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中日參與世界博覽會事業比較研究：

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指導教授：彭立忠博士

研究生：林劍秋 撰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七月



摘要

中國與日本早在 1866 年就接到法國邀請參加 1867 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日本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搪塞，並未組團，到了 1873 年方由海關洋員組團參加奧國舉辦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另日本明治政府於 1877~1907 年間共舉辦六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而中國卻遠落後 30 多年於 1910 年方首度舉辦等同規格的「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彼此間博覽會發展的延誤落差？有鑒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且深度尚淺，另有鑒於中日兩國現代化也有類似延誤落差的研究，大多限於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可惜少了整體的解釋，我們需要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本論文以中日兩國參與世博會事業進行案例研究(Case Study)，並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方法上以歷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除了要分析影響博覽會事業成敗的關鍵活動成員(Player)，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還要掌握關鍵活動成員和博覽會引進過程是被鑲嵌在社會脈絡(context)，一些地理、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脈絡因素不容忽視。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進而以此綜合觀點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關鍵詞：世界博覽會、賽會、同光中興、明治維新、現代化



感謝辭

客家人夙以「耕讀傳家」為訓，父母親總寄望孩子們能十年寒窗金榜題名光宗耀祖，民國 74 年順利從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理當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終因遇上這一輩子的另外一半，先成家立業等諸多因素而緩了下來。服完預官役進入資訊工業策進會工作，民國 96 年工作滿 20 年，兩個小孩也都在攻讀碩士，老大群雅也正要進入博士班攻讀學位，在這樣的氛圍下，突然想起自己還欠父母親多年企盼的博士學位，再加上工作的需要，毅然參加母校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隔年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的考試，蒙師長們的厚愛，年近花甲的老學生得以第二名的成績順利進入博士班就讀，在課程學分和資格考試都能按規定時程順利完成，惟論文撰寫一直定不下題目，且在職工作的關係而延誤，幸指導教授彭立忠博士的鼓勵與教導，以及陳小紅教授、呂紹理教授、洪泉湖教授、劉季倫教授等口試老師在論文給予的指導，方能順利完成這本論文，老師們提攜與獎掖後進之情，銘感在心。

感謝我工作 30 年的資訊工業策進會，也要感謝我借調多年的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及現在的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提供時間與資源，讓我能夠重回母校進修攻讀博士學位。感謝資訊工業策進會柯志昇執行長、龔仁文副執行長、黃國俊副執行長、何寶中副執行長、高天助所長、林宗男所長、吳文玲處長、蕭美麗處長，以及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汪庭安執行秘書、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鐘嘉德執行秘書、郭耀煌執行秘書、連錦漳參事等長官們的提攜與指點，讓我能順利完成博士學業。

最後要感謝愛妻淑美一輩子的陪伴，雖然她總是說她不愛唸書，倒能將家庭與一家子的讀書人照顧的妥妥貼貼，尤其表現不錯的兩個寶貝兒子群雅與群喻，也都順利取得博士與碩士學位並成家立業，讓我無後顧之憂。更在畢業之際讓我抱了孫女，不只是雙喜臨門，孫女芝嫻的可愛，總讓我在撰寫論文時的苦悶，平添生氣活力。

更要感謝慈愛的母親，無怨無悔的栽培與支持，以及多年的包容與鞭策，終能為竹北新瓦屋林家再添一博士，「父子博士」或許在這個年代已不稀奇，但我衷心的要將年近 60 歲所拿到的博士學位，以及吾兒群雅前年在台灣大學取得的博士學位，一起獻給我敬愛的母親，並告慰父親大人在天之靈。

林劍秋謹誌

106.08.26



目 錄

摘要	iii
感謝辭	v
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背景.....	1
第二節 文獻檢閱.....	7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9
第四節 研究概要.....	31
第二章 世界博覽會的發展與意義.....	33
第一節 世界博覽會的起源.....	38
第二節 工業與帝國展示時期的世博會(1850~1920年).....	46
第三節 世界博覽會的定義與意義.....	83
第三章 中日兩國參與世界博覽會情形.....	101
第一節 中日兩國何時接觸世博會.....	103
第二節 中日兩國何時清楚意會世博會.....	121
第三節 中日兩國何時參展學習世博會.....	153
第四節 中日兩國何時舉辦世博會.....	187
第四章 中日參與世博事業落差分析兼論兩國現代化.....	225
第一節 從兩國意會學習實作世博會過程的差異來看.....	226
第二節 從兩國世博會被鑲嵌在社會脈絡的差異來看.....	262
第三節 從中日參與世博事業落差因素來看兩國現代化差異.....	272
第五章 結論.....	347

附錄

一、台灣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373
二、中國大陸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378
三、日本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385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397
二、日文部分.....	420
三、英文部分.....	434



圖目錄

圖 1-1 作者於 1993 年考察「1992 年西班牙塞維亞世界博覽會」會後展 場運用.....	5
圖 1-2 作者參訪 2000 年德國漢諾威世界博覽會.....	5
圖 1-3 作者於 2005 年與友人福井昌平(愛知世博首席製作人)攝於「愛· 地球廣場」前.....	5
圖 1-4 中日兩國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比較架構.....	27



表目錄

表 1-1	美國戰後主要現代化學者對經濟、政治與文化關係的論述分類.....	20
表 2-1	歷屆 BIE 世界博覽會一覽表.....	35
表 2-2	法國於 1797 年~1849 年間舉辦的博覽會.....	41
表 2-3	截至 1912 年在 BIE 登錄的重大世界博覽會一覽表.....	46
表 3-1	幕末與明治時期日本參與主要世界博覽會展品紀要.....	112
表 3-2	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接觸(世界)博覽會比較表.....	119
表 3-3	中國滿清政府時期受邀或參加 BIE 認可的世界博覽會譯名一覽表.....	124
表 3-4	中日兩國何時清楚意會世博會一覽表.....	151
表 3-5	中日兩國於 1877~1911 年組團參加世界博覽會情形.....	154
表 3-6	1873 年維也納世博會參展國得獎數.....	163
表 3-7	1904 年聖路易士世博會的日本展品.....	178
表 3-8	日本明治 4 年(1871 年)~明治 41 年(1908 年)舉辦的博覽會.....	188
表 3-9	日本於 1877~1907 年所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相關統計資料.....	196
表 3-10	南洋勸業會民間社會組織機構一覽表.....	217
表 3-11	中日兩國於 1871~1911 年所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	223
表 4-1	中國人與日本人意會(世界)博覽會比較表.....	249
表 4-2	日本於 1877~1911 年組團參加 BIE 世界博覽會情形.....	258
表 4-3	中日兩國學習世博會過程比較表.....	261
表 4-4	日本為中日戰爭所舉辦的內國博覽會.....	267
表 4-5	中日兩國現代化關鍵成員對西風東漸與現代化的意會比較.....	276
表 4-6	中日兩國從 1860 年代至 1870 年代主要出使西洋比較表.....	298
表 4-7	中日兩國面對西風東漸所做的回應比較.....	322
表 4-8	從中日參與世博會事業比較兩國現代化差異.....	345
表 5-1	主要國家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單位:美元).....	365
表 5-2	世界主要國家 GDP(單位:百萬 1990 年國際元).....	36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背景

2014年7月迎來甲午雙甲子，120年前爆發的甲午戰爭，標示著中日早期現代化的成敗。回想1860年代的中日兩國同受歐美帝國主義的衝擊，分別以「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進行早期現代化。中國自鴉片戰爭後處在內憂外患的局勢，地方要員與思想家提出了學習西方的主張，進行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與此同時日本德川幕府在美國黑船的叩關之後也發生變化，倒幕維新的思想最終推翻了幕府統治。明治新政府採取一系列維新措施，進行早期的現代化，成功的讓日本由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化社會。而發生於1894年7月25日的甲午戰爭，至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署馬關條約，戰爭結束也終結了中國洋務運動，代之而起的戊戌變法與立憲運動的再次現代化改革，由於成效不彰且不符合革命志士的期待，終至滿清皇朝的覆亡，標示著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挫敗與現代化富國強兵的成效落後日本。

兩國現代化的成敗曾激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與討論，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國際背景下，兩國現代化的命運何以如此不同？從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東瀛的康有為和梁啟超開始痛切地比較分析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成敗原因，百年來海內外華人學者對此課題進行了不少的研究和探討。依據田毅鵬、李少軍兩位教授的研究，百年來海內外華人學者先後掀起了三次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的浪潮。首先，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間，洋務運動時期對明治維新有所瞭解的王韜、薛福成、鄭觀應、李鴻章等人對中日兩國現代化進行了比較。甲午戰爭後，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藉由中日的比較，認識到明治維新的長處，決心仿效日本實行變法。梁啟超就從器物、制度、文化三個方面探討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落後日本，可謂是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的肇始。20世紀初，赴日的中國留學生，也深切的體會到中日兩國在各方面的差距，他們辦報著書，例如1928年戴季陶發表《日本論》，從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較中日文化與社會的異同，從政治理念、宗教意識和個人修養等方面，

探究日本比中國進步的原因。其次，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到抗戰結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救亡圖存的同時，也積極地從學術研究角度反省19世紀中葉以來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成敗得失。該時期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焦點，主要在中日外交史和國民性比較研究兩個方面。其中以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之中國與日本》與繆鳳林編著的《中日民族論》為代表作。再次，1980年代以來的研究高峰。如果說前兩次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熱潮，是以政治家、思想家、新聞記者和部分學者為主力的話，那麼第三次比較研究浪潮則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為主，研究領域也擴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田毅鵬教授總結百年來學術界主要圍繞著中日現代化的起點，社會精英、社會結構與現代化之間關係等議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李少軍教授則指出學者專家多從兩國近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諸多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參見田毅鵬，2001a；李少軍，2001)

曾於台灣與美國多所大學任教的蔡文輝教授指出：「對中國而言，現代化的問題是非常複雜。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和其他從事比較的學者，經常都為一項事實感到困惑，那就是中國和日本幾乎是在同時開始踏上現代化的路途，但是日本成功地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中國卻失敗了。」(蔡文輝，1980：419) 當代中國現代化理論與比較現代化進程研究的領導學者、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先生亦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是「被延誤了的現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對中國現代化延誤的探索，長期以來是中外學術界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發展之謎，也就是為什麼一個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的經典農業文明大國，在邁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會如此步履艱難，險阻迭起，前路漫漫。(羅榮渠，2013：19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者郭廷以院士，亦曾對中國近代化的延誤發表專文，從中國滿清的知己知彼功夫不夠，尤其是知彼功夫的欠缺，對變革時代的認識不明，致蹉跎貽誤，措施乖方，造成百年以來民族危機。(郭廷以，1980)美國史學界研究東亞史的權威學者哈佛大學賴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教授與同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共同執筆《東亞—近代化》(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一書時，了解到雖然早知道19世紀日本與中國的近代化速度有很顯著的差異，但兩位教授認為當時的學者專家並沒有完全闡明差異的原因。學者專家們曾試著從19世紀後半期日本海外留學生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以及當時企業界的發展例子，來看日本與中國近代化過程的差異點，但解釋並不完全。因此，賴世和與費正清試著從兩國的社會結構、思想、價值觀去闡明之間近代化的差異。(賴世和著，王崧興譯，1963:17) 美國知名的漢學家和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芮瑪麗(Mary C. Wright)，在《同治中興》一書從「內生的」(endogenous)觀點來解釋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進程，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她用了不少篇幅敘述和分析儒家文化如何影響「同治中興」的中堅人物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和社會精英們的生活、思想和行動，如何影響中興的各種政策和措施，最後決定了中興的殞落。芮瑪麗教授將這段歷史歸結為「中國保守派的最後抵抗」，其實就是指儒家文化的最後反抗。在她看來，儒家輕視商業和產業，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是注定無法步入現代化社會。(Mary C.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2002)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伊田憲家在《中日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一書指出，中國和日本的近代化分別以鴉片戰爭和黑船來航為契機，共同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為起點，後來兩國近代化的發展速度有了很大差異，主要原因來自列強壓力的強弱不一之外，還有兩國統一市場形成與否的差異。當然也可以說針對各列強的壓力能否作出有效的反擊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參見錢國紅，2009：pp.代序2-代序4)

不僅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專家們，一些社會研究者也做了許多的嘗試，去理解中日兩國現代化的不同。有些是集中注意於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其他則強調政治制度、家庭結構或是西方軍事和政治的影響。(參見蔡文輝，1980) 關於中國宗教和現代化的著作可以韋伯(Max Weber)的《中國宗教》一書為代表，說明中國之所以未能發展出資本主義，主要是因為缺乏了一種特殊的宗教倫理做為必需的動力。Marion J. Levy Jr.從家庭是中國社會的核心，與日本家庭制度相比較，得出中國嘗試現代化所遭遇的失敗是由於中國家庭結構沒有能力應付變遷的看法。中國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現代化方面，有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獨裁

的社會起源》一書，討論土地貴族與農民在國家朝向現代化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摩爾把中國現代化的失敗歸咎於底下兩個因素：第一，由於科舉制度，在官僚體制的底層，有為數不少的候補官員(如生員)，他們成為政府官員和普通人民之間的過渡性團體，卻常在社會體系當中把精力浪費於一些無效的反叛和暴動。相對的，日本武士中的較低階層卻是19世紀中促成現代化的最大動力。第二，中華帝國的社會結構從未創造出像西歐封建制度後期出現的城市貿易與製造業階級，也就是現今所謂的「中產階級」。因為在中國科舉制度之下，使得有雄心壯志的菁英投入功名而遠離商業，中國人深信經商賺錢對於讀書人、朝廷命官的威望和正直是一種威脅。(Barington Moore 著，拓夫譯，1991：173-174)

前揭有關於中國現代化延遲的研究，大多限於中國社會系統中的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事實上，不乏關於宗教、家庭結構、政治組織和法制系統的小型理論，可惜無法使我們對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成敗有一整體的解釋。誠如蔡文輝教授所言，「很顯然的，大部分有關此主題的研究都過於單純，他們時常過分強調社會系統中某一特定範圍，而忽略了其他部分。因此，設計出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更能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是必要的。」(蔡文輝，1980：440)

除中日兩國現代化時間落差之外，有一段被人遺忘的世界博覽會發展史，兩國幾乎同時接觸到世博會，而實際舉辦世博會的歷史也存在著三、四十年的時間差。筆者自1987年任職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迄今，世博會一直都是工作上關注的一個主題。1991年行政院為加速台灣資訊工業的發展，核定「資訊工業部門發展計畫(1990~2000)」，其中五大推動計畫列有籌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的工作項目，經濟部科技顧問室曾委託台灣嵐德科技顧問公司於當年完成「我國於西元2000年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之可行性與財務可行性評估兩本報告。之後經濟部科技顧問室升級為經濟部技術處，於1993年將「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規劃案」委由資策會協同日本世博會專家泉真也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接手執行，陸續完成《我國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規劃設計報告書》與《我國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之交通規劃與財務分析報告書》，當時筆者因緣際會擔任該國際合作案專案經理，

開始了個人的世博會經歷，親身參訪過多次世博會，如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也參觀過各國舉辦的國家級博覽會，如1990年日本大阪花與綠博覽會、2002年瑞士國家博覽會、2002年荷蘭國際園藝博覽會，以及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所舉辦的地方性博覽會。也曾訪問多個博覽會籌備組織汲取籌辦經驗，亦曾考察1970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會、1992年西班牙塞維亞世博會、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會後會場運用成效。



圖1-1 作者於1993年考察「1992年西班牙塞維亞世界博覽會」會後展場運用



圖1-2 作者參訪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界博覽會

圖1-3 作者於2005年與友人福井昌平(愛知世博首席製作人)攝於「愛·地球廣場」前

在參訪的過程中，回顧跨入21世紀之後的十餘年間，除2000年6月在德國漢諾瓦舉行的世博會，共吸引1,800萬參觀人潮。五年後的2005年，日本繼1970年在大

阪舉辦亞洲首屆由「國際展覽局(BIE)」¹ 認可的世博會經驗，再次成功的舉辦「日本國際博覽會」(愛知萬博)，會期185天，會場佔地173公頃，會場建設投入1,350億日圓(約12.5億美元)，而主辦單位營運費達550億日圓(約5億美元)，總計有2,200萬參觀人次。之後，中國大陸延續舉辦讓世人驚嘆的「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在2010年的上海成功舉辦BIE同意且夙有「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域奧林匹克」之稱的世博會，規模比愛知萬博更為盛大，會場328公頃，會場直接投資額高達30億美元，參觀人次創下新世界紀錄為7,308萬人次，遠遠超過1970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所締造的6,422萬人次的世界紀錄，成為世界與東亞國家所樂道的世紀盛事。中國雖有後來居上之勢，不過中日兩國就第一次舉辦BIE同意的世博會時間來看，之間也有著40年的差距。

或許大家比較陌生底下的一段歷史，中國滿清政府與日本德川幕府早在1861年就曾接到英國駐地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在中國的邀請參加1862年第二屆倫敦世博會，最終由駐地領事在中國與日本徵集展品參加倫敦世博會。1866年兩國亦曾接到參加隔年法國第二屆巴黎世博會的邀請，日本德川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則推諉婉拒未能參展，到了1873年方委由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操辦，參加由奧國舉辦的「維也納世博會」。據趙祐志教授的統計，1866年至1911年間，中國接到至少80次的邀請，其中滿清政府組團參加13次，寄物參展6次，派員蒞會11次。(趙祐志，1997：288) 中國在20世紀初，除應邀參加歐美的世博會之外，亦曾在1910年舉辦第一次的國家級博覽會「南洋勸業會」。而日本應邀參加法國1867年舉辦的巴黎世博會之後，明治新政府於1877年至1903年間共舉辦5次「內國勸業博覽會」，依據日本學者百崎誠的研究統計，明治時期的

¹ 由於各國競相舉辦世博會，為維護世博會的市場秩序避免客源分散，1928年的11月由31個國家代表在巴黎開會簽訂《國際展覽公約》，規定世博會的分類、舉辦週期、主辦者和參展者的權利義務、國際展覽局(BIE：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的權責與設置等等。BIE依照該公約的規定應運而生，管理各國申辦、舉辦世博會及參加國際展覽局的工作，保障公約的實施和世博會的品質，截至目前有169個會員國。依據BIE的定義，世博會是以教育大眾、分享創新、加速發展及促進合作的全球性活動，可分成綜合型世博會、專業型博覽會、國際園藝博覽會、米蘭設計博覽會等4個類別。(參見BIE官網：<http://www.bie-paris.org/site/en/expos/about-expos/expo-categories>)

1871年至1912年的40年間舉辦過以博覽會為名的活動共有122個之多。(百崎誠，2005：5-6) 就中日兩國舉辦博覽會情形來看，皆在1861年與1866年同樣接到英法邀請參加各自舉辦的第二屆倫敦世博會或第二屆巴黎世博會的邀請，何以日本能領先於1877年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往後一路蓬勃發展至1970年成功舉辦BIE認可的世博會？而中國卻遠遠落後30多年，在1910年首度舉辦等同「內國勸業博覽會」規格的「南洋勸業會」，並遲至百年後的2010年才成功舉辦BIE認可的世博會，中日之間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及世博會的事業，有著30年至40年的差距，有趣的是中日現代化也有類似時間的落差，是什麼因素造成中日博覽會事業與中日現代化的落差，以及世界博覽會與國家現代化之間的關係，都讓人好奇，這正是本論文想要解答的謎題(puzzle)。

第二節 文獻檢閱

世界博覽會的研究主要探討19世紀至21世紀所舉辦的世博會，從1980年代開始，尤其是主要舉辦國家的英國、法國、美國的學者專家進行了研究分析，而日本也從1980年代後半起跟進，東西方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據日本學習院大學伊藤真實子教授的研究，歐美有關世博會的研究起自於1930年代德國思想家Walter Benjamin有關「世界博覽會是人們膜拜商品聖地」的說法。他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書中，討論世博會主題的時候，指出在世博會出現之前，歐洲各國就有自己的工業產品博覽會，1798年²首次在巴黎戰神練兵場舉行，取悅了法國勞動階級與普羅大眾，展覽日變成他們的解放節日。(Walter Benjamin 著，張旭東、魏文生譯，2002：269-272；伊藤真實子，2008b) 由於受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結合社會學、文學、媒體研究、文化人類學來研究工業社會文化

² 依據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一書，有關「...歐洲各國就有自己的工業產品博覽會，1789年首次在巴黎戰神練兵場舉行」的譯文，經查證與參酌Walter Benjamin原文，應該是「1798年首次在巴黎戰神練兵場舉行」，而非前揭譯書的1789年。(參見Benjamin，1969：167)

現象的影響，以及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研究一些被殖民國家受到前殖民國家影響的文化現象，再加上福柯(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揭露博覽會隱藏權力關係的影響，1980年代歐美學者燃起對世博會研究的興趣。福柯將大型展示活動視為近代「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展現，把受規訓約制者放在可見的位置，而擁有權力者隱身幕後窺伺被展示的人與物，激起了博覽會具有殖民知識建構、帝國主義殖民控制、文化霸權等面向的討論。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Tony Bennett在他的《博物館的誕生》一書，將博物館、美術館、博覽會、百貨公司、遊樂園等文化娛樂設施視為「展覽複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是為政府的治理而生，是一種新權力運作形式。Tony Bennett引用福柯《規訓與懲罰》的論述，認為博物館與監獄、療養院、軍營、學校等機制相同，都是近代興起的權力裝置。他將1851年萬國博覽會中的「水晶宮」展館與當時的環形監獄做比較，點出19世紀展示觀看技術的幾個特徵。世博會是一種「可以認知、可以窺見奇觀」(knowable and visible spectacle)的技術，一種百科全書式的蒐羅萬事萬物加以展示，提供大量參觀者觀覽的技術。而近代新興民族國家為了誇耀現代化成果與規訓國民，世博會很自然就成為創造此種奇觀的最大載體。

(Bennett, 1995: ch.2) 另外一位英國學者Paul Greenhalgh的《白駒過隙》(Ephemeral Vistas)一書，針對1851年到1939年英、法、美等國所舉辦的世博會，對起源和概念演進、資金籌措、帝國主義、人種展示、國家形象等議題進行討論。(Greenhalgh, 1988) 在另一個歐洲世博會大國的法國，其文化與政治史專家Pascal Ory曾受邀於2010年上海世博會法國館舉辦個人講座「思想的論辯系列」，也曾於2010年10月到北京法國文化中心，以「1851年至2010年的世博會：現代性的八種功能」為題，與聽眾一起追溯世博會的歷史及其與現代性的關係。Pascal Ory在1982年與1989年分別出版《巴黎世博會》(L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de Paris) 與《世博會》(L'expo Universelle)兩本專書，研究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初在巴黎舉辦的世博會，討論法國產業、美術及帝國主義殖民等議題。1889年巴黎世博會以後，會場出現來自殖民地「野蠻人」的展演與其居住環境的再現，這樣的「殖民地展示」成為世博會

固定的娛樂展項。(伊藤真實子，2008b：104)

繼英、法之後美國成為20世紀世博會大國，其研究世博會的專家Robert Rydell教授在《全世界盡在博覽會》(All the World's a Fair)一書，記述1876年至1916年間在美國舉行的12屆博覽會³，從策展者的角度出發，指出世博會是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所建立的一套價值觀，西方文化霸權的展現與傳遞，以及動員民眾參與國家現代化工程的有效工具。另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Edward Said教授，他的著書《東方主義》，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及福柯的「知識權力」為基礎，論述東方主義論者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的支配，知識再生產的霸權架構，以及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及主僕式的霸權體系。(Edward Said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1999) 另外一位同樣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Timothy Mitchell教授，他的《殖民埃及》一書則透過英國在埃及建立軍警體系、學校制度、打造新村落住宅空間等案例，呈現福柯揭露的規訓力量。如何將殖民地實體世界扭轉成為宛如博覽會(world as exhibition)社會的過程，展現了帝國與殖民地的權力關係。博覽會會場中不只展現殖民國家所勾勒的帝國秩序藍圖，它更具有複雜的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關係。至此，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前半期間的世博會，肩負西方強權國家殖民正當化的文化裝置觀點，成為1980年代至21世紀初世博會研究的重要論述主軸。(伊藤真實子，2008b：103)

近年世博會研究漸漸擴及到20世紀後半至21世紀初的世博會，討論與奧運這種超大型活動(mega-events)、大眾文化、觀光旅遊、都市發展、傳播媒體等領域的關

³ 1876年於費城舉行的「美國獨立百周年博覽會」、1884年於新奧爾良舉行的「世界工業和棉花業百年紀念博覽會」、1893年於芝加哥舉行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紀念博覽會」、1895年於亞特蘭大舉行的「棉花州國際博覽會」、1897年於田納西州納什維爾舉行的「田納西州百年國際博覽會」、1898年於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舉行的「穿越密西西比博覽會」、1901年於水牛城舉行的「泛美博覽會」、1904年於聖路易士舉行的「購買路易士安那州百年紀念博覽會」、1905年於波特蘭舉行的「路易士和克拉克遠征百年紀念博覽會」、1909年於西雅圖舉行的「阿拉斯加太平洋博覽會」、1915年於加州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1915-1916年於聖地牙哥舉行的「巴拿馬加州博覽會」。(參見Rydell，1984)

係。Alexander、Coffey和Lau蒐集整理發生在1851年至2005年間24個國家所舉辦的博覽會(以歐美國家為主)相關研究資料,共1,868筆書籍與文章等二手資料。(參見: Geppert, Coffey & Lau, 2006) 另有關世博會研究綜論的部分,中國為籌備上海世博會,上海圖書館的「上海世博會資訊中心」曾編譯出版「世博資訊叢書」,可說是了解世博會的幾本入門書。分別翻譯Alfred Heller的《文明的進程:世博會的發展與思考》、Claude Servant和Ippei Takeda的《國際級博覽會影響研究》、Marcel Galopin的《20世紀世博會與國際展覽局》、Monclus Javier Fraga的《世博會和城市規劃》。(參見: Alfred Heller著,吳惠族等譯,2003; Claude Servant & Ippei Takeda著,魏家雨等譯,2003; Marcel Galopin著,錢培鑫譯,2005; Monclus J. Fraga著,于漫譯,2008) 此外,2005年黃振萍翻譯Karl Gerth的《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討論1905—1937年民國時期的國貨運動,其中有專章討論民族主義商品展覽會,以及1928年展覽會建立的民族主義視覺認知。(Karl Gerth著,黃振萍譯,2005) 另陳瑤等人翻譯M. J. Morgan編著的《人類景象:世博會從倫敦到上海》,就工業革命、文化交流和近代世博三個章節,以歷屆大型世博會為主軸,介紹世博會歷史,講述世博會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M. J. Morgan著,陳瑤等譯,2010)

另依據台灣大學呂紹理教授在《展示台灣》一書所做的整理,晚近20年間歐美學者分別從不同的方法途徑去理解世博會:(1)從制度、社會與經濟的角度去探討其演進史及其蘊含的歷史意義,如Paul Greenhalgh的《白駒過隙》(Ephemeral Vistas)一書,從1851年水晶宮倫敦世博會開幕所宣示的目標,去考察往後百年間的世博會性質,以及從組織營運的角度出發,去討論世博會的四種營運模式。(2)從行動者(actor),分成策展者、被展者與參觀者的角度去檢視世博會,例如Robert W. Rydell的《全世界盡在博覽會》(All the World's a Fair)一書,從策展者的角度出發,主張世博會是19世紀中產階級所建立的一套價值觀與文化霸權的展現與傳遞,以動員民眾參與國家現代化工程。而Lester Moses從被展示者角度來看,研究美國印第安人在博覽會中的角色,就發現印第安人藉由博覽會被展示的機會,企圖改變整體社會對其負面形象的認知。(3)受到文化人類學的影響,把世博會視為意涵極為豐

富的象徵符號場域，可透過世博會的表達(presentation)與再現(representation)，我們可以捕捉社會秩序與文化價值的基本原則與形貌，更可探測對於新秩序與新價值的想像。如人類學者Burton Benedict的《世界博覽會的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World's Fairs)一書，借北美印第安人的「誇富宴」(potlatch)概念，來說明世博會就是現代社會誇耀富裕與禮儀餽贈的儀式，藉此建構並販賣國際邦儀、教化理念、科技價值、生活方式及藝術在社會中的角色。(4)受到Michael Foucault的影響，把展示活動視為近代規訓權力的施展，進而引發博覽會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之間關係的探討，如Patricia Morton的《混血的現代性》一書，指出1931年「殖民地博覽會」會場建築，乃是帝國與殖民地秩序在視覺上的展演，此一秩序乃文明與野蠻及進步與落後之文化論述的實體化表徵。(5)、把世博會視為「現代性」(Modernity)的龐大表徵。加拿大學者Keith Walden的《多倫多成為現代都市》一書，討論了博覽會與城市現代化的關係，將博覽會視為展示現代性的櫥窗。從世博會具各主辦國到會場內各參展國的國家館的爭奇鬥豔，表面上在塑造國家形象，其實是國家主權的彰顯與爭取認同，博覽會會場中的展館配置與展品分類，反映現代知識分類架構，更是展示工業文明強大生產力的重要櫥窗。(參見呂紹理，2005：30-36)

就以上的整理分析，歐美有關世博會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惟對中國舉辦博覽會的相關研究卻不多見。Alexander、Coffey和Lau蒐集整理發生在1851年至2005年間24個國家所舉辦博覽會相關研究的1,868筆書籍文章等二手資料，僅列了一篇美國南洋華僑研究專家Michael R. Godley在1978年發表有關1910年中國滿清政府時期的南洋勸業會專文。(Godley, 1978) 透過政大圖書館的電子資料庫查詢，能掌握的有1977年Irene E. Cortinovis的〈聖路易士博覽會的中國〉、1996年Barbara Vennman的〈龍、泥人與王朝：1876-1904年間美國萬國博覽會的中國〉、1996年Sue Bradford Edwards的〈帝國東方遇見民主西方：聖路易士博覽會的中國代表團〉等運用世博會探討中國意象的專文。還有Susan Fernsebner在2002年加州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中國在1876至1955年間，如何運用參加世博會與自己舉辦博覽會的方式展現中國並促進國家發展，尤重政府官員和知識份子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Fernsebner, 2002) 另她在擔任瑪麗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時，發表一篇討論1910年南洋勸業博覽會時代意義的專文。(Fernsebner, 2006) 並於2010年中國大陸舉辦上海世博會之際，也在《亞洲研究》期刊發表一篇從歷史的觀點比較1910年滿清時期南洋勸業會與百年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專文。(Fernsebner, 2010) 此外，2006年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Abigail Markwyn完成《建構文明縮影：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展現美國進步年代願景與地方政治影響力》的博士論文，一反過去學者從帝國主義與國家經濟發展的視角，試圖從地方的政治與社會議切入，討論美國在1915年舉辦的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其中第四章〈博覽會展示想像中的亞洲〉，特別討論主辦單位因應舊金山反亞洲人情緒的地方議題，邀請中國與日本參展情形。(Markwyn, 2006) 兩年後，Markwyn特別將這個章節的論述，於《西方歷史季刊》發表〈經濟夥伴與外來的他者：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的中國與日本〉專文。(Markwyn, 2008) 2012年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Hyungju Hur(許炯朱)所完成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在1851至1910年間，中國滿清政府想透過參加世博會，以及舉辦1910年南洋勸業會來展現現代國家的企圖，如何受到知識份子與媒體報導的質疑。(Hur, 2012) Jeffer Daykin在2014年的日本企業歷史學會年會上發表過〈博覽會從歐洲傳到日本與中國：在形式的轉變〉一文，以博覽會展品評審團獎勵方式的演變，來討論英國1851年倫敦世博會到日本1903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與中國1910年南洋勸業會舉辦宗旨的改變。(Daykin, 2014)

歐美世博會研究起步比較早，日本亦不遑多讓，時間要比海峽兩岸來得早一些，論文與專書的數量上也比較多。(參見本論文附錄：三、日本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綜論世博會的專書由籌辦單位、科技作用、國家發展與及文化藝術等角度切入，討論博覽會的概念、歷史及意義為主。如永山定富的《內外博覽會總說》、山本光雄的《日本博覽會史》、吉田光邦的《萬國博覽會研究》、平野繁臣的《國際博覽會歷史事典》、諸岡博熊的《博覽會學肇始》、寺下勅的《日本的博覽會》、橋爪紳也的《萬國驚奇的博覽會》、海野弘的《20世紀的萬國博覽會》等代

表性著作。(永山定富, 1933; 山本光雄, 1970; 吉田光邦, 1989; 平野繁臣, 1999; 諸岡博熊, 1987; 寺下勅, 2005; 橋爪紳也, 2005; 海野弘, 2013)另吉見俊哉的《博覽會政治學》是從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及大眾娛樂的角度來談世界覽會的發展。吉見教授隨後的《萬國博覽會幻想》反省運用萬國博覽會滿足民眾追求富裕與政府加速國家發展的迷思。(吉見俊哉, 1992a、2005)另一代表性人物國雄行的《博覽會與明治日本》與《博覽會時代：明治政府的博覽會政策》兩本著作，探討明治政府舉辦博覽會的加速國家發展的意圖。(國雄行, 2010、2005)至於這方面的期刊論文，有平野繁臣、吉田光邦、吉見俊哉、國雄行、百崎誠等日本博覽會學者專家，分別就日本的博覽會發展史，討論博覽會概念的變化。神戶大學重富公生教授則以1851年第一屆倫敦萬國博覽會為案例，關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同樣關注經濟面向有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清川雪彥的〈博覽會與共進會在殖產興業政策所具有的意義〉論文與《日本經濟發展與技術的普及》專書，有專章討論博覽會與共進會對日本技術普及與市場形成所具有的意義。而東京藝術大學教授佐藤道信從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與美術行政來研究分析博覽會與博物館，專章討論殖產興業與美術振興的相輔相成關係。在文化藝術方面的討論，日本博物館專家椎名仙卓對整理日本博物館的發展史與博覽會的關係。多摩美術大學教授榎木野衣的《戰爭與世博》，研究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對日本現代美術的影響。博士論文則有福井庸子的研究討論明治時期博物館與博覽會等展示空間的教育特質。

有關日本參加歷屆世博會的研究，專書討論日本海外參展對國家發展的意涵，有伊藤真實子的《明治日本與萬國博覽會》、堀田綾子的《1910年日英博覽會》、山本佐惠的《戰時舉辦的萬國博覽會與日本的國家形象》等書。博士論文有伊藤真實子從明治政府海外參展的策略、展品、日本館，討論近代日本在萬國博覽會的自我認識。久本明日香以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案例，分析討論中美兩國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形象。寺本敬子針對日本首次正式參加第二屆巴黎萬國博覽會與後來的第三屆巴黎萬國博覽會，研究分析日本與法國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形象。三島雅博整理分析明治政府時期參加1867年、1873年、1876、1878年、1889年、1893年等世博會的日本館建築、參展組織、展品與世博會關鍵人物。畑智子研究分析1876年費城萬國博覽會、1893年芝加哥萬國博覽會、1904年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等三屆在美國世博會的日本館建築。相關期刊論文依世博會舉辦的先後順序論文來看，楠元町子與寺本敬子分別以1862年第二屆倫敦萬國博覽會與1867年第二屆巴黎萬國博覽會為案例，研析在世博會展現出來的日本形象。針對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西川智之從「日本流風」(Japanism)找出展現的日本形象。戶田清子與藤原隆男也以維也納博覽會為焦點，討論近代日本博覽會事業對振興產業的意義與扮演的角色。至於1876年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坂本久子與畑智子從展品來討論它與前幾屆萬國博覽會間的關係，以及日本的展示空間與日本展館的建築。至於1878年舉辦的第三屆巴黎萬國博覽會，樋口いづみ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分別討論日本徵集展品主其事者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意圖與日本教育部門的參展情形。1893年美國芝加哥博覽會有平井茜針對的日本館、關口英里則針對女性館，而大井浩二討論美國的女作家與芝加哥博覽會。針對1900年第五屆巴黎世博會，有吉田典子討論本屆巴黎世博會的政治、文化與象徵意涵。1904年美國聖路易世博會，有楠元町子與伊藤真實子研析明治政府的國際戰略、國際關係、皇室外交、日俄戰爭時期的外交等議，畑智子則以日本館建築來看19世紀的日本，渡邊かよ子討論「教育」而久本明日香則研析聖路易世博會「娛樂街」的設置。

有關日本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研究論文，概論有國雄行對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基礎研究，個案則有丸山宏的〈明治初期的京都博覽會〉、関根仁的〈明治16年水産博覽會的舉辦〉，國雄行的〈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與大阪〉，松田京子亦以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討論展示「他者」(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表象的技法與帝國博覽會。延續帝國博覽會的議題，伊藤真實子為文介紹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台灣館與人類館，並討論帝國殖民與人種展示等議題。松田京子更以1914年東京大正博覽會與1922年和平記念東京博覽會，研究分析大正時期的「南洋」表

象。專書方面，山路勝彥的《大阪的繁華時光：剖析兩次萬國博覽會》，運用豐富的史料，比較分析日本所舉辦過最具代表性的1903年大阪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與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這些專書與論文對本人迭有啟發，整理的資料對本論文也很有參考價值。

受到福柯與歐美探討世博會帝國主義性質的影響，許多日本學者也研討博覽會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關係及人種展示的議題，松田京子的《帝國視線》討論1903年大阪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與帝國殖民，山路勝彥的《近代日本的殖民地博覽會》整理日本帝國主義在宣揚國威與頌揚殖民成果所舉辦的一系列殖民地博覽會。有關殖民地方面的論文，山路勝彥有多篇論文研究日英博覽會設置「人間動物園」、拓殖博覽會與帝國版圖裡的諸人種、台灣與滿洲所舉辦的殖民地博覽會。至於研究影響日本世博會事業的社會菁英與關鍵人物方面，專書有伊原澤周的《論日本與中國面對西洋文化的因應之道》、芳賀徹的《將軍大人的使節：幕末日本人的西歐體驗》、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須見裕的《德川昭武：萬博先生傳記》、久米邦武編寫的《特命全權大臣：米歐回覽實記》、國雄行的《佐野常民—佐賀偉人傳》、吉田光邦的《日本近代化時期雇用的外國人(2)—產業篇》等著書，介紹了日後影響日本博覽會事業至鉅的德川昭武、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福澤諭吉、澀澤榮一、佐野常民、清水卯三郎、德國人華格納。論文方面，寺下勅就幕末與明治時期的博覽會先驅，如栗本鋤雲、清水卯三郎、佐野常民、福澤諭吉、田中芳男、澀澤榮一、手島精一、櫛引弓人、大林芳五郎等人，做簡要的生平事蹟介紹。松村昌家與大前義幸則有多篇討論1862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出現的幕末使節團專文。愛知峰子、澤護、關根仁、嚴安生分別對日本博覽會事業關鍵人物的樋口一葉、清水卯三郎、大倉孫兵衛、佐野常民、久米邦武做專文的介紹。

最後，日本學者專家對中國近代博覽會也有相當早的研究，倉橋正直的〈清末實業的振興〉，野澤豐的〈1903年大阪博覽會與張謇來日〉、〈辛亥革命與產業問題：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與日、美實業團的訪華〉及〈民國初年袁世凱政權的經濟政策與張謇〉，以及吉田光邦的〈1910年南洋勸業會始末〉、小島淑男的〈

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和東南亞華僑>、鈴木智夫的〈李圭訪美與在美國的華人〉、〈萬國博覽會與中國(1851年~1876年)〉、〈清朝赴美教育使節團與在日美的華人〉、〈祁兆熙的《出洋見聞瑣述》〉、久本明日香的〈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與清末中國〉、楠元町子的〈萬國博覽會與中國〉、柴田哲雄的〈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世界博覽會〉、重富公生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巡禮：世博會歷史上的位置〉等諸篇。尤以鈴木智夫的〈萬國博覽會與中國(1851年~1876年)〉專文，整理滿清政府對博覽會觀念的演變，與中國海關在清政府海外參展所扮演的角色，對本論文有參考價值。

綜上所述，日本博覽會事業的研究集中關注在底下幾個領域，首先由籌辦單位、科技作用、國家發展與及文化藝術等角度切入，討論博覽會的概念、歷史及意義等綜論世博會的專書與論文，其次，有關日本參加歷屆世博會的研究，討論日本海外參展對國家發展的意涵，以及日本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相關研究。再其次，受到福柯與歐美探討世博會帝國主義性質的影響，許多日本學者也研討博覽會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關係及人種展示的議題。最後在對中國博覽會事業的研究方面，主要側重在清末博覽會的研究，尤其是1910年的南洋勸業博覽會、滿清政府參與1903年大阪博覽會及2010上海世博會這方面的論文較多，專書較少見。內容上較傾向從歷史分析入手，做個案的研究與史料的整理，可惜的是未見針對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的比較研究。

至於海峽兩岸對於世博會事業的研究，相較於歐美與日本等國家起步較晚。而兩岸有關世博會研究的起步相差無幾，大陸由於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相對的資源投入與研究成果較台灣豐碩。(參見本論文附錄：一、台灣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二、中國大陸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首先，在滿清政府參與世博會研究方面，台灣有古偉瀛與趙祐志兩位教授檢視中國近代參與國際賽會歷史，鍾少華對中國第一次舉辦的內國勸業型博覽會做了介紹與評論。中研院王正華博士曾就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呈現「中國」做了研究，政治大學許峰源博士則有多篇論文討論晚清博覽會與近

代中國的發展。大陸方面，馬敏博士率先於1985年發表〈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述評〉，隨後於1988年發表〈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開啟中國大陸的博覽會史研究。隨後有朱英的〈端方與南洋勸業會〉、汪岳波的〈晚清政府參加國際博覽會述略〉、梁碧瑩的〈民初我國實業界赴美的一次經濟活動：中國與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王翔的〈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里程碑——1910年南洋勸業會述論〉、王翔與黃錫明的〈民國博覽會縱覽〉、王傳瑞的〈清末南洋勸業會的產生及影響〉等論文的發表。此後沉寂一段時間，直到1999年中國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之後，再加上籌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需要，相關的研究又活絡起來。有關滿清政府參加世博會的研究，1999年後有汪嶽波的〈晚清政府參加國際博覽會述略〉、董增剛的〈晚清赴美賽會述略〉、宋茂萃〈近代中國海關與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以及尹淑梅與屈春海的〈清政府參加比利時萬國博覽會後的政策調整〉。而有關滿清政府主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研究，繼馬敏、王翔、王傳瑞等學者專家對1910年「南洋勸業會」的研究之後，魏愛文對清末商品賽會加以評述，朱英則對清末的武漢勸業獎進會做了評介。至於社會菁英與關鍵人物對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影響的研究方面，馬敏教授與謝輝曾對「張謇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題目先後發表專文，蔡克驕對近代中國博覽業的先驅陳琪，以及張元隆對參與1876年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的李圭發表專文。李愛麗則對把持滿清政府出洋賽會主辦權29年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影響也做了分析。有關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綜論研究，馬敏教授討論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關係，林芳與謝輝合力研究分析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衰落的原因，喬兆紅博士分別就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發展、政府作為，以及與天津的關係發表論文。由於中國籌辦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需要，有關世博會的專書、譯書、博碩士論文，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大陸的中文圖書與學術研究領域。主要在界世博會文獻的整理、世博會歷史的回顧，以及中國參加世博會的社會菁英與關鍵人物的專書與中國舉辦上海世博會相關的研究為主。

其次，有關殖民與博覽會的主題，在大陸的研究成果當中較為少見，而台灣方面較早有政治大學呂紹理教授，就日本博覽會展示殖民中看見臺灣的實像與鏡像，中原大學陳其澎教授探討19世紀萬國博覽會之殖民意涵。胡家瑜也就博覽會展示「他者」意象與臺灣原住民發表論文，李政亮副教授則以1903年日本大阪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案例，討論帝國、殖民與展示議題。政治大學楊瑞松教授也以此學術人類館事件，探討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最近的2014年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戴蕾分析日本在「日英博覽會」中除了展示日本本國的文化以及現代化的成果外，也展示其殖民地，呈現殖民地落後的意像，突顯日本本國在演化階序上的進步。再其次，台灣方面有關日據時代台灣參與及舉辦博覽會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主要針對「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專書較不多見，碩士論文百餘筆，未見博士論文，碩士論文以台灣日據時期1935年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與該時期的博覽會活動設計、宣傳計畫、視覺表現、殖民教化、島外參加博覽會等議題為主。(參見：蘇文清，1997；鄭建華，1998；程佳惠，2001；劉融，2003b；林文通，2003；張世朋，2004；馮瓊瑩，2005；石川豪，2005；彭慧媛，2005；林士鈞，2006；黃馨瑩，2011；蘇立，2011)

就兩岸對世博會的研究成果，兩岸學者多數認為博覽會對中國與台灣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是近代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內容上較傾向從歷史分析入手，做個案的研究與史料的整理，亦可見單從社會、政治、文化、建築、美術等角度切入的博覽會研究。若以起步較早的歐美和日本學者來看，對博覽會的研究已有相當深度，不只是從史學的角度切入，研究視野擴及社會學、文化學、政治學、經濟學、展覽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的方法途徑，值得兩岸學者借鏡。歐美日等國家對世博會的研究成果雖然豐碩，比較可惜的是未見對於中日兩國的比較研究，筆者相信若能對這兩個國家在引進與發展世博會事業加以比較研究，尤其19世紀中日兩國的文化相仿、歷史背景相似、接觸世博會幾近同時，何以博覽會事業的成功引進與發展會有30多年的差距，若加以比較分析有所發現，或可嘗試以綜合觀點，討論中日現代化的成敗，則幸甚矣。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觀點

社會變遷與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一直是發展學者關心的領域。在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當中，古典社會學時期的重要學家如聖西門(Henri 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涂爾幹(Emile Durkheim)、馬克思(Karl Marx)和韋伯(Max Weber)的學說當中，有相當大的部份是在探討傳統社會的現代化/工業化，提出不同的解釋與解決方案。聖西門和孔德所關切的是舊秩序瓦解後的危機，以及重建社會的必要性，而馬克思和韋伯所預見的新社會，在本質上是探討資本主義將會導致的危機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所以馬克思想藉革命的手段以達到共產的美好社會；而托克維爾則認為新社會的特質乃是「追求平等的熱情」，也帶著幾分將走向群眾社會的隱憂。然就他們的研究方法來看，似乎是基於「藝術性直觀」(artistic intuition)，尤其是這些大師們的真知卓見，如韋伯討論資本主義和新教倫理，馬克思討論資本主義中經濟異化與非人化的影響，托克維爾在《美國之民主》一書中抓住「追求平等的熱情」，孔德思想中對知識的強調，以及聖西門聚焦在「工業社會」這個概念。(Kumar, 1978: 52-54) 20世紀初，涂爾幹和韋伯這些歐洲社會學大師過世之後，社會學研究重鎮逐漸移到美國，特別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領導的結構功能學派獨領風騷。惟帕森斯早期的學說傾向於從事社會橫斷面的研究，使得社會變遷的研究在美國的社會學界相對顯得消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殖民地社會紛紛獨立成國家，冷戰使得美國政府透過許多援助計畫來爭取新興國家的認同與加盟，加速了開發中國家的研究。從「傳統」到「現代」、甚至於到「後現代」的大轉變，也就是「現代化」的課題獲得了較多的關注，特別是探討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在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研究領域當中成了一門顯學。

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現代化與後現代化》一書指出：「現代化理論可分為兩個學派，一為馬克思學派，認為經濟、政治和文化是緊密相關，一個社會

的經濟發展決定其政治和文化特徵。二為韋伯學派，認為文化決定經濟和政治生活。儘管兩派之間的爭議未有定論，但在一個關鍵點上他們是有一致的看法，認為社會經濟變遷都依照協調一致且可以預知的模式在進行。因此，兩派都默認主要的社會、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並非隨機，而是緊密相關的一種關係，我們可以從已知的一個主要特徵，預知其他特徵的出現。」(Inglehart, 1997: 67) 西方關心現代化這個議題的學者專家都會從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去論述社會的變遷與國家現代化，這方面的著作可謂是汗牛充棟，英格哈特在2000年的〈文化與民主〉一文作了一個不錯的整理，他指出福山(Francis Fukuyama)、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學者的論述屬韋伯學派，貝爾(Daniel Bell)和他自己本身屬馬克思學派。(Inglehart, 2000: 80) 準此分類，可將美國戰後主要現代化學者，對經濟、政治與文化關係的論述加以分類，臚列如表1-1。

表 1-1 美國戰後主要現代化學者對經濟、政治與文化關係的論述分類

馬克思學派	韋伯學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安士敦(Alice H. Amsden)的《下一個亞洲巨人》 ▪ 貝爾(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 詹隼(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 ▪ 李維(Marion J. Levy)的《現代化與社會結構》 ▪ 李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 ▪ 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 ▪ 斯卡契普(Theda Skocpol)的《把國家找回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維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 ▪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 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的《未開發是一種心態》 ▪ 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的《為什麼文化很重要》 ▪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 ▪ 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 ▪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使民主運轉起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就韋伯學派而言，即使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主在處理文化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的經典著作，強調新教倫理主義對於歐洲現代化有關鍵性影響。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導讀〉文中，指出韋伯也不致於主張文化是唯一的因素，他明確指出生產企業與家業分開、城市發展、羅馬法制、複式簿記等社會經濟因素，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力。(Max Weber著，于曉等譯，2001：xii) 另屬馬克思學派的李普賽，在《政治人》一書強調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正向關係，卻在〈政治文化的重要性〉(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論文中，開始探討民主政治與天主教、基督教等文化因素之間的關係，強調了政治文化因素的重要性。(Seymour M. Lipset著，張明貴譯，1982；Lipset，1990) 此外，David Potter在《民主化的歷程》一書解釋民主發展模式時，提出現代化研究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轉型研究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及結構研究途徑(structural approach)等三種研究途徑，對本論文頗有啟發性。(Potter，1997：1-40) 現代化研究途徑強調現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要有許多社會與經濟的必要條件，這正是李普賽在《政治人》一書所要申論的主題，點出民主與一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或現代化程度有關。轉型研究途徑則強調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es)及菁英的政策創新與政治抉擇，來解釋國家如何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其中以Dankwart Rustow的〈轉型到民主〉一文最富盛名，他對現代化研究途徑與李普賽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驅動人類社會轉型到民主的力量，來自於政治菁英的行動(the agency of political elites)，民主是政治菁英創造出來的。而結構研究途徑強調權力結構的變遷促成了民主的發展，摩爾的名著《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誕生時的貴族與農民》，在討論農民、地主與都市資產階級，以及國家之間互動關係，討論英、法、美、中、印、日等國家的民主發展。(參見Potter，1997:13-22；Rustow，1970；Barrington Moore著，拓夫譯，1991) 而David Potter在該書的「民主化理論的整合」乙節，指出沒有任何理論通則可以做到全面解釋與評斷的地步，但如果因此忽略理論而只限於特定事件與過程的無盡描述，那麼有關民主為何僅存於某些地區，或民主化為什麼會發生等問題將永遠沒有答案。《民主化的歷程》一書大

部分章節實際上運用超過一個以上的研究途徑，有些甚至將三個研究途徑都派上用場，像第十章即是如此，這是1990年代的學者在從事民主化研究時的普遍作法。現代化研究途徑、轉型研究途徑與結構研究途徑都是不同的民主化解釋，每一研究途徑均利用一套相互關聯的因素，用以解釋民主化存續與否的原因。(David Potter等編著，王謙等譯，2000：28)

以上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師與前輩們有關社會變遷、現代化及民主化的真知卓見、理論建構及方法途徑，對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有所啟發。僅以馬克思學派與韋伯學派強調經濟與文化因素來解釋社會變遷，似有不足。除了David Potter所說的轉型研究途徑，強調菁英的政策創新與政治抉擇因素，來解釋國家如何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之外，似可考量《民主化的歷程》一書列出的六種解釋因素：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差異、國家與政治制度、市民社會、政治文化與觀念、跨國與國際介入（包括戰爭）等多面向的因素，來研究與解釋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或後現代化的發展。(David Potter等編著，王謙等譯，2000：29-37)

二、質性研究

許多研究亞太國家現代化的學者專家，經常都會為「中國滿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幾乎是同時在19世紀開始踏上現代化之路，但是明治政府成功地使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中國滿清政府卻失敗了」的這段歷史感到困惑，他們做了許多的嘗試來理解中日現代化的成敗，有些從經濟發展、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家庭結構或是西方帝國殖民的影響，雖有小型理論的豐碩成果，但這些答案似乎是見樹不見林。事實上，我們有的是許許多多關於宗教、家庭結構、政治組織和法制系統的片面看法，但無法使我們對中國現代化過程有一整體概念的理解。因此，研究中日現代化有必要發展一套綜合的架構，來看各主要領域的變遷過程。不過要隻身縱橫百年的現代化歷史，且要關照科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每一範疇，非一位學者獨力所能成。試以抽樣的概念縮小研究範圍，擇一案例進行歷史比較的方式或有可能。而這樣的嘗試，深受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蕭瑞麟的《不用

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一書的啟發(蕭瑞麟，2007)，該書採用質性研究最常見的兩種方法，即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與歷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

《不用數字的研究》是一本讓人深省的著作，向來不太以量化研究的我，經常在腦海浮現「是否只有量化研究才是科學」的問題，在這本書我找到了答案，也讓本論文要進行的質性研究更為有趣且更為踏實。正如書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布立基曼(Percy Bridgman)所言：「沒有所謂科學或不科學的方法，方法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心靈的極限，而非將心靈之門閉塞。」而什麼是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蕭瑞麟教授從「研究」講起，指出人類因對事物好奇與不了解，所以要尋找、再尋找，直到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為止。這種尋找、再尋找的過程就是研究。所以簡單的說，研究就是針對疑惑去取得資料、分析資料，藉以了解真相、產生知識。「質性研究」在建構理論，而不是去驗證公式，而是要去說一個令人得到啟發的「故事」，那就是要「使事物被看見」(making things visible)。要達成這個使命，研究者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個目標的其中一個。第一，你的文章必須使原來沒注意到的事件被注意到。第二，你的研究必須使原來已被注意到的東西重新被認識與省思。第三，研究者的任務在透過故事、文字、語言，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目標就是希望將一些無形的宰制加以描述與呈現，而讓人恍然大悟，使人豁然開朗。

前揭我們有必要發展研究中日現代化的一套綜合架構來理解中日現代化的成敗，試以抽樣的概念縮小研究範圍，擇一案例進行歷史比較。本論文嘗試以中日參與世博會事業的案例做比較研究，來理解中日現代化的成敗。為什麼要選擇世博會事業進行個案研究? 從Google網站鍵入「博覽會.tw」，就能找出約93萬多筆在台灣發生的博覽會相關資料，而我們日常的生活也充斥著「博覽會」的字眼，印象中大多只是租個場地，展示幾天的活動，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也沒什麼學問。但是前面提到過，日本在2005年舉辦經BIE認證的愛知萬博，會期長達半年之久，會場佔地百公頃以上，會場建設與營運經費則以幾億美元為單位，如此巨額投資、

百公頃的場地、長達半年的展期，這樣的博覽會與我們印象中的有所不同，肯定大有學問。不禁要問我們常掛在嘴邊，或是實際參與過的大學博覽會、就業博覽會，和經BIE同意舉辦的世博會，到底有什麼不同？重要的是舉辦世博會對國家發展、對國家現代化具有什麼樣的意義？Gavin Weightman在《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一書指出，第一屆世博會的英國萬國工業大博覽會「水晶宮」展館，代表了19世紀上半工程學和製造業的巔峰成就，參觀「大博覽會」的人也都認為英國是世界第一的工業國家。(Gavin Weightman著，賈士蘅譯，2013：211-212) 菲茨帕特里克(Anne Lincoln Fitzpatrick)在探討俄國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夏諾夫哥羅德(Nizhnii Novgorod，現在的高爾基市)展覽會的著書，開宗明義點出俄國夏諾夫哥羅德展覽會的研究可以窺見19世紀俄國的落後，也可以用來檢視當時俄國在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工具。(Fitzpatrick，1990：11) 大陸暨南大學的羅靖副教授在〈近代中國參加世博會之歷史嬗變〉一文，亦點出近百年的中國博覽會事業的曲折發展，反映了中國國際化和近代化的艱難歷程。(羅靖，2011:153) 北京大學吳靖教授更在〈現代性的神聖儀式：世界博覽會與國家競爭〉一文，試圖在論述世博會作為現代性文化制度的各種形態與功能基礎上，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和日本如何被世博會的魅力所俘獲，以及如何利用世博會表達與推進對現代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世博會的歷史就是現代性文化的敘事史。我們可以從世博會的轉型來管窺現代生活、制度和文化形態的變遷。(吳靖，2012：213) 世博會是19世紀歐美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產物，在我國滿清時期與民國初年通稱為「賽會」，日本現代化啟蒙大師福澤諭吉理解為「每隔數年，在西洋大都會舉辦物產大會，號召世界各國徵集名產、便利器械、古物珍品，以展示給萬人觀覽，稱之為博覽會。」(福澤諭吉，2002：49-50) 筆者以為世博會除了是展示人類藝術、科技和產業發展成就的國際性展會活動，目的在喚起大眾關注，以達到振興產業、開發科技園區、進行都市更新與均衡區域發展，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與「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之外，也會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有鑒於此，筆者試著從可做中日現代化一個面向的世博會事業發展，針對兩國幾乎同時接觸世博會，卻在舉辦

內國勸業博覽會出現30到40年時間差的案例，進行綜合觀點的研究分析，進而多方比較中日現代化發展差異，以架構起解釋兩國現代化成敗的綜合觀點。

有關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興衰研究，僅見金普森、林芳、謝輝三位合力完成的兩篇專文，主要論點在政府信用不佳、財政困難、政局動盪等原因；以及劉健在《博覽勸業：世博會與近代中國博覽會》專書中有〈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衰落的原因〉一小節，從政局動盪、實力羸弱、人員素質等三個面向阻礙博覽會事業發展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及文化因素，來討論造成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發展遲緩並走向衰落。(金普森、謝輝：2004；林芳、謝輝：2005；劉健，2010：165-172)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原先想就博覽會是個國家發展政策工具的角度，來比較分析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的成敗，試以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論者成功解釋東亞國家經濟奇蹟的經驗，就兩國政府的博覽會政策、博覽會專責組織及國家菁英(官僚、企業家與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來談，經初步瀏覽兩國有關博覽會發展資料，若採用發展型國家的觀點似有其局限性，未及於博覽會政策、博覽會專責組織及國家菁英所鑲嵌的社會脈絡(context)，以及之間的互動歷程。參酌《不用數字的研究》一書的歷程分析法，可把博覽會事業個案研究的觀察時間拉長，由過去的歷史了解問題的產生與其中糾纏不清的情結，深入真相，進而能夠鑑往知來。而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的〈演化科技意會：衛星派遣科技的人性軌跡〉論文，在研究使用者對新穎資訊科技的意會過程，將如何影響他們對科技的使用。他們調查衛星派遣系統導入一個大型計程車隊的歷程，剖析創新演化歷程中，使用者與科技如何互動，對科技又產生哪些新的意會，並發展出新穎的應用方式與工作行為，這樣的歷程分析就是個值得參考的方法途徑。(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2011)

本論文試以世博會這個活動為起點，它既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與「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可以把它視為「主辦者有計畫的，在一定的期間與相當面積的展場，徵集相當數量的參展者提供展品，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將主題資訊傳達給參觀者」的一種大型展會活動，其成敗與發展，除了要看主辦者、參展者及參觀者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這三個關鍵活動成員與博覽會是被鑲嵌在社會脈

絡，一些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因素不容忽視。前者可把博覽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過程，將以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何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自己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來比較分析。後者則以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面向，來比較分析兩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參見圖1-4：中日兩國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比較架構) 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研究，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時間差異。

三、研究限制

論文寫作最困難的一件事會是什麼？只要寫過論文的人都會同意選題目很難，而且選擇題目也很重要。如何選擇一個適當的研究題目，在探討論文寫作的專書都會有一些基本原則的討論。(曹俊漢，1978；宋楚瑜，1983；李瑞麟，1996；莫建清，1998) 就筆者本身論文的寫作經驗，題目的選擇至為重要。回憶就讀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時期，修習恩師華力進先生講授的「各國政府」課程，受了恩師對民主政治的評論(華力進，1980：93-114)與美國知名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民主死了嗎？」(Is Democracy Dying?)專文的啟發(Huntington，1976)，期末報告寫了「民主政治的滅亡」的題目，當時心中頗為忐忑，憂慮會不會題目過大致不易蒐集資料且難以分析，不過有著自己對民主政治的不以為然，以及多位學術前輩在這個題目的討論，方能夠站在這些學術巨人的肩膀上，做了整理分析與評論。當時獲得華老師高度的肯定，也從此下定決心投身政治研究所進行理論研究，繼續在恩師的指導下完成「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理論的研究」碩士論文，也因為這篇論文得以政治研究所碩士，進入員工以資通訊領域碩博士為主的資策會任職，進行研究與規劃台灣邁向資訊化社會的工作。

此外，有關論文題目大小的議題，常見指導教授們苦口婆心地提醒研究生要小題大作，許多教授研究方法的師長們亦耳提面命得小題大作。操作題目大小意指研究架構及研究範圍之規模大小，關乎研究者投入心力之可行性。要維持一定的研究品質，題目愈大所需投入的時間與心力就愈多，在研究時間與投入經費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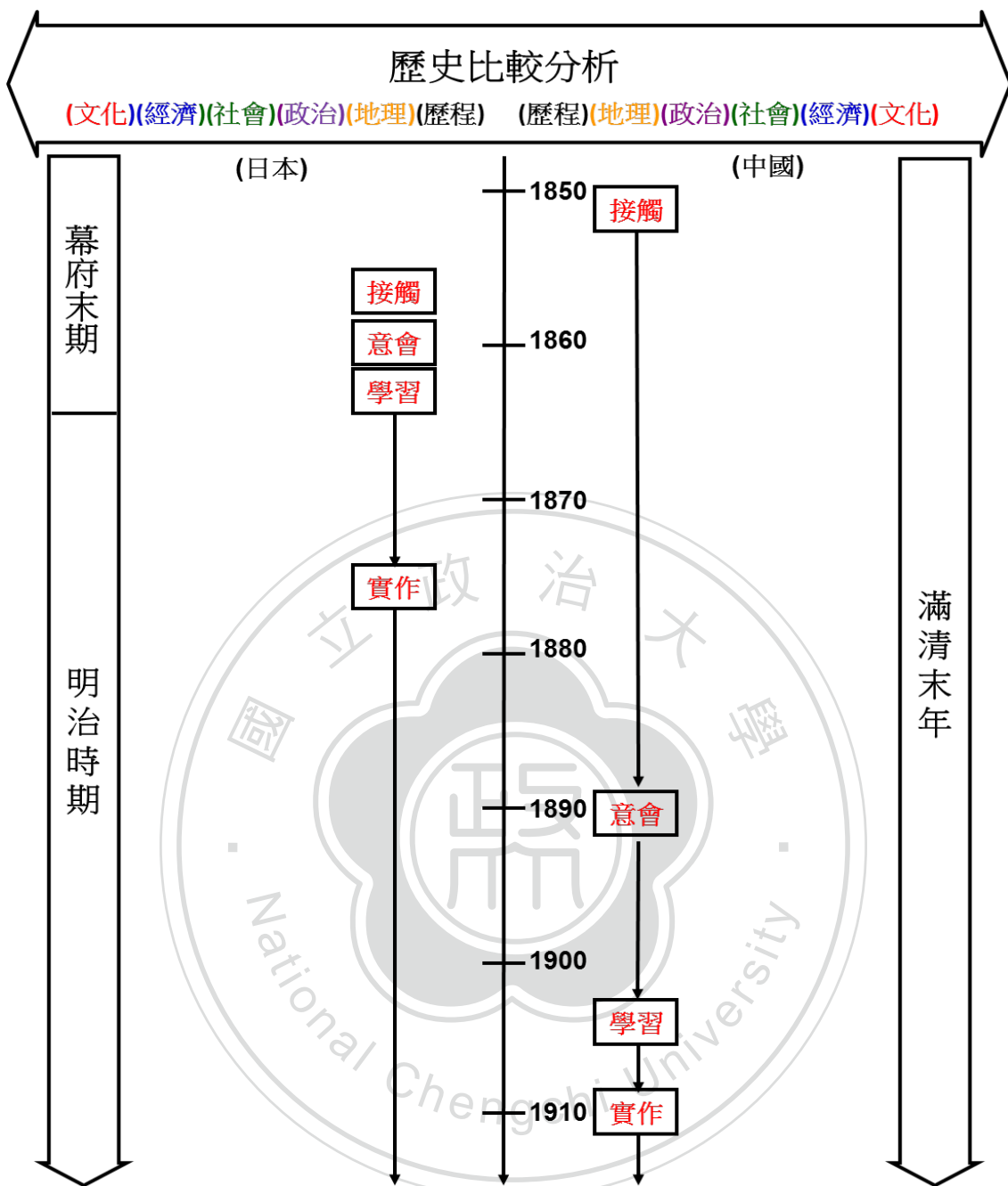


圖1-4 中日兩國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比較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量下，通常題目愈大，操作的難度愈高，研究品質就愈不容易掌握，寧願小題大作似乎言之成理。於是乎，前揭有關於中國現代化延遲的研究，大多限於中國社會系統中的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誠如蔡文輝教授所言，「很顯然的，大部分有關此主題的研究都過於單純，他們時常過分強調社會系統中某一特定範圍，而忽略

了其他部分。因此，設計出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更能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是必要的。」(蔡文輝，1980：440) 為此，作者選擇以「中日參與世界博覽會事業比較研究：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的大題目，試以綜合觀點進行中日世博會事業的比較，進而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把世博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世博會的過程，將以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何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以及在何時實作自己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來分析比較。再以兩個國家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世博會所存在的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系絡來比較兩國世博會事業的發展，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研究，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時間差異原因，進而整理分析出綜合觀點以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歷史學家沈雲龍「大題三作」的主張，讓選擇大題目的研究生得到進一步的精神支持。沈雲龍先生一直以為，寫作論文要有「大氣」，不一定要循學術常規所謂「小題大作」方式為之。他認為只要自己掌握的資料夠，肯用心去耙梳整理，具基本的史學專業訓練，選擇題目不一定要侷限於「小題大作」，就算「大題小作」、「大題大作」、「大題深作」又何妨。總而言之，就是要有氣魄膽識，不要畏首畏尾。(轉引自陳正茂，2009：374)

雖說選擇題目要有氣魄膽識，不要畏首畏尾，筆者試著選擇大題目進行研究，不過在案例的時間縱深上，仍以中國滿清覆亡的1912年與日本明治天皇逝世的1912年為截止時間點。有兩個考量：首先，就中日兩國參與世界博覽會發展史而言，兩國幾乎同時接觸到世博會，日本領先於1877年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世博會事業往後一路蓬勃發展至1970年首次成功舉辦BIE認可的「大阪萬國博覽會」，而中國相較之下卻遠遠落後30多年，在1910年首度舉辦等同「內國勸業博覽會」規格的「南洋勸業會」，並遲至百年後的2010年才成功舉辦BIE認可的「上海世界博覽會」，中日之間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及世博會的事業，有著30年至40年的時間差距。若本論文比較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將兩國首次成功舉辦BIE認可的世博會經驗做比較，將有近160年的時間，期間發生與博覽會

事業的相關事件，恐怕不是一個人在短時間的研究所能處理，本論文以兩國首次舉辦全國性博覽會的60餘年時間(1851~1912年)過程進行比較研究。

其次，若本論文比較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滿清覆亡之後的中國，有1949年後兩岸分治的議題，推翻滿清的中華民國政府即使在國共內戰退居台灣之後，仍代表中國參與世博會至1974年美國史波肯(Spokane)世界博覽會。雖然大陸學者丁長清主編的《中國與世博會三部曲②參與世博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的史觀，直指1939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就是舊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參與的最後一次世博會。(丁長清，2010b：31-32)惟事實並非如此，1949年中共竊據大陸，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也應他國邀請代表中國參加過幾次世博會，如1964年的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1967年的加拿大蒙特婁世界博覽會、1970年的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這次世博會的「中華民國館」規模是之前歷屆中國參加世界博覽會最盛大的一次)。即使在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仍接受美國邀請參加1974年的史波肯世博會，這才是中華民國政府在世博會的最後一次以「國家館」方式演出。之後，中國大陸於1979年與美國正式建交之後，從此接受各國邀請代表中國參加世博會有十餘次之多，例如截至2010年中國自己主辦上海世博為止，有1982年的美國諾克斯維爾世博會、1984年美國新奧爾良世博會、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會、1986年加拿大溫哥華世博會、1988年澳大利亞布里斯班世博會、199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花與綠博覽會)、1992年義大利熱那亞匹世博會、1992年西班牙塞維亞世博會、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1997年加拿大魁北克世博會、1998年葡萄牙里斯本世博會、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2005年的日本愛知萬國博覽會(上海市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2007：136)，再加上2008年的西班牙薩拉戈薩世界博覽會就有14次之多。準此，若本論文真要將比較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1949年後兩岸分治的議題肯定會讓比較研究更為複雜，需要不同的史觀與更多的時間來加以持平處理。就以上兩個考量，本論文對兩國的比較，以截至中國滿清覆亡的1912年與日本明治天皇逝世的1912年為止的這段歷史為主。未來若有時間與機會，滿清覆亡之後的中國與明治天皇逝世之後的日本，

比較研究兩國截至目前的世界博覽會事業發展，肯定會是一個值得投入心力研究分析的有趣案例。

有關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的比較研究，在參訪或閱讀資料的時候，語言問題會是個限制。因為日文並非國際學術上常使用的語言。事實上，研究日本博覽會事業的文獻可謂是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皆以日文而非英文或中文發表，若非通曉日文恐難以閱讀與理解。所以有些學者不得不透過有限的英文資料來了解日本博覽會史。這樣的做法，容易因語言障礙造成誤解或理解的不夠充分，進而影響到整個研究分析的有效性。筆者因工作關係，1989年曾提案日本資訊化社會發展研究，獲日本政府外務省的經費資助赴日研修考察一個月，為此開始在台大語文訓練中心修習日文多年，加上在資策會的工作負責日本方面的研究與考察，經常接觸日文資料與日本學者專家，目前閱讀研究報告不成問題。除此之外，筆者頻繁進出日本已累積超過50趟次以上，因工作亦結識許多嫻熟英文的日本朋友，尤其是泉真也教授、福井昌平社長、永井正社長等多位研究與籌辦博覽會的日本專家，以及兼子利夫處長、橫澤誠教授等資通訊應用的學者專家，他們提供本研究論文許多協助與啟發，如參訪的安排與陪同訪談，以及日本博覽會資料的蒐集與釋疑。

蒐集資料是撰寫論文的基礎，論文的研究分析與探討評論都需要大量資料支撐。論文要有說服力與可讀性，資料出處必須多元豐富，大致可分為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一手資料是指與事件相關的物件或由當事人提供的資料，例如自傳、著書、史料，以及實地考察、訪談、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二手資料則為由其他人整理有關事件而得出的資料，引用書籍、期刊、報紙、論文、網路等資料便是最常見的二手資料。本論文理應以一手資料為主，如史料的援引與實際參觀訪談，惟本論文研究分析所需的一手資料，誠如本章第二節「文獻檢閱」發現已有許多學者專家做了整理與考證，應可以在這些巨擘前輩的肩膀上，進一步的加值分析與討論，或有「抄襲」之嫌的疑慮。美國參議員葛倫說得好：「如果抄襲一個人的作品，那是剽竊；如果抄襲十個人的作品，那是做研究工作；如果抄襲一百個人的作品那就成為學者」。(轉引自莫建清，1998)

第四節 研究概要

本論文內容共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問題、文獻檢閱，以及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第二章「世界博覽會的發展與意義」，從重要世界博覽會的回顧，闡述什麼是「世界博覽會」及其意義。第三章「中日兩國參與世界博覽會情形」，把世博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一個團體或社會菁英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過程，將以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何清楚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以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自己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以比較中國參與世博會落後日本30餘年。第四章「中日參與世博事業落差分析兼論兩國現代化」，討論中日意會世博會有「賽會」與「博覽會」之差異，考察學習有「五大臣出洋」的順道參觀與「岩倉使節團」的專程參訪世博會之分，參展學習有「洋人代辦」與「國人自籌」舉辦世博會之別外，政治因素上政府的「封建顛預」對比「開明進取」、經濟因素上的「半資本主義農業社會」對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社會因素上「戰亂頻仍」對比「戰亂較少」、文化因素：「自大排外」對比日本的「擇優攝取」，再從中日參與世博事業落差分析架構與因素來看兩國現代化差異，第五章「結論」，總結本論文研究心得，以及後續的幾個研究方向。



第二章 世界博覽會的發展與意義

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我們生活周遭充斥著名為「博覽會」的活動，只要在網路搜尋引擎Google鍵入「博覽會」的字詞，就會跳出約有2,360,000項相關網頁的資料。而我們日常生活經驗過的「博覽會」大多只是擺幾個攤位，展示幾天的活動，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也沒什麼「學問」。回想1990年8月因公務考察日本推動資訊化社會的作法，從東京移動到大阪拜訪日本關西情報化振興協會，適逢週六與週日的假期，抽空在大阪車站隨著人潮搭車參觀當時舉辦的一個不知名的大活動，只知其展場之大、人潮之多、內容之精而已。事隔3年於1993年參與經濟部委託資策會執行的「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規劃案」後，方知1990年就曾遊歷過「日本大阪花與綠博覽會」，是時真不知什麼是「博覽會」，也只不過是以過路客心情參與了一場盛會而已。

由於1993年起參與經濟部委辦的「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規劃案」，曾多次考察世界博覽會、國際園藝博覽會、國家博覽會、都市博覽會、地方博覽會，方知大有「學問」。例如，日本繼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萬國博覽會之後，於2005年再次舉辦經BIE同意的「日本國際博覽會」(愛知萬博)，會期有185天半年之久，會場佔地約有210個標準足球場大的173公頃，會場建設投入1,350億日圓，約12.5億美元，而主辦單位營運費達550億日圓，投入約5億美元，總計有2,200萬參觀人次。作者亦曾於當年應日本友人「愛知萬博」首席製作人福井昌平先生邀請，參觀「愛知萬博」。驚見如此巨額投資、百公頃場地、長達半年展期、上千萬參觀人次，肯定這樣的「博覽會」與我們印象中的有所不同，其中必有「學問」。我們不禁要問我們常掛在嘴邊，或是實際參加過的大學博覽會、就業博覽會，它們和經BIE同意舉辦的世博會，到底有什麼不同？那究竟什麼是「博覽會」或是「世界博覽會」？都有待我們去探討釐清。

日本東京首都大學教授國雄行的著書《博覽會與明治日本》，在探討什麼是博

覽會的時候，提到自己兒時參觀過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經驗，當時認為博覽會就是個孩童嚮往的主題遊樂園區(遊園地)。國雄行亦曾調查任教的東京首都大學學生如何看待博覽會？普遍有底下幾個看法：(1)蒐羅世界珍奇事物讓參觀者觀覽的場所，(2)展覽各國想要炫耀事物的場所，(3)宣揚各國傳統文化、產業及技術的場所，(4)國民可以看到自己國家威望的場所，(5)資訊交換的場所，(6)博物館+美術館+節慶活動(お祭り)的大型展會。(國雄行，2010：3-4) 即使在一個頻繁舉辦博覽會的日本，大學生們對博覽會也有五花八門的看法。

英國學者Paul Greenhalgh在《白駒過隙》一書，以及吉見俊哉教授在《博覽會的政治學》書中提到的「世界博覽會」一詞，在英國稱Great Exhibition，法國稱Exposition Universelle，美國稱World Fair，日本稱之為「萬國博覽會」。(Greenhalgh，1988：2；吉見俊哉，1992a：25) 而在滿清時期與民國初年，中國人稱為展覽會、陳列會、勸業會、獎進會、勸工會、物產會等，一般通稱為「賽會」。呂紹理教授在《展示台灣》書中對「博覽會」一詞做了整理，在西方世界的語意中共有Exhibition、Exposition及Fair三個單字。依據《牛津字典》，Exhibition意指收集各類物品以公開展示，為了廣告促銷而陳列商工貨品，以公開展示動植物及花卉之優劣的各種農畜產競賽等，英國較慣用此字指稱博覽會；Exposition則指一切物品的展示，法國的博覽會偏好此字；Fair除了指傳統定期市集和商店街Bazaar外，大型商工展示活動也往往稱之為Fair，美國舉辦的博覽會則較常用此字。《牛津字典》的解釋代表了當代對於此種活動在功能面向的認識，但缺乏歷史性的陳述與理解。(呂紹理，2005：27-28) 也就是說，在定義「博覽會」、「世界博覽會」做為本論文研究的範圍之前，得加上歷史性的陳述，先回顧世界上博覽會演變的歷史，掌握其發展脈絡與內涵，進而討論博覽會與世界博覽會的意義。

就BIE官網統計到2020年的資料，世界主要國家舉辦BIE認可登錄的綜合型世博會與專業型博覽會有69次之多。其中19世紀所舉辦的世博會有12次，歐洲國家共舉辦9次(法國4次，英國2次，奧地利、西班牙、比利時各1次)，美國2次及澳洲

1次，19世紀後半是歐洲為主的時期。進入20世紀，這百年間共舉辦49次世博會，仍以歐美國家為主。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逐漸成為世界新盟主，美國一個國家就包辦了9次，儼然成為世博會舞臺上的新霸主。而歐洲國家有30次(義大利6次，比利時6次，法國5次，瑞典3次，保加利亞3次，德國2次，西班牙2次，葡萄牙、匈牙利、芬蘭各1次)，亞洲國家則有日本的3次，以色列2次，韓國的1次，其餘由加拿大2次、澳洲1次、海地1次。邁入21世紀之後，截至2020年的BIE核定申辦數有8次，亞洲國家包辦5次(中國、日本、韓國、哈薩克及阿聯各1次)，歐洲國家的德國、西班牙及義大利各1次，在「東亞經濟奇蹟」的引領下，日本、韓國及中國等亞洲國家似乎在世博會舞臺上日漸展露頭角。(參見表2-1)

表2-1 歷屆BIE世界博覽會一覽表

次	日期	舉辦國/城市	名稱	類型	天數	萬人次
1	1851年	英國/倫敦	萬國工業博覽會	綜合	140	604
2	1855年	法國/巴黎	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150	516
3	1862年	英國/倫敦	倫敦世界博覽會	綜合	104	609
4	1867年	法國/巴黎	第2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0	923
5	1873年	奧地利/維也納	維也納萬國博覽會	綜合	106	725
6	1876年	美國/費城	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	綜合	159	800
7	1878年	法國/巴黎	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190	1,616
8	1880年	澳洲/墨爾本	墨爾本世界博覽會	綜合	111	133
9	1888年	西班牙/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世界博覽會	綜合	244	230
10	1889年	法國/巴黎	第4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2	2,512
11	1893年	美國/芝加哥	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	綜合	183	2,700
12	1897年	比利時/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綜合	171	600
13	1900年	法國/巴黎	第5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0	5,000
14	1904年	美國/聖路易士	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綜合	185	1,969
15	1905年	比利時/列日	列日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7	700
16	1906年	義大利/米蘭	米蘭世界博覽會	綜合	223	NA
17	1910年	比利時/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4	1,300
18	1913年	比利時/根特	根特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3	950
19	1915年	美國/舊金山	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	綜合	288	1,883
20	1929年	西班牙/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世界博覽會	綜合	249	580
21	1933年	美國/芝加哥	芝加哥萬國博覽會	綜合	170	2,257
22	1935年	比利時/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綜合	150	2,000
23	1936年	瑞典/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	NA

24	1937年	法國/巴黎	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203	3,104
25	1938年	芬蘭/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世界博覽會	專業	9	NA
26	1939年	比利時/列日	列日世界博覽會	專業	114	NA
27	1939年	美國/紐約	紐約世界博覽會	綜合	356	4496
28	1947年	法國/巴黎	巴黎世界博覽會	專業	37	NA
29	1949年	瑞典/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	NA
30	1949年	法國/里昂	里昂世界博覽會	專業	16	NA
31	1949年	海地/太子港	太子港世界博覽會	綜合	167	25
32	1951年	法國/里爾	里爾世界博覽會	專業	24	150
33	1953年	義大利/羅馬	羅馬世界博覽會	專業	98	170
34	1953年	以色列/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世界博覽會	專業	24	60
35	1954年	義大利/拿坡里	拿坡里世界博覽會	專業	154	NA
36	1955年	義大利/杜林	杜林世界博覽會	專業	26	12
37	1955年	瑞典/赫爾辛堡	赫爾辛堡世界博覽會	專業	80	NA
38	1956年	以色列/伯大哀	伯大哀世界博覽會	專業	31	NA
39	1957年	德國/柏林	柏林世界博覽會	專業	86	100
40	1958年	比利時/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6	4,145
41	1961年	義大利/杜林	杜林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4	500
42	1962年	美國/西雅圖	西雅圖 21 世紀世博會	綜合	184	964
43	1965年	德國/慕尼黑	慕尼黑世界博覽會	專業	101	320
44	1967年	加拿大/蒙特利爾	加拿大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5	5,031
45	1968年	美國/聖安東尼奧	聖安東尼奧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4	638
46	1970年	日本/大阪	日本萬國博覽會	綜合	183	6,422
47	1971年	匈牙利/布達佩斯	世界狩獵博覽會	專業	35	190
48	1974年	美國/史波肯	史波肯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4	480
49	1975年	日本/沖繩	沖繩世界海洋博覽會	專業	183	349
50	1981年	保加利亞/普羅夫迪夫	普羅夫迪夫世界博覽會	專業	29	NA
51	1982年	美國/諾克斯維爾	諾克斯維爾世界能源博覽會	專業	152	1,113
52	1984年	美國/新奧爾良	路易西安納世界博覽	專業	184	734
53	1985年	日本/筑波	筑波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4	2,033
54	1985年	保加利亞/普羅夫迪夫	普羅夫迪夫世界博覽會	專業	27	100
55	1986年	加拿大/溫哥華	溫哥華世界運輸博覽會	專業	165	2,211
56	1988年	澳洲/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世界博覽會	專業	184	1,856
57	1991年	保加利亞/普羅夫迪夫	普羅夫迪夫世界博覽會	專業	32	NA
58	1992年	義大利/熱那亞	熱那亞世界博覽會	專業	94	171
59	1992年	西班牙/塞維亞	塞維亞世界博覽會	綜合	176	4,100

60	1993年	韓國/大田	大田世界博覽會	專業	93	1,400
61	1998年	葡萄牙/里斯本	里斯本博覽會	專業	132	1,013
62	2000年	德國/漢諾威	漢諾威世界博覽會	綜合	153	1,800
63	2005年	日本/愛知	愛·地球博	專業	185	2,205
64	2008年	西班牙/薩拉戈薩	薩拉戈薩世界博覽會	專業	92	565
65	2010年	中國/上海	上海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4	7,308
66	2012年	南韓/麗水	麗水世界博覽會	專業	93	820
67	2015年	義大利/米蘭	米蘭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4	2,150
68	2017年	哈薩克/阿斯塔納	阿斯塔納世界博覽會	專業	93	NA
69	2020年	阿聯/杜拜	杜拜世界博覽會	綜合	173	NA

資料來源：整理自《BIE 官網》有關綜合型世博會(World Expos)→(<http://www.bie-paris.org/site/en/expo-timeline>)；專業型博覽會(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 Expos)→(<http://www.bie-paris.org/site/en/expo-timeline/expo-timeline-international-expo>)。

在回顧世界博覽會發展簡史之初，原本計劃以19世紀(1851~1899年)、20世紀(1900~1999年)、21世紀(2000~2020年)三個小節來做討論，惟閱讀《博覽會的政治學》一書之後，吉見俊哉教授以三個觀點來考察博覽會，第一階段(1850年代至1920年代)，世界博覽會是「工業」與「帝國」展示為主的時期。例如1851年的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是「大英帝國」的祭典。1870年代後期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出現了更大規模的殖民地展示，這種趨勢在1880年到1910年代的博覽會更加顯著。第二階段(1930年代至1960年代)，世界博覽會是大眾與現代商品世界相逢的消費社會為主的時期。就像Walter Benjamin深刻的評論，世界博覽會作為「商品拜物教的神廟」，它以各種面貌現身於世。在世界博覽會中，商品世界展現的意義要凌駕帝國主義的展示，已經是1930年之後的事。第三階段(1970年代迄今)，世界博覽會作為「見世物」舞台的大眾娛樂為主時期。(吉見俊哉，1992a；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19-20) 基於本論文以中國滿清覆亡的1912年與日本明治天皇逝世的1912年為截止時間點，本章將以世界博覽會的源起、工業與帝國展示時期的世博會(1850~1920年)兩節，回顧世界博覽會發展簡史，並以世界博覽會及其歷史意義一節做結語，寫就三節作為後續討論中日參與世界博覽會事業成敗的基礎。

第一節 世界博覽會的源起

依據《大美百科全書》，萬國博覽會脫胎於商品市集(Fairs)，在19世紀與20世紀的有些市集稱為博覽會，有些博覽會則稱為市集。現代的市集起源於中世紀歐洲經濟制度下商人的定期集會，19世紀後半葉的市集，其目的主要是批發的功能，這些市集使企業家得以參觀樣品與產品的草圖，以便訂購大批的貨品供日後在零售市場銷售之用。(光復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1990：398) 呂紹理教授的研究亦指出：回顧過往的社會生活，各種各樣的展示行為，早已存在民間日常的市集買賣之中，但是市井攤販的貨品陳列，與所謂世界博覽會之間，不僅在規模大小有差異，它們在性質、目標、擺設方式，以及象徵意義上，更有天壤之別。在探討這些差別之前，先追溯博覽會起源與不同階段的演變歷程，俾進一步剖析世界博覽會的特質。(呂紹理，2005：49)

博覽會起源於早期集市，從15世紀起歐洲諸國舉辦過多次博覽會，如1475年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法國豐富的物產，路易11世在英國倫敦舉辦了法國物產博覽會，該博覽會被認為是近代博覽會的雛形。1756年英國舉辦了產業博覽會，旨在展示皇家藝術協會的優秀產品和機械頒獎的展品。1798年法國博覽會是法國政府與產業界為超越英國而開辦的博覽會。從1798年到1849年間，法國巴黎共舉辦了11屆博覽會。(平野繁臣，1999：3-4；吳建中，2008：1；名古屋學院大學綜合研究所，2005：3) Walter Benjamin就曾提及「世界博覽會是人們膜拜商品的聖地，在世界博覽會出現之前，歐洲各國都有自己的工業品展覽會，1798年首次舉行於戰神廣場，它是取悅勞動階級，使展覽日變成他們的解放日這一願望的結果。」就研究博覽會多年的學者如英國的Paul Greenhalgh、日本的吉見俊哉、國雄行及兩岸的馬敏、呂紹理、陳其澎等多位國內外學者專家的看法，博覽會是近代文明發展、國家現代化與工業化的產物，源起於18世紀後半期的英國或法國。誠如Paul Greenhalgh、吉見俊哉、國雄行的研究，博覽會並不是在1851年突然誕生，這個新型資本主義的祭典，早在18世紀末就已慢慢顯現出輪廓。這種商品祭典化形式成

為持續性的國家政策，最早出現在法國。(Greenhalgh, 1988: 3; 吉見俊哉, 1992a: 29; 國雄行, 2010: 9) 馬敏教授在〈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專文，寫到近代意義的地方博覽會起源於1798年由法皇拿破崙發起的巴黎工藝博覽會，Anna Jackson在《世博會：1851年至1910年間的國際博覽會》一書指出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的前身卻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1798年至1849年間，在巴黎所舉辦的10次全國性工業與手工藝產品展覽會，而羅靖教授的研究點出比較公認的說法，近代意義上的博覽會始於1798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工藝博覽會，是為歐洲博覽會之濫觴。(Jackson, 2008: 10; 羅靖, 2009a: 6, 2009b: 19)

不過，Paul Greenhalgh、吉見俊哉、呂紹理、陳其澎等多位教授的研究，都指向可以追溯到1797年，在法國巴黎舉辦關於掛毯、瓷器、地毯的博覽會。吉見俊哉指出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急於振興貿易和工業，於是將過去用於美術品的展示會(display)，擴大至工業製品的領域。這個展覽會舉辦於1797年，由大革命之前就在法國皇家工廠擔任高布林掛毯(Gobelins tapestry)、賽佛爾瓷器(Sevres porcelain)、薩佛努利地毯(Savonnehe carpet)三個工廠監督官的達維茲(Marquis d'Aveze)侯爵所策劃。達維茲在展覽會中展示販售三個工廠生產的各種產品，對法國民眾展現本國工業的旺盛活力。在奧塞園邸舉辦的這場展覽會，展期只有4天，其意義不只在於成功販售商品，更在於具有教育民眾的意義。當時密切關注這場成功展示會的內政部長努夏多(Francois de Neufchateau)，不打算讓展示會賣完商品就結束，要擴大為國家規模的產業博覽會。得到達維茲侯爵的協助，1798年努夏多決定在巴黎市郊區，曾是國家革命祭典及拿破崙凱旋舞臺的戰神廣場，舉辦史上第一次產業博覽會。1798年的博覽會與國家緊密結合，但與1797年的展示會卻有完全不同的性質。1798年的博覽會除了商品販售，也具有教化法國國內廠商，以及帶動大革命後節慶氣氛的用意。展覽會場共展出110樣產品，惟依據Paul Greenhalgh在《白駒過隙》一書的說法，應該是110家參展廠商(exhibitors)，而非展品數。在五天的會期中，有遊行、舞會、煙火秀，還有會場四周的雜耍表演活動，博覽會已不只是商品的展示會，而是以各種奇觀將商品幻化的資本主義文化

機制，那麼這種基本特質第一次出現，就是在1798年的這場博覽會。由於此次產業博覽會的成功，也讓法國決定要定期舉辦同樣的博覽會。到1849年，法國逐次擴大規模，總共辦了11次產業博覽會。(Greenhalgh, 1988: 4-5; 吉見俊哉, 1992a: 29-30)

早在光緒23年(1897年)甘韓編撰的《皇朝經世文三編增附時務洋務》就有這樣的記載，179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為了與講究「藝學日新」的英國競爭，在巴黎設立博覽會。「專賽新出之物，曰新物會，會中四千四百九十四人，先詔令國中有能製造新奇之物，勝於英國及他國者，受上賞。」(轉引自喬兆紅, 2007b: 30) 呂紹理教授在《展示台灣》書中有更生動的描述，1798年法國大革命之後，一方面英國廉價的棉紡織品大量銷入法國境內，另一方面法國本身所生產之物品則受到英國的貿易封鎖，因而經濟大受影響。1797年原本任職法國音樂學院經理的達維茲被法國大革命後的共和政府任命接管原屬於皇室的陶器、織錦(掛毯)和地毯的工場。這三間工場在被接管之前，因政局擺盪，所生產出來的貨品全無銷路，工匠早已忍飢挨餓數年。達維茲苦思如何出清堆積如山的貨品時，突發奇想，構思聯合全國的藝匠展示其作品，藉由展示以吸引買主，擴大銷售。達維茲同時設計以發行彩票作為展場門票，既可吸引觀眾，又能貼補展覽經費。這個構想不但引起巴黎市民高度的興趣，也獲得當時內政部長努夏多的支持。隔年(1798)在努夏多的主導下，於巴黎戰神廣場舉辦了第一次的法國工藝展覽會。努夏多為了鼓勵工匠參展，另外設計了獎賞制度，並且為求公平起見，組織審查委員會以招獎賞之公信。這個以政府為名舉辦的第一次工業展覽會，雖然只有110名的參展者，但對於大革命後的法國人而言，這些展示品似乎重拾他們對於自身經濟實力的信心。努夏多更進一步決定要定期舉辦這類型的展示活動，而其繼任者亦持續此信念，於是從1798年至1849年間，由法國政府舉辦的工業展覽會即達10次之多，而且規模愈來愈浩大，1849年在香舍麗榭(Champs Elysees)所舉辦的展示會，參展者高達4,532人，是1798年第一次法國工藝展覽會參展者的40倍之譜，詳如表2-2。(參見呂紹理, 2005: 49-50)

表2-2 法國於1797年~1849年間舉辦的博覽會

階段	屆	年別	展示期間	參展者數	地點
第一階段博覽會 (研究、育成)	1	1797年	4天	60	羅浮宮(Le Louvre)的前院
	2	1798年	5天	110	戰神廣場(Champs de Mars)
	3	1801年	n/a	220	羅浮宮(Le Louvre)的庭院
	4	1802年	n/a	540	羅浮宮(Le Louvre)的庭院
	5	1806年	24天	1,422	榮軍院 (Esplanade des Invalides)
第二階段博覽會 (學術應用、機械生產)	6	1819年	35天	n/a	羅浮宮(Le Louvre)
	7	1823年	50天	n/a	羅浮宮(Le Louvre)
	8	1827年	62天	1,695	羅浮宮(Le Louvre)
第三階段博覽會 (振興經濟)	9	1834年	n/a	n/a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
	10	1839年	2個月	n/a	香榭麗舍(Champs-Elysees)
	11	1844年	2個月	n/a	香榭麗舍(Champs-Elysees)
第四階段博覽會 (國際)	12	1849年	6個月	4,532	香榭麗舍(Champs-Elysees)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Greenhalgh, Paul(1988)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3-6；國 雄行(2010)《博覽會と明治の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pp.9-10。

1798年後，1801年與1802年兩次博覽會都在羅浮宮的庭院(Louvre courtyard)舉辦，1801年有220家參展廠商，1802年參展廠商倍增為540家，尤值得一提的是1802年的那次博覽會，法國設立了產業獎進會(Societe d'Encouragement)，由這個機構建置評獎機制，評選參展廠商展品並頒發獎牌以資鼓勵。3年後，1806年博覽會遷移至榮軍院 (Esplanade des Invalides)舉辦，參展廠商有1,422家，展示天數也增加為24天。1806年二月開展的博覽會，是為了慶祝前一年法國與奧地利簽訂普雷斯堡和約 (the Peace of Presbourg)。日本明治時期政治家金子堅太郎將這四次博覽會歸類為法國「第一階段博覽會」，重產業育成與研究成果的展示，其中第一次1798年係提供法國產品回擊英國商品的商戰型博覽會。由於法國大革命以來，因為戰爭致力於農工商業的人比較少，參展者僅110人，不算成功。第二次1801年亦屬商戰型博覽會，其中自動織布機的展示受到矚目，漸漸顯現出教育國民殖產興業國策的博覽會，第三次1802年與第四次1806年博覽會宣教殖產興業政策的色彩更為濃厚，第四次1806年博覽會展期已超過10天，且參展者超過千人。之後1819年、

1823年、1827年的博覽會都以羅浮宮為展場，會期更延長為35天、50天、62天，參展家數在1827年已達到1,695家。金子堅太郎把這三次博覽會歸類為法國「第二階段博覽會」，展示應用學術研究成果的新工業產品為主，如玻璃製品與機械生產的絲織品，漸漸能夠挑戰英國在機械生產製品獨占鰲頭的局面。1834年則移至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舉辦，首次運用臨時性建物作為展館。隨後的1839年、1844年、1849年博覽會在香榭麗舍舉辦，幾乎每5年一次，似乎逐漸形成博覽會定期舉辦的原則。金子堅太郎把1834年、1839年、1844年這三次博覽會歸類為法國「第三階段博覽會」，宣教民眾對抗外國農工商業產品競爭，以及增加出口以振興經濟的博覽會。1849年的博覽會展期已長達六個月，參展廠商高達4,531家。(Greenhalgh, 1988: 6; 國雄行, 2010: 9-10; 參見表2-2) 吉見俊哉更指出1849年法國舉辦的博覽會，阿爾及利亞(Algeria)及法國其他海外殖民地也前來參加，幾乎已達國際規模，或可稱為「準萬國博覽會」，也是金子堅太郎所謂的法國「第四階段博覽會」，一個打破貿易國界，將世界產品齊聚一堂，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國際博覽會。(吉見俊哉, 1992a: 31; 國雄行, 2010: 10) 陳其澎教授也提到「萬國博覽會可以遠溯1797年在法國舉辦一項關於織錦、瓷器、地毯的博覽會，這個成功的經驗鼓舞主辦者達維茲向法國政府提出在巴黎戰神廣場舉辦博覽會的計畫，而又一次成功辦成包括60個參展單位的博覽會，成為第一次國際級的萬國博覽會。往後成為慣例，分別在1801年舉辦第二次、1802年第三次、1806年第四次、1819年第五次、1823年第六次、1827年第七次、1834年第八次、1839年第九次、1844年第十次、1849年第十一次等萬國博覽會。(陳其澎, 2005: 81-82) 陳教授未提及1798年法國工藝展覽會，且認為1797年的博覽會為第一次國際級的萬國博覽會，法國於19世紀前半葉舉辦過11次萬國博覽會，似有商榷餘地。就Paul Greenhalgh的評論，1797年與1849年法國舉辦過的博覽會，雖然已稍具一些世界博覽會的特性，且引起過其他國家的興趣，不過就參展的廠商來看都是法國廠家，應該只是國家級博覽會。(Greenhalgh, 1988: 6)

受到巴黎工藝展覽會成功的影響，法國各地紛紛舉辦類似的博覽會。例如1827

年的南特(Nantes)、1835年的里爾(Lille)、1835年與1845年的波爾多(Bordeaux)、1836年的土魯斯(Toulouse)與第戎(Dijon)都舉辦了博覽會，也促成歐洲各國舉辦類似的博覽會。比較重要的如1818年德國慕尼黑(Munich)博覽會、1820年比利時根特(Ghent)博覽會、182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博覽會、1824年比利時都爾奈(Tournai)、1825年荷蘭哈倫(Haarlem)博覽會、1826年愛爾蘭都柏林(Dublin)博覽會、1827年西班牙馬德里(Madrid)博覽會、1828年美國紐約(New York)博覽會、1829年俄羅斯莫斯科(Moscow)博覽會與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博覽會、1830年比利時布魯塞爾(Brussels)博覽會。其中1830年的布魯塞爾博覽會，比利時邀請鄰國荷蘭參加，初具國際博覽會的格局。1844年德國在柏林舉辦「全德博覽會」(All German Exhibition)，宣揚德意志國家的政治認同，可以意會此時博覽會的目的，不只是在振興產業，也具有國際政治與文化的角色。五年後的1849年法國巴黎工藝博覽會就具有形塑法國為歐洲中心意象的政治意圖。(Greenhalgh, 1988: 9) 有關1830年布魯塞爾博覽會初具國際博覽會格局，法國在1834年也曾研擬巴黎產業博覽會以國際型式舉行，1849年農業部長布斐(Louis Buffet)更著手計畫開辦國際博覽會，最終都因堅守貿易保護態度的工商團體及地方政府的反對而打消。因此，即使面對英國已決定要在1851年舉辦國際博覽會，號稱法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1849年博覽會，仍然只是個國家級的博覽會。這種拒絕國際博覽會的背後心態，恐怕還是在於害怕工業實力獨大的英國，亦即擔心英國工業產品入侵，而訴求育成國內產業為主的考量。(Greenhalgh, 1988: 10-11; 吉見俊哉, 1992a: 32-33)

不過，就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教授天野史郎有關法國國內勸業博覽會的研究，博覽會不會在19世紀中葉突然出現在歐洲的倫敦，這個新型態的展示系統，雖然在中世紀的市集與18世紀的繪畫藝術展看出其原型輪廓，若就振興產業發展為目的展示系統原型，應該追溯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另《世界大百科事典》的記載，近代博覽會概念的原型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後，1761年倫敦「藝術、製造與商業促進會」(The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舉辦了人類史上第一個展示工業製品的博覽會。(下中弘編集, 1988, Vol.22: 463) 英

國人施普利(William Shipley) 在1754年成立了「藝術、製造與商業促進會」，1847年更名為「皇家藝術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鼓勵各種能有益於工商發展的技術與發明，這個學會且成為推動1851年萬國博覽會最重要的幕後推手。「藝術、製造與商業促進會」於1756年在倫敦舉辦了有關掛毯、地毯、陶藝製造技術展示與評獎的活動，1761年更舉辦了英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有關農業機械的展覽會，可以算是近代博覽會概念的原型，很可惜的是當時英國僅舉辦一次，並沒有將其制度化定期舉辦的作為。推其因當時的英國自由主義思維當道，政府很難把民間主導的展覽會發展成由國家主導的勸業博覽會，反而發生在與英國競爭的法國。(天野史郎，1992：124-125)

有關1761年「藝術、製造與商業促進會」舉辦史上第一個展示工業製品博覽會，暨南大學羅靖副教授有更細緻的描述：「藝術、製造與商業促進會在1754年成立，1847年榮獲皇家特許被改為「皇家藝術學會」，意在建立一個基金，其中的獎金用於促進和鼓勵自由藝術、科學和生產等等的精進。1760年該組織決定舉行一次藝術、手工藝品和發明的展覽，於是被名為全國第一次有組織的藝術公共展覽。在1761年皇家藝術學會舉辦了一個為期七周的藝術、製造和商品展覽會，旨在每年評選獲獎者，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這屆展覽會展示了英國各類技術發明，包括機器類中的微型風車、手紡車；農業機械方面的曳引機、蘋果榨汁機和各類輪船模型和紡織機械等。由於宣傳不力，第一年展出的效果並不理想，皇家藝術學會決定把獲獎產品作為固定陳列，就像博物館陳列展品一樣，籍以吸引觀眾。由此，英國放棄了年度展覽的原意和進一步發展這類展覽會的可能，而把這個機會留給了法國。」(羅靖，2009a：7，2009b：20-21)

誠如呂紹理教授所言：「英國在1760年代舉辦過工藝品和發明物的展示會，這個展示會不僅沒有法國那種擔負國家政策的目標，而且規模也相當小，嚴格來說稱不上是博覽會，但展示內容卻包羅了繪畫、雕刻、幫浦、紡織機等各種「發明物」，因此也具有與博覽會相同特質的綜合性。儘管這個展示活動的規模與雄心都

無法與38年後(1798年)法國工藝博覽會相提並論，但此一學會的展示卻形塑了18世紀末葉英國中產階級對於藝術的認知，了解到藝術是種文明生活的重要表徵。英國後來在1837年時，也舉辦了一場規模較大的展覽會，不過參加者以北英格蘭為主，並未涵蓋整個國境，也未邀請其他國家參加。」(呂紹理，2005：51；Greenhalgh，1988：7-8) 此外，在19世紀進入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時代，機械學會(Mechanics Institutes)將英國當時的展會規模擴大。受到皇家藝術學會的啟發，機械學會關注勞工階級的休閒與教育，英國在1837年後的地方工業都市陸續舉辦各種教育勞工的機械製品展示會。從1837年曼徹斯特舉辦以後，薩瑟蘭(Sunderland)、紐卡索(Newcastle)、索爾福(Salford)、里茲(Leeds)、雪菲爾(Sheffield)、斯托克(Stoke)、德比(Derby)、伯明罕(Birmingham)、普勒斯頓(Preston)、瑪斯菲爾(Macclesfield)、維根(Wigan)、哈利法克斯(Halifax)、哈德斯菲爾德(Huddersfield)、諾丁罕(Nottingham)、威克菲爾德(Wakefield)、斯托克波特(Stockport)、斯特勞德(Stroud)、萊斯特(Leicester)、利物浦(Liverpool)、布拉德福(Bradford)、里彭(Ripon)、奧爾德姆(Oldham)等城市也相繼跟進。機械學會所舉辦的展會，性質屬慈善公益的展會，想喚起勞工階級的自覺與形塑工業文化。(Greenhalgh，1988：8) 吉見俊哉教授更指出，1839年的里茲技術與製造業展示會，入場人數已達18萬人次，1849年的伯明罕展示會，會場更是一座面積一萬平方英尺的龐大建築物。在1847年之後的倫敦，皇家藝術協會主辦的工業品與工藝品展覽會，也發展為每年固定舉辦的盛會。(吉見俊哉，1992a：33-34；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31)

有關1851年英國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的起源，應該追溯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或是18世紀末葉的法國，姑不論Paul Greenhalgh、吉見俊哉、國雄行、馬敏、呂紹理等學者專家的研究，認為博覽會最早出現在18世紀末葉法國的看法比較正確？還是天野史郎的研究與《世界大百科事典》主張應該追溯到18世紀中葉英國的看法比較能夠接受？即使提醒我們應該追溯到18世紀中葉英國的天野史郎教授，也在他的研究指出18世紀中葉以後的英國自由主義思維當道，政府很難將民間主導的展覽會發展成由國家主導的「殖產興業」博覽會，反而發生在法國。羅靖也曾

提到1761年英國工業製品博覽會，由於宣傳不力，第一年展出的效果並不理想，英國放棄了年度展覽的原意和進一步發展這類展示會的可能，而把這個機會留給了法國。準此而論，近代意義上的博覽會始於1798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工藝博覽會是比較合理的說法。更重要的是該時期法國所舉辦的工藝博覽會，已經可以看到近代博覽會的屬性與意義：(1)藉由展示評獎，鼓勵業者之間的競爭；(2)藉由展覽推廣宣傳工業製品，增加業者商機；(3)藉由展覽帶動產業發展，促進國家經濟成長。

第二節 工業與帝國展示時期的世博會(1850~1920年)

依據《BIE官網》統計到1912年的資料，世界主要國家舉辦BIE認可的世界博覽會有17次之多，考量論文的討論不致發散，以及論文的篇幅，似乎沒有必要對17次世博會逐一做介紹。已故的英國作家John Allwood在他1977年出版的《偉大的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s)一書，列舉了百年世博會中17屆重大盛事，若以1912年為界，則有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1855年巴黎博覽會、1862年倫敦博覽會、1867年巴黎博覽會、1873年維也納博覽會、1876年費城博覽會、1878年和1889年巴黎博覽會、1893年芝加哥博覽會、1900年巴黎博覽會、1904年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等11屆重大的世博會。本論文再加上滿清政府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政府商部顧問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的1906年米蘭世博會，如此回顧檢視才較為完整，方便後續章節的討論。本章第二節將以12屆重大的世博會(詳如表2-3)做介紹，並就學者專家的討論來彰顯世博會的歷史意義。

表2-3 截至1912年在BIE登錄的重大世界博覽會一覽表

#	年度	舉辦國/城市	名稱	類型	天數	萬人次
1	1851年	英國/倫敦	萬國工業博覽會	綜合	140	604
2	1855年	法國/巴黎	第1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150	516
3	1862年	英國/倫敦	倫敦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5	621
4	1867年	法國/巴黎	第2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7	906

5	1873年	奧匈/維也納	維也納萬國博覽會	綜合	106	725
6	1876年	美國/費城	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	綜合	185	800
7	1878年	法國/巴黎	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190	1,616
8	1889年	法國/巴黎	第4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182	3,235
9	1893年	美國/芝加哥	芝加哥世界哥倫布博覽會	綜合	183	2,753
10	1900年	法國/巴黎	第5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綜合	212	5,086
11	1904年	美國/聖路易士	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綜合	185	1,969
12	1906年	義大利/米蘭	米蘭世界博覽會	綜合	223	NA

資料來源：整理自《BIE 官網》、丁錫鏞《1851至2005年世界博覽會全紀錄(上冊)》、周秀琴與李近明編著《文明的輝煌：走進世界博覽會歷史》、John E. Findli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 1851-1988。

一、1851年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

由於工業革命致使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際交通的發展，找尋海外市場成為19世紀中葉工業化領先國家必須面對的課題。當時正處於工業革命鼎盛時期的英國，為宣揚國威與持續產業發展，在1851年的倫敦舉辦了規模空前的「萬國工業博覽會」，共有25個國家參展，展出34個國家的展品，包括奧地利、比利時、巴西、智利、中國(滿清政府)、丹麥、埃及、法國、德國、希臘、墨西哥等國家，將近14,000個參展者(13,937)，100,000餘個展品，展品種類多達6大類30個細類。英國的蒸汽機、水壓機、紡織機等代表當時工業化最高水準的產品盡數陳列。藉由各國相互交流，方能知己知彼，並且把工業化的成就和資訊帶到世界各地。展期共140天，從1851年5月1日至1851年10月15日，歷時5個多月，超過600萬人次，共6,039,195參觀人次。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普遍被認為是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象徵，確立了大英帝國世界工廠的主導地位。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展示世界工業革命的先進成果，讓世人開闊眼界，並聯合各國人民把工業革命推向全世界。(上海圖書館，2002：6；呂紹理，2005：54；周秀琴，2010：54；Edwards，2008：6-7；Findling，1990：7) 由於它的成功，BIE追認為人類第一個世博會，也從此拉開160餘年世博會發展史的序幕。(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245)

倫敦世博會的誕生與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亞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與柯爾(Henry Cole)先生這兩位重要人士密切相關。1843年亞伯特親王擔任英國藝術學會主席，1847年學會改名為皇家藝術學會。1846年柯爾先生加入皇家藝術學會成為中堅幹部，當時他們正熱衷於舉辦藝術學會的傳統展覽會，1847年的展覽會吸引了大約2萬觀眾，1848年的展覽會達到7萬參觀人次，這樣的成功大大鼓舞他們決定從1851年開始效仿法國，每5年舉辦一次大型展覽會。法國早在1789年就創辦國家工業展覽會，到了1849年的第11屆展覽會，參展商已多達4,500個，參觀人數超過10萬人次。其實法國曾經想把1849年的展覽會辦成國際展，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而放棄。柯爾先生曾專程前往巴黎觀摩1849年法國工業展覽會，回國後向亞伯特親王請示倫敦展覽會究竟是舉辦成國內展？還是要成為國際展？有歷史遠見的亞伯特親王決定展覽會必須包括外國產品，倫敦展覽會特別強調萬國，把展覽會從國內推向國際，開創了世界博覽會的先例。(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62-63)

首次世博會會在英國舉行，在於英、法兩國對自由貿易的態度不同。法國國內的商業團體與地方政府對自由貿易持反抗的態度，而在舉行萬國博覽會之前，自由貿易已成為英國的國策。19世紀中葉英國的文化和思想受樂觀的進步思想支配，這些思想信念充分展現在第一次倫敦世博會。作為工業革命的領頭羊，在樂觀、自信和勇於競爭的精神感召下，英國人成功地把工業展覽會提升為國際性博覽會。(喬兆紅，2009b：113) 第一次倫敦世博會的關鍵人物亞伯特親王更認為，藝術和工業創作並非是某個國家的專有財產和權利，而是全世界的共有財產。天時、地利、人和激發了第一屆世博會在英國誕生。而世博會與之前國內產業博覽會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於國家力量的直接介入。無論是英國、法國在前期舉辦世博會的競爭，還是美國作為新興工業國家舉辦紐約、費城、芝加哥等世博會時，都展現了一個國家登上世界歷史舞臺與爭奪中心地位的衝動。(喬兆紅，2011a：160)

第一屆世博會最具特色的展館建設非「水晶宮」莫屬，徵集博覽會展館的設計之初，雖有254個設計方案，主辦單位均不滿意，最終取各案之長，推出以磚塊為結構的建築方案，並選定海德公園為博覽會場地。公佈後掀起了軒然大波，普遍

認為如果把公園建成博覽會場地，公園裡的大榆樹就會被砍伐，倫敦唯一可供人們休閒的綠地將會失去，這一磚塊結構的龐然大物必將長久聳立，也會破壞海德公園的原來面貌，當時的泰晤士報(The Times)對世博會將肢解海德公園的永世惡夢尤抱敵意，這些都讓展館建設工程陷入困境。此時英國皇家園藝師和中部鐵路的負責人Joseph Paxton提出以鋼鐵和玻璃結構的展館設計方案，除能保留大榆樹之外，同時還可以在博覽會結束後拆除展館，恢復海德公園原貌。(Findling, 1990: 3-4; 周秀琴, 李近明編著, 2009: 63-65) Alfred Heller曾評論道：「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人們又稱它為水晶宮博覽會，因為展館是由玻璃、鋼鐵和木材構成的宏偉建築。水晶宮以預製材料構成，4個月內完工，這是新工業時代才可能出現的建築奇蹟。水晶宮內更顯示出大英帝國的新銷售前景、擴大的市場和日益增長的效益，進而增添民族的自豪感。」(Alfred Heller著，吳惠族等譯，2003: 32-33)

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的展示共分6大部分，包括原料、機器、紡織製品、金屬/玻璃/陶瓷製品、雜項及美術。許多來自英國本土及海外的展品，展品數量超過100,000件，分別來自13,937位參展者。展位空間的一半幾乎都給了6,556件外國展品，另一半則提供給英國及其殖民地的7,381件展品，每一件展品上都不標價格。其中機器類最受人們注目，隆隆巨響的渦輪引擎、火車、蒸汽壓縮機和收割機等展品，讓人見識並崇拜機械的威力，更讓人陶醉他們身處於維多利亞盛世年代。(Edwards, 2008: 7; Findling, 1990: 7-8) 在參展國當中，法國和德國是最為引人注意的兩個國家，美國的場地僅次於法國，雖未能把全部場地派上用場，卻送來了560個有質地的展品，尤其是在農業機械設備及新材料工藝產品，連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略勝一籌，美國還送來摩斯在1843年發明的電報機。另中國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送來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展，並奪得金銀兩項大獎之外，也有所謂的「中國展區」，包括了絲綢、瓷器，宮燈、花傘、繪畫等傳統工藝品。係當時在華的英國人曾向兩廣總督提出合作參加博覽會的建議被拒之後，由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與Harry Parkes徵集中國商品送往倫敦展出。參觀人群慕名前往，無不為中國奇特的精美細緻的手工製品感歎不已，維多利亞女王也於5月7日參觀了

中國和其他展廳。(上海圖書館，2002：49-53；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65-67；鈴木智夫，1996：66-67)

主辦單位還專門設立了評獎委員會，對參展的優秀展品給予獎勵。評比的要求是獨創性、新穎性、精美性、經濟性和實用性等。原來設想給予獲獎者現金獎賞，後改為頒發獎章。每枚獎章用銅製成，上面刻有維多利亞女王和亞伯特親王的肖像。這次大會共有5,000多個展品獲獎，中國送展的絲綢、旗袍、茶葉等產品也獲得了大會頒發的各種獎章。倫敦博覽會於10月15日閉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參觀者超過600萬人，盈餘達18萬6,437英鎊，後於南肯辛頓購買了87英畝的土地，用於建造博物館和教育機構，繼續奉行促進國家工業發展的宗旨，這也顯現出來自德國的亞伯特親王所做的規劃，展現了德國人注重教育以及教育用於工業的傳統思維，也反映了德國人對建置博物館的思想特色。其中「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Science Museum)和「維多利亞女王與亞伯特親王紀念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就是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所留下的重要資產。(Edwards, 2008：11；Findling, 1990：8；周秀琴，2010：56) 更重要的是英國由此獲得了巨大的聲譽，首創的世界博覽會成為推動世界工業和經濟貿易發展、促進世界各國相互瞭解和世界文明進步的大舞臺。繼水晶宮博覽會後，其他國家紛紛仿效爭相主辦，共同譜寫光輝燦爛的世界博覽會歷史。水晶宮還是按原計畫於1852年拆除，遷移重建於西德納姆(Sydenham)，重建的水晶宮作為舉辦展覽、音樂會、足球比賽和其他娛樂的活動中心達85年之久，於1936年12月1日毀於大火。(Findling, 1990：9；周秀琴，2010：55；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68) 呂紹理教授於《展示台灣》一書道「水晶宮的建築重新組建於倫敦南邊的西德納姆，成為當時最著名的遊樂公園，直到1939年該建築毀於大火為止。」經比對所參考John E. Findling編輯的《1851年至1988年世界博覽會的歷史字典》一書，應該是毀於1936年較為正確。(呂紹理，2005：54；Findling, 1990：9)

Gavin Weightman在《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一書對1851年的「大博覽會」(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有過生動的描述，整個籌辦的計畫絕佳地展示英國人在組織上

所用的方法。首先，雖然政府成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監督展館和展示的安排，可是皇家委員會既不實際參與籌備工作也不提供經費。更重要的是大博覽會的想法不是來自一個政府部門，而是出自1754年為促進工業創新而成立的「皇家鼓勵藝術、製造業和商業學會」，成為維多利亞女王那位不善交際的夫婿亞伯特親王將其熱誠貫注在科學與文化的重要工具。當時該學會重要幹部柯爾自1849年巴黎博覽會回來，向他提出英國也應該辦一次博覽會的建議時，亞伯特親王即表支持。鑒於法國人並沒有邀請外國人參展，而亞伯特又是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提議英國應當邀請世界其他各國參展，讓世博會具有國際性。其次，任何想在「水晶宮」參展的國家，都必須遵守倫敦所制訂的規則：大會分配給參展國展出空間，參展國得自己設法把展品運來並負擔運費。而且每一個國家應當成立自己的委員會，以安排展品的選擇和運輸。由一開始大家便同意展出空間的一半，應該陳列英國及其殖民地的產品和製造品，另一半則陳列世界其他國家的展品。(Gavin Weightman 著，賈士蘅譯，2013：208-209)

有關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的歷史意義，呂紹理教授有過鞭辟入裡的評論。儘管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指出萬國博覽會所展現的龐大物資，與實際上當時英國社會的經濟實力與消費能力不太相稱，這場史上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在結束後，仍為英國留下不少遺產。水晶宮重新組建於倫敦南邊的西德納姆就是其一，成功的營運留下18.6萬英鎊的盈餘，並利用這筆款項在南肯辛頓建造「自然史博物館」和「維多利亞女王與亞伯特親王紀念博物館」，此其二。除此之外，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留給世博覽會的典範更為重要。這場博覽會與過往村鎮市集物品陳列的重要差異，在於沒有標價，亦即物品的展示，純粹以觀覽為目的，背後隱含了「教育民眾」的目標，亦即透過展示，讓觀眾認識並理解近代機械工業的技術與知識，以及背後所蘊含的知識分類概念。水晶宮博覽會的展示架構結合了當時英國逐漸成形的演化思潮，創造了一種對於物質與知識的分類概念，並且落實於展品的分類上，其中機械、工業製品、原物料與美術等四大類，日後成為所有博覽會展品分類時承繼並擴充的基準。在象徵意義的層次上，維多利亞女王在開幕簡

短的致辭中宣示了幾個價值：(1)這場博覽會祈求各國間的和平與友善的競爭，(2)追求工業文明所帶來的「進步主義」，(3)藉由博覽會展品免稅進口的政策，企圖打破各國關稅壁壘，實現當時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促進國際貿易發展。(呂紹理，2005：54-55) Jeffrey Auerbach與Peter H. Hoffenberg在《在1851年大博覽會的大英帝國與世界》一書直指1851年英國的萬國工業博覽會投射反映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英國，以及更寬廣的歷史發展趨勢。(Auerbach and Hoffenberg，2008：ix)

二、1855年法國巴黎第1屆世界博覽會

1851年倫敦世博會還未閉幕，巴黎當局就開始規劃1855年的世博會。巴黎世博會似乎受到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影響，其實法國在此之前早已經舉辦過多次國家工業展覽會，形成經常舉辦展覽會的傳統。(參見本章第一節)法國於1798年舉辦第一個全國性工業展覽會，有110個參展單位，總共頒發23個獎。到了1844年法國第十次的工業展覽會，參展單位增至3,960個，頒獎數達到3,253個。當時很多人都希望法國每年舉辦一次工業展覽會，也期望在1849年舉辦國際性工業展覽會。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成功，卻給英國搶在法國前頭，在倫敦舉辦了1851年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成功舉辦第一屆世界性博覽會。(Findling，1990：17)法國的1855年巴黎世博會有幾個目的，首先想從英國手裡奪回開創世界博覽會局面的形象。其次運用1855年巴黎世博會向世界宣示新政權的高度，以及展示法國工業技術與文化的超凡能力。舉辦這屆博覽會的另一層意義則是1851年12月政變上臺的拿破崙三世想抓住這一機會，向國際社會展示法國實力，顯示擁有僅次於英國倫敦的歐洲第二大城市(有百萬餘人口)的巴黎魅力。巴黎世博會無論在物質還是文化領域上，都被認為是成功激勵國際合作和發展的一次世界博覽會。(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74-75；Findling，1990：17)

有關展館的建設，法國政府於1852年3月27日批准成立一家私營機構來負責建造和管理。博覽會分工業與藝術兩大部分。整個展覽全部佈置在工業展廳內舉行，另外在工業宮旁建造娛樂設施和主走道，構成了展覽、休閒和娛樂一體的建築群

體。主要因為工業展廳的場地不足，使得主辦單位不得不增加二棟臨時性的大樓，一個為長條形的玻璃廳，另一個為法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藝術廳。前者，主要展示代表19世紀進步標誌的人類技術成就。從所展示的工業技術和獲頒獎項數量來看，英法兩國在工業技術上位居主導地位，拿破崙戰爭後工業展廳中展出的技術已在伯仲之間，兩國差距已大大縮小。藝術廳展出來自29個國家、2,054位藝術家、5,000件作品當中，來自法國的就有3,634件之多，佔總數的七成以上。藝術廳向世界展示人類的文化、文明和藝術，更展示法國藝術家卓越才能，雕塑廳被法國藝術家所壟斷，法國畫家表現更為傑出。此次博覽會擴大了人們的眼界，也瞭解到世界藝術發展趨勢。(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75-77；Findling，1990：16)

1855年巴黎世博會與1851年倫敦世博會相較之下，有幾個不同特點：第一，1851年倫敦世博會藝術方面只有雕塑品，1855年巴黎世博會則專門建造了藝術廳，使藝術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展示；第二，這次博覽會強化了英法聯盟的關係，在參展品中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上，法英都佔據了絕對優勢。兩國還多次進行友好訪問，英國維多利亞女王8月的訪法是從1422年亨利五世以來第一個正式訪問法國的在位英國國王。這次博覽會不但鞏固兩國聯盟關係，同時也展示英法兩國的工業實力與文化魅力。第三，此次博覽會也同時向世界展示了法國首都巴黎這座第一大城市在工業、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當時的巴黎正在迅速發展，已經佔有整個法國工業生產的三分之一。(Findling，1990：16；平野繁臣，1999：15) 1855年的巴黎世博會於5月15日開幕到11月15日閉幕，共150天，創造516萬餘(5,162,330)參觀人次。儘管最終以830萬法郎赤字收場，但在許多方面與1851年倫敦世博會相較之下毫不遜色，甚至在展館面積、投入建設與營運成本方面有過之。(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79-80；Findling，1990：18-19；平野繁臣，1999：16)

呂紹理教授對1855年法國巴黎第1屆世界博覽會的歷史意義，有段精彩的評論：「1855年法國以慶祝歐洲自1815年滑鐵盧之役後經歷40年和平為理由，舉辦了萬國博覽會，除開和平的訴求之外，由於失去了主辦世界第一屆世博會寶座，也讓法國立意要在此會與英國互別苗頭，以凸顯法國所舉辦的才是貨真價實的「萬

國」 「博覽會」。正因為要標舉法國所辦者乃為真正的博覽會，會場面積比水晶宮大了1.5倍，而更重要的差異在於特別設立了單獨的藝術廳建築，以表現英國只重工業技術，而法國不僅重工業，更重人文教養傳統。此外，為呈顯歐洲帝國力量的擴張，會場內展示了許多各國殖民地的農產物品，說明了歐洲日常生活與殖民地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凸顯殖民地的人種與物資，乃自該會之後，成為歐美博覽會展示其帝國意識無可或缺的元素。當然，除開凸顯藝術的特質之外，技術仍然是會場的另一個核心。法國也表現出其在紡織技術與設計上的成果，以對比英國所展覽者為大量製造的粗品。法國的雕刻繪畫在會場中更大放異彩，法國在博覽會標舉藝術重要性的概念，也成為日後所有博覽會仿效的典範，在日後所有的博覽會中，藝術展示一定是一項獨立而且代表各國文化最重要的象徵。雖然從經營的角度看，這場博覽會並不算成功，5,162,330人次的觀眾人數還是沒有超越水晶宮博覽會，而且收入短少了800餘萬法郎，也無法與水晶宮博覽會成功的財務管理相比擬，不過這次博覽會對於法國還是有許多實質的收穫。首先法國人民希望藉博覽會促成政府降低關稅的企圖在會後得以實現，其次，該博覽會成為英法同盟的重要黏著劑，維多利亞女王破天荒地造訪了法國參觀此會。最後，該會也有助於鞏固巴黎作為法國政經文化首都地位的功效，尤其經歷1853年豪斯曼(Georges Haussmann)銳意整頓塞納河，以及整體都市計畫的翻新之後，巴黎市容煥然一新，吸引無數旅客造訪流連，巴黎已不僅只是法國的首府而已，更成為歐洲的重心。」(呂紹理，2005：57-59)

三、1862年英國倫敦世界博覽會

1862年英國倫敦世界博覽會自5月1日開幕至11月1日閉幕，共185天的展期。正式名稱為倫敦國際工業和藝術博覽會(Lond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n Industry and Art)，以農業、工業及藝術為展示主題，展場面積15.2公頃，展館約9.5公頃(23.5英畝)，有39個國家參展，包括來自東亞的中國滿清政府與日本德川幕府的展品，係英國第一任駐中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世博會展出，半年的時間創造621萬餘(6,211,103)的參觀人次。(參見Findling，1990：23；國雄行，2010：16-20)

英國於1858年開始醞釀舉辦第二屆世博會，最初計劃在紀念10周年後的1861年舉辦，後因展館實際建設延遲，晚了一年在1862年5月1日開幕。由於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的成功，皇家委員會宣稱要使第二屆世博會無論在規模還是成效上都要超過1851年水晶宮博覽會。主辦者決定增加博覽會內容，不僅包括工業與美術，也包括工業製品、機器，以及歐洲工業所需的各殖民地所擁有的原物料。他們把工業的進步作為展覽的主要訴求重點，希望廣泛傳播技術知識，使這屆博覽會更具國際性，進而推動世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英國展示大不列顛在土木工程、農業工具、鑄鐵工業、機器製造、陶器和傢俱製造方面的實力，法國則在裝飾工藝方面見長。受到1855年法國世博會的刺激，在藝術展覽方面，他們決定不只增加陳列面積，有來自英歐等國2,305位藝術家的6,500件繪畫、雕塑和蝕刻藝術作品。而且允許展出各個時代的藝術作品，各國都力圖追溯到該國藝術鼻祖至今的藝術作品。亞伯特親王曾在1861年預測1862年的第二屆倫敦博覽會將會像1851年倫敦世博會一樣成功，甚至可以超越。很可惜這個預言並未實現，5月1日開幕後，觀眾並未達到預期的那麼多，也沒有太多的配合造勢活動，門票銷售並不好，而且營運費用面臨超支。1862年博覽會11月1日閉幕時，有621萬餘的參觀人次，而且花掉募來的459,632英鎊，僅賺了790英鎊，沒有像第一屆世博會有18.6萬英鎊那麼多的盈餘，也未能取代人們心目中水晶宮博覽會的地位，不過倒是為後來的法國立下世博會每隔11年舉辦的先例。(丁錫鏞，2006a：114；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81-82，84；Findling，1990：23)

將1862年與1851年的倫敦世博會做個比較，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會同意1862年倫敦世博會規模更大、展品更全、技術也更為進步，可是沒多少人會認為比得上1851年倫敦世博會。概在1862年倫敦世博會在籌備和舉辦期間有三個不利因素。首先，42歲的亞伯特親王於1861年12月因傷寒不幸辭世，導致1862年倫敦世博會沒了皇家代表。亞伯特親王對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卓越貢獻人人皆知，人稱「世界博覽會第一人」，儘管他未投入1862年的準備工作，但他象徵性的露面支持，影響就非同小可。在開幕式上每個貴賓的致詞，第一句都是悼念亞伯特親王

的不幸。其次，有多個戰爭爆發。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被視為是世界和平的新紀元，可是倫敦世博會結束後，許多國家紛紛捲入戰爭，如法國第二共和的瓦解、印度的反抗運動、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年)、西西里地區的衝突，以及美國內戰(1861-1865年)，無不發生在這段時間。其中籌備英國倫敦世博會的總經理Colonel L. Shadwell也以後備部隊被送往前線而喪命，為籌辦單位皇家委員會的運作帶來很大影響，使得世博會許多工作的處理都極為緩慢，工作效率十分低落，遭到媒體與民眾的抱怨。最後，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太過於成功，也給1862年倫敦世博會帶來巨大壓力。(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82-84；Findling，1990：24-25)

雖然本屆世博會受到諸多責難，展館設計拙劣、展示空間不足、籌備單位皇家委員會的沒有效率、營運經費的幾近超支……等等，日本博覽會專家平野繁臣還是肯定1862年倫敦世博會的貢獻。首先，它成功地展現世博會向世界傳達人類知識技術進步的功能，其中以英國工程師貝西默(Henry Bessemer)名字命名的「貝西默鍊鋼法」，這是鍊鋼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明，藉由世博會的展示宣傳，影響極其深遠。其次，確立了每隔11年舉辦一屆世博會的先例。(平野繁臣，1999：17)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久元年(1862年)德川幕府因外交事務的需要派遣竹內保德率領38人使節團遠赴歐洲，在英國駐日使節阿禮國的安排之下，出席了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典禮，是日本第一次派人前往參觀世界博覽會。使節團在會場內驚見日本展品，係由英國駐日使節阿禮國將私人收藏的日本珍品送去參展。(湯本豪一，1996：8-9；西川智之，2006b：175-176；松村昌家，2004)日本竹內使節團參與了第二屆英國倫敦世博會，對於往後日本的世界博覽會事業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使節團的成員如淵邊德藏、福澤諭吉在參觀倫敦世博會之後，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政策涵義，為日本參加世博會展示以學習，進而日後自己實際操作世博會「這個資本主義發展與國家現代化政策工具」邁出堅實的一大步。

四、1867年法國第2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1862年英國倫敦世博會的經驗顯示，要複製甚至超越1851年成功舉辦世博會，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法國宣稱在1855年舉辦第一屆巴黎世博會的11年後，法國應該在1867年舉辦第二屆巴黎世博會，以超越本身與英國1862年倫敦世博會的歷史紀錄。參觀人次要能達到900萬，要讓觀眾看到的絕不僅僅是個更大更好的世博會，更要讓世人看到拿破崙三世(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於法國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在各個領域的榮光。為此，第二帝國召集了法國最有才幹的名人加入宣傳行列，鼓吹巴黎不僅能成功的舉辦世博會，巴黎這個偉大城市還是人類新秩序的中心，例如知名的文學家雨果(Victor Hugo)應邀為巴黎市的導覽寫序。名人作家紛紛利用手中的筆來宣傳法國的榮光與偉大，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成為法國工業家與藝術家的陳列櫥窗，用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展示，來證明法國是世界的領頭羊，巴黎是世界文明的首都。(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85-86；Findling，1990：33-34)

據國內世博會研究與實務專家丁錫鏞博士的考證，1867年法國第2屆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展期從4月1日至11月3日共217天，會場在巴黎的戰神廣場，有68.7公頃，主展館占地15.3公頃，有42個國家參展，另有52,237家企業參展，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德川幕府首次組團正式參展(平野繁臣，1999：18)。該次博覽會以勞工的歷史為主題，首度出現比較像是世博會所謂的主題。截至11月3日閉幕，付費入場的共有9,062,965人次，約906萬參觀人次，財務方面則有416萬多法朗的盈餘。(丁錫鏞，2006a：126)

1867年的世博會參觀者並不是直接走進主展館，而是要穿越環繞主展館的一個大花園，可欣賞花園內的奇觀異景。花園內豎起50米高的燈塔，高聳的燈塔之光把夜間的花園照亮得如同白晝，或許正是這座燈塔啟發了1889年世博會設計了300公尺高的埃菲爾鐵塔。花園布置一連串多國風情的餐廳，把一種歡樂的氣氛帶進世博會，不少商家都意識到世博會是賺錢的黃金機會，紛紛推出了巴黎咖啡等在中世紀就很流行的餐飲。公園的出現使世博會的內容更有創造性，有些難以在正規的主展館內展出的物件都可在公園內亮相。(Findling，1990：34-35)

自1851年倫敦世博會以後，世博會展區均按國家劃分，每一國家分配在指定的區域內，自己規劃合適的方式展出。1867年法國第2屆巴黎世博會首次提出二元化分類方法，按展品的性質與參展國家來分類。為因應新分類法也相應產生橢圓形展區的設計，展區的各圓圈區域展示來自各個國家的同類展品，圓心輻射區域則分配給各個國家。此次世博會的分類體系展現了人類十大活動領域：(1)藝術品(works of art)，(2)博雅藝術的器械與應用(apparatu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iberal arts)，(3)傢俱與家用物件(furniture and other objects for use in dwellings)，(4)服飾及穿戴飾品(clothing, including fabrics and other objects worn upon the person)，(5)工業製品及原物料加工機械(industrial products, and machines for producing raw materials)，(6)應用藝術品之器械與加工方法(apparatus and processes used in the common arts)，(7) 食品的保鮮及儲存及其處理(food, fresh or preserved, in various states of preparation)，(8)牲畜和農業建築(livestock and specimens of agricultural buildings)，(9)花木園林產品(live produce and specimens of horticultural works)，(10)提高人類身心靈的物品(articles whose special purpose was meant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oral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86-87；Findling，1990：37-38)

在橢圓圓心區佈置了新穎的「勞工歷史」主題陳列，第二帝國意在贏得勞動階層的擁護，特別設置從石器時代到1800年左右的勞工歷史展示，隨著勞工歷史的發展，法蘭西文明也逐漸崛起。位於世博會外環線的大型機器展示區則是19世紀歐洲的真實寫照。在重型機器方面，各國競相展示代表國力的創新機器，在此美國的摩斯電報與芝加哥湖隧道展覽嶄露頭角，引起歐洲工業大國的注意，在1867年讓世人刮目相看。而主辦國法國最引人注目的是蘇伊士運河展，模型逼真地展示了這一人類歷史的巨大工程。法國工程師設計的大型挖土機為今後類似的運河工程和海洋事業開闢了樂觀的前景。普魯士(德國)克魯伯鋼鐵公司(the Krupp Company)也獲得大獎，它的煉鋼技術新異，更多的觀眾則在該公司生產製造能發射1,000磅炮彈、重達50噸的鋼炮面前讚歎不已。第二屆巴黎世博會吸引超過906

萬參觀人次，創造416萬多法朗的盈餘，此時的巴黎欣欣向榮，拿破崙三世皇帝功業彪炳，法蘭西是新世界的領頭羊，巴黎從未像此時那麼輝煌耀眼。1867年世博會盛景並不能消除國與國之間的新仇舊恨，盛大活動後不久，法蘭西與普魯士就爆發了戰爭。正是在1867年世博會上展出的50噸重的克魯伯鋼炮轟開了巴黎城門，巴黎乃至整個法國被襲擊和佔領，拿破崙三世被俘並遭流放。普魯士軍隊行進在香謝大道上與隨之而來的血腥鎮壓，抹殺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曾經的光輝燦爛，法蘭西第二帝國亦黯然失色。(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87-92；Findling，1990：38-39)

丁錫鏞博士與平野繁臣兩位專家的評論，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有底下幾個重要的影響：(1)在世博會布展的想法上，首次提出二元化分類方法，按展品的性質與參展國家來分類，因此有了橢圓形展區的設計。(2)在世博會展示形式上，第一次出現國家館，在主展館周圍的公園內，參展國建造了具有本國風情的國家館及休閒設施，如奧地利酒吧，英國小酒館、突尼斯咖啡屋、晚間音樂會等；(3)在世博會的理念上，第一次有了人文展示主題「勞動的歷史」，從過去重展示較狹隘的產業技術領域，轉向較偏向人文關懷的文化展會。(丁錫鏞，2006a：123；平野繁臣，1999：19-23)

法國在籌備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的過程中，曾經邀請遠在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參展。1866年中國滿清政府總理衙門首度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加。然而，就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有一位來自中國廣東的書生王韜(被譽為中國親眼目睹世博會的第一人)，他遠涉重洋到達法國，親歷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並寫下〈游觀新院〉收錄在其《漫游隨錄》一書。(上海圖書館，2002：14；上海市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2007：125)不過，1867年理雅各(James Legge)自香港回蘇格蘭家鄉探親，邀請王韜到歐洲遊歷，並前往蘇格蘭繼續幫助翻譯中國經典，11月20日王韜乘輪船啟航40多日抵達法國馬賽，從馬賽轉搭火車到巴黎想必已是隔年1月，巴黎世博會早已結束快兩個多月，很難有親眼目睹世博會的可能。日本學者鈴木智夫亦指出王韜到巴黎的時候，博

覽會已經閉幕，所紀錄的是他參觀會後展場所見，以及翻譯人員所說，不過無論如何王韜還是最早關心世博會，並為文介紹的中國人。(鈴木智夫，1996：70) 反觀當時的日本，法國駐日大使羅休斯(Michel Jules Marie Léon Roches)曾探詢幕府監察官栗本鋤雲參加巴黎世博會的可能性，栗本當下將exposition一詞翻譯成「博覽會」。經駐日大使羅休斯與栗本鋤雲的居中協調，幕府最終決定參展，由德川幕府的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陶器、漆器、銅器、浮世繪、礦物等特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席，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隨行的澀澤榮一將1867年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情形，詳實且生動的紀錄在他的《航西日記》書中。(西川智之，2006b：176-177；椎名仙卓，2005：5；國雄行，2005：23；福田州平，2013：31)

五、1873年奧匈帝國維也納世界博覽會

奧地利政府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閉幕三年後的1870年向世人宣佈，將在1873年舉辦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除了紀念奧皇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執政25週年之外，要把首都維也納推進世界先進都會之列，並恢復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失利後的國際威信。為了迎接世博會，維也納城市中世紀修築的城牆被拆除，護城河以及內城的防禦工事也被打通，與發展中的城市郊區連成一體。同時修建寬闊的道路和新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和新古典風格的宏偉大樓。另一大工程就是改造數百年來常常水災的多瑙河沿岸低窪地區，將多瑙河改道，為世博會提供了一個臨近河流又有公園綠地的理想場地。1867年巴黎世博會很明顯告訴世人，把全部展覽集中在一個大展廳的做法，已經跟不上世博會的需要。為此，奧地利政府建造了四棟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工業、機械、農業及藝術四個展廳。工業展廳是整個世博會的中心，後成為世博會的標誌性建築，穹頂式的圓形大廳直徑為354英尺，高284英尺，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圓形大廳，是羅馬聖彼得教堂的兩倍大，穹頂上有天窗和陽臺，觀眾能在陽臺上觀看世博會乃至維也納城市的全景。工業展廳計畫在世博會後繼續使用的永久性建築，一直作展覽廳使用，1937年毀於一場大火。(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93-94；Findling，1990：48-50)

該世博會有兩個主題，一為改善人民教育、品味和生活品質的理想(the idealism of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tas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all people)，二為大規模製造的產品和豐富原物料的工業時代(the industrial age with its vast numbers of manufactured products and the wealth of raw materials)。儘管世博會有展示智力和人文進步的計畫，但世博會還是按照1851年倫敦水晶宮博覽會，把原物料列為第一，藝術放在最後。兩大主題分為26個類別。其中有智慧財產權、品味教育、婦女兒童的教育、食品與家庭手工業、交通運輸、機械、林業管理、礦產開發、工程、新化學、陸軍與海軍、文化藝術，同時也舉辦各種國際組織關心議題的專門會議。由於這屆世博會被德語國家所壟斷，世博會的代表性受到了影響。35個國家送來7萬件展品，英國、法國及美國三個大國的展品都不夠理想。美國沒有意識到這次世博會的規模，只送來不起眼的展品，但卻派政府官員隨行，世博會後整理了四大卷維也納世博會報告，對正在籌備中的1876年費城世博會有不小的幫助。英國的參展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送來的展品沒有什麼新意，與當時取得的新發現和新工業成就不太相稱。倒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度，以及來自亞洲的中國與日本送來令人刮目相看的藝術展品。日本首次參加國際世博會取得了極大的成效，60餘人的代表團，不僅帶來了日本的傳統藝術，更虛心地觀察學習和汲取經驗。他們回國後整理出96卷世博會觀察報告，收集了很多可貴的資料，對日本以後躍上經濟強國和博覽會大國產生極大的影響。(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96-97；Findling，1990：51)

儘管各方人員的積極努力與來自奧地利軍方4,000名官兵的大力協助，5月1日世博會開幕時，世博會場地仍未完工。儘管如此，約瑟夫皇帝仍舊按照奧匈帝國君王的禮儀，親自駕臨為這盛大的世博會開幕式揭幕。開幕式可謂盛況空前，但世博會初期仍遇到不少困難，在開幕前7天，維也納股票市場狂跌，面臨崩盤邊緣，這對維也納是一個極大的挫折，嚴重的經濟衰退造成了維也納乃至全國大批工人失業。禍不單行的是1873年夏天又爆發了霍亂，造成2,000人死亡，嚇壞了原想前往世博會的觀眾。再加上天公也不作美，連續的暴雨造成水災，沖壞了世博會的

不少展館建築。另外毫無節制的旅館、餐館和計程車費用的漲價，嚇跑國內外旅客。這屆世博會造成經濟損失高達1,500萬gulden(約1,300多萬美元)，是19世紀賠最慘的一次世博會。經奧國的積極努力，當6個月展期結束時，共有725萬參觀人次之外，維也納人從此不用擔憂年年遭受多瑙河水患之苦，改道後的多瑙河和重建的城市，展現世博會對維也納市區重劃的最大貢獻。(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97-98；Findling，1990：53)

1870年清政府受到奧國邀請，起初不願參加，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轉引自趙佑志，1997：299)但是回應者廖無幾，商民對參加博覽會的意願不高，1871年11月奧國駐華公使強力建議清政府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博覽會的籌備事宜，方能使中國赴維也納的展品具有代表性，不失大國之顏面。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清政府委由當時總理衙門轄下的海關總稅務司全權處理，由於海關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滿清政府由海關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鈴木智夫，1996：70-74；Wright, 1993：3, 537) 據文獻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的記載，當時台灣還在大清帝國的管轄之下，因此委由淡水海關聘用的一些海關洋員如R. Hastings、R. Lent等人，策劃安排將台灣特產如煤、米、茶葉、蔗糖、樟木、樟腦、藥材、籐、麻、扇蓆等，以及常見的一些原住民交換物品，如「織布機和布」、「兵械及器具」、「生番麻」、「生番布」等，做為「中國館」展覽的一部份，是台灣首度登上世博會舞台的紀錄。(轉引自胡家瑜，2005：6)

奧國亦於1872年派特使親赴日本面見明治天皇陳遞約瑟夫一世親筆邀請函，明治政府首肯成立「臨時博覽會事物局」籌備參展事宜，並預先於1872年舉辦「湯島聖堂博覽會」徵集展品並作預演，以及派出70人的代表團參加，成為明治時期積極出洋參加世界博覽會的重要里程碑，也引起歐洲藝術史上所謂「日本流風」的熱潮。(鈴木智夫，1996：70；西川智之，2006b：179-183；吉見俊哉，1992a：116-118；椎名仙卓，2005：132-151；國雄行，2005：29-37) 明治政府於1871年11

月至1873年9月13日期間，首度派遣由重臣所組成的「岩倉使節團」，遠赴美國及歐洲諸國，交涉修改與美英法等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做西方文物制度考察。途中取道維也納參觀世博會，隨員久米邦武編撰的《米歐回覽實記》，由於其中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見聞記要〉上下兩篇傳世，日後才有大久保利通的規劃與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以及1877年首度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參見：湯本豪一，1996：20-21；久米邦武，1989：21-52)

六、1876年美國費城獨立百年博覽會

1870年代，美國以經濟大國之姿，正從大西洋的彼岸崛起，當時美國經濟位居全球第四，直到1880年代的美國經濟已居世界第一。1860年到1880年間，美國農業機械化發展迅速，造就高度發達的農業。同時美國的煤炭、鋼鐵、石油產量逐步超越了英法等國，交通也迅速發展，1875年每天進出芝加哥的火車達750列，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這一年中國滿清政府德宗(光緒)皇帝登基，時為光緒元年。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美國印第安那州瓦伯西學院(Wabash College)教授坎貝爾(J. L. Campbell)於1866年寫信給費城市長，要在費城舉辦一個國際性展會慶祝美國獨立100周年。五年之後的1871年，由賓州眾議員莫雷爾(D. J. Morrell)提案，經國會通過成立美國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負責1876年在費城舉辦「藝術、工業製品、農業礦業產品世博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Products of the Soil and Mine)。立案時國會言明，美國政府對參展的費用不做承諾，美國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會不得不向公眾出售股票的方式來募資。到了1873年秋季，經濟衰退籠罩全美，一直持續到1879年，美國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面臨巨大挑戰。美國國務卿曾向各國政府正式發出邀請，英國女王率先宣佈英國政府將派出大規模展覽團參加。除了派人前往歐洲遊說，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的宣傳部還通過報紙不斷向世界發佈訊息，最後共有35個國家與20幾個殖民地參加了美國獨立百周年世博會。(參見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99-100；Findling，1990：55)

世博會場位於費城西北部的費爾蒙公園(Fairmount Park)，用於博覽會的土地有175公頃，真正用於展示設施的只有115公頃。會場規劃的負責人舒茲曼(Hermann J. Schwarzmann)在不設主展廳，廣設主題式展館和國家館等獨立展館的原則下，不到兩年的時間，115公頃的荒地改造成漂亮的公園，蓋了249 幢大大小小的建築，這種分散式的設計概念對隨後世博會的佈局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876年5月10日清晨的天空下著濛濛細雨，到了上午9時世博會大門開啟時，太陽穿過雲彩展露笑顏，給費城獨立百年博覽會帶來好兆頭。盛大的開幕式共有18.7萬人到場，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與巴西皇帝Pedro登上高聳在機械廳內的蒸汽機，這架擁有1,400匹馬力的蒸汽機高13米、重56噸，由設計製造者考立斯(George Corliss)親自開啟蒸汽機。當蒸汽機開始運作時，透過40英里長的皮帶，帶動機械館內數百台大小機器跟這運轉，傳來震天價響的機器聲與人群的歡呼聲。考立斯蒸汽機成為費城獨立百年博覽會的標誌，更是美國工業技術水準的最佳展現。獨立百年博覽會的展品大多佈置在主展廳、機械館、農業館、紀念館及園藝館等五大展館，主展館是由鋼鐵與玻璃為主要材料建成，占地20英畝，1,000多個參展商在內展示了成千上萬的展品。主展館的一端為主辦國展覽，也是本屆世博會的重點。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貝爾發明的電話，經過世博會亮相後，這些產品都得到迅速推廣和廣泛使用，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另一端為外國展區，各國都儘量把自己的展館裝飾得出眾，表現出自己國家的風采。中國館則是典型的清朝的牌樓，中間寫著「大清國」三字，雕刻精美，鑲嵌華麗。當時滿清政府仍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組團參展，為了使海關籌辦世界博覽會的事務在國內得到認可，1876年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經東海關稅務司德瑾琳推薦，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委派參加了費城世博會，詳細考察並記錄了該屆博覽會，回國後的1877年完成《環遊地球新錄》一書，可說是中國人對世博會最完備的現場參訪紀錄，詳細介紹費城博覽會與心得，讓中國人進一步認識世博會。另俄國和日本的教育和其他的展示都讓參觀者刮目相看。機械館毫無疑問是世博會上最引人注目的展館，除56噸重的考立斯蒸汽機之外，在機械館旁有一瀑布池，動用很多抽水馬達把水從大蓄水

池中打出，然後送入到瀑布池中。浪花飛濺，水聲嘩嘩，帶給人們舒適的涼意，報章雜紙報導這裡是1876年夏天最受歡迎的展點。除了五大展館外，還有其他200餘幢建築，婦女館就是個創新，可惜並未形成日後其他世博會的設置慣例。(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01-104；平野繁臣，1999：29-30；Findling，1990：55-59)

人們也許難以相信，以前的世博會並沒有對遊客的交通作出配套安排，目睹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交通的混亂，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決定對交通作出相應安排。費城鐵路局負責把大展的交通搞得有條不紊，井井有序。百年慶典世博會唯一不愉快的事件是圍繞著周日是否開放引起的爭論，世博會原訂於週一至周六上午9時至下午6時開放，星期日閉館。那時美國人每週都工作六天，星期日關閉讓許多上班族無法前來，造成財務收入一定的損失。最後通過投票表決，結果9個州投贊成票，30個州投反對票，使百年慶典世博會不得不宣佈維持原狀，星期日不開放。(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05) 另丁錫鏞博士的研究，星期日不營運的理由是因為機械館的動力來源考立斯蒸汽機，它的設計製造者考立斯不允許他心愛的機器在星期天還要辛苦的工作，只得在星期天關門休館。(丁錫鏞，2006a：148)

1876年世博會於11月10日閉幕時，185天開放期間，共吸引觀眾近1,000萬(9,789,392)參觀人次，其中有800多萬(8,004,325)人次購票入場。世博會結束後，34個國家贈送美國聯邦政府部分展品，運送到華盛頓成為史密森協會管理下新博物館(現為國家歷史與技術博物館)的核心收藏品。1876年前歐洲把美國看作是一個剛剛起步的國家，尚未有資格加入一流國家俱樂部。1876年費城世博會使得美國被看作是一塊進步的土地，被形容為大膽、迅速、現代、富有生氣及講究實效的國家，顯示美國工業和經濟強國的潛力。(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06；平野繁臣，1999：30；Findling，1990：61)

七、1878年法國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令法國人顏面盡失的普法戰爭結束7年，法國政府在1878年想舉辦第三屆巴黎世博會，向法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法蘭西要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繼續承擔

法國在人類文化的領頭羊角色。這屆世博會於1878年5月1日正式開幕，第9天後的付費觀眾達到26萬人次，會期共190天。儘管到後期，該屆世博會仍有3,170~3,200萬法郎的赤字，但大部分法國人和政府官員都認為能建立起新共和國的信心，這個代價絕對值得。反對者的聲音也不小，抨擊世博會過於鋪張浪費，因為在開幕式上明顯地拒絕有任何宗教色彩，宗教界人士激烈反對這屆世博會，致使1878年世博會僅有近1,616萬(16,156,626)參觀人次，比預測的人數要少，致使營運經費有很大的虧損。(丁錫鏞，2006a：162；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07-108；平野繁臣，1999：31，33；Findling，1990：63-64)

1878年世博會顯示法國工程師的周密規劃，人們驚奇地發現一條地下小火車軌道連接特羅卡德羅宮(the Trocadero Palace)和工業宮(the Palace of Industry)，大大加快了兩個展廳建造工程的進度，也使世博會結束後的清理工作能夠速戰速決。另一個特點是供水系統，四套大型的水力抽水設備把塞納河水藉由23英里長的管道送往世博會的每一個角落。在世博會的盛夏時間，可利用水來降低展廳內的溫度。特羅卡德羅宮正式竣工後，其中的音樂廳成了藝術聖殿，幾乎每晚都舉辦音樂會，每次能容納觀眾達4,500人之多。在此期間音樂廳還舉辦了國際合唱比賽，成為世博會中引人注目的活動場所。在特羅卡德羅宮內舉辦各種展覽會，從法國政府和私人收藏中彙集起來的裝飾藝術展，到有數千年歷史的法國盔甲、槍支、皇冠、扇子、金屬、木雕、瓷器等工藝展覽。在特羅卡德羅宮其他展廳內，各種國際組織聚會研商共同關心的議題，舉行了多次工程技術專業會議以及國際和平組織會議。婦女權力國際會議討論了婦女在各個發展時期的權力和作用，雨果主持的作家大會討論保障文學著作權的問題。正是由於該次會議促成了國際版權法的制訂，對後世的影響極大。進入工業宮，人們能見到世博會中常見的龐大機器，展品按國家或廠商排列。1878年的展示安排決不僅僅是對1867年世博會的改良，還創造了頗受歡迎的「萬國街」(the Street of Nations)。在工業宮的中心草坪上，每一參展國都樹立一個進口正門，結果帶有各國建築風格和特點的門面，形成了光彩奪目的各國建築薈萃的展覽，成為世博會的一大亮點。(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

108-109；平野繁臣，1999：31-32；Findling，1990：64-68)

進入工業宮，就像前幾屆世博會一樣，蒸汽機和裝飾藝術仍舊在1878年世博會上占主導地位，但是那些既富有創造性又有實用性的小型機器更為吸引觀眾。世界上第一台製冰機在世博會上亮相，受到參觀者的圍觀。還有新發明的橡膠輪胎也受到青睞。觀眾們在美國館流連忘返，美國的縫紉機行業名列前茅，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更贏得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無比崇拜，人們對他發明的能反復播放音樂的留聲機拍手叫好，對巴黎市民和一般觀眾來說，最吸睛的是1878年6月安裝在歌劇大道和歌劇廣場路旁的電燈(愛迪生發明用鎢絲製作的白熾電燈)，耀眼奪目的光彩照亮全場，所有的人都被愛迪生這位天才的發明所折服。(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10-111；平野繁臣，1999：33；Findling，1990：68-69)

儘管特羅卡德羅宮是世博會的藝術展廳，在塞納河對岸的工業宮卻不乏當代的繪畫和雕塑。在練兵廣場的草坪上，觀眾們看到的是法國雕塑家巴特勒迪(Frederic Auguste Bartholdi)空前巨大的雕塑自由女神像頭部的作品，就是後來放在紐約的世界著名自由女神像頭部，每天都有數千人進入自由女神的頭像內部遊覽。這一作品的顯示美法兩國的友好關係，1876年美國費城獨立百年世博會上展出的自由女神高舉火炬的手臂是用來表示美國正擺脫內戰創傷變得強大。法國也是要向世人宣告正從軍事敗戰和國內困境中重新站起來，走向光榮勝利的明天。(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13-114；Findling，1990：79-80)

李圭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數年後的1878年，適逢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受命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燾匆匆赴法，正趕上參加第三屆巴黎世博會盛大的開幕儀式，多次參觀世博園區，還參加了巴黎世博會的夜間活動，也曾多次參觀倫敦的水晶宮。在郭嵩燾日記筆下的世博會雖為萬國珍奇會、博物院、賽奇會、賽會、聚珍會、珍奇會、炫奇會、百年大會等字眼，但郭公使對世博會的認識已漸漸脫離「賽珍炫奇」的意義，發現世博會的價值，曾慨歎日本展館布置優於中國館且國人漠視不談世博會，進而主張仿效美國、法國的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參見郭嵩燾，

2008；吳海勇，2010：14) 而伴隨郭嵩燾公使左右的幕僚，有專職翻譯張德彝、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公使參贊黎庶昌等，皆滿清政府一時之選。他們各有行動，不僅親自見證巴黎世博會之盛況，且有文字傳世，對日後中國的博覽會事業發展有所影響。

八、1889年法國第4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1876年美國費城獨立百年博覽會剛落幕，法國遵照自己每隔11年在法國舉辦一屆世博會的規劃，隔兩年後的1878年又在巴黎舉辦第3屆世博會。從1867年、1878年到1889年這麼短的時間內連續舉辦世博會，曾引起法國人民的爭議。1884年11月8日，法國第三共和政府(1870~1940年)宣佈將在1889年再次於巴黎舉行第4屆世界博覽會，以紀念法國大革命100周年時，也引起支持與反對兩陣營的相互攻訐。法國商業部長Anne-Charles Herisson就1889年世博會可行性一事在報紙上陳述了各種支持與反對意見，包括世博會舉行過於頻繁、通貨膨脹的噩夢、犯罪的增加、外國勞工的湧入、會對已經衰退的經濟雪上加霜...等等。世博會支持者主張不能因為1878年巴黎世博會有過龐大的虧損就要換個城市辦辦看，應該堅持每11年在巴黎舉辦一屆世博會的光榮傳統。最後法國政府於1884年11月8日頒佈公告，遵照法國每11年舉辦一屆世博會的慣例，於1889年舉行第4屆巴黎世博會，展期為5月5日至10月31日，後改為5月6日至11月6日，並成立世博會專門委員會，著手世博會場地、經費籌措和展示設計等準備工作。(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25-126；Findling，1990：108-109)

1885年3月14日，世博會專門委員會向商業部長遞交規劃報告，但由於內閣成員的變動和其他事務的纏身，一直沒有定案。所幸的是自1885年12月新任商業部長勞克洛(Edouard Lockroy)上任後，才繼續推動主辦世博會的既定計畫。由於1889年世博會在紀念法國大革命100周年，歐洲君主國拒絕參加的傳聞不斷，1886年7月法國的官方公告明確地把世博會的目的定為慶祝百年來的經濟進步(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century)，想方設法把法國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和世博會

脫鉤，但世界各國對法國第三共和政府透過外交途徑發出的正式邀請反應冷淡。到了1888年1月，只有希臘、瑞士、挪威和塞爾維亞正式回復參加。美國、中南美各國，日本、摩洛哥等29個國家直到年底才回復。歐洲主要國家和絕大多數的小國家都拒絕參加，英國和俄國公開反對。法國對那些拒絕參展的最好回應就是把世博會辦成一個成功的盛會，一個使世界各國都無法不予理睬的盛大世博會。曾因法國革命及後來歲月的人心渙散，法國人於1889年夏天在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國家榮譽的驅使下團結一致，共同為第4屆巴黎世博會而努力。(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26-128；平野繁臣，1999：35-36；Findling，1990：109-110)

此次世博會總共有3,235萬參觀人次，比1878年第3屆世博會的總參觀人次多了1,600多萬，前來觀看分佈在237英畝(約95公頃)世博會場地上的61,722個參展單位，其中有一半(33,937)來自法國。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埃菲爾鐵塔(the Eiffel Tower)，總高度300.51公尺，共分57.63公尺高、115.73公尺高及276.13公尺高三層。建造花了2年2個月，耗資近780萬法郎(約合151萬美元)，博覽會期間有近200萬觀眾登上鐵塔，門票收入600萬法郎。平均每天有2萬人從早上8點半起，通常要排隊等候到中午，分乘5部電梯，登上艾菲爾鐵塔高處，一睹世博會全景和巴黎市景。與愛菲爾鐵塔相對應的是世博會場上最大的建築物「機械宮」(Galerie des Machines)，長1,452英尺，寬380英尺，分為兩層，占地15英畝，最高處達148英尺，所用的鋼鐵材料是埃菲爾鐵塔的兩倍。裡面的電動平臺每次能把200名觀眾從平地一直送到22英尺的高臺，俯瞰整個機械宮的陳列全景。愛迪生花費10萬美元，展出493項發明，特別是他設計的留聲機使人迷戀，贏得法國人民的衷心敬佩。在機械宮與埃菲爾鐵塔之間的練兵廣場上，聳立80餘座建築，內有各種精彩豐富的展覽。圓形大廳是世博會的中心，5月6日的開幕式就在此舉行。在塞納河對岸是園藝區，內有荷蘭鬱金香和日本園林。在東邊有食品工業與農業展覽，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要數用櫟木做成可容納20萬瓶酒的大酒桶，上面繪有香檳酒商的盾形標章。這個巨大的酒桶是由特製的20隻牛拖拉的貨車運入巴黎會場，顯示了法國在國際酒類市場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可以看見法國在國際經濟上的新發展。(周秀

琴，李近明編著，2009：128-130；Findling，1990：111-113)

法國人民第一次有機會目睹法蘭西帝國殖民地的種種異國風情，如草棚、市集、咖啡館和正在從事手工勞動的原住民之外，可以欣賞愛迪生最新發明白熾燈所帶來的奇觀，它使世博會能在夜晚開放參觀，這在世博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白熾燈將埃菲爾鐵塔點綴的燈火通明，再加上三色探照燈在空中飛舞照射，把半個巴黎城市都照得如白晝，十分壯觀動人。每天晚上人們都聚集在練兵廣場的大花園內，觀看在燈光照射下的噴水池所產生令人炫目的奇觀。原定10月31日閉幕的世博會，應民眾強烈要求而延長至11月6日。當在埃菲爾鐵塔上鳴放了最後一響禮炮，人們仍久久不肯散去。19世紀的世博會追求教育與娛樂效果，1889年巴黎世博會把兩者整合，並取得空前的成功。(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0-131；Findling，1990：113-115) 依據Anna Jackson、周秀琴、李近明及丁錫鏞博士的研究資料，總共約3,235萬(32,350,297)參觀人次，估算盈餘高達800萬法郎(約合160~165萬美元)，最少也有平野繁臣與John E. Findling兩位博覽會專家估算的60萬美元盈餘。(丁錫鏞，2006a：185；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1；平野繁臣，1999：40；Findling，1990：115；Jackson，2008：20) 1889年巴黎世博會是少數能夠在並非有利的條件下，取得極大成功的世博會之一，埃菲爾鐵塔與機械宮更是傳世的地標性建築，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之外，該屆世博會有許多殖民地展示，其意義在告訴國人有多少海外屬地，宣揚帝國教化殖民地的成就，並爭取國人對殖民政策的支持。(Jackson，2008：20-21) 該屆世博會充分顯示法國人的活力與才華，再次增強法國人的自信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總理在頒獎典禮所做的演說，點出過去的世博會以展示科技發明與商品展售為主，而最近的世博會已開始關心如何增進人類全體福祉的議題，如公共衛生、兒童教育、災害預防、居住環境改善的展示與討論。簡言之，如國雄行教授的研究觀察，世博會先進國的法國，1900年巴黎世博會已從獎勵產業發展，轉變至增進社會福利的世博會。而該屆世博會運用其超強的集客力，配合舉辦全球會議(如全球貨幣會議、全球海事會議等)的做法，也成為他國舉辦世博會仿效的一種慣例。(國雄行，2010：125-126)

九、1893年美國芝加哥世界哥倫布博覽會

為了慶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400周年，美國於1893年的芝加哥舉辦「世界哥倫布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又稱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是19世紀美國舉辦的世博會當中，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世博會，被譽為歷史上最成功的世博會之一。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會期是從1893年5月1日至10月3日，共183天，會場設置在芝加哥市中心東南方11公里處密西根湖畔的傑克遜公園(Jackson Park)，會場面積290公頃，共有19個國家與7萬多家企業參展，截至閉幕當天共累計2,752萬9,400參觀人次。(丁錫鏞，2006a：199)

在1876年美國費城獨立百年博覽會的激勵下，有人提議為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400周年舉辦一個盛大的世博會以資慶祝。1882年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與芝加哥時報(the Chicago Times)咸認為舉辦世博會是最好的慶祝方式，芝加哥時報更認為芝加哥是舉辦世博會最理想的城市。芝加哥地處美國中西部，是連接東西岸的交通樞紐，又瀕臨密西根湖，是個天然的港口城市。1893年人口已超過150萬，經濟的蓬勃發展帶動當地文化發展。1888年6月美國首府華盛頓第一個正式提出申辦世界哥倫布博覽會。接著紐約、費城、聖路易士和芝加哥都紛紛加入競爭主辦城市的行列。參訪1889年第三屆巴黎世博會之後，要想把世博會辦得趨近甚至超過極富藝術氣質的法國式標準，只有美國紐約或芝加哥才有這樣的條件。於是紐約與芝加哥這兩個城市之間的競爭愈形激烈，同時也刺激了美國國民對此屆世博會的關注。儘管大家都一致認為有必要於1892年在美國舉辦一屆世博會，但是直到1890年2月主辦城市仍未定案，最後在國會眾議院八次的投票，芝加哥獲得多數眾議員以及後來參議院的支持，被選定為主辦城市，因為芝加哥位居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完備的交通設施，又有堅強的私人贊助商，還有尚未開發的大片土地可作為世博會場地。1890年4月28日哈里森總統(Benjamin Harrison)正式簽署世博會法案(the world's fair bill of 1890)，並把世博會從1892年推遲到1893年春夏，以便有充裕的時間來籌備。法案特別規定成立國家委員會來監督和批准有關展館選址、總體設計、展館建造、綜合管理等重大決策。芝加哥世博會公司

和國家委員會這雙頭馬車的體制，使得日後世博會各項工作的開展變得複雜。(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4-135；平野繁臣，1999：41-42；Findling，1990：122-123)

在七個芝加哥世博會場址方案中，最終選定傑克遜公園區域，再加上市區南面的一大片土地作為世博會場地，面積大約為600多英畝。1890年11月發布世博會總設計基本構想，圍繞在一個人工湖與大湖灣建造14棟主要建築，在人工湖的中央有16英畝種滿植物的小島供休憩。代表作之一是受法國影響在環繞大湖灣而建的榮譽區(Court of Honor)。除此之外，還有200多州立、外國、企業和其他建築。環水而建不但解決世博會的用水，還可以創造出面湖的風景。總體設計採用了對稱的紀念碑式大建築，並決定在榮譽區的中心地帶採用新古典式，並以白色為基調，這就是後來芝加哥世博會稱為「白城」(White City)博覽會的原因。「白城」對美國建築，尤其是對華盛頓、舊金山和克利夫蘭等城市的建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延續到1930年代。(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6-137；平野繁臣，1999：42-43；Findling，1990：123-124)

芝加哥世博會國家委員會於1890年11月批准了世博會的展示規劃，包括農業、園藝、牲畜、礦冶、漁業、製造、機器、交通、電業、美術、人文、人種學及其他等類別展品。該屆世博會共吸引來自19個國家和美國本身39個州，共65,000多個參展單位。展覽大都集中在13棟主要建築之內，也有不少散佈在世博會場地和「中途遊樂場」。在藝術宮的74個展室內展出來自歐美的9,000件繪畫雕塑，還有少數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作品，中國送去的是精美瓷器。農業宮陳列有各種穀物、食物、肉類、乳酪製品、煙、糖、飲料酒類、動物、農舍、農業機械、農業學校等。製造與人文館是世博會場地上最大最壯觀的建築，長達1,700英尺、寬800英尺、占地30英畝。包括從化學醫學產品、服裝、旅遊器具到肥皂、陶瓷器等展品，中國廳占地1,000平方英尺，陳列有刺繡、牙雕、絲綢、織品等中國傳統製品。機械宮和電器宮展品的廣度和深度宣告美國進入一個新技術時代。雖有法國、德國等送來的展品，但電器宮基本被美國各大電力、電話電報、鐵路和機械等公司的展

品所壟斷。最引人注目的是43台蒸汽機，每台在18,000至20,000匹馬力之間，帶動著127台發電機，為整個世博會提供電源。交通宮陳列了迄今為止從嬰兒車到火車頭的人類史上的所有交通工具。人類學宮包括人體骨骼、人種學和考古三大部分的展示。人類學是從人體骨骼學的角度來追溯史前到現在的人類發展史。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展示在人種學和考古兩大部分展覽的洞穴人、湖河居民和懸崖居民的發掘物和遺址模型，以及十幾個反映土著生活和習性的民俗村。人類學家認為這些人種展覽實際上藉科學來說明人種優劣，宣傳種族歧視，為帝國主義擴張合法化開了先河。(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6-142；Findling，1990：123-124)

由於芝加哥不如紐約、費城、巴黎那樣有名，倘若要吸引大量遊客和參展者，以及能與巴黎世博會相匹敵，主辦單位進行大量宣傳以喚起人們的關注和認知。為此，世博會於1890年12月成立了廣宣行銷部，由東海岸報界人士Moses P. Handy負責，他充分意識到媒體的重要性，於是組織了由作家和翻譯家組成的寫作團隊，出版每週新聞並配備宣傳世博會籌備工作進展的照片，向國內外5萬多個組織、機構、報刊、雜誌發送。此外，在世博會籌備初期，主辦單位就收到很多來自娛樂、餐飲、雜耍、魔術、音樂等團體要求參與的請求，最後決定把娛樂活動集中安排在連接傑克遜公園和華盛頓公園之間的狹窄通道上，稱為中途遊樂場(the midway plaisance)。這一遊樂場成為世博史上最成功最出名的娛樂區，為後來大規模的娛樂園區奠下基礎。人們在中途遊樂場，可以發現異國情調的展示，如德國啤酒屋、土耳其市集、埃及街道、原始的爪哇村等。最出名的要數George Ferris設計的摩天輪，中心軸高45英尺、重46噸，是美國鍛造的最大最重的鋼軸，一次能把36個座艙共1,440名觀眾送上264英尺的高空，俯瞰世博會全景，成為世博會最受歡迎的設施之一。它具有埃菲爾鐵塔的英雄壯觀，還有載人運轉的歡樂氣氛。(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8-139；平野繁臣，1999：44-45；Findling，1990：126-127)

世博會於5月1日開幕，到10月3日閉幕時，共有2,150萬人次付費參觀世博會，而總數達2,752萬餘參觀人次，據不同的估算主辦單位芝加哥公司還有30~140萬美元的盈餘。芝加哥世博會成為世界博覽會成功的典範，為後繼的世博會所仿效。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世界哥倫布博覽會是那個時代經濟、科學和文化的大展示。如果說1876年費城世博會顯示了強大的美國已經越過了起跑線，世界哥倫布博覽會則向全世界宣告美國已成為世界大國，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能與老牌的帝國相提並論。(丁錫鏞，2006a：199；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42；Findling，1990：130)

十、1900年法國巴黎第5屆世界博覽會

法國政府在1889年世博會閉幕不到三年的1892年7月13日，法國第三共和政府宣佈於巴黎舉辦1900年第5屆世界博覽會的決定。一方面與6月間謠傳德國想在1900年柏林舉辦世博會有關，一方面法國想維護每11年舉辦一次世界博覽會的傳統，當然1900年是20世紀開始的第一年也是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45；Findling，1990：155)

這屆世博會場地包括練兵廣場、特羅卡德羅宮及其花園和塞納河兩岸，比法國歷屆世博會的場地都要大，巴黎主場地占地279英畝，副場地占地274英畝。主會場分成五大部分，包括裝置藝術、藝術展品、小類工業品、農業、林業、漁業、採集、飲食類產品、化學工業、土木工程、交通、教育、文學、科學、機器、棉紗、布料、衣服、礦產、軍事、社會經濟、衛生、園藝等展覽。在塞納河沿岸的國家大道聳立著23個國家館，還有專門用來召開學術會議的會議廳。這些國家館代表各自國家的傑出建築，因為照世博會的要求，建築必須反映每個國家傳統的建築風格。英國館和德國館堪稱最完美地展現城堡式建築，美國館則呈現看似不協調的是新古典式建築，中國館仿製傳統的典型塔樓建築，還有孔廟的廟門、頤和園的弓背橋和鐫刻有10種文字的都城北門。在副場地展出的是不適合在巴黎市中心舉辦的展覽，如農業、汽車、鐵路、重型農業機械如麥克考密克收割機等。在這裡同時舉行了第二屆奧運會，這是在希臘本土以外舉辦的第一次奧運會，也是第一次把世博會與奧運會同時在同一城市舉行，增色不少，也增加了不少觀眾。世博會共有83,047個展覽，38,253個來自法國，44,794個展覽分別來自40餘個國家，

其中歐洲占半數，最大的是美國，帶來7,610個展品。世博會建築有現有的、新建的長久性和臨時性建築。除保留下來的1878年世博會的特羅卡德羅宮，以及1889年的機械宮和埃菲爾鐵塔外，其餘舊世博會建築均被拆除，埃菲爾鐵塔特地重新粉刷披上金黃色，為世博會增加歡慶氣氛。新聳起的大宮、小宮和亞歷山大三世大橋是永久性建築，其餘均為臨時建築。(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45-147；Findling，1990：156-158)

19世紀曾風靡一時的蒸汽機、熱氣球、飛行器已不再那麼吸引人，該屆世博會上觀眾欣賞的是那些新型活字排版機、新型電影攝影機和X光機。最吸引觀眾的是些神奇的電器、新發明的汽車、自動電扶梯。在眾多的殖民地展示中，法國和其他帝國都展出新獲得的殖民地，以及當地原住民及其生活習俗。娛樂以商業性的活動較多，有特別慶祝日、宴會、音樂、戲劇、舞蹈和體育。與前幾屆世界博覽會不同，這裡沒有專設遊樂場，主辦單位想把各種吸引人的娛樂設施散佈在各個展覽館附近，不少集中在埃菲爾鐵塔下和沿著塞納河畔右側的巴黎之路。如頗具教育意義的太空旅遊和時空旅遊，以歐洲、北非、中東和遠東的異國情景和模型為主的世界遨遊，還有帶著虛幻冒險的宇宙之遊。(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48；Findling，1990：159-161)

1900年世博會，從4月15日至11月12日，共212天的展期，累計5,086萬餘(50,860,801)的參觀人次，主場地達48,368,504人次，副場地也有2,492,297人次。外國觀眾以德國人最多，這是德國第一次正式參加巴黎世博會。儘管參觀人次未達所期望的數字，但5,086萬多的參觀人次仍為歷屆世博會之最，這紀錄一直保持到1964年才被美國紐約世博會5,167萬參觀人次所打破。有關該屆世博會的盈虧，主辦單位曾宣佈虧損200萬法郎，1903年4月30日報導又說盈餘700萬法郎，國際展覽局記錄的盈餘為409萬法郎。1900年的世博會是自1855年開始的巴黎第五屆世界博覽會，也是五屆中最後最盛大的一屆。從參觀人數和各種反應來看，許多人認為該屆世博會辦得很成功，雖然沒有像預計的那麼輝煌。法國藉由這五屆巴黎世博會，充分展現自己，由此改變了二流國家的形象和地位，從英國、德國的陰影中

走了出來。(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49-150；平野繁臣，1999：49-50；Findling，1990：162)

十一、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美國在1803年4月30日以1,500萬美元向法國購買路易士安那約100萬平方英里這大片土地，比19世紀初期的美國版圖還要大。除了現在的路易士安那州之外，還包括阿肯色、科羅拉多、愛荷華、堪薩斯、明尼蘇達、密蘇里等11個州，當地的人口約占全美的四分之一。為了紀念購買路易士安那100周年，特別選在聖路易士舉辦世博會，所以稱之為聖路易士世博會。聖路易士世博會籌備委員會和聖路易士市以股票和債券分別籌措500萬美元，再加上美國政府撥款500萬美元，在籌備初期就募得1,500萬美元資金，這在世博會歷史上還是個首例。美國國會一致同意撥款說明了這屆世博會的重要性，同時也促成了世博會往大規模方向發展。與以往的世博會不同，主辦單位免費提供場地給參展單位，只須事先提出申請並遵守場地的使用規劃即可。世博會選定在聖路易士市西部的森林公園，景色非常秀麗的1,272英畝(約515公頃)的土地。(丁錫鏞，2006a：225；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53-154；平野繁臣，1999：51-52；Findling，1990：178-179)

美國總統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於1901年8月20日向世界各國發出聖路易士世博會的邀請。麥金萊總統卻在兩個禮拜後的9月5日參加布法羅舉行的泛美覽博會(Pan-American Exposition)時，遭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身亡，留下「世博會見證時代的進步，並記錄世界進步的歷程。世博會激發了人類的活力、進取心和智慧，促進人類聰明才智發展」的名言，這正是世博會意義之所在。繼任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根據國會法案，於1902年7月1日宣佈路易士安那世博會延後一年的1904年5月1日開幕。該屆世博會把展品分為教育、藝術、人文、製造業、機械、電器、交通、農業、園藝，人類學等16個類別。大部分類別都有專門的展館，參觀者可根據需要做選擇性參觀。基於聖路易士是世界的生產中心和美國的商品流通中心，這屆世博會不僅強調展品陳列，更強調展品的製造過程。

要求展覽儘量顯示具體生產的過程，以便觀眾從原材料一直跟蹤到產品的完成。值得一提的是，除深受人們的歡迎的熱狗、冰紅茶、冰淇淋首次在本屆世博會上問世之外，人類學類別的人種展示卻備受爭議。如果說主辦單位企圖展示人類在各領域上最新的技術成就，而在人類學方面則宣傳了人種優勢和帝國主義擴張具有正當性的思想。在前幾屆世博會風土民俗村的基礎上，進一步展示從野蠻人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人類發展史，並想盡辦法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搬到世博會場地。人類學館包括了來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亞的巨人、非洲的侏儒、日本的愛奴族人、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中國勞工、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規模最大且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菲律賓風土民俗村，占地7英畝，內有人造河，沿河有百餘座茅草房屋，居住著1,100位菲律賓人，向觀眾展示獨特的生活方式。主辦單位想讓觀眾對最原始和最先進的人作一比較，宣傳白種人優於有色人種。這種把活人與展品一起陳列的人種展示，實際上傳達的就是白種人優越感，以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後來遭到學者嚴厲批判。(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54-157；平野繁臣，1999：53；Findling，1990：179、181、183、185)

1904年聖路易士世博會共有60個國家參加，英國資助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15萬英鎊並委派威爾士王子率團參展，俄國為抗議美國在日俄戰爭中支持日本，且要把花費在世博會上的資金用於緩和國內經濟危機，拆除了俄國館退出世博會。(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57；Findling，1990：178-179)、庚子事變後慈禧(1904年)，滿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分別為正副監督。日後成為1910年南洋勸業會幕後要角的陳琪，也因精通英語，受湖南巡撫委派，隨團參與聖路易士世博會，負責陳設湖南展品與實業調查。雖然參展經費75萬兩銀元，為滿清歷年海外參展經費總數的三倍，建造了國亭與中國館，並首次出現二家官民合資專為參展而設立的公司，展出物品印有專刊目錄，以物品籌辦地分地詳盡記載，厚達370餘頁，而美籍女畫家柯姑娘(Katherine A. Carl)專為參展所繪之巨幅慈禧油畫像，也費盡心思自頤和園運至會場展出。不過整體展品仍由海關的洋人把持操辦，以農業、手工業及工藝品

為主，甚至為了投洋人所好，有些醜化貶低中國人的裹小腳婦女、吸食鴉片的老爺等泥人塑像展品引發爭議。(上海圖書館，2002：65-68；王正華，2003：421) 年輕團員陳琪對此次參展作業的不佳、展品的不當、展示中國的效果不彰提出批判，加速中國滿清政府從取回由海關洋人把持的世博會籌辦權。(Fernsebner, 2002：40-54) 此外，愛知淑德大學教授楠元町子與學習院大學的伊藤真實子指出，日本明治政府則以國際戰略、國際關係、皇室外交、日俄戰爭時期的外交等考量，積極參與聖路易世界博覽會，且規模為歷年之最。(參見：伊藤真實子，2003；楠元町子，2003a、2007a)

儘管理論都說世博會是一種教育性重於商業性的巨型展會活動，惟企業家早早意識到世博會具有可以增加財富的商業活動潛力。要能夠讓世博會辦得成功，就必須寓教於樂，以具有大眾化娛樂活動來促進教育之宗旨。聖路易士世博會主辦單位從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的經驗，決定開闢專門遊樂園區(The Pike)，坐落在世博會會場的北端，占地60英畝，提供500多項娛樂活動，展示了異國情趣、自然景觀及超自然現象，包括代表現代技術的潛水艇和飛艇的體驗，還搬來風靡於芝加哥世博會的摩天輪，受到觀眾大大的歡迎。在聖路易士世博會期間，同時舉行第三屆奧運會，共吸引近2,000萬(19,694,855)參觀人次，會場面積515公頃是世博史上會場最大的一屆世博會。據John E. Findling、周秀琴與李近明的推估，最後盈利有50萬美元到100多萬美元之譜，還留下了藝術宮為今日的聖路易士藝術博物館，菲律賓風土民俗村的展品大部分被送進費城商業博物館，另有部分文物分佈在密蘇里歷史學會、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愛荷華大學自然史博物館及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公共博物館，這是一屆成功的世博會。(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58；周秀琴，2010：138-139；Findling，1990：185) 不過丁錫鏞博士的研究是有19,694,855的參觀人次，但財務卻賠了550萬美元。從主辦單位原預估參觀人次在3,000萬人次，實際進場參觀的卻只有近1,970萬人次，以門票收入佔主辦單位營運收入一半的經驗來看，賠550萬美元似有可能。(丁錫鏞，2006a：225-226) 聖路易士世博會可說是個創造歷史紀錄的世博會，不過財務方面應該不算是成功的世博會。

十二、1906年義大利米蘭世界博覽會

1905年在義大利西北部與瑞士南部的交界處，當時歐洲最長的辛普朗鐵路隧道(the Simplon Tunnel)建成。為慶祝該鐵路隧道通車及該地區商業的發展，義大利政府決定在工業城市米蘭，舉辦以運輸為主題、涵蓋經貿交流與漁業發展方面的世博會。1906年4月28日開幕，至11月11日閉幕，會期198天，參觀人數達750萬至1,000萬人次。會場占地一百公頃，參加此次博覽會的國家主要有歐洲的法國、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英國、匈牙利、瑞士、荷蘭、俄國、土耳其、希臘、西班牙、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國；亞洲的日本、波斯、印度以及中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美各國等25個國家。(參見BIE官網：<http://www.bie-paris.org/site/en/1906-milan>；丁錫鏞，2006a：230-231)

1906年義大利米蘭世博會採分散式會場，分為森皮奧內公園(the Parco Sempione)展場與軍事廣場(Piazza d'Armi)展場，兩個展場相隔1,350公尺，以飛雅特公司創新研發生產製造的柴油驅動電車連結，也呼應了米蘭世博會展示運輸的一個主題。在現成的森皮奧內公園內，建造了陳列美術和文化活動的館樓。在另一塊空曠的前軍事廣場土地上，則作了正規的規劃來安排外國展館和展示工業和工程技術的展覽。主辦者原來打算把藝術和工程分在兩個不同地方來展示，後因各國紛紛送來以藝術為主的展覽而打亂計畫。儘管世博會的建築並未被當代的評論家看好，但仍有不少特色。如仿製辛普朗隧道式的進口、辛普朗隧道的立體模型、音樂廳、還有一個以巴洛克和洛可可兩種風格相結合的裝飾華麗的建築。在海洋交通館內，聳立著200英尺高的燈塔，為俯瞰世博會全景提供了絕佳地方。還有兩座新穎的展館，反映從紅十字制服到各種手術器械的醫療衛生展覽，以及世博會歷史上第一次汽車製造專館陳列。(參見BIE官網：<http://www.bie-paris.org/site/en/1906-milan>；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61-162)

除了受歡迎的工程展覽外，義大利和匈牙利的藝術展覽亦受人矚目。藝術館集中了義大利藝術，並展示了年輕藝術家的繪畫、雕塑和設計作品。在旁邊樓館內

展出的匈牙利展覽，帶有拜占庭圖案的藝術品更是讓人流連忘返，受到普遍好評。很不幸的是，義大利和匈牙利兩個藝術展館都於 8月2日毀於大火。外國參展者包括絕大部分的西歐諸國以及日本、中國、土耳其和加拿大。雖然有幾個南美國家聯名參展之外，北美有美國參展，但規模很小。大會還安排了特別展覽與活動，其中有美國人布法羅比爾組織的印第安人原始西部表演，以及帶有異國情趣的「開羅街」展示。(參見BIE官網：<http://www.bie-paris.org/site/en/1906-milan>；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62)

為慶祝辛普朗鐵路隧道落成通車及此後商業機會的增多，義大利政府決定在工業城市米蘭，舉辦以運輸為主題，涵蓋經貿交流等方面的國際博覽會，清廷接到邀請後，當即授權外務部著手操辦此事，以往中國參加各國博覽會都是委派海關總署總稅務司辦理，而此次參加1906年米蘭世博會是第一次所有事宜由外務部與國人承辦，浙江、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省的商人，分別攜帶瓷器、玉器、綢緞、繡貨等中國傳統的工藝品參賽。江蘇海門頤生釀造公司的「頤生酒」榮獲了此次米蘭博覽會的金獎。(郭慧，2006c：126) 1906年義大利米蘭世博會係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政府由外務部、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以及首次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該次米蘭世博會。

十三、小結

誠如大陸學者喬兆紅所言：從制度、社會與經濟的角度探討博覽會演進歷史，可以發現1851年英國萬國博覽會所宣示增進商貿以促進無關稅壁壘的自由貿易、追求和平、展示其國力與工業技術的三個目標，可以作為考察往後百年間各國博覽會性質的框架。(喬兆紅，2007b：31) 1912年前所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主在工業與帝國的展示，在在說明世博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促進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也就是1851年英國萬國博覽會增進商貿以促進無關稅壁壘的自由貿易，以及展示其國力與工業技術的初衷。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歐美所舉辦世界博覽會的資本主義性格，想藉由技術與商品的展示評獎，鼓勵業者之間與國際之間的競爭。

藉由世博會展場推廣宣傳國家的工業製品，以增加業者商機。最終想藉由世博會帶動產業發展，促進國家經濟成長，進而達到國力的展示。

而國力展示和文化建構與帝國認同密切關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舉辦的世界博覽會所展現的，有惡名昭彰的殖民地與人種展示。對於帝國主義而言，世博會是殖民正當化的最好藉口，歐美各國在19世紀下半葉紛紛建立起世博會制度，展示其工業文明與帝國榮光。就先前的討論，1855年法國巴黎第1屆世博會為呈顯歐洲帝國力量的擴張，會場內展示了許多各國殖民地的農產物品，說明了歐洲日常生活與殖民地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其中殖民地的人種與物資乃成為歐美博覽會展示其帝國意識無可或缺的元素。1889年法國第4屆巴黎世博會的埃菲爾鐵塔是傳世的地標性建築之外，該屆世博會有許多殖民地展示，法國政府在告訴國人有多少海外屬地，宣揚帝國教化殖民地的成就，並爭取國人對殖民政策的支持。誠如王正華博士所言：「為了全人類文明之進化，以歐美白種人為主的強國剝削弱勢民族及國家的作為，成為自然之理，無須懷疑博覽會是帝國慾望的最佳表徵，具體而微地視覺化帝國的意識形態與種族優越感。1889年巴黎博覽會中的「開羅街」(la rue du Caire)在模擬與竊佔真實之中自有法蘭西帝國對於埃及的想望，更甚者，殖民地人種的展示幾乎貫穿博覽會的歷史，殖民母國帝國權力的展現與博覽會大眾教育、文明進化等宗旨緊密疊合，難以釐清彼此的分別。」(王正華，2003：435)

一洋之隔的美國在1876年費城獨立百年博覽會，將展場劃分為拉丁區、日耳曼區、安格魯薩克遜區、美洲區以及東方區，其中黑色人種以及被殖民的原住民則被拒絕成立其專屬的展示區，而只能附屬於其殖民帝國的區域內。展示的內容安排，不管是科技或藝術，自然以殖民帝國的文明為主。(陳其澎，2005：85) 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倫布博覽會人類學展館，展示包括人體骨骼、人種學和考古三大部分的展示。其中人種學和考古兩大部分，展覽洞穴人、湖河居民和懸崖居民的發掘物和遺址模型，以及十幾個反映土著生活和習性的民俗村。人類學家咸認為這些人種展覽實際上藉科學來說明人種優劣，宣傳種族歧視，為帝國主義擴張合法化開了先河。

1904年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除深受人們的歡迎的熱狗、冰紅茶、冰淇淋首次在本屆世博會上問世之外，人類學類別的人種展示也備受爭議。美國在前幾屆世博會風土民俗村的基礎上，進一步展示從野蠻人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人類發展史，並想盡辦法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搬到世博會場地。人類學館包括了來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亞的巨人、非洲的侏儒、日本的愛奴族人、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中國勞工、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規模最大且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菲律賓風土民俗村，占地7英畝，內有人造河，沿河有百餘座茅草房屋，居住著1,100位菲律賓人，向觀眾展示獨特的生活方式。美國在1898年美西戰爭中，自西班牙贏得菲律賓等地，正式進入帝國強權的行列，領有殖民地。王正華博士指出：1904年聖路易士博覽會特別安排一區為「菲律賓保留區」(Philippine Reservation)，自當地運來上千人，包括不同的部落，將其生活全然顯露在參觀者面前，強化「白種人的優越感」及殖民的正當性。此一舉動不啻宣示美國帝國主義的新紀元，這也是聖路易籌展當局初始的計畫，在美墨、美西戰爭後，美國國勢如日中天，正可以博覽會形式慶祝的初衷。(王正華，2003：437-438) 日本學者楠元町子亦指出，舉辦1904年聖路易士博覽會是要向世人展示美國就是國家現代化的範本，目的要讓世界上發展比較遲緩的國家現代化，也要為美國殖民統治這些落後國家找到正當性，這也是「菲律賓保留區」展示的主要訴求。(楠元町子，2007a：35) 該次博覽會主辦單位想讓觀眾對最原始和最先進的人作一比較，宣傳白種人優於有色人種。這種傳達白種人優越感的人種展示，實際上是對有色人種的歧視，遭到學者嚴厲批判。

二次大戰前，比利時的1935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原本就以「殖民」(colonization)作為主題，以紀念剛果獨立50周年。但1935年3月德國違反凡爾賽條約，全面擴充軍事力量，歐洲又將爆發可預見的戰爭。一些國家呼籲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這屆世博會才將原來的主題作了調整，希望各國能將世博會作為平臺，展開技術和經濟競爭，來取代軍事競爭，實現歐洲的永久和平。(陳燮君主編，2012：100) 雖然，1935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放棄以「殖民」作為主題，為世博會的殖民展示正式畫下句點。不過在19世紀中葉西方帝國主義發展與擴張的

年代，列強在非洲展開激烈的殖民地爭奪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歐美國家常有以「殖民」為主題的專屬博覽會，最早於1886年英國舉辦的印度殖民地博覽會，後有1879~1880年的雪梨國際博覽會、1880~1881年的墨爾本國際博覽會、1883年的阿姆斯特丹殖民地與產業國際博覽會、1883~1884年的加爾各答國際博覽會、1886年的倫敦殖民地與印度博覽會、1887~1888年的伊莉莎白女王在位50年紀念國際博覽會、1888~1889年的墨爾本殖民地誕生百周年紀念國際博覽會、1906年法國的馬賽殖民地博覽會、1914年荷蘭殖民政府舉辦的爪哇殖民地博覽會、1922年法國馬賽殖民地博覽會，以及規模最大的1931年法國巴黎國際殖民地博覽會。(平野繁臣，1999：34-35；喬兆紅，2007b：31) 而日本藉由1894年甲午戰爭和1904年日俄戰爭的勝利，一躍而成為新殖民帝國，開始與西方強權分庭抗禮，此後日本所舉辦的博覽會展示內容，已不再只是局限於日本國內的產品，而開始殖民地與人種櫥窗的展示。其中，在日本國內舉辦的有1903年大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屬於本文斷代下限之後，則有1912年東京拓殖博覽會、1913年大阪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1930年名古屋拓殖博覽會、1936年樺太拓殖共進會等。主要介紹殖民地的發展與建設，讓日本國內人民深入瞭解殖民成果以彰顯帝國偉業，並將殖民統治合理化。日本在朝鮮、臺灣等地都舉辦過始政紀念博覽會，如1916年台灣的紀念始政二十週年「台灣勸業共進會」、1925年的「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及1935年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藉以弘揚日本在台灣地區的施政成果，鞏固海外殖民統治。(參見：山路勝彥，2006，2005，2004；寺下勅，2005；伊藤真実子，2014；林品章，2007，2002a，2002b；喬兆紅，2007b：32)

第三節 世界博覽會的定義與意義

有關1851年英國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的起源，是否應該追溯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或是18世紀末葉的法國？比較公認的說法，近代意義上的博覽會始於1798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工藝博覽會。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法國所舉辦的工藝博覽會，

已經可以看到近代博覽會：(1)藉由展示評獎，鼓勵業者之間的競爭；(2)藉由展覽推廣宣傳工業製品，增加業者商機；(3)藉由展覽帶動產業發展，促進國家經濟成長的屬性與意義。喬兆紅、羅靖等多位學者專家指出，近代意義的世界博覽會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後出現的文明產物，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在全球化意識的推動之下出現的人類文明大集合。(羅靖，2011:153)

由於工業革命使得資本主義快速發展，19世紀中葉工業化領先國家必須面對找尋海外市場的課題。當時正處於工業革命鼎盛時期的英國，為宣揚國威與持續產業發展，在1851年倫敦舉辦了BIE追認的全球第一屆世博會「萬國工業博覽會」，呂紹理教授對本屆世博會的歷史意義，有過三點評論。首先，這場史上第一次的世博會在結束後，為英國留下不少遺產，水晶宮重新組建於倫敦南邊的西德納姆，並為工業革命過程中人類的鋼鐵、玻璃與建築等技術完美組合留下見證。其次，成功的營運創造18.6萬英鎊盈餘，並利用這筆款項在南肯辛頓建造「自然史博物館」和「維多利亞女王與亞伯特親王紀念博物館」，亦為博覽會與博物館的緊密結合埋下種子。Steven Conn指出博覽會與博物館在反映西方人征服的結果與展示人類最前瞻知識的功能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博物館可說是長時間展出的博覽會，博覽會則是短時間展出的博物館。(Steven Conn著，王宇田譯，2012)最後，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純粹以觀覽為目的，背後隱含「教育民眾」的意義，亦即透過展示讓觀眾認識並理解近代機械工業的技術與知識，以及背後所蘊含的知識分類概念。

在象徵意義的層次上，維多利亞女王在開幕致辭中點出世博會的價值：(1)祈求各國間的和平與友善的競爭，(2)追求工業文明所帶來的「進步主義」，(3)實現當時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促進國際貿易發展。(呂紹理，2005：54-55)美國加州大學Jeffrey A. Auerbach教授與夏威夷大學Peter H. Hoffenberg教授在合著的《在1851年大博覽會的大英帝國與世界》一書，更點出1851年英國的萬國工業博覽會反映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以及投射更寬廣的歷史發展趨勢，尤具深意。(Auerbach and Hoffenberg，2008：ix)

一、世界博覽會的定義

就前兩節有關世界博覽會發展的討論，世博會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商人定期的市集，其差異在於市集在傳統上偏重於交易的集會，而博覽會則在形式上帶有廣告展示的性質。博覽會舉行日期的間隔通常較市集為久，或者是僅在某些特定場合才舉行，且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向商人及有興趣的觀眾介紹各種新的技術與工業上的發展，以及展示各項藝術品。所以說博覽會並不是作為商業交易的地點與場合，而是提供展示一個國家工業產品與技藝的機會。而近代意義上的博覽會始於1798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工藝博覽會是比較合理的說法。更重要的是該時期法國所舉辦的工藝博覽會，已經可以看到近代博覽會的屬性與意義。大陸研究博覽會史的馬敏教授就歐美的世博會發展史來看，博覽會涵義有三：展覽觀摩、獎勵比賽及推廣銷路。概括而言，博覽會是品類繁複的展覽會、勸業會、勸工會、工藝會、農產會、漁業會、博覽會等的統稱，雖兼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但又偏重於社會經濟方面；雖強調出品展陳，但也兼及部分銷售，所以確切地講，應稱為「商品賽會」。(馬敏，1988：115) 而日本博覽會研究的專家吉見俊哉教授則從社會文化研究的角度的角度來看，19世紀到21世紀的世博會，其實就是融合了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大眾娛樂三個要素。世博會既是帝國主義宣傳的機制，同時也是不停誘惑消費者進入商品世界的廣告機制。(吉見俊哉，1992：22；蘇碩斌等譯，2010：21)

至於19世紀歐美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所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在西方的用法，如英國學者Paul Greenhalgh所說的，「世界博覽會」一詞英國稱Great Exhibition，法國稱Exposition Universalle，美國稱World Fair，(Greenhalgh，1988：2)日本則稱之為「萬國博覽會」。呂紹理教授在《展示台灣》書中對「博覽會」一詞做了整理，在西方世界的語意中共有Exhibition、Exposition和Fair三個單字。依據《牛津字典》，Exhibition意指收集各類物品以公開展示，為了廣告促銷而陳列商工貨品，以公開展示動植物及花卉優劣的各種農畜產競賽等，英國較慣用此字指稱博覽會；Exposition則指一切物品的展示，法國的博覽會偏好此字；Fair除了指傳統定期市

集、商店街、回教國家的市集(Bazaar)外，大型商工展示活動也往往稱之為Fair，美國舉辦的博覽會則較常用此字。(呂紹理，2005：27-28) 而中國在滿清時期與民國初年稱為展覽會、陳列會、勸業會、獎進會、勸工會、物產會等，一般通稱為「賽會」，日本則比較一致採用「博覽會」的譯名。至於日本政府最早接觸世博會是1862年遣歐使節團，應邀出席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典禮。(湯本豪一，1996：8-9) 隨團的福澤諭吉回國後，將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並作引介，於1866年出版《西洋事情》廣為宣導，「博覽會是指每隔數年，會在西洋大都會舉辦物產大會，號召世界各國徵集名產、便利器械、古物珍品，以展示給萬人觀覽，稱之為博覽會。...有教學相長之用意，可比喻為『智力功夫的交易』大會。」(福澤諭吉，2002：49-50)

世界博覽會發起於1851年英國倫敦，再流傳至法國巴黎，19世紀於歐洲蓬勃發展。20世紀已擴及至以美國與加拿大為中心的北美洲。20世紀博覽會所呈現的已不再侷限於巴黎世博會所構想的地中海區域，而是以大西洋為舞台，於歐洲與美國發揚光大。由於各國競相舉辦世博會，為維護世博會的市場秩序避免客源分散，1928年的11月由31個國家代表在巴黎開會簽訂《國際展覽公約》，規定世博會的分類、舉辦週期、主辦者和參展者的權利義務、國際展覽局(BIE)的權責與設置等等。國際展覽局總部設在巴黎，成員為各締約國政府、聯合國會員國、非聯合國會員身份的國際法庭章程會員國、聯合國各專業機構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會員國都可申請加入，目前有169個會員國。依據BIE的定義，世界博覽會是以教育大眾、分享創新、加速發展及促進合作的全球性活動(global event)。主辦國邀請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民間企業，公民社會、一般大眾參與這個全球性活動。由於參與者的多樣性，世博會滿足從領袖菁英到市井小民、從銀髮高齡到青年兒少的需求，規劃舉辦讓人驚奇的展覽會之外，同時進行各國在外交的較勁，企業家們的商務會議，學者專家的公開研討等等活動。而世博會可分成4個類別：(1)註冊類(綜合型)的世博會(World Expos)、(2)核可類(專業型)博覽會(International Specialized Expos)、(3)國際園藝博覽會(Horticultural Exhibitions)及(4)三年一次的米

蘭設計博覽會(Design Triennale of Milan)。註冊型世博會展期三到六個月，面積百公頃左右，每五年一個，且會員國得自己建館參展，如筆者親身參訪考察過的1992年的西班牙塞維亞世博會、2000年的德國漢諾威世博會、2005年的日本愛知萬博及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核可型博覽會的展期三個月以內，面積25公頃以下，主辦國自己建展館提供會員國租用參展，例如1985年的日本筑波國際科學技術博覽會、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及1998年的葡萄牙里斯本世界海洋博覽會。(參見：BIE官網；Galopin，2005：8-38)

除了前述經由BIE成立之後追認的，以及後來註冊與核可的世博會之外，還有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ducers)所核定舉辦的國際園藝博覽會，該組織宗旨在協調花卉園藝行銷、展示及生產，目前有25個國家，33個會員參與，於每年春、秋兩季召開年會，以促進國際性園藝產業健全發展為目標。我國亦由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於2004年間加入成為會員，目前世界各主要生產國都積極爭取辦理AIPH認證之花卉博覽會，例如筆者親身參訪考察過的1990年日本大阪花與綠博覽會、1999年中國昆明國際園藝博覽會、2000年日本淡路花博、2004年日本濱名湖國際園藝博覽會、2010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以及2006年中國瀋陽世界園藝博覽會、2011年中國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2014年中國青島世界園藝博覽會。

世界各國透過BIE及AIPH兩個國際博覽會系統申請舉辦世博會之外，也可以憑藉自身的力量舉辦國家級與地方性博覽會。熱衷舉辦博覽會的日本，除1970年起舉辦過多次BIE及AIPH認可的世博會之外，亦曾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舉辦過許多國家級的都市型國際博覽會，例如1989年的一年裡就有福岡亞洲太平洋博覽會、橫濱YES博覽會及名古屋世界設計博覽會，其規模與BIE核可的世博會不相上下。1991年11月參訪過「日本橫濱國際博覽會」(YES'89)會場，該博覽會在紀念橫濱市政100周年與開港130周年，以及為了在邁向21世紀之際，以嶄新的觀點發展橫濱成為國際文化都市，掌握國際交流推動的契機。因此推動「21世紀未來港都(MM21)計畫」，開發新橫濱副都心地區，均衡地區發展，促銷填海造地的新生地，藉由舉

辦博覽會的方式，吸引民眾到此參訪，重新認識橫濱，給予新的評價，於1985年開始籌備博覽會。在1989年3月25日至10月1日盛大舉辦，共展出215天，計有1,333萬餘參觀人次，展出主題為「宇宙與兒童」。橫濱博覽會結束後，大多數展館拆除，只剩下當時的橫濱館及橫濱美術館，拆除展館的基地在住宅都市整備公園的努力下，已陸續依MM21計畫完成興建地標大廈、國際旅館、三菱重工大樓等建設工作，成功的發展橫濱副都心。(林劍秋，2005) 同年，名古屋市政府為紀念實施市制百周年，提升設計意識，以及推動名古屋市白鳥地區都市更新，在1989年7月15日至11月26日，計135天，由於場地面積限制，將會場分為主會場(白鳥會場)與輔助會場(名古屋城與名古屋港兩個會場)，舉辦名古屋世界設計博覽會，計有1,518萬餘參觀人次。名古屋設計博覽會會後，主會場的白鳥會場除主題館保留外，其餘展館全數拆除，而原場地則供作發展成世貿中心的基地。其中保留下來的主題館移做國際會議中心設施，原拆除之廣場區則興建三棟會議及展示大樓，而原日本庭園及親水區則保留作為世貿中心之文化休閒設施。名古屋港會場之展館全數拆除，已開發成海洋水族館及港灣公園，供市民休閒娛樂運用。至於名古屋城會場之展館亦全數拆除，而整建後之名古屋城仍為重要之觀光據點，更是市民休閒娛樂之公園綠地。至於名古屋設計博覽會的效益：第一，促成民眾對設計的認識與設計意識的提升。第二，帶給名古屋市實施都市計畫的動機與機會，有效地改善市容。第三，大大提升名古屋市在國內外的知名度。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振興了區域經濟。就主辦單位調查結果，推算出名古屋設計博覽會支出所誘發的生產金額為9,945億日圓，是為當初投資及會場消費金額3,098億日圓的3.2倍，所增加的就業人數則有63,000人之譜，而在稅收方面，愛知縣則增加109億日圓的地方稅收。(參見：電通，1990；林劍秋，1997b：11-45)

至於地方性的博覽會，可以日本政府通商產業省(相當我國政府之經濟部)於1988年為振興地方產業發展與國際交流所建立的「特定博覽會(Japan Expo)制度」為例。1992年開辦至今所舉辦的日本特定博覽會，計有1992年的富山縣博覽會與岩手縣海陸博覽會、1993年的長野縣信州博覽會、1994年的和歌山縣世界休閒博

覽會與1994年的三重縣世界慶典博覽會、1996年的佐賀縣焱博覽會、1997年有宮城縣的國際交流博覽會與鳥取縣的山陰夢港博覽會、1999年的和歌山縣熊野體驗博覽會、2001年有福島縣美麗福島的未來博覽會、山口縣21世紀未來博及福岡縣北九州博覽祭。(林劍秋，1997c：8-10)

作者曾參訪過1993年的長野縣信州博覽會、1994年的和歌山縣世界休閒博覽會與1994年的三重縣世界慶典博覽會、1997年鳥取縣的山陰夢港博覽會，其中山陰夢港博覽會是結合境港促進輸入地區(FAZ)計畫的博覽會，而境港FAZ計畫是根據「促進輸入及對內投資事業順利進行的臨時措施辦法」，為使輸入事業順利進行，結合港口(境港)、機場(米子機場)及其周圍地區(竹內工業區)完備其設施，經中央政府認定而設置「促進輸入地區」的區域開發計畫。山陰夢港博覽會在展示期間的「鳥取縣館・鄉鎮市館」以及「主題館」為永久展館，會後作為1995年中央政府核定之FAZ計畫核心設施中的國際交流設與施貿易支援設施「夢港塔」，以及物流支援設施的「冷藏倉庫」、「普通倉庫」及「流通業加工設施」來運用。(參見：山陰中央新聞社，1997；林劍秋，1997b：46-49)

無論所舉辦的博覽會是BIE所定義的註冊型與核可型的世博會，AIPH國際博覽會系統申請舉辦的世博會，或是憑藉自身力量舉辦的國家級與地方性博覽會。不同等級的世博會都是由主辦國邀集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民間企業，公民社會、一般大眾出錢出力，完備會場展館與周邊基礎設施的建設，共同展示人類藝術、科技和產業發展成就的全球性展會活動。以達到振興產業、開發科技園區、進行都市更新、均衡區域發展、加速國家發展、宣揚國威提升國際地位等發展目標。世界博覽會可說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更是「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本論文所指的「世界博覽會」係指BIE的世博會與AIPH的國際園藝博覽會等級的博覽會，以及包含可視為主辦這兩類世博會暖身的國家級博覽會。

二、世界博覽會的意義

英國1851年舉辦過足以向世人誇躍維多利亞繁華盛世的世博會之後，法國也不

甘示弱於1855年舉辦了第一屆巴黎世博會，英國為重拾水晶宮博覽會華美燦爛的光彩，還法國以顏色，於1862年在倫敦舉辦了第二次世博會，法國則回敬舉辦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博會。英國受到1862年世博會的挫折之後，於1871至1874年間別開生面地連續四年舉辦倫敦世博會。位於中歐的奧匈帝國也不甘坐壁上觀，於1873年於維也納舉辦了奧國在19世紀第一場也是僅有的一場萬國博覽會。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國經歷1853年紐約世博會慘痛的失敗教訓之後，1876年為慶祝獨立百周年在費城舉辦了南北戰爭以後的第一場世博會，在世博會史上異軍突起，自此英、法、美三國相繼舉辦世博會相互競爭。(呂紹理，2005：56-57) 這些歐美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所舉辦的世博會，各有其創新之處，不僅成為世博會歷史上的典範，也成為日後各國仿效的範本之外，其中隱含著幾個舉辦世博會的意義：(1)是宣揚帝國主義殖民正當性的手段，(2)是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3)是國家現代化的一面鏡子。

(一) 世博會是宣揚帝國主義殖民正當性的手段

中國大陸研究博覽會專家喬兆紅博士指出：1851年處於工業革命全盛時期的英國在倫敦舉辦「萬國工業博覽會」，目的就是為了向世界展示其強大國力，目標在於宣揚國威與展示工業技術，增進商貿以促進無關稅障礙的自由貿易與追求和平。但隨著科技快速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博覽會日益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拓展海外市場與擷取海外資源，進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為此，世博會的價值觀也發生了嚴重變化，成為帝國主義殖民合理化的最好障眼法。在19世紀下半葉歐美各國繼英國之後登上世博會舞臺，展示其帝國主義殖民成果，爭奪文明先進國家的霸主地位。(喬兆紅，2010) 對此，《博覽會的政治學》作者吉見俊哉教授在第5章〈帝國主義的祭典〉也有精彩的描述：「博覽會的時代，同時也是帝國主義的時代，這絕非偶然。19世紀中葉開始至20世紀初為止，規模廣及全地球並持續擴張的資本主義場景中，最醒目的無疑就是博覽會這個帝國主義的巨大表演設施。博覽會使科技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也就是帝國的擴張，全部合

為一體，並將大眾的欲望吸納其中。這種博覽會與帝國主義的結合，早在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就已顯露。倫敦萬博開辦之初，主辦單位最先動手準備的，就是將大英帝國殖民地或自治領地（包括東印度、錫蘭、馬爾他、非洲西海岸、好望角、加拿大、英屬蓋亞那、百慕達群島、澳洲、紐西蘭等）所有參展物品統整為帝國的展示。實際上，許多英國人也是那時才發現他們的『帝國』原來還擁有遠及大西洋的馬爾他、福克蘭、黃金海岸等地方。大英帝國的『豐饒』與英國國民的『優越感』，透過殖民地的展示而獲得『確證』。（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178）

世博會的殖民地展示開始帶有意識形態傾向，應該是1855年第一屆巴黎世博會之後的事。法國在1855年舉辦第一屆巴黎世博會的時候，擁有海外殖民地的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國家，都把殖民地的產品拿出來展示。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博會，殖民地展示的規模更大，展示的規劃也更加細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889年第三屆巴黎世博會，殖民地展示在這次的世博會中有了決定性的發展。在塞納河岸入口附近就建有法國最重要的兩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的展覽館，濃縮了法國人對殖民地異國風情的印象。例如阿爾及利亞館和突尼西亞館集結各種伊斯蘭風格，並醞釀出地中海風情。殖民地展示中，意義最重要的是塞內加爾、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法屬西印度群島、爪哇島等地的原住民聚落。這裡展示的是博覽會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一個傳統，也就是「人種展示」，是將殖民地的原住民帶到博覽會場，將他們放置在柵欄圍的模擬殖民地聚落中，展示他們的生活，供遊客觀覽，這也就是19世紀末的社會進化論與種族歧視最直接了當的展示類型。此時在巴黎世博會登場的殖民地聚落，一是展示的數量已不只是少數幾個人，而是將數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社會群體，連同他們的居住環境一併移植到會場；二是展示的組織化與展演的安排，已是一種人類學知識的運作，將非西歐世界插補到社會進化論的階梯當中；三是這種「未開化社會」奇觀的展示是由國家本身負責，與過去民間奇風異俗的表演在本質上完全迥異。在造訪1889年巴黎世博會的龐大人潮面前，前方聳立著艾菲爾鐵塔展現鋼鐵與電力所創造的「文明」，鐵塔

底下則是大批馴養在殖民地聚落裡的「未開化」世界。在某種意義下形塑了一種由「未開化」走向「文明」的社會進化論式金字塔空間。之後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會、20世紀初美國的幾屆世博會，以及大約同時期的歐洲博覽會，乃至日本的國家博覽會中都可以看到。(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179-184)

Robert Rydell曾評論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明顯展現帝國主義與種族歧視，並開始廣為滲透到同時代美國人的意識之中。(Rydell, 1984) 芝加哥世博會的12個大分類展示中的人類學與考古學，是從人體骨骼學的角度來追溯史前到現在的人類發展史。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展示在人種學和考古兩大部分展覽的洞穴人、湖河居民和懸崖居民的發掘物和遺址模型，以及十幾個反映土著生活和習性的民俗村。人類學家認為這些人種展覽實際上藉科學來說明人種優劣，宣傳種族歧視，為帝國主義擴張合法化開了先河。(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136-142；Findling, 1990：123-124) 芝加哥世博會第二會場，亦即以娛樂設施為主的中途遊樂場(the midway plaisance)，這一遊樂場成為世博史上最成功最出名的娛樂區。除了為後來大規模的娛樂園區奠下基礎之外，人們可以在中途遊樂場觀覽異國情調的展示，如德國啤酒屋、土耳其市集、埃及街道、原始的爪哇村等。主辦單位想出了讓中途遊樂場扮演人類學教化的角色，也就是以人類學來包裝大眾娛樂。由該展示部門的負責人Frederick W. Putnam在此搭建「民族學式的聚落」，入場的觀眾依循著「進化」的順序逐步觀賞，也就是先從西端的「未開化」聚落及現場展示的「未開化人種」的達荷美聚落開始，接下來參觀接近「半文明」的亞洲聚落，之後再看到歐洲的「文明」聚落。由西向東穿過中途街樂園到達白城的路程，被認為是從黑暗世界走向光明世界的進步歷史。(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190-191)

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的民族學式展示與社會進化意識形態，成為之後美國舉辦諸多博覽會的範本。接下來的1901年水牛城博覽會、1904年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對剛剛在美國與西班牙戰爭中獲勝，且併吞菲律賓與夏威夷，變身成為「帝國」的美國來說，是更能讓廣大美國人民分享這種「帝國意識」的意識形態

博覽會。水牛城博覽會也在中途遊樂場建造了菲律賓人聚落和非洲人聚落，也有美國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展示，還有古巴人、愛斯基摩人、夏威夷人及日本愛奴人聚落。不斷將這種娛樂連結到社會進化論的方向，亦即透過「實物」的人種展示，再次確認美國人勝過有色人種的「優越性」。1904年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的「人種展示」，規模大舉超越之前所有博覽會。透過這種壓制性展示，塑造一種未開化與低度文明的民族還不具備治理自己國家能力而加以殖民統治正當化的意識形態，讓帝國主義隱藏於目眩神迷的嘉年華氣氛之中，人們也被誘惑進入這個帝國財富堆砌的烏托邦。(參見：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192-198) 誠如日本愛知淑德大學楠元町子教授所言：「世界博覽會把來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加以展示，將文明加以排序，並將西歐文明就等於現代化的思想散播出去，更透過這種視覺裝置，向人們展示帝國主義對亞非洲落後國家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楠元町子，2007a：36) 也就是說舉辦博覽會讓歐美民族的優越性獲得確認，也讓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取得正當性。

(二)舉辦世博會是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

有關舉辦世博會促進經濟發展的論文不算少，本章第一節世界博覽會源起的討論中，具有近代意義博覽會的1798年在法國巴黎舉辦工藝博覽會，就可以看到藉由展示評獎，鼓勵業者之間的競爭；藉由展覽推廣宣傳工業製品，增加業者商機；藉由展覽帶動產業發展，促進國家經濟成長的政策工具意義。誠如 Jeffrey Auerbach 所言：早期博覽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商務的活動，它展示引介新原物料促進生產，進而擴大貿易活絡市場。(Auerbach，1999：98)

BIE 認可的第一屆世博會(1851年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除維多利亞女王在開幕致辭中宣示的祈求各國間的和平與友善的競爭，與追求工業文明所帶來的「進步主義」之外，重要的是企圖打破各國關稅壁壘，實現當時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促進國際貿易發展。後來在19世紀跟進的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甚至東亞的日本所舉辦博覽會都有著濃濃「厚植產業發展，帶動經濟持續成長」的政策工具味道，就像 B. Faulkner 和 G. Jeong 評估 1993 年韓國大田的世博會，就發現增加了工

作就業的機會，增加消費信心的經濟效益。(轉引自謝飛帆，1999：29)

進入 21 世紀，上述厚植產業帶動經濟成長的政策工具，依然深刻影響各國，例如德國在 2000 年舉辦漢諾威世博會時，直接支出為 102 億馬克，促成當年德國 GDP 效應為 170 億馬克，給漢諾威市政府帶來了 20 億馬克的財政稅收。(喬兆洪，2008c：9) 此外，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對上海世博會直接經濟影響和間接經濟影響的估算，世博會對上海經濟的總效應是增加 GDP 在 2,197 億元與 2,327 億元人民幣之間，世博會對當地經濟的拉動作用比北京奧運會更為顯著。(張世賢、馬莉，2004：22)

若就以上的討論，歐美國家與日本如何利用舉辦世博會成功提升經濟力量的經驗來看，中國在 2010 年的上海舉辦世博會，主要在吸引全世界注意力與加速經濟發展，是一種後進國家基於加速經濟發展與國家發展的政策性考量，可由底下幾位上海世博關鍵人物的講話得到支持，中共前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早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也形容奧運和世博會是當代國際兩大經濟加速器。(呂瑋宗，2002) 上海世博會申辦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儀國務委員曾這樣形容，北京申辦奧運會已經成功，如果上海申辦世博會成功，將成為中國 21 世紀初發展的雙引擎。(胡志剛，2002)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世博會執委會副主任萬季飛指出，上海世博會的建設有利於上海市的城市改造，也有利於上海市的產業結構調整。上海世博園區建設的資金也是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需要的一個重要舉措。上海世博園的建設也再次振興上海的經濟，拉動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在全國產生效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表示，上海舉辦世博會，就像裝上了一個加速器，一個輻射源，不僅中國、上海也受益，它既對舉辦國經濟實力和舉辦能力的考驗，同時也給舉辦國經濟帶來極大的推動作用。(劉鑫炎，2009) 上海世博會總規劃師吳志強(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說道：「世博會和奧運都是全球盛事，能為主辦國家帶來驚人商機，同樣是國際舞臺上會生金蛋的雞，早在 1900 年法國巴黎便同時舉辦世博會和奧運，而在 60 年代初，日本和南韓都參透個中玄機，在短時間內同時申辦奧運和世博會，為本土經濟打響了『經濟雙響炮』，帶來

振興本土經濟和國力的『黃金十年』。」(呂瑋宗，2002)

有關舉辦世博會是為了都市更新與區域發展的部分，奧地利政府在 1873 年舉辦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除了紀念奧皇約瑟夫一世執政 25 週年之外，要把首都維也納推進世界先進都會之列。為此，維也納城市中世紀修築的城牆被拆除，護城河以及內城的防禦工事也被打通，與發展中的城市郊區連成一體。同時修建寬闊的道路和新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和新古典風格的宏偉大樓，另將多瑙河改道解決數百年來常常水災的多瑙河沿岸低窪地區等諸多都市化工程。在東亞的日本政府也曾經利用舉辦 1985 年日本筑波國際科學技術博覽會來提高筑波研究學園的知名度，並完備展示周邊基礎建設，如土地/建築物整建、地下管線鋪設、交通（鐵公路的建造）、公園綠地及住宅學校等的興建等，其他還包括租稅優惠、低利融資、及其他福利設施等，吸引民間企業投資或遷入，以達成都市更新、繁榮新市鎮的目的。1992 年西班牙舉辦塞維亞世博會是希望投入大量金錢與資源來消除西班牙各自治區的發展不均，為此中央政府在相距五百公里的塞維亞與馬德里之間興建高速鐵路，而博覽會會後是希望發展成科技研究園區，以優良的基礎建設以及吸引人的土地價格，誘導國內外廠商之科技研發部門進駐博覽會原會場，開發塞維亞市成為南歐的科技重鎮之一。同樣的 1993 年韓國大田世界博覽會的目的，在發展大田市成為科學園區。

有關舉辦世博會是為了落實國家外交政策的部分，法國在 1855 年舉辦第一屆巴黎世博會，就是 1851 年 12 月政變上臺的拿破崙三世想抓住這一機會，向國際社會展示法國實力與宣傳僅次於英國倫敦的巴黎城市魅力，被認為是成功激勵國際合作和發展的一次世界博覽會。(Findling, 1990: 17) 奧地利在 1873 年維也納舉辦的世界博覽會，除了紀念奧皇約瑟夫一世執政 25 週年之外，恢復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失利後的國際威信，要把首都維也納推進世界先進都會之列。法國政府在 1878 年想舉辦第三屆巴黎世博會，向法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法蘭西已從令法國人顏面盡失的普法戰爭失敗陰影中走出來，繼續承擔法國在人類文化的領頭羊角色。

日本政府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透過參加 1939 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與舊金山金門大橋國際博覽會，改善日本的負面國際形象。(山本佐惠，2012)堀田綾子在《1910 年日英博覽會》一書指出：從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及 1905 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崛起引起歐洲列強的不安。更在 1910 年 8 月日本吞併朝鮮，引起歐美列強更大的疑慮，日本的國際形象更加惡化。於是日本選擇在 1910 年的倫敦舉辦日英博覽會，期求淡化國際媒體對於日本吞併朝鮮的關注，以及增加歐洲對於日本的認識，俾改善日本的國際形象，鞏固英日同盟關係。(Hotta-Lister，1999)

同樣的，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快速增長，軍事力的加強與國際政治影響力日益擴大，帶給西方先進工業國家一種潛在的不安感覺，擔心一個有數千年歷史且曾領先世界的非西方大國刻正現代化，即將追平甚至超越世界領先國家。許多西方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中國是個不滿現狀的新興強國，意圖運用手段恢復中華文明榮光，重建國際秩序。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引起西方國家的關切，而「中國威脅論」進而喧囂塵上，中國亟需解決塑造和改善國際形象的重大課題。為了淡化各國所擔心的「中國威脅」論，舉辦上海世博會是在更廣泛的層面讓世界來認知中國，中國和世界人民一樣，是熱愛和平，擁護和平，中國人民願意和世界人民一起思索人類社會發展遭遇的共同難題，並齊心協力破解這樣的難題。通過這樣的大展示、大交流，樹立中國和平崛起，要做一個理性大國、責任大國、平衡大國的形象。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之第 44 章「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列有「擴大國際文化交流，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辦好上海世博會。」

不僅如此，中國高層與上海市領導都有著同調的說法：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申辦上海世博信函中道：「擁有近 13 億人口和悠久文明、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非常熱切地盼望著能夠舉辦一屆世界博覽會，加強各國、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胡志剛，2002) 為了樹立友善大國形象，以及鼓勵更多國家與國際組織來參加上海世博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前來參展，中國大陸於 2002 年 7 月的 BIE 第 131 全體大會上宣佈：中國願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總額一億美元的參展優

惠。2005年12月，國際展覽局第138次大會上一致通過上海世博會《註冊報告》，再次對一億美元參展援助基金作了承諾。參展援助計畫的實施有助於鞏固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進一步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Huang, 2007: 81-82) 準此而論，法國、奧地利、日本與中國的舉辦世博會，在塑造和改善國際形象的国际外交考量，比較像是把舉辦世博會當成國家發展的政策工具。

雖然吉見俊哉教授在《萬國博覽會幻想》針對1970年大阪萬博、1975年沖繩世界海洋博覽會、1985年筑波世界博覽會、2005年愛知萬博等日本舉辦的幾次世博會，運用世博會滿足民眾追求富裕與政府加速國家發展的迷思做了反省。(吉見俊哉, 2005) 就歐美與中日韓等國家所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經驗，世博會在展示人類藝術、科技和產業發展成就的國際性展會活動，目的在達到振興產業、開發科技園區、進行都市更新、均衡區域發展等國家發展目標。世博會除了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之外，更是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是帶動地區發展的一個重要施政作為。

(三)世界博覽會是國家現代化的一面鏡子

趙致真在《造物記：世博會的科學傳奇》一書指出，我們可以從世博會的歷史看見人類的科技簡史與近代文明史。(趙致真, 2010) 那世界博覽會對國家現代化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Gavin Weightman在《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一書，點出第一屆世界博覽會的英國萬國工業大博覽會「水晶宮」展館，代表了19世紀上半工程學和製造業的顛峰成就，參觀「大博覽會」的人也都能夠認知英國是當時世界第一的工業國家。(Gavin Weightman著，賈士蘅譯，2013:211-212) 範虹在〈大博覽會與小博覽會：於維多利亞王朝倫敦呈現的中國展品〉一文，亦指出「英國藉由萬國工業大博覽會的和平、進步及繁榮昌盛的主題，證明自己不只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與世界工廠，也是世界上最先進和強大的國家。」(HAN, 2007: 204) 以上的看法，隱約的可以看出透過世界博覽會，可以窺探一個國家發展的程度。Anne Lincoln Fitzpatrick在探討俄國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夏諾夫哥羅德市(現在的高爾基市)展覽會的著書，開宗明義地說出研究俄國夏諾夫哥羅德展覽會可以看見19世紀俄國的落後，展覽會可以用來檢視當時俄國在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

(Fitzpatrick, 1990: 11)另陶德民、朱蔭貴、馬學新、木村昌人合編《世博會與東亞的參與》，集結中日兩國學者有關世博會研究的論文集，從世界的1851年的倫敦世博會、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到1933年芝加哥世博會、1970年大阪世博會，從中國的1910年南洋勸業會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歷史，看見中國的發展及東亞的變遷，以及兩國現代化經驗。(陶德民等合編，2012)大陸暨南大學的羅靖副教授亦指出，近百年的中國博覽會事業的曲折發展，反映了中國國際化和近代化的艱難歷程。(羅靖，2011:153)

誠如北京大學吳靖教授在〈現代性的神聖儀式：世界博覽會與國家競爭〉一文，試圖在世界博覽會作為現代性文化制度的各種形態與功能基礎上，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和日本如何被世博會的魅力所俘獲，以及如何利用世博會表達與推動對現代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博覽會的歷史就是現代性文化的敘事史。我們可以從世博會的轉型來管窺現代生活、制度和文化形態的變遷。世界博覽會從四個方面編織了現代性的複雜歷程和形態。(吳靖，2012：213-221)首先，世界博覽會既是各國工業進步和博物學知識的展示，也是帝國主義全球體系的宣傳場所。從第一屆博覽會由玻璃和鋼鐵所構成的「水晶宮」開始，每屆世博會都競相展示最新的工業成果和科技發展，並以藝術、建築與奇觀等形式來加以展示。除了各自的藝術、文化與工業成果以外，還包括各自帝國殖民和海外征服成就的誇耀。博覽會所展示的圖像，實際上是對帝國秩序與帝國景觀的描繪與宣傳。

從第一屆世博會開始，這種對全球秩序的等級化展示與觀看體系就已經存在。水晶宮博覽會將英國置於由工業化和自由貿易全球體系的中心，在展示不同社會與文化的成就的同時，還以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眼光來排列、品評和推斷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其中流露出日不落國的優越感。(Young, 2008：5-6)世界博覽會的第二個文化功能是通過商品和消費的展演，灌輸民眾現代消費社會的倫理和常識。Walter Benjamin有過這樣的評論，「世界博覽會是商品拜物教的聖地，博覽會本來就為商品流通而設立，加上科技和藝術的推波助瀾，商品戴上評比後的王冠，煥發著誘人的光彩。博覽會造成了一個讓商品的使用價值退到幕後的結構，

並推廣了大量消費的商品世界，一種資本主義的文化幻境。

博覽會商品展示的機制與百貨公司、廣告、都市空間的再造等其他消費文化的制度性裝置，相互滲透連結，使得在展示活動中發展出來的各種商品行銷手段進入日常生活的空間，編織成無所不在的商品與消費世界，壟斷了人們對現代性的體驗。」(轉引自吳靖，2012：215) Robert W. Rydell認為博覽會是19世紀中產階級所建立的一套價值觀與文化霸權的展現，是對中下層民眾進行的文化改造，由此動員人們參與建構現代國家的工程。(Rydell，1984) 英國學者Tony Bennett指出，博覽會的展覽機制與大革命之後歐洲出現的各種公共教育設施，如博物館、圖書館等有密切的關聯性。(Bennett，1995：89) 例如史上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在結束後，英國將主展館「水晶宮」重新組建於倫敦南邊的西德納姆，也運用18.6萬英鎊的盈餘，在南肯辛頓建造「自然史博物館」和「維多利亞女王與亞伯特親王紀念博物館，繼續執行各式展示教化的任務。

三、小結

既然世界博覽會可以被看做是現代文化的編織、展演與表述的重要平臺，而它又在特定的時空中凝結了現代文化制度的各種表現方式，以博覽會為媒介去探詢和比較兩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思考與文化建構的軌跡，就成為一項有意義的課題。吉見俊哉教授在《博覽會的政治學》一書，既非討論博覽會的歷史，也非博覽會的魅力，所關注的是博覽會就像一面「鏡子」。吉見教授努力捕捉這面鏡子映照出來的種種圖像，就是想要在日常世界結構空間的層次上，揭露一種貫穿所謂「現代」這個時代的力量。(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271-272) 筆者以為世界博覽會除了是展示人類藝術、科技和產業發展成就的國際性展會活動，目的在喚起大眾關注，以達到振興產業、開發科技園區、進行都市更新與均衡區域發展，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與「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之外，也會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有鑒於此，筆者試著從可做中日現代化一個面向的世博會事業發展，針對兩國幾乎同時接觸世博會，卻在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出現30到

40年時間差的案例，進行綜合觀點的研究分析，進而多方比較中日現代化發展差異，以架構起解釋兩國現代化成敗的綜合觀點。



第三章 中日兩國參與世界博覽會情形

早在西元前11世紀，中國的《周易》書中就有記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種市場的雛形可以說是一種以交換為目的之流動展覽。到秦漢時就逐漸轉變成「市」和「肆」，到了唐末的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已十分繁榮，不僅固定的「市」發展壯大，而且出現了許多不定期的「市」，在北方稱為「集」，在南方稱為「墟」，其中貨物的展覽十分簡陋，與地攤無異，也有專門的「市」，如蠶市、豆市、棉市，專門展覽交易某一種物產。此時，也興起各種廟會，雖然帶有較強的宗教色彩和娛樂意味，但集市中還是有商品交易會，一般以一週至一月為期，各地商賈雲集，展覽銷售商品，這與現在以推銷商品服務的展銷會已十分相似。(參見羅靖，2009b：25-26) 上海師範大學曹建南教授更點出，唐玄宗時代開始就有舉辦過「擬似博覽會」的活動。(曹建南，2015：711-712) 據《舊唐書》卷一百五、列傳第五十五〈韋堅傳〉上的記載，唐玄宗的臣子韋堅，時任陝郡(今河南三門峽)太守兼領水路轉運使，在他興建的長安東郊廣運潭(南方租賦漕運總碼頭)落成後，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漕運展覽會，共有二三百船隻參加，船上載著江南的金銀鉅錫、綾羅綢緞、瓷器酒具、名酒茶葉、文房四寶、名貴藥材列隊展演，顯示唐代商貿和水運的發達暢通之外，也意涵著太守施政成果的展示，以及文明教化、產業振興、區域發展等「擬似博覽會」的活動。韋堅還特意為到場觀禮的唐玄宗安排了歌舞節目，一百多人齊聲唱道：「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裡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玄宗的乳名)當殿坐，看唱得寶歌⁴。」唐玄宗聽到「三郎」出現在歌詞中，龍顏大悅，認為韋堅能幹，立即加官晉爵委以重任。(參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2000：2184-2185)

另於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史學界曾認為中國人第一次參加世博會是在1855

⁴ 「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是指唐玄宗在弘農得寶符的大喜事，得到的寶貝可不止是寶符，廣運潭運來的銅器等貨物不也是寶物嗎？唐玄宗(三郎)既然當殿而坐，就聽聽《得寶歌》。這就是唐朝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廣運潭盛會，它相當於今天的博覽會，展示開元天寶時期社會的繁榮富庶。(參見：《蒙曼說唐：唐玄宗》第二十六回 天寶繁華之二 物華天寶)

年的第一屆巴黎世博會。但據北嶺徐氏宗譜中記載，徐瑞珩(徐榮村)以自己經營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加了1851年在倫敦舉辦的第一屆世博會，並獲金獎殊榮，這是中國人參加世博會的最早記錄。過去或許大家比較陌生底下的一段歷史，中國與日本早在1866年就接到參加隔年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的邀請，日本的德川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到了1873年方派員參加由奧國舉辦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據趙祐志教授的統計，1866年至1911年間，中國總共接到至少80次的邀請，其中滿清政府組團參加13次，寄物參展6次，派員蒞會11次。(趙祐志，1997：288) 中國在20世紀初，除應邀參加歐美的世界博覽會之外，亦曾在1910年舉辦第一次的國家博覽會「南洋勸業會」。而日本應邀參加法國1867年舉辦的巴黎世博會之後，明治新政府於1877年至1907年間共舉辦六次「內國勸業博覽會」，依據百崎誠的研究統計，明治時期的1871年至1912年，40年間共舉辦過博覽會的活動有122個之多。(百崎誠，2005：5-6)

就中日兩國舉辦世界博覽會情形來看，同在1866年接到參加隔年(1867)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的邀請，何以日本能領先於1877年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之後，一路蓬勃發展？而中國卻遠遠落後30多年，才在1910年首度舉辦等同規格的「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彼此間博覽會發展落差？本論文試以世博會這個活動的關鍵活動成員的認知、能力與經驗為起點之外，也關注世博會鑲嵌在一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國際等因素所形成的社會系絡。本章把世博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一個團體或社會菁英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過程，將以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何清楚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以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自己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以比較分析中國與日本參與世博會領先落後情形，第四章再以兩國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過程為基礎，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國際等面向，來比較分析討論兩國世博會事業發展落差的原因。

第一節 中日兩國何時接觸世博會—接觸階段

對於中國和日本來說，與世博會這個「最獨特的現代性符號發明」(Bennett, 1995: 209)的初次接觸，意味著兩個古老文明與西方現代性文化的劇烈碰撞，兩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意會與回應這樣的相遇，成為引人深思的歷史話題。(吳靖，2012: 217-218) 本節就以中日兩國在哪些時間點，是什麼樣的人士，在什麼樣的場合「接觸」了世界博覽會談起。

一、中國人的接觸世博會

法國政學兩棲的中國通Alain Peyrefitte，在其著書《停滯的帝國》，從世界史的角度切入，探討英國派遣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勳爵率領龐大使節團出使中國。他將這次長達兩年的出使行動，視為東、西方文化的再次接觸與首次的衝撞，意即中國這「天下唯一文明國家」遇上英國這個「世界最強盛國家」所產生的衝突，不僅打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迷戀誤解，也成為日後世界霸權版圖劇變的轉捩點。(Alain Peyrefitte著，王國卿等譯，2007) 遙想220多年前，大英帝國以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指派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節團前往中國。於1792年9月26日分乘五艘船艦，經過10個月的航行，於1793年7月底到達天津大沽，並於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過程中最大的爭論竟然是英國使者要不要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禮。當時英國率先工業化，已是西方的第一強國，在世界各地擁有許多殖民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當時的中國一直是東方的第一大國，雖處大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盛世之末，但仍有著遼闊的疆土，周圍許多國家對這強大古文明帝國還是得俯首稱臣。英國也由於工業化使得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為尋求原料與市場急於向外擴張，自然覬覦這塊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正是在這種擴張主義的思維下，英國派遣使節團訪華，希望與清政府談判以改善兩國的貿易，進而建立永久的外交關係。中國滿清由於文化背景與政治觀念的不同，認為居於天下中心的「中國」與鄰邦的關係只能是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異邦必須歲歲朝貢俯首稱臣。長期的閉關鎖國，使中國滿清的皇帝對外部世界的進步與西方的科

學文明一概不知，而為自己處於「太平盛世」而沾沾自喜。他們認為英國是仰慕中華文明，才遣使遠涉重洋為大清皇帝祝壽。馬戛爾尼覬見乾隆皇帝時是否下跪叩頭的問題，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禮儀之爭，而是工業文明帝國與農業文明帝國的再次接觸所形成的衝擊，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1793年的8月24日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圓明園布置了「科技宮」，將代表西方工藝的瓷器與天文學做了展示，地球儀、天體運行儀、弗雷澤天文儀、瓦利雅密座鐘、氣壓計、韋奇伍德瓷器等精美物品盡出。誠如作者Alain Peyrefitte的評論，這真像是參加1799年在法國首屆藝術與工業製品國際博覽會的英國未來館，這是一次西方工藝的輝煌展示，尤其是英國應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成就，英國人把展示重點放在中國人感興趣的瓷器與天文學。很快從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好像所有的中國人都參觀了英國人帶來的禮品展(滿清官員所謂的貢品展示)，所有的文人以及沒有陪同乾隆皇帝去熱河的官員都蜂湧來到圓明園。(參見：Alain Peyrefitte著，王國卿等譯，2007：121-129) 就展會形式而言，這似乎是中國滿清與西方藝術與工業製品博覽會的首次接觸。

從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節團出使中國之後，近一甲子的1851年，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鼎盛時期，為宣揚國威與持續產業發展，在倫敦舉辦了規模空前的「萬國工業博覽會」，經BIE追認為人類社會第一屆世博會，當時共有25個國家參展，展出34個國家的展品，包括奧地利、比利時、巴西、智利、中國(滿清政府)、丹麥、埃及、法國、德國、希臘、墨西哥等國家。(上海圖書館，2002：6； Findling，1990：7) 中國與英國又再一次於西方工業製品展會的舞台上接觸，這會是中國最早的一次接觸世博會嗎？11年後的1862年英國再次於倫敦舉辦世博會，以農業、工業和藝術為展示主題，有39個國家參展，包括來自東亞的中國滿清政府與日本德川幕府的展品。(Findling，1990：23；國雄行，2010：16-20) 這會是日本的第一次接觸世博會嗎？

有關第一屆倫敦世博會是中國人最早接觸世界博覽會的議題，大陸學者專家都

指向除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展，並奪得金銀兩項大獎之外，也有繪聲繪影的「希生廣東老爺」與中國的商品展示區。據中國大陸學者羅靖的《中國的世博會歷程》一書，對徐榮村的參展倫敦世博會有過這樣的描述：「1851年在倫敦舉辦第一次世界博覽會時，英國就想邀請中國政府參加，但因中國滿清政府當時還沒有辦理外事的機構，就只建議兩廣總督在博覽會上進行合作，最後遭到兩廣總督的拒絕。於是在廣東與香港的英國官員和商人只好自己籌辦中國產品赴賽，並動員中國商人也辦理商品出賽。當時與外界接觸頻繁，稍具世界眼光的主要是買辦商人，如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曾以其經營的『榮記湖絲』參展，並獲得金銀大獎。這是有關中國與博覽會之關係的最早記載。此後，中外商人和外國官員還自行組織展品，參加了1855年巴黎世界博覽會、1862年倫敦世界博覽會和186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但赴賽展品不多，到會場觀覽者更少。」（羅靖，2009a：14）另據文獻記載，當時在華的英國人曾向兩廣總督提出合作參加博覽會的建議被拒之後，由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與Harry Parkes徵集中國商品送往倫敦展出。（上海圖書館，2002：49-53；鈴木智夫，1996：66-67）

據俞立主編的《歷史的回眸》專書，對中國於1851年至2008年參加世博會的故事，有過生動的記載與精彩的討論。在保存的1851年萬國博覽會全景畫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有關中國部分的參展內容。畫中間的上半部分，有一塊小小的掛牌上清楚地標示著「CHINA」的字樣。掛牌下面的畫面真實展示了博覽會期間中國展室的展覽情景。從畫面上可以看出，與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相比，中國展室所占的面積很小，展品的數量和品種也不多。畫面相對應的兩行文字說明，中國展室中的展品包括：廣口大對瓶、著官服的滿清官員像、青銅器、中國瓷器、屏風、椅子、象牙雕刻、青銅器、大理石群像等。顯然畫面只能顯示展室中較大件物品。實際上，從1852年倫敦出版的《萬國工業博覽會評委會關於30類展品的評審報告》來看，當時中國展室的展品還包括：上海榮記行的絲綢樣品、景德鎮制瓷原料、植物蠟、棉花、木材、翡翠製品、硬煤和珍珠雕刻、蠟燭、蜜餞、雨傘、拐杖、茶葉、文具箱等。有意思的是，畫面展示的內容給人有點不倫不類的感覺。室內

掛著的宮燈和展室右側的裸體大理石雕像很不協調，顯然不符合中國的社會倫理規範。這種種疑點都叫人迫切想知道，究竟是誰規劃並提供了中國展室的展示品？(俞力主編，2009：5) 從當時參展目錄來看，1851年倫敦世博會所看到的中國展品都是英國人或出口商提供，和當時中國滿清政府並沒有實際的接觸。(Vanke, 2013：201)

此外，有許多史料記載1851年倫敦世博會上曾經出現過一位中國滿清官員，這名官員還受到英國方面隆重的禮遇。現保存於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由英國畫家Henry Courtney Selous創作的油畫《女王在開幕式上接見各國使臣》更清楚地看見一位身穿滿清官服的中國人就站在維多利亞女王附近。當年曾有人寫信給《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說此人是中國的親王。《北華捷報》1851年7月19日刊登了這封信，同時表示嚴重懷疑，並希望讀者不要輕信。根據清朝故宮外交檔案編寫的道光、咸豐年間《籌辦夷務始末》及後來的《補編》和《清史稿》均無中國派官員參加1851年世博會的任何文字記載。可見中國滿清政府當時沒有組織參加倫敦世博會。英國學者John Davis的說法比較可信，他認為這位中國人是當時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中國輪船「耆英號」上的一個普通中國人。他穿著官服來參觀展覽，被英國方面誤認為中國的重要官員而拉入等待英王接見的各國外交官之列。一些參加開幕的英國人事後曾在「耆英號」上遇見過這個中國人，此人被稱為「希生廣東老爺」。「耆英號」於1846年12月從廣東出發，於1848年3月抵達英國倫敦，船上的中國工藝品吸引了包括英國女王與狄更斯等社會名流在內的當地人上船參觀。首屆博覽會上，希生作為貴賓被邀請出席。(俞力主編，2009：6-7)

<中國人參與世博會的百年記憶與史鑒>研究報告有一段有趣的敘述：據英國傳記《維多利亞女王》所記載，「1851年5月1日的萬國工業博覽會在水晶宮盛大開幕，維多利亞女王親臨現場，受到熱烈歡迎。正當坎特伯雷大主教做完簡短的祈禱，600人合唱團齊聲高歌『哈利路亞』之際，驚見一位中國人走出人群，直入中心展廳的正中，向英女王深深鞠躬，這讓女王大為感動。萬國工業博覽會太需要

中國的加盟，由於中國並無代表出席，英女王遂下令將那人編入外交官行列，隨行巡視水晶宮。」希生在世博會開幕儀式上的大膽舉動，旨在引起眾人注意，伺機宣傳「耆英號」參觀活動。為此，他甚至大著膽子四處宣揚自己是大清國的代理。希生亮相世博會，大大刺激了英國人的想像，那個時期英國雜誌還出現了一些描繪中國人參加世博會的漫畫。1851年5月24日《倫敦新聞畫報》曾報導當時有一個中國家庭組合在阿爾伯特門附近頻繁亮相，他們不時做街頭表演，丈夫伴奏，妻子演唱，孩子童趣的表演，吸引眾多參觀者駐足觀賞，報導還附有一張那個中國家庭的合影。可以肯定，中國人的確來到了首屆世博會的現場。(吳海勇，2010：13-14)

中國人在1851年倫敦世博覽會的首次亮相，是以私人身份親臨現場或寄物參展的方式參與盛會，而非官方的接觸。繼倫敦世博會之後，1855年法國首次舉辦的巴黎世博會與1862年英國第二次的倫敦世界博覽會，都未引起中國滿清政府的重視。惟1862年英國倫敦世界博覽會現場，卻有來自東亞的中國滿清政府與日本德川幕府的展品，係英國第一任駐中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世博會展出，也算是一種中國與世博會的另類接觸。(參見：國雄行，2010：16-20)而在1866年清政府總理衙門首度接到邀請參加隔年在法國舉行的第二次巴黎世博會，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加。大陸學者的研究指出該博覽會值得一提的是流亡海外文人王韜，是時剛好在法國，參觀了巴黎世博會，並寫下〈游觀新院〉收錄在其《漫游隨錄》一書，曾被譽為中國親眼目睹世博會的第一人。(上海圖書館，2002：14；上海市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2007：125) 1867年王韜受邀到歐洲遊歷，11月20日王韜乘輪船啟航40多日抵達法國馬賽，從馬賽轉搭火車到巴黎想必已是隔年1月，巴黎世博會早已結束快兩個多月，很難有親眼目睹世博會的可能。日本學者鈴木智夫亦指出王韜到巴黎的時候，博覽會已經閉幕，所紀錄的是他1868年參觀會後展場所見，以及翻譯人員的解說，不過無論如何王韜還是最早接觸與關心世博會，極少數寫文章加以介紹的中國人。(鈴木智夫，1996：70)

或許日本學者鈴木智夫遺漏了幾位中國人早在王韜之前的1866年參觀了隔年開展的第2屆巴黎世博會展場工程的歷史，若是參訪世博場館也算是接觸了世博會，那麼清朝的「斌椿歐洲考察團」早在兩年前就分別參觀了建造中的1867年巴黎世博會場館以及英國的水晶宮，可謂捷足先登。為考察歐洲的情況，清同治五年正月初六(1866年2月20日)清廷接受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的建議，決定派遣前襄陵知縣斌椿，攜其子廣英，隨同回歐洲度假的赫德，親赴法、英、德、俄等歐洲九國考察，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專門為考察西洋情況而出國遠行。斌椿的隨行人員，有同文館之英文館學生張德彝、鳳儀和法文館學生彥慧，一行總計五人。斌椿等人這次西行，留下兩份涉及北歐的旅行紀錄，一是斌椿本人撰寫的《乘槎筆記》，另一是張德彝撰寫的《航海述奇》。此外，斌椿還在遊歷歐洲期間撰寫的詩篇，也彙編為《海國勝遊草》一書，大致是在同治八年前後，與《乘槎筆記》一同刊行於世，如王韜的記述，這些遊歷歐洲的書籍，在民間可是風行一時而洛陽紙貴。(參見：辛德勇，2013：80-81、90、95)

同治五年，朝廷特遣三品大員斌椿出使泰西諸國，隨員數人。在英京時，日出眺覽，搜羅奇異，恢擴眼界，真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如園囿中之珍禽怪獸，不可名狀；水湧地中，有若噴珠濺雪；機坊中飛梭運軸，不藉人工，皆水火二力之妙。凡其製作，無不巧奪天工，至於山川風土，亦皆觸景異觀。登臨採訪之餘，殊深興感，故各人於耳目所及，寄諸吟詠。遄歸之日，著有《乘查筆記》一書，已刊板于京師，一時通國傳觀，抄襄陽播拊之詞者，頓為紙貴。

至於上對朝廷，斌椿所撰行記，經整理抄錄，在他回國一個多月後的同治5年11月21日(1866年12月27日)，很快就由恭親王奕訢進奏上達天聽。雖然同治皇帝只是批下「知道了」三字，並沒有表述具體看法，但書中記述的海外見聞，對同治皇帝看待西方世界的新東西不可能毫無影響。(辛德勇，2013：95) 有關博覽會部分，張德彝撰寫的《航海述奇》有過這樣一段對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的描述文字，滿清政府同文館高材生張德彝與世博會的接觸。

二十四日癸未晴，早有告假回國之福州稅務司美里登來拜。其人白面烏鬚，能華言，其談鋒莫可禦。遂同彼乘車行三里許，至法國工程處。有大官數員上樓飲茶，有伊姓者云：法君欲將百里教場，改建百里樓房作「考產廠」，又名「炫奇會」。按天下國都造樓，國之大者備樓數間，小者五六間，再小者二三間，請天下那國各將其土產、服色、器皿置於其內，以便民間壯觀，其不願者聽。餘地按國數分作花園，約在次年夏

間，在巴黎斯會齊。法君擇其優者，獎來人以寶星。後取出圖樣數張與看。(轉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書；陳占彪，2010：1)

曾擔任2010年上海世博會日本館館長的江原規由，在引介上海世博的專文中，指出中國歷代接觸過世博會的人物當中，除滿清政府時期有寄物參加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買辦商人徐榮村，觀光過1867年巴黎世博會會後場館寫下《漫遊隨錄》的讀書人王韜之外，還有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的李圭，曾出席1878年巴黎世博會開幕式的駐英公使郭嵩燾，以及受日本政府邀請參訪考察1903年日本大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實業家張謇。(佐野真由子編，2015：688-690) 從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起，中國滿清政府開始以國家身份參加，具體事務則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承辦。在長達數10年海關代辦時期，中國士宦因公因私遊歷歐美的機緣漸多，而參訪世博會的大多僅為單純遊客的性質，惟李圭等少數人參與了相關世博會的籌備工作。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委派，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參加了為紀念美國獨立百周年而舉辦的1876年費城世博會，他詳細考察並記錄了此屆博覽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這可說是中國人對世博會最完備的一個現場參訪記錄。摘錄如下：

美國設會緣起：北阿墨利加洲有美國者，洋文稱友乃德司得次，譯即合眾國，又稱米利堅，俗稱花旗，泰西強大國也，在地之西半球。……光緒二年，為有國百年慶期……。歐洲諸大國所以稱雄者，以地大兵強，民安物阜耳，今我國豈出其下哉？且以大勢觀之，又安知將來不能駕乎其上耶？茲屆慶期，宜舉一極盛事以志不朽。因擇噴夕爾費尼阿省費里地費城，建屋設會，廣致天下物產，互相比賽。美其名曰「百年大會」，又曰「賽奇公會」焉。

會院總略：光緒二年，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國費里地費城仿歐洲賽會例，創設大會。先期佈告各國，廣集天下寶物、古器、奇技、異材，互相比賽，以志其開國百年之慶，藉以敦好篤誼，獎才勵能焉。……(轉引自李圭，1997：1-2；陳占彪，2010：25-27)

李圭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數年後的1878年，適逢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受命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燾匆匆赴法，正趕上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盛大的開幕儀式，多次參觀世博園區，還參加了巴黎世博會的夜場活動。伴隨郭嵩燾公使左右的幕僚，有專職翻譯張德彝、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公使參贊黎庶昌等，皆一時之選。他們各有行動，不僅親自見證巴黎世博會之盛況，且有文字傳世。張德

彝在1878年巴黎世博會開幕前就迫不及待地參觀了世博園區，他的日記還記錄了開幕儀式以及當晚活動的盛景。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除稟報自己在巴黎的課業之外，也述及自己遊賞世博會的觀感，對洋人代辦中國參博展品發表諸多意見。另號稱「曾門四弟子」⁵之一的黎庶昌，完成〈巴黎大會紀略〉收錄於其《西洋雜誌》一書。(吳海勇，2010：14) 馬建忠與黎庶昌接觸1878年巴黎世博會寫下的文字，分別摘錄如下：

……近日工課稍寬閒，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輻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游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之本意哉。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陳中華土產宜乎，其見聞之淺也，有以質之忠者忠，惟云賽會另有監會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謀，又何能詳言其故，此**巴黎炫奇會**之大略也。(參見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記言卷二之〈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中曆之光緒戊寅年三月也，法國開**賽會堂**於巴黎，至冬十月盡而散，名為**哀克司包息相(exposition)**。先未開會之前一年，法以書遍騰各國，請以珍物來會。至是，殊方異物珍奇瑰璋之觀，無不畢至。其堂建於商得媽司，舊時練兵之所。巨厦穹窿，梁柱榱桷，悉皆鐵鑄，而函蓋玻璃，下施地板，東西相望。外綴園亭池館，市肆酒樓，規模壯闊。自西洋**賽會**以來，詫為未有。余數數往觀，默誌厓略，蓋千百中之十一耳。(參見黎庶昌《西洋雜誌》之〈巴黎大會紀略〉)

二、日本人的接觸世博會

日本江戶時代的寶曆7年(西元1757年)，由江戶時代集博物學者、蘭學者、醫生、作家、發明家於一身的平賀源內提案，並由田村藍水在江戶的湯島開辦了藥品會(物產大會)，當時全國的藥用動植物都彙聚於此，這是日本江戶時代最原始的博覽會。(椎名仙卓，2005：10-13) 然而，日本人與歐洲世博會的第一次接觸在什麼時候？會人類史上第一次舉辦的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還是學者比較常提及的1862年第二屆倫敦世博會？

雖然1851年在日本正是德川幕府治理的鎖國時期，依據當時荷蘭在爪哇的巴達

⁵ 「曾門四弟子」是指曾國藩的四位門生，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

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建立的東印度公司總部，摘要彙總全球時事送往江戶幕府的《別段風説書》（奇異風聞錄）曾有一段記載：「在英國的首都(倫敦)正舉辦能夠展示來自全球各地藝術品與工業產品的博覽會，為此特別建造一座全用玻璃與鋼鐵建材的水晶宮展館……。」日本學者不清楚當時的江戶幕府如何處置這份情報，或可以得知日本德川幕府在1851年對世界博覽會的報導有過驚鴻一瞥。(福田州平，2013：31-32) 另外一次的報導接觸，發生在日本幕府鎖國期間的文久二年(1862)，荷蘭總督府發行的機關報日語版《バタビヤ新聞》一月號，曾報導英國正籌劃在倫敦舉辦來自全球各地展品的展示博覽會，預告1862年5月英國第二屆倫敦世博會即將正式開幕，這可說是出現在日本有關世博會的第二次報導。(平野繁臣，1999：166-167；橋爪紳也，2005：4)

然若以日本展品首次出現在歐洲的博覽會而言，依據日本近畿大學教授坂本久子的研究，早在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藉由荷蘭希格斯公司(F. Seghers & Company)展出過日本屏風，1853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荷蘭展品中出現日本物品，1855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在荷蘭展品中更出現80件日本物品。(參見表3-1) 然而John Allwood在《大博覽會》一書則指出日本展品首次出現在1853年都柏林博覽會，Allwood寫道：「就在美國培理將軍率黑船打開日本鎖國時期前幾年的1853年，都柏林博覽會中的日本展品引起參觀者的興趣，也讓許多參觀民眾頭一回觀覽來自遙遠東方的日本藝術和手工藝品。」(Allwood，1997：25) 不過吉見俊哉教授的研究，那次的展品來源只是因某種特別管道而流入英國的個人收藏，即使有日本人出現在會場，但與日本人有意的參展無關。(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104) 同樣的，我們可以說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1853年紐約世界博覽會及1855年巴黎世界博覽會藉由荷蘭之手展出的日本物品，與日本人有意的參展無涉。

那麼日本人直接與世博會的正式接觸，始於1862年英國的第二屆倫敦世博會。日本展品的出現在倫敦世博會，係第一任駐日英國公使阿禮國個人的收藏與熱心促成。(橋爪紳也，2005：5) 當第二屆倫敦博覽會決定於1862年舉行時，作為英國

表3-1 幕末與明治時期日本參與主要世界博覽會展品紀要

世界博覽會名稱	日本展品紀要
1851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	荷蘭希格斯公司(F. Seghers & Company)展出日本屏風。
1853年紐約世界博覽會	荷蘭的展品中有日本物品。
1855年巴黎世界博覽會	荷蘭的展品中有80件日本物品。
1862年倫敦世界博覽會	英國公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個人的日本美術工藝收藏，經由神奈川英國領事館的F·Howard Wise上尉寄物展出614件。(前田典子，2009：178)
1867年第2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德川幕府、薩摩藩、佐賀藩共同組團，由德川慶喜將軍的弟弟德川昭武擔任參展使節團團長，遠赴法國參展。
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	日本明治政府展出名古屋城金鯨與鎌倉大佛的模型、天王寺五重塔等展品。
1876年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	日本明治政府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參展。
1878年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日本美術工藝品受到注目，強化了歐洲工藝品的「日本流風」傾向。
1889年第4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在日本的展示品當中，並沒有特別引人注目的展品。
1893年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	日本館模仿國寶京都府平等院鳳凰堂的型式搭建。
1900年第5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參展團事務官林忠正舉辦了日本古代美術展，也由日本工匠建設日本展館、日本茶室、日本庭園等展示設施。
1904年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日本仿京都金閣寺與京都皇宮的紫宸殿建館，並搭配日本庭園做展示。

資料來源：整理自坂本久子〈日本の出品にみる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と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の関連〉，日本デザイン学会《研究発表大会概要集》，第54回，2007年。

外交網路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日本自然也在博覽會的邀請名單之列，公使阿禮國於1861年7月4日接到了通知。雖然中間發生過「東禪寺事件」的小插曲，阿禮國險些被一個日本的保守團體「水戶浪士」所殺害，這些人仇視在神聖的日本國土出現日漸增多的外國人，此次事件並未澆熄阿禮國促成日本參展的熱忱。由於阿禮國相信日本的商業技藝卓越，瓷器、銅器、絲織品、漆器、冶金可與歐洲最好的產品相匹敵，最終說服了日本政府成為世界博覽會的一員。1861年8月24日，江

戶幕府負責外交事務的「老中」⁶ 回信給阿禮國，表示幕府已充分領會將要舉行的世博會用意，並聲明自己國家的榮譽能在異國展現將是件讓人極為欣慰的事。阿禮國一收到這封信，就將日本肯定的答覆正式傳達給英國外交部，此刻日本的參展某種程度已是官方行為。(佐野真由子，2015：29-35)

這與阿禮國在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前，不顧中國方面以及在華其他英僑的冷淡，與下屬巴夏禮(Hany Parkes)一起去收集中國產品提供在倫敦博覽會展出的參與方式有所不同。中國的展品於1851年送往英國參展，人們也視中國是個參展國，但沒有人具體監管這些中國展品。日本的情況是阿禮國親自監管負責日本參展，同時也以日本的參展獲得大會給予殊榮。事實上，阿禮國對於將日本美術工藝品收藏參加第二屆倫敦世博會展出的參與程度，是要比他在1851年收集中國展品參加第一屆倫敦世博會參展要來的深，收集了614種日本展品，還親自準備了一本《日本送出的工業及藝術展品名錄》，阿禮國的收藏品對當時英法手工業界造成了巨大影響，阿禮國也被視為「日本流風」的先導之一。(佐野真由子，2015：29-35；2012：56-57)

至於日本人出現在1862年第二屆倫敦世博會，僅只是「竹內遣歐使節團」的順道而已嗎？據吉見俊哉教授的研究，日本幕府時期的文久二年(1862)，幕府為了讓歐洲諸國承認江戶、大阪、兵庫、新潟的延後開港，派遣了以竹內下野守保德為正使，總數38人的使節團前往歐洲。這個包含福澤諭吉、松木弘安、福地源一郎等人在內的竹內遣歐使節團，於1862年1月登上停靠於品川港的英國軍艦奧丁號(odin)。船艦經過香港、新加坡、紅海、馬爾他島，於4月初在法國馬賽(Marseille)登陸。短暫於巴黎停留之後，他們在4月30日渡過多佛海峽抵達倫敦。翌日5月1日正是第二屆倫敦世博會開幕日，使節團一行就穿著「紋付羽織袴」服裝出席開幕儀式，受到倫敦市民極大的注目。5月3日《倫敦畫報》的一篇報導，曾評述日本代表團在開幕式的裝束，並不是「金線縫製或織繡詭異龍紋圖樣」的中國服飾，

⁶ 老中為日本德川幕府常設的最高職務，直屬將軍負責輔助管轄的政務最高責任者，政務總理的幕府官員，共四名或五名，由食祿二萬五千石以上的世襲諸侯中指派。

而簡單樸素到不登大雅之堂，或正因為如此，日本使節團在英國確實成為很大的話題。此外，「日本」會在這次倫敦萬國博覽會成為話題，還有一個理由是前段述及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他不僅費心遊說日本幕府組成遣歐使節團、挑選赴歐洲諸國交涉的團員，還將自己在日本熱心收集的漆器、陶器、瓷器、銅鐵器、書畫骨董、甲冑刀槍，乃至於燈籠、提燈、鞋靴、時鐘等將近九百件展品，都提供在此一博覽會中展出。位於展示場中央通路右側的日本區，其展品與中國一併陳列，帶給倫敦人全然的異國刺激，其中尤以銅器、精雕金飾類明顯最獲好評。在5年後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及11年後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對日本工藝品的讚嘆仍然有增無減，也就是眾所周知曾在歐洲各地流行過的日本流風(ジャポニスム，來自法語的 Japonisme)。(吉見俊哉，1992：109-112；蘇碩斌等譯，2010：104-107)

日本使節團參與了第二屆英國倫敦世博會，除了帶給英國人全然的異國刺激，在倫敦引起了相當程度的話題之外，對於往後日本的世界博覽會事業更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竹內使節團的成員如淵邊德藏、福澤諭吉、松木弘安、福地源一郎在參觀倫敦世博會之後，立刻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能夠透過「觀覽相較」讓日本產品躍上國際舞台的涵義，淵邊德藏在他的著作《歐行日記》中提到，日本還不理解博覽會具有將物品集中展示，讓日本的產品有效推廣出去的效果，只拿一些粗俗的展品聊備一格，殊甚可惜。摘錄如下：

原本此展覽之企圖，在以博覽各國產物之名、匯集海內外之商人，使其各國所誇之產物、製品、器械等為人所見，以增多本國產品輸出而獲取利益；是以，為在此展場推出品項，除須支付大量稅金，亦須不惜資費自遠海專誠運送國產，以廣為各國人所知。精選之展出品項，若在展覽之時即被直接求購，多亦樂於盡量出售。……本國則因尚未諳此意，未能積極賣弄產物於他人，是以僅推出如此粗物。(轉引自平野繁臣，1999：169；蘇碩斌等譯，2010：110)

另一位竹內使節團成員的福澤諭吉，理解到世博會的意義。福澤諭吉在數年後的1866年刊行的《西洋事情》一書，在「博覽會」小節寫下「將千萬種物品置於一大廈內排列，在五六個月之期間供眾人觀覽」，並指出博覽會的意義在於「藉由嶄新器物的陳列，以達到相較相學，取他人之長以利己，有如智力功夫之交易」。(呂紹理，2005：77) 西洋大都會每隔幾年都會設置物產大會，向世界公告徵集各

國名產如便利的器械、古物奇珍，向世界各國人民作展示，這樣的展覽會稱之為「博覽會」。同時福澤諭吉也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全日本，甚至普及到其他漢字體系的國家。原文摘錄如下：

「故に西洋の大都会には、数年ごとに産物の大会を設け、世界中に布告して各々其国の名産、便利の器械、古物奇品を集め、万国の人に示すことあり。之を博覧会と称す」(轉引自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

1866年中國滿清政府總理衙門與日本幕府首度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參加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正式組團參加。反觀當時的日本，駐日大使羅生曾探詢幕府監察官栗本鋤雲參加巴黎世博會的可能性，栗本當時將exposition一詞翻譯成「博覧会」。最終德川幕府決定參展，由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陶器、漆器、銅器、浮世繪、礦物等特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席，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當時德川幕府的博物學者田中芳男，應法國世博會之邀，收集整理日本的昆蟲標本與會參展，奠定爾後日本廣設博物館的基礎，後人也稱田中芳男為「日本博物館之父」。然而就在同時，佐賀藩與薩摩藩曾經規劃獨自參展，因此相互爭搶前往巴黎的國家代表權，尤其以幕府和薩摩藩的競逐最為激烈。佐賀藩參加此次世博會的事務官佐野常民，後來在明治政府第一次正式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時，擔任博覽會事務局의 副總裁，也是日本政府把參加與舉辦世博覽會制度化(博览会行政)的開端。此外，1867年的巴黎世博還有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在會場開設一家有藝人現場表演而大受歡迎的日本流風茶室，其中以轉陀螺(独樂回し)唱師松井源水為首的許多藝人、曲藝師紛紛渡海而至，這些藝能表演也引發許多饒富興味的軼事。隨行的澀澤榮一與杉浦讓兩人接觸1867年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情形，詳實且生動的紀錄在《航西日記》書中，澀澤榮一在给川村惠十郎的書信中留下這樣的博覽會記述：

博覽會之展示實在盛大而精彩，來自宇內萬國的實用物品，以及其他美觀的器械等展示品星並羅列，令人驚歎。我國的展品評價亦良好至極，鑒定家已評定，我國將與英、美、米利、普魯士等其他兩三國一樣被授予最高獎牌。此乃國家之名譽，喜慶之至。(轉引自關根仁，2012：76)

日本江戶時期德川幕府的正式參與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又是一次日本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德川昭武、栗本鋤雲、田中芳男、佐野常民、澀澤榮一、清水卯三郎等人與歐洲世博會的接觸，對日後明治政府參與世博會及自己舉辦博覽會，起了大的作用。(平野繁臣，1999：169-172；西川智之，2006：176-177；椎名仙卓，2005：5；國雄行，2005：23；福田州平，2013：31；蘇碩斌等譯，2010：111-112)

奧地利政府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閉幕三年後的1870年向世人宣佈，將在1873年舉辦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除了紀念奧皇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執政25週年之外，要把首都維也納推向世界先進都會之列，並恢復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失利後的國際威信。1870年清政府受到邀請，起初也是不願參加，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轉引自趙佑志，1997：299)但是回應者寥寥無幾，商民對參加博覽會的意願不高，1871年11月奧國駐華公使強力建議清政府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博覽會的籌備事宜，使中國的展品具有代表性，才不失大國顏面。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清政府把目光投向當時總理衙門轄下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赫德通知各口岸稅務司準備土特產作展品，並指定廣州稅務司包臘(E. C. Bowra)到各口岸催辦。屆時由德瑾琳(Gustav Detring)主辦，偕同葛德立(W. Cartwright)、杜德維(E. B. Drew)、漢南(C. Hannen)和包臘組成代表團到維也納代表中國參展。由於德瑾琳(Gustav Detring)在海關擔任稅務司一職已滿七年，他被批准首次回國休假兩年。此次休假可謂公私兼顧，除了回家探親以外，深受赫德器重的德瑾琳還被指派參加1873年在維也納舉辦的國際博覽會，這是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博覽會，也是德瑾琳登上人生更大舞臺的開始。代表團的組織工作卓有成效，中國展品在這次展覽會上獲得各國好評。為此，奧地利政府給與會的德瑾琳等人發了勳章，清政府也給德瑾琳等人「賞給三品銜」以示獎勵。從此直到1905年止，中國海關承辦大小規模不等的博覽會約25次左右，從此確立早期中國由海關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的慣例。(鈴木智夫，

1996：70-74；張暢、劉悅，2012：17-18；Wright，1993：3，537)

反觀同樣受到奧國邀請的日本，甫於1867年11月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起初態度也不很積極，經奧國與主辦單位的勸說，基於參與展會可在很短的時間與很少的開銷，能夠體察全世界各國發展的考量，最終決定參加，還成立了專責單位負責籌備參展事宜。當時由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擔任總裁，工部大丞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佐野常民在1872年寫下對參加博覽會目的，「一曰凡以為出品之物，無論天產人工，必擇精美者以搜集之，俾藉國土之豐饒，人工之巧妙，揚國威於海外；二曰各國之出品及著作，必詳加考核，俾知西洋之學藝之精妙，機械之妙用，以開產物蕃殖之道；三曰乘今日之機運，創設不可或缺之博物館，以促學藝之發達，而樹他日博覽會之基礎；四曰本國物產之名目製造，宜力圖改良，以博各國之稱道，而增輸出之數額；五曰各國產物之有名者，必詳查其原價銷路等，以裨自國之貿易。」(馬敏，2007：101；國雄行，2005：32-33)

明治政府為與各國增進友誼親善，以及考察歐美諸強的文化國情，同時也帶著試探各國對修改江戶時代後期與西方列強所簽下不平等條約的態度，1871年12月23日至1873年9月13日期間，派團至美國及歐洲諸國訪察，也就是日本史上知名的「岩倉使節團」，由正使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為副使，加上政府官員及留學生等共107人組成。出使期間曾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在會場驚見小國展品完全不遜於大國展品，主要在於國家與國民的「獨立自主精神」，而各國在世博會的競爭可稱為「太平時期的戰爭」。(國雄行，2004：250)

三、小結

中國(滿清政府)早在1851年曾有過私人身分(希生廣東老爺)親臨現場或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寄物參與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而且當年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也曾徵集中國商品送往第一屆倫敦世博會展出。而此時的日本德川幕府，收到過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總部編譯的《別段風說書》，對第一屆倫敦世博會有過記載，

少數幕府官員曾對世界博覽會的「報導」有過接觸。雖然日本近畿大學教授坂本久子指出日本早在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藉由荷蘭希格斯公司展出過日本屏風，1853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荷蘭展品中出現日本物品，1855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在荷蘭展品中更出現80件日本物品，而John Allwood在《大博覽會》書中也提到日本展品首次出現在1853年歐洲的都柏林博覽會，日本展品大規模出現在世博會是發生在1862年第二屆英國倫敦世界博覽會，係英國第一任駐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世博會展出，這與1851年第一屆世博會有中國商人寄物參展與外國人徵集中國商品送往參展有十年的差距。

至於政府官員與文人雅士之流親臨現場並寫下紀錄，則由日本領先於1862年德川幕府派遣了以竹內下野守保德為正使，包含淵邊德藏、福澤諭吉、福地源一郎等人的竹內遣歐使節團，參觀過第二屆倫敦世博會。淵邊德藏在他的著作《歐行日記》與福澤諭吉在數年後出版的《西洋事情》一書，對世博會對國家發展的政策涵義都有精準的掌握，使得更多日本人透過書籍接觸世博會，擴大了日本人對世博會的視野。而中國稍遲於1866年由滿清政府派遣的斌椿歐洲考察團，參觀了隔年將開展的第2屆巴黎世博會展場工程，以及英國的水晶宮。斌椿的《乘查筆記》與隨行張德彝的《航海述奇》寫下巴黎世博會描述文字。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日本政府(德川幕府)應邀正式組團參展，又是一次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德川昭武、栗本鋤雲、田中芳男、佐野常民、澀澤榮一、清水卯三郎等人與歐洲世博會的接觸。而1873年日本政府(明治政府)再次應邀參加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還成立了專責單位負責籌備參展事宜，由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擔任總裁，工部大丞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佐野常民所完成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不只是商品展覽，更具有開化民智的重要角色。期間派出的「岩倉使節團」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等政府官員，以及留學生等共107人參訪了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又是日本一次盛大而有計畫的接觸世博會。

至於中國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展，卻是在30年後的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

博會，滿清政府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分別為正副監督。陳琪因精通英語，受湖南巡撫委派，隨團參與聖路易士世博會，負責陳設湖南展品與實業調查。不過整體展品仍由海關的洋人把持操辦，以農業、手工業及工藝品為主，甚至為了投洋人所好，有些醜化貶低中國人的裹小腳婦女、吸食鴉片的老爺等泥人塑像展品引發爭議。(上海圖書館，2002：65-68；王正華，2003：421) 年輕團員陳琪對此次參展作業的不佳、展品的不當、展示中國的效果不彰提出批判。(Fernsebner, 2002：40-54) 隔年的1905年比利時舉辦的黎業斯博覽會，滿清政府決定改由商部操辦，結束了由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把持承辦的歷史。博覽會會場建造了一座典型的中式風格的中國館，共有18個省的30餘個城市組織展品參賽。

總結的說來，私人身分與較大規模展品出現世博會會場的接觸形式，中國的1851年領先日本的1862年。至於政府官員與文人之流親臨現場並寫下紀錄，則由日本的1862年領先派遣竹內遣歐使節團參觀過第二屆倫敦世博會，隨行淵邊德藏的《歐行日記》與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對世博會觀念有精準掌握，讓更多日本人透過書籍接觸世博會。而中國稍遲於1866年派遣的斌椿歐洲考察團，參觀了正在施工的第2屆巴黎世博會展場，斌椿的《乘查筆記》與隨行張德彝的《航海述奇》留下有關巴黎世博會介紹文字。而正式由國人自主組團參展的接觸，日本更領先於1867年正式參與第2屆巴黎世博會，中國則遲至1905年滿清政府才決定改由商部操辦，自主籌備參加比利時舉辦的黎業斯博覽會。(參見表3-2)

表 3-2 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接觸(世界)博覽會比較表

接觸	中國	日本
出現過「疑似博覽會」	天寶元年(西元 742 年)，唐玄宗的臣子韋堅在他興建的長安東郊廣運潭(南方租賦漕運總碼頭)落成後，舉辦過規模盛大的漕運展覽會。	
接觸過初期的博覽會	1793 年的 8 月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圓明園布置「科技宮」，展示代表西方工藝的瓷器與天文學，類似 18 世紀法國藝術與工業製品國際博覽會。	西元 1757 年日本江戶時代的寶曆 7 年，由平賀源內提案，並由田村藍水在江戶的湯島開辦了藥品會(物產大會)，這是日本江戶時代最原始的博覽會。
接觸世界博覽會	1851 年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寄送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加第一屆	1851 年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別段風說書》曾對第一屆倫敦世博會有

	倫敦世博會，現場出現「希生廣東老爺」，是以私人身份親臨現場或寄物參展的方式參與，而非官方接觸。	過記載，並送往日本德川幕府，當時的幕府人員對世界博覽會的報導應該有過驚鴻一瞥。
	1851年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徵集中國商品送往第一屆倫敦世博會展出。也有一說為東印度公司所蒐集的中國商品送往倫敦世博會展出。(Auerbach, 1999: 176)	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藉由荷蘭希格斯公司展出過日本屏風。1853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荷蘭展品中出現日本物品，同年日本展品出現在歐洲的都柏林博覽會。1855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在荷蘭展品中更出現80件日本物品。
	1862年英國倫敦世界博覽會現場，有來自中國展品，係英國第一任駐中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世博會展出。	1862年英國倫敦世界博覽會現場，也有來自日本展品，係英國第一任駐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世博會展出。 1862年荷蘭總督府發行的日語版《バタビヤ新聞》一月號，曾報導英國預備在1862年5月舉辦第二屆倫敦世博會，這可說是出現在日本有關世博會的第二次報導接觸。 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了以竹內下野守保德為正使，包含福澤諭吉、福地源一郎等人的竹內遣歐使節團，參觀過第二屆倫敦世博會。福澤諭吉在數年後出版的《西洋事情》一書，擴大日本人的接觸世博會。
	1866年清朝的斌椿歐洲考察團參觀了隔年開展的第2屆巴黎世博會展場工程，以及英國的水晶宮。斌椿的《乘查筆記》與隨行張德彝的《航海述奇》寫下巴黎世博會描述文字。	1867年日本德川幕府正式參與第2屆巴黎世博會，又是一次日本政府與社會菁英如德川昭武、栗本鋤雲、田中芳男、佐野常民、澀澤榮一、清水卯三郎等人與歐洲世博會的接觸。
	文人王韜曾結識太平天國地方長官劉肇均（劉紹慶），受其器重，從戰略上為太平軍獻策而入罪。1868年流亡海外，參觀法國巴黎世博會會後展場，寫下〈游觀新院〉收錄在《漫游隨錄》一書。	
	1873年中國正式受邀參與維也納世界博覽會，只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清政府任務交付當時總理衙門轄下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委由海關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	1873年日本甫成立之明治政府受到奧國邀請決定參加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還成立了專責單位負責籌備參展事宜。期間「岩倉使節團」的正使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等政府官員，以及留學生等共107人，曾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
	1876年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受總稅務司赫德委派，參加了費城世博	

	會，詳細考察並記錄此屆博覽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是中國人對世博會最完備的現場參訪記錄。	
	1878年清駐英公使郭嵩燾受命兼任駐法公使。參加過巴黎世博會盛大開幕儀式，多次參觀世博，還參加世博會夜場活動。伴隨郭嵩燾公使左右的幕僚，有專職翻譯張德彝、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公使參贊黎庶昌等，不僅親自見證巴黎世博會之盛況，且有文字傳世。	
	1904年滿清政府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分別為正副監督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陳琪因精通英語，受湖南巡撫委派，隨團參與聖路易士世博會，負責陳設湖南展品與實業調查。	
	1905年滿清政府決定改由商部操辦，自主籌備參加比利時舉辦的黎業斯博覽會，結束了由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把持承辦的歷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中日兩國何時清楚意會世博會—意會階段

第一節討論了中日兩國接觸世博會的情形，也就是說兩國在哪個時間點，什麼樣的人士，在什麼樣的場合接觸了世界博覽會。接下來分析討論兩國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何時對世博會有清楚精準的「意會」，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回應這樣的接觸，誠如吳靖教授所言這是個引人深思的歷史話題。

一、中國人怎麼看待世博會

(一) 1870年代將世博會視為「炫奇鬥異」之舉

220多年前的大英帝國以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由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節團，於1792年9月26日分乘五艘船艦，於1793年7月底來到中國的天津大沽，並於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期間1793年的8月24日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圓明園

布置了「科技宮」，將代表西方工藝的瓷器與天文學做了展示，這是一次西方最新工藝的展示，尤其展演出英國應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成就，許多王公大臣與平民百姓都來到圓明園，做了初期西方藝術與工業製品博覽會的接觸。(Alain Peyrefitte 著，王國卿等譯，2007：121-129) 中國的反應會是什麼？以乾隆皇帝之說最具代表性，對西方叩關通商與技術交流之請，乾隆仍以天朝自居，心想由於其恩威遠播，萬國來朝，大清朝種種貴重之物比比皆是，無所不有。而且天朝從不貴奇巧，更不需要英國制辦的產品。如此看來，在圓明園布置的「科技宮」展示西方工藝，對大清乾隆皇帝與重臣們而言，只不過是不屑的「奇技淫巧」而矣，這一直也是中國官宦士大夫對外夷的基本看法。摘錄乾隆皇帝致英王書信，則可見一斑。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知悉，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齋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齋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該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貫加賞各物件另單賞給外，茲因爾國使臣歸國，特頒敕諭，並賜齋爾國王文綺珍物，具如常儀。加賜彩緞羅綺，文玩器具諸珍，另有清單，王其祇受，悉朕眷懷。特此敕諭。(轉引自Alain Peyrefitte著，王國卿等譯，2007：249-250)

從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節團出使中國之後，近一甲子的1851年，英國為宣揚國威與持續產業發展，在倫敦舉辦了人類社會第一屆世博會，當時共有25個國家參展，展出包括中國滿清政府的34個國家展品。(上海圖書館，2002：6； Findling，1990：7) 大陸學者專家都指向除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展，並奪得金銀兩項大獎之外，也有繪聲繪影的「希生廣東老爺」與中國的商品展示區，是中國以私人身份親臨現場或寄物參展的方式參與盛會。讓人好奇的是，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以「榮記湖絲」參展得獎，他是怎麼看待世博會？據《北嶺徐氏宗譜》記載，徐榮村以自己經營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加了1851年在倫敦舉辦的第一屆世博會，並獲得了金、銀大獎。徐榮村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所以鄭重其事地寫在他的家譜中，摘錄北嶺徐氏宗譜如下：

咸豐紀元，英國開百年大會於其倫敦之京城……君獨寄七裡湖絲十二包，往陳於會。既而較論久之，竟推君絲為會中第一，中外人無異詞。英國主親臨觀之，喜甚，獎君金銀牌各一，手諭、畫幅一幀。(轉引自楊彥華、冷啟迪、陳恒才，2010)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在於英國倫敦京城大會，賽演五大洲各國土產以及五金玉石古玩一切貨物，其湖絲一類經在會眾人公舉榮記湖絲為第一。英國君主賞給金銀牌各一面，又給翼飛洋人執照，上載明："總理會總亞爾技、英京蘭頓美柏院會所、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月十五號"字樣。照系英字，今以華字翻譯如此云云。(轉引自黃時鑒，2012：48-49)

1851年倫敦世博會主辦單位方非常希望中國參展，但當時滿清政府置若罔聞，於是轉向邀請中國商家參展。由於當時中國相對閉塞，許多商人也是置之不理，幾乎沒有人響應。唯徐榮村獨寄七裡湖絲(榮記湖絲)12包往陳於會，蓋在徐氏意會出經商的需要，在世博會上獲獎後，就把這個獎牌制作成一個商標，進行重新包裝打向市場，在競爭中打敗了其他商家，獲得了很大的商業業績。(HAN，2007：215；楊彥華、冷啟迪、陳恒才，2010) 徐榮村稱世博會為「百年大會」、「京城大會」，將世博會看成在商場競爭所需與商品評比行銷的工具，可惜的是徐氏族譜並不對外販售，除能影響少數徐氏宗親之外，能影響到更多國人的機會不大。

繼倫敦世界博覽會之後，有1853年美國首次舉辦的紐約博覽會(並未被列入BIE旗下的世界博覽會)、1855年法國首次舉辦的巴黎世界博覽會、1862年英國第二次的倫敦世界博覽會，都未引起中國滿清政府的重視。在1866年滿清政府總理衙(相當現今的外交部)首度接到邀請參加隔年在法國舉行的第二次巴黎世博會，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展。四年後的1870年，清政府受到奧國政府邀請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起初也是不願參加，同樣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轉引自趙佑志，1997：299) 依據趙佑志先生對清朝中國參家世博會的研究，就清廷有關各國賽會公會的外交檔案，從1866年接到法國政府邀請算起，46年間共80次以上。就其表列80次的博覽會名稱，可以看出當時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們對博覽會的理解，叫「賽會」的有37次、「賽奇會」11次、「炫奇會」7次、「博覽會」6次、「賽珍會」3次、「公會」3

次、「聚珍會」2次、「紀念會」2次、「聚寶會」、「格物會」、「百藝會」、「工藝會」、「利用會」、「藝業會」、「生業會」、「博物會」與無活動名稱各1次。(趙祐志, 1997: 288-294) 其中出現「賽奇會」、「炫奇會」、「賽珍會」、「聚珍會」、「聚寶會」有關奇珍異寶的有24次, 而且排序上都發生在前40次。若就其中由BIE認可的世博會則有8次的譯名(參見表3-3), 出現「賽奇會」3次、「炫奇會」2次, 「賽會」、「聚珍會」、「商品陳列公會」各1次, 更凸顯「賽珍炫奇」之意味。概在晚清朝野士人初次接觸博覽會, 僅從遊歷西方的官員、文人及商人得知有關洋人舉辦博覽會的一鱗半爪, 大多視為無關宏旨的「賽珍炫奇」之舉, 當然也含有中國傳統士大夫鄙視蠻夷為「奇技淫巧」之癖性所致, 時人曾謂「吾國舊時於賽會二字, 不求本意, 謬譯曰賽珍, 遂若賽會為炫奇鬥異之舉者」。(轉引自馬敏, 2004: 100) 重「賽」字的競爭意思有51次, 約佔六成以上, 莫怪乎許多學者都說博覽會在近代中國一般都稱為「賽會」。(喬兆紅, 2005: 89)

表3-3 中國滿清政府時期受邀或參加BIE認可的世界博覽會譯名一覽表

#	年	舉辦國/城市	現今通行的譯名	清政府總理衙門譯名	清政府反應
1	1867	法國/巴黎	第2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法國巴黎萬國聚珍會	曉諭商民參加
2	1873	奧匈/維也納	維也納萬國博覽會	奧國萬國商品陳列公會	官民組團參加
3	1876	美國/費城	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	美國定鼎百年紀念費理地費萬國賽奇會	官民組團參加
4	1878	法國/巴黎	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法國各國炫奇會	官民組團參加
5	1889	法國/巴黎	第4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法國各國炫奇會	海關寄物參加/ 商民自行參加
6	1893	美國/芝加哥	芝加哥世界哥倫布博覽會	美國西嘎哥四百年誌慶萬國賽奇會	曉諭商民參加/ 使館派員參加。
7	1900	法國/巴黎	第5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法國巴黎萬國賽奇會	官民組團參加
8	1904	美國/聖路易士	聖路易士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美國散魯伊斯慶賀購得魯義地方百年紀念賽會	官民組團參加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民國86年6月，pp. 289-294。

再舉遊歷西方的官員、文人及商人之要者，以推敲他們對洋人舉辦博覽會的理解與意會。首先，1866年斌椿等人西行考察北歐的旅行紀錄，尤以隨行的同文館高材生張德彝撰寫的《航海述奇》值得一提，依據《中國基本古籍庫》的檢索，《航

《航海述奇》出現過「炫奇會」的字眼四次，對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作定義式描述的則有這樣一段文字，「……法君欲將百里教場，改建百里樓房作『考產廠』，又名『炫奇會』。按天下國都造樓，國之大者備樓數間，小者五六間，再小者二三間，請天下郡國各將其土產、服色、器皿置於其內，以便民間壯觀，其不願者聽。餘地按國數分作花園，約在次年夏間，在巴黎斯會齊。法君擇其優者，獎來人以寶星。」(轉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書；陳占彪，2010：1) 張德彝將世博會意會成「一定規模的場地，修建各國展館，供展示各國代表文物產品，並由大會考教給獎。」而將世博會名之為「考產廠」與「炫奇會」者，有士大夫奇技淫巧鄙視氣息與考較評獎的賽會之意。另隨後流亡海外文人王韜於1868年也參觀了巴黎世博會會後的會場，並寫下〈游觀新院〉收錄在其《漫游隨錄》一書，也是早期極少數寫到世博會的中國人。《漫游隨錄》有這樣的記述文字，「蓋此院之建，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將開設博物大會，特為萬國陳設各物公所。二三年來竭貲興造，加意經營，日役工匠數千人……開院之日，通國民人，列邦商賈，遐邇畢集，均許入而遊覽，來往無禁。……法駐京公使伯君于其中創設聚珍大會，凡中外士商有瑰奇珍異之物，皆可入會，過關許免其稅。……一時物玩精奇，宸遊怡暢，稱盛集焉。院內排列臚陳者，皆當世罕覩之珍，或有莫悉其名者。法王特簡一博識宏覽之大臣，細察詳觀，辨別其美惡，品評其高下，次第其等差……。」(轉引自陳占彪，2010：14-15) 王韜雖將世博會名之為「博物大會」、「聚珍大會」，已能描繪出世博會設展場供世界各國展示奇珍異物，由主辦國考較評獎的大型展會，仍缺對世博會眼目之教、殖產興業及商戰強國等意義的掌握，字裡行間仍流露出中國士大夫遊記對奇觀的詠嘆，以及些許士大夫鄙視夷人奇技淫巧的「炫奇會」氣息。張德彝《航海述奇》將世博會譯成「炫奇會」，以及王韜所寫的《漫游隨錄》書中的〈游觀新院〉，將世博會譯為聚珍考較評獎的「博覽大會」，較屬視博覽會為「炫奇鬥異」之輩。王韜筆下的巴黎世博會不到1,000字，若再就其〈玻璃巨室〉乙節，遊賞英國人稱之「水晶宮」(係1851年倫敦世博會展館)，王韜卻隻字未提倫敦世博會。(王韜，1982：101-103) 若屬關心或熟知世博會之士，應該會留下幾

句感嘆，或可推想王韜似不熟世博會，同屬20世紀之前視世博會為「炫奇鬥異」之輩，所寫僅文人「遊記」而已。

(二)1870年代末期逐漸認識到世博會「益國而不徒費」

1873年滿清政府委由海關總稅務司承辦參加維也納世博會展覽事宜，由於處置得當，讓外國人透過全方位展品對中國的對外經濟狀況、人民生活和中華文化有所瞭解，當時國人在認識世博會的驚奇之外，也逐漸能夠體會出了其蘊藏的有利於他國交好，以及擴大貿易與見聞的好處。刊登于梁啟超主編的《中西聞見錄》⁷的一些文字「博覽會非以誇奢鬥巧，實以博見聞，擴知識，一以越邦國之藏富，一以勉人力之溥存也」。「此一會也，非惟矜奇尚異，實於中西交際，大有裨益，將見貿易於日隆，而和好於以日敦矣。」(轉引自羅靖，2009a: 67) 這些報導評論的文字，可以看見時人開始理解博覽會能傳播新知、促進貿易、有助於中西交好。另一方面，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其屬下的眼光挑選的展品，畢竟帶有幾分洋人高高在上的種族歧視味道。他們收集部分展品刻意暴露中國人醜陋之處，使中國在世博會上出醜。同治癸酉年(1873年)閏六月初七日《申報》的〈記奧國格物會院事〉就評論委由赫德參賽「似徒供西人之玩視，而無濟中國之利益，蓋中國雖派海關內之西國諸君以督理其事，究不如簡擇諮明官員數人，使攜中國之物相比較，次第具奏，既可以周知各國之出產，又可以多取各國之善法。」(轉引自羅靖，2009a: 66) 為了使海關籌辦世界博覽會的事務在國內得到認可，1876年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經東海關稅務司德瑾琳推薦，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委派參加了為紀念美國獨立百周年而舉辦的費城世博會，特「囑將會內情形，並舉行所聞見者，詳細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其所以慎重周詳者無他，亦欲敦交誼，廣人才，冀收利國利民之效也。」(李圭，2008: 作者序) 李圭詳細考察並記錄了此屆博覽會，

⁷ 1872年8月北京的外國傳教士、美國長老會丁韋良(William Martin)、英國倫敦會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介紹近代科學和自由思想。有鑒於香港、廣州、上海、寧波等地都有報刊發行，唯獨北京沒有，於是決定於北京創辦一種期刊。同月，《中西聞見錄》便應運而生。月出一號，每號發行一千份，大部分免費發送，主要限於北京。

回國後的1877年完成《環遊地球新錄》一書，卷一〈美會紀略〉可說是中國人對世博會最完備的一個現場參訪紀錄，其中「美國設會緣起」乙節有過這樣的文字「北阿墨利加洲有美國者，……為有國百年慶期……歐洲諸大國所以稱雄者，以地大兵強民安物阜耳，今我國(美國)豈出其下哉，且以大勢觀之，又安知將來不能駕乎其上耶。茲屆慶期，宜舉一極盛事以志不朽。因擇噴夕爾費尼阿省費里地費城，建屋設會，廣致天下物產，互相比賽。美其名曰『百年大會』，又曰『賽奇公會』焉。另「會院總略」乙節即言：「光緒二年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國費里地費城仿歐洲賽會例創設大會。先期佈告各國，廣集天下寶物、古器、奇技、異材，互相比賽，以志其開國百年之慶，藉以敦好篤誼，獎才勵能焉。建於城西北隅飛莽園內，基廣三千五百餘畝，圍以木城為門十七，內建陳物之院五所，一為各物總院、一為機器院、一為繪畫石刻院、一為耕種院、一為花果草木院。基址之廣闊，營構之奇崛，局度之恢宏，陳物之美備，五大洲中古今無兩，五院計用洋錢四百五十萬圓……」(轉引自李圭，1997：1-2；陳占彪，2010：25-27) 李圭的《環游地球新錄》一書，詳細記錄他每一天到場參觀的所見與心得，「賽會之物，幾乎無物不有，無美不具。逐件位置妥當，須六閱月工夫，始能齊備。遊人欲盡覽諸物，每日周曆各處，曲折計算得五十六里，兩日始遍。」李圭對西方工業技術發出驚歎之語，「誠可謂萃萬寶之精英，極天人之能事矣」，更感到「如入五都之市，萬寶雜陳，已覺心目俱駭」。他批評當時國人反對機器的守舊觀點，嘲笑封建文人說機器是「機事機心，古人所不為」的昏話，認為機器可以利國利民，應當講求。(轉引自李圭，1997：2-4；喬兆紅，2009b：148)

《環游地球新錄》一書讓國人更進一步的認識世界博覽會，尤其對當時的洋務派官員與讀書人有很大影響。例如1887年清政府通過考試選拔，派遣12名遊歷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個國家進行為期兩年的遊歷考察。遊歷使們撰寫了幾10種國外調查研究報告和海外遊記。單單考選榮登第一中選的傅龍雲一人，就撰寫了遊歷日本、美國、加拿大、古巴、秘魯、巴西等六國的調查報告《遊歷圖經》、遊記《遊歷圖經餘記》和記遊詩共110卷之多。在他的日記當中，就曾出現「…守藏銅

人十有奇，《環遊地球錄》所謂最奇鐵櫃見於賽奇公會總院者，殆此類之具體而微歟。」(傅雲龍，2005：126) 光緒四年(1887年)五月廿一日郭嵩燾的日記寫道：「方自倫敦啟行而赫德至，並枉送寧波人李圭所著《環遊地球新錄》。蓋前歲美國開設百年大會于費地里費之飛莽園，李圭司浙海關書記，赫德派令赴會者也。其書四卷，分三類：曰《美會紀略》，曰《遊覽隨筆》曰《東行日記》，紀錄尚為詳明。(郭嵩燾，2008：628-629) 顯見李圭對社會菁英的影響。康有為在讀完這本書後，開始走向西方國家尋找解決方案，不過當時只印了3,000冊，影響範圍仍有限。(張元隆，2006：25)

雖然李圭《環遊地球新錄》的卷一〈美會紀略〉計約2萬字，所描述的世博會不只篇幅極短，將世博會名為「百年大會」、「賽奇公會」，認識上仍偏重「賽會」的意義，不過通過參觀考察世界博覽會，李圭改變過去士大夫迂腐的觀念，開始推崇西方先進事物而宣導西學，他認為由於國人出外鮮少窮究其理就主張舉辦博覽會是無益之舉。李圭赴會考察之後已能對舉辦世博會效益寫下評論的文字，「竊嘗謂美國創是會也，若似乎徒費。今而知其志在聯交誼，獎人才，廣物產，並藉以通有無，是有益于國，而不徒費。且舉來與會之三十七國，獲益亦非淺鮮，而經費亦未為徒糜也。」(轉引自李圭，1997：3；上海圖書館，2002：117 & 120；喬兆紅，2009b：148) 而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為《環游地球新錄》作序時，亦見中國士大夫代表性人物對世博會認知的一些轉變，序言美國為考究物產與修好睦鄰，仿歐洲賽會設會院於費城，廣集各國展品，分類分區展示。更指出西方各國為通商富強，假世博會以角逐聰明才智，務極事物新奇，進而相互仿效等認識。並以如今中外通好，與英、德、法、美各國互動頻繁，期許有志之士，若能殫心考究各國，略其短而師其長，則對國家有遠大的效益。

《环游地球新录》李鴻章序：大清光緒紀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為美利堅立國百年之期。美人設會院于費裡地費城，廣集各國珍玩古器、日用服禦、生潛動植諸物，區分部畫，各有其所。與斯會者，中國而外，凡三十有六國。名曰“百年大會”，亦曰“賽奇公會”。將欲考究物產，修好睦鄰。蓋仿歐洲賽會，而創為是舉也。……夫自通商以來，泰西諸國，日出其聰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為富強計者，若鐵路、電線、車

舡、炮械之屬，轉相仿效，務極新奇；而于商務，尤所措意，舍是則無以自立其國，匪特習尚所在，蓋亦時勢使然也。是錄於物產之盛衰，道裡之險易，政教之得失，以及機器製造之精巧，人心風俗之異同，一一具載。其非耳目所及者，則略焉弗詳。圭之此行，為不虛矣。……有志之士，果能殫心考究，略其短而師其長。則為益於國家者，甚遠且大；又豈僅一名一物，為足互資考鏡也哉！（轉引自上海圖書館，2002：117-118）

李圭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數年後的1878年，適逢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受命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燾匆匆赴法，正趕上參加巴黎世博會盛大的開幕儀式，多次參觀世博園區，還參加了巴黎世博會的夜間活動，也曾多次參觀倫敦的水晶宮。光緒3年(1877年)4月12日郭嵩燾在他的日記寫道：

由維多利亞地方乘坐輪車，過代模斯江橋至克拉奔，向東行至蘭海，過兩小山，車路適出水晶宮後。貝爾迎於車次。入門皆玻璃為屋，宏敞巨麗，張架為市，環列百餘。其前橫列甬道，極望不可及。中列樂器堂，可容數萬人列坐（其右又一小樂器堂相對，亦容數百人，別為一院）。左為戲館，就坐小憩。又繞出其左，為水晶宮正院。巨池中設一塔亭，高可數丈，吸水出其頂。旁為海神環立，所乘若龍，兩眼吸水上噴，高約數尺，張口吐水，日夜奔湃。大樹環列烽十株，水晶宮最勝處也。曲折相接為巨屋，模仿各國形式……（郭嵩燾，2008：203）

光緒4年3月29日(1878年5月1日)郭嵩燾則在日記寫道應邀出席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典禮並視察中國館，亦多次親赴世博會場參觀各國展館，就曾慨歎日本展館布置優於中國館：

光緒四年三月廿九日為西曆五月初一日，於是日開設萬國珍奇會。外部瓦定敦致送與會票一紙，因偕李湘甫、姚彥嘉、德在初、聯春卿、李丹崖、陳敬如、馬眉叔及馬格里、日意格、斯恭塞格、高氏亞同往。至門，有兵官導之人，至大圓屋一所，周回向外。各國公使坐位凡分三段，公使夫人居中，右為公使，再右為公使隨員。前為平臺，張設甚盛。……出正門，因便至中國陳設貨物處，晤赫德、赫政、吉羅福、金登幹諸人，其英國相識者阿里克(阿禮國，英國駐上海領事)……。（郭嵩燾，2008：557-558）

光緒四年四月十二日偕丹崖、蕓齋、春卿至大會場。先由橋北西角門入，因至公所小坐。王承榮、馬錦章二人陪同遊歷。公所陳設華麗，牌樓亭樹，金碧輝煌。日本則以槿籬環之，中設小屋數區，隙地皆種花草，牡丹、矮柏各十餘本，並移植古樹數株，皆西洋所無，視中國為有清雅氣。隨過橋至會廠，陳設機器惟英、法、美三國。……凡遍歷各國所陳設物事(俄國、瑞士、希臘……)。五月廿八日偕黎蕓齋、聯春卿、馬格里一至會廠。由東大門入，略視法國陳列物事。……（郭嵩燾，2008：570-571，632）

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兼任駐法公使，雖然多次去巴黎世博會，參觀火炮廠和各種機器展品。他得悉歐洲各國不斷派人到巴黎世博會考察學習，在光緒四年八月

廿四日的日記中寫下：「新報載英國水師部尚書派水師官學總辦巴那畢及水師官安其尼爾加賴得來赴巴黎大會，考核水師軍器，以求有益實用。」也感慨地寫道：「各國人才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廣益，不遺餘力，中國漠然處之，一論及西洋事宜，相與譁然，以謂誇獎外人，得罪公議，至唐景星寓書李丹崖，切切焉以評論西人長處為大戒。中國士大夫憤憤如此，雖有聖者，亦且奈之何哉！」(郭嵩燾，2008：733) 再加上郭嵩燾公使駐英法期間，曾與英國人約翰盤(John Bourne)討論過在中國舉辦博覽會的可能性。光緒三年四月廿日的日記中寫道：「盤致書，極言英國富強之業一出於學問，而望中國加意振興，宜仿照法、美大國開賽奇會，招攬各國機器·以廣見聞，其言極詳。蓋盤專意成就上海格致書院，望中國為之主持也。」(郭嵩燾，2008：213-214) 隨後於四月廿八日，為上海設立博物院，郭嵩燾拜訪約翰盤商討於上海舉辦博覽會。盤言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阿洛伯獻議開設賽奇會，集萬國人民器物，設玻璃院海德巴園，以六閱月為期。於是各國珍奇畢至，房稅已多。而所造玻璃屋，英人聚資購之，就城外隙地建置遊觀之所，即今水晶宮是也，國家獲利甚厚。嗣是奧大意(利)、美利堅相踵為之，明年法國復開此會。上海博物院略仿其意，不獨有益中國學問，即國家亦必稍有所利。(郭嵩燾，2008：220-221；青山治世，2010：74) 郭嵩燾也曾與東亞的後起之秀日本的駐英公使上野景範請教過日本舉辦博覽會(內國博覽會、勸業博覽會)的情形與經驗。在他光緒三年九月廿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適日使上野景範在坐，因問：「日本一切取用西法，亦設有博物院否？」因言：「東京近三年蓋造一院極宏麗，名博覽會。日本三島分三府三十五縣，各悉其物產分置院中(外國亦聽入)。按地段繳納租價，而官計其本利，為定一價，按所陳貨刊刻准單，視市價稍平。入觀者皆給錢，乃聽入。於是趨市貿易皆集院中，為東京第一繁盛之區，國家亦因而收其利。隸之內務省，所謂勸業博覽會者是也。此亦炫奇會之一端，故名內國博覽會·專會聚本國物產。」因問各國開設炫奇會，日本赴會，國家公用幾何？曰：「每次出國幣三十萬圓，並約不可逾此數。」曰：「然則各國此會，間歲一開，所費不亦多乎？」曰：「奧國此會耗費極多，約略計之，至少亦二十萬圓。為各商人販運各物，出鬻者無多，其本大耗。去歲美國此會，出入兩足相抵。」問其章程何如？曰：「國家為租炫奇會院房屋若干畝，轉租之商人。其物產有運之商人者·有運之國家者。如五金、土石及木質堅韌種類之別，國家為收聚以相比合，其運費皆國家承認。商力不足則貸之國家，各視所出鬻，得息幾何，按數輸之國家，以收其息，是以所鬻多則利厚。」曰：「三十萬圓用款，能盡收還乎？」曰：「所爭差無幾。大率國家遣派戶部

侍郎一人經理其事，亦有支銷；在本國各處收集物產，亦有使費。所耗不過如此。（郭嵩燾，2008：349）

郭嵩燾有駐英兼駐法的天時地利之便，多次親歷1878年第3屆巴黎世界博覽會，接觸過國內外世博會的學者專家，也曾慨嘆國人漠視不談世博會。郭嵩燾有此感慨，肯定與他撰寫的《使西紀程》在此前一年（1877年）被國內士大夫激烈批評一事有關。《使西紀程》由總理衙門委託京師同文館出版，在中國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士大夫們認為郭嵩燾已中洋毒，並對他展開激烈抨擊，特別是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結果朝廷命令將《使西紀程》毀版。郭嵩燾通過西方人對舉辦世博會不遺餘力的態度看出其長處，更對中國士大夫的蒙昧感到悲觀失望，並進行批評。他對世博會的高度評價和對中國士大夫的批評，都只在未出版的日記上記載，並沒有傳入當時中國官界和士大夫階層，殊甚可惜。（青山治世，2010：73）

在郭嵩燾筆下的世博會雖為萬國珍奇會、博物院、賽奇會、賽會、聚珍會、珍奇會、炫奇會、百年大會云云（參見郭嵩燾，2008：213-214，220-221，327，349，415，498，547，557-558，628-629，629），但郭公使對世博會的認識已漸漸脫離「賽珍炫奇」的意義，發現世博會的價值，進而主張仿效美國、法國的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吳海勇，2010：14）伴隨郭嵩燾公使左右的幕僚，有專職翻譯張德彝、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公使參贊黎庶昌等，皆滿清政府一時之選。他們各有行動，不僅親自見證巴黎世博會之盛況，且有文字傳世。張德彝在1878年巴黎世博會開幕前就迫不及待地參觀了世博會，他的日記還記錄了開幕儀式以及當晚活動的盛景。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除稟報自己在巴黎的課業之外，也述及自己遊賞世博會的觀感，對洋人代辦中國參博展品發表諸多意見。雖然馬建忠在用字仍以「炫奇會」，卻見「賽會」之陳義，已跳過去中國官員與讀書人對世博會的刻板認知，認為世博會意不在炫奇，而在誇富宣揚國威。蓋在令法國人顏面盡失的普法戰爭結束7年，法國政府想在1878年想舉辦第三屆巴黎世博會，向法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法蘭西要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

來，繼續承擔法國在人類文化的領頭羊角色。

……近日工課稍寬閒，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輻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游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之本意哉。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參見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記言卷二之〈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另黎庶昌親歷1878年巴黎世博會，完成〈巴黎大會紀略〉收錄於其《西洋雜誌》一書，寫下這樣的文字：「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中曆之光緒戊寅年三月也，法國開賽會堂於巴黎，至冬十月盡而散，名為哀克司包息相(exposition)。先未開會之前一年，法以書遍騰各國，請以珍物來會。至是，殊方異物珍奇瑰瑋之觀，無不畢至。其堂建於商得媽司，舊時練兵之所。巨厦穹窿，梁柱棖桷，悉皆鐵鑄，而函蓋玻璃，下施地板，東西相望。外綴園亭池館，市肆酒樓，規模壯闊。自西洋賽會以來，詫為未有。余數數往觀，默誌厓略，蓋千百中之十一耳。」（參見黎庶昌〈巴黎大會紀略〉）雖然在《世博讀本》作者宋超看來，〈巴黎大會紀略〉是目前所知關於這屆世博會最詳盡的中文文獻，不過黎庶昌對1878年巴黎世博會的記述，仍屬摘要並無太多評論。對世博會的認知，亦不出「炫奇賽珍」之說。（宋超，2008）

另1870年代與1880年代的中國新聞報刊如何看待世博會？張學勤在〈中國提出舉辦世博時間早於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文，點出西元1880年中國大地上還沒有出現過任何形式的博覽會。極大多數中國人對博覽會還相當陌生，認為舉辦博覽會「人則徒事跋涉，事則大類浮囂，誠屬無理取鬧之甚矣」。少數與洋人有所接觸的中國商人，則將博覽會視同可以與會博取一些小利的中國廟會，而當時的中國官員甚至認為廟會是鬧事的場所要加以嚴禁。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英國商人Ernest Major於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創辦的《申報》出現闡述博覽會意義、倡導辦博覽會的新聞報導就引人興趣。在清代末期，博物院一詞使用上

有兩層含義，一個等同於博物館，一個等同於博覽會。1872年6月13日第2版的〈論東洋博物院事〉說的就是博覽會，直言博覽會在廣見聞、備器械、精格致、鬥智巧，而非炫奇鬪異而已。

近聞東洋博物院已展期至六月初一日為止，奇珍異物多有由他國來睹賽者是可觀也，有一友人往看氣我多博物院者歸為子言曰其事系屬創始亦稱美舉，然未盡各國之奇器各方之名寶也，蓋此院之設原為廣見聞備器械精格致鬥智巧起見，而非僅侈瑰奇新異之觀玩弄供設之寶而已也，故即機輪之疾製造之工，有此國所不能為而彼國已為之者，有此國所未及成而被國已成之者，使盡羅之以置於博物院中，則不難互相師法互相仿造，而奇技異能有無所不盡之妙矣，今東洋所陳各國奇器甚少，倘下次舉行時能先行通知歐洲諸國，庶可使無物不備無妙不泄矣，而豈玩物喪志之謂哉。(轉引自史夢遙，2014：71)

1872年11月26日第1版的〈論奧國博物院事〉說的也是博覽會，指出博覽會可以遍覽宇宙中之珍異新奇，且可考較各國物產窺其智巧，豈為驚音炫異之舉而已。

博物院之創設于歐羅巴各國也，將以遍覽宇宙中之珍異品物新奇器具也，且可以得何國之好尚最正，知何國之物產最佳，由是而識其土俗窺其智巧，庶以集各國之成焉，豈第為驚音炫異而已哉。考其事創于英廷僅在三十年之前，耳其後各國效法日盛月新，蓋知其事實有裨於交接之道，所以廣增貿易，所以加精技藝豈不美哉，故各國皆已次第舉行爭先睹之為快矣。茲奧國已擬于明年英四五月間新設一大院，……其院之大如此所以容積夫宇宙之珍異品物精奇器具與夫各國所好尚尊崇土宜物產者也，奧國官憲業已照會各友邦上國普示民人各獻異爭新以贊助其大舉焉，茲聞本朝深體夫柔遠之意慕善之忱已派關東之西稅務司前赴奧國京都司管華人所投進陳設之品焉，……中土物產如綢緞經緯金翠彝鼎博古器皿著名書畫咸可投入，如有甚洽董事之意者則必優得花紅即不甚洽董事之意者亦可售以善價，否則名馳於域外而貨仍歸於家中亦有大利益之事也，何勿出其所藏而一試之尚弗徒作枕中之秘席上之珍也哉。(轉引自史夢遙，2014：72-73)

除西方商人所辦的報紙談論博覽會之外，還有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辦的中文報刊的傳譯，依據李軍有關19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中文報刊對中國早期博物館知識傳播貢獻的研究，在傳教士中文報刊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博物院」一詞被大量使用，「博物院」一詞的意義大概包括了博覽會與近代意義上的博物館。這一時期的《萬國公報》及其前身《中西聞見錄》等新教傳教士中文報刊，刊載了大量關於世界各國舉辦博覽會的資訊。如1872年的《中國教會新報》就報導了日本、奧斯地利國等國家舉辦博覽會的消息。例如：「奧斯地利國今年開設博物院，地方房屋廣大，較前各國所開之博物院倍之，早已登報中，今聞奧國訊息云：各國送到

各種物色，以及大小機器甚夥，所備院屋實屬不敷，即今趕緊添造房屋。」除使用「博物院」一詞指稱博覽會外，有時也使用「博物炫奇會」、「炫奇會」、「博物會」等名稱，如上述奧斯地利國新聞的後續報導中，就使用了「博物炫奇之會」，而關於1876年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的報導，也同時使用了「炫奇會」和「博物院」的稱呼。(李軍，2015: 12-13)。

甫進入1880年代，第一年(1880年)年初日本派人前來接洽想在《申報》刊登有關日本舉辦博覽會的一則廣告，主要內容如下：

日本西京舊開設博覽會場。今于光緒六年正月念一日(廿一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相當於1880年3月1日到6月8日)，計為期百日。啟請四方君子惠然肯來。物則不拘新舊，地則不論遐邇，期踴躍奔赴，以助斯會。

經檢視日本博覽會史的資料(參見山本光雄，1970: 48)，該廣告指的博覽會應該是明治13年(1880年)3月1日到6月8日在京都舉辦的第九屆京都博覽會。這則廣告見報後，《申報》即於當年2月17日以頭版頭條形式，刊載「論博覽會有益於地方生意」的社論，認為舉辦博覽會是很有效的通商舉措，更能發展地方經濟，還能有效開啟人的智慧，舉辦博覽會好處多多。顯然《申報》的這篇社論世希望中國也能舉辦能夠開啟全民智慧與推動地方經濟的博覽會。《申報》因應1881年3月初有個叫「加葛理」的義大利人在上海高談想召集各國之人在1882年上半年的上海興辦一博覽大會，連發社論希望中國也能舉辦世博會，1881年3月9日的《申報》發表「論創會」社論。主要論點：(1)舉辦博覽會非常有利於招徠生意，上海的商業現狀需要博覽會。(2)中國人得以大廣其見識，一新其耳目。(3)中國如能持續舉辦博覽會，招商製造會越來越多，還將與西方各國並駕齊驅。1881年3月11日《申報》社論「續論博覽會」再次以頭版頭條的形式，樂觀看待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可能性。這三篇社論對博覽會的意義有了闡述，對舉辦博覽會有了更熱切的期盼。《申報》在1893年5月1日也刊載「西人賽會議」與1896年3月2日「賽會以開民智論」。《申報》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這幾篇系列的社論，有助於中國人認知博覽會的價值，為中國日後舉辦博覽會事業做了重要的奠基，也可以窺見當時新聞從業人員

對博覽會有助通商、展經濟及開民智等等好處的掌握，也開始援引使用日本人慣用的「博覽會」字眼。(參見張學勤，2010；洪振強、艾險峰，2009)

(三)1890年代起認識到世博會「評獎賽會」的殖產興業功能

進入世博會觀念日漸轉折的1890年代，張蔭桓繼郭嵩燾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出使英、美、法、德、俄諸國。雖然他是滿清政府少數幾個曾經出洋、懂洋務的外交官員，相較於郭嵩燾，張蔭桓的觀念要傳統得多，駐美期間對世博會曾有這樣的認知評論「西俗喜賽會，炫奇鬥勝者，是隋煬帝窮極奢侈的風氣傳到了海外，迂廓無稽」。但在歐風美雨的熏沐下，張蔭桓很快以實際行動修正了世博偏見。再到崔國因於光緒十五年三月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在1893年美國芝加哥世界哥倫布博覽會活動的觸動下，重新認識世博會的意義：「因查賽會一事，即《周書》所云『奇技淫巧』也。然商王以玩物，而泰西以利用，其用意不同焉。……若夫農桑之利，便民之方，算學、化學、重學、光學，無不各出心思以求精，進富強之業基焉，甚未可以奇巧而斥之也。」(轉引自吳海勇，2010：15) 中國士宦參觀世博會，逐漸刺激中國人對世博觀念的改變。

1893年鄭觀應出版《盛世危言》，在〈賽會〉乙節，闡釋西方國家振興經貿商務發展以加速國家發展是以舉辦世博會開始，並將世博會的宗旨與歷史作了簡要的整理，最終提出「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等舉辦博覽會的主張。〈賽會〉論述擇要如下：

泰西以商立國，其振興商務有三要焉：以賽會開其始，以公司持其繼，以稅則要其終。賽會者，所以利導之也；……中國於此三事皆未能因時制宜，取長棄短，無惑乎日日言商務，而商務愈不可問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人工有巧拙精粗，物質有良窳美惡，自然之理，必至之情也。得彼之法而亦趨亦步，則拙者有時而巧，粗者有時而精，守我之舊而不見不聞，則良者可轉而窳，美者可轉而惡。此泰西各國所以有博覽會之設也。……溯賽會之事創之者，英京倫敦；繼之者，法京巴黎。嗣後選相舉賽，各國亦起而踵行。奧則設於維也納，美則行於斐刺鐵蜚，日本則舉于東京。萃萬寶之精英、羅五洲之珍異，百年之內，炫異爭奇。此亦萬國大通必有之事矣。洎我聖清光緒十九年，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美人賽會于希加哥，為科布倫探獲美洲之日，閱寒暑四百周，其氣象規模尤極天下之大觀，為古今所未有。……美人于此一會不惜工本如此，豈特以為觀美哉？誠以“一物不知，儒者所恥”，而萬物皆備，聖功所基。此會角九州萬國之珍奇，備海瀕山陬之物產，非此不足以擴識見，勵才能，振

工商，興利賴。(參見鄭觀應《盛世危言》之〈賽會〉乙節)

1897年劉楨麟發表〈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一文，直言：「…夫恤商惠工條理萬端，而提倡風氣闢啟津途，可以破華商之愚、懲華商之偽、勸華商之勇、擴華商之見、合華商之勢，使小者大、因者創、拙者巧、詐者信，孰有先於賽會者乎。……故中國不興商務則已，中國而興商務必自賽會始，吾今請言中國賽會之利有八，使天下之主持商務者或有取焉。…一曰聯交誼、二曰擴物產、三曰獎人才、四曰察商情、五曰廣貿易、六曰增關稅、七曰興商地、八曰除積習」。

張謇曾在1896—1897年間向朝廷上呈〈農工商標本急策〉，提出舉辦博覽會是振興實業的重要途徑。張謇認為：「工務亟宜開，開導之計有二，一如各省開勸工會。試辦不甚難，但須上有提倡，並立獎格以鼓舞之；一派大員集合資本，博采各省著名精巧之器，入巴黎大會，並選挈名商慧工同往，察視各國好尚風俗，以便推廣製造。」1901年他在《變法平議》中更把舉辦博覽會列為改良政治，振興實業的一項變法內容，認為「博覽會尤有益於工」，通過商品的展示、比較，「良楛並陳生競心，新奇多見生巧思」，對「最精良者給以賞，或助其銷路」，必能為「勸工之助」。在1903年東渡日本參觀大阪內國勸業會之前，張謇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博覽會展示、比較、競爭與勸業精神。(黃鶴群，2010：148) 另據趙祐志的研究指出，1895年甲午戰後，中國在西方和日本的強大壓力下，繼「兵戰」之後，開始轉向提倡「商戰」，朝野對博覽會的認知，漸漸由「聚珍炫奇」到「評獎賽會」，博覽會的殖產興業的經濟功能受到重視，博覽會一詞更常被譯為「賽會」。(參見趙祐志，1997：291-294) 在馬敏教授〈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的論文，亦指出：「(1894年)甲午戰後，中國在西方和日本的強大壓力下繼「兵戰」之後，復倡「商戰」，振興工商實業的輿論騰播而起，朝野對博覽會功能的認識始由「炫奇」和「邦交」向「商利」和「爭競」轉化，博覽會的經濟功能得到重視。」而博覽會一詞開始被更多地譯為「賽會」，顯然受到中國古時集期廟會和迎神賽會的影響，賦予其集慶典、娛樂、社交、競賽和貿易為一體的內涵及功能，但卻去掉了廟會和迎神賽會的宗教性功能。對此，1921年直隸實業廳公署編的《巴拿馬

賽會直隸觀會叢編》的序言曾有清楚的說明，博覽會三字東譯也，我國則譯曰賽會。賽會之事，我國自古有之，但其事為定期之市，於今世之所謂博覽會者有大小繁簡之不同。(馬敏，2004：101)

1900年八國聯軍迫使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逃往陝西，最終滿清簽下《辛丑和約》，付出龐大的賠款。在風雨飄搖之際的滿清政府，積極推行新政以救亡圖存。慈禧太后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據當時上海的《東方雜誌》報導，滿清政府調撥府銀75萬兩(50萬美元)鉅款，首次以官方名義參加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1902年底慈禧太后任命溥倫貝子為清政府世博會參展團的正監督，負責一切赴會事宜。同時還任命黃開甲為副監督。黃開甲是晚清首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耶魯大學學習，熟悉美國情況。黃開甲先期赴美，負責具體布展事宜。滿清政府除撥出鉅款參展之外，慈禧特別派出溥倫貝子率團赴美主持中國館開幕，並帶著慈禧的私函與親筆簽名玉照轉赴華府會見老羅斯福總統。「慈禧太后畫像」是當時中國參展品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從居蜜博士編寫的《1904美國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所發掘的史料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愚昧無知的慈禧，也不是一個顛預腐敗的清廷，而是一個懂得如何與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立私人情誼的大清統治者，與一批充分理解文化外交重要性的洋務大臣。(居蜜主編，2010) 1904年滿清皇室溥倫貝子擔任清帝國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參展團正監督，負責一切赴會事宜，溥倫在參加完中國館的開幕式後，溥倫還遍遊三藩市、芝加哥、華盛頓等各大城市，參觀學校、工廠、博物館、港口、軍事機構以及監獄等福利機構。與十年前同樣在美國掀起熱潮的李鴻章不同，溥倫帶給西方世界的是一個謙和、敢於接受新鮮事物且具有新思想，立志圖強的年輕貴族形象，《紐約時報》還是將他視作滿清皇室中最為民主的成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時，表達了中國不甘落後於日本的決心，以及要向西方學習，振興國脈的信心。自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回國後受到重用，任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是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一。

邁入20世紀的滿清興起了一股競辦實業及舉辦博覽會的熱潮，聖路易士世博會

召開前後，地方大員張之洞在湖北大辦洋務新政的過程中，為促進湖北的商業發展，他提出了擴充湖北商務的十條舉措，最後一項即為「賽工藝」。曾言「天下事有粗觀類遊戲，而實隱寓富強之意，其西人之賽珍會乎。」所謂賽珍會者，「聚五洲之物產，羅各國之珍奇，品評優劣高下以行其賞賚，或得金牌或得寶星，增識見廣聞。」除對這類商品賽會的一般特點進行論述外，他還特別提到賽會在振興商務方面的獨特功用。賽會上所展陳的物品，一經品題，身價十倍，其效果顯著，用意深遠，乃歐洲振興商務之一大關鍵。1903年為籌議變法，張之洞上奏〈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其中第五條為勸工藝。指出世人多謂西國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國之富實以工，並提出勸工之道有三，一曰設工藝學堂，一曰設勸工廠，一曰良工獎以官職。三事並行，中國工藝自然而進。應如何開展勸工藝？張之洞強調了賽會的作用，言「西國常有賽會之舉，聚本國他國之貨物，萃於其中。」張之洞建議仿效西方及日本賽會，在沿江沿海及內地各省大城巨鎮設立勸工廠，備列本省出產貨物、工作器具，讓人參觀，比較優劣，自相勉勵。(馬敏，2010b：80，2010c：)。在晚清地方大員中，張之洞較早認識到商品賽會對振興工業與商業具有重要作用，是西方發展經濟的重要舉措之一，因而大力提倡仿效推行。正是在張之洞這樣的封疆大吏們的籲請下，清政府開始變更其工商政策，鼓勵民間出洋參加博覽會和在各地舉辦各式各樣的商品賽會。

同年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亦認為：「西人賽會為商務最要關鍵，為工藝第一戰爭，洵中國今日亟應舉辦之端」，以及吉林將軍長順上書稱博覽會為商戰當務之急，言曰：「今與列國開門通市競爭雄富，號為商戰之時，人皆開通，我獨自守，斷無能勝之理，今日舉辦賽會實為當務之急」。就在1903年9月7日，滿清政府為宣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設立商部，任命載振為尚書主管商部。1905年清朝商部頒行「出洋賽會同行簡章」20條，表態支持商人出國參加萬國博覽會，號召各省商家精擇物品，踴躍赴賽，並改變過去將賽事委諸海關洋員包辦的做法，由政府和民間紳商聯合置辦賽品赴賽。而在發想舉辦世博會方面，1902年11月梁啟超發表《新中國未來記》描繪1962年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的盛景。1905年吳趸人(沃

堯)發表小說《新石頭記》，幻想上海浦東成為會場開辦中國的世界博覽大會。1910年陸士諤的《新中國》寫的是1928年上海舉辦內國博覽會，無疑這與聖路易士博覽會的轟動一時有關。(參見馬敏，2004：101；邢建榕，2010；張偉、黃薇，2010；吳海勇，2010：15)

此時值得一提的是為新政清廷派出五大臣分率兩支考政大軍周遊世界，不期而遇西方世博會的這段歷史。端方、戴鴻慈一路的考察任務較為繁重，匆匆行過12國，在返國覆命前夕，卻在義大利遇見米蘭世博會。依據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所載他們前往參觀米蘭世博會的養蠶業館、機器館、菸草業館、軍器館、寶石館、油畫館、法國館，參觀各國家館之後，評論認為法國館規模最為宏闊，而對比中日展品，覺得「日本精心銳力出賽，賽品皆其上選，駸駸乎有追步英德之概，獨我國局面太狹，……殊無足觀者，幸漁業公司尚可自成一結構耳。」(戴鴻慈，2008：503-505) 另一路考政大臣載澤在參觀了美國某大學博物館後，在其《考察政治日記》也寫到：「詣博物館，內有一室列中國物，大半華商賽會時所遺，陳列無次，且多粵中窳劣之物，徒貽訕笑於外，深為愧疚。」(載澤，2008：593) 看得出當時滿清大臣們的反省和自責。考政大臣歸國後，積極建議推行憲政之外，1908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兩年後的2010年，中國首次全國性勸業博覽會的名洋勸業會在南京成功舉辦。(吳海勇，2010：15)

端方、戴鴻慈等人當時或許並不知道，在米蘭世博會成功舉辦漁業展覽的幕後推手是曾積極主張舉辦博覽會以振興實業的張謇，但端方倒是深摯期許參加過聖路易士世博會、曾隨五大臣出洋考察、後又倡議舉辦南洋勸業會的陳琪，能夠成為中國近代博覽會之第一人。1904年美國為紀念聖路易購地百周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中國應邀赴會。因陳琪精通英語，受湖南巡撫趙爾巽委派，前往美國負責陳設湖南湘繡、青田石雕等展品，並進行實業調查。博覽會後他又轉道歐洲，赴德國考察陸軍。此行陳琪花一年時間，遊歷了日、美、英、法、德、俄、奧、意、葡、西、比、土等國，考察各國的風土民情、工商農礦、政教軍事，歸國後著有《環

遊日記》、《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遊記》、《漫遊記實》等。第一次出洋歸國後，即在《擬陳湘省工業次第興辦事宜稿》中提出設陳賽土物廠，以振興實業，也就是在國內召開博覽會。陳琪指出各國市面每以賽會而驟增興盛，倫敦及巴黎世博會以來，美國東方接踵而起。雖然萬國博覽會一下子不可能舉辦，但像日本一樣開辦勸業工廠和舉辦內國博覽會等還是可以做到的。首先在省會城市中心設立陳賽土物廠，年設會市四次，招募全省工商廠家參賽，給以錦旗或賞牌的獎勵。試辦一年，待陳賽土物廠稍有成效，就可以開辦內國博覽會，「聚各省之精華·比較優劣，明定保護賞勸之章，使工商未能者專心肄習，已能者精益求精，工業之興指日可待矣」。(蔡克驕，2001：308；謝輝，2005：70；林芳，2009：15-16，24-25)

1905年12月陳琪又隨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其間先後參觀了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比利時黎業斯博覽會、義大利米蘭世界博覽會等。通過這些考察活動，陳琪迅速對博覽有了全盤的掌握。陳琪歸國後升任道員，時端方任兩江總督，調陳琪到江蘇，負責兩江督練公所教導處。陳琪對博覽會能促進農工商務繁盛深有體會，自第一次出洋考察歸國後，在《擬陳湘省工業次第興辦事宜稿》中提出要召開國內博覽會後，一直掛念此事，他曾向端方建議舉辦國內博覽會，最終1910年在陳琪的策劃主持之下，舉行了空前規模的全國性勸業博覽會「南洋勸業會」。(蔡克驕，2001：308；林芳，2009：15-16)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刊行的《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遊記》又名《美洲博覽會記》共14章，8萬餘字。在第一章「緒言」中，陳琪點明該書宗旨在師人之長補己之短，言曰「拉雜成帙，以告我同胞，俾未遊斯土者曉於商戰之劇烈，會所之內容，大勢之趨向，鄉土之缺乏。或可效善良之習尚，生妒慕之熱忱，各以改良進步相勸勉，尤吾儕所馨香頌禱而以望我同胞者也。」以後各章記敘了聖路易大會之緣起、中國赴賽之歷史、會場大概之情形、各展廳之陳列、遊觀、會展大事記、花絮等，最後一章為「外論」，附錄海關辦事情形，華商、華工在美洲的情況，以及陳琪為中國參與比利時黎業士賽會所上的條陳。(林芳，2009：16-18；謝輝，2005：65-66；蔡克驕，2001：310-311)

陳琪認為博覽會的設立是「用以集合群力，薈萃眾長，以資比較而促進」，類型上有專門的博覽會「羅列某類物產，供人展覽，凡一藝、一能之改良發達以之」，有普通的博覽會「廣征各類物品，用備觀摩，農、工、商各業之改良發達，莫不以之」，類別上指出「外國賽會，種類至繁，為地方勸業會，為內國勸業博覽會，為萬國博覽會，此綜合物產之全體者也。」他認為舉辦世界博覽會的難度最高，國內博覽會次之，赴他國參展又次之。而舉辦博覽會的功能有五：(1)博覽會可樹立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助於睦鄰邦交、國民外交。(2)博覽會是交流與競爭的平臺，以開闊眼界發現缺陷，一方面汲取經驗彌補不足。(3)博覽會能促進商品貿易、實業發展，為新政的推行籌措財源。(4)舉辦博覽會有助於社會經濟發展(5)博覽會為國民之大學校，具有教育大眾的作用。最終在中國的博覽會事業經營方面，首先建議先收回自1873年至1905年間由外國人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控制的中國國際博覽會承辦權。1905年1月陳琪拜訪駐比公使楊兆璽，並上呈《赴比賽會條陳》，開宗明義地建議赴賽監督「似不宜用外人，以傷國體」；其次建議汲取先進國家舉辦博覽會的有益經驗，以期為我所用。他主張中國參加國際博覽會應達成以下列幾個目標：一是促進國內經濟繁榮，國際貿易興旺，擴大稅源；二是引進外資，增進與國外的經濟聯繫，與外國結成經濟聯盟，進而升格為國家同盟，締結邦交；三是借參會之機學習吸收西方物質文明，發展教育；四是借鑒西方發展經濟之舉措，奮起直追，振興實業；五是貿易既盛，必然對運輸業有新的要求，海陸運輸隨之將興，拓展交通。最後，提出在國內自辦博覽會的具體方案。以興辦南洋勸業會為例，應注意五項要點「宗旨宜純、範圍宜小、體制宜崇、褒獎宜優、籌備宜速」，陳琪認為自辦賽會應循序漸進，先在省會城市開辦陳賽土物廠，待稍有成效後，再舉辦國內博覽會。他還主張應當官商合辦，實行保商政策。(參見林海曦，2015：256-259；謝輝，2005：71；林芳，2009：19-20) 陳琪清楚認知意會什麼是博覽會，也深知為什麼要舉辦博覽會，進而能建議如何發展中國博覽會事業，堪稱中國近代博覽會之第一人，也標示著中國官宦士商對博覽會以有通盤的認識。

綜上所述，晚清官員與知識分子對博覽會的認識猶十分模糊，仍以「天朝上

國」、「迎神賽會」等觀念來對待新事物。對世博會的意會，大多視為無關宏旨的「賽珍炫奇」之舉，當然也含有中國傳統士大夫鄙視蠻夷為「奇技淫巧」之癖性，大致不出聚珍、炫奇、賽會之辭。另有一說，陳占彪在〈論清末民初中國對萬國博覽會的三種認知〉一文，則從早期的世博會視為「賽奇會」是國人對早期對世博會的認知，這正是遊戲賞玩新奇事物的一個側面反映切入。有趣的是滿清時期不同身份的人員先後觀覽歐洲世博會，也都多次遊覽重建後的水晶宮(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主場館)並留下記錄，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早期接觸世博會的國人對世博會的認知。1866年4月2日，張德彝等人來了錫德納姆山的「水晶宮」，之後張德彝等人於1866年的4月4日、4月21日、5月11日，以及1868年的9月8日、9月13日先後多次遊覽水晶宮。在張德彝的記載中，水晶宮無異於一個「遊樂園」。1868年，另一個中國文人王韜也來到歐洲，在觀覽巴黎世博會的舊址後，王韜也來到英國觀覽了大名鼎鼎的「水晶宮」，在王韜的記載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當時「玻璃巨室」(水晶宮)裡的熱鬧情形。8年後的1876年，另一個中國人李圭也參觀了這座水晶宮，為我們留下了關於「葵色爾巴列斯」(Crystal Palace)的現場記錄。張德彝、王韜、李圭記載了「水晶宮」熱鬧非凡的娛樂新奇景象，影射到世博會的觀奇性質，或可說明在早期世博會的記錄文字中，張德彝、王韜、李圭等人將世博會稱為「炫奇會」、「賽奇會」，這也反映了他們理解世博會具有娛樂新奇的意義。(陳占彪，2000：152-154)

二、日本人怎麼看待世博會

雖說明清政府的中國與德川幕府的日本同採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但早在1720年被譽為江戶幕府中興之主的德川吉宗(比康熙晚30年出生，)下令准許輸入與天主教無關的西方書籍後，緩解禁書制度，從此西學的傳入速度加快，逐漸形成研究攝取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學問的蘭學，使日本產生一大批具有革新精神和近代西方科學意識的蘭學家，把西學源源不斷的輸入日本，為變革中的日本社會培育大批人才，為日本的現代化埋下種子。另享保5年(1721)，德川吉宗確保藥材貨源，積極推動藥材國產化，派遣採藥使分赴日本各地調查採集各種藥材藥劑，享保9年

(1734)吉宗下令擴大對各藩、天領(將軍直屬領地)、寺社領地進行藥草、藥石(礦物藥)、鳥獸、魚介、昆蟲等進行全國性物產與自然調查，在吉宗的政策裡，物產學和殖產興業緊密相連。吉宗的緩解禁書與全國性物產調查之策，帶動江戶後期百科全書與博物學的蓬勃發展，也為幕末的藥品會、物產會，以及明治時期的出洋參與世界博覽會與自己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打下基礎。(伊藤真実子，2012：63-66；蘇碩斌等譯，2010：138-139)

(一) 1860年代日本將博覽會意會為「廣為展示，萬民觀覽」場會

日本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正式參與1867年法國第2屆巴黎世博會，這一階段的日本官員與社會菁英對世博會的看法，比較上把「博覽會」意會為「廣為展示，萬民觀覽」之場會。與中國滿清政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經驗，在幕末的文久(1861-1864)、元治(1864-1865)、慶應(1865-1868)年間的外交文書，有關博覽會的用詞常見的有觀覽場、展觀場、展覽場、博物場、博覽場、賽場、博物會。(寺下勅，2005：52) 當時官方對博覽會的認知，以「觀覽」為其基調。而「博覽會」一詞的出現，係栗本鋤雲在1864年日本幕府首度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參加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的時候，當時駐日大使羅休斯曾探詢幕府監察官栗本鋤雲日本參加巴黎世博會的可能性，栗本當時參酌大使的書記官卡雄(Merume Kation)告知Exposition具有「廣為展示」的意思，以及日本當時本草學領域所舉辦物產會的經驗，將法國在隔年要召開的Expostion巧譯為「博覽會」，有「廣為展示，萬民觀覽」之意。寺下勅筆下這位創造「博覽會名詞之父」的栗本鋤雲眼中，博覽會指的是能夠讓物產展示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寺下勅，2005：52；椎名仙卓，2005：6-7)

在栗本鋤雲將法語的Expostion譯為「博覽會」之前的1862年，日本竹內使節團參與了第二屆英國倫敦世博會，對於往後日本的世界博覽會事業有極大的影響。竹內使節團的成員如淵邊德藏、福澤諭吉在參觀倫敦世博會之後，立刻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政策涵義，淵邊德藏在他的著作《歐行日記》中提

到，日本還不理解博覽會具有將物品集中展示，讓日本的產品有效推廣出去的效果，只拿一些粗俗的展品聊備一格，殊甚可惜。摘錄如下：

原本此展覽之企圖，在以博覽各國產物之名、匯集海內外之商人，使其各國所誇之產物、製品、器械等為人所見，以增多本國產品輸出而獲取利益；是以，為在此展場推出品項，除須支付大量稅金，亦須不惜資費自遠海專誠運送國產，以廣為各國人所知。精選之展出品項，若在展覽之時即被直接求購，多亦樂於盡量出售。……本國則因尚未諳此意，未能積極賣弄產物於他人，是以僅推出如此粗物。（轉引自蘇碩斌等譯，2010：110）

另一位竹內使節團成員的福澤諭吉，理解到世博會的意義。福澤諭吉在數年後的1866年所著《西洋事情》一書，在「博覽會」一節寫下「將千萬種物品置於一大廈內排列，在五六個月之期間供眾人觀覽」，並指出博覽會的意義在於「藉由嶄新器物的陳列，以達到相較相學，取他人之長以利己，有如智力功夫之交易」。（呂紹理，2005：77）西洋大都會每隔幾年都會設置物產大會，向世界公告徵集各國名產如便利的器械、古物奇珍，向世界各國人民作展示，這樣的展覽會稱之為「博覽會」。同時福澤諭吉也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全日本，甚至普及到其他漢字體系的國家。原文摘錄如下：

「故に西洋の大都会には、数年ごとに産物の大会を設け、世界中に布告して各々其国の名産、便利の器械、古物奇品を集め、万国の人に示すことあり。之を博覧会と称す」（轉引自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

實際上薩摩藩和佐賀藩積極爭取代表日本政府參加1867年巴黎世博會，有威脅到德川幕府的威信之勢，幕府才有派遣使節團對外宣揚幕府的權威及其政權的正統性。最終德川幕府決定參展，經由「法國通」栗本鋤雲的居中協調，由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席，隨團的有幕府的澀澤榮一與博物學者田中芳男、佐賀藩的佐野常民及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等人，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因為這些團員日後成為明治維新與日本博覽會事業發展的功臣，並且讓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現代化的國家。參展與舉辦博覽會無疑是日本現代化與歐美各國從事技術交流的窗口。

當時德川幕府的博物學者與蘭學者田中芳男，應法國世博會之邀，收集整理日

本的昆蟲標本56箱參加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博會，停留在法國10個月的期間，除巴黎世博會會場之外，深入考察各地的博物館，奠下日後日本廣設博物館的基礎，日本人也稱田中芳男為「日本博物館之父」。回國之後，日本政府為了殖產興業把勸業寮升格成物產局之外，也積極提倡舉辦博覽會。

當十八九世紀歐洲博物學發展地如火如荼之時，藉由與荷蘭的貿易吸收西方知識的日本，也產生了類似西方「自然史圖鑑」的圖像，以及專門繪製此類圖像的畫家，帶動現今學界所稱「江戶博物學」的風潮。江戶時期有關自然科學的研究，其名稱及概念亦相當含混，有舊時「本草學」之延用，亦有「藥品學」、「物產學」、「名物學」等等的稱呼，範圍通常是以漢方醫(中醫)為基礎，逐漸擴散至非關藥物的自然界生態。雖然以本草學為中心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自古以來就不曾中斷，但18世紀中葉的研究之所以特別興盛，一般認為是1716年幕府將軍德川吉宗推行「享保改革」，以因應自1707年富士山火山爆發以來的政治及經濟困局，其中一項措施為1735年在國內展開物種調查，以扭轉日本大量仰賴進口物資的情況，史稱「享保元文全國產物調查」(1735-1738)，由此帶動江戶中晚期各地藩主與武士對動、植、礦物的搜集與研究。所稱的「博物學」基本上是對譯西方「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概念，此種對譯的說法，通常以1879年伊藤圭介所著《本邦博物起源沿革說》及《博物學起源沿革說續》二書為基準。伊藤圭介為日本蘭學家、植物學家、東京大學教授、理科博士，晚年受封為男爵。伊藤圭介曾於1828年翻譯Carl Peter Thunberg所著的《泰西本草名疏》為日本現代植物學研究的開端，其門生田中芳男除建立日本現代動物學研究之外，並首次提出「博物館」此一詞命名1869年明治政府新設立的自然科學標本展示設施。在1860年代，曾出現有「博物館」、「展觀場」、「寶藏」、「寶庫」、「古物有之館」等等稱呼。(謝休容，2013：33-35) 1871年設置的文部省博物局曾經對以「文部省博物館」之署名，對外公告將在湯島聖堂，於明治四年(1871年)10月1日至10日舉辦博覽會，後因故延至明治五年(1872年)3月10日至4月30日(共50天)，由田中芳男主辦於湯島的大盛殿舉辦博覽會，明治天皇親臨會場參觀，由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西鄉隆盛、參議大隈重信等官員陪

同，並由主辦單位的町田久成與田中芳男導覽。(椎名仙卓，2005：93，109-110) 從此日本各地紛紛舉辦博覽會，正因為如此田中芳男也被稱為「日本博覽會之父」。當時公告舉辦博覽會的宗旨可以窺見田中芳男對博覽會的看法，主要在收集全國自然與人造的產物，統一在各地不同的名稱，並說明其功用廣為人知。其中古物的展出，可以傳達時代與社會的變遷，主要基於博物學收集展示全國產物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原文抄錄如下：

「博覽會ノ旨趣ハ天造人工ノ別ナク宇内ノ產物ヲ蒐集シテ其名称ヲ正シ其用法ヲ弁シ人ノ知見ヲ広ムルニ在リ。就中古器苗物ニ至テハ時世ノ推遵制度ノ沿革ヲ追徵ス可キ要物ナルニ因リ嚮者御布告ノ意ニ原ツキ周ク之ヲ羅列シテ世人ノ放觀ニ供セント欲ス……」(轉引自椎名仙卓，2005：93-94)

此外，1867年的巴黎世博還有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在會場開設一家有藝人現場表演而大受歡迎的日本流風茶室，其中以轉陀螺(独樂回し)唱師松井源水為首的許多藝人、曲藝師紛紛渡海而至，這些藝能表演也引發許多饒富興味的軼事。(澤護，1981：498)卯三郎出國期間耳聞目睹西洋先進技術，驚歎之餘，寫下百聞不如一見的感言。回國後的明治5年(1872年)提出《舉辦博覽會建議書》，在日本舉辦博覽會，以開闢貿易興國之路，他認為日本不應該只單純進口西洋製品，而應該掌握技術成為能自己製造產品的國家，第一步就是舉辦博覽會，通過親眼目睹西洋物品，觸動更多的日本人。他說：「舉辦博覽會，使天下萬民增廣見聞，加速產業發展以趕上英法，這就是我本來的願望。我國技術者能夠親身接觸西洋機械，知識技術即可提高，就可藉他國之力發展我們的技術與產業。」這份建議書被評價為具有遠見，在文部省和工部省內流傳，清水卯三郎提出《舉辦博覽會建議書》5年後的明治10年(1877年)，日本舉辦第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リ百科事典：清水卯三郎)

隨行的澀澤榮一與杉浦讓兩人接觸1867年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情形，詳實且生動的紀錄在《航西日記》書中，澀澤榮一在给川村惠十郎的書信中留下這樣的博覽會記述：

博覽會之展示實在盛大而精彩，來自宇內萬國的實用物品，以及其他美觀的器械等展

示品星並羅列，令人驚歎。我國的展品評價亦良好至極，鑒定家已評定，我國將與英、美、米利、普魯士等其他兩三國一樣被授予最高獎牌。此乃國家之名譽，喜慶之至。（轉引自關根仁，2012：76）

澀澤坦言自己驚歎博覽會之盛大，各國展品之精彩，另外還在信中報告了日本展品在會上受到良好評價一事。除此之外，能窺探澀澤如何看待巴黎世界博覽會的資料非常有限，只能依據《航西日記》中的記錄。至於對博覽會的感受，《航西日記》指出展品的多樣性，認為會場中「自物華天寶至與日用雜品文藝相關之諸道具」，不論是天然產品還是人造物品，時代上也不論是古器珍品，還是現世發明之新器，均有所展示。而且「觀各國物品之異，可自知其國之風俗，其人之智愚」，尤其是對於「東洋西洋風氣俗尚之懸隔」，從「器用服色之上」即可「略略概見其一端」。《航西日記》還論道博覽會產生的效果，認為透過對博覽會會場上各國的各種展品的陳列、比較，就能瞭解到各個國家的差異、進步、文明開化之狀況。此外，關於歐洲的出品狀況則有如下記錄：「人工展品精密，學術、藝術品新穎，歐洲競爭著鞭之先。故此會之出展品皆窮巧智，盡奢靡，使聲望聞名世界。」由此可知，歐洲各國此次展出的有人工的、學術藝術的新產品，這些均為「窮巧智，盡奢靡」之物品。另外還特別指出，美國展出的農耕機械、紡織機械可謂特別優秀之展品，英國展品則次之。由此可知，澀澤一行感受到了英國產業的衰退。（關根仁，2012：76-77）

（二）1870年代日本已認識博覽會有「眼目教化，殖產興業」的意義

奧地利政府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閉幕三年後的1870年向世人宣佈，將在1873年舉辦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日本受到奧國的邀請，甫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起初態度也不很積極，經奧國與主辦單位的勸說，最終決定參加，還成立了專責單位負責籌備參展事宜。當時由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擔任總裁，工部大丞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佐野常民在1872年列舉參加博覽會的目的，「一曰凡以為出品之物，無論天產人工，必擇精美者以搜集之，俾藉國土之豐饒，人工之巧妙，揚國威於海外；二曰各國之出品及著作，必詳加考核，俾知西洋之學藝之精妙，機械之妙用，

以開產物蕃殖之道；三曰乘今日之機運，創設不可或缺之博物館，以促學藝之發達，而樹他日博覽會之基礎；四曰本國物產之名目製造，宜力圖改良，以博各國之稱道，而增輸出之數額；五曰各國產物之有名者，必詳查其原價銷路等，以裨自國之貿易。」(馬敏，2007：101；國雄行，2005：32-33) 也就是說，(1)收集及展示精良物品，以使日本國土之豐饒、人民之巧技為海外所周知；(2)觀摩各國物產、學藝之精妙，並傳習其機械技術；(3)在日本籌備創建博物館、開辦博覽會之基礎；(4)整備日本製品成為各國之日常用品並增加輸出之途徑；(5)調查各國製品之原價、售價及供需狀況，以增加未來貿易之利益。(蘇碩斌等譯，2010：113；椎名仙卓，2005：134-136；國雄行，2010：57-58) 在這些列舉的目的當中，可以看出佐野常民對博覽會的看法，博覽會是集展示國家、交流學習、他山之石、產品輸出、國際貿易等功能於一身之國際展會活動。明治政府透過維也納世博會的參與，已理解博覽會的精神與內涵，也為後來「內國勸業博覽會」找到範型。另佐野常民在其《奧國博覽會報告書》的博物館篇，將博覽會與博物館理解成互為表裡的一體兩面，博覽會與博物館之宗旨相同，同為「眼目之教」，而博覽會只不過是一個將博物館展示規模擴張成暫時性博物館設施。

博覽會之主旨，乃是透過眼目之教，開啟眾人之智巧技藝。凡觸動人心之事物，所能產生感動認識者，皆多從眼視之力所由來。國家語言雖異，人之情意相通，藉由手藝可知悉其大概，因物之妍娛美醜而散發愛憎好惡不同之情感，或因形質體狀而理解製式用法，皆是仰賴眼視之力。古人有云，百聞不如一見也。開啟人智、推進工藝之最捷徑最便利之方，即在此眼目之教也。(轉引自蘇碩斌等譯，2010：115)

吉見俊哉教授分析佐野常民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作為開化民智的重要角色：不只是商品展覽，更是依據部門、類別加以區分，讓人們在巡覽這個有秩序的空間時不知不覺透過眼睛所見來學習「未曾知見之物品」。博覽會具有「眼目教化」的功能，藉由科學知識將視線再編以達到文明開化、現代化之目的，這也影響到日後日本一系列以文明開化為號召所舉辦的博覽會，甚至是將殖民地也納入博覽會的動員行列。(陳柏勳，2016) 佐野常民早在出發到維也納世博會之前，就已向明治政府正院提出在東京櫻田門到虎之門一帶舉辦博覽會，在他回國以後撰寫的意見書中，佐野把地點改為上野一帶，1876

年參加費城世博會後，他在1880年提案舉辦日本首次國家博覽會，列舉十項開設國家博覽會的意義：(1)坐得集天下之所產於一場；(2)人民藉此機會，率皆舊然與起，博其聲譽，獲其營利並精研改良技術；(3)得以檢閱認識未曾見知之物品與利用；(4)比較海內外之物品，考察相互間之得失良否，藉此琢磨職工技術並熟練製法；(5)得到學習機械技術的機會；(6)讓外國人得以觀看日本所產，並能促成交換或購買；(7)促進國內進步，增加輸出；(8)於參展物中挑選「適要」物品，擴充博物本館與分館的展示；(9)得知各國土壤之豐瘠與物產之多寡；(10)察其風俗美惡，觀其開化之優劣。很明顯的能看到佐野常民對於作為民眾教化「裝置」的博覽會角色，已有著十分強烈的關心。(蘇碩斌等譯，2010：116；國雄行，2010：69)

也就在1873年這段期間，明治政府為與各國增進友誼親善，以及考察歐美諸強的文化國情，「岩倉使節團」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加上政府官員及留學生等共107人，曾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隨行的久米邦武回國之後編修使節團報告書《米歐回覽實記》計五冊100卷，於1878年刊行，記述使節團訪問12個國家，120幾個城市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產業、宗教、教育、娛樂等多領域的觀察報告，對明治初期的政經、文教、行政之影響頗深。其中第82卷及83卷大量描述維也納世博會，就會了解他們確實將萬國博覽會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機制。《回覽實記》就是將博覽會定位為振興工業、富國強兵不可或缺的機制。

博覽會，即所謂「エキシビション」(Exhibition)，乃蒐集各國物產，於一樓宇之內陳列供眾人觀賞，以廣知各地人民之生意、土宜、工藝與嗜好、風俗者也。一則集結眾人，持其物品供他人觀賞，以增廣其買賣聲譽、求得永久利益；二則觀看他人物產，思考若自己欲如此作為，從今應做何努力，俾達到順應各方嗜好、廣增我國生意之目的；再則獲取名士佳評及注目，以期有更加進步之門徑。是以，為水興盛貿易、獎勵製作、廣增眾見，乃應規畫此一重要會場以作為國民之治安、富強之媒助。(轉引自蘇碩斌等譯，2010：114)

「岩倉使節團」的大久保利通時任大藏卿(相當我國目前的財政部長)，回國後任內務卿(相當我國目前的內政部長)於1876年2月向太政大臣(當時的最高行政長官)三條實美提出開辦博覽會的建議書。其中大久保曾指出博覽會的宗旨在於「將

萬物毫無遺漏蒐集於同一場所，調查物件之品質良否，考究人工之巧拙，令識者加以評論，使百工相互砥礪，以開商品販銷之途」。(轉引自蘇碩斌等譯，2010：118)也就是說透過博覽會的考較評比與觀摩競爭以推動殖產興業政策。明治政府這種基本姿態，可在歷次內國博覽會舉行時，事務局對參觀者發行的《注意書》手冊得見，《注意書》曾寫道「內國勸業博覽會之主旨，在協助工藝進步、開發物產貿易之利益，而非設置戲玩場所以供遊覽之用」。博覽會從此開始與戲玩的場地、開帳場、見世物出現了嚴格的區別。博覽會的效益在於「不需人民長途跋涉即能於同一場地之內周覽全國各種物品，不僅能夠判別其中優劣異同，又能同時領略各種工藝之實驗與妙處」，這種思維與玩賞珍寶或奇物的作為全然不同，已經不再是中國士大夫慣常將博覽會視為「賽珍炫奇」的不屑看法，博覽會參觀的要點在於「物品之比較判別」。人們在參觀時也被告知必須注意事項：(1)周詳地細視熟察物質的精粗；(2)區分製造的巧拙；(3)判斷使用與操作的方便得失；(4)了解使用時機是否適當；(5)考慮價格是否低廉等。若能如此觀察留意展示物的比較判別，「舉凡接觸萬象之眼目，皆增長知識之媒介，知悉橫互一物之動向，即增廣見聞之工具」。(蘇碩斌等譯，2010：120-121)

三、小結：日本領先中國認識博覽會有「眼目教化，殖產興業」意義中日兩國何時接觸博覽會或有不同的說法，甚至中國人先於日本人接觸世博會。然就意會掌握世博會意義來說，日本德川幕府領先中國滿清政府30-40年，清楚認識博覽會有「眼目教化，殖產興業」的意義。(參見表3-4)就皇親貴胄言，1867年日本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委任其弟德川昭武代理出席1867年巴黎世博會，並遊學法國學習西方文物制度。十年後的1877年起，明治天皇出席各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第四屆除外)，除表示對大久保利通運用博覽會推動「殖產興業」政策的加持，更以行動宣示對日本現代化路線的堅持。而中國滿清的慈禧太后於1904年為改善其國際形象與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首次以官方名義組團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慈禧特別派出溥倫貝子率團赴美主持中國館揭幕，並帶著慈禧的私函與親筆簽名玉照轉赴華府會見老羅斯福總統。日本的最高領導人幕府將軍德川慶喜

與大正奉還後的明治天皇，以及中國滿清最高領導人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之間，意會出世博會的重要性並採取行動的時間落差約有30到40年之久。就兩國的政府官員而言，較具代表性的有1873年日本「岩倉使節團」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等政府官員曾參訪維也納世博會，將世博會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機制，將博覽會定位為振興工業、富國強兵不可或缺的機制。回國後大久保利通建議舉辦內國勸業博以推動「殖產興業與富國強」政策。而中國滿清遲了30多年，為推行新政於1905年12月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端方、戴鴻慈順道參觀了1906年米蘭世博會，歸國後積極推行憲政之外，1908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

表3-4中日兩國何時清楚意會世博會一覽表

時間	中國	日本
1851~1870年	將世博會視為「炫奇鬥異」無益之舉(賽奇會、炫奇會、賽珍會、聚珍會、聚寶會)	將世博會意會為「廣為展示，萬民觀覽」場會(博覽會：福澤諭吉《西洋事情》)
1870~1890年	逐漸認識到世博會「益國而不徒費」的「賽會」意義(萬國珍奇會、博物院、賽奇會、賽會、百年大會)	已認識到世博會有「眼目教化，殖產興業」的意義(博覽會：佐野常民《奧國博覽會報告書》、久米邦武《米歐回覽實記》)
1890~1911年	認識到世博會「評獎賽會」的殖產興業功能(賽會、博覽會、博物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就知識分子的士大夫與武士來說，1862年參與英國倫敦世博會的日本竹內使節團成員之一，精通蘭學的武士福澤諭吉回國後在其1866年所著《西洋事情》點出「博覽會」的意義，並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全日本，甚至普及到其他漢字體系的國家。幾年後，1868年流亡海外的中國文人王韜於參觀巴黎世博會會後的會場，寫下〈游觀新院〉將世博會名之為「博物大會」、「聚珍大會」，流露出中國士大夫鄙視夷人奇技淫巧的氣息，十年後的1878年駐英法公使郭嵩燾左右的幕僚，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雖然在用字仍以「炫奇會」，不過已跳出過去讀書人視

博覽會為奇技淫巧的刻板認知，認為世博會意不在炫奇，而在誇富宣揚國威。遲至1890年代，有1893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大力闡釋世博興商強國論，同時提出舉辦博覽會的主張。1897年劉楨麟發表〈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一文，直言興商務必自賽會始。中日的知識份子對世博會的認識與主張，亦有1860年代與1890年代間，大致有30年的時間差距。

再就商人或士商來看，1851年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獨寄榮記湖絲於倫敦世博會，在商人接觸世博會似領先日本，不過徐氏稱世博會為「百年大會」、「京城大會」，將世博會看成在商場競爭所需與商品評比行銷工具而已。1867年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隨德川幕府萬博使節團，在巴黎世博會場開設一家有藝人現場表演而大受歡迎的日本流風茶室。回國後的1872年提出〈舉辦博覽會建議書〉，主張日本應該舉辦博覽會，以開闢貿易興國之路，日本不應該只單純進口西洋製品，而應該掌握技術成為能自己製造產品的國家，第一步就是舉辦博覽會。同年隨德川幕府萬博使節團成員澀澤榮一參觀了第二屆巴黎世博會，驚見西方工業化程度，為此留下來研究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兩年後回國接受明治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不久即辭職投身實業，一生創辦了五百多家企業，成為近代日本的「實業之父」。遊歷歐洲與參觀巴黎世博會寫下的《航西日記》，肯定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對博覽會會場上各國的各種展品的陳列、比較，就能瞭解到各個國家的差異、進步、文明開化之狀況。中國有位與澀澤榮一在家學背景、人生歷練，以及仕途方面都有驚人相似性的張謇，他在1896—1897年間向朝廷上呈〈農工商標本急策〉，提出舉辦博覽會是振興實業的重要途徑。1901年他在《變法平議》中更把舉辦博覽會列為改良政治，振興實業的一項變法內容，通過商品的展示、比較，生競爭之心，創造巧思，藉獎賞助銷路，有助於產業發展。在1903年東渡日本參觀大阪內國勸業會之前，張謇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博覽會展示、比較、競爭與勸業精神。若以中日兩國代表性士商澀澤榮一與張謇對世博會的清楚認識與舉辦博覽會的主張來看，中日商人與士商也有約30年的時間差。

第三節 中日兩國何時參展學習世博會—學習階段

處於工業革命全盛時期的英國，為宣揚國威與持續產業發展，在1851年的倫敦舉辦了規模空前的「萬國工業產品大展覽會」，展期140天，18,000位參展商人，近10萬件展品，評選出5,084件得獎展品，共630萬參觀人次，大會有18.6萬英鎊的盈餘。(上海圖書館，2002：6) 由於它的成功，經BIE追認為人類第一個世界博覽會，拉開世界博覽會150餘年發展史的序幕。首屆倫敦世界博覽會，除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展，並奪得金銀兩項大獎之外，有中國人出現在會場，也有中國商品的展區。據文獻記載，當時在華的英國人曾向兩廣總督提出合作參加博覽會的建議被拒之後，由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與Harry Parkes徵集中國商品送往倫敦展出。(上海圖書館，2002：49-53；鈴木智夫，1996：66-67)

繼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之後，有美國在1853年首次舉辦的紐約博覽會(並未被列入BIE旗下的世界博覽會)、1855年法國首次舉辦的巴黎世界博覽會、1862年英國第二次的倫敦世界博覽會，都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視。然而，日本文久二年(1862)的德川幕府時期，因外交事務派遣竹內保德率領38人使節團遠赴歐洲，在英國駐日使節阿禮國的安排之下，出席了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典禮，是日本第一次派人前往參觀世界博覽會。使節團在會場內驚見日本展品，係由1859年到任的英國駐日使節阿禮國將私人收藏的日本珍品送去參展。(湯本豪一，1996：8-9；西川智之，2006：175-176；松村昌家，2004)日本竹內使節團參與了第二屆英國倫敦世博會，對於往後日本的世界博覽會事業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竹內使節團的成員如淵邊德藏、福澤諭吉在參觀倫敦世博會之後，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政策涵義，為日本參加世博會展示以學習，進而日後自己實際操作世博會「這個資本主義發展與國家現代化的政策工具」邁出堅實的一大步。

四年後的1866年滿清政府總理衙門首度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參加1867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巴黎世博會展示，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加。反觀當時的日本，由德川幕府偕同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陶器、漆器、銅

器、浮世繪、礦物等特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席，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界博覽會，也是中日兩國參與暨發展世界國博覽會事業的重要轉捩點。（西川智之，2006：176-177；椎名仙卓，2005：5；國雄行，2005：23）1867年江戶幕府還政於日本明治天皇(大政奉還)，明治新政府持續積極參加世界各國的博覽會，如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1878年法國第3屆巴黎世博會、1880年澳洲雪梨世博會、1888年西班牙巴塞隆納世博會、1889年法國第4屆巴黎世博會、1893年美國芝加哥世博會、1900年法國第5屆巴黎世博會、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1905年比利時列日世博會、1906年義大利米蘭世博會等，加上1867年法國第2屆巴黎世博會及1910年與英國合辦「英國倫敦日英博覽會」共有13次之多，遍及法國、英國、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美國、澳洲等國家。

反觀顛覆的中國滿清政府於1866年以「曉諭商民參加」搪塞未組團參加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博會。四年後的1870年，清政府受到奧國政府邀請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同樣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才勉強同意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英國人)組團因應，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轉引自趙佑志，1997：299)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卻成立「奧國博覽會事物局」積極籌備，亦規劃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重臣出洋考察，途經奧地利參觀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中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正式參與世博會，卻是由洋人控制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組團參展，直至1906年滿清政府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義大利米蘭世界博覽會展示，也首次規劃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了米蘭世博會。期間由海關總稅務司組團參展共8次，(參見表3-5)

表3-5 中日兩國於1877~1911年組團參加世界博覽會情形

年份	國家	博覽會名稱	官方參展		備註
			中國	日本	
1851	英國	倫敦世界博覽會	X	X	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寄送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加第一屆倫敦世博會，現場出現中

					國展品，係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徵集中國商品送往展出，而現場由荷蘭希格斯公司展出過日本屏風，皆非官方接觸。
1855	法 國	巴黎世界博覽會	X	X	在荷蘭展品中更出現80件日本物品，非官方接觸。
1862	英 國	倫敦世界博覽會	X	X	世博會現場有來自中國展品與日本展品，係英國第一任駐中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展出，而非官方接觸。
1867	法 國	巴黎世界博覽會(二)	△	◎	日本由德川幕府的薩摩和佐賀兩藩代表參加，由德川昭武(德川慶喜將軍之弟)率代表團出席。滿清僅曉諭商民自行參加。
1873	奧地利	維也納世界博覽會	○	◎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奧國博覽會事物局」積極籌備；滿清政府先推諉，後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英國人)組團因應。日本明治政府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重臣出洋考察，途經奧地利參觀維也納世界博覽會。 中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正式參與世博會，卻是由洋人控制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組團參展。
1876	美 國	費城世界博覽會	○	◎	滿清仍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組團參展，不過第一次有中國官員李圭隨團。
1878	法 國	巴黎世界博覽會(三)	○	◎	
1880	澳 洲	雪梨萬國博覽會	△	◎	
1888	西班牙	巴塞隆納世界博覽會	△	◎	
1889	法 國	巴黎世界博覽會(四)	○	◎	
1893	美 國	芝加哥世界博覽會	○	◎	
1897	比利時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X	X	
1900	法 國	巴黎世界博覽會(五)	○	◎	
1904	美 國	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	○	◎	為擺脫海關把持世博會參展業務，滿清政府決定改組設立特使團，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此次博覽會，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但未能克制海關洋員的跋扈，引起參展商和留學生的強烈地不滿，加速滿清政府收回世博會參展業務。
1905	比利時	列日世界博覽會	○	◎	
1906	義大利	米蘭世界博覽會	◎	◎	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政府由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首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了米蘭世博會。
1910	比利時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	X	日本政府因「英日同盟」要維持兩方友好，於1910年合辦「英國倫敦日英博覽會」，故未參加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資料來源：X 代表「未參加」，△代表「曉諭商民參加」，○代表「由海關洋員籌備參加」，◎代表「由政府(國人)組團參加」。整理自山本光雄，1970：238-297；胡家瑜，2005：28；趙祐志，1997：289-294。

本節將以中日兩國參加世博會具有轉捩點意義的幾次參展歷史，加以比較分析

中日兩國參加世博會學習這個資本主義發展與國家現代化政策工具的經驗。日本方面如首度由江戶幕府組團參加的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界博覽會、大政奉還後的明治政府首次組團參加的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首度組團赴美參加的1876年費城世界博覽會，中國方面如滿清政府首度由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組團參加的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滿清仍由海關總稅務司組團參展卻第一次有中國官員李圭隨團的1876年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為擺脫海關把持世博會參展業務首次由皇室溥倫貝子率特使團參加的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政府由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並有出洋考察大臣順道參訪的1906年義大利米蘭世博會。

一、日本領先中國組團參加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界博覽會

法國為了要讓世人看到拿破崙三世所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在各個領域的榮光，宣揚巴黎這個偉大城市會是人類新秩序的中心，在1867年舉辦第二屆巴黎世博會，向世人展示法國工業與藝術的成就，證明法國是世界的領頭羊，巴黎是世界文明的首都。本次博覽會以「勞工的歷史」為主軸，首度出現比較像是世博會所謂的主題，付費入場的約906萬參觀人次，財務方面則有416萬多法朗的盈餘，算是一次成功的世博會，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在籌備的過程中，曾經邀請遠在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參展。1866年中國滿清政府總理衙門首度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加。也就是滿清政府接到法國巴黎世博會邀請書後，總理衙門僅發函通知總稅務司署，法國政府應其駐北京使館請求，委派美理登(Baron de Meritens)來華協助中國參加1867年巴黎世博會。總理衙門劄文並未明確組建大清國赴巴黎世博會正式參展團，但是正式授權海關總稅務司署統管參展世博會工作。法國人美理登於1861~1871年任福州海關稅務司，受赫德之命，利用回國假期參與1867年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協助滿清商民參加世博會事務。形成了以後近40年，陸續有30多位稅務司藉回國休假兼辦世博會事務。(俞力主編，2009：19-20) 前節提到的清朝「斌椿歐洲考察團」就參觀過施工中的1867年巴黎世博會場館。當時清廷為考察歐洲的情況，也是接受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

赫德(Robert Hart)的建議，決定派遣前襄陵知縣斌椿，攜其子廣英，隨同回歐洲渡假的赫德，親赴法、英、德、俄等歐洲九國考察，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專門為考察西洋情況而出國遠行。兩案都顯示出滿清政府對洋務的被動應付，以及仰賴洋人的作法。

至於中國在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的展品與展館的描述，是有滿清政府交由海關派出福州海關稅務司法國人美理登利用回國假期，協助滿清商民參加參與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的說法，未見中國展品展館相關資料，倒是王韜在《漫遊隨錄》的「游觀新院」乙節，並沒有對中國展品與展館留下文字，僅僅提到曾有一團來自中國廣東的戲班子，粉墨登台表演，觀眾為之神移，每天賺得不少銀子。(王韜，1982：93-94) 愛知淑德大學教授楠元町子的研究指出，日本和中国、泰國同一個展區，僅占整個會場的128分之1，其中日本展品佔掉這一區的一半，中國展品很少，中國並未派出正式的代表團，到有一團旗幟鮮明華麗穿著的廣東戲劇團在現場演出，展品就是中國傳統服飾、特產茶葉而已。(楠元町子，2016：86)

反觀1866年的日本，駐日大使羅休斯曾探詢幕府監察官栗本鋤雲參加巴黎世博會的可能性，經駐日大使羅休斯與栗本鋤雲的居中協調，幕府為向各國宣示其政權統治日本的正統性，以及薩摩和佐賀兩藩為了要利用參加法國世博會做採購軍艦商談的目的，最終決定參展，由德川幕府率同薩摩和佐賀兩藩參展，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幕府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席，昭武一行於1867年2月15日從日本出發，同行的團員有外國奉行(相當於現在的外務大臣)向山一履、擔任昭武家教的山高信離、負責昭武警衛工作的7名水戶藩士、擔任「勘定陸軍附調役」主要負責一行人會計總務工作的澀澤榮一、傳習生，以及清水卯三郎、吉田六左衛門等江戶商人，共33人。(關根仁，2010：74-75)

幕府有關參加巴黎世博會的籌備工作，作了組織分工與準備工作的規劃，首先分別由監察、外交、財務三個機關負責收集參加巴黎世博會的展品，監察機關負責武器與服飾，外交機關負責美術工藝品與昆蟲鳥獸皮類、財務機關負責飲品食

物、植物、金石、陶器、雜貨等，古器類則委由江戶商人收集；其次也對幕府子民與各藩募集展品，由於幕末時期社會動亂少有人響應參展，惟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吉田六左衛門及薩摩、佐賀兩藩有了正面回應。佐賀藩因適逢委託荷蘭製造軍艦，特別選派藩士佐野常民參加巴黎世博會，而薩摩藩因採購軍艦商談的目的，由家老岩下方平率藩士參展。（須見裕，1984：43-63）

在展品的徵集與展示規劃方面，在慶應2年(1866年)5月幕府就曾事先徵詢開成所(幕府於江戶設置的西學教育研究單位)的法國人西伯里昂(シベリオン)的專家意見，基於真實與臨場感，甲冑就可以穿在假人身上來展示，考量吸引觀眾的目光，陶器・漆器・銅器的展品要大。更指出昆蟲標本的展品不足，幕府才授命開成所的田中芳男負責採集國內昆蟲標本赴巴黎世博會展出，也因此田中芳男與世博會結下不解之緣。幕府徵集的展品以武器、繪畫、漆器、陶器、書籍等為主，約1,014件，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吉田六左衛門提供的展品，以武器、書畫、衣服、漆器、陶器等居多，約1,180件，兩藩中的佐賀藩以陶器參展為主，約506箱，薩摩藩則為琉球產製的麻布、砂糖、陶器等產品480餘箱。（國雄行，2010：30-31）

有關此次日本參展的表現，在澀澤榮一給川村惠十郎的信中，有這樣的記載：「博覽會之展示實在盛大而精彩，來自宇內萬國的實用物品，以及其他美觀的器械等展示品星羅棋布，令人驚歎。我國的展品之評價亦良好至極，鑒定家已評定，我國將與英、美、普魯士等其他兩三國一樣被授予最高獎牌。此乃國家之榮譽，喜慶之至。」另據法國報紙的評論，清水卯三郎用檜木建造舖有六張榻榻米的「日本茶屋」大受歡迎，營業額達65,000法郎，跟幕府展品銷售額70,000法郎旗鼓相當。至於大會的評獎，在52,200位參展者，共發出19,526個獎牌，日本幕府共得24個獎牌。雖然日本展品受到歡迎，不過會後展品銷售情況不佳，推其因在日本人的產品不符合西方人的口味，製作之初就是為本國人而設。在澀澤榮一與杉浦讓兩人的日記合編而成能的《航西日記》，就曾討論到博覽會所產生的效果，認為藉由對博覽會會場上各國的各式各樣展品的陳列比較，能瞭解到各個國家的差異、進步、文明開化等情況。歐洲各國此次展品的有人工的、學術藝術的新產品，這些都是

「窮巧智，盡奢靡」之物品。而美國此次世博會展出的耕作機械、紡織機械，都屬特別優秀之展品，英國次之這樣的評論。由此可知澀澤感受到了英國產業的衰退。(關根仁，2010：76-77；國雄行，2010：37-41) 無論如何，日本德川幕府首次組團參加，或許展示效果不大，不過的確確為明治時代的日本，培養了一批像田中芳男、佐野常民、山高信離、清水卯三郎這等籌備世博會與發展國家博覽會事業的人才。(國雄行，2010：42)

就在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界博覽會這個時間點，日本已經有組織計畫，且能夠徵詢洋人顧問的意見，徵集展品與展館規劃，而隨團出洋籌備本次世博會的田中芳男、佐野常民、山高信離、清水卯三郎等確實習得世博會這個西方創造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領域競爭交流的平台，紮實的為日本儲備了一批舉辦博覽會與殖產興業的人才，相較中國滿清政府的顛預被動不以為意，且仰賴洋人全權處理的做法，兩國在博覽會事業的進展上已有了差距。

二、日本與中國以不同方式組團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

奧地利政府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閉幕三年後的1870年向世人宣佈，將在1873年舉辦奧地利維也納世界博覽會，除了紀念奧皇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執政25週年之外，要把首都維也納推向世界先進都會之列，並恢復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失利後的國際威信。隔年的1871年11月，日本明治政府為外交事務與考察歐洲國家文物制度以師夷之長，首度派遣重臣所組成的「岩倉使節團」，由右大臣岩倉具視銜命率參議木戶孝允、外務少輔山口尚芳、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一行60餘人，至美國及歐洲諸國交涉修改與美英法等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做西方文物制度考察，1873年9月13日回到日本，途中取道維也納參觀世界博覽會，隨員久米邦武編撰的《米歐回覽實記》就載有〈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見聞記要〉上下兩篇，而日後才有大久保利通的規劃與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以及1877年首度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參見：湯本豪一，1996：20-21；久米邦武，1989：21-52)

在派出「岩倉使節團」同一年的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曾經由民部省(內政部)的細川潤次郎擔任參展監督，率東京府少數商人攜帶展品，前往美國參加舊金山工業博覽會。不過，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遣團前往參加世博會，則始於1873年的奧地利維也納博覽會。而後日本明治政府截至1900年之前，共參加24次博覽會⁸，使日本在世博會的舞台上嶄露頭角。(山本光雄，1970：238；三島雅博，1993：13-14)

奧國於1872年派特使親赴日本面見明治天皇陳遞約瑟夫一世親筆邀請函，年底日本政府即決定參加，任命參議大隈重信、外務大輔寺島宗則、大藏大臣井上馨處理博覽會事務。1872年1月成立「博覽會事務局」，由大隈重信擔任總裁、駐奧國公使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負責徵集展品與籌備海外展示事宜。設立博覽會事務局之初，即向國人作了明確的政策宣示：「一個國家自然資源豐富，說明風土氣候優厚；人造物品做工精良，說明國民工藝水準和智慧出眾；著述立說精闢細緻，說明這個國家在探索真理、追求學術方面具有廣袤的深度。所以一個國家能否在世界上揚名昌盛，都表現在其物品的好壞和工藝的優劣上。日本雖然沒有機械之類的發明，但不能就說日本在工藝方面毫無精妙可言。日本的生絲、蠶卵紙、茶和陶器等，在博覽會上素有聲譽。如果能進一步改造精良，成為東洋第一物產，那麼宣揚日本榮譽，國家享受繁榮昌盛自不待言。就此呼籲全體國民要認真體察公告之目的，充分展現物品，把它當作國家利益來考量。」(轉引自喬兆紅，2011a：152；三島雅博，1993：14-15) 當然以上的作為，不會單純只是明治政府的首次參加世博會而已，重要的是宣示了日本積極學習外國科學技術的態度。

⁸ 日本明治政府截至1900年之前，陸續參加1874年英國倫敦萬國博覽會、1875年澳洲殖民博覽會、1876年美國費城建國百週年博覽會、1878年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1879-80年澳洲雪梨萬國博覽會、1880年德國柏林漁業博覽會、1881年德國礦業博覽會、1881年美國亞特蘭大棉業萬國博覽會、1882年國內工業展覽會、1883年荷蘭阿姆斯特丹萬國殖民博覽會、1883年美國波士頓技術與工業博覽會、1883年英國倫敦漁業博覽會、1884年英國倫敦衛生博覽會、1884年俄國聖彼得堡熱帶園藝博覽會、1884年英國蘇格蘭愛丁堡蘇利文博覽會、1884-85年美國路易士安那州紐奧良世界工業與棉業百年博覽會、1885年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博覽會、1885年德國紐倫堡金屬工業博覽會、1888年西班牙巴塞隆納萬國博覽會、1889年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1889年德國漢堡工業暨商業博覽會、1890年俄國聖彼得堡國際監獄博覽會、1893年美國芝加哥哥倫布萬國博覽會等24次博覽會。(參見胡家瑜，2005：28)

有關此次參加維也納世博會的目的，1871年5月博覽會事務局副總裁佐野常民在向明治政府正院(相當現在的內閣)提出的參展計畫書中列舉五大目的：「第一，凡以為出品之物，無論天產人工，必擇精美者以搜集之，俾藉國土之豐饒，人工之巧妙，揚國威於海外；第二，各國之出品及著作，必詳加考核，俾知西洋之學藝之精妙，機械之妙用，以開產物蕃殖之道；第三，乘今日之機運，創設不可或缺之博物館，以促學藝之發達，而樹他日博覽會之基礎；第四，本國物產之名目製造，宜力圖改良，以博各國之稱道，而增輸出之數額；第五，各國產物之有名者，必詳查其原價銷路等，以裨自國之貿易。」(馬敏，2007：101；山本光雄，1975：240-241；國雄行，2010：57；國雄行，2005：32-33) 就如同喬兆紅所言，日本明治政府參加此次世博會的目的：(1)通過展示日本天然和人造的物品，宣告日本的存在；(2)調查研究歐洲工業界的實際情況，學習其專業知識；(3)將來日本也建設博物館，舉辦博覽會；(4)瞭解對日本物品的評價，以調整增大輸出的方法；(5)調查各國有名物品的原價，為振興貿易收集資料。(喬兆紅，2011a：153；三島雅博，1993：16) 其中為了達到調查研究歐洲工業界的實際情況，以及學習其專業知識目的，佐野常民提出招募工業各科的學生和職工，一同前往維也納世博會學習各專業知識，同時在國內設置能夠讓國人學到最新西方技術與發明的博物館，為日後明治政府推動殖產興業政策奠下了基礎。(三島雅博，1993：16)

新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對此次參加維也納世博會十分重視，如前述在會前設立「博覽會事務局」專職籌備工作，由政院的內史、外務省、大藏省、工部省、文部省派員擔任事務局的專員，是個跨部會的任務編組。在博覽會事務局的組織成員方面，任命參議大隈重信、外務大輔寺島宗則、大藏大臣井上馨處理博覽會事務。(並松信久，2016：15-16)由大隈參議為博覽會事務局總裁，理事官佐野為副總裁，近藤真琴、關澤明清等人為博覽會事務官，大藏省的山高信離等人為博覽會書記官。副總裁佐野常民出身佐賀藩，去過奧地利，學過蘭學和化學，1867年帶領加賀藩士參加過巴黎世博會；事務官關澤明清出身加賀藩，也學過蘭學和航海術，在倫敦留學三年；另書記官山高信離出身濱松藩，學習法語和制鐵技術，

也參加1867年巴黎世博會，會後作為留學生繼續留在歐洲。從這三人的經歷都有共同之處是在幕府末期喝過洋墨水，其中佐野常民與山高信離這二人還有過1867年巴黎世博會的參展經驗。(喬兆紅，2011a：153) 也就是說，在籌備維也納世博會參展的組織方面，大量起用有西學背景與世博會經驗的本國菁英。同時在徵集展品方面，也十分看重外國顧問的意見。如當時在明治政府正院工作的西博爾德(Alexander Georg von Siebold)主張要提高歐洲人對日本的關注，基於大就是美的考量，建議現場要有大型展品，最終名古屋的金鯨⁹、鎌倉大佛、天王寺五重塔、淺草觀音的大燈籠等實物大小模型送往維也納世博會展出。而到日本長崎任石鹼製造所技師，指導陶器製造的德國人華格納，在廢藩置縣後繼續在大學東校教授化學之外，也在西博爾德的推薦下，擔任日本參加維也納世博會有關展覽品的技術指導。他主張展品與其展出不成熟的製品，倒不如展出傳統的工藝品要來得好，因此竭力在京都收集工藝品。兩位被僱傭的外國人都認為，應通過展示日本的傳統工藝，向世界宣告日本的存在。(三島雅博，1993：17；山本光雄，1975：241；吉田光邦編，1996：77-78；國雄行，2010：60；喬兆紅，2011a：153)

在展品的徵集與展示方面，預先於明治5年(1872年)舉辦「湯島聖堂博覽會」徵集展品並作預演，當年的11月19日，日本明治天皇、昭憲皇后、英照皇太后親臨博覽事務局，將全部遠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的展品巡視御覽了一遍，以示皇家對日本參加世博會的重視。(山本光雄，1975：243) 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的展品有鎌倉大佛模型、五重塔模型、陶瓷、織物、美術工藝品，展示日本式庭園建築，並派出70人的代表團參加，成為明治時期積極出洋參加世界博覽會的重要里程碑，當時亦引起歐洲藝術史上所謂「日本流風」的風潮。(西川智之，2006：179-183；吉見俊哉，1992：116-118；椎名仙卓，2005：132-151；國雄行，2005：29-37；鈴木智夫，1996：70) 在此次世博會上，據喬兆紅博士的資料，日本展示品贏得名譽獎狀5個，進步獎牌40個，有效獎牌92個，雅緻獎1個，表彰獎72個，輔助獎牌8個，

⁹ 名古屋城中最著名的就是金鯨。據說城堡大樑上懸掛金鯨始於室町時代前期的城堡輪廓成形期。當初金鯨是用來裝飾大樑的防火符咒，後來成為城主權力的象徵。

共計獲獎218個，另國雄行教授的整理，日本的得獎數為217個，中國的得獎數則為118個。(詳如表3-6) 會期中賣出的物品總額為奧元計83,200基爾德(gulden)，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並引起歐美各國的重視。(喬兆紅，2011b：154)

表3-6 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參展國得獎數

排名	國家	得獎數	排名	國家	得獎數
1	奧地利	5,991	11	瑞典	534
2	德國	5,066	12	土耳其	470
3	法國	3,142	13	美國	441
4	義大利	1,908	14	葡萄牙	431
5	匈牙利	1,604	15	丹麥	309
6	西班牙	1,157	16	荷蘭	284
7	英國	1,156	17	羅馬尼亞	238
8	俄羅斯	1,018	18	日本	217
9	瑞士	723	19	巴西	202
10	比利時	612	20	希臘	183
			21	中國	11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雄行《博覽會と明治の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年，p.63。國雄行〈博覽會時代の開幕〉，載於松尾正人編《日本の時代史21：明治維新と文明開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p.253

為了出口日本的工藝品，以維也納世博會為契機，在佐野常民的指示下於維也納設立了半官半民的貿易公司「起立工商會社」，由維也納博覽會參展團隨行人員松尾義助和若井兼三郎分別擔任正副社長，博覽會事務局大力支持這個公司，從三井集團借入運營資金30,000日元，該公司自籌資金12,000日元，一共42,000日元的資本金開始創業。主要的業務負責日本展區的日本庭園會後的販售，以及博覽會未售出展品的銷售。回國後他們於1874年創業，和英國的公司及維也納商人簽約，出口日本工藝品。公司運營18年，先後參加國外世博會11次，1877年在紐約開設分店，次年又在巴黎開設分店，為日本貿易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遺憾的是該公司由於經營不善，於1891年公司解散。(三島雅博，1993：21；喬兆紅，2011a：155；ウィキペディア：起立工商會社)

主導此次博覽會事務的佐野常民更在這屆博覽會結束後，撰寫了卷帙浩繁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詳細介紹了此次博覽會各方面的情況，同時對發展日本的博覽會事業與博物館的建置，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不僅整理為《報告書》提交給政府，還印刷出版讓廣大民眾瞭解。從《報告書》中顯示的調查專案和與此相關的當地資料譯本可以看出，以佐野為首的日本官員對引進西方有用東西極為熱情。(國雄行，2010：67-68；馬敏，2010b：78；喬兆紅，2011a：154) 佐野撰寫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特別提出，博覽會和博物館具有相同的作用，即寓教於觀。佐野曾言夫觸動人心，使其生感動識別者，莫過於以眼目所視之物。語言相異之人而能情意相通者，乃基於彼此相互對待有方；而人對於物之妍媸美醜所生之愛憎好惡，亦因物之制式用法不同乃使形質體狀相異而生，此皆起于眼目所視之效。是以古人常言百聞不如一見者。若欲開人智、進工藝，眼目之教乃最為捷易之法也。」受政府之命，佐野等人還特別起草了留歐人員在各地學習的技術、回國後從事的活動，以及如何推動日本產業和技術的發展，交給內務省。在佐野常民等人的實際主持下，日本斥資50萬日元，派出近70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展。正在歐洲考察的著名的岩倉使節團也曾前往參觀本屆博覽會。在《奧國博覽會參同記要》的中篇《技術學習》中有20個專案的報告，主要內容包括：養蠶法、林木工藝法、山林各科、活字制法、活字紙型制法、硝酸制法、鉛筆制法、測量儀器制法、針盤法、鐘錶製造、電信機械、測量器械、細小器械製造、染法、陶器、木器革類塗法和裝板手工藝等。這些研究對促進日本近代化，培育人才，開辦學校，創建學社，有過極大的貢獻。(喬兆紅，2011a：154-155)

1870年清政府也受到邀請，起初也是不願參加，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轉引自趙佑志，1997：299) 但是回應者寥寥無幾，商民對參加博覽會的意願不高，到1871年11月奧國駐華公使強力建議清政府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博覽會的籌備事宜，使中國赴維也納的展品具有代表性，不失大國之顏面。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當時的中

國連外交部都沒有，外國事務都由兩廣總督處理。國際交流的機會少之又少，因而有能力辦理外交，參與國際性活動的人才寥寥無幾。再者滿清政府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認為是賽珍耀奇、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因此漠不關心，更沒有興趣參加。滿清政府很自然把目光投向當時主管海關的總理衙門領導人奕新、文祥等大臣信任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由海關承辦世界博覽會參展事務，從1873年的維也納博覽會到1905年的列日博覽會，海關在32年間承辦約28次世界博覽會的展出業務。(鈴木智夫，1996：70-74；Wright, 1993：3, 537；羅靖，2009a：54-56)

依據維也納世博會的章程，各國可以送出本國所有重要港口、海港進行的世界貿易的貨樣或樣本作為展覽品，以展示各國進行世界貿易的狀況。赫德決定把1865年以前建立海關的14個口岸即九江、廣州、天津、上海、福州、汕頭、鎮江、淡水(台北)、寧波、漢口、廈門、煙臺、營口、打狗(高雄)等所進行的對外貿易狀況加以統計並做展示，由海關總稅務司辦公室海關總署送出中國各個口岸商業貿易的貨樣、標本和10年間各口岸商務、航運情況圖表以展現中國的對外貿易。同時還準備了各種獨特的展品，如農具、工具、帆船模型等。由於海關的組織完備又有效率，各關稅務司認真執行總稅務司赫德的指示，責成並監督驗貨收集、編排樣品、驗收展品等工作之外，也對各該口岸10年貿易情況做統計印製14份口岸報告及1份總報告。在各口岸海關中，收到最多民間展品的是廣州海關，其次是寧波海關。廣州海關送去的展品有兵服、軍旗、燈籠、各類絲織品，各式油漆煙盒、茶盒、花瓶等。寧波海關則送出雕刻屏風與嵌板、畫框、鞋子、各種木雕傢俱、浙江省各地風物照片等。另有上海、天津、寧波、杭州等個城市組織了產品參展，大都是中藥、絲綢、茶葉等傳統產品，也有個別紡車、手推車、沙船等第一次參展的物品。參展的大多是中外貿易的貨物，而中國海關展出的主要目的是要對世界提供各國對華貿易情況，為各國展示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的對外貿易情況，雖與世博會考較產品以資改良的目的有些相左。《萬國公報》稱此次「中國寄往各物遐邇，爭觀恐後，以為見所未見也」。中國的展品全方位地展示中國的對外經濟狀況、

人民的生活和中華文化，獲得各方好評，其中尤以絲綢為甚。由於中國對維也納博覽會的貢獻，奧國政府為滿清海關洋人漢南、包臘等人頒發勳章。並特以嵌寶十字架遙祝總稅務司赫德，名為酬勞之常禮，實為感謝中國對此次世博會所作的貢獻。」(羅靖，2009a：57-64)

就在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這個時間點，日本更能精準掌握參加博覽會要讓日本走入國際社會、學習西方文明與技術等目的，並藉此廣徵展品的機會向國人作了參加世博會的政策宣示。在籌備的組織方面，大量起用佐野常民、町田久成、田中芳男、山高信離、近藤真琴、關澤明清這些有西學背景與世博會經驗的本國菁英。同時在徵集展品方面，也十分借重法國人西博爾德與德國人華格納等外國顧問的意見。也開始在「參展團」的佐野常民、近藤真琴與「岩倉使節團」的大久保利通等菁英，從世博會認知到「自主精神」的重要性，開始規劃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推動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國策。相較之下，中國滿清政府則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再者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認為是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方委由績效卓著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主辦參展事務，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32年間由海關承辦的「洋人代辦」參展模式，與日本明治政府「國人自辦」的參展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對兩國在博覽會事業的進展也產生極大的影響。

三、日本最大規模與中國第一次有官員參加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

美國在1870年代以經濟大國之姿，正從大西洋的彼岸崛起，當時美國經濟位居全球第四，直到1880年代的美國經濟已居世界第一。1860年到1880年間，美國農業機械化發展迅速，造就高度發達的農業。同時美國的煤炭、鋼鐵、石油產量逐步超越了英法等國，交通也迅速發展，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下，1871年美國賓西法尼亞州眾議員莫雷爾(D. J. Morrell)提案，要在費城舉辦一個慶祝美國獨立100周年國際性展會，國會通過成立美國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負責1876年在費城舉辦「藝術、工業製品、農業礦業產品世博會」。

美國國務卿曾向各國政府正式發出邀請，英國女王率先宣佈英國政府將派出大規模展覽團參加。除了派人前往歐洲遊說，百年慶典活動委員會的宣傳部還通過報紙不斷向世界發佈訊息，最後共有35個國家與20幾個殖民地參加了美國獨立百周年世博會。(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99-100；Findling，1990：55)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一書的〈美會紀略〉亦有類似的文字記載。

光緒二年，為有國百年慶期...，茲屆慶期，宜舉一極盛事以志不朽。因擇噴夕爾費尼阿省費裡地費城，建屋設會，廣致天下物產，互相比賽。美其名曰百年大會，又曰賽奇公會焉。...先期佈告各國，廣集天下寶物、古器、奇技、異材，互相比賽，以志其開國百年之慶。藉以敦好篤誼，獎才勵能焉。(李圭，2008：200-201)

世博會場位於費城西北部的費爾蒙公園(Fairmount Park)，用於博覽會展示設施的有115公頃的土地。會場規劃的負責人舒茲曼(Hermann J. Schwarzmann)在不設主展廳，廣設主題式展館和國家館等獨立展館的原則下，不到兩年的時間，115公頃的荒地改造成漂亮的公園，蓋了249幢大大小小的建築，這種分散式的設計概念對隨後世博會的佈局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獨立百年博覽會的展品大多佈置在主展廳、機械館、農業館、紀念館及園藝館等五大展館，主展館是由鋼鐵與玻璃為主要材料建成，占地20英畝，1,000多個參展商在內展示了成千上萬的展品。主展館的一端為主辦國展覽，也是本屆世博會的重點。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機械館56噸重的考立斯蒸汽機之外，就是貝爾發明的電話，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另一端為外國展區，各國都儘量把自己的展館裝飾得出眾，表現出自己國家的風采。(平野繁臣，1999：29-30；Findling，1990：55-59) 亦可參見李圭在〈美會紀略〉的描述：

會建於城西北隅飛莽園內，基廣三千五百餘畝。園以木城，為門十七。內建陳物之院五所：一為各物總院，一為機器院，一為繪畫石刻院，一為耕種院，一為花果草木院。基址之廣闊，營構之奇崛，局度之恢宏，陳物之美備，五大洲中，古今無兩。五院計用洋錢四百五十萬元。此外另造大小房屋一百五十餘處，則有美國公家各物院、女工院、各式馬車房、總理會務官公署、幫辦公事房。各國管理會務官公所，則各國預先定地自建者。會內稅關、銀行、電報局、書信館、給照所、巡捕房，與夫照像館、酒樓、飯店，並各項店鋪咸備。(李圭，2008：201)

當時滿清政府援照參加奧國維也納世博會的慣例，仍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選

派海關稅務人員組團參展，在國內徵集展品與處理本國赴會事宜者，為東海關稅務司德瑾琳、閩海關稅務司杜德維；親赴費城會場籌備展館與展示者，為粵海關稅務司赫政、前津海關稅務司吳秉文、潮海關稅務司哈捫德，並美國居華紳商鼎達、幫辦穆好士等數人，分司其事。為了使海關持續為滿清政府籌辦世界博覽會的事務在國內得到認可，1876年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經東海關稅務司德瑾琳推薦，受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委派詳細考察並記錄費城世博會，這也是中國頭一遭有官員隨參展團參與世博會事務，回國後完成《環遊地球新錄》一書，這可說是中國人對世博會最完備的一個現場參訪紀錄，詳細介紹費城世博會與心得，讓中國人進一步的認識世博會。李鴻章為李圭《環遊地球新錄》作序時，寫下「是錄於物產之盛衰，道裡之險易，政教之得失，以及機器製造之精巧，人心風俗之異同，一一具載。其非耳目所及者，則略焉弗詳。圭之此行，為不虛矣。」(李圭，2008：192) 李圭在《環遊地球新錄》自序時，亦寫下自己赴會的背景。

光緒二年丙子，美國創設百年大會。先經其國駐京公使，照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諮行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工商人等送物往會。並酌撥款項，劄行總稅務司赫德，援照奧國賽會例，選派海關稅務人員辦理。於是派委在本國管理赴會事宜者，為東海關稅務司德瑾琳、閩海關稅務司杜德維；駐會管理者，為粵海關稅務司赫政、前津海關稅務司吳秉文、潮海關稅務司哈捫德，並美國居華紳商鼎達等；另有幫辦穆好士等數人，分司其事。圭不敏，嘗承乏浙海關案牘十有餘年，得德君相知之雅，非尋常比。於是薦由赫公派赴會所，囑將會內情形，並舉行所聞見者，詳細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其所以慎重周詳者無他，亦欲敦交誼，廣人才，冀收利國利民之效也。(李圭，2008：193-194)

費城世博會設「各物總院」(大會主展示區)，也就是各個國家展示區，以美國所占面積最大，約居十之五六，英國次之，法、德、俄、奧又次之，日本再次之，中國展示區面積更小於日本。(李圭，2008：202，205) 參展國並不是每個都有獨立的國家館，35個參展國中只有15個國家建有自己的國家館。例如中國是參展國之一，沒有獨立的中國館建築，只有在大會主展示區中擁有「大清國」展區；而日本建有獨立的日本館，同時還擁有主題館中的日本展區。(互動百科：1876年費城世博会)中國展示區以木質大牌樓，上書「大清國」三字。門樓上的橫額為「物華天寶」對聯為「集十八省大觀，天工可奪」、「慶一百年盛會，友誼斯敦」，皆為

稅務司德瑾琳請李圭擬定。兩旁有東西轆門，上插黃地青龍旗，與官衙沒兩樣，外觀極為肅殺嚴肅。中國展區面積小於日本，中國參展物品共720箱，價值約20萬兩白銀。其中各種土特產與手工藝品，包括絲、茶、瓷器、綢貨、雕花器、景泰藍等，在世博會上大受好評。李圭在這次世博會上，看到了西方國家精美的展品，也瞭解到世界對商品的需求。像絲綢、茶葉的加工方法，瓷器、雕花、景泰藍的出口量以及其他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前景。(李圭，2008：206；俞力，2009：33；楠元町子，2016：87-88)

明治6年(1873年)美國政府邀請日本參加費城世博會，隔年決定參展，援例於1875年設置「美國費城博覽會事務局」專責參展事宜，由內務卿大久保力通擔任總裁，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擔任副總裁，事務局長由文部省的町田久成擔任，隔年5月免町田之職，改由內務省勸業寮河瀨秀治接任，嗅出從博物館的科普教育，走向勸業博覽會的產業政策方向。亦任命有參加世博會經驗的田中芳男、山高信離等菁英，擔任籌備參加美國費城世博會事務專員。(國雄行，2010：76；三島雅博，1993：22) 此次明治政府採取的參展方針，承襲參加維也納世博會的政策方向，學習美國的新工業技術，以及加強殖產興業政策推動力道之外，也在外國顧問德國人華格納的積極協助之下，日本參展的展品有絹織物(絲織品)、漆器、陶瓷器、工藝品及傳統產業製品等，但有別於維也納世博會展現傳統日本之美而已，也向外國人展示日本人引進西方教育制度的推動成果。(三島雅博，1993：22) 國雄行教授的整理，明治政府在費城世博會會場除建置兩棟「日本家屋」，以及在維也納世博會獲得好評的美術工藝品積極參展，以有更好的得獎成績。此次費城世博會的日本展品共分七類：(1)礦產、冶金術，(2)傳統產業製品，(3)教育與學習，(4)美術，(5)機械，(6)農業，(7)園藝等，共1966件，其中傳統產業製品1067件，佔展品的半數以上。其中賣得比較好的展品，有東京銅器、金澤銅器、高岡銅器、佐渡銅器、真葛陶器、九谷陶器、有田陶器、淡路陶器、美濃陶器、大阪黑漆器等，而得獎的展品有銅器、陶器為主的140件展品，博覽會事務局的報告也提到有140件得獎展品誠乃國家的光榮，更非浪得虛名。(國雄行，2010：76-77)

在李圭的《漫遊隨錄》對日本的展示有些紀錄與評論：「日本陳物之地，較中國大可加倍，位置亦甚井井。櫥櫃悉仿西式，器物亦間用西法製造者。正中隙地置水管，上起銅台，水珠倒瀉，四周綴盆草，極可觀。梁際懸金漆額，大書「帝國日本」四字，遍插白地紅心旗。公事房在極西首，管理會務官等皆泰西裝束，有時亦攜眷（眷亦穿著西裝）同行。倘非髮黑面黃，幾令人東西莫辨矣。」（李圭，2008：208）李圭進而評論道：「其有實用者，則惟印書活字板甚精，皆日人仿西法自製。又小樣機器數具，亦極靈巧。蓋已推廣其法，大有出藍之目。南窗下皆五金、礦塊、煤石類，不下數十種、數百塊，各考察焉。瓷器製自肥前地方者最佳。銅、棒、牙器多半東京所製。聞此番赴會，共用帑金二十七萬元。」（李圭，2008：208）更語重心長的說，日本政府專注於引進西方制度，國民習洋務洋文，勤於出國參展並組團考察學習，已有青出於藍之勢。

現其國迎來於泰西制度、器藝造作，悉能用心窺其深奧。如開掘五金、煤礦以裕國，更改水陸軍政以強兵，建立機器局、造錢局、電報局、郵政局、火輪舟車局以利國利民。四民中有留心洋務，或能作外洋語言文字者，皆羅致錄用，不遺一人，以獲其效，而勘其後。今亦選派多人來會，專司紀載。相傳一二年後，法國會畢，將仿其制踵行之，以張大其國名。凡此皆舉重若輕者，則在其任豪俠、競智巧，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也。（李圭，2008：208）

日本在積極動現代化躋身世界文明國度，派員出國調查各國文物國情的過程中，岩倉使節團於1873年參訪維也納世博會時，眼見會場西歐小國的展品與大國相比毫不遜色，進而認識博覽會是在非戰場上的國家間競爭，也就是一場嚴峻的「太平戰爭」，其中國家的自主與自立的精神尤其重要。三年後，日本再次參加在美國舉行的1876年費城世博會，當時在美國留學的菊池武夫（後來成為日本中央大學第一任校長）在參觀費城世博會的機械館，驚見歐美生產製造的印刷機、織布機、縫紉機、蒸氣車船機械、切割木金石的機器、抽水幫浦、1400匹馬力的蒸汽機，以及相關工程機械化的機具，有感於歐美先進國家壓倒性的工業實力，與日本傳統產業製品與手工藝品相較之下，頓時覺得自己與自己的國家無地自容，也開始對日本的現代化感到焦慮。（國雄行，2010：79-80）

中日兩國在1876年費城世博會又再一次的碰頭，日本更能精準掌握參加博覽會

要讓日本走入國際社會、學習西方文明與技術等目的，更深切的認識到日本與現代化的歐美國家工業化的差距，更深深體認到參加世博會與舉辦博覽會有助於國家的現代化。基於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費城世博會的參展學習經驗，於是在隔年的1877年舉辦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以推動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國策。(國雄行，2004：255) 相較之下，中國滿清政府無感於世博會的效益，仍委由海關總稅務司以「洋人代辦」的方式參展，洋人很自然從歐美人士想看的「異國風味」來塑造中國館形象，衍生日後國人對諸多負面形象的抗議批評聲浪。楠元町子教授有過這樣的結語，中國與日本可說是亞洲的兩個彼此競爭的國家，從費城世博會展示內容的評價來看，可以反映兩國政府對世博會關心與重視的差異，就此也可以看出面對歐美壓力，兩國所做的現代化努力程度。(楠元町子，2016：97)

四、中國首次由皇室成員率團參加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

1900年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之後，滿清政府憂心政權的維續，開使推行新政，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世博會的角色在跨20世紀前後逐漸受到政府與士大夫的重視，清政府參加世博會的態度較以往積極。劉楨麟在〈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一文，提出開賽會有八利：聯交誼、擴物產、獎人材、察商情、廣貿易、增關稅、興商地、除積習，而「中國不興商務則已，中國而興商務，必自賽會始」。(劉楨麟，1987：52-54) 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的〈賽會〉篇，更指出：「泰西以商立國，其振興商務有三要焉，以賽會開其始，以公司持其繼，以稅則要其終。賽會者所以利導之也，公司者所以整齊之也，稅則者所以維持而調護之也。中國於此三事皆未能因時制宜取長棄短，無惑乎日日言商務，而商務愈不可問也夫。」，「故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鄭觀應，1998：397、399) 1900年至1910年這期間中國參加的較大規模的世博會有1900年法國巴黎世博會、1903年日本大阪博覽會、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1905年比利時列日博覽會、1906年義大利米蘭世博會及1910年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其中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在當時中國社會引起的最大反響，也最具中國世

博會事業轉捩點的意義。

庚子事變後慈禧新政第四年的清光緒30年(1904年)，中國出資白銀75萬兩積極參與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雖然之前，滿清政府已多次參加世博會，然此次費用三倍過去海外參展之總和，也相同於以往曉諭商人自行參展或由海關、當地公使館策劃派員參加。此次則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所組成的官方特使團，由政府統籌參展事宜，並首次出現二家官民合資專為參展而設立的公司，展出物品印有專刊目錄。另由美籍女畫家柯姑娘(Katherine A. Carl)專為此次參展所繪製的巨幅慈禧太后畫像，也費盡心思自頤和園運至聖路易士會場展出。聖路易士世博會歷時7個月，4月30日至12月1日，在清末財政困難，歲收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如此勞師動眾又花大把銀子，甚至請出大清國皇太后慈禧肖像之舉，讓此次滿清的參加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別具意義。(王正華，2003：421-422) 雖然參展經費為歷次之最，也建造了國亭與中國館，不過展品仍由海關承辦，以農業、手工業及工藝品為主，甚至有些醜化中國人的裹小腳婦女、吸食鴉片的老爺等泥人塑像的展品引發爭議。(上海圖書館，2002：65-68) 年輕團員陳琪對此次參展作業的不佳、展品的不當、展示中國的效果不彰提出嚴厲批判。(Fernsebner, 2002：40-54) 陳琪在《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遊記》中對國人提出敬告，「中國國家賽品，因托洋員購運，陳設諸多劣敗，故略為表出，以告國人，俾知所以求工商業之改良，且使他日與賽勿復假手外人以辱國」。(轉引自羅靖，2009a：91) 大陸學者羅靖的研究亦指出：參加聖路易士世博會是中國近代博覽會史上的重要事件，除了滿清政府第一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參加世博會，亦派出最高品級的皇室貝子溥倫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組成官方特使團之外，赴賽商人之多、赴賽經費之充足，都是清史上前所未有的。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博覽會上，清廷官吏及海關洋員的所作所為引起眾怒，國人開始強烈要求由中國人自己籌辦世博會事務。滿清政府終於在1905年9月從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手中收回籌備參加世博會事務的自主權，此次參加聖路易士博覽會成為近代中國自主參與世博會的重要里程碑。(羅靖，2009a：74)

光緒28年6月(1902年7月)，美國總理會務大臣巴禮德來到中國，要求覲見清朝光緒皇帝，為慶賀美國購得路易士安那百周年，準備召開聖路易士世博會，以中國聚集天下所有製造之物與百工技藝，為美國人大為羨慕為由，特別邀請大清國皇帝陛下親臨該會，並殷盼大皇帝御飭貴國大臣等隨同前往。隨後得到光緒皇帝允准，屆時簡派大員前往助會。(俞力，2009：45)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外務部檔案》的資料可以佐證光緒皇帝同意簡派大員前往助會，光緒28年12月初七，外務部在為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的奏稿中曾寫道：

「臣等伏查，泰西崇尚工商賽會之設，在羅致各國物產工藝，區分類別，排列會場，俾各國之人咸得，較其精良，用資模仿，實於通商之中隱寓勸工之意。聞美國此次散魯伊斯賽會，其國家撥給該會鉅款，以贊其成。各國均特派大員赴會，蓋因此舉與交涉邦交顯有關係，而于商務尤為有益。中國物產甲於全球，徒以工藝未興、商情渙散，比諸各國實有不逮。現當整飭庶政之時，適美國有此大會，亟應加意講求，期於工商諸務有所裨益。曾詢美國使臣康格，各國派往員數大率用正、副監督三人者居多。臣等共同商酌，所有正監督一員，應請特旨簡派，此後一切赴會事宜，統歸該員主持，仍俟開會屆期，再行前往。至應派副監督，查有候選道黃開甲，才具幹練，熟悉商情；東海關稅務司美國人柯爾樂，精細妥實，在華多年均堪派充，隨同正監督辦理。該副監督等，應令先行前往，將度地建屋、陳設貨物各事宜，預為經營佈置。其赴會一切用款，所費不貲，亟應籌備，以資撥用。」同日奉朱批：「著派溥倫為正監督，餘依議」。(轉引自沈原，2006：73；俞力主編，2009：45-46)

慈禧太后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據當時上海的《東方雜誌》報導，滿清政府調撥府銀75萬兩，約50萬美元鉅款，首次以官方名義參加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在盛宣懷、端方和兩江總督魏光燾、兩廣總督岑春等重臣的建議下，1902年底慈禧太后任命溥倫貝子為清政府世博會參展團的正監督，負責一切赴會事宜。同時還任命黃開甲為副監督。黃開甲是晚清首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耶魯大學學習，熟悉美國情況。黃開甲先期赴美，負責具體布展事宜。滿清政府除撥出鉅款參展之外，慈禧特別派出溥倫貝子率團赴美主持中國館開幕，並帶著慈禧的私函與親筆簽名玉照轉赴華府會見老羅斯福總統。「慈禧太后畫像」是當時中國參展品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中國館內展示了頤和園的模型及來自中國各地的工藝產品，精選的中國古籍善本與地圖也在世博的自由藝術宮展出，並於展後贈送國會圖書館永久收藏。剛剛開辦不久的河北唐山「啟新洋灰

公司」的馬牌洋灰（水泥）還獲得了賽會的頭等獎，顯示清末民族工業的可觀進展。從居蜜博士編寫的《1904美國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所發掘的史料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慈禧，也不是一個顛預腐敗的清廷，而是一個懂得如何與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立私人情誼的大清統治者，與一批充分理解文化外交重要性的洋務大臣。（居蜜主編，2010：序、引言及第一章）

滿清政府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由直隸、山東、江蘇、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廣東、浙江、安徽、福建等11個省，籌集75萬兩銀子作為參加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的經費。而各省徵集的展品計有江西景德鎮製造的各種瓷器，以及來自各省的全紅小瓷瓶、平金椅靠、鍛靴、平金衣料、扣帶、官帽、朝帽、緞、絨、綢、貢緞、金羅緞、手帕、繡貨、緞聯、棉緞、繡屏、牙雕櫃子、金漆茶盆、金漆掛架、銀煙盒、銀叉、銀針盒、銀加斐壺、銀花瓶、銀胡椒盅、銀糖夾、銀煙灰盒、銀鹽盅、銀調羹、銀五味架、銀扣帶、銀茶瓶、銀酒盅、銀相片架、銀糖盅、銀牛奶壺、銀大酒盅、雕雲母壺、雕牙扇、金漆功夫箱、金漆蓮花、古瓶、繡花屏等等。對於參展的商品，則由瓊、粵、潮、閩、浙、杭州、江、金陵、蕪湖、九江、江漢、宜昌、重慶、天津14海關出口，全部免稅優惠，以鼓舞各地商人「或挾資前往專事考求，或辦貨同行兼圖貿易」。北京工藝商局赴美博覽會者共5人，商品以瑤瑯、地毯為大宗，兼有古玩、玉器、雕漆等物。上海茶磁公司準備了上等茶葉赴美參加博覽會，經評比各茶分數均在95分以上，獲得超等文憑，除會場零售之外，全部由美國白蘭克公司購去，並訂立行銷合約。中國物產豐富，歷史悠久，雖然沒有工業革命的產品參加博覽會，僅憑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湖北的茶葉、江西的瓷器、浙江的絲、茶等，在聖路易士博覽會獲得頭等獎牌9個，江寧的花緞、江西的夏布、四川的貨物等，獲9面金牌、3面銀牌、11面紀念牌，共計32面獎牌；中國政府及官員獲得16面頭等將牌、20面金牌、23面銀牌、12面銅牌、5面紀念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由美國女畫師凱薩琳·卡爾為慈禧太后所作的畫像，在聖路易士博覽會期間，在美國國家畫院正廳展出。大清國母后聖容讓洋人瞻仰，這一舉動打破了中國幾千年傳統封建禮教所奉行的婦女不能在大庭

廣眾下拋頭露面的陋俗。以及上海南洋公學會按照全堂建置形式製成一具木質模型，送往美國博覽會會場陳列，各國觀賽者莫不稱羨。(沈原，2006：74-75；)

1904年滿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並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學者提出此乃晚清時局下為考察他國商產、拓展貿易利源，敦睦國際邦誼之考量。(王正華，2003：422) 而此次中國參展的效益，就外交而言，中國特使不僅提早抵達聖路易，親自安排展出事宜，也大量出席相關儀式，在美國媒體及當地社交活動的能見度，恐為外交史上首見。副監督黃開甲畢業於耶魯大學，英文頗佳，又熟知西洋禮節，不僅負責展覽場地的選取與「中國館」的建造，也參加社交活動及儀式。首次出國的溥倫一舉一動廣受新聞媒體矚目，包括住處、膳食等生活細節均見詳細報導，尤其偏重其勇於嘗試西方文化的一面，而溥倫的見報率似乎遠高於包括男爵在內的日本特使團，以及於1904年底訪問博覽會的伏見親王(Prince Fushimi)。相對於日本的全面西式裝扮，清廷對於傳統服飾及髮式的堅持，反而使特使團代表在聖路易成為眾人好奇觀看的對象，中國特使的「異國風味」(exoticism) 帶來極高的「可看性」，成為與會者與媒體追逐、觀看與品評的對象。(王正華，2003：431) 就國際貿易而言，藉由此次世博會的參與，更多的中國人對國際經濟貿易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如《大公報》發表的社論就認為聖路易士博覽會乃是中國商務的重大轉機，建議中國應著手舉辦自己的博覽會，在漢口或上海設立會場，廣招國內外商家參與。「賽會之政，所以開民智、阜財源也。」對滿清政府而言，也是一個有力的棒喝，從1905年比利時的列日世博會後，就再也不將此項事務委託給海關，而是國人親自操辦。1906年義大利的米蘭世博會、1910年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世博會，清廷都直接委派駐意、駐比公使擔任監督，且從國內派出專門大臣襄助。1905年商部還訂立了《出洋賽會通行簡章》，對赴國外參加博覽會的各項具體事宜進行了明確規定，將「取彼之長，補我之短，以圖改良之計」作為赴賽的宗旨之一。(董增剛，2000：101)

雖有以上的效益，仍有許多負面評論，羅靖博士就認為1904年聖路易士世博會

上中國所蒙受的屈辱，有下列數端：(1)展品醜化中國形象：海關籌辦的部分展品形象十分醜陋和落後，令中國在國際博覽會上大獻其醜。如上海裝小腳婦人、寧波裝小腳病婦人等小木人數百個文弱腐敗之態。美國會商還在博覽會遊戲場內與華人勾結，雇傭纏足婦人現場展示小腳。甚至於有華人開辦、西人出資的振黃公司，在展館裡展出「華埠地獄」，展出的不外乎是華人吸鴉片、嗜賭博、役女奴等華人醜態。把中國人醜化到不堪入目的程度，以謀私利。(2)佈展混亂不堪：展品任意陳設，錯亂無章，竟有將中國教科書顛倒擺放。展品無說明，且參觀者詢問華人教科書事宜，無人能回答。(3)官員腐敗無能：身為正監督的溥倫對辦賽事宜用心甚少。副監督黃開甲從未參與過重要外事活動，對賽會從不過問。中國會場上所有事情由海關洋員負責，使得外人以為「賽品為西人經辦，西人為中國主人翁」。(4)海關洋員壓制華人：赴會的一些海關洋員在博覽會期間散佈狂言，處處擺排場，處處壓制華商，任意索賄，同時虐待華工，極其囂張跋扈。(羅靖，2011：154) 推其主因在委由海關承辦的「洋人代辦」參展模式所致。曾經隨聖路易士世博會參展團，日後成為籌辦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南洋勸業會」要角的年輕團員陳琪，對此次參展作業不佳、展品不當、展示中國的效果不彰提出嚴厲批判。在其著書《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遊記》就曾對國人提出敬告，「中國國家賽品，因托洋員購運，陳設諸多劣敗，故略為表出，以告國人，俾知所以求工商業之改良，且使他日與賽勿復假手外人以辱國」。(轉引自羅靖，2009a：91) Barbara Vennman 就曾在「1876-1904年間滿清政府參加五個美國世博會的中國形象」一文中指出：中國在世博會中所呈現的形象為「他傳」而非「自傳」，掌控權全然操在赫德領導的海關洋員手上，中國於此一西方主導的文明裝置中，處於被宰制的角色之外，更有來自主辦國的壓迫，難有中國自己的聲音，更遑論中國的形象塑造。(Vennman，1996) 另一篇從文化史角度討論博覽會參展國之視覺呈現與權力關係的專文，Carol Ann Christ也認為中國滿清政府沒有實際的主導權，參展規劃與展品佈置全操控在中國海關洋員與美方主辦當局，海關洋員以展品買賣為考量，陳列方式不敵其他參展國經過專業行銷規劃所呈現的秩序感，並提到美方主辦單位在

藝術部門犧牲中國獨厚日本，藉著貶抑中國而塑造日本成為亞洲藝術傳承的唯一守護者。(Christ, 2000) 日本奈良大學的久本明日香在「聖路易士世博會與清末中國」的論文指出：聖路易士世博會中國展品的讓中國人蒙受屈辱，倒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契機。(久本明日香, 2004)

早在1901年美國政府透過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與駐日大使邀請日本政府參加原規劃於1903年舉辦的聖路易士世博會，由於本國在1903年有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在大阪舉辦，再加上外有和俄羅斯帝國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影響力的兩國關係日益緊張，婉拒了美國政府的邀請。後因美國政府再三懇請，以及將聖路易士世博會延至1904年舉辦，日本才答應參展，經帝國議會同意撥款約80萬餘日圓，較日本參加1900年巴黎世博會的129.9萬日圓少了許多，最初由農商務大臣平田東助、後由繼任之農商務大臣清浦奎吾擔任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男爵松平正直擔任副總裁，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校長手島精一擔任秘書長一職，事務官、監察官、評審委員、文書共約近百人的組織規模。(山本光雄, 1970: 272-273; 伊藤真実子, 2008a: 129-130; 楠元町子, 2007c: 136-137) 哈里斯教授(Neil Harris)指出本次世博會有21個國家建置國家館，日本與中國是其中之一，由於日本豐富的參展經驗與細緻的籌備能力，即使在日俄戰爭的情況下，日本仍是僅有的一個國家在世博會開幕前把展館與展示布置妥當。明治政府此次世博會大約投入80萬日圓的經費，由臨時博覽會事務局副總裁的松平正直男爵督導所有的現場籌備工作，而民間參展廠商較以往有更好的組織動員，透過日本展覽協會(the Japan Exhibit Association) 的平台，全國各地的商會代表集聚東京研商參展事宜。(Harris, 1975: 47-48) 就山本光雄在《日本博覽會史》的記載，日本搭建日本館、眺望亭、商品店、金閣寺造型咖啡店、台灣咖啡店、吉野庵等展示設施400多建坪，參展人員2,447名，127,325件展品，2,500噸重，會場共銷售31萬美元，經評選獲頭等獎牌156面、金牌359面、銀牌607面、銅牌584面，共獲得大會1,706面獎牌的好成績。(山本光雄, 1970: 273) 有關此次日本參展的特色，展品已經不是來自各地方縣市的商品物件，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農商務大臣清浦奎吾曾於地方長官聯席會議要求各

地方首長要跨縣市合作選出足以代表大日本帝國的物產有別於過去偏重技術能力考叫來遴選參展商批品。在1904年聖路易士世博會開幕前爆發了日俄戰爭(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日本政府在1904年4月30日至12月1日聖路易士世博會開展期間，善用這個列強都出席的世博會平台，做足同盟協商、宣傳公關等活動，以爭取列強對日本出兵中國，迎戰俄羅斯兩大事的支持。(伊藤真実子，2008a：132-134，146-149) 工業先進國廣設博覽會有其原因，剛開始以經濟考量為主，為促進國內商業及國際貿易，勢必涉及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與交流。世博會既然為國家總體國勢的展示地，在所難免與國際局勢息息相關。1904年當日俄戰爭於中國東北郊戰方酣時，在聖路易士的博覽會場上，日俄競爭更是慘烈，日本因宣傳上的優勢，甚至奪取俄國原來規劃的參展空間。(王正華，2003：434-435)

聖路易士世博會的展示共分教育、美術、心芸、工業、機械、電氣、運輸、農業、園藝、林業、採礦及冶金、漁業及狩獵館、人類學、經濟、體育、家畜等16個展示部門 (Department)，底下又細分144個展示群組 (group)、807個展示類別 (class)，以及教育館及經濟館、美術館、心藝館、工業館、工藝館、機械館、電氣館、運輸館、農業館、林業漁業狩獵館、採掘及冶金館.....等14個主題展館。日本參與各主題展館的展品參見表3-7。

表3-7 1904年聖路易士世博會的日本展品

展館名稱	日本的展示面積(平方英尺)	日本的主要展示品
教育館及經濟館	5468	用照片介紹日本教育制度
美術館	7398	日本畫、油畫、彫刻、景泰藍、銅器、漆器、刺繡、金銀器、友禪染、陶磁器
心芸館	400	印刷機械
工業館	26179	絹織物、製絲順序模型、生絲、織物、扇子、玩偶、竹細工、化學用器械
工藝館	49194	銅器、傢俱、陶磁器、景泰藍、象牙雕、屏風、刺繡、漆器、真珠、金銀器
機械館	N/A	N/A
電氣館	1596	電信電話機、發電機、傳動帶
運輸館	16046	大日本帝國地理模型、刺繡世界航路圖、名勝彩色

		照片
農業館	10872	茶、醬油、菓子、素麵、花生、啤酒、麥芽糖、砂糖、醬菜、樟腦
林業漁業狩獵館	6948	木片草編織、木材、皮草、漁船模型、海苔、寒天
採掘及冶金館	8078	採煤場模型、精練場模型、銅坑模型、精選所模型、石炭、各種鉍物標本

資料來源：轉引自 楠元町子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の展示品と評価>，《愛知淑徳大学現代社会研究科研究報告》，第2号，2007年，p.140

王正華博士在〈呈現「中國」〉論文中，從聖路易士世博會案例，精闢分析中日兩國在世博會策展的觀念與經驗有很大差距。聖路易士世博會中展覽備受讚賞的日本與德國先完成其場地設計，若干裝潢組件或須在國內完成，屆時到會場依圖完成佈建，中國未能完全體會此策展概念。更重要的或許在於中國未能理解博覽會此一現代性場所中的「展示」，也就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學人所討論的「現代意義的展示」，在商品價值的神聖化過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十九世紀中期後逐漸出現如商店街、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型物品展示體，以及相關的特殊建築空間設計、陳列形式。另日本當代工藝置於象徵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美術宮」中展出，中國卻缺席，主因在中國本身並不積極在「藝術類」建立世界聲望或取得光環，也就是說中國並未出現西方民族國家形成時關於「藝術保存與展示」的論述，未意識到參加博覽會之某些物品足以表徵「中國文化」，而標示出的「文化傳統」有助於中國之國際形象。就拿選擇展館基地來說，日本特別離開中國所在的各國館區，選擇世博會地標之大摩天輪旁，原因即是著眼於觀看與展示。一是觀景人潮在大摩天輪上低頭即見日本館全景，二是攝影取地標之景時想必帶到日本館，三是攝取該館風采時，以巨輪為背景尤有意義，可彰顯本身科技文明的進步。日本的考慮可說是嫻熟於現代性的視覺表述，無怪乎整體展覽深受好評。而對於中國展示的評語頗多，在多數稱讚的聲音中，二處批評聲音特別引人注目，一則以同情語氣提及中國展區之擁擠，將之歸因於大會分配到的展地過於狹小，另一則直指中國展出「亂七八糟」，令人無法觀看。而在展品的行銷上，中國參展品由海關港口、地方政府、各地私人共同徵集而來，外國貿易商若有興趣可訂購，例如上海茶磁公司的茶葉因得獎而與紐約一茶行簽訂長期交易合同。為此，有參

展目錄以英文印製，隨展販賣，可供日後買貨參考。然而，日本專為博覽會參展設置之協會擔負與潛在買主日後連絡之責，中國沒有這樣的措施。（參見王正華，2003：431，446-447，455-458，460）

在1904年聖路易士世博會這個時間點，滿清末期的中國無法面對現代情境，反身觀照自己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定義，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國族論述」。同樣的，當時的中國不願意面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現代複合性展示設施」博覽會，又在米契爾(Timothy Mitchell)所說的「現代再現秩序」(modern representational order)之下，無法理解學習西方創造出來的「再現新裝置」(new apparatus of representation)世博會的操作技巧，從此中日兩國的博覽會事業發展差距就更加明顯。（Mitchell，1992：290）

五、中國首次由中國人以官民聯合方式參加1906年米蘭世界博覽會

1904年3月滿清政府外務部接到比利時政府擬於1905年召開列日世界博覽會的邀請，任命楊兆鏊為中國駐列日世博會欽差大臣兼監督，同時依慣例命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負責所有參展事宜，並由預定回國度假的比利時籍廈門海關稅務司阿裡嗣幫同料理會務。楊兆鏊通令各省徵集展品，結果國內反應冷淡，最後仍需仰賴海關總稅務司透過各通商口岸的海關稅務司就地徵集具有特色產品，基本上仍是官方展品為主。（上海圖書館，2002：72-78）列日世界博覽會展示期間，發生參展華商聯名上訴，有關海關代表阿裡嗣僭充監督、損失國體、濫耗公帑、凌辱商人等罪狀，要求撤換該員。賽會進行中的5月25日，周懋功等參會華商向外務部、商部發出電稟：「稅司阿里嗣充監督、欺凌商人、遇事阻梗，請即撤退。蘇商困，崇國體。商等不願再歸洋員節制，情急電稟，伏乞恩准。」第二天周懋功等人向駐列日世博會欽差大臣兼監督楊兆鏊呈送稟文：「自開會以來，諸多困難，就中情節，早在大人洞鑒之中。推原其故，皆由洋員阿裡嗣措置不善所致。彼既不能相助，近又遇事梗阻，種種苦狀，商等萬難再忍。昨曾發電稟請外部、商部撤退該員以蘇商困...。」正是由於楊兆鏊的正確認識，不僅及時地向滿清政府反映，個人也堅

決支持華商撤換阿里嗣的要求，且適時提出改革建議。在上給光緒皇帝的奏摺中，力陳以後政府參與賽會，應派員監督：「賽會關係商務，向由總稅務司領辦，以西人置華貨，所擇未必精，陳所不應陳，每貽笑柄。嗣後應由商部奏派熟悉業務丞參充當監督，會同駐紮該國使臣辦理。」在致商部的諮呈中，建議妥定賽會章程：「賽會宗旨，專為改良工藝。非精緻華麗之品，不足爭衡。現當貴部整飭商務，無美弗臻。擬請妥定賽會章程，使商業挽回利權，獲益匪淺。」商部在接到楊兆璽的諮呈後，參照各國賽會情形擬定《出洋賽會通行簡章》共20條，徵詢外務部的意見後，於光緒31年十月初五日(1905年11月1日)，經核准頒行各省。其中第一條即確定賽會參加事宜由商部負責承辦：「外國遇有賽會，由商部諮行各省督撫，曉示商人，有願赴賽者務於期限內呈報本省商務局、商會，轉報督撫，匯諮商部辦理。」第二條確定由中國官員負責的總事務所是經理參會的機構：「外國會場應設立總事務所經理華商賽會事宜。屆時或奏派監督，或出使大臣就近照料，或派員監理，由外務部、商部酌核辦理。」從此改變海關洋員把持賽會操辦情況，結束30餘年由海關外籍稅務司承辦賽會參展的歷史。(尹淑梅、屈春海，2006：93-95)

1905年滿清政府核准《出洋賽會通行簡章》頒行各省的同時，在義大利西北部與瑞士南部的交界處，當時歐洲最長的辛普朗鐵路隧道建成。為慶祝此鐵路隧道通車及該地區商業的發展，義大利政府決定在工業城市米蘭，舉辦以運輸為主題、涵蓋經貿交流與漁業發展方面的世博會。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刊布的〈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義大利米蘭賽會史料〉，光緒31年2月20日(1905年3月25日)，義大利駐華公使巴樂禮為設立賽會內有漁業分會，曾照會清政府邀請中國派員參加米蘭國際博覽會漁業賽會事宜。該照會寫道：「本國於一千九百零六年擬在秘拉諾(米蘭)地方設立賽會，該會內極關重要中特有漁業分會，今接得本國政府之諭，應請貴部轉達商部並海關總稅務司，俾得通知各省及通水路各地方官員，令其出示勸囑，或漁業公司，或漁業之人，均行預備賽會。並希見復，以便稟覆本國政府為盼。」(轉引自郭慧，2006a：37) 商部接到外務部轉送的照會之後，發函與南北洋大臣相商如何辦理。結果在南洋大臣周馥的舉薦下，由時任商部頭等顧問官

的張謇出馬策劃參與此次漁業賽會。(馬敏，2001：16) 滿清政府於20世紀初期已看出世博會利於邦交，更益於商務，時值清末推動憲改與發展商業的新政時期，決定參加米蘭世博會倒也合理。清駐義大利大臣許珏為米蘭賽會中國應派員參加事致外務部函更提及參會有助於國內鐵路建設，「知該會所包甚廣，漁業特其一端。查此會原起系為慶賀義大利、瑞士兩國交界地方所鑿新潑龍山洞鐵道告成而設。……故會中章程以陸運、海運、河運三項居首。中國各省現正議開鐵路，如派員前來考察，似于講求路政有裨。」(轉引自郭慧，2006a：38)

南洋大臣周馥的舉薦由時任商部頭等顧問官的張謇策劃參與此次米蘭世博會(含漁業賽會)，張謇據其1903年考察日本大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所得經驗，並研究了歷次漁業賽會的情況後，對此次中國參賽提出了兩點至關重要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清政府賽會政策的轉變。首先，建議成立七省漁業公司，由中國官方和民間合作自籌展品赴會，以整合夙不往來的七省漁業，使不分南北相互保護各安其業。同時可以參加博覽會的機會，學習世界各國漁業方面的先進經驗。其次，張謇提請滿清政府一定要注意此次漁業賽會所暗含的領海主權問題，建議以英國繪製的中國海圖為基礎，編繪漁界全圖在博覽會展出，將領海主權附於漁界，順勢為中國海權正名發聲。商部接受張謇的建議，以鄭孝胥為總理，籌組七省漁業公司。同時商部、南洋大臣周馥命令陳壽彭縣令、邱寶仁海軍副將，設局編繪漁界全圖，1906年2月完成中國海總圖二幅、沿海七省分圖七幅，不僅附有經緯線，且詳譯中英文。(謝輝，2002：44；馬敏、艾險峰：1)

在此次博覽會上，中國共獲得獎憑、獎牌百有餘張。其中張謇創辦的鹽業公司呂四鹽場得頭等獎，釀造公司的酒、頤生公司的罐頭得金牌獎。更為重要的是達到了表明中國領海主權的預期目的，以海產品物，中國漁具漁史，騰我東南海漁界圖而去，彰我古昔領海之權。清政府以前參加的國際博覽會因為是由海關總稅務司洋員把持，「以西人置華貨，所擇已未必精，陳所不應陳，每貽笑柄」。在米蘭博覽會上，首次依照商部訂立的《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政府和民間合作籌辦參加國際博覽會，中國終於擺脫了海關洋員的把持，使得籌辦博覽會朝制度

化方向發展。(馬敏，2001：17；謝輝，2002：44-45) 其中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插曲：這次米蘭博覽會，義大利駐天津代辦達斐祿任期已滿即將回國，他表示願意隨往充當中國此次博覽會監督隨員，中國駐意大使黃誥也正在考慮選派監督隨員一事。

意駐華公使巴樂禮為推薦達斐祿充任賽會隨員事致外務部函(光緒32年正月28日)

敬啟者：日前與貴中堂面晤時，本大臣曾保薦本國人達斐祿可稱賽會隨員之選。當承貴中堂面許代作介紹，轉薦於駐羅馬之黃欽使，俾其充中國賽會隨員之任。今將該達斐祿名片附送，以便請貴中堂便中函達黃欽使。一俟達斐祿到羅馬前往拜謁時，即可與黃欽使當面商訂也……。專此，順頌日祉。

不料赴意參展的中國商民聽到欲派洋人達斐祿充當展會監督隨員的消息十分不滿，紛紛表示「如派洋人充當中國監督隨員，商等情願罷會歸國」。中國商人林毓、林子屏、羅誠等人聯名呈遞稟文：「近聞有西人欲來米郎充華商賽會監督處隨員，商等不勝憂甚。緣商等出洋賽會，不過特以自由考求商務進步，以我之弱就彼之強，取彼之所有，益我之所無。賽會假手西人，非徒商等不能考求商務實學，而且西人往往趁賽會之機徒圖利營私，置我國體於不顧，動則魚肉商人」。他們認為：「我華人現自知賽會，言語精通，愛國之心尤切，我國人辦我國事，理所當然，權得自由，賽會之利益亦歸我。」並列舉了法國巴黎展會洋人隨員華必樂、美國聖路易展會洋人隨員伽爾、比利時列日城展會洋人隨員柯立司等，對中國商民欺詐、辱虐的種種事實。指出：洋人隨員將我國小腳女鞋、偶像木主等物陳列高處，令人觀看，而凡中國美產，如絲、茶等件，則棄之於地，任人踐踏，虐商吞款，全無忌憚。駐意大使顧及到商民抵制洋人隨員的情緒，又得知赴會商民中有漁業分會會長羅誠，精通英、法、意多國文字，而其他商民也曾數次出國參加展會，夙諳規矩，最終作出這次展會不再任用洋人為監督隨員，而改由國人擔任的決定。(郭慧，2006c：pp.126-127)

因此，中國終於擺脫了海關洋員的把持，使得籌辦博覽會朝制度化方向發展。而張謇在參賽人員臨行前反復叮囑他們「各用所長，以華洋文各記所見，賽畢而歸，作增進中國漁業之根底」。會後郭鳳鳴寫成《義大利萬國博覽會紀略》、《調查歐西實業紀要》二書，張謇在為這二本書作序中寫道：「夫賽會云者，各競其長，

而短者取人之長而自益。今以我視同列于會場之國，未暇論長短，而當論有無。則是我國實業尚在胚胎，未可遽言幼稚也」。米蘭博覽會的情況更加深了張謇的危機感，進而投身于振興實業的活動。(謝輝，2002：45)

此時值得一提的是為新政清廷派出五大臣分率兩支考政大軍周遊世界，不期而遇西方世博會的這段歷史。端方、戴鴻慈一路的考察任務較為繁重，匆匆行過12國，在返國覆命前夕，卻在義大利遇見米蘭世博會。依據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所載他們前往參觀米蘭世博會的養蠶業館、機器館、菸草業館、軍器館、寶石館、油畫館、法國館，參觀各國家館之後，評論認為法國館規模最為宏闊，而對比中日展品，覺得「日本精心銳力出賽，賽品皆其上選，駸駸乎有追步英德之概，獨我國局面太狹，……殊無足觀者，幸漁業公司尚可自成一結構耳。」(戴鴻慈，2008：503-505) 端方在歐美期間，除考察各國政治外，還注意留心各國之博覽會，並專程去義大利考察了正在米蘭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及漁業賽會，對博覽會有了深刻的體驗與認識，回國後不久即被清廷任命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他赴南京上任後不久，便醞釀舉辦博覽會。光緒34年11月(1908年12月)，端方即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名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摺，稟請諭允創設第一次南洋功業會。奏文說明泰西各國無不以賽會促其實業發達，獎勸之方，尤以合群競爭為進步。中國以交通不便之故，農工商等多守舊法，簡陋相仍，利源外溢而無計挽回，機軸日新而不知爭勝。因此，亟需仿行西法開設賽會。(朱英，1988：68)

六、小結：日本實質領先中國30餘年參展學習世界博覽會

雖然，1866年中日同時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參加隔年於巴黎舉辦的世博會，中國滿清政府總理衙門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加。僅發函授權總稅務司署統管參展世博會工作，由福州海關稅務司法國人美理登利用回國假期參與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協助滿清商民參賽事務，形成了以後近40年，陸續有30多位稅務司藉回國休假兼辦世博會事務。也在這個時候，接受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建議，決定派遣「斌椿歐洲考察團」，隨同回歐洲度假的赫德，親赴法、

英、德、俄等歐洲九國考察，不只是中國人第一次出國遠行考察西洋情況，還順道參觀施工中的1867年巴黎世博會場館。反觀1866年的日本，在駐日大使羅修斯與幕府要員栗本鋤雲的居中協調，幕府為向各國宣示其政權統治日本的正統性，以及薩摩和佐賀兩藩為了要利用參加法國世博會做採購軍艦商談的目的，最終決定參展，由德川幕府率同薩摩和佐賀兩藩參展，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或許此次組團參加的展示效果不大，倒是可以看到1867年的日本已經有組織計畫，能夠徵詢洋顧問意見，進行展品徵集與展館規劃，而隨團出洋籌備本次世博會參展的田中芳男、佐野常民、山高信離、清水卯三郎等社會菁英，扎實習得世博會這個西方創造的文化裝置，確實為日本儲備了一批舉辦博覽會與殖產興業的人才。

1870年奧地利政府向世人宣佈在三年後的1873年舉辦維也納世博會，於1872年派特使親赴日本面見明治天皇陳遞約瑟夫一世親筆邀請函，年底日本政府即決定參加，任命參議大隈重信、外務大輔寺島宗則、大藏大臣井上馨處理博覽會事務。1872年1月特別成立「博覽會事務局」，由大隈重信擔任總裁、駐奧國公使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負責徵集展品與籌備海外展示事宜。而幾個月前的1871年11月，日本明治政府為外交事務與考察歐洲國家文物制度以師夷之長，首度派遣重臣所組成的「岩倉使節團」，由右大臣岩倉具視銜命率參議木戶孝允、外務少輔山口尚芳、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一行60餘人，至美國及歐洲諸國交涉修改與美英法等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做西方文物制度考察。1873年9月13日回到日本，途中取道維也納參觀世博會，而日後才有大久保利通的規劃與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以及1877年首度在東京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1870年清政府也受到邀請，起初也不願參加，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參加。在奧國駐華公使強力建議清政府組團參展，方不失大國顏面。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再加上滿清政府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自然委由當時受到總理衙門信任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全權處理，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展極為成功，從此確立由海關承辦世界博覽會參展事務，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把持32

年操辦滿清參加世博會的展出業務，於是有人戲稱中國之賽會乃「赫德之賽會」。

也就是說在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這個時間點，日本已能精準掌握參加博覽會是要讓日本走入國際社會、學習西方文明與技術等目的，並藉此廣徵展品的機會向國人作了參加世博會的政策宣示。在籌備組織上，大量起用佐野常民、町田久成、田中芳男、山高信離、近藤真琴、關澤明清這些有西學背景與世博會經驗的本國菁英。在「參展團」的佐野常民、近藤真琴，以及「岩倉使節團」的大久保利通等菁英，從世博會的意會到認知「自主精神」的重要性，開始規劃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推動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國策。相較之下，中國滿清政府則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再者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認為是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方委由績效卓著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主辦參展事務，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32年間由海關承辦的「洋人代辦」參展模式，與日本明治政府「國人自辦」的參展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對兩國在博覽會事業的進展也產生極大的影響，兩國菁英學習世博會與蓄積籌備能量上，已開始出現差距。實際上，在此次世博會上，日本展示品贏得217個獎，35個參展國當中排名18，亞洲第一大國的中國僅獲得117個獎牌，排名21，落在日本之後。日本的鎌倉大佛模型、五重塔模型、陶瓷、織物、美術工藝品等展品，以及日本式庭園建築的展示，更受到歐美各國的重視，引起歐洲藝術史上所謂的「日本流風」風潮。

相較於日本1873年有組織的參展，與派出大臣出洋考察並順道參觀世博會，4年後有第一屆全國性博覽會「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參展學習模式，中國滿清政府晚了33年，在1906年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米蘭世界博覽會，結束持續30多年由海關總稅務司洋員把持參賽的歷史。是時滿清政府也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米蘭世博會，在考察大臣端方的努力之下，才有4年後的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的舉辦。

第四節 中日兩國何時開始舉辦世博會—實作階段

就中日兩國同在1866年接到法國政府邀起，參加隔年1867年第二屆巴黎世博會，日本德川幕府接受邀請代表日本首次組團參展，滿清政府卻是冷淡的曉諭商民參展而已，日本更領先於1877年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而中國卻遠遠落後30-40年，在1906年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國人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組團參加米蘭世界博覽會，4年後的1910年中國才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中日兩國彼此之間博覽會事業發展的落差？本論文試以世博會這個活動關鍵成員的認知、能力與經驗為起點之外，也關注世博會鑲嵌在一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國際等因素所形成的社會系絡。本論文把世博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一個團體或社會菁英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過程，本章前三節已把關鍵活動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何清楚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的過程歷史，做了整理分析與比較。接下來的第四節將整理日本明治政府與中國滿清政府自己實作舉辦全國性博覽會的歷程，以比較分析中國與日本博覽會事業領先或落後情形。

一、日本領先於1877年起舉辦6次全國性內國勸業博覽會

日本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正式參與1867年法國第2屆巴黎世博會，這一階段的日本官員與社會菁英對世博會的看法，比較上把「博覽會」意會為「廣為展示，萬民觀覽」之場會。寺下勅筆下創造「博覽會名詞之父」的栗本鋤雲，在1864年日本幕府首度接到法國政府邀請參加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的時候，當時駐日大使羅休斯曾探詢幕府監察官栗本鋤雲日本參加巴黎世博會的可能性，栗本當時參酌大使的書記官告知Exposition具有「廣為展示」的意思，並結合日本當時本草學領域所舉辦的「藥品會」經驗，將Exposition巧譯為「博覽會」，指的是能夠讓物產展示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亦可以見得日本博覽會事業發展與「藥品會」之間的連結。(寺下勅，2005：52；椎名仙卓，2005：6-7；蘇碩斌等譯，2010：138)

德川幕府接受邀請參加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決定由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

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席，隨團的有幕府的澀澤榮一與博物學者田中芳男、佐賀藩的佐野常民及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等人，可說是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這些團員日後成為明治維新與日本博覽會事業發展的關鍵人物。其中，當時身為德川幕府博物學者與蘭學者的田中芳男，曾應法國世博會之邀，收集整理日本的昆蟲標本56箱參加第二屆巴黎世博會，也在當時「江戶博物學」的風潮之下，田中芳男除建立日本現代動物學研究之外，並首次提出以「博物館」命名1869年明治政府新設立的自然科學標本展示設施。1871年設置的文部省博物局曾經以「文部省博物館」之署名，對外公告將在明治4年(1871年)10月假湯島聖堂舉辦博覽會，後因故延至明治5年(1872年)3月由田中芳男成功舉辦「湯島聖堂博覽會」，從此日本各地紛紛舉辦博覽會(參見表3-8)，正因為如此田中芳男也被稱為「日本博覽會之父」。(椎名仙卓，2005：93，109-110) 此外，1867年江戶幕府還政於日本明治天皇(大政奉還)，明治新政府除延續積極參加世界各國的世博會之外，也開始規劃在東京、京都、大阪各地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全國各地亦紛紛舉辦自己城市的博覽會，如明治4年(1871年)官民合作舉辦的京都博覽會，至昭和3年(1928年)期間總共辦了56屆。日本德川幕府時期本草學領域所舉辦的藥品會，以及明治時期博物學風潮下的1872年湯島聖堂博覽會與各舉辦的博覽會，為1877年起接連舉辦5屆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營造出有利的發展環境。

表3-8 日本明治4年(1871年)~明治41年(1908年)舉辦的博覽會

舉辦時間	名稱	舉辦場所	主辦者
1871 (M4)	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西本願寺	京都博覽會社
1872 (M5)	第1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西本願寺、知恩寺、建仁寺	京都博覽會社
	湯島聖堂博覽會	東京都湯島聖堂	文部省博物局
	額田博覽會	愛媛縣岡崎專福寺	
	和歌山博覽會	和歌山縣鷺森本願寺	
	廣島博覽會	廣島縣嚴島千畳閣	廣島縣
1873 (M6)	金澤博覽會	石川縣兼六園	加賀金澤市
	金毘羅博覽會	香川縣金毘羅神社	金毘羅宮
	第2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御所、仙洞御所	京都博覽會社
	伊勢山田博覽會	度會郡山田	度會縣丁神社庁

	茨城博覽會	茨城縣	西高辻信巖、三木隆助
	山下御門內博覽會	山下御門內博物館	內務省博覽會事務局
	松本博覽會	松本城	松本博覽會社
1874 (M7)	山下御門內博覽會	山下御門內博物館	內務省博覽會事務局
	第3回京都博覽會	御所、仙洞院	京都博覽會社
	名古屋勸業博覽會	東本願寺名古屋別院	愛知縣下博覽會社
	奈良博覽會	東大寺大佛殿	
	新潟博覽會	白山神社	新潟縣
1875 (M8)	新吉原博覽會	江戸金瓶樓	俵屋和助、泉屋忠兵衛
	第4屆京都博覽會	御所、仙洞院	京都博覽會社
	第1屆奈良博覽會	東大寺大佛殿	奈良博覽會社
	新潟博覽會	新潟	京都博覽會社
1876 (M9)	第5屆京都博覽會	御所、仙洞院	奈良博覽會社
	第2屆奈良博覽會	東大寺大佛殿	堺博物館
	堺縣博覽會	堺、南宗寺	宮城縣
	宮城縣博覽會	仙台、櫻花公園	奈良博覽會社
1877 (M10)	第1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上野公園	中央政府
	第3屆奈良博覽會	東大寺大佛殿	
	第6屆京都博覽會	御所、仙洞院	京都博覽會社
	堺博覽會	南宗寺	堺博物館
	第1屆秋田博覽會	秋田、佐竹義純別邸	
1880 (M13)	奈良博覽會	奈良縣東大寺大佛殿	奈良博覽會社
	琴平博覽會	愛媛縣琴平神社	愛媛縣
	第9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御所仙洞御所	京都博覽會社
	長崎博覽會	長崎縣長崎公園	長崎縣博覽會本部
	第2屆愛知縣博覽會	愛知縣名古屋博物館	愛知縣
	茨城博覽會	茨城縣築波神社境內	
	大分博覽會	大分縣大分郡大分町	大分縣
	秋田博覽會	秋田縣八橋植物園	
宮城縣博覽會	宮城縣仙台西公園	宮城縣	
1881 (M14)	第2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東京都上野公園	中央政府
	第10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	京都博覽會社
	奈良博覽會	奈良縣東大寺大佛殿	奈良博覽會社
1882 (M15)	第11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	京都博覽會社
1883 (M16)	第12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	京都博覽會社
	第1屆水產博覽會	東京都上野公園(內國勸業博覽會跡地)	農商務省
1884 (M17)	第13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	京都博覽會社
1885 (M18)	第14屆京都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	京都博覽會社
1890 (M23)	第3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東京都上野公園	中央政府
	京都美術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	京都博覽會社
1893 (M26)	第17屆奈良博覽會	奈良縣	奈良博覽會社

	(美術工藝博覽會)		
1894 (M27)	富山市設博覽會	富山県	
1895 (M28)	第4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	中央政府
1896 (M29)	創立25周年記念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第2屆水産博覽會	兵庫縣和田岬	農商務省
1898 (M31)	第1屆婦人製品博覽會	京都府御苑内舊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899 (M32)	全國意匠工藝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900 (M33)	全國貿易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901 (M34)	第1屆全國製産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902 (M35)	第2屆全國製産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903 (M36)	第5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大阪府天王寺今宮	中央政府
1904 (M37)	第3屆全國製産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905 (M38)	第4屆全國製産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1906 (M39)	戰勝記念博覽會	大阪府天王寺今宮	大阪府
	記念內國特産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孩童(こども)博覽會	東京都上野公園	同文館
	孩童(こども)博覽會	大阪府府立博物場	
1907 (M40)	東京勸業博覽會	東京都上野公園	東京府
	東京婦人博覽會	東京都芝公園(東京勸工場)	婦人博覽會協會
	郵政博覽會	東京都芝公園郵政博物館	通信省
1908 (M41)	第5屆全國製品博覽會	京都府岡崎公園博覽會館	京都博覽協會

資料來源：整理自伊藤真実子〈19世紀日本の知の潮流：江戸後期～明治初期の百科事典、博物学、博覧会〉，《19世紀学研究》，第6号，2012年，p.76；大貫涼子〈地方博覧会の変容(序論)：明治前期を中心として〉，《國學院大學博物館學紀要》，Vol.37，2012年，pp.12-13。

作者註：前掲伊藤真実子之「資料1 明治初期博覧会開催一覧」，以及大貫涼子「表2 明治13年～明治40年開催の博覧会」都有明治年換算西元年的謬誤。伊藤真実子資料1表列之1871 (M3)～1877 (M9)，西元年換算成明治年都少了一年，經校對應修改為1871 (M4)～1877 (M10)；大貫涼子之表2，從原表列之「明治30年 第1回婦人製品博覧会」開始至「明治40年 第5回全國製品博覧会」，經校對也都少了一年，應修正為「明治31年 第1回婦人製品博覧会」……「明治41年 第5回全國製品博覧会」。

(一) 1757年起舉辦原始的博覽會(藥品會)

藥品會的最早起源於德川幕府第九代將軍德川家重在位的1757年(寶曆7年)，由平賀源内等人發起，委請師匠田村藍水為會長而舉辦。當時以田村一門為中心的21名參展人，共提出180種參展物。隔年1758年，以田村為會長舉行的第二屆藥品會，參展人增加至34名，參展品增加至231種，隨後1759年平賀源内自身擔任會長的第三屆，以及1760年松田長元擔任會長的第四屆陸續舉辦。1762年，日本博

物學史上最值得記載的第五屆東都藥品會，也由平賀源內召集開辦。此次參展品的數量，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11,300種。此會的參展人雖然僅限江戶的本草學者，卻能夠拓展到全國，並以關懷廣泛物產之由成功進行動員。各地的參展申請人，都是透過最接近物產所在地的「三都產物請取所」將展品送到江戶，因此也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物流網絡。結果，參展品的範圍包含了長崎、近江、攝津、播磨、紀伊、信濃、越中等廣大地域，內容除了藥物之外，也包括「天然產物」。平賀源內在開辦之際，就已將印有宗旨的簡介分送全日本的物產商家。藥品會並非在平賀源內主辦的第五屆之後就消失，1780年代之後的田村藍水之子田村元長以及田村藍水的門人桐山正哲，都曾經數次在江戶舉辦藥品會，甚至到了19世紀以後，京都的山本亡羊、大阪的岩永玄昌堂、名古屋的伊藤圭介，也以江戶醫學館為據點接連開辦，幾乎各地都還在年年舉辦藥品會和物產會。18世紀後半開始的這個藥品會系譜，可說是明治博覽會思想前哨站的胚胎。然而，這種藥品會雖由民間的博物學者舉辦，卻不具有動員廣泛大眾的文化機制效力。(伊藤真実子，2012：66；蘇碩斌等譯，2010：138-139)

(二) 1871年起明治初期地方性博覽會

1867年江戶幕府還政於日本明治天皇(大政奉還)，明治新政府除延續積極參加世界各國的博覽會外，也開始規劃在京都、東京、大阪各地舉辦國內博覽會，估計到1877年為止，共舉辦了41次「博覽會」，其中明治4年(1872年)10月1日至10月10日在東京湯島聖堂由文部省舉辦的「湯島聖堂博覽會」，為中央政府首度主辦的展示活動，而由地方政府而如京都商人三井八郎右衛門、小野善助和熊谷久右衛門等人，則是在10月10日於京都西本願寺舉辦為期一個多月(至11月11日止)的「京都博覽會」，有11,211的參觀人次，展品主要是私人珍藏的骨董，為日本舉辦博覽會的嚆矢。據丸山宏與工藤泰子兩位教授的研究，京都在幕末戰火與遷都東京伴隨而來的經濟衰退危機之下，推動振興京都三大政策(殖產興業以加速京都的現代化、琵琶湖的整治、使京都成為全國首選的觀光都市)。為此，從明治4年(1871年)到昭和3年(1928年)期間，幾乎每年舉辦京都博覽會，共56屆之多。當時的京都大

參事(副知事)榎村正直擔心遷都東京後京都的沒落，疾呼有志之士於明治4年(1871年)在京都國寶西本願寺書院舉辦日本最早的博覽會，以提升文化、振興美術、復興古都、宣傳觀光都市。後由三井財閥的大當家三井八郎右衛門(高福)、豪商「小野組」的小野善助(包賢)、鳩居堂的熊谷久右衛門(直孝)三人集資，並接受京都府一部分資金的援助，於1871年10月11日至11月11日期間，舉辦為期33天的京都博覽會，入場參觀總人數約11,200人，主要展示項目為骨董與傳統手工藝品，共336件展品。雖然榎村正直為會後由三井高福、小野包賢、熊谷直孝三人編輯出版的《博覽會目錄》寫序的時候說：「博覽會為展示發明人的智慧，而非炫耀私家的骨董收藏」，不可否認的當時京都博覽會主要還是在展示私人骨董珍藏，依據《博覽會目錄》的記載，1872年京都博覽會分成皇國區、西洋區及中國區，共336件展品。其中皇國區與中國區，分別為166件與131件展品，西洋區則有39件，裡面有Rudolf Lehmann(最早在日本編撰出版和德辭典，並受聘在京都府的歐洲學舍教授德語)與Leon Dury(京都府法國學校的法語教師)兩位提供的21件展品，包括火車模型、旅行用的餐具、六連發迷你手槍、法國史書、畫具等。1871年京都博覽會成為以後每年舉辦的京都博覽會前身，閉幕後第四天的11月15日，京都府與民間團體合力組織半官半民的「京都博覽會社」，負責日後在西本願寺舉辦京都博覽會的規劃與籌備工作。除留下「京都博覽會社規則(設置要點)」之外，還留下「京都博覽會參展意願書」、「京都博覽會外國人進出京都規則」、「京都博覽會外國人投宿京都手續書」等博覽會營運的相關文件。(工藤泰子，2008：77-80；丸山宏，1996：221-234)雖說是由地方舉辦的博覽會，在籌備與營運過程中，徵展、集客及組織方面，都有文件化與制度化的專業展會水準。

呂紹理教授在《展示臺灣》書中評論道：除了京都博覽會稍具與西方博覽會近似的審查制度和以機械展示為主的明確意識之外，絕大多數地方型的展示活動雖以博覽會為名，但實際上仍延續了江戶時代以來的物產會或藥品會，近乎廟會趕集與娛樂雜耍的性質，而與歐美當時博覽會整體的意義完全相背。相對而言，1876年由當時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提案，1877年舉行的「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才真

正符合了19世紀中葉以降歐美博覽會的精神與目標。(呂紹理，2005：80) 也就是吉見俊哉教授所說的，京都博覽會或許是個例外，因為日本大多數的地方博覽會，實際上更接近江戶時代的開帳¹⁰、鬧市、物產會或藥品會，保留著某種濃厚的「見世物」性格。而1877年以後持續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一方面接續了地方層級博覽會的流行風潮，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江戶的見世物本質，最終建立一種西方博覽會新穎透明的視線空間。(吉見俊哉，1992a：123；蘇碩斌等譯，2010：118) 在此之前，日本國內確實沒有以「博覽會」為名的活動。例如石井研堂即曾提到，明治4年5年到10年間的博覽會，與傳教、剪髮、學校、馬車、人力車的流行，同是文明開化的要素，且盛極一時。(轉引自丸山宏，1996：227) 因此，在明治初期的「博覽會」，也是作為一種傳進日本的新風俗加以隆重舉辦。例如：明治5年在京都、和歌山、岡崎、土浦、高知，明治6年在京都、茨城、福岡、松本、島根，明治7年在京都、名古屋、新潟、金澤等地，都有紀錄每年在日本各地都有地方博覽會開辦。其中，京都從明治4年以後每年舉辦的京都博覽會，就是由一些當地的資本家所推動，有意重建失去帝都地位後略呈衰退的京都經濟；這些博覽會採用審查制度、展示進口機械等作法，實已具有對歐洲博覽會的意會。(吉見俊哉，1992a：122-123；蘇碩斌等譯，2010：117-118)

在進入1877年「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討論之前，先就明治政府於1872年首次舉辦的「文部省博覽會」做一整理。1871年京都博覽會的隔年，文部省博物局假東京湯島聖堂舉辦「湯島聖堂博覽會」，會期50天，參觀者192,878人次，展品仍以骨董為主，當時有股反「厭舊競新」以保護古物的風潮，中心人物為文部省的町田久成與田中芳男，兩位往後成為日本博覽會與博物館事業的重要人士。(國雄行，2005：23-25；寺下勅，2005：10-13；椎名仙卓，2005：93，111-112) 就日本國學院大學大貫涼子有關〈明治前期地方博覽會的變遷〉研究，明治政府的博

¹⁰開帳亦稱「開龕」，是江戶時代寺廟或神社將祕藏的神佛珍寶「打開龕帳」，開放一般信徒禮拜觀賞的盛會，多在春季舉行，後來亦衍生有「鬧市」(盛り場)的意思。(蘇碩斌等譯，2010：118)

覽會事業從文久元年(1861年)在「蕃書調所」¹¹ 開設物產學開始，物產學可說是國家經濟的根本，為了繁榮貿易，有必要調查國內物產的狀況。明治3年(1870年)在大學南校設置臨時物產局，任命大學南校教授田中芳男調查收集國內物產狀況。物產局提出在九段三番築園地設置博物館開始舉辦博覽會的計畫，在明治4年舉辦大學南校博覽會，當時博覽會的主要目的，要將天下的物產蒐集於一地，將各式各樣的物產品名加以統一，並加以說明用途價值。不過，實際舉辦博覽會時，將名稱變更為「物產會」。明治4年的物產會，可說是日本最初的博覽會。物產會的展品分為礦物門、植物門、動物門、測量器械部、內外醫科器械部、陶器部、古物部、雜物部等類別。此外，在這個時期，明治維新以來形成一股破壞歷史傳統文物的風潮，為了要保存貴重的美術品與歷史文物，明治4年5月23日大政官昭告全國保存歷史文物，並計畫於明治四年(1871年)10月1日至10日舉辦博覽會，以文部省博物局的名義，在湯島大成殿的文部省博物館舉辦博覽會，後因故延至明治5年(1872年)3月10日至4月30日(共50天)。明治5年日本接受奧國政府的邀請參加維也納世博會，為了廣徵展品赴維也納參展，以及宣揚保護歷史文物思想，太政官除了在正院內設置「奧國博覽會事務局」之外，並由田中芳男於湯島的大盛殿舉辦博覽會預做赴會參賽的展品徵集。1872年湯島聖堂博覽會開展期間(3/10~4/30)，3月13日休館以接待明治天皇親臨會場參觀，由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西鄉隆盛、參議大隈重信等官員陪同，並由主辦單位的町田久成與田中芳男導覽。(椎名仙卓，2005：93，109-110)

1872年湯島聖堂博覽會和先前舉辦的物產會不同，使用了博覽會的名稱，可說是日本最早舉辦的博覽會。其展品計有古美術品、古道具、古瓦、武器武具、古錢、調度品、日用品、博物標本等約620件，與前一年的物產會以礦物、植物、動物的博物學資料為主的展品相較之下，此次博覽會的展品大部分歷史文物居多，

¹¹江戶時代末期，德川幕府開設的洋學研究教學，以及洋書、外交文書翻譯的機關。安政2年(1855年)改名「洋學所」、文久2年(1862年)改名「洋書調所」，次年改「開成所」，也是明治維新後「大學南校」的前身，歷經「開成學校」、「東京開成學校」，最終發展成為現在的「東京大學」。(ブリタニカ國際大百科事典：蕃書調所)

可以窺見博覽會的旨趣在收集全國自然與人造的產物，統一在各地不同的名稱，並說明其功用，以廣為人知。其中古物的展出，可以傳達時代與社會的變遷，主要基於博物學收集展示全國產物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椎名仙卓，2005：93-94；大貫涼子，2012：2-3)

(三) 1877年起明治時期的全國性博覽會

在西洋文明的衝擊下，日本明治政府為了要彌平與西歐諸國之間的技术落差，運用下列四種方法推動「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的政策：(1)出國考察西歐諸國，尤其是工業生產的實際發展調查，(2)引進西歐近代工業技術，(3)展示日本的技术能力以增進產品輸出，(4)派員至西歐諸國進行技術研修。有鑑於西歐諸國運用世界博覽會進行技術、產業及國力的競賽，以及世博會可以做為日本展示技术能力以增進產品輸出的一個手段，博覽會事業成為明治政府推動殖產興業政策的重要一環。透過世界博覽會的參展，一方面汲取西歐諸國最新製造技術與制度，一方面又可以將日本傳統工藝品對海外諸國廣為宣傳，以增進產品輸出的機會，最終達到振興產業的目的。就上一節有關中日兩國參加世博會的學習經驗，日本組團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偏重派員至西歐諸國進行技術研修，在德國籍顧問華格納的建言之下，藉參展維也納世博會的機會，由佐野常民率70多位學生與職工赴歐洲學習各領域的技術；而日本組團參加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則重拓展對外的貿易。(戶田清子，2010：28-30) 奈良縣立大學戶田清子教授的看法，起自於1877年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可說是運用日本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的機會，為振興產業發展在國內舉辦的博覽會。也就是說，明治政府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之後，有感於奧美兩國舉辦世博會的效益，也開始思考在國內舉辦等同規模的博覽會。當時主導維也納世博會參展事宜的佐野常民，提出博覽會與博物館具有「寓教於觀」的作用之外，更有感於日本產業技術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提出舉辦世界博覽會計畫，以吸取西歐先進產業技術，振興日本產業。惟當時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工業，決定先舉辦全國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以防止強勢的外國貨

品在國內泛濫，扼殺亟待發展的國內工業。(國雄行，2005：37, 51-52；呂紹理，2005：78-79) 1877年至1907年的30年間共舉辦六次比較重要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相關資料參見表3-9)，會期都在百日以上，參觀人次從45萬成長到680萬之譜，雖為內國勸業博覽會，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與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已有世界博覽會的規模，在此之前的1888年西班牙巴塞隆納世博會參觀人次也只有230萬、1880年的澳洲墨爾本世博會參觀人次更只有133萬而已。松田京子更進一步指出，第一屆至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性質屬「經濟的博覽會」，鑒於與列強簽下不平等條約，尤其「治外法權」的存在，不得不採取舉辦內國博覽會作為保護國貨，以振興產業發展的政策工具。不過，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與1899年治外法權的撤除，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性質，就比較偏向宣揚帝國主義正當性的「帝國博覽會」，除了展示外國展品之外，也邀請歐美、滿清與朝鮮等國參展，已不再是國內勸業的經濟性質的博覽會。(松田京子，2003：16-17)

1. 1877年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東京)

日本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組團參加世博會，依前節的討論應為1873年的維也納世博會，明治政府特別在1872年成立了「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由參議大隈重信擔任事務局總裁，並由日本駐奧國公使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佐野為本次參展的靈魂人物，在世博會結束返國之後，撰寫厚厚的《澳國博覽會報告書》之外，更提出日

表3-9 日本於1877~1907年所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相關統計資料

	1877年(明治10年)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1881年(明治14年)第二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1890年(明治23年)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1895年(明治28年)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1903年(明治36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1907年(明治40年)東京勸業博覽會
會期	8/21~11/30	3/1~6/30	4/1~7/31	4/1~7/31	3/1~7/31	3/20~7/31
展場	東京 上野公園	東京 上野公園	東京 上野公園	京都 岡崎	大阪 天王寺	東京 上野公園
展場坪數	29,807	43,300	40,000	50,558	114,017	51,812
展館坪數	3,103	7,563	9,569	8,744	16,506	5,812

展示天數	102(註)	122	122	122	153	134
展品件數	84,352	331,169	167,066	169,098	276,719	93,854
參展人數	16,174	31,239	77,432	73,781	130,416	14,876
參觀人數	454,168	822,395	1,023,693	1,136,695	5,305,209	6,802,768
獎賞件數	4,321	4,031	16,119	17,729	36,487	8,012
費用(円)	106,875	276,350	486,148	377,256	1,066,611	1,100,000
展 區	礦業/冶金 製造物 美術 機械 農業 園 藝	礦業/冶金 製 造 品 美 術 機 械 農 業 園 藝	工 業 美 術 農 業、山林 及園藝 水 產 教育及學藝 礦業及冶金 機 械	工 業 美術及美術 工 藝 農 業、山林 及園藝 水 產 教育及學術 礦業及冶金 機 械	農業及園藝 林 業 水 產 採礦及冶金 化 學 工 業 染 織 工 業 製 作 工 業 機 械 教育、學術 衛生及經濟 美術及美術 工 藝	第 1 會 場 (上野公園) 第 2 會 場 (不忍池畔) 第 3 會 場 (皇室博物館 西側)
展 館	本館(3棟) 農 業 館 機 械 館 園 藝 館 美 術 館	本 館 美 術 館 機 械 館 農 業 館 園 藝 館 動 物 館	本 館 動 物 館 水 產 館 水 族 館 機 械 館 參 考 館	工 業 館 美 術 館 農 林 館 動 物 館 水 產 館 機 械 館	農 業 館 林 業 館 水 產 館 工 業 館 機 械 館 教 育 館 美 術 館 運 輸 館 動 物 館 水 產 館 台 灣 館 參 考 館 溫 室 冷 藏 庫	第 1 号 館 第 2 号 館 第 3 号 館 第 4 号 館 第 5 号 館 美 術 館 農 葉 館 蔬 菜 館 台 灣 館 車 輛 館 外 國 館 體 育 館

資料來源：整理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事務報告》上卷，參見芳井敬郎，1996：288-289；松田京子，2003：17；伊藤真實子，2008：94。有關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的資料，參考山本光雄《日本博覽會史》，東京都：理想社，1970年，p.50,60-62；國雄行《博覽會と明治の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年，pp.197-198。

註：前揭芳井敬郎(1996)與伊藤真實子(2008)整理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事務報告》上卷之資料中，有關1877年(明治10年)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展示天數112天有謬誤。1877年8月21日至11月30日，合計應該是102天。

本在1880年自行舉辦世博會的構想，企圖引進西歐進步的機械以刺激日本產業的

發展。不過，當時明治政府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就有不同的意見，大久保除了考慮財政不足以舉辦世博會之外，主要的考量殖產興業政策，以及在於當時日本與西歐列強之間仍存在不平等條約，外國人只能在限定區域進行商業活動，在上野的博覽會場地恐難容許外國商品展示與買賣，此外貿然召開世博會可能使外國貨品充斥國內市場，阻礙國內產業發展。為此，1876年2月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開辦內國博的建議書，指出博覽會的宗旨在於「將萬物毫無遺漏蒐集於同一場所，調查物件品質之良窳，考察人工之巧拙，請學者專家加以評論，使百工相互觀摩自我砥礪，以打開商賈買賣交易之門道」（參見日本史籍協會森古秀亮編《大久保利通文書(七)》：45-49），也就是透過全國蒐集物品、加以分類審查評獎，並向國民廣為展示的博覽會作法，以殖產興業，進而富國強兵。（國雄行，2010：89-90，2004：255；御古一茂，2009：111-118）

日本在1860年代起接觸歐美的博覽會經驗，使得當時日本領導階層認識到博覽會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產業與文化宣傳的作用。此時日本國內正瀰漫著「殖產興業」與「文明開化」的思潮，舉辦博覽會既可刺激日本國內產業提升，又可宣揚「文明開化」精神，更具有提倡振興「國貨」的民族主義內涵。在這樣的歷史背景與大久保利通的內國博建議之下，日本於明治10年(1877年)8月21日首度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辦「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開幕典禮，明治天皇由親王、太政大臣、參議等皇室公卿迎接進入會場，並與各國公使致意後，善盡主持博覽會開幕閉幕之責任，做了開幕致詞，並由內務卿大久保致歡迎詞，正式宣布「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開展，至11月30日止，計102天，共吸引454,168人次觀覽。在近三萬坪的展場建構東本館、西本館、農業館、機械館、園藝館、美術館等展館，這次博覽會的展區規劃模仿維也納世博會，包含了礦業及冶金、製造物、美術、機械、農業、園藝等六類別，而礦業冶金和製造物的展品放在東本館，顯示明治初期想要全力發展工礦與製造業的企圖，西本館則陳列日本國內3府39縣外加琉球藩的地方物產，表達了「內國」的概念之外，要讓國民透過博覽會認識自己的國家領土與行政區劃，以形成國家意識。（國雄行，2010：93-95；呂紹理，2005：81）

1877年的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雖說102天是個不算短的展期，參觀人次卻只有45萬多，無法與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破500萬人次相提並論，不過第一屆認真說來是有幾個開創性意義：首先，嘗試將博覽會與見世物¹²之間，內國博覽會與萬國博覽會之間做區隔，俾有效推動「殖產興業」的政策目標。日本德川幕府時期的本草學領域所舉辦的「藥品會」，以及明治時期博物學風潮下的1872年湯島聖堂博覽會，孕育出1877年起連續舉辦5屆的內國勸業博覽會。18世紀後半開始的這個藥品會譜系，由博物學者舉辦，展示個人收藏的骨董文物，不具有動員廣泛大眾的文化機制效力，比較像是17世紀出現在歐洲貴族宅邸或都市之中的標本陳列會。然而在藥品會與物產會之後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則以文明化的視覺機制重新納編廣大民眾的凝視，也正是形成「明治國家」所不可或缺的過程。(吉見俊哉，1992a：143-144；蘇碩斌等譯，2010：139) 有關內國勸業博覽會以文明化的視覺機制重新納編廣大民眾的凝視部分，可在內國博覽會事務局為參展者所編寫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簡介〉看到明治政府的基本態度。該簡介刊載展館配置與參觀者應注意事項，並附錄有助於勸業的一些場所，如教育博物館、博物館、北海道臨時博物館、淺草文庫、小石川植物園、勸農局試驗場、農學校等，還有一些值得觀覽的製造工廠。簡介第一頁的「參觀者應注意事項」就曾寫道「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宗旨，在協助工藝進步，以開發物產貿易的利益，絕非遊戲玩樂場所」。明確的點出博覽會絕非開帳場、見世物等遊樂場所。博覽會的效益在於「不需長途跋涉就能於同一場地觀覽全國物品，判別其優劣異同，領略各種工藝之妙處」，亦即博覽會參觀的要點在於「展品之比較判別」。內國博覽會事務局告知人們在參觀時應注意事項：(1) 審視物質的精妙，(2) 判斷製造的巧拙，(3) 分析使用與操作的方便得失，(4) 了解使用時機是否適當，(5) 考慮價格是否低廉。明治政府透過內國勸業博覽會把國家產業發展的責任，不只期待在參展業者身上，更放在入場參觀的民眾身上，勸業博覽會以文明化的視覺機制重新齊一廣大民眾的現代化視線。(國雄行，2010：94-95，2004：260) 此外在明治政府主責博覽會業務部會的轉變，亦可看得出端倪。明治

¹²見世物意指在繁華街道或神社寺廟的祭典儀式上，搭戲棚表演或展示珍稀物品及動物的活動。

初期的日本，一般人將博覽會與展示奇珍逸品的「見世物」娛樂活動理解成一樣的東西。當時主責博覽會業務的是文部省，主要是本草學與博物學領域的菁英展示個人收藏逸品骨董的藥品會與物產會。明治七年(1874年)在內務省底下設置「勸業寮」，在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的督導之下，推動殖產興業政策。內務省為推動產業發展，特別在博覽會前加上「勸業」兩字以示區隔，最終參考維也納世博會報告書與費城世博會的範型，規劃舉辦勸業博覽會。(國雄行，2010：88-89) 勸業博覽會的重點不在宣揚國威，而是想藉博覽會達到眼目教化的效果，因而著重「物品的比較」，希望藉著博覽會使觀眾仔細熟看物質的精粗、製造的巧拙、使用是否合宜與價格之高下。物質精粗優劣的比較其實還涉及到「產業情報」的收集、整理、研判與學習，博覽會等於是提供大量情報的場所，藉由收集展覽中所釋放出來的各種產業與技術的情報訊息，指引生產目標與制定價格，才能使產業獲得更大的利益，達到「殖產興業」的目標。這場為期102天的展會，吸引45萬多人次觀覽，明治政府肯定其效果，因而訂出日後每五年舉辦相同性質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成規，從1877至1911年明治時代結束為止，共舉辦了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呂紹理，2005：82-83)

其次，明治政府在籌備博覽會兩件大事中的「展品徵集」費盡了心思，推出自費參展資助辦法、參展經費貸款、展品運費優惠、各府縣設置參展指導員(出品世話掛)與展品專員(出品取扱人)、中央集權的徵展方式等鼓勵與徵展措施。當參展辦法公布之後，一般人還是不清楚什麼是內國博覽會，更遑論徵集物品送件參展。於是乎內務省要求各府縣要設置專責的參展指導員與展品專員，負責轄區農商工業的調查，推廣宣傳轄區內的農商工業者踴躍參展。在展品徵集的大戰略上，政令下達由中央政府到府縣(省縣)，再到町村(鄉鎮)，展品的匯集則由町村(鄉鎮)到府縣(省縣)，再到中央政府，這也是明治政府中央集權體制的實地測試。政府為了鼓勵農商工業者踴躍參展，考量減輕其參展經費負擔以增加其參賽誘因，訂頒「自費參展資助辦法」，自費參展者可在閉幕之後，由大會的門票收入與展品目錄銷售金額給予補助，大致補助參展者的展品原價、運費及裝箱費總和的11%。明治政府

也同意各府縣從稅收裡給予參展者融資，運輸公司也對參展者的運費給予折扣優惠，通常可以享受到15%到40%的折扣，會後政府會致贈運輸公司感謝獎盃。由於以上的規劃與推動措施，最北從北海道到最南的琉球藩，全國有14,455種類，84,352件展品出現在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展場。(國雄行，2010：91-92，2004：256-258)

最後，關於入場參觀的人數仍不敵博覽會三惡(戰爭、傳染病、狂風暴雨)與民眾的積習難改。在1877年的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只有45萬多的參觀人次，1881年的第二屆有82萬人次，1890年的第三屆有102萬人次，1895年的第四屆有114萬人次，1903年的第五屆更高達531萬人次。明治10年(1877年)1月爆發西南戰爭，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士族，藉清君側之名義起事，與明治政府軍於現在的熊本縣、宮崎縣、大分縣及鹿兒島縣等日本西南地區交戰，阻礙了來自南方鹿兒島縣的展品；另9月爆發的霍亂橫行肆虐，10月11日的暴風雨重創會場，使得參觀人數不如預期。(國雄行，2010：99) 雖說參觀人潮不如預期，能夠在短時間吸引如此大量人潮至同一場所的活動，也只有明治時期才看得見。博覽會對明治時期的民眾而言，就像新時代的節慶一樣受到歡迎。但未必全是自發性活動，是明治政府的刻意動員。首先就參展者來看，明治的工藝家其實多數都沒有博覽會的知識，只是依據行政官員的指示提供展品。同樣的，由上而下不斷的籲請，參觀者被組織性動員前來觀覽。吉見俊哉教授的看法，這些被動員的民眾，絕不是以國家期望的方式接受博覽會，他們並沒有對博覽會的產業性意義有太多關心，反而把博覽會當作像過去熟悉的「開帳場」那種「見世物」娛樂活動。在明治初期民眾的意識裡，博覽會和「開帳場」可能是沒有什麼差異的事件。弔詭的是，1877年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開辦，明治政府最想要切斷與「見世物」及「開帳場」等近世時期遺物的連續性。但也是這種與江戶時代見世物的連續性，反而使博覽會剛開始出現時，能讓明治初期民眾比較容易接受內國勸業博覽會的重要關鍵。(吉見俊哉，1992a：130-135；蘇碩斌等譯，2010：125-131)

2. 1881年第二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東京)~1895年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京都)

1877年的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這場為期102天的展會，共吸引45萬多人次觀覽。呂紹理教授援引永山定富《內外博覽會總說》的說法，「明治政府認為具有相當大的效果，因而訂出了日後每五年舉辦相同性質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成規。」（呂紹理，2005：83）山本光雄與芳井敬郎都曾提及，明治10年12月28日太政官布告第八十八号「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期程，明治10年舉辦第一屆，以後每一屆起算的五年期間舉辦一次，明治14年將舉辦第二屆，至於會場、日期等各項規則要在三年前公布。」（山本光雄，1970：30；芳井敬郎，1996：287）明治10年12月太政官布告第88号原文抄錄如下：

内国勸業博覽會ノ儀明治十年ヲ以テ第一会トシ爾後五ヶ年目毎(明治十四年ヲ以テ第二会トス)ニ被開候條此旨布告候事、但本会開設ノ場所及日限諸規則等ハ三ヶ年前ニ公布スベキ事。(内閣官報局，1887：110)

推其意，應該是日本史籍協會的森古秀亮所編輯《大久保利通文書》第七冊〈給三條(實美)公舉辦內國博覽會建議書〉的注釋解說中，於明治10年8月在上野公園舉辦(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並建立爾後每四年舉辦一次內國博覽會制度的意思。(日本史籍協會森古秀亮編輯，1969：49)另國雄行教授的研究亦指出，大久保利通為繼續發展日本的博覽會事業，從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結束後，提案每四年舉辦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並將全國分成五個區域，每個區域由府縣輪流舉辦地方勸業博覽會，也就是博覽會展品的徵集由地方博到內國博，內國博再到萬國博，就像運動賽事選手的選拔由縣市運動會到全國運動會，再到世界運動會；反過來，為了引進海外先進技術，內務省則從萬國博購入展品到內國博展示，再借給有需要的地方博展示，以宣揚殖產興業的精神與國內外技術的評判交流。雖然內務省於1878年4月在地方政府的反對之下，並未實行地方博的構想，倒是在參加1878年第三屆巴黎世博會之後，宣布於明治14年(1881年)3月1日到6月30日，在上野公園舉辦第二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同時設置內國博事務局，由皇室的能久親王擔任總裁，形成以後內國博事務局總裁由皇室成員擔任的慣例，而副總裁由內務卿松方正義、大藏卿佐野常民、農商務卿河野敏謙三位擔任，並由熟悉世博會與海外事務的田中芳男與山高信離擔任事務官，以及町田久成擔任專員(御用掛)，

負責籌備業務的內國博事務局可謂陣容堅強。最終本屆內國博與第一屆相比，展區同樣分成礦業/冶金、製造品、美術、機械、農業、園藝等6各展區，參展人數(16,174→31,239)、展品件數(14,455→85,366)及參觀人次(454,168→822,395)都有成長，唯獨頒獎數減少(5,096→4,031)，最高榮譽賞也少了兩項，只有四位得主。其中機械區的展品雖只有很少的216件，不過較第一屆多了五件，其中得到二等進步獎的臥雲辰致棉紡織機改良版，從第一屆內國博獲獎時該紡織機要兩人操作，進化到只要一人操作的表現，儘管臥雲辰致的發明受到兩屆內國博的肯定，由於當時並無專利制度的保護，被大量的抄襲仿冒，發明人未能享有原創的好處，臥雲辰致的生活並不寬裕，甚至要他人資助才能繼續他的發明改良，因此才有明治政府於明治14年(1881年)頒布專利保護條例實施至今。(國雄行，2010：104-118)

1881年的第二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結束後，內國博事務局副總裁大藏卿佐野常民建議要擴大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舉辦「亞洲博覽會」。這樣的建議不意外，佐野常民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之後就懷抱日本要舉辦世界博覽會的夢想。為何鎖定在「亞洲」呢？首先，展品的徵集範圍擴大到亞洲範圍，比較能夠有更廣泛的產品考較。日本博覽會焦點的機械展品很少，若能徵集到亞洲國家被歐美殖民所建置的機械展品可作為補充。其次，相較於歐美的繁榮興盛，亞洲是比較落後，日本的率先推動現代化，可以帶動亞洲國家的復興。最後，亞洲博覽會可為日本往後舉辦世界博覽會鋪路。(國雄行，2010：120-121)

由於受到明治14年政變的影響，佐野常民辭去內務卿，再加上明治政府從大隈重信的積極財政論，轉變到松方正義的財政緊縮論，「亞洲博覽會」的構想仍沒被採用，明治16年(1883年)農商務卿西鄉從道為了要讓地方政府與國內業者有更長的休養生息的準備時間，將原預定於4年後的1885年舉辦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延到明治22年(1889年)舉辦。兩年後農商務卿西鄉要紀念明治23年(1890年)為日本開國2550年，建議將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擴大舉辦亞洲博覽會，經「亞洲博覽會籌備調查員會」的調研，需要102萬日圓的經費，從亞洲國家徵集最先進的機械展品有困難，建設置貿易館募集歐美國家的展品。由於財政的吃緊，大藏大臣松方正

義僅同意以50萬日圓舉辦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並保留貿易館的構想，惟籌辦的過程中改成參考館，該館展示的都是從1889年從巴黎世博會購入的展品。1890年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於3月26日開幕，同樣在上野公園，參觀人數已超過百萬，計有1,023,693人次。(國雄行，2010：121-124,128)

一連三屆內國博在東京舉辦，由於對當地經濟發展有明顯的益處，全國各的開始熱衷爭取第四屆內國博的舉辦，如大阪府的堺市商業會議所爭取在大阪，稍後成立的京都商業會議所也出來爭取在京都舉辦。明治25年7月松方正義內閣接受農商務大臣、向來熱衷嫻熟博覽會事業的佐野常民建議，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在京都，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在大阪，第六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再回到東京舉辦的建議。(國雄行，2010：138-139)

3. 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大阪)

前面討論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時候，就曾提到內國博事務局副總裁大藏卿佐野常民建議要擴大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舉辦「亞洲博覽會」，農商務卿西鄉從道為了要紀念明治23年(1890年)為日本開國2550年，也建議將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擴大舉辦亞洲博覽會，還設置「亞洲博覽會籌備調查員會」做了研究調查。雖沒能成，之後卻不斷出現要擴大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構想。例如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開幕的時候，大隈重信基於中日甲午戰爭勝利後宣揚國威與擠身強國之列的考量，曾發下豪語要投入700~1000萬日圓舉辦能夠陳列展示全世界物產的「世界大博覽會」。明治政府在準備參加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之際，由於擴大舉辦內國博的話題延燒，與籌備參加1900年巴黎世博會，將原訂於明治32年(1899年)舉辦的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延至明治35年(1902年)舉辦。明治28年(1895年)8月31日的《讀賣新聞》為了紀念黑船裴利將軍於1853年來航50週年，亦曾提出邀請太平洋沿岸諸國於1903年舉辦「半」世博會規模的「太平洋博覽會」的建議，農商務省曾於第三屆農工商高等會議徵詢政府官員、企業家及各地商會代表，有關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規模與時間的意見，順勢將第五屆內國博的時間再延至明治36年

(1903年)舉辦。(國雄行，2010：173-175；伊藤真實子，2008：97-103) 伊藤真實子教授在《明治日本與萬國博覽會》一書第三章〈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前言寫到：「當初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預定在1889年(似筆誤，應該是1899年)舉辦，由於明治政府決定參加1900年巴黎世博會，讓國內參展者在籌備上陷入困境，於是改在1903年舉辦，而會場是在第14次帝國議會決定，並於1900年5月15日天皇敕令昭告全國將在大阪舉行。」(伊藤真實子，2008：94)

據呂紹理教授的研究，大阪舉辦的這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與前四屆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相較，有幾個不同：**(1)考慮到都市更新的博覽會**。因考慮到展場腹地要廣闊，過去都是使用既有的公園，而大阪立意仿效歐美國家藉博覽會做都市更新的經驗，先將會場天王寺(茶白山周邊)附近的「長町」貧民窟大力整頓，將原本居住在該地的遊民和貧民全數遷離，並擴張聯絡會場到市中心的日本橋筋的道路。**(2)重視「殖產興業」的經濟博覽會**。在會場中特別設立了「參考館」徵集世界各國器物參展，以考較觀摩促進日本國內產業發展。於是過去博覽會中經常以炫奇新鮮為號召的展示品大多被排除在展示之列。**(3)誇耀富庶與強盛以宣揚國威的博覽會**。在大阪內國博覽會開展之時，日本籠罩在甲午戰爭與義和團事變勝利的氣氛之中，這兩場戰役讓日本人相信自己已躋身於世界列強之林，因此如何展現這個亞洲帝國的榮光，是大阪博覽會與前四次勸業博覽會展示設計截然不同的思考重點，誇耀富庶與強盛於是成了這場博覽會的特色之一。**(4)規模為歷屆之最的內國勸業博覽會**。與在京都舉辦的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相較，大阪內國博覽會的會場面積足足大了2.3倍(114,017坪)，展館面積也大了1.9倍(16,506坪)，展館數則由6館擴增為14館，展期為1.3倍(153天)，展品件數為1.6倍(276,719件)，參展人數也有1.8倍(130,416人)，觀眾人數也比前次多了4.7倍，達到5,305,209人次。**(5)展示日本躋身世界列強之林的帝國主義博覽會**。除了數字堆疊出龐大富裕的景象之外，實體的展示仿效法國於1867年巴黎世博會的做法，將世界「落後民族」集結展示，以呈顯日本這個新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先進與民族的優秀，於是有「學術人類館」的人種展示與「台灣館」的殖民地展示。(呂紹理，2005：113-115；芳井

敬郎，1996：288-289)

除了呂教授點出的5個特色之外，整理國雄行、山路勝彥、松田京子等日本學者有關的研究，「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還有幾個特色：**(1)強調電力時代燈飾照明(illumination)的博覽會**：瓦特發明的蒸汽機帶動工業革命，造就了英國世界工廠的主導地位，與日後英國的日不落帝國，也促使1851年英國舉辦萬國大工業博覽會，開啟了人類社會第一屆世博會，展示世界工業革命的發展成果。20世紀初，人類科技的快速發展，電力與機械廣泛應用，標示著人類文明的一大躍進。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抓住這樣的時代脈動，除了展示最先進的機械工業製品如「冷藏庫」展館，以及在餘興活動舞台設置了「激流飛船」(water chute)等機械遊樂設施之外，更展示20世紀初的重要基礎設施電力的應用，動用11,000多個電燈裝飾博覽會會場成為不夜城，與1900年第五屆巴黎世博會曾使用過21,749個電燈泡妝點的世博夜間會場相較毫不遜色。開展一個月後的4月1日起，開放62天的夜間觀覽時段，各展館電力燈飾照明齊放，儼然如白晝般的引人入勝，結果共吸引545,508人次夜間入場，遠超過第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的45萬餘人次。(國雄行，2010：184-186；山路勝彥，2014：23-26；松田京子，2003：47)**(2)重視娛樂性的博覽會**：在與東京爭取主辦權勝出之後，大阪府於明治33年5月設置「第五屆內國博覽會協贊會」負責貴賓接待、交通、旅宿、舉辦配合活動等過去協贊會主責的工作，只多了一項係參考1900年第五屆巴黎世博會設置娛樂場所(興行場)的新工作。上一屆的內國博在京都舉行，有許多風景名勝古蹟可看的風雅餘興，大阪商都只能訴求世俗餘興。如音樂、煙火、不可思議館、馬戲表演、激流飛船、民族舞蹈、動物園、大遊行、相撲等餘興節目，最受歡迎的要算是「不可思議館」，由金髮碧眼美女加上五顏六色電燈的舞蹈表演，以及「動物園」展示活生生地萬獸之王「獅子」等難得一見的動物。光是遊賞動物園、不可思議館、激流飛船、大林高塔等娛樂設施的人數就高達1,394,358人次，收入達164,622日圓。這些內國博娛樂性，漸漸變成現代世博會遊樂園區的重要元素。(國雄行，2010：181-184) 這些表演舞台、不可思議館、激流飛船等會場內的餘興活動之外，(山路勝彥，2014：47-65) 還

有學術人類館、動物園、薩摩舞蹈、環遊世界一周館、百美人寫真館等場外餘興活動，其中以「學術人類館」的展演最具爭議，曾引起中國滿清政府、韓國乃至琉球的抗議。學術人類館則是由被稱為「日本人類學之父」東京帝大教授坪井正五郎企劃，參考1889年法國巴黎世博會首次展示「落後人種」的作法，準備展示北海道愛奴族、臺灣原住民、琉球、朝鮮、中國、印度、爪哇等七種「土人」，滿清透過在日有影響力的華僑孫淦反映，再透過滿清駐神戶領事館向日本政府交涉，同意取消中國人的展示。學術人類館展出之後，也有韓國民眾向日方抗議，在韓國公使的交涉下，最後也撤除韓國人的展示。最終，現場仍展示北海道愛奴族、臺灣原住民、台灣人、琉球人、馬來人、印度人、土耳其人、爪哇人、尚吉巴島人等民族的風俗、使用器具及生活情形。(山路勝彥，2014：121-157；李政亮，2006：32-33)

(3)「半」世博會規模的博覽會：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朝世界博覽會的規模去規劃，加入萬國博覽會所需的基本要素，邀請世界各國參展。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曾有「參考館」的設置，僅陳列明治政府自巴黎世博會購置的外國展品。明治32年日本政府與列強斡旋廢除不平等條約，已無先前大久保利通擔心只能舉辦內國博的情況，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會場特別設立了「參考館」展示來自14個國家與18個海外地區的展品，如加拿大館、美國館、奧國館、德國館，已初具小規模世博會的展示活動。其中又以展示面積最大的加拿大館最受歡迎，展示其最大農產品小麥與麵粉，於現場實際展示運用麵粉製作麵包的過程，並於現場將出爐的麵包免費提供參觀者品嚐，造成轟動。(國雄行，2010：186-187；山路勝彥，2014：37-40)。

如果面積大小可以表現博覽會展示的重心所在，則工業館、農林館、機械館和參考館無疑是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展示核心，讓國人瞭解明治維新後日本邁向先進國家的根本，與學習西方國家現代化經驗。占地面積不小的臺灣館更是大會的焦點，展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的統治成果。(呂紹理，2005：118) 大阪博覽會可謂極為成功的博覽會，不僅規模遠遠超過前四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其中參觀人數大幅成長突破530萬人次，推其因：(1)會期中沒碰到傳染病、暴風雨及戰爭等

「博覽會三惡」的干擾因素；(2)到會場的交通規劃妥當，國鐵與私鐵的通力合作發揮前所未有的運輸能力；(3)會場的大阪素有日本第一商業都市的稱號，吸引了不少知名企業的參展，也吸引參觀者進場參觀；(4)本次展覽開放夜間可以進場參觀；(5)首次設有外國的獨立展館；(6)設置台灣館話題性十足，首度展示日本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7)會期舉辦了120多場相關會議，吸引不少人到場參與；(8)娛樂性活動的設施與活動，貢獻出最大的集客力量，共吸引近140萬人到場觀覽遊賞¹³。(國雄行，2010：179-180)

二、中國於1910年始舉辦全國性南洋勸業會

清末新政期間，政府在經濟方面制定了振興工商的措施，主要包括設立商部、制定經濟法規、獎勵工商、勸辦商會等方面的內容，在經濟政策上對商品賽會給予大力支持。例如在1903年設立商部，其下設置的會計司除主管經費、報銷、商業、銀行、訴訟等事項之外，對商品賽會進行管理也為要務之一。1906年清政府成立的農工商部，也有保惠司的設置，主管商品賽會活動。(丁麗，2013：73)清末的商戰思潮的發展，讓人們開始提倡舉辦商品賽會，以促進工商發展。時人劉楨麟提出「興商務必自賽會始，吾今請言中國賽會之力有八：聯交誼、擴物產、獎人才、察商情、廣貿易、增關稅、興商地、除積習」。(劉楨麟，1987：52-56)

隨著滿清政府參加世博會次數與經驗的增多，逐漸體會世界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重要，劉楨麟直言「興商務必自賽會始」。1905年清政府頒布《出洋賽會通行章程》，決定將參加博覽會事務由商部經辦，顯現清政府重新認識世博會的重要性，商部在1903年成立之後，亦積極勸誘商工業者參加外國博覽會，推動國內舉辦各種展覽會並開始籌劃博覽會。(劉世龍著，陸梅、劉紅譯，2010：359-369) 在1906

¹³有關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參觀人數，出現4,350,693人次與5,305,209人次兩個數字，前者如山本光雄(1970：41、44、49)、吉見俊哉(1992：127)、寺下勅(2005：35)、山路勝彥(2014：69)；後者如芳井敬郎(1996：288)、松田京子(2003：17)、伊藤真實子(2008：94)、國雄行(2010：179)等學者主要是援引《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事務報告》上卷的數據資料。伊藤真實子教授在《明治日本與萬國博覽會》內文指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參觀人數達到4,350,693人次，參見表5的數字卻是5,305,209人次。(伊藤真實子，2008：94)

年的成都第一次商業勸工會成功舉辦之後，1907年4月天津商務總會舉辦天津勸工展覽會，後續有規模較為盛大的1909年武漢勸業獎進會及1910年南洋勸業會。清末新政期間逐漸興起的國內商品賽會活動，從舉辦城市來看，主要集中在天津、成都、武漢、南京等地。從規模上來看，天津、成都、武漢各地的賽會都是地方性賽會，而且武漢勸業獎進會在地方商品賽會中屬於規模較大的賽會，南洋勸業會發展為全國規模的商品賽會。從籌辦費用來看，由早期賽會的幾萬元發展到南洋勸業會的70萬元。從會期來看，最早的賽會只有幾天，武漢勸業獎進會歷時一個半月，南洋勸業會則長達半年，有世博會的展期規格。從參觀人數來看，由最初的幾萬人到南洋勸業會的20幾萬人。(丁麗，2013：73)

(一)1906年起舉辦地方性業勸博覽會

1906年在成都舉辦的第一屆商業勸工會，第一次把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博覽會引進國門，成為中國博覽會的肇始，開闢了近代中國博覽會之先河。光緒31年(1905年)12月，四川商務勸工局總辦沈秉堃擬就青羊宮花會改為商業勸工會，向當時的四川總督錫良呈文：「為詳請事竊維商務之興，必有賽珍博覽會以為比較觀摩之助，俾工業競爭日盛，則商市之轉輸不窮，此中外之所同，而讓局之所為兢兢在念也。前日新繁鄉會，本為該處趕集之常，前經賤向督飾，商會派商董前往，分別督理，商情遂形踴躍。茲據調查，玉器、綢緞、麻衣等項均能獲利，計本銷貨六千余金，趕集各銷貨三千余金，較之昔年有加無已。現在青羊宮花會為期匪遙，查該會為成屬各會之冠，歷年已稱繁盛，惟商情渙散，漫無紀綱，若能利導擴充，亦商市之一大觀。不惟工業以比較而精，即商情亦以團集而勝。茲擬督同員紳，先赴會場詳略查看，預將陳列地段量為分劃，略仿博覽會場，從簡佈置，一面通飭各州縣示諭各商，屆時一體赴會，其會場應有一切規則，已由局斟酌情形妥為擬議呈請憲核，一候奏准後再行刊佈。」(轉引自孫耀中，2007：15)

據前揭沈秉堃呈文與檔案史料記載，成都第一次商業勸工會是四川商務勸工局

以「獎勸工業、聯屬商情」為宗旨，在傳統「成都青羊花會」¹⁴的基礎上，「略仿博覽會場，從簡佈置，一面通飭各州縣示諭各商，屆時一體赴會」，而舉辦的四川省範圍的地方型博覽會。大會制定了嚴密的組織規程，除設有總辦、會辦、提調等機構總攬全域外，還分設有接待登記，評選獎勵，警務治安等組織機構，制定有清潔衛生、物品展出、遊覽規定等細則。

成都市第一屆商業勸工會從3月10日開幕，至4月13日閉幕，歷時35天，大會取得圓滿的成功。勸工會場地設在成都青羊宮二仙庵內，占地12,870方丈(約142,857平方公尺)，仿國外博覽會辦法，參會的十大類三千多種產品，分別陳列于四大展區。十大類產品包括天然品、製造品、教育品、美術品、農產品、動物品、植物品、水族品、機械品、遊戲品。四大展區之內各設「茶館、酒肆、飯菜店」，以及官員、外國人、婦女「休憩地」，各處「或標以旗幟，或榜以牌匾，規模具備。」商業勸工會根據展品進行評比，分別授獎，參展各商號得獎21個，各勸工局得獎17個，商業勸工會選出售展品，分天產和製造兩門。據粗略統計，售貨品種達3,437種，銷售額計銀28.7萬餘兩。以此為開端，四川勸工總局和商務總局制定的《成都商業勸工會章程》規定以後應年舉一次並推行各府廳州縣，到1911年清朝四川地方當局在成都青羊宮舉辦了六次商業勸工會，每開會時，各屬物產，櫛比競賽，實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觀。其中第五次勸業會略工重農、抑制外國貨，第六次勸業會則以工業品為主。歷次勸業會上，不僅有商品展銷，且有川劇等戲曲表演，有武術擂台等活動。(孫耀中，2005：18) 1906年的成都商業勸工會的成功舉辦，推動了成都及四川地區工商業的繁榮，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全國工商業發展。勸工會所引進的新形式、新思想、新觀念，為當時封閉的社會開啟了一扇窗戶，拓展了國人的視野，促進了社會的轉型發展。

繼1906年成都第一屆商業勸工會於4月13日閉幕之後，10月7日天津勸工展覽會

¹⁴ 花會是古老傳統民俗活動，始於唐宋，至今有千年歷史。花會的地址就在成都西門外的青羊宮。傳說道教始祖李老君的生日是農曆二月十五，故唐代以來，民間在此舉辦一年一度的廟會。又因成都二月正是百花盛開季節，又傳二月十五是百花的生日，因此每年二月青羊宮舉辦花會，故名之為成都青羊花會。

於大經路河北公園內開展。天津勸工展覽會的舉辦，可溯及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總辦周學熙。庚子之亂後，1901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配合新政的推行，袁世凱著手整飭轄區工商業。周學熙曾於光緒29年(1903年)春，東渡日本考察工商幣制，大受啟發，認為「今日本通國無一人不需洋貨，而無一洋貨非出自本國仿造者，此所以區區小國能自立於列強商戰之世也。」周學熙回國後向袁世凱建議創建直隸工藝總局發展工商業，並任總辦。直隸工藝總局章程明確其創辦目的是引導民間興辦實業，直隸工藝總局下設高等工業學堂培養技術人才、設教育品陳列館興新教育、設實習工廠、勸業鐵工廠傳授生產技、設考工廠以開發民智、舉辦勸工會、商業演說會振興商業。1903年以後，由於直隸工藝總局先建官廠，並以此為楷模，取提倡、獎勵、勸誘、保護工商之策，官督商辦及私人自辦的企業加多，隨著國貨與日俱增。到1906年大量的洋貨蜂擁而至，由於國貨(特別是棉布)粗糙，造成天津各鋪商貨堆積如山。直隸工藝局為扶植國貨、廣開銷路及與洋貨抗衡，有開辦勸工展覽會，對國貨實行免稅的措施。(許海娜，2013：25；喬兆紅，2007a：53)

光緒32年(1906年)十月初七開幕，至農曆十月十三止，會期共七天，天津勸工展覽會於大經路河北公園的考工廠單棚內舉辦，參加展覽會的工商業各家約100多個，所有各項展示貨物，均可訂價出售，任人購買。參觀民眾達15萬人次，交易額約3萬元。為振興國內工商並為國內商人拓展銷路，首先規定展品限收國貨，不收洋貨；其次展品尤以精美為佳，一切易燃腐敗發臭、占地太大等物品，不得入會展售。再其次，展品按性質分類，分12場陳設。主要有各種布匹、綢緞、織毯、皮革製品、木器、瓷器、文化用品、織布人力機、古董、裝飾品及化妝洗滌用品等。展覽會期間每日上午九點鐘開始，下午四點半結束。值得一提的是展會期間，前五日為男客遊覽日，後兩日為女客遊覽日，男女分日參觀。女子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場所算是社會一大進步，只是男女大防這關仍未突破。為鼓舞眾商踴躍參會，天津勸工展覽會制定了國貨免稅規則，這是政府用實際行動支持展覽會、支持工商業的一個突破。此次勸工展覽會由官方主辦，開通了民風、鼓舞了民氣，開創

國內展覽會先河，在我國近代博覽會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許海娜，2013：31-32；喬兆紅，2007a：53-54)

隨著庚子事變之後，滿清政府於光緒27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進行改革推行新政，在振興工商業的部分，曾出現各種獎進會、勸工會、勸業會，與西方的博覽會性質相近。除1906年成都商業勸工會與天津勸工展覽會之外，1909年在武昌舉行的武漢勸業獎進會，可說是清末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博覽會，對中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武漢乃九省通衢，素來居天下要衝，1905年9月京漢鐵路開通後，交通更顯便利。加上張之洞近20年的努力，此地工商業日漸發達，舉辦博覽會的各項條件已然具備。1908年張之洞調任中樞，陳夔龍移督兩湖主張實需開設會場陳列商品，以旌其良能而勸掖獎勤，如此方足以鼓舞群商日臻進步，故博覽會亟宜規劃而不可稍緩。隔年1909年的春天，陳夔龍命湖北勸業道暨官錢局總辦籌設勸業博覽會，勸業道鄒元汴及官錢局總辦高佑即共同擬訂勸業博覽會章程15條，商人報名規則8條，正式籌備開會。因初創規模不宜過大，故僅取獎勵實業之義，定名為武漢勸業獎進會，勸業會會場設在省城武昌平湖門處新建的乙、丙兩棧，地處長江之濱，風景絕佳。展示共分天產、工藝、美術、教育、古物等5個部。天產部分為農產、樹藝、藥材、水產、礦石、狩獵等6大類372種，工藝部分為染織、服裝、陶瓷、五金、玉石、化學製造等12類3,512種，美術部分為繡織、繪畫、雕塑、手工編制、陶燒等6大類564種，教育部分為教育用具、理化器械、圖畫等5類941種，古物部分為金石、陶瓷、書畫、雜物等5類1,137種。5個部的展品共6,527種，參展人數1,208人。同時專設直隸、湖南、上海、寧波四館，以及漢陽鋼鐵廠、陸軍工廠、槍炮廠、實習工廠、勸工院等七個特別展覽室，共1,473件展品。合計全部參展者一千多人，展品八千多種。凡陳列物品除留赴定於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物品外，其餘均限期領回。武漢勸業獎進會歷時約一個半月，參觀人數每天多則9,000餘人，少則1,000多人，合計參觀者，男子163,236人、女子39,989人、外國人2,344人，共計205,569人。獎進會上共頒發一等獎10名、二等獎16名、三等獎26名。10名一等獎分別是鼎興公司的

無線電機、洪順公司的軋花機、磁業公司瓷器、彩霞公司繡畫、美粹學社繡字、應昌有限公司黃白絲、肇興公司新式綢緞、興商公司茶瓶、彝興公司茶葉和於欽軒刻牙。從獲獎物品看，仍以手工藝品和農副產品為主，說明當時湖北乃至全國工業化水準還比較低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眾工商意識的覺醒，吸引了更多力量投入現代工業建設。經費方面共支出銀35,730兩，門票收入也大致如此，收支兩平，還算成功。(馬敏，2010c：80；喬兆紅，2003：55-56；朱英，2000：187)

武漢勸業獎進會可稱為中國近代全國博覽會之嚮矢，從推動武漢工商業發展來看，確實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首先，第一次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和場所，使武漢工商業者能夠從全域瞭解武漢經濟發展的現狀。另一方面，許多展品付諸闕如或欠完善，也反映武漢乃至整個中國工業仍很落後的狀況。最後，武漢勸業獎進會作為一種大型的地方性商品賽會，它的舉行對中國如何學習西方國家創造的這一推動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式，著實提供有益的經驗與教訓。(朱英，2000：187-188) 而武漢勸業獎進會的成功，雖與武漢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關。但馬敏教授認為在一個以人治為主的政治結構當中，決定是否舉辦博覽會的往往不是經濟或社會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也就是取決於個別封疆大吏或地方官員的開明程度，誠乃的論。例如晚清的湖北能夠率先舉辦武漢勸業獎進會，顯然與張之洞、端方、陳夔龍等三位督撫有著莫大關係，尤其與張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各項新政有密切的關係。新政期間張之洞所提出的擴充商務十條辦法的第十條即為賽工藝，張之洞較早地看到西國常有賽會之舉，聚本國他國之貨物，萃於其中。日本效之，故設勸工廠，亦名貨物陳列所。他建議仿效西方各國及日本賽會，在沿江沿海及內地各省大城巨鎮設立勸工廠，備列本省出產貨物、工作器具，讓人參觀，比較優劣，自相勉勵，並認為此事並不難，惟在朝廷嚴飭各省，切實舉行。為此，張之洞積極在湖北開設商品陳列所、勸工廠，儘管湖北於1909年舉辦武漢勸業獎進會，是在張之洞身後不久由繼任趙爾巽湖廣總督的新任陳夔龍總督主持，但實際可視之為端方、張之洞治鄂業績的延續。同樣的，晚清直隸商品賽會的興起和發展，以及前面所提過的1906年10月天津勸工展覽會，與袁世凱在直隸所推行的

各項新政改革有關。(馬敏，2004：115；洪振強、艾險峰，2013：93)

(二)1910年舉辦全國性勸業博覽會：南洋勸業會

清末1900年爆發庚子事變，慈禧太后接受八國聯軍提出的《辛丑和約》，朝廷保守派主動要求變法以圖存。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之下，滿清政府進行改革，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欲圖自強，必先變法；欲變法，必先改革政體。為今之計，惟有舉行立憲，方可救亡。」1905年7月袁世凱聯合兩江總督周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奏實行立憲政體，並奏請簡派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1905年9月滿清政府決定派遣考察政治大臣五人，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出使西洋。同年12月7日，第一路考察團戴鴻慈和端方率團出發。1906年1月14日，載澤率領第二路考察團出發。考察團先後回國後進呈了一份強國必行憲政的考察報告，編成《列國政要》133卷及《歐美政治要義》18章，並積極建議推行憲政。1908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兩年後的1910年，中國第一個全國性博覽會「南洋勸業會」在南京盛大舉辦。

一般說到南洋勸業會的發起，會認為是端方的功績之一。依據喬兆紅博士與馬敏教授的研究發現，倒不盡然。喬兆紅〈開一時之風氣策異日之富強—論1910年南洋勸業會〉一文指出，最早於1904年由的南洋華僑張振勳首先倡議。南洋歸國華僑張振勳入京，捐銀二十萬兩，慈禧太后特予召見，聽取南洋工商業如何發達的報告，張振勳建議清政府開辦一大規模博覽會，以開闊國人視野，繁榮經濟。當時深得慈禧太后贊許，即令著手籌辦。(喬兆紅，2008d：12)另就馬敏教授的〈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述評〉一文，或可算在其下屬江寧公園辦事處主事道員陳琪身上。1908年底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端方曾飭令江寧公園辦事處籌辦一個植物賽會院，目的無非考察種植，研究農學，裝點新政門面而已。陳琪思想比較開明且嫻熟世博會事務，趁此時機聯合另一名道員嚴其章給端方上了個稟文，認為僅陳賽植物花卉，於國計民生並無大益，不如就江南公園地界舉辦一次國內博覽會，

合農工商品蔚成巨觀，以求農工商業之勃興。(馬敏，1985：73) 其實陳琪早在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博覽會時，因精通英語，被湖南巡撫派往美國負責陳設湖南賽品，並調查實業。1905年12月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陳琪任參贊隨員，順道參訪過1906年米蘭世博會，對博覽會能促進農工商務繁盛頗有體會，歸國後即在《擬陳湘省工業次第興辦事宜稿》中提出要在國內召開博覽會。後一直掛念此事，躍躍欲試。所以陳琪在一份上奏端方的呈文中提出：「嘗考歐美各國農工商務繁盛之原因，無不由賽會而起……北美洲自東徂西，逐次開賽，以造其國。若英、德、奧、法、比、義連年開博覽大會，而富強之規甲于寰宇，此其明證也。」(喬兆紅，2008d：12) 由是才有1908年11月為江寧省城擬設南洋第一次勸業會，官商合資試辦以開風氣而勸農工，兩江總督端方上奏朝廷，力陳「富強之策必以實業發達為要圖，而講勸之方尤以合群競爭，為進步泰西各國常於農工商各項品物開設博覽會」，並表明「前年奉使歐美，察其農工商業之盛，無不由此賽會激勸而來，自蒞兩江任後，時競競焉，以仿行賽會為急務。」(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1-3)

籌備組織方面，端方的建議獲中央的支持，其主張亦得到滬寧兩地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著名實業領袖張謇、虞洽卿等人都為此積極奔走。1909年3月26日於南京成立勸業會事務所，設正會長由兩江總督兼任、副會長、坐辦、幫辦諸職。事務所下轄董事會，具體負責籌款、經營業務。滿清政府於1909年8月28日正式批准舉辦南洋勸業會，任命新任兩江總督張人駿為勸業會正會長，專任籌備該會一切進行事宜。同勸業會事務所平行的輔助機關為協贊總會，其目的在聯絡各地官紳、實業各界而謀南洋第一次勸業之發達。在勸業會事務所指導下，兩江所屬各府州先後設立39個物產會事務所，由地方官和本地著名紳商共同主持。其任務是對本地物產、工藝進行周詳調查，舉辦物產會選擇品質精美的土特產品，然後再擇優運往南洋勸業會赴賽。兩江以外的其他各省以及南洋群島諸埠則分別設立出品協會，作用與兩江物產會類似。值得一提的是南洋勸業會仿內國博覽會辦法，按照規章所有會務及出品運賽一切，不只本國領土以內都要協力籌辦，凡為中國

屬土所轄以及殖民所至之地，所有農工商學及各種實業，都要徵集物品運往陳賽。南洋群島及新加坡等埠，地勢廣衍物產繁豐，中華僑民營業于其地者，不下數萬人之多。考量其地雖為荷蘭等國所佔領，惟實業各界仍由我國僑民執牛耳。於是南洋勸業會特建立南洋華僑陳列所，勸諭僑民分別設立協會徵求物品赴賽。各地先期舉辦的物產會、出品展覽會和勸業獎進會不僅為勸業會徵集一大批精良賽品，更重要的是在全國各地分別進行了勸業會預演，為南洋勸業會奠定基礎。(馬敏，1985：75；喬兆紅，2008d：13)

展示規模方面，會場佔地700畝(約47公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兩江所設展覽館計有教育館、工藝館、農業館、機械館、通運館、美術館、衛生館、武備館、京徽館，並附設一勸工廠。又設有暨南館一所，作為南洋華僑出品陳列之處，設第一、第二、第三參考館，展出英、美、日、德等國的產品。各省館、東三省館、山陝館、湖北館、湖南館、四川館、河南館、山東館、雲貴館、浙江館、福建館、安徽館、江西館、安慶館。此外有江寧綬業館、湖南磁業館、博山玻璃館三個專門實業館，以及江南製造局蘭鑄館、廣東教育協會教育出品館、江浙漁業公司水產館三個特別館。全部賽品約百萬餘件，以農副、工藝和教育出品為主，共分24部、444類，展覽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在中國歷史可謂空前。出品陳列展出由陳列裝飾部專門負責，逐件附以標籤及說明目錄，力求井井有序。參賽物品主要供觀覽、研究和評獎，也准許部分就地銷售，價目仍照原產地標籤。但成交率並不高，售出之物不過20%~30%。(馬敏，1985：76；朱英，1996：187-188；喬兆紅，2005：92)

展品評獎方面，評獎原則以「專以獎進實業，提倡公司局廠為先」，或鼓勵其工作之良，或檢視其銷路之廣，予以優獎。在三個月時間中，審查評獎人員對十萬多件賽品分類審查，悉心比較，最後評出一等66名、二等240名、三等426名、四等1,218名、五等3,345名，共計5,269名。列入一等者發給商勳，二、三、四、五等分別給予超等、優等文憑和金牌執照。此外，凡於製造、采運賽品有贊助之勞者，酌情給予贊助獎憑。66件一等展品中，以農產品中的絲、茶，工藝品中的化

工染織品為最多，礦產、陶瓷、教育品、美術品次之，機械、武備、棉紗、麵粉、畜牧、水產展品又次之。(馬敏，1985：76)

研討活動方面，係南洋勸業會最大的一個特色，和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一樣，不只是展示而已，還配合舉辦很多研究會或報告會。乘勸業會籌備和舉辦的機會，紳商學各界加強聯合，建立了許多研究會、報告會、演說會等民間組織機構，據統計在勸業會結束前20多天就已有42個之多，具體情況詳見表3-10。(吉田光邦，1996：341；洪振強，2007：208) 南洋勸業會研究會於1910年6月成立，有近八百名研究員，研究展品的優劣及改進方法，以推動工商業進步發展。研究員在對各類展館進行各自研究的基礎上，將各種研究成果匯總結成書，編成《南洋勸業會研究會報告書》。在農業方面，研究員在報告書中分析了當時引進小型農用機械並加以改進的現狀。例如，梁祖祿把原由英國人發明的篩茶機、制茶機加以改良並進行推廣。在科技機械方面，劉輔臣的報告書對機械館進行了評價，他指出上海求新鐵廠和天津勸業鐵工廠製造的機器反映了中國科技的進步，這些展品雖然是效仿的國外技術，但是製作水準很高，將來會有創新的可能。還有研究員對不同地區的綢緞和瓷器進行比較研究，以求改良進步。這些研究報告可以使各展品的優點得以發揚，缺點得以改正，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丁麗，2015：64；吉田光邦，1996：343-345)

表3-10 南洋勸業會民間社會組織機構一覽表

名稱	常設或暫設	發起人或主責人
1. 全國出品調查會	暫設	向瑞琨、陶遜等
2. 勸業會研究會	暫設	張謇、李哲浚、陳琪等
3. 種子交換會	常設	馬良、向瑞琨等
4. 教育研究會	暫設	黃紉之等
5. 報界俱進會	常設	時報、神州報等
6. 天足演說會	常設	王女士等
7. 滬漢跑馬會	暫設	滬漢商會
8. 軍國運動會	暫設	徐紹楨、陳琪等
9. 遊戲改良研究會	暫設	滬商界
10. 協贊總會	暫設	張弼壬、張謇等

11. 各省出品協會聯合會	暫設	不詳
12. 勸業日報社	常設	向瑞琨、彭淵恂等
13. 南京濟良所	常設	顧琪、陶席山等
14. 勸業會銀行	常設	官商合辦
15. 後湖種苗公司	常設	梁祖祿等
16. 甯商建築公司	常設	寧省商界
17. 制帽傳習所	暫設	華僑及事務所
18. 臨時病院	暫設	事務所
19. 赴意賽會出品協會	暫設	吳匡時等
20. 書畫研究會	暫設	不詳
21. 城北救災會	常設	巡防局及事務所
22. 陳列裝飾研究會	暫設	向瑞琨、沈祚延等
23. 全國農業研究會	常設	張謇、熊希齡、周廷弼等
24. 廣告研究會	暫設	向瑞琨等
25. 武備出品研究會	暫設	陳琪、馮錫仁等
26. 全國衛生研究會	常設	朱師誨、楊君謀等
27. 保國愛財會	常設	梁祖祿等
28. 音樂研究會	常設	陶朴青、莊志佑等
29. 全國學界運動會	暫設	青年會等
30. 美國商團歡迎會	暫設	南洋勸業會中各團體
31. 事務員養成所	暫設	向瑞琨、沈祚延等
32. 城北公共衛生處	常設	舒厚仁、陳琪等
33. 勸工廠出品研究會	暫設	事務所
34. 美術研究會	暫設	向瑞琨、闕伊等
35. 益利建築公司	常設	虞和德、李平書等
36. 貧民生計研究會	暫設	向瑞琨、高彤墀等
37. 蒙啞善堂	常設	陶森甲等
38. 菊花賽會	暫設	不詳
39. 大豆研究會	暫設	李石曾等
40. 赴德賽會出品協會	暫設	朱師誨
41. 手工業改良研究會	暫設	不詳
42. 宗教演說會	常設	中國青年會

資料來源：《大公報》，第 2972 號，1910 年 11 月 2 日。轉引自洪振強，2007：208。

參觀人次方面，南洋勸業會於1910年6月5日開幕，《申報》刊載的〈南洋勸業會開會祝辭〉中寫道：「會中有各省特產，不限於南洋，實全國勸業會也。華僑有陳列所，外國有參考館，則又近于萬國博覽會矣」。(轉引自謝輝，2005：20) 因此

南洋勸業會也受到當時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紳商、政要、學者、華僑紛紛前來參觀，日本與美國也派龐大代表團。(參見：野澤豐，1983) 南洋勸業會前後開展6個月，參觀人數近30萬人次。鍾少華在〈中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文中提到「入場券一張兩角錢，由於票價偏高，據記者調查，展出期間，每天平均參觀者在三百至四百人次，即半年間不過七萬餘人。」(鍾少華，1991：99) Susan R. Fernsebner在她的博士論文有類似看法。(Fernsebner, 2002:98) 而朱英在《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書中提到南洋勸業會「展出6個月期間，各種報刊雜誌競相報導，前往觀摩者達20多萬人次，日本與美國也先後派出實業代表團赴會參觀。」(朱英，1996：188) 此外，提到20多萬人次的學者專家還有王傳瑞(1999:54)、喬兆紅(2005：92)、魏愛文(2002:26)，而吉田光邦在〈1910年南洋勸業會始末〉文中，推估參觀人次最多只有24萬。(吉田光邦，1996：352) 倉橋正直在〈清末振興實業〉文中提到約有25萬的參觀人次。(倉橋正直，1978：80) 謝輝在他的《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博士論文，提到南洋勸業會有30萬的參觀人次。(謝輝，2005：196)

會務營運方面，勸業會結束後，由於經營不善，造成了數十萬元的虧空，幸有南洋僑商慷慨解囊。僑商張煜南擔任籌備勸業會善後事宜，願以10萬元報效勸業會善後經費，以20萬元承領會場地基屋宇。除留下勸工廠、美術館、水產館，各省別館五處以及馬路、橋樑外，其餘均歸該僑商永遠管業，另設公司，開辦市場，十年之內准其免繳房租地稅並一切厘金雜捐。(馬敏，1985：75；喬兆紅，2008d：13，2005：92；吉田光邦，1996：352) 南洋勸業會是中國晚清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商品賽會，若以經費收支與參觀人數來看，並不能算是成功的博覽會。單就參觀人數無法達到預期的50萬來看，當時南京人口只有20多萬人，客源就不足，若想吸引比較富裕的滬寧民眾前來，需四天的旅程且所費不貲，中等旅費要20元，若以當時勸業會入場券只需五分錢來看是昂貴了些，而且是時南京正值酷暑，更嚴重影響民眾參觀意願都是原因。(吉田光邦，1996：352；倉橋正直，1978：80) Michael R. Godley與 Susan R. Fernsebner的研究亦指出勸業會六月初開幕之後，仍

有許多展館尚未完工，教育館與農業館七月完工，工藝館、機械館和武備館直到八月才完工，大大影響民眾參觀意願，也就影響到大會的門票收入。(Godley, 1978: 519; Fernsebner, 2002:98) 倉橋正直也曾提到「由於交通的不發達，許多展品開幕三個月後才到位，且70萬展品當中，約40萬是農產品，新奇的工業展品很少，影響民眾到場參觀。」(倉橋正直，1978：80)

當時日本上海總領事有吉明在《南京博覽會各省展品調查報告書》的序文，即言這次的勸業會雖然冠上「南洋」的名稱，事實上，它道道地地是個全國性的博覽會。該報告書緒論亦稱南洋勸業會與歐美國家的博覽會相比，雖然在展場規模與展館裝潢都無法比擬，不過確實是中國第一次的全國性博覽會，藉此可一窺中國在教育、軍事、農林工礦的發展現況。(吉田光邦，1996：340，354) 馬敏教授亦認為1910年在南京召開的南洋勸業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博覽會，它以某種新形式體現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具體展現當時滿清全國產業發展狀況，對當時農工商業和教育、衛生各方面均有很大的影響。結論作為一次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新事物的嘗試，它畢竟不很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貧窮落後所致。(馬敏，1985：75，78) 惟中國世博會研究後起之秀喬兆紅博士評論道：「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實屬世界博覽會在中國的一次成功預演，中國歷經清朝40餘年幾10次參加世界博覽會的經驗，且南洋勸業會的主事者多為放過洋嫻熟世博會之士，南洋勸業會讓中外各界無不驚為意外，國內各界好評到場參訪絡繹于路，發揮『開一時之風氣，策異日之富強』的承先啟後作用，促進了南京乃至全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喬兆紅，2008d：17)

三、小結：滿清的博覽會事業發展落後日本30多年

就中日兩國參與世界博覽會情形來看，1851年的首屆倫敦世界博覽會就有中國商品的展區，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展，奪得金銀兩項大獎，但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視。中日兩國同在1866年受法國邀請，隔年日本的德川幕府為向各國宣示其政權統治日本的正統性，以及薩摩和佐賀兩藩為了要利用

參加法國世博會做採購軍艦商談的目的，最終決定參展，由德川幕府協同薩摩和佐賀兩藩參展，是為日本首度參加世博會。相對的，滿清政府遲至1904年才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聖路易士世博會，之間有30年以上的差距。

不過，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遣團前往參加世博會，則始於1873年的奧地利維也納博覽會。奧國於會前派特使親赴日本面見明治天皇陳遞邀請函，日本政府方決定參加，為此成立「博覽會事務局」，由大隈重信擔任總裁、駐奧國公使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負責徵集展品與籌備海外展示事宜。設立博覽會事務局之初，即向國人作了明確的政策宣示要積極學習外國科學技術，也確立參加世博會的目的。在展品的徵集與展示方面，預先於明治5年(1872年)舉辦「湯島聖堂博覽會」徵集展品並作預演，日本明治天皇、昭憲皇后、英照皇太后親臨博覽會事務局，將全部遠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的展品巡視御覽了一遍，以示皇家對日本參加世博會的重視。主導此次博覽會事務的佐野常民更在這屆博覽會結束後，撰寫了卷帙浩繁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詳細介紹了此次博覽會各方面的情況，同時對日本發展博覽會事業與建置博物館，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1873年的參加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成為明治時期積極出洋參加世界博覽會的重要里程碑。

1870年清政府也受到邀請，起初也是不願參加，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但是回應者寥寥無幾，商民對參加博覽會的意願不高，經奧國駐華公使的多方奔走，滿清政府才交由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處理，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滿清政府由海關承辦世界博覽會參展事務，從1873年的維也納博覽會到1905年的列日博覽會，海關把持在32年中國參與世博會的28次參展業務。中國滿清政府直到1906年，才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委由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米蘭世界博覽會，結束持續30多年由海關總稅務司洋員把持參賽的歷史。是時滿清政府也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米蘭世博會，在考察大臣端方的努力之下，

才有4年後的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1910年南洋勸業會」的舉辦。1906年的參加義大利米蘭世博會，成為滿清政府自主出洋參加世博會的重要里程碑，相較於日本參加維也納世博會的經驗，中國晚了30年以上的時間。

雖說日本德川幕府第九代將軍德川家重在位的1757年，本草學領域由平賀源內等人發起，委請田村藍水會長舉辦過「藥品會」，當時以田村一門為中心的21名參展人，共提出180種參展物，可以窺見藥品會係少數貴族菁英的私人珍藏的展示交流活動，不具有動員廣泛大眾的文化機制效力。明治政府的博覽會事業從文久元年(1861年)在「蕃書調所」開設物產學開始，物產學可說是國家經濟的根本，為了繁榮貿易，有必要調查國內物產的狀況。明治3年(1870年)在大學南校設置臨時物產局，任命大學南校教授田中芳男調查收集國內物產狀況。物產局規劃在明治4年舉辦大學南校博覽會，當時博覽會的主要目的，要將天下的物產蒐集於一地，將各式各樣的物產品名加以統一，並加以說明用途價值。不過，實際舉辦博覽會時，將名稱變更為「物產會」。明治4年的物產會，可說是日本最初的博覽會。而明治時期博物學風潮下的1872年「湯島聖堂博覽會」為中央政府首度主辦的展示活動，以及由地方政府與商人舉辦的地方博覽會，為1877年起接連舉辦5屆的內國勸業博覽會，營造出有利的發展環境。反觀滿清的博覽會發展史，似乎少了幕府時期本草學的「藥品會」，明治時期「蕃書調所」開設物產學舉辦「物產會」，將天下的物產蒐集於一地，將物產品名加以統一說明用途價值，以及博物學收集展示全國產物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

明治政府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之後，有感於奧美兩國舉辦世博會的效益，當時主導維也納世博會參展事宜的佐野常民，提出博覽會與博物館具有「寓教於觀」的作用之外，更有感於日本產業技術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提出舉辦世界博覽會計畫，以吸取西歐先進產業技術，振興日本產業。惟當時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工業，決定先舉辦全國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以防止強勢的外國貨品在國內泛濫，扼殺亟待發展的國內工業。1877年至1907年的30年間共舉辦六次比較重要的內國勸業博覽會，會期都在百日以上，參

觀人次從45萬成長到680萬之譜，雖為內國勸業博覽會，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與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已有世界博覽會的規模。為保護國貨以振興國家產業發展，第一屆至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性質屬「經濟的博覽會」。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與1899年治外法權的撤除，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就比較偏向宣揚帝國主義正當性的「帝國博覽會」。

對照滿清政府的舉辦博覽會經驗，1906年第一次把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博覽會引進國門，在成都舉辦的第一屆商業勸工會，於4月13日閉幕之後的10月7日天津勸工展覽會於大經路河北公園內開展。除1906年成都商業勸工會與天津勸工展覽會之外，1909年在武昌舉行的武漢勸業獎進會，雖說是清末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博覽會，這三個博覽會雖同有經濟博覽會的性質，即使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已有設置類似日本的參考館有外國應邀參展，但規模都不及日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展示天數由102天增加至153天，參觀人數由45萬成長到531萬人次。就單與日本1877年舉辦全國性質的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相比較，中國遠遠落後30多年，在1910年才首度舉辦全國性質的「南洋勸業會」。(參見表3-11)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彼此之間博覽會發展的落差？這正是下一個章節要討論的重點。

表3-11 中日兩國於1871~1911年所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

年份	博覽會名稱		會場	會場面積	會期	參觀人次
	明治日本	滿清中國				
1871	京都博覽會		日本京都		30天	11,211
1872	湯島聖堂博覽會		日本東京		50天	192,878
1877	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日本東京	0.9公頃	102天	454,168
1881	第二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日本東京	2.5公頃	122天	822,395
1890	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日本東京	3.2公頃	122天	1,023,693
1895	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日本京都	2.9公頃	122天	1,136,695
1903	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		日本大阪	5.5公頃	153天	5,305,209
1906		成都商業勸工會	中國成都	14.3公頃	35天	
1906		天津勸工展覽會	中國天津		7天	150,000
1907	東京勸業博覽會		日本東京	17.1公頃	134天	6,802,768
1909		武漢勸業獎進會	中國武漢		45天	205,569

1910		南洋勸業會	中國南京	46.7公頃	177天	300,000
------	--	-------	------	--------	------	---------

資料來源：整理自松田京子，2003:17；國雄行，2005:23-25，275；吉見俊哉，1992:127；寺下勅，2005：10-13；謝輝，2005:196；馬敏，1985：76，2010c：80；朱英，2000：187；孫耀中，2005：18；許海娜，2013：25；喬兆紅，2007a：53，2003：55-56。



第四章 中日參與世博事業落差分析兼論兩國現代化

前揭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興衰研究，僅見金普森、林芳、謝輝三位合力完成的兩篇專文，主要論點在政府信用不佳、財政困難、政局動盪等原因；以及劉健在《博覽勸業》專書中有〈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衰落的原因〉一小節，從政局動盪、實力羸弱、人員素質等三個面向阻礙博覽會事業發展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及文化因素，來討論造成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發展遲緩並走向衰落。(金普森、謝輝：2004；林芳、謝輝：2005；劉健，2010：165-172) 在研究方法上，筆者參酌蕭瑞麟教授質化研究的歷程分析法，把博覽會事業個案研究的觀察時間拉長，由過去的歷史去了解問題的產生與其中糾結的諸多因素，深入背後真相，進而能夠釐出其間的相關性。同時期望在一充滿複雜性的導入博覽會過程中，詳細描述影響導入的相關事件所鑲嵌的社會脈絡，分析過程與脈絡之間的相關性，形成解釋不同國家引進新科技與制度的綜合性架構。

本論文試以世博會這個來自西方的新平台為起點，它既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與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當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主辦者有計畫在一定的期間與相當面積的展場，徵集相當數量的參展者提供展品，以評比考教的交流方式，以寓教於樂的展示方式，將主題資訊傳達給參觀者的一種超大型展會活動(Mega Events)，其成敗與發展，除了要看博覽會主辦者、參展者及參觀者，或者說影響博覽會事業的關鍵人物，如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及民眾，這些關鍵人物對博覽會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這些關鍵人物與博覽會這個文化裝置或說政策工具是被鑲嵌在社會脈絡裡，一些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國際等因素不容忽視。前者可把博覽會事業視為一個國家、一個團體、一些社會菁英，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快慢起落過程，將以關鍵人物什麼時候接觸到世博會、如何認知意會世博會、如何出洋考察與海外參展來學習世博會，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自己舉辦世博會的歷程，來加以比較分析不同國家發展的落差之外，還要看關鍵人物與博覽會鑲嵌在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面向所交織而成的社會脈絡，來比較分析影響兩國博覽會事業發展的因素。也就是從兩國

在該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制度設計、社會結構變遷、戰爭多寡勝敗、文化包袱束縛等面向，來比較分析兩方發展博覽會事業的環境脈絡，試著掌握中國滿清政府的博覽會發展為何落後日本明治政府30多年的重要因素，進而討論中日兩國現代化發展落差。

第一節 從兩國意會學習實作世博會過程的差異來看

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三位教授在研究使用者對新穎資訊科技的意會過程，將如何影響他們對科技的使用。他們調查衛星派遣系統導入一個大型計程車隊的歷程，剖析創新演化歷程中，使用者與科技如何互動，對科技又產生哪些新的意會，並發展出新穎的應用方式與工作行為，這樣的歷程分析是本論文參考的一個方法途徑。參酌三位教授的研究，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中國與日本這兩個國家遇到博覽會這個來自西方的新制度與新事物，可能感到驚喜，也可能受到驚嚇，亦可能冷漠以對。於是兩國的君臣與國民只好努力去意會博覽會這個新制度與新事物，試著去建構合理解釋來理解因陌生而產生的驚訝。或者以既有思維框架回溯事件，試著由新穎的事物中，找出符合自己感受的解釋，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合理化過程。在意會過程中，關鍵人物的心智活動至少會啟動兩項功能。第一是由意會產生主觀認知，他們會依靠自己以前的經驗，賦予陌生事物某些意義，有時意會的結果是自我感覺良好，有時卻是心生厭惡恐懼，不願面對而推拖觀望。不管這些主觀認知理性或不理性，都會導致面對博覽會新事物關鍵人物的決定性行動，例如採納或觀望或拒絕參加或引進博覽會。第二項功能是由意會進行學習與行動，19世紀中期的中日兩國政府在遇到博覽會時，除了會賦予喜好嫌惡的意義之外，也會進行學習的活動。特別是與其密切互動之後，就會對其功能、舉辦效益，以及不同的運用方式更為熟悉。因此，對博覽會理解的越快、越深入，就更能有效的學習與行動。中日兩國對世博會的理解意會與學習方式，將影響其博覽會事業的發展，是本節要討論的重點。(參見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2011)

一、世博意會：中國的「賽珍炫奇會」 vs 日本的「博覽會」

有關科技意會文獻可分為兩個討論重點，第一類在討論使用者的心智活動 (cognitive process)，分析他們如何賦予科技主觀的意義，以理解科技所產生的不確定性。第二類文獻分析的是使用者意會如何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改變系統設計或科技應用。但是，當今文獻卻較少關注到意會的演化。換言之，「時間」的因素被忽略了。這其中牽涉到兩個理論性問題。第一，過去研究的重點多是「初始意會」 (initial sensemaking)，以及所造成的科技採納結果。不過，這些文獻卻忽略，使用者會隨時間而變「聰明」。當使用者變的更聰明，吸收更多經驗後，他們對科技的感覺與理解就會不一樣。(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2011：93) 中日兩國的博覽會事業發展就是個很好的例證，中國滿清政府對世博會的「初始意會」，早期主責外交事務的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們，將西方博覽會理解成「賽珍炫奇會」的無益之舉，夙以曉諭商民參加或委由海關總稅務司洋人赫德籌辦，以作為外交事務的搪塞應付，國內自難有仿效舉辦博覽會之舉。後經遊歷西方及駐外官員、文人及商人長時間的參觀考察世博會，他們對洋人舉辦博覽會才有不同的理解與意會，漸漸改變過去士大夫迂腐的觀念，開始推崇西方先進事物而宣導西學，對世博會的認識已漸漸脫離「賽珍炫奇會」的意義，20世紀初逐漸掌握考較評比與勸業興商的世博會價值，進而主張仿效歐美的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遲至1910年才有南洋勸業會這等全國性博覽會在南京舉辦。

反觀日本於1862年的德川幕府即派出竹內使節團參與了第二屆英國倫敦世博會，團員中的福澤諭吉在參觀倫敦世博會之後，記下西洋大都會每隔幾年都會設置物產大會，向世界公告徵集各國名產如便利的器械、古物奇珍，向世界各國人民作展示，這樣的展覽會稱之為「博覽會」，立刻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的意義在於「藉由嶄新器物的陳列，以達到相較相學，取他人之長以利己，有如智力功夫之交易」。同時福澤諭吉也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全日本，甚至普及到其他漢字體系的國家。隨後的1867年德川幕府末期的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代表其兄長德川慶喜將軍率團出

席，隨團有幕府的澀澤榮一與博物學者田中芳男、佐賀藩的佐野常民及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等人，其中被稱為「日本博覽會之父」的田中芳男，他對博覽會的看法，主要在收集全國自然與人造的產物，統一在各地不同的名稱，並說明其功用廣為人知，主要基於博物學收集展示全國產物，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閉幕三年後的1870年，日本受到奧國的邀請決定參加1873年舉辦的維也納世博會，還成立了專責單位負責籌備參展事宜。當時由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擔任總裁，工部大丞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佐野常民指出博覽會是集展示國家、交流學習、他山之石、產品輸出、國際貿易等功能於一身之國際展會活動。明治政府透過維也納世博會的參與，已充分理解博覽會的精神與內涵，也為後來「內國勸業博覽會」找到範型。佐野常民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作為開化民智的重要角色：不只是商品展覽，更是依據部門、類別加以區分，讓人們在巡覽這個有秩序的空間時，不知不覺透過眼睛所見來學習「未曾知見之物品」。也就在1873年考察歐美諸強的「岩倉使節團」亦曾參訪維也納世博會，隨行的久米邦武回國之後編修使節團報告書《米歐回覽實記》就是將博覽會定位為振興工業、富國強兵不可或缺的機制。可說在1870年代的日本就以精準意會掌握世博會的意義，也才能領先中國於1877年開始舉辦六屆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

(一) 中國緩慢而被動的掌握世博意義

就時間序來看，可以清朝以前的中國、17~18世紀康乾盛世時期(1681~1795年)、19世紀滿清內外交迫時期、20世紀救亡圖存的新政時期，來討論中國如何緩慢掌握世博的意義，進而影響到參加學習世博會的意願，甚至關連到中日兩國引進這個全新的西方裝置，吸納成內國博覽會制度的時間差異。再者，可就中日兩國可能影響是否引進西方博覽會的關鍵人物，他們對世博會的認知意會的情形，來討論中日兩國引進西方世博會這個全新裝置，內化成內國博覽會制度的時間落差。

1.就時間序來看中國人的意會世界博覽會

就清朝以前中國的擬似博覽會經驗而言，本文的第三章曾提及唐朝末年的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已十分繁榮，不僅固定的「市」發展壯大，且出現了許多不定期的「市」，如北方的「集」與南方的「墟」，也興起各種廟會，帶有較強宗教色彩和娛樂意味的商品交易會。上海師範大學曹建南教授更點出，唐玄宗時代陝郡太守兼領水路轉運使的韋堅，曾經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漕運展覽會，可說是舉辦過「擬似博覽會」的活動。中國大陸博物館專家劉健也提到《舊唐書》裡的〈韋堅傳〉就曾記述：在唐代天寶初年(742年)，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韋堅開槽渠引渭水至長安，在宮苑牆外造廣運潭，廣集各地酒舟所載的地方特產供皇帝觀覽，展示茶米油鹽、山珍海味、綾羅綢緞、奇珍異寶、珠寶首飾、紙筆硯墨等。就形式來說，已初具博覽會的形態。另據古籍記載，更早在隋朝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御駕西巡時，在河西走廊的張掖召開由西域27國君主、使臣、商旅參加規模盛大的國際商品交易會。「(帝)命裴矩說高昌王曲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帝復令武威、張掖仕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互數十里，以示中國之勝」(參見《資治通鑒》隋紀五)。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出現過多種專業性的展覽形式，如唐代為了宣導農具革新，曾收集各地收割用的農具陳列於殿堂，以供宮廷王公大臣等參觀學習；元代人們為了紀念紡織技術革新家黃道婆，將其生前所用的織機、紡車等紡織用品彙集在一起，立廟展覽。(劉健，2010：3-4) 話雖如此，這些都不是西方18世紀19世紀所謂的博覽會。

就17世紀至18世紀康乾盛世時期(1681~1795年)來看，18世紀末的1793年8月24日英國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圓明園布置了「科技宮」，將代表西方工藝的瓷器與天文學做了展示，這是一次西方最新工藝的展示，尤其展演出英國應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成就，許多王公大臣與平民百姓都來到圓明園，做了初期西方藝術與工業製品博覽會的接觸。中國臣民的反應可以乾隆皇帝之說最具代表性，對西方叩關通商與技術交流之請，乾隆仍以天朝自居，心想由於其恩威遠播，萬國來朝，大清

朝種種貴重之物比比皆是，無所不有。而且天朝從不貴奇巧，更不需要英國製辦的產品。如此看來，在圓明園布置的「科技宮」展示西方工藝，對大清乾隆皇帝與重臣們而言，只不過是蠻夷不入流的「奇技淫巧」而已，這一直也是中國官宦與士大夫對外夷的基本態度。這樣的認知意會，再加上當時中國正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盛世，自然不把西方科技看在眼裡，很難有起而效尤的想法。

再就19世紀滿清內外交迫時期來說，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商人徐榮村於1851年的首屆倫敦世博會寄物參展得獎，並未引起滿清政府的重視，這可能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世博會。1851年倫敦世博會主辦單位非常希望中國參展，但當時滿清政府置若罔聞，於是轉向邀請中國商家參展。由於當時中國相對閉塞，許多商人也是置之不理，幾乎沒有人響應。唯買辦商人徐榮村意會出博覽會能滿足其經商的需要，獨寄榮記湖絲往陳於會。在世博會上獲獎後，就把這個獎牌製作成一個商標，進行重新包裝進入市場，在競爭中打敗了其他商家，獲得了很大的商業利益。據徐氏族譜的記載，徐榮村稱世博會為「百年大會」、「京城大會」，將世博會看成在商場競爭所需與商品評比行銷的工具，可惜的是徐氏族譜並不對外販售，再加上商人自古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地位就不高，除能影響少數徐氏宗親之外，能影響到更多中國人的機會似乎不大，當然中國在1850年代自然不容易參加或舉辦博覽會之舉。15年後的1866年滿清政府總理衙門首度接到邀請參加隔年在法國舉行的第二屆巴黎世博會，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展。四年後的1870年，清政府又接到奧國政府邀請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起初也是百般不願意，同樣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依據趙祐志先生對清朝中國參加世博會的研究，從1866年接到法國政府邀請算起，46年間共80次以上。就其表列80次的博覽會名稱，可以看出早期主責外交事務的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們，將西方博覽會理解成「賽珍炫奇」的無益之舉。概在晚清朝野士人初次接觸博覽會，僅從遊歷西方的官員、文人及商人得知有關洋人舉辦博覽會的一鱗半爪，且大多視為無關宏旨的「賽珍炫奇」之

舉，當然背後隱含中國士大夫傳統鄙視蠻夷，以及將科技理解成「奇技淫巧」之癖性所致。(參見趙祐志，1997)

舉遊歷西方的官員、文人及商人之要者，可以瞭解當時他們對洋人舉辦博覽會的理解與意會。首先，1866年斌椿等人西行考察北歐的旅行紀錄，尤以隨行的同文館高材生張德彝撰寫的《航海述奇》，將參訪1867年巴黎世博會展前籌備會場的實際經驗，把聽說的世博會意會成「一定規模的場地，修建各國展館，供展示各國代表文物產品，並由大會考教給獎。」而將世博會名之為「考產廠」與「炫奇會」者，除有士大夫奇技淫巧的鄙視氣息，但多了考較評獎的賽會涵意。另隨後流亡海外文人王韜¹⁵於1868年也參觀了巴黎世博會會後的會場，並寫下〈游觀新院〉，雖將世博會名之為「博物大會」、「聚珍大會」，已能描繪出世博會設展場供世界各國展示奇珍異物，由主辦國考較評獎的大型展會，仍缺對世博會眼目之教、殖產興業及商戰強國等政策涵義的掌握，字裡行間仍流露出中國士大夫遊記的奇觀詠嘆。清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為了使海關籌辦世界博覽會的事務能得到中國人的認可，1876年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受總稅務司赫德委派參加費城世博會，並詳細考察並記錄此屆世博會，回國後的1877年完成〈美會紀略〉約2萬字，將世博會名為「百年大會」、「賽奇公會」，認識上偏重「賽會」的意義，不過通過參觀考察世博會，李圭改變過去士大夫迂腐的觀念，開始推崇西方先進事物而宣導西學，他認為由於國人出外鮮少窮究其理，因而主張舉辦博覽會是無益之舉。〈美會紀略〉讓國人進一步的認識世博會，尤其對當時的洋務派官員傅雲龍、郭嵩燾等人有很大影響，可惜的是當時只印了3,000冊，影響範圍仍然有限。

李圭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數年後，適逢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受命兼任駐法公

¹⁵ 1860年李秀成率領的一支太平軍陷蘇州，碰巧在這期間王韜回蘇州老家探望母親時，結識太平天國地方長官劉肇均，受其器重，為太平軍獻策，兵敗為朝廷通緝。受到上海英國領事館的庇護，1862年輾轉亡命香港，蒙英華書院院長漢學家理雅各收留，並受聘協助翻譯《十三經》、《尚書》等中國經典，1867年理雅各離開香港回蘇格蘭家鄉，王韜受道理雅各邀請到歐洲遊歷並前去蘇格蘭繼續幫助翻譯中國經典。就在這段時間，王韜參觀了1868年巴黎世博會會後的會場，並寫下《漫游隨錄》一書。(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王韜>)

使，正趕上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盛大的開幕儀式，多次參觀世博園區，更接觸過許多國內外世博會的學者專家，通過西方人對舉辦世博會不遺餘力的態度看出其長處，更對中國士大夫的蒙昧感到悲觀失望，並進行批判。他對世博會的高度評價和對中國士大夫的批評，都只在未出版的日記上記載，並沒有傳入當時中國官界和士大夫階層，殊甚可惜。在郭嵩燾筆下的世博會雖為萬國珍奇會、博物院、賽奇會、賽會、聚珍會、珍奇會、炫奇會、百年大會云云，但對世博會的認識已漸漸脫離「賽珍炫奇」的意義，發現世博會的價值，進而主張仿效美國、法國的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誠如汪榮祖於《走向世界的挫折》一書的〈弁言〉所述：

「郭嵩燾在那個時代中並非頂尖人物，他生既不在咸同將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賜諡。他雖與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等公私關係均密，亦曾得到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甚至慈禧太后的賞識，但是他的實際貢獻不大。原因是他成為那個時代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時代的主流容不了他，他亦不肯隨俗浮沉，腰經挫折後，只好投閒置散，壯志不酬，含恨死於長沙。……我們不禁要假設：如果郭嵩燾真能影響政策，在總理衙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贏得士大夫的支持，領導中國走向世界之路，那麼這條路必定會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代價更要小得多。」(汪榮祖，1993) 但是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以及郭氏的性格與所處的身分地位，實孤掌難鳴，而此一假設僅止於假設，史實證明最終亦不能成，1870年代滿清皇親貴胄與朝廷重臣也沒能依其建言，仿效英法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

另19世紀後半的70年代與80年代的中國新聞報紙如何看待世博會？1880年中國大地上還沒有出現過博覽會，極大多數中國人對博覽會還相當陌生，認為舉辦博覽會誠屬無理取鬧之甚矣。少數與洋人有所接觸的中國商人，則將博覽會視同可以與會博取一些小利的中國廟會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英國商人於1872年4月30日創辦的《申報》出現闡述博覽會意義、倡導辦博覽會等新聞報導，直言博覽會在廣見聞、備器械、精格致、鬥智巧，而非炫奇鬪異而已。曾以多篇社論希望中國也能舉辦能夠開啟全民智慧與推動地方經濟的博覽會，另因應1881年義大利人加葛理在高談召集各國人在隔年的上海興辦博覽大會，連發社論希望中國也

能舉辦世博會。《申報》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這幾篇系列的社論，有助於中國人認知博覽會的價值，為中國日後舉辦博覽會事業做了重要的奠基，也可以窺見當時新聞從業人員對博覽會有助通商、展經濟及開民智等等好處的掌握，也開始援引使用日本人慣用的「博覽會」字眼。(參見張學勤，2010；洪振強、艾險峰，2009) 就維基百科的資料，這份地方性的上海報紙，1872年4月30日創刊，4個月內銷量從起初的600份上升到3,000份，截至滿清覆亡的1911年《申報》日銷量約7,000份左右，即使到了1922年，《申報》創刊50周年全盛時期的發行量方突破50,000份。《申報》的發行量有限，再加上距北京城有點遠，要能開啟滿清皇親貴胄與朝廷重臣有關博覽會之智，似乎有點困難。

最後，就20世紀救亡圖存的新政時期而言，1900年八國聯軍迫使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逃往陝西，最終滿清簽下《辛丑和約》，付出龐大的賠款。在風雨飄搖之際的滿清政府，積極推行新政以救亡圖存。慈禧太后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首次以官方名義參加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地方大員也興起了一股競辦實業及舉辦博覽會的熱潮，聖路易世博會召開前後，地方大員張之洞在湖北大辦洋務新政的過程中，為促進湖北的商業發展，他提出舉辦賽會與設立勸工廠等措施，認識到商品賽會對振興工業與商業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大力提倡推行。同時北洋大臣的袁世凱亦認為西人賽會為商務最要關鍵，吉林將軍長順上書稱博覽會為商戰當務之急，於是在1903年9月7日，滿清政府為宣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設立商部，1905年清朝商部頒行「出洋賽會同行簡章」20條，支持商人出國參加萬國博覽會。另為新政清廷派出五大臣分率兩支考政大軍周遊世界，端方、戴鴻慈一路的考察，在返國覆命前夕，端方特別順道考察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世博會，對世博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端方回國後，醞釀在江寧(現在的南京市)舉辦博覽會，俾激勵國人以實業興國的決心。端方在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1908年12月7日)會同江蘇巡撫聯銜奏請清政府於江寧舉辦南洋勸業會。端方在奏摺中寫道：「臣前年奉使歐美，察其農工商業之盛，無不由比賽激動而來，自蒞兩江任後，時兢兢焉以仿行賽會為急務。」並在江寧成立了南洋勸業會事務所，

任命候補道陳琪為坐辦，商科舉人向瑞珉為幫辦，並遴選留學東西洋高等商科及曾赴各國參與博覽會務具有經驗之官紳進駐，兩年後的1910年，中國首次全國性勸業博覽會的南洋勸業會得以在南京成功舉辦。

2.就博覽會關鍵人物的意會世博會

中日兩個國家的博覽會事業關鍵人物對世博會的意會、參展學習涉入的程度，常常是影響一個國家引進外來世博會制度，加以內化成本國勸業博覽會營運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兩個國家的博覽會事業關鍵人物約略可分成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及民眾，他們對世博會的意會，甚至參展學習的涉入程度，對兩個國家推動博覽會事業成效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第一，就皇親貴胄而言：在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皇帝與其家族享有無上的權力，以及經科舉制度由皇帝考試任用的官員也享有極大的權力。當然在引進西方科技與制度，他們的認知意會、好惡態度及政策決定至為重要。就拿最高決策者的皇帝而言，17世紀的康熙皇帝喜歡西方人的科技，而且還下過苦功夫學習。據記載做過康熙師傅的傳教士有11位之多，其中有法、比、德、義等國人士，學習的範圍從天文、曆法、地理、數學、光學、哲學、音樂、解剖等領域，可惜的是康熙只把西學當成個人的愛好，而沒有預見科技發展對他治理天下的影響，他不僅沒有大規模引進西學，而且還壟斷把持與外國人的交往。而18世紀的乾隆皇帝，曾在1792年接觸大英帝國由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節團在圓明園佈置「科技宮」展示的西方工藝，他的態度高高在上以天朝自居，心想其恩威遠播，萬國來朝，大清朝種種貴重之物比比皆是，無所不有。而且天朝從不貴奇巧，更不需要英國製辦的產品。如此看來，西方工藝只不過是不屑一顧的「奇技淫巧」而矣。另乾隆皇的孫子愛新覺羅·旻寧於1820年繼大位為道光皇帝，任內的1839年發生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事實上道光皇帝起初是主戰，敢下這樣的決心，與他當時對世界大勢的無知有關。道光居然不知歐美各大國的位置，甚至認為英吉利和俄羅斯是相接壤的國家，尤其他對於英法美德俄等西方列強的政治狀況、經濟發展、軍事實

力等都一無所知，導致他盲目樂觀，認為對英戰爭可穩操勝券。當林則徐任欽差大臣去廣東時，道光皇帝與朝中主戰大臣都認為一定可以使英人降服。顯然道光皇帝不知道，作為全球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國，其軍事實力是當時世界最為強大的。由於道光對敵我力量判斷的錯誤，導致其決策上的反覆。1840年7月定海的陷落，道光帝大出意外，他隱約地感受到西方列強軍事力量的威脅。當英軍北上天津，到達白河口時，道光皇帝被迫面對現實，聽從琦善勸告，同意和談。然而他所謂的和談，仍是天朝上國對外夷懷柔的安撫政策。(馬敏、彭南生主編，2009：20-21)

這樣的世界觀，與其祖父乾隆皇帝如出一轍，即使兵臨城下，仍高高在上以天朝自居，很難將西方科技工藝的「奇技淫巧」放在眼裡。19世紀的同治皇帝，在1866年12月批閱由恭親王奕訢上奏斌椿西行考察北歐所撰行記，僅寫下「知道了」三字，並沒有對一行參訪1867年巴黎世博會前展館建設工程，以及張德彝有關巴黎世博會的奏陳，表達任何具體看法。(辛德勇，2013：95)

至於光緒皇帝(1875-1908年)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以「富國強民」的核心思想，打破了當時社會單純抵抗和盲目排外的消極認識，主張社會改革把中國從落後變為先進，從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從貧窮變為富強，積極探討富國救國之途。光緒皇帝大為賞識，詔命總理衙門特印2,000部，分發京都大臣閱讀。另陳熾寫成《庸書》百篇，提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興學育才、倡議設議院等頗具時代性的主張。此書在維新運動期間與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併被送呈光緒皇帝御覽，對光緒皇帝與維新運動有過重大的影響。(劉健，2010：72，74)

邁入20世紀，八國聯軍之後的1904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首次決定投入大筆參展經費以官方名義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更派出溥倫貝子率團赴美主持中國館揭幕，並帶著慈禧的私函與親筆簽名玉照轉赴華府會見老羅斯福總統。「慈禧太后畫像」是當時中國參展品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1904年滿清皇室溥倫貝子擔任清帝國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參展團正監督，負責一切赴會事宜，《紐約時報》還是將他視作滿清皇室中最為民主的成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時，表達了中國不甘落後於

日本的決心，以及要向西方學習，振興國脈的信心。從居蜜博士編寫的《1904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所發掘的史料當中，20世紀初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慈禧，也不是一個顛預腐敗的清廷，而是一個懂得如何與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立私人情誼的大清統治者，與一批充分理解文化外交重要性的洋務大臣。(居蜜主編，2010) 在進入21世紀滿清政府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后對西方與世博會有新的意會，使得2010年中國首次全國性勸業博覽會的南洋勸業會才得以成功舉辦，當然期間少不了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及商人對世博會的意會相呼應，方得以水到渠成。

第二，就政府官員而言：早期與博覽會事業最核心相關的要算是主責外交事務的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依據趙祐志先生就清廷有關各國賽會公會的外交檔案，對清朝中國參加世博會的研究，從1866年接到法國政府邀請算起共80次以上的博覽會名稱，其中出現「賽奇會」、「炫奇會」、「賽珍會」、「聚珍會」、「聚寶會」有關奇珍異寶的有24次，而且排序上都發生在前40次。若就其中由BIE認可的世博會則有8次的譯名，出現「賽奇會」3次、「炫奇會」2次，「賽會」、「聚珍會」、「商品陳列公會」各1次，更凸顯「賽珍炫奇」之意味。可以看出早期的總理衙門官員們，將西方博覽會理解成「賽珍炫奇」無益之舉。(參見趙祐志，1997)

官員西行考察，最早要算1866年斌椿等人陪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返鄉西行考察北歐，隨行同文館張德彝撰寫的《航海述奇》，將參訪1867年巴黎世博會展前籌備會場的實際經驗，把聽說的世博會意會成展示各國代表文物產品，並由大會考教給獎，名之為「考產廠」與「炫奇會」，仍有士大夫奇技淫巧的鄙視氣息，但多了考較評獎的賽會涵意。1876年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受總稅務司赫德委派參加費城世博會，並詳細考察並記錄此屆世博會，將世博會名為「百年大會」、「賽奇公會」，理解上偏重「賽會」的意義，漸改變過去士大夫迂腐的觀念，開始推崇西方先進事物而宣導西學，他認為由於國人出外鮮少窮究其理，因而主張舉辦博覽會是無益之舉。李圭對世博會的認知意會，對當時的洋務派官員傅雲龍、郭嵩燾等人有很大影響，可惜的是李圭當時人微言輕，其著述《環游地球新錄》也只印

了3,000冊，影響範圍仍然有限。而當時身為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為《環游地球新錄》作序時，曾指出西方各國為通商富強，假世博會以角逐聰明才智，務極事物新奇，進而相互仿效等認識。並以如今中外通好，與英、德、法、美各國互動頻繁，期許有志之士，若能殫心考究各國，略其短而師其長，則對國家有遠大的效益。

1876年費城世博會數年後，適逢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受命兼任駐法公使，正趕上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盛大的開幕儀式，多次參觀世博園區，更接觸過許多國內外世博會的學者專家，通過西方人對舉辦世博會不遺餘力的態度看出其長處，更對中國士大夫的蒙昧感到悲觀失望，並進行批評。可惜的是他對世博會的高度評價和對中國士大夫的批評，都只在未出版的日記上記載，並沒有傳入當時中國官界和士大夫階層。郭嵩燾肯定世博會的價值，進而主張仿效歐美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另伴隨郭嵩燾公使左右的幕僚，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書信〈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除稟報自己在巴黎的課業之外，也述及自己參訪1878年巴黎世博會的觀感，對洋人代辦中國參博展品發表諸多意見。讓人好奇的是，位高權重的李鴻章在為李圭《環游地球新錄》作序時，對世博會似有理解，對有志之士多所期許，但最終並未力挺相識的郭嵩燾，參採其仿效歐美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的主張，以及回應其門生馬建忠批評由洋人代辦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意見。推其因在於洋務大臣與有識之士最鍾愛西洋物質文明當中的武器與軍備，而非西方國家的典章制度。李鴻章本著「中學為體」的政治正確，就是一意經營軍備以圖自強，並派遣留學生到英、德諸國學習軍事，無暇顧及郭嵩燾所提醒此舉乃捨本逐末。他認為李鴻章積極購買兵器軍備，選派學生學習西方利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務而忘其本也」。什麼是本呢？是西洋軍隊與軍火後面的西洋政制、法律及學術。(汪榮祖，1993：254-257) 自然很難參採郭公使建議仿效歐美經驗在中國舉辦博覽會的主張，以及回應門生馬建忠批評由洋人代辦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意見。

僅經營軍備以圖自強這樣的想法，亦可見諸於北洋大臣的頂頭上司，總理衙門

的首席總理大臣恭親王奕訢，1861年1月奕訢、桂良、文祥三大臣曾上奏《通籌夷務全域酌擬章程六條折》，首條即是請求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通籌夷務。於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封建王朝所設立的第一個專門的中央外交機關，是清末外務部的前身。同一時期，滿清政府還在上海、天津兩地設有南北洋通商大臣。總理衙門成立之初，奕訢就曾明確表達洋務運動在於練兵以自強為中心的想法，除了購置洋槍、洋砲、軍艦外，還要自己能夠製造，更要聘請英、法等國軍官對清兵進行使用西式槍砲訓練，以提高軍隊素質和戰鬥力。仿照外國式樣練兵開工廠製器，終究還是需要各類新式人才。另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矇，於是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北京同文館，上海、廣州的廣方言館，為晚清和民國造就一批翻譯、外交及科技人才。同時，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附設的翻譯館，還譯出一大批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近代科技知識。由於只重視整軍經武以自強，不見西方強大武力背後的典章制度思想，自然不會關心歐洲國家用以拓展商機、科技交流及帝國殖民的世博會政策意涵。這與據趙祐志先生，早期與博覽會事業最核心相關的要算是主責外交事務的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將西方博覽會理解成「賽珍炫奇」無益之舉的研究結論相吻合。(參見季鳳文，2002；趙祐志，1997)

清朝末年維新派健將陳熾，光緒年間舉人，歷任戶部郎中、刑部章京、軍機處章京，年輕時曾遍遊沿海各商埠，並考察港澳留心天下利弊得失，接觸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衝擊，由此熱衷西學，並主張學習西方以求自強。他博採已譯之西書，廣徵出使遊歷之華人紀錄，寫成《庸書》百篇，提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興學育才、倡議設置議院等頗具時代性的主張。此書在維新運動期間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一併被呈送給光緒皇帝御覽，對維新運動產生重大促進作用。身為一個改革思想家，陳熾也提出商品博覽會對商戰的重要性，「西人之心計工矣，其維持商務也至矣。其始，莫亟於開博覽之會，所以開其先也。」他認為工業發展的關鍵是維持商務，而想要維持商務就必須先舉辦博覽會。陳熾所理解意會的博覽會，「博覽云者，互徵參觀，以耳目代心思之用，是使

民逸獲之由也」，也就是藉由舉辦博覽會，徵集產品參賽供觀覽，透過觀摩比較激發生產者的創造力，激勵工商發展。陳熾讀英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後寫下《續富國策》一書，其中針對如何準確掌握國際市場資訊時，又再次提到他所理解的博覽會，「賽會一事，實擴充商務之本原，所以駿發心思，開明耳目，使商人之智慧日增，而商貨之流通日廣者」，另「泰西各國，君民上下，皆亟亟焉視賽會為要圖，……經一次賽會，則其國工商技藝各業勃興」。他建議中國在沿江沿海各埠，設法仿行西方賽會，則富強可翹足而待。(參見劉健，2010：74) 與鄭觀應相較，陳熾在思想上更重視農業生產，主張詳細考察歐美各國舉辦賽會的規則制度，先在上海、漢口等交通要道，舉行農桑、礦務等賽會，以促進農業生產與發展。

另趙祐志的研究亦指出，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們對博覽會的理解，叫「賽會」的有37次，在時間排序上都發生在比較後面，亦可嗅出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滿清政府官員對博覽會的理解，已從「炫奇賽珍」轉變到「競爭商戰」的觀念。1895年甲午戰後，中國在西方和日本的強大壓力下，繼「兵戰」之後，開始轉向提倡「商戰」，朝野對博覽會的認知，漸漸由「聚珍炫奇」到「評獎賽會」，博覽會的殖產興業的經濟功能受到重視，博覽會一詞更常被譯為「賽會」。(參見趙祐志，1997：288-294) 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邁入20世紀的滿清地方官員興起了一股競辦實業及舉辦博覽會的熱潮，聖路易士世博會召開前後，地方大員張之洞在湖北辦洋務新政的過程中，為促進湖北的商業發展，提出擴充湖北商務的十條舉措，最後一項即為「賽工藝」。1903年為籌議變法，張之洞上奏〈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其中第五條為勸工藝，建議仿效西方及日本賽會，在沿江沿海及內地各省大城巨鎮設立勸工廠，備列本省出產貨物、工作器具，讓人參觀，比較優劣，自相勉勵。(馬敏，2010b：80)。同年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亦認為：「西人賽會為商務最要關鍵，為工藝第一戰爭，洵中國今日亟應舉辦之端」，以及吉林將軍長順上書稱博覽會為商戰當務之急，言曰：「今與列國開門通市競爭雄富，號為商戰之時，人皆開通，我獨自守，斷無能勝之理，今日舉辦賽會實為當務之急」。就在1903年9月7日，滿清政府為宣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設立商部，任命載振為尚書主管商部。1905

年清朝商部頒行「出洋賽會同行簡章」20條，表態支持商人出國參加世博會，號召各省商家精擇物品，踴躍赴賽，並改變過去將賽事委諸海關洋員包辦的做法，由政府與民間紳商聯合置辦賽品赴賽。此時值得一提的是為新政清廷派出五大臣分率兩支考政大軍周遊世界，並參訪義大利米蘭世博會的這段歷史。考政大臣歸國後，積極建議推行憲政之外，1908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兩年後的1910年，中國首次全國性勸業博覽會的南洋勸業會終於在南京成功舉辦。(吳海勇，2010：15)

端方之所以會同江蘇巡撫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背後有陳琪等幕僚的襄助。1904年美國為紀念聖路易士購地百周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中國應邀赴賽。因陳琪精通英語，受湖南巡撫趙爾巽委派，前往美國負責陳設湖南湘繡、青田石雕等展品，並進行實業調查。博覽會後他又轉道歐洲，赴德國考察陸軍，並遊歷了日、美、英、法、德、俄、奧、意、葡、西、比、土等國，考察各國的風土民情、工商農礦、政教軍事。歸國後即在《擬陳湘省工業次第興辦事宜稿》中提出設陳賽土物廠，以振興實業，也就是在國內召開博覽會。1905年12月陳琪又隨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其間先後參觀了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比利時黎業斯博覽會、義大利米蘭世博會等。通過這些考察活動，陳琪迅速對博覽會有了全盤的掌握。陳琪認為博覽會旨在「用以集合群力，薈萃眾長，以資比較而促進」，有綜合的萬國博覽會、專門的萬國博覽會、內國勸業博覽會、地方勸業會，而舉辦博覽會有五個功能：(1)博覽會可樹立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助於睦鄰邦交、國民外交。(2)博覽會是交流與競爭的平臺，以開闊眼界發現缺陷，一方面汲取經驗彌補不足。(3)博覽會能促進商品貿易、實業發展，為新政的推行籌措財源。(4)舉辦博覽會有助於社會經濟發展。(5)博覽會為國民之大學校，具有教育大眾的作用。陳琪歸國後升任道員，時端方任兩江總督，調陳琪到江蘇，負責兩江督練公所教導處。陳琪曾向端方建議舉辦國內博覽會，並提出在國內自辦博覽會的具體方案，應注意五項要點「宗旨宜純、範圍宜小、體制宜崇、褒獎宜優、籌備宜速」，陳琪認為自辦賽會應循序漸進，先在省會城市開辦陳賽土物廠，待稍有成效後，

再舉辦國內博覽會。他還主張應當官商合辦，實行保商政策。最終在陳琪的策劃主持之下，於1910年舉行了空前規模的全國性勸業博覽會「南洋勸業會」。由於，陳琪清楚認知意會什麼是博覽會，也深知為什麼要舉辦博覽會，最終蒙受有影響力長官的賞識，能夠建議如何發展中國博覽會事業，進而操辦滿清的一個全國性博覽會，堪稱中國近代博覽會之第一人，也標示著20世紀伊始中國各級官員對博覽會已有較全面的認識意會，也說明滿清地方官員在聖路易士世博會召開前後，興起了一股競辦實業及舉辦博覽會的熱潮。

第三，就知識分子而言：知識份子與現代化向來都是學術界關注的題目，在一個國家引進外來的世博會亦然，知識分子的認知意會影響其博覽會事業的發展。那些人算是知識分子？一般說來，科舉時代的讀書人，以及現代受過一定教育程度的人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Edward Shils就曾說過凡是有專精學識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不過Charles Kadushin則說認為一個有專精學識的專業人員，如果整天關在研究室中讀資料、搞實驗，充其量他只是一個專家，只有同時關心國家社會的榮枯興衰，才是一個知識份子。(轉引自張朋園，2002：2)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亦點出：目前的社會科學只關心一些和民眾所關心的公共議題無關的枝節問題，知識分子投身社會科學，有責任運用想像力，關心歷史社會結構，掌握社會議題，進而能運用適當方法解決迫切的公共議題。(C. Wright Mills著，張君玖、劉鈺佑合譯，1996) 以此觀之，清朝知識分子對世博會有所接觸與意會，甚至關心博覽會事業發展者，舉其要者並依時間序有王韜(1828-1897年)、鄭觀應(1842-1922年)、馬建忠(1845-1900年)、梁啟超(1873-1929年)。

王韜於1860年曾為太平軍獻策，兵敗為朝廷通緝，受到上海英國領事館的庇護，1862年輾轉亡命香港，並受英國人理雅各邀請到歐洲遊歷，並繼續幫助翻譯中國經典，這段時間王韜參觀了1868年巴黎世博會會後的會場，並寫下《漫游隨錄》一書，其中的〈游觀新院〉，將世博會名之為「博物大會」、「聚珍大會」，已能描繪出世博會設展場供世界各國展示奇珍異物，由主辦國考較評獎的大型展會，仍缺對世博會眼目之教、殖產興業及商戰強國等政策涵義的掌握，字裡行間

仍流露出中國士大夫遊記的奇觀詠嘆。無论文人王韜是否為第一個看過博覽會的中國人，就他所寫的《漫游隨錄》書中的〈游觀新院〉與〈玻璃巨室〉兩節，可知王韜亦視博覽會為「炫奇鬥異」之輩。日本學者鈴木智夫指出王韜到巴黎的時候，博覽會已經閉幕，所紀錄的正是他參觀會後展場所見及導覽人員所說，不過無論如何王韜還是最早關心世界博覽會，並為文介紹的中國人。(鈴木智夫，1996：70) 就王韜的《漫游隨錄》書中的〈游觀新院〉乙節可以證實鈴木智夫的說法，他筆下的巴黎世博會不到1,000字，譯之為「博覽大會」或「聚珍大會」，「凡中外士商有瑰奇珍異之物，皆可入會，過關許免其稅，于是懷寶者自遠縻至，美不勝收。…法主特簡一博識宏覽之大臣，細察詳觀，辨別其美惡，品評其高下，次第期等差。然後參定應賞多寡。」(王韜，1982：94) 若再就其〈玻璃巨室〉乙節，游賞英國人稱之「水晶宮」(係1851年倫敦世博會展館)，王韜卻隻字未提倫敦世博會。(王韜，1982：101-103) 若屬關心或熟知博覽會之士，應該會留下幾句感嘆，顯見王韜不熟博覽會，同屬20世紀前視博覽會為「炫奇鬥異」之輩，而所寫不過「遊記」，中國士大夫旅遊的奇觀詠嘆而已。

馬建忠因精通英、法現行文字以至希臘、拉丁古文，中西學兼通的人才。1876年以郎中資格被李鴻章派往法國學習國際法，同時兼任當時滿清政府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期間碰巧陪同郭公使參加1878年巴黎世博會盛大的開幕儀式，並多次參觀世博園區。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書信，除稟報自己在巴黎的課業之外，也述及自己遊賞世博會的觀感，對洋人代辦中國參博展品發表諸多意見。馬建忠接觸1878年巴黎世博會寫下「……近日工課稍寬閒，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轂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的文字(參見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記言卷二之〈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雖然馬建忠在用字仍以「炫奇會」，卻已見「賽會」之陳義，跳出過去中國官員與讀書人對世博會的刻板認知，認為世博會意不在炫奇，而在誇富宣揚國威。蓋在令法國人顏面盡失的普法戰爭結束7年，法國政府想在1878年想舉辦第三屆巴黎世博會，向法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法蘭西要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繼續承擔法國在人類文化的領頭羊角色。並評論大清泱泱大國的展示，尚不及蕞爾小國日本，主要原因在於日本由國人自辦，而中國則委由洋人代辦的作法所致。

鄭觀應自小受身為讀書人的父親教育，惜童子試未中。1858年奉父命從香山到上海學習經商，並勤修英語，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等有更深認識，1894年完成《盛世危言》，其中的〈技藝〉乙節，曾言：「誠能集捐籌費，廣開藝學，竭力講求，以格致為基，以製造為用，選擇聰穎子弟已通文理者入院學之，並延西國名師原始要終悉心教授。然後創行博物會，廣羅物產，品評優劣，優者賞之，劣者斥之，則器物日備，製造日精。以之通商，則四海之利權運之掌上也；以之用兵，那三軍之器械取諸宮中也。此取威定霸之真機？而國富民強之左券也。」(鄭觀應，1998：392) 亦言：「茲欲救中國之貧，莫如大興工藝。其策大略有四：一宜設工藝專科也。中國於工作一門，向為士夫所輕易，或鄙為雕蟲小技，...致天下有志之士，不敢以藝自鳴，國家何能致富乎？一宜開藝學堂也。招集幼童，因才教育，各分其業藝之精者，以六年為學成。一宜派人遊學各國也。...日本以彈丸小國有志維新，當其初見貨物之有入無出也，乃分遣親藩大臣遊歷各國，訪其政俗、人情。今之伊藤諸臣，即當時隨派之肄業學生也。一宜設博覽會以勵百工也。歐洲博覽會始於法國...日本在明治初年，子弟工藝學成，於橫須賀設立勸工廠，以賽新物，其佳者准其專利，雖至微之物皆優獎之。故國本大張，得列公法大國之內。今中國亦宜於各省會市鎮各設勸工廠，備列本省出產貨物、工作器具，縱人入觀，無分中外。一以察各國之好惡，一以考工藝之優絀，使工人互相勉，勵自然藝術日新。」(鄭觀應，1998：394-395)

在《盛世危言》的〈賽會〉乙節，鄭觀應闡釋西方國家振興經貿商務發展以加速國家發展是以舉辦世博會開始，並將世博會的宗旨與歷史作了簡要的整理，指

出：「泰西以商立國，其振興商務有三要焉，以賽會開其始，以公司持其繼，以稅則要其終。賽會者所以利導之也，公司者所以整齊之也，稅則者所以維持而調護之也。中國於此三事皆未能因時制宜取長棄短，無惑乎日日言商務，而商務愈不可問也夫。」最終提出「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等舉辦博覽會的主張。(鄭觀應，1998：397、399) 鄭觀應不僅充分地認識到了博覽會對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而且還大膽提出了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主張。《盛世危言》以「富國強民」的核心思想，打破了當時社會單純抵抗和盲目排外的消極認識，主張通過社會改革，把中國從落後變為先進，從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從貧窮變為富強，並就「富國救國」的途徑、方式和方法等進行了積極的探討。洋務運動代表人物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據說光緒皇帝讀了，也大為賞識，詔命總理衙門特印兩千部，分發京都大臣閱讀。幾年之內，這本書竟被翻印20多次，還流傳到日本、朝鮮等鄰邦，風行一時。後來，鄭觀應的這些思想和精神還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及毛澤東等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劉健，2010：72) 最重要的是鄭觀應的重商思想，為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興起奠下理論基礎。晚清思想家當中王韜最早把商業同國家發展聯繫起來，提出了商富即國富、恃商為國本的主張。陳熾則以「商務盛衰之樞，即邦國興亡之券也」來強調商務的重要性，這種氛圍造成商務問題日漸受重視以及重商思想的興起。其中對商戰理解最透徹，談得最深的則首推鄭觀應，他和早期的王韜都把舉辦博覽會與振興商業連繫在一起，1897年劉楨麟發表〈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一文做了最好的結語，「…夫恤商惠工條理萬端，而提倡風氣闢啟津途，可以破華商之愚、懲華商之偽、勸華商之勇、擴華商之見、合華商之勢，使小者大、因者創、拙者巧、詐者信，孰有先於賽會者乎。……故中國不興商務則已，中國而興商務必自賽會始，吾今請言中國賽會之利有八，使天下之主持商務者或有取焉。…一曰聯交誼、二曰擴物產、三曰獎人才、四曰察商情、五曰廣貿易、六曰增關稅、七曰興商地、八曰除積習」。(劉楨麟，1987：52-54)

綜上所述，晚清官員與知識分子對博覽會的認識猶十分模糊，仍以「天朝上國」、「迎神賽會」等觀念來對待新事物。對世博會的意會，大多視為無關宏旨的「賽珍炫奇」之舉，當然也含有中國傳統士大夫鄙視蠻夷為「奇技淫巧」之癖性，大致不出聚珍、炫奇、賽會之辭。另有一說，陳占彪在〈論清末民初中國對萬國博覽會的三種認知〉一文，則從早期的世博會視為「賽奇會」是國人對早期對世博會的認知，這正是遊戲賞玩新奇事物的一個側面反映切入。有趣的是滿清時期不同身份的人員先後觀覽歐洲世博會，也都多次遊覽重建後的水晶宮(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主場館)並留下記錄，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早期接觸世博會的國人對世博會的認知。1866年4月2日，張德彝等人來了錫德納姆山的「水晶宮」，之後張德彝等人於1866年的4月4日、4月21日、5月11日，以及1868年的9月8日、9月13日先後多次遊覽水晶宮。在張德彝的記載中，水晶宮無異於一個「遊樂園」。1868年，另一個中國文人王韜也來到歐洲，在觀覽巴黎世博會的舊址後，王韜也來到英國觀覽了大名鼎鼎的「水晶宮」，在王韜的記載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當時「玻璃巨室」(水晶宮)裡的熱鬧情形。8年後的1876年，另一個中國人李圭也參觀了這座水晶宮，為我們留下了關於「蔡色爾巴列斯」(Crystal Palace)的現場記錄。張德彝、王韜、李圭記載了「水晶宮」熱鬧非凡的娛樂新奇景象，影射到世博會的觀奇性質，或可說明在早期世博會的記錄文字中，張德彝、王韜、李圭等人將世博會稱為「炫奇會」、「賽奇會」，這也反映了他們理解世博會具有娛樂新奇的意義。(陳占彪，2000：152-154)

第四，就仕商/商人而言：1851年倫敦世博會主辦單位方非常希望中國參展，但當時滿清政府置若罔聞，於是轉向邀請中國商家參展。由於當時中國相對閉塞，許多商人也是置之不理，幾乎沒有人響應。唯徐榮村獨寄七里湖絲(榮記湖絲)12包往陳於會，蓋在徐氏意會出經商的需要，在世博會上獲獎後，就把這個獎牌制作成一個商標，進行重新包裝打向市場，在競爭中打敗了其他商家，獲得了很大的商業業績。(HAN，2007：215；楊彥華、冷啟迪、陳恒才，2010) 徐榮村稱世博會為「百年大會」、「京城大會」，將世博會看成在商場競爭所需與商品評比行銷的工

具，可惜的是徐氏族譜並不對外販售，除能影響少數徐氏宗親之外，能影響到更多國人的機會不大。

張謇，他在1896—1897年間向朝廷上呈〈農工商標本急策〉，提出舉辦博覽會是振興實業的重要途徑。張謇認為：「工務亟宜開，開導之計有二，一如各省開勸工會。試辦不甚難，但須上有提倡，並立獎格以鼓舞之；一派大員集合資本，博采各省著名精巧之器，入巴黎大會，並選挈名商慧工同往，察視各國好尚風俗，以便推廣製造。」1901年他在《變法平議》中更把舉辦博覽會列為改良政治，振興實業的一項變法內容，認為「博覽會尤有益於工」，通過商品的展示、比較，「良楛並陳生競心，新奇多見生巧思」，對「最精良者給以賞，或助其銷路」，必能為「勸工之助」。在1903年東渡日本參觀大阪內國勸業會之前，張謇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博覽會展示、比較、競爭與勸業精神。(黃鶴群，2010：148) 若以中日兩國代表性士商濼澤榮一與張謇對世博會的清楚認識與舉辦博覽會的主張來看，中日商人與士商也有約30年的時間差。

第五，就一般民眾而言：1880年中國大地上還沒有出現過博覽會，極大多數中國人對博覽會還相當陌生，認為舉辦博覽會誠屬無理取鬧之甚矣。少數與洋人有所接觸的中國商人，則將博覽會視同可以與會博取一些小利的中國廟會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英國商人於1872年4月30日創辦的《申報》出現闡述博覽會意義、倡導辦博覽會等新聞報導，直言博覽會在廣見聞、備器械、精格致、鬥智巧，而非炫奇鬪異而已。曾以多篇社論希望中國也能舉辦能夠開啟全民智慧與推動地方經濟的博覽會，也連發過社論希望中國也能舉辦世博會。《申報》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這幾篇系列的社論，有助於中國人認知博覽會的價值，為中國日後舉辦博覽會事業做了重要的奠基，也可以窺見當時新聞從業人員對博覽會有助通商、展經濟及開民智等等好處的掌握，也開始援引使用日本人慣用的「博覽會」字眼。(參見張學勤，2010；洪振強、艾險峰，2009) 就維基百科的資料，這份地方性的上海報紙，從創刊的600份，截至滿清覆亡的1911年日銷量約7,000份左右，發行量有限，再加上距天子腳下的北京城有點遠，不只要能開啟滿清皇親貴胄與

朝廷重臣有關博覽會之智有點困難，即使要對上海區域廣大的居民，要能有所影響也有困難。若加上一般民眾教育普及率或是識字率的因素，對來自歐美世博會的意會，會更加的困難。

日本經濟新聞亞洲總局編輯委員村山宏在〈中國和日本國力何時出現逆轉〉一文，指出：「最大的原因是平民教育水平的差異。日本推動明治維新的是下層武士、商人和富裕起來的農民。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連普通平民都能夠理解外國的新技術和新思想。領導者不管怎樣下達指令推進維新運動，如果底層的人不理解支持，新技術和新思想就無法推廣。清朝末期中國也出現了幾次維新運動，但僅限於宮廷內部，並未成為廣泛的大眾運動。在中國通常只有地主階級的兒子為了科舉考試而上學，平民的孩子能夠上學的少之又少。因此中國老百姓在20世紀之前對歐洲文化的理解一直都很緩慢。」（村山宏，2015）

綜上所述，晚清官員與知識分子對博覽會的認識猶十分模糊，仍以「天朝上國」、「迎神賽會」等觀念來對待新事物。由「聚珍炫奇」到「商戰賽會」的轉變，也是守舊勢力與開明官僚之間的較勁拉扯。（鈴木智夫，1996：74-75）

（二）日本快速掌握「博覽會」的世博意會

而與滿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經驗，在幕末的文久(1861-1864)、元治(1864-1865)、慶應(1865-1868)年間的外交文書，有關博覽會的用詞常見的有觀覽場、展觀場、展覽場、博物場、博覽場、賽場、博物會。（寺下勅，2005：52）當時官方對博覽會的認知，以「觀覽」為其基調。而「博覽會」一詞的出現，係栗本鋤雲在1864年，將法國在隔年要召開的Exposition巧譯為「博覽會」，有「廣為展示，萬民觀覽」之意。（椎名仙卓，2005：6-7）至於日本最早接觸世博會是1862年遣歐使節團，應邀出席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典禮。（湯本豪一，1996：8-9）隨團的福澤諭吉回國後，將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並作引介，於1866年出版《西洋事情》廣為宣導，「博覽會是指每隔數年，會在西洋大都會舉辦物產大會，號召世界各國徵集名產、便利器械、古物珍品，以展示給萬人觀覽，稱之為博覽會。...

有教學相長之用意，可比喻為『智力功夫的交易』大會。」(福澤諭吉，2002：49-50) 該書出版狂賣25萬冊，對官員與知識份子認知博覽會有深遠影響，幕府的德川慶喜將軍就讀過這本書，而五年後日本就派出首次代表團參加1867年巴黎世博會。(椎名仙卓，2000：47 & 2005：23；上海圖書館，2002：12；鹿野政直，1987：40) 該次的巴黎世博會兩國都接到邀請參加，反應確是兩極。1866年清政府接到邀請參加1867年在法國舉行的第二次巴黎世界博覽會，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前往。反觀日本，隔年就由德川幕府的薩摩和佐賀兩藩，徵集陶器、漆器、銅器、浮世繪、礦物等特產品參展，是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界博覽會。隨行的澀澤榮一將巴黎世博會情形，詳實且生動的紀錄在他的《航西日記》書中，回國後即一再強調舉辦博覽會對產業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寺下勅，2005：56)

總之，日本比較採用「博覽會」的譯名，是日本人追求「文明開化」與「殖產興業」的重要政策工具，政治、經濟和教育的目的兼而有之。日本在1873年首度派員參加奧國維也納博覽會，其目的一開始便非常明確，「一曰凡以為出品之物，無論天產人工，必擇精美者以搜集之，俾藉國土之豐饒，人工之巧妙，揚國威於海外；二曰各國之出品及著作，必詳加考核，俾知西洋之學藝之精妙，機械之妙用，以開產物蕃殖之道；三曰乘今日之機運，創設不可或缺之博物館，以促學藝之發達，而樹他日博覽會之基礎；四曰本國物產之名目製造，宜力圖改良，以博各國之稱道，而增輸出之數額；五曰各國產物之有名者，必詳查其原價銷路等，以裨自國之貿易。」政治、經濟和教育的目的兼有。(馬敏，2007：101；國雄行，2005：32-33)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何時接觸博覽會或有不同的說法，然為文引介博覽會觀念，各有中國王韜的《漫游隨錄》與李圭的5,000冊《環游地球新錄》，以及日本福澤諭吉的25萬冊《西洋事情》，分別理解博覽會為「炫奇賽珍」與「智力功夫交易」的活動。而有關博覽會之用，1867年日本澀澤榮一的《航西日記》旨在「殖產興國」，1876年中國李圭的《環游地球新錄》與李鴻章所寫的序，「賽奇公會，將欲考究物產，修好睦鄰」，重在敦睦邦交。就時間的早晚、出版數量的多寡及認識的

深淺，日本略勝一籌。近代日本在舉辦博覽會能拉開與中國的差距，與兩國一開始對博覽會與其作用有無精準的認識不無關係。(詳如表4-1)

表 4-1 中國人與日本人意會(世界)博覽會比較表

各階層的人	中國	日本
皇親貴胄	<p>1792年乾隆皇帝對大英帝國由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節團曾在圓明園佈置「科技宮」展示西方工藝，的態度，以天朝自居，心想其恩威遠播，萬國來朝，大清朝種種貴重之物比比皆是，無所不有。而且天朝從不貴奇巧，更不需要英國制辦的產品。如此看來，西方工藝只不過是不屑的「奇技淫巧」而矣。</p> <p>1866年12月同治帝批閱由恭親王奕訢上奏斌椿西行考察北歐所撰行記，朱批「知道了」三字，並未對一行參訪1867年巴黎世博會前展館建設工程表述具體看法。</p> <p>1904年慈禧太后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首次以官方名義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界博覽會，慈禧特別派出溥倫貝子率團赴美主持中國館揭幕，並帶著慈禧的私函與親筆簽名玉照轉赴華府會見老羅斯福總統。「慈禧太后畫像」是當時中國參展品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p> <p>1904年滿清皇室溥倫貝子擔任清帝國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參展團正監督，負責一切赴會事宜，《紐約時報》還是將他視作滿清皇室中最為民主的成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時，表達了中國不甘落後於日本的決心，以及要向西方學習，振興國脈的信心。</p>	<p>1720年德川吉宗(比康熙晚30年出生，被譽為江戶幕府中興之主)下令准許輸入與天主教無關的西方書籍後，緩解禁書制度，從此西學的傳人速度加快，逐漸形成蘭學(研究攝取近代西方科學知識的學問)，使日本產生一大批具有革新精神和近代西方科學意識的蘭學家，把西學源源不斷的輸入日本，為變革中的日本社會培育大批人才。</p> <p>1867年德川昭武奉15代將軍德川慶喜之命，代理出席1867年巴黎世博會，並遊學法國，因大政奉還返國，1876年擔任日本參加美國費城世博會代表團專員赴美，並前往法國留學14年後回國，長年在明治政府服務。</p> <p>1877年起明治天皇出席各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第四屆除外)，除表示對大久保利通運用博覽會推動「殖產興業」政策的加持，更以行動宣示對日本現代化路線的堅持。</p> <p>北口由望<明治天皇と内国勸業博覽会行幸：殖産興業政策における天皇の役割を中心に></p>
政府官員	1866年斌椿 西行考察北歐，隨行	1862年幕府官員淵邊德藏 ，參與了第

翻譯張德彝撰寫《航海述奇》將世博會意會成「一定規模的場地，修建各國展館，供展示各國代表文物產品，並由大會考教給獎。」而將世博會名之為「考產廠」與「炫奇會」，有士大夫奇技淫巧鄙視氣息與考較評獎的賽會之意。

1876年浙海關稅務司文書李圭，參加美國費城世博會，寫下《環遊地球新錄》，1877年由海關撥款印行3000冊，可謂中國人對世博會最完備的一個現場參訪紀錄，李將世博會名為「百年大會」、「賽奇公會」，屬視博覽會為「炫奇門異」之輩，認識上偏重「賽會」的意義，但對舉辦世博會效益持肯定態度。

1878年清朝駐英公使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燾，多次親歷第3屆巴黎世博會，日記中的世博會仍為萬國珍奇會、博物院、賽奇會、賽會、聚珍會、珍奇會、炫奇會、百年大會云云，對世博會的認識上仍未脫離「炫奇賽會」的意義。

1878年伴隨郭嵩燾公使左右的參贊黎庶昌，親歷1878年巴黎世博會，完成〈巴黎大會紀略〉一文，仍屬摘要並無太多評論，認知亦不出「炫奇賽珍」之說。

1893年駐美公使國崔國因在芝加哥世界哥倫布博覽會的觸動下，開始重審世博會的意義，各出心思求精，促進國家富強，不可以奇技淫巧視之。

1905年為推行新政於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端方、戴鴻慈順道參觀了1906年米蘭世博會，歸國後積極建議推行憲政之外，1908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

二屆英國倫敦世博會的日本竹內使節團成員之一，在其《歐行日記》中提到，日本還不理解博覽會具有將物品集中展示，讓日本的產品有效推廣出去的效果，只拿一些粗俗的展品聊備一格，殊勝可惜，已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政策涵義。

1864年日本幕府監察官栗本鋤雲將法國1867年要召開的Exposition巧譯為，有「廣為展示，萬民觀覽」之意。博覽會指的是能夠讓物產展示讓廣大民眾觀覽的展會。

1873年「岩倉使節團」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等政府官員曾參訪維也納世博會，將世博會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機制，將博覽會定位為振興工業、富國強兵不可或缺的機制。回國後由隨行的久米邦武編修完成使節團報告書《米歐回覽實記》，於1878年刊行，其中第82卷及83卷大量描述評論維也納世博會)

明治政府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之後，主導維也納博覽會參展事宜的工部大臣佐野常民撰寫了長達96卷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詳細介紹維也納博覽會各方面的情況，並對發展日本的博覽會事業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佐野常民認為博覽會與博物館具有「寓教於觀」的作用之外，更有感於日本產業技術遠落後於歐美，提出舉辦世界博覽會計畫，以汲取西方先進產業技術，振興日本產業。

1876年2月內務卿大臣大久保利通向三條實美提出開辦博覽會的建議書，博覽會的宗旨在於「將萬物毫無遺漏蒐集於同一場所，調查物件之品質良否，考究人工之巧拙，令識者加以評論，使百工相互砥礪，以開商品販銷之途」，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工業，決定先舉辦全國性「內國勸業博覽會」，以防止強勢的外國貨品在

<p>士大夫/武士</p>	<p>1868年王韜於參觀巴黎世博會會後的會場，寫下〈游觀新院〉將世博會名之為「博物大會」、「聚珍大會」，仍流露出些許士大夫鄙視夷人奇技淫巧的「炫奇會」氣息，以及考較評獎的賽會意思。</p> <p>1878年駐英法公使郭嵩燾左右的幕僚，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雖然在用字仍以「炫奇會」，且見「賽會」之陳義，不過已跳出過去讀書人對世博會的刻板認知，認為世博會意不在炫奇，而在誇富宣揚國威。</p> <p>1893年鄭觀應出版《盛世危言》，大力闡釋世博強國論，同時提出舉辦博覽會的主張。</p> <p>1897年劉楨麟發表〈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一文，直言：「...興商務必自賽會始，吾今請言中國賽會之利有八...，一曰聯交誼、二曰擴物產、三曰獎人才、四曰察商情、五曰廣貿易、六曰增關稅、七曰興商地、八曰除積習」。</p>	<p>國內泛濫。</p> <p>1862年日本武士福澤諭吉，參與英國倫敦世博會的竹內使節團成員，在其1866年所著《西洋事情》點出西洋大都會每隔幾年都會設置物產大會，向世界公告徵集各國名產如便利的器械、古物奇珍，向世界各國人民作展示，這樣的展覽會稱之為「博覽會」。同時也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全日本，甚至普及到其他漢字體系的國家。</p>
<p>商人/士商</p>	<p>1851年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獨寄榮記湖絲於倫敦世博會，徐稱世博會為「百年大會」、「京城大會」，將世博會看成在商場競爭所需與商品評比行銷的工具。</p> <p>與澀澤榮一在家學背景、人生歷練，以及仕途方面都有驚人相似性的張謇在1896—1897年間向朝廷上呈〈農工商標本急策〉，提出舉辦博覽會是振興實業的重要途徑。1901年他在《變法平議》中更把舉辦博覽會列為改良政治，振興實業的一項變法內容，通過商品的展示、比較，生競爭之心，創造巧思，藉獎賞助銷路，有助於產業發展。在1903年東渡</p>	<p>1867年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隨德川幕府萬博使節團，在巴黎世博會場開設一家有藝人現場表演而大受歡迎的日本風茶室。回國後的1872年提出〈舉辦博覽會建議書〉，主張日本應該舉辦博覽會，以開闢貿易興國之路，日本不應該只單純進口西洋製品，而應該掌握技術成為能自己製造產品的國家，第一步就是舉辦博覽會。這份建議書在文部省和工部省內流傳，5年後的1877年日本舉辦第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p> <p>1867年澀澤榮一參觀了巴黎世博會，驚見西方工業化程度，為此留下來研究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兩年後回國接受明治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不久即辭職投身實業，一生創</p>

	<p>日本參觀大阪內國勸業會之前，張謇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博覽會展示、比較、競爭與勸業精神。</p>	<p>辦了五百多家企業，成為近代日本的「實業之父」。遊歷歐洲與參觀巴黎世博會寫下的《航西日記》，肯定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對博覽會會場上各國的各種展品的陳列、比較，就能瞭解到各個國家的差異、進步、文明開化之狀況。</p>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考察學習：中國的「五大臣出洋」 vs 日本的「岩倉使節團」

中國滿清末年和日本幕府末年，面對西方船堅砲利的「外壓」，自然興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革新運動，雙方都相繼派出使節團與或考察團，進行外交談判與瞭解西方國家以茲因應。例如，1868年的滿清的「蒲安臣使節團」，與日本1860年的「遣米使節團」、1862年的「遣歐使節團」。(王賓，2001：223-224) 當然兩國在引進與發展博覽會制度上，也曾派出使節團與考察團，日本幕府早在慶應三年(1867年)就派出「巴黎萬博使節團」，中國滿清政府則遲至1904年才派出「聖路易士萬博使節團」。而考察團的部分，日本明治新政府在明治四年(1871年)派出「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考察西方文物制度，順道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中國滿清政府則在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團」，赴日本歐美等國考察政治，順道參訪1906年米蘭世博會。

(一)日本考察學習世博會的領先經驗

日本的「遣歐使節團」，發生於1862年德川幕府時期，因外交事務派遣外國奉行(外交事務長官)竹內保德率領38人使節團遠赴歐洲，交涉兵庫、新瀉開港與江戶(東京)、大阪開市延期事宜，當時團員包括日本現代化啟蒙大師福澤諭吉等人，順道出席1862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開幕典禮，係日本第一次派人前往參觀世界博覽會。(湯本豪一，1996：8-9；西川智之，2006b：175-176；松村昌家，2004) 數年後，福澤諭吉在所寫的《西洋事情》書中，介紹博覽會、博物館等觀念，出版發行之時就狂賣25萬冊，對日本官員與知識份子認識「博覽會」有深遠的影響。(椎名仙卓，2000：47 & 2005：23；上海圖書館，2002：12)

1871年12月23日，日本明治政府為修改不平等條約與考察歐美國家先進國家文物制度，派遣由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4人為特命全權副使(他們後來都成為左右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鍵人物)，以及隨行人員與留學生等48人組成的大型使節團，從橫濱港乘美國商船出發前往美國和歐洲各國。回國後的1878年由久米邦武編寫《美歐回覽實記》多達100卷，其中有參加奧國維也納世界博覽會的紀錄二卷。岩倉使節團主要的影響，在國家發展方面認識到富強是治國的根本，發展資本主義乃是富強的有效途徑。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差距很大，有必要改革。在學習對象方面，歐美列強的後進國家如德國與俄國的經驗，才是日本學習的榜樣。(毛利敏彥，1969：176-180)

大久保利通在1873年5月回國就任參議，11月設內務省由他兼任內務卿，建立起大久保利通政權，自稱「東方的俾斯麥」。1874年提出《殖產興業建議書》，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認為：「大凡國家之強弱，在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在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在於人民是否勉力於工業」，而目前的日本，所以落後於西方國家，在於民智未開，以及政府對此事未加宣導與獎進。在宣導方面，大久保認為博物館與博覽會是「開人智、獎工藝」的捷徑，尤其肯定博覽會物產調查與產業獎進的功能，在他的極力宣導之下，1876年為參加美國費城世博會，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親自擔任該局總裁，田中芳男、手島精一等能吏協助籌辦，成功的完成明治政府第二次海外參展。由於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的經驗，有感於舉辦博覽會的效益，也開始思考在國內舉辦等同規模的博覽會。當時主導維也納博覽會參展事宜的佐野常民，在回國之後提出舉辦世界博覽會計畫，以吸取西歐先進產業技術，振興日本產業。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工業，決定先舉辦全國性的內國博覽會，以防止強勢的外國貨品在國內泛濫，扼殺亟待發展的國內工業。並在西南戰爭的威脅之下，於1877年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有鑒於他的盛況與效益，大久保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建議每四年分區輪流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加速殖產興業政策的

推動。(國雄行，2005：51-84)

另外一位岩倉使節團的成員伊藤博文，歷任外國事務局交涉員，兵庫縣知事、大藏少輔兼民部少輔、工部大輔等職，1885年12月根據他的建議廢除太政官制，實行內閣制，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並開始起草憲法的任務，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大久保利通死後，內務卿伊藤博文與大藏卿大隈重信聯署公告於1881年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為平息內務省勸農局與大藏省勸商局爭奪勸業主導權，於1889年6月設置獨立於這兩個機構的「內國博事務局」負責籌辦工作，順利舉辦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參觀人次由第一回的45萬成長到82萬人次。(國雄行，2005：88) 由於大久保利通與伊藤博文，確立了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制度。

(二) 中國考察學習世博會的經驗

反觀中國滿清政府同樣的接到歐美國家的邀請，惟主責的總理衙門對世博會的了解，僅只是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因此對他國邀請參加世博會都漠不關心。經不起他國的再三邀請，援「以夷制夷」的想法，自組團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籌備，從此確立由海關洋員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遲至1904年，因外交的考量，才派出政府官員與海關洋員聯合組成的「聖路易士世博會使節團」。當時的滿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此次博覽會，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說明清廷對此次博覽會的重視，日後成為1910年南洋勸業會總辦的陳琪，亦隨團參與。(上海圖書館，2002：65-68) 貴為皇親國戚的溥倫貝子與留學哈佛的官員黃開甲，在歸國後對滿清的博覽會事業未有進一步貢獻，誠屬可惜。

20世紀初，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而搖搖欲墜。1901年1月鎮壓過戊戌維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佈要「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遊歷。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的加深，

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後，再做決策。於是1905~1906年間，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等一二品大員，並選調了大批隨員同行，陳琪受端方的賞識舉薦在列，分兩路考察14個國家。考察雖以政治特別是憲政為中心，但實際調查範圍包括議會、政府機關、工廠、銀行、學校、員警、圖書館、博物館、動植物園...等，並順道參訪1906年的米蘭世博會。(王曉秋，2007：143-144)

「五大臣出洋考察團」的端方和隨員陳琪，在1910年所以能首次舉辦中國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該次考察有一定的影響力，與日本1871年派出「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考察西方文物制度，順道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其團員大久保利通與伊藤博文日後促成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惟雙方的差異在30多年的時間差，與日後主導博覽會事業關鍵人物的官階與影響力。端方考察回國之後，出任兩江總督時建議舉辦「南洋勸業會」獲准，1909年調直隸總督，在慈禧出殯之時攔路拍照而罷官。(張海林，2007) 陳琪曾任陸軍第四中學總辦、奉天交涉使會辦兼奉天勸業道、赴美賽會監督兼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局長、浙江省議會副議長，大致都為地方官員。(謝輝，2005：186-191) 官階地位都不如日本「岩倉使節團」的大久保利通與伊藤博文，日後成為主導日本政局之中央大員，當然在影響力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語。

三、參展學習：中國的「洋人代辦」 vs 日本的「國人自辦」

就中日兩國於1877~1911年組團參加BIE世博會情形來看，共17次的BIE世博會，其中日本從1867年開始組團參展12次，中國組團參加只10次。不過，清政府在1873年一時權宜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負責籌辦，首次參加奧國維也納博覽會之後，從此由海關洋人把持30有年參加BIE世博會業務，總計有8次都是洋員承辦，只有1906年米蘭世博會與1910年布魯塞爾世博會這2次由國人親自籌辦之外，國人難以與聞，何遑經驗傳承積累。(參見表3-3) 真要說能累積國人實際籌備經驗與培

養博覽會人才的海外參展，若要把1904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而海關洋人籌辦的形式，率官商參加該次博覽會，以及1905年列日世博會由駐比利時公使楊兆鏊為欽差大臣兼監督，同時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負責所有參展事宜，由國人與海關洋員合作的這兩次算上，也只有4次而已。若要與日本的12次，且早在1867年開始的經驗相比，天差地別。

(一)中國參展學習世博會的「洋人代辦」經驗

1870年滿清政府總理衙門接到奧國邀請參加年維也納世博會，回覆「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由於奧國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但是回應者寥寥無幾，商民對參加博覽會的意願不高，奧國駐華公使乃強力建議清政府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博覽會的籌備，使中國赴維也納是博會的展品具有代表性，才不至於讓大清國顏面無光。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清政府把目光投向當時總理衙門轄下的海關總稅務司，授權赫德迅速妥善處理。晚清海關屬總理衙門管轄，是當時一個大量任用洋人的機構，調度較易，通國際語言，並熟悉外情，再者海關經費較為寬裕，在清政府心中自是組團參加維也納博覽會的理想承辦機構。由於赫德的用心，此次清政府首度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由海關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鈴木智夫，1996：70-74；沈惠芬，2002：5-6；Stanley F. Wright 著，陳養才等譯，1993：3、537) 此外，赫德於1863年被正式任命為海關總稅務司後，「包攬盡可能包攬的職務，承擔盡可能承擔的職務，千方百計地增強海關的權力。」赫德一向以改良中國為己任，他認為參加國際性博覽會有利於促進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與交流，因此十分樂意承擔國際博覽會事務，既受到總理衙門的授命，便牢牢掌握，不允許任何人接觸。(沈惠芬，2002：7-8) 赫德插手滿清參加世博會事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總理衙門不瞭解外情、不知博覽會，以及赫德有心主導中國海關交錯下的結果。它創造了由海關洋員幫辦，並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博覽會的怪誕場面，不只有人戲稱中國賽會乃「赫德之賽會」(汪岳波，2000：1199；李愛麗，2004：214)，也阻礙中國人累積實際籌備經驗與博覽會人才的培養

達30年之久。真要說能累積國人實際籌備經驗與培養博覽會人才的海外參展，若要把1904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而海關洋人籌辦的形式，率官商參加此次博覽會，正監督溥倫貝子，副監督黃開甲，隨員陳琪，以及1905年列日世博會由駐比利時公使楊兆璽為欽差大臣兼監督，同時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負責所有參展事宜，由國人與海關洋員合作的這兩次算上，也只有4次而已。

在20世紀初的清政府開始以國人與洋人合辦方式參加世博會的經驗，可以印證國人若有實際博覽會的參展經驗，有助於日後世博會的舉辦。1904年的聖路易士世博會，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此次博覽會，陳琪因精通英語，受湖南巡撫委派隨團參與世博會，負責陳設湖南展品與調查實業，歸國後將所見所聞寫就《新大陸聖路易博覽會遊記》。1905年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陳琪任參贊隨員，再次遊歷歐美，順道得見1906年米蘭世博會。歸國後受兩江總督端方委任，籌辦滿清時期空前規模的1910年南洋勸業會。1915年由於遊歷歐美精通博覽會事務，前充南洋勸業會總辦亦卓有成效，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任命陳琪為赴美賽會監督兼充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局長，陳以最少之經費，攜最多之出品，得到最良結果。

另外，在中國近代實業界與博覽會事業卓然有成的張謇亦然。張謇於1903年5月受邀參觀日本的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1905年義大利邀請清政府參加隔年舉行的米蘭漁業博覽會，時任商部頭等顧問的張謇正在經營江浙漁業公司，商部要該公司代為徵集漁業展品參賽，張謇就籌備此次博覽會向商部提出二點建議：一是建議成立「七省漁業公司」，以官民合作自力徵集展品赴會。二是趁機宣示中國海權。米蘭博覽會的參展，首次由官民合作籌辦參加國際博覽會，擺脫海關洋員的把持，這是中國近代博覽會史上的重大變化，張謇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10年4月，端方和張謇等人發起舉辦南洋勸業會，這是真正「合全國之力」而舉辦的一次全國規模的博覽會。1913年9月，張謇出任袁世凱政府的農林工商總長，上任後亦大力推動博覽會，在張謇的宣導下，民國初年中國相繼參加了日本大正博覽

會、美國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在北京舉行了農商部「國貨展覽會」，掀起了民國初年的博覽會熱潮。(馬敏，2001；謝輝，2002)

雖然陳琪與張謇所建立起的博覽會事業，印證國人若有實際博覽會的參展經驗，對日後世博會的舉辦與興起有很大的幫助。不過，滿清政府也在1873年權宜由「洋人代辦」的決策，造成日後海關洋員把持30多年海外參展，剝奪國人出洋參展學習累積博覽經驗的機會，進而影響中國博覽會事業落後日本30多年。

(二)日本參展學習世博會的「國人自辦」經驗

反觀日本，1866年接到法國邀請參加1867年巴黎世博會，就由幕府和薩摩、佐賀兩藩，徵集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率團出席，團員裡有幕府的山高信離、田中芳男與澀澤榮一，以及佐賀藩士佐野常民與薩摩藩士町田久成隨行，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1867年幕府還政於日本明治天皇，明治新政府於1872年收到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的邀請函，明治政府首肯參加，並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由大隈重信擔任總裁、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負責徵集展品與籌備海外展示事宜，成為明治時期積極出洋參加世博會的重要里程碑。而後日本明治政府截至1912年之前，陸續以政府組團與或官民合作的方式，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等10次世博會。(詳如表4-2) 其中有1876年費城世博會、1878年的巴黎世博會、1880年雪梨世博會、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1900年的巴黎世博會、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1906年的義大利米蘭世博會等八次的海外參展，都設有專責的「臨時博覽會事務局」負責籌備。而1888年的西班牙巴塞隆納世博會與1905年的比利時列日世博會，則採官民合作，委由民間協辦與政府督導的方式辦理。

表4-2 日本於1877~1911年組團參加BIE世界博覽會情形

年	博覽會名稱	參展方式	參展經費	備註
1867	法國巴黎世博會(二)	政府	NA	德川幕府和薩摩、佐賀兩藩代表參加，由德川昭武(德川慶喜將軍之弟)率代表團出席，團員有田中芳男、澀澤榮一、佐野常民、町田久成、清水卯三郎等。

1873	奧地利維也納 世博會	政府	60萬日圓	成立博覽會事務局，總裁大隈重信(太政官直屬參議)、副總裁佐野常民(駐奧國公使)，田中芳男隨行。
1876	美國費城世博會	政府	36萬日圓	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大久保利通(內務卿)、副總裁西鄉從道(陸軍中將)，田中芳男、手島精一等人員。
1878	法國巴黎世博會(三)	政府	22萬日圓	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大久保利通、副總裁松芳正義(大藏卿)。
1880	澳洲雪梨世界 覽會	政府	4萬日圓	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松芳正義，板田春雄等5名人員。
1888	西班牙巴塞隆 納世博會	政府主導 民間協辦	2.3萬日圓	由農商務省博覽會課主其事，首度委由民間人士協辦出洋參展，仍由駐在地公使大越成德擔任會場指揮官。
1889	法國巴黎世博會(四)	政府	13萬日圓	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井上馨(農商務大臣)、副總裁田中不二(駐法公使)、花房義質(農商務次官)等20名人員。
1893	美國芝加哥世 博會	政府	63萬日圓	首次經帝國議會議決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農商務大臣、副總裁九鬼隆一、建野鄉三，現場事務官手島精一。
1900	法國巴黎世博會(五)	政府	49萬日圓	閣議議決於農商務省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農商務大臣、副總裁九鬼隆一、曾禰荒助。
1904	美國聖路易士 世博會	政府	82萬日圓	閣議議決於農商務省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總裁農商務大臣、副總裁松平正直，現場事務官長(指揮官)手島精一。
1905	比利時列日世 博會	政府補助 民間辦理	4萬日圓 (補助金)	由政府補助日本出品協會辦理，農商務省督導，並派事務官長岡實現場監督。
1906	義大利米蘭世 博會	政府	NA	由農商務省派技師一名赴義大利參展，展場只有144平方米(16個展示攤位)，很小規模。

資料來源：整理自山本光雄(1970)《日本博覽會史》，東京都：理想社。pp.238-275。

不同於中國以「洋人代辦」，日本全由「國人自辦」的作法，在累積經驗與培育博覽會人才，有顯著的效益。例如：1867年在法國巴黎世博會，日本由幕府和薩摩、佐賀兩藩徵集產品參展，並由德川昭武率團，團員裡有幕府的山高信離、田中芳男與澀澤榮一，以及佐賀藩士佐野常民、薩摩藩士町田久成、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等隨行，是日本第一次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田中芳男停留在巴黎的10個月間，除歷練博覽會事務之外，利用時間考察法國的植物園與博物館等文化設施。由於參加過法國巴黎世博會的工作經驗，為明治政府重用，陸續參與1873年

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並於前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擔任籌備單位的事務官、審查官、審查部長等重要職務。而日本從「物產會」發展到「博覽會」及博物館制度的建立，田中芳男的貢獻良多，光是東京大學圖書館就有田中芳男6,000冊有關博覽會、博物館與本草學的藏書，日本人叫他「博物館之父」，也有人稱他為「博覽會之父」。(寺下勅，2005：55；西野嘉章、根本亮子，1997) 同行的佐野常民與清水卯三郎，以及後來奉派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的手島精一，日後都被評價為幕末與明治時期的博覽會先驅人物，對日本發展博覽會事業有極大的貢獻。

清水卯三郎雖是商人卻精通荷蘭文、英文與俄文，有西向之志。曾為參加1867年巴黎世博會到處奔走，最後在會場經營「日本茶屋」，得到大會好評獲頒銀質獎章，回國後更思考在國內如何舉辦博覽會，並提出建言。(寺下勅，2005：53；澤護，1981；丸山宏，2005：225) 佐野常民在後來日本參與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有更重要的角色，明治政府為此在會前設立「博覽會事務局」專職籌備工作。在組織方面，明治政府正院根據佐野常民的建議，任命大隈參議為博覽會事務局總裁，理事官佐野為副總裁，關澤明清等人為博覽會事務官，大藏省的山高信離等人為博覽會書記官。作為副總裁的佐野常民出身佐賀藩，去過奧地利，學過蘭學和化學，1867年他帶領佐賀藩士參加過巴黎世博會，世博會結束後去荷蘭和英國考察海軍和工業，1868年回國後指導該藩的兵制改革。1870年在明治政府為官，致力於海軍建設；事務官關澤明清出身加賀藩，學過蘭學和航海術，在倫敦留學三年，回國後效力明治政府；另書記官山高信離出身兵松藩，學習法語和製鐵技術，1867年參加巴黎世博會，博覽會結束後作為留學生繼續留在歐洲，後應明治政府的召喚回國，廢藩置縣後效力於明治政府。從這三人的經歷都有共同之處，在幕府末期喝過洋墨水，在歐洲主要國家的巴黎、倫敦等地接觸並學習過西洋文明，其中佐野常民與山高信離這二人還參與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喬兆紅，2011a：153) 佐野常民由於他的「蘭學」背景與參加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的經驗，於1873年擔任日本參加奧國維也納世博會「博覽會事務局」的副總裁，負責徵集

展品與籌備海外展示事宜。在回國之後完成《奧國博覽會報告書》，提出博覽會與博物館具有「寓教於觀」的作用之外，更有感於日本產業技術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提出舉辦世博會計畫，以吸取西歐先進產業技術，振興日本產業。惟當時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剛萌芽的工業，因而有六次「全國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促進了日本產業發展。(寺下勅，2005：53-54；國雄行，2005：37, 51-52；呂紹理，2005：78-79)

手島精一有「博覽會先生」的美稱，曾於美國費城留學三年，精通土地丈量與英文，因而奉派參加1876年費城世博會，負責展示日本剛實行的新學制與日本館的解說員，其中的「算盤」教學展示，讓美國人驚嘆。繼之又參加1878年的巴黎世博會、1884年倫敦世界衛生博覽會、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及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期間擔任過農商務省書記官兼博覽會事務主任、日本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現場指揮官、33歲時擔任日本教育博物館館長。(寺下勅，2005：56-57)

有關中日兩國派出使節團與考察團學習世博會，以及組團參展學習世博會的經驗，兩國政府在時間上、方式上及規模上的差異，都可以說明兩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落差。(參見表4-3)

表4-3 中日兩國學習世博會過程比較表

	中 國	日 本
使節團	1904年 派出「 聖路易士萬博使節團 」，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此次博覽會，派出皇室的溥倫貝子和官員黃開甲為正副監督，陳琪隨團參與。	1867年 派出「 巴黎萬博使節團 」，由德川幕府的薩摩和佐賀兩藩代表參加，並由德川昭武(德川慶喜將軍之弟)率代表團出席。田中芳男、佐野常民、清水卯三郎隨行。
考察團	1905年 派出「 五大臣出洋考察團 」，赴日本歐美等國考察政治，順道參訪1906年米蘭世博會。	1871年 派出「 岩倉使節團 」，赴歐美考察西方文物制度，順道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 後來都成為左右日本博覽會與現代化發展的重要關鍵人物

<p>組團參展</p>	<p>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滿清政府先推諉，後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英國人)組團參加，從此由海關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p> <p>1904年派出「聖路易士萬博使節團」，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加此次博覽會。</p> <p>1906年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政府由商部顧問官張謇和民間聯合組團參加米蘭世博會。首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了米蘭世博會。</p>	<p>1867年派出「巴黎萬博使節團」，由德川幕府的薩摩和佐賀兩藩代表參加，並由德川昭武率團參展。</p> <p>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奧國博覽會事物局」積極籌備，並派出「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考察西方文物制度，順道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p>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從兩國世博會被鑲嵌在社會係絡的差異來看

一、政治因素：中國的「政府顛預」vs 日本的「政府開明」

就起自於1851年英國倫敦世博會「興業富國」與「宣揚國威」的用意來看，世博會是種「國家的事業」，平時以和平手段的國與國戰爭。(鈴木智夫，1996：65)有相當高的經濟與政治含量，其中國家政府有其突出且重要的角色，它對博覽會的認知、經驗與作為，將會影響該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

喬兆紅的研究指出：自晚清開始舉辦的博覽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員的態度是否開明，因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政治權勢結構移易而導致的「人存政立，人亡政息」現象非常突出。清末民初的很多博覽會都發端於一、兩位政要，如湖北武漢勸業獎進會的創辦與張之洞和陳夔龍關係重大，直隸天津興辦展覽會與袁世凱、周學熙有很大關係，南洋勸業會的創設與端方和陳啟泰緊密相聯。在1910年代或以前，中國的商品賽會幾乎沒有按章而設，多緣於某政要或商界名流的提議，或緣於某事件的刺激。直到1928年的中華國貨展覽會，中國近代的博覽會事業才開始步入制度化的軌道。(喬兆紅，2008：158) 她對滿清博覽會事業取決於人治而

乏制度，誠乃的論，不過「在1910年代或以前中國的商品賽會幾乎沒有按章而設，直到1928年的中華國貨展覽會中國近代的博覽會事業才開始步入制度化軌道」的說法，並非全然正確。本文前面幾節以就中日雙方對博覽會的認知，與參展與考察以學習作過比較，顯現出中國「天朝自居」的自負與顛預，不過在國內外情勢的壓迫下，遲至於1906年清政府收回由海關洋員主辦參加世博會的權力，清政府開始把它視為作為振興實業的一項具體措施和有效手段（鄭起東，1988：30-33，41-42），博覽會事業日益受到清政府的重視並加以推動。

清政府有關博覽會事業的作為，可有下列數端：(1)1905年11月商部參照各國賽會制定《出洋賽會通行章程》，於1906年12月頒布，明確規範商部與各省督撫、商務局、商會和商人參加國際博覽會的管理許可權及責任，對商人參賽的展品提出了具體要求：一是赴賽之物必須選擇精良，裝潢精美，以合外人好尚為主；二是凡有害風教衛生各品不准赴賽；三是出品應與各國所陳同類之品用心比賽，取彼之長補我之短，以圖改良之計；四是要求出品附有外文說明，隨物陳列，為擴張販路之計…。(轉引自金普森、謝輝，2004：5-6)並要求各省商務局和各地商會鼓勵各地商家精擇物品，踴躍赴賽。(2)為了加強對博覽會事業的領導，設立專門籌備機構加以統籌，清政府決定賽會事宜由商部(後改組為農工商部)負責辦理。(3)提倡商人出洋赴賽之外，「仿外洋博覽會之意而變通之」，在國內也宣導舉辦商品陳列所、勸工廠、勸工會、勸業會、物產會等各種類型的展會，以刺激工商業的發展。(4)為鼓勵商人參加博覽會，官方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一是減免厘稅，《出洋賽會通行章程》明確規定「賽會貨物，准其免稅」。1910年南洋勸業會，亦在端方的上奏之下，同意減免厘稅。(5)鼓勵官商合作舉辦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是官商合作的一次嘗試。勸業會由官商合股，各認其半，並成立了董事會。作為官方代表直接參與的端方，再三強調「專以振興實業，開通民智為主旨」，合作的方式定為「官任補助，不使商本受虧」。(參見劉世龍著，陸梅、劉紅譯，2010：359-369；金普森、謝輝，2004：5-7)

政府政策推動了近代博覽會事業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激發商界人士振興工商實

業的熱情，但由於政府信用不佳、財政困難等原因的影響，限制了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參見金普森、謝輝，2004：7-9) 當然保守勢力「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與帝國主義強烈干預，以及組織上商部及後來改組的農工商部主管官員素質不齊，且權力與影響力的有限，使得滿清「振興工商」政策的失敗，(參見：鄭起東，1988：30-33，44-48；倉橋正直，1978：64-66；汪榮，2006：77) 連帶也遲緩了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

相形之下，早在1871年12月派出的「岩倉使節團」咸認為博物館與博覽會是「開人智、獎工藝」的捷徑，其中大久保利通尤其肯定博覽會物產調查與產業獎進的功能。除極力宣導官商合作海外參展之外，也規劃舉辦全國性的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之後建議定期每四年分區輪流舉辦，以加速殖產興業政策的推動。大久保利通死後，內務卿伊藤博文與大藏卿大隈重信聯署公告於1881年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為平息內務省勸農局與大藏省勸商局爭奪勸業主導權，於1879年6月設置獨立於這兩個機構的「內國博事務局」負責籌辦工作，總裁由能久親王擔任，內務卿松方正義、大藏卿佐野常民、農商務卿河野敏鎌擔任副總裁，並由相關部會的高階文官如內務大書記官田中芳男共七位組成，官階地位及博覽會專業與經驗都是一時之選，第二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參觀人次由第一回的45萬成長到82萬人次。(國雄行，2005：88) 由於大久保利通與伊藤博文，確立了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政策與組織制度。

而且日本起自於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的海外參展，截至1912年之前，陸續以政府組團與或官民合作的方式有10次參加世博會經驗，其中有8次的海外參展，都設有專責的「臨時博覽會事務局」負責國內徵集展品與海外展示的業務。當然國家高層更為重視，明治政府首次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太政官直屬參議大隈重信擔任總裁、駐奧國公使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籌備期間的明治5年11月19日，明治天皇、昭憲皇后與英照皇太后親臨博覽會事務局，視察御覽赴維也納世博會展品，顯見皇室的高度重視。(山本光雄，1970：239-243)

二、經濟因素：中國的「半資本主義農業社會」vs 日本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

由於工業革命致使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際交通的發展，國際貿易成為19中葉工業化領先國家必須面對的議題。居於工業化領先群的英國、法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為日益膨脹的生產力尋找新市場，加劇了彼此之間在商業上的競爭。馬克思(Karl Marx)在《資本論》第二卷，即指出隨著資本主義而起的，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為舞台而展開的商戰。(轉引自汪岳波，2000:1203) 為商戰求勝以持續產業發展，與宣揚帝國榮光，英、法等工業先進國家競相舉辦世博會，開啟19世紀後半博覽會以歐洲國家為主的時代。1851年的馬克思就曾憂心的寫到：「博覽會是集中暴力的明証，現代大工業用這種暴力到處去掃除國家壁壘，日益抹殺生產的地方特性、社會關係以及各民族的性格。」(轉引自Marcel Galopin著，錢培鑫譯，2005：6) 準此，世博會的舉辦，似與國家的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日兩國自19世紀伊始，具有都被歐美列強要求打開鎖國的歷史共同性，並在政治經濟的半獨立與半從屬狀態中，力圖「富國強兵」追求國家現代化。然而，這一走向近代化和對外自立的過程中，日本進展很快，但中國卻緩慢，有些學者從當時強加諸於兩國的政經和軍事「外壓」的不同，做為兩國差異的主要原因，日本學者芝原拓自認為這沒有多少根據，主要是兩國面對「外壓」的對策本身，決定其間的差異。(芝原拓自，1986)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對「外壓」的情況下，基本上國家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和體制根本沒有改變，直到20世紀初，在新政的改革中，漸採重商政策，獎勵農工發展。(劉偉，1997：42) 在近代中國的產業結構，農業產值的比重一直占壓倒優勢，1880年代農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高達66%，傳統工業產值比重僅為7%，近代工業產值比重則可忽略不計。1936年的國民總產值中農業產值比重仍占62%，近代工業產值僅占5%，這說明1949年以前的中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代化程度仍非常之低。(馬敏，1997：101)

相對的，日本鑒於封建幕府遺留下來的經濟基礎甚為落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很不成熟，明治政府為了抗「外壓」，亟思在日本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以「富國強兵」。於1868年4月，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公佈《五條誓文》的施政綱領，一為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二為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為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四為破除舊來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五為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五條誓文》用含糊的語句，表述了地主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要求和願望，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統一國家，表明了近代化的方向。(王銘，1997：85)

不久制定了一項移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殖產興業」政策，運用國家政府的力量，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和動用國庫資金，來加緊推行資本積累，並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大力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明治維新後所推行的「殖產興業」和20世紀初年的產業革命高潮，日本已一躍而變為亞洲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了全面的發展。1886年的日本，全國僅有各類公司(會社)1,794個，1899年則達7,631個，1909年更高達11,549個；全國工廠數為874家，1900年已增至6,992家。從農業與工業比例關係演變看，在「殖產興業」初期，農業一直占有絕大的比重，隨著工業的發展，其比重逐漸下降。大體到了1910年，工業和農業拉平，以後雙方的位置便顛倒過來。在貿易結構上，到1900年前後，日本逐步擺脫了半殖民地的貿易結構，開始形成既依附歐美列強，又對亞洲實行掠奪擴張的新貿易結構。(馬敏，1996：134-135)

博覽會在西方是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世界市場體系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晚清仍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沒有起碼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基礎，理當不可能舉辦商品賽會。在「殖產興業」初期，農業一直佔有絕對大比重的日本亦然。但20世紀初庚子事變之後，滿清政府強烈的救亡圖存與振興工商的需要，模仿了明治政府指導與干預市場機制的做法(於1877年推出舉辦博覽會以殖產興業的政策)，以及組團參訪1903年日本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學習籌辦經驗，在滿清政府的主導介入，於1910年舉辦了等同規模的南洋勸業會。時間雖然慢了30多年，

仍可以看出資本主義與工業化不成熟的不利環境下，若要提早舉辦博覽會以振興工商，「發展型國家」的政府介入與指導有過成功的經驗。

三、社會因素：中國的「戰亂頻仍」 vs 日本的「戰亂較少」

博覽會事業的發展，需要有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戰爭的發生對博覽會的舉辦產生正反兩面的影響，也勢必衝擊參展與參觀意願。就以兩次世界大戰與世博會的關係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主要戰場在歐洲，美國於1917年參戰。在這大戰四年期間，只有戰場未及的北美洲國家美國，於1915年舉辦長達288天的舊金山巴拿馬世博會，有32個參展國，1,888萬參觀人次。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在1937年至1945年，是人類社會所進行規模最大的全球性戰爭。交戰雙方是以中國、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等國組成的同盟國，與德國、日本、意大利等軍國主義國家組成的軸心國。戰爭先在1937年中日之間的蘆溝橋事變開始，歐美主要國家真的開戰是在1940年，美國則遲至珍珠港事變之後的1941年底方參戰。在二戰的八年期間，有過1937年法國巴黎現代藝術生活世博會、1938年芬蘭赫爾辛基國際航空博覽會、1939年比利時列日國際水資源博覽會、1939-1940年美國紐約世博會等4次的BIE世博會，都是在主辦國實際開戰之前所舉辦的博覽會，似不難理解戰爭與主辦博覽會之間的關係。就古偉瀛教授的研究，滿清受邀參展海外賽會的次數和戰事有關聯的，例如八國聯軍進兵北京的1900年，完全沒有受到邀請，當時只有戰爭，沒有友誼。(古偉瀛，1986：255-258) 然而八年抗戰(中日戰爭)期間，理當兩國不可能舉辦博覽會，日本為了動員與合理化對中國發動戰爭，從1938年開始，舉辦過「中國事變聖戰博覽會」、「大東亞建設博覽會」、「國防科學大博覽會」、「興亞國防大博覽會」等博覽會(詳如表4-4)，我們可以在進一步的指出，戰爭期間戰場所在的國家很難舉辦博覽會。

表4-4 日本為中日戰爭所舉辦的內國博覽會

年	博覽會名稱	會場	主辦/贊助	會期	參觀人次
1938	中國事變聖戰博覽會	兵庫縣	大阪朝日新聞社/陸軍部、海軍部	60天	1,500,000

1939	大東亞建設博覽會	兵庫縣	大阪朝日新聞社/陸軍部、海軍部	61天	NA
1941	國防科學大博覽會	兵庫縣	(財)科學動員學會/陸軍部、海軍部、教育部、工商部...	61天	1,000,000
1941	興亞國防大博覽會	新瀉縣	高田市觀光協會/陸軍部、海軍部、鐵道部、電信部...	30天	222,615
1942	大東亞建設大博覽會	滿州國	NA	50天	85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 寺下勅，2005：162-174；橋爪紳也，2005：201。

近代中國戰爭與內亂不斷，博覽會事業一直缺少平穩發展的機會，只有在戰亂與戰後復原的艱苦環境中緩慢發展。道光年間的1840年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滿清戰敗，與英國簽下南京條約，割地賠款與開通商口岸。咸豐年間的1856年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滿清又被英法聯軍打敗，簽下北京條約，賠款與開通商口岸。接續發生中法戰爭(1883~1885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年)、八國聯軍(1900~1901年)，一再上演簽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與開通商口岸等戲碼。在鴉片戰爭以後的70年間，發生過苗民、回民、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等五次社會大動亂，其中太平天國內戰歷時14年，長期的戰爭對江南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造成巨大破壞，使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人口在一個世紀後還未能復原到原有的水平。(羅榮渠，1994：8) 大陸學者彭澤益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一書指出：太平天國之亂的20年內戰中，軍費龐大造成清政府財政空前危機，自1852年到1862年的戶部銀庫收支情況來看，有六年都是虧空短少，1853年更虧了403萬兩白銀。為了擺脫財政困境，不惜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強取豪奪人民財富，以至整個經濟更加惡化，社會更加不安，國民革命勢所難免。(彭澤益，1983：138-145) 在戰亂頻仍所造成的社會動盪與財政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很難舉辦和平歡樂且所費不貲的博覽會。據載於宣統2年(1910年)5月《商務官報》的〈江督張會同南洋勸業會審查總長本部右堂楊蘇撫和奏開會禮成辦理情形折〉，南洋勸業會召開之前，「謠言紛起，或謂逆黨乘機起事，或謂土匪焚搶，會場人心異常惶惑」，

清政府如臨大敵，趕緊調集軍隊駐紮會場附近，還調兵艦在長江水面巡邏。(轉引自金普森、謝輝，2004：9) Michael Godley的研究亦指出南京一帶革命亂黨的活動與仇視外國人的氣氛，曾迫使主辦單位考慮開幕是否要延期，外國軍艦亦在南京城外警戒，清政府也調集軍隊駐紮會場附近。(Godley, 1978:519-520) 不安的氣氛與民窮財困之下，到場參觀的人數也未達到預期，造成南洋勸業會20萬元的虧損。

日本在明治時期，相對於中國享受了多年的國家統一與安定和平，只在1868年大政奉還時發生「戊辰戰爭」(1868-1869)，以及明治維新推行「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和「廢除封建階級身份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影響到封建士族(武士)的利益，引起士族叛亂，1877年爆發「西南戰爭」，在叛軍首領西鄉隆盛中彈自殺後，結束了日本歷史上最後一次內戰。至於明治時期的對外戰爭有三次，依序為1894~1895年的「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1900~1901年的參與「八國聯軍」，以及1904~1905年的「日露戰爭」(日俄戰爭)，幸運的是三次都獲勝，為日本贏得巨大利益。而諷刺的是三次戰爭的戰場都在中國，造成滿清國家威信與人民財產生命極大的損傷。兩相比較，1851年倫敦世博會之後，中國滿清末年與日本明治時期的60年當中，中國有將近20年身陷戰亂，而日本只有2年多的內戰與2年多的出兵海外，相對安定與富裕，相較之下會舉辦更早、更多次的博覽會。

四、文化因素：中國的「自大排外」vs 日本的「擇優攝取」

文化包括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道德情操、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各種制度。文化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更是一種歷史現象的沉澱。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戴季陶、郭沫若等人就特別重視中日兩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異。郭沫若於1935年發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一文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歷史太久，太光輝燦爛，往往視歐美為夷狄，對於新文化、科學知識不易接受，這在變革時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而日本傳統文化的負擔沒有中國重，易於學習外來文化，所以走得較快。(李少軍，2001：283) 日本學者井上清在1954年出版的《日本現代史》第一卷中表達過類似的見解：「中國在幾千年的長時期內，就東方和東方人

所知道的範圍來說，實際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國人當然會以中華自豪，對於近代西洋與其文化，不容易虛心學習。與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曾吸取朝鮮、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來培養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國文化與認識其價值方面，不受中國人那樣的歷史的限制。」(丁日初、杜詢誠，1983：45)

基本上中國在近代以前是單一文化，主流實為儒學的一脈相承，有強烈的同化異質文化的特徵，對不易同化者就會排斥。它具有較大的穩定社會的功能，但容易趨於保守，且因難於吸納新質而使自己停頓。日本文化是複合型的，神道、儒學、佛教和蘭學和而不同，互相補充，既有穩定社會的功能，又能不斷吸納新質而使自己生機勃勃。(參見羅福惠，1995：36；李少軍，2001：284) 再加上中國封建社會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必然導致文化上的專制主義，以利於皇帝的專制。由是滿清的統治者大致上對於西方的科學文化採取鄙視排斥的政策，對西方的科學技術、文物制度、工業產品也一概斥之為奇技淫巧。大英帝國曾由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節團，以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於1792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謁見乾隆皇帝，滯留中國期間的1793年的8月24日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圓明園布置了「科技宮」，將代表西方工藝的瓷器與天文學做了展示，這是一次西方最新工藝的展示，尤其展演出英國應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成就。中國的反應，以乾隆皇帝之說最具代表性，對西方叩關通商與技術交流之請，乾隆仍以天朝自居，心想由於其恩威遠播，萬國來朝，大清朝種種貴重之物比比皆是，無所不有。而且天朝從不貴奇巧，更不需要英國制辦的產品。如此看來，在圓明園布置的「科技宮」展示西方工藝，對大清乾隆皇帝與重臣們而言，只不過是不屑的「奇技淫巧」而矣，這一直也是中國官宦士大夫對中華文化的驕傲自負，進而鄙視外夷的基本看法。乾隆皇帝致英王書信的一個段落可見一斑：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該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轉引自Alain Peyrefitte著，王國卿等譯，2007：249-250)

就滿清政府對西方博覽會這個新文物制度的看法，依據趙祐志先生對清朝中國參家世博會的研究，從1866年接到法國政府邀請算起，46年間共80次以上。就其表列80次的博覽會名稱，其中出現「賽奇會」、「炫奇會」、「賽珍會」、「聚珍會」、「聚寶會」有關奇珍異寶的有24次，而且排序上都發生在前40次，可以看出當時清政府總理衙門官員們對博覽會的理解，大多視為無關宏旨的「賽珍炫奇」之舉，突顯中國傳統士大夫鄙視蠻夷科技文物為「奇技淫巧」之癖性所致。就以中日兩國受邀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的案例，最能彰顯文化因素上中國「自大排外」而日本「擇優攝取」所造成意會、學習及引進世博會上的差異。1870年清政府也受到邀請，起初也是不願參加，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回應，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當時奧國駐華公使強力建議清政府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博覽會的籌備事宜，使中國赴維也納的展品具有代表性，不失大國顏面。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當時的中國連外交部都沒有，外國事務都由兩廣總督處理。再者滿清政府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認為是賽珍耀奇、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滿清政府援用以夷制夷的想法，很自然把目光投向當時主管海關的海關總稅務司洋人赫德，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由海關洋原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的奇特制度。就在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這個時間點，日本更能精準掌握參加博覽會要讓日本走入國際社會、學習西方文明與技術等目的，並藉此廣徵展品的機會向國人作了參加世博會的政策宣示。在籌備的組織方面，大量起用佐野常民、町田久成、田中芳男、山高信離、近藤真琴、關澤明清這些有西學背景與世博會經驗的本國菁英。同時在徵集展品方面，也十分借重法國人西博爾德與德國人華格納等外國顧問的意見。也開始在「參展團」的佐野常民、近藤真琴與「岩倉使節團」的大久保利通等菁英，從世博會認知到「自主精神」的重要性，開始規劃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推動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國策。

相較之下，中國滿清政府則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再者漠視

世博會的效益，認為是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方委由績效卓著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主辦參展事務，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32年間由海關承辦的「洋人代辦」參展模式，與日本明治政府「國人自辦」的參展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對兩國在博覽會事業的進展也產生極大的影響。綜上，晚清官員與知識分子對博覽會的認識猶十分模糊，仍以「天朝上國」、「迎神賽會」等觀念來對待新事物。對世博會的意會，大多視為無關宏旨的「賽珍炫奇」之舉，也取巧的交由「洋人代辦」參展，其中含有中國對華夏文明的自負，傳統士大夫鄙視蠻夷為「奇技淫巧」癖性之文化因素。

第三節 從中日參與世博事業落差因素來看兩國現代化差異

本論文的第一章提及19世紀的中日兩國同受歐美帝國主義的衝擊，分別以「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進行早期現代化。中國自鴉片戰爭後處在內憂外患的局勢，地方封疆大吏與士大夫提出了學習西方的主張，進行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與此同時日本德川幕府在美國黑船的叩關之後也發生變化，倒幕維新的思想最終推翻了幕府統治。明治政府採取一系列維新措施，進行早期的現代化，成功的讓日本由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化社會。發生於1894年7月25日的甲午戰爭，1895年4月17日滿清政府的李鴻章與日本明治政府的伊藤博文簽署馬關條約，或可以說中日甲午戰爭終結了中國洋務運動，代之而起的戊戌變法與立憲運動的再次現代化改革，由於成效不彰，終至滿清皇朝的覆亡，標示著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挫敗與現代化富國強兵的成效落後日本。蔡文輝教授指出：「對中國而言，現代化的問題是非常複雜。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和其他從事比較的學者，經常都為一項事實感到困惑，那就是中國和日本幾乎是在同時開始踏上現代化的路途，但是日本成功地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中國卻失敗了。」(蔡文輝，1980：419) 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亦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是被延誤了的現代化，對中國現代化延誤的探索，長期以來是中外學術界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發展之謎，也就是為什麼一個長期處於領

先地位的經典農業文明大國，在邁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會如此步履艱難，險阻迭起，前路漫漫。」(羅榮渠，2013：194)

兩國現代化的成敗落差曾激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與討論，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國際背景下，兩國現代化的命運何以如此不同？從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東瀛的康、梁開始痛切地比較分析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成敗原因，百年來海內外華人學者對此課題進行了不少的研究和探討。依據田毅鵬、李少軍兩位教授的研究，總結百年來學術界主要圍繞著中日現代化的起點，當時的社會精英、社會結構與現代化之間關係等議題進行比較研究，李少軍教授則指出學者專家多從兩國近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諸多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參見田毅鵬，2001a；李少軍，2001) 中央研究院郭廷以院士，亦曾對中國近代化的延誤發表專文，從中國滿清的知己知彼功夫不夠，尤其是知彼功夫的欠缺，對變革時代的認識不明，致蹉跎貽誤，措施乖方，造成百年以來民族危機。(郭廷以，1980) 美國哈佛大學賴世和教授與同事費正清教授共同執筆的《東亞—近代化》一書，試著從兩國的社會結構、思想、價值觀去闡明其間近代化的差異。(賴世和著，王崧興譯，1963：17) 美國耶魯大學芮瑪麗教授在《同治中興》一書，從內生的觀點來解釋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進程，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在她看來儒家輕視商業和產業，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是注定無法步入現代化社會。(Mary C.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2002) 日本歷史學家伊田憲家在《中日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一書指出，主要原因來自列強壓力的強弱不一之外，還有兩國統一市場形成與否的差異。當然也可以說針對各列強的壓力能否作出有效的反擊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參見錢國紅，2009：pp.代序2-代序4) 不僅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專家們，一些社會研究者也做了許多的嘗試，去理解中日兩國現代化的不同。有些是集中注意於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其他則強調政治制度、家庭結構或是西方軍事和政治的影響。前揭有關於中國現代化延遲的研究，大多限於中國社會系統中的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事實上，不乏關於宗教、家庭結構、政治組織和法制系統的小型理論，可惜無法使我們對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成敗有一

整體的解釋。誠如蔡文輝教授所言，「很顯然的，大部分有關此主題的研究都過於單純，他們時常過分強調社會系統中某一特定範圍，而忽略了其他部分。因此，設計出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更能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是必要的。」(蔡文輝，1980：440)

許多研究亞太國家現代化的學者專家做了許多的嘗試，來理解中日現代化的成敗，有些從經濟發展、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家庭結構或是西方帝國殖民的影響，雖有小型理論的豐碩成果，但這些答案似乎是見樹不見林。事實上，我們有的是許許多多關於宗教、家庭結構、政治組織和法制系統的單面向看法，但無法使我們對中國現代化過程有一整體概念的理解。因此，研究中日現代化有必要發展一套綜合的架構，來看各主要領域的變遷過程。不過要隻身縱橫百年的現代化歷史，且要關照科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每一範疇，非一位學者獨力所能成。試以抽樣的概念縮小研究範圍，擇一案例進行歷史比較的方式或有可能。本論文試從可做中日現代化一個面向的世博會事業發展，針對兩國幾乎同時接觸世博會，卻在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出現30到40年時間差的案例，進行綜合觀點的研究分析，進而多方比較中日現代化發展差異，以架構起解釋兩國現代化成敗的綜合觀點。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背景必須追溯到百年前的鴉片戰爭，因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起因於一種「內生的力量」，而是源自於一種「外生的壓力」，我們用C. E. Black的術語來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衛底現代化」。(金耀基，1987：153) 中國在過去二千年當中從沒有發生過全面而永久性的變遷，而只有適應循環的變遷。中國這次所遭遇到的對手是「前史所未載，互古所未通」的西方國家，是中國文化前所未有的勁敵，同光年間洞識世局的郭嵩燾指出，西洋人之入中國是天地的一大變。李鴻章、嚴復也說這是三千年來中國的大變局，是秦以來所未有過的世變。金耀基教授指出：「西方對中國的挑戰，在形式上是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實際上則是西方價值對中國價值的挑戰，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挑戰。的確，這不只是一國族興亡的問題，也是一文化絕續的問題。所以面對著這種巨

變與「挑戰」，當時掌有國族命脈與文化機運的知識份子（以官僚集團與士大夫集團為主）不能不有所『回應』。...但不幸的是，中國的變是在西方的砲艦轟擊威脅下逼出來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就是在口服心不服的精神狀態下發動與進行。」（金耀基，1987：154-155）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一連串的「反應」，雖然代表中國知識份子的覺醒，但也暴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無知與短視，更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本節試以前揭中日博覽會事業落差的綜合分析架構，把中日現代化理解成「防衛底現代化」，兩國如何在西方的船堅炮利的威脅下，去面對西方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挑戰，更是西方文化對兩國文化的挑戰。其發展與成敗，除了要看當時掌有國族命脈與文化機運的關鍵成員，如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及民眾，這些關鍵成員他們對西方文化與隨之而來現代化的認知、能力及經驗之外，當然這些關鍵成員與兩國現代化是被鑲嵌在社會脈絡裡，一些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因素不容忽視。前者可把兩國現代化視為一個國家、一些社會菁英，接觸、意會、學習與實作的快慢起落過程，將以關鍵成員什麼時候接觸到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如何認知意會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如何出洋考察來學習西方文化與現代化，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推動現代化的歷程來比較分析其落差成敗因素之外，還要看活動成員與現代化被鑲嵌的社會脈絡裡的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面向，來比較分析影響兩國現代化的發展因素。也就是從兩國在該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制度差異、社會結構變遷、文化包袱束縛等面向，來比較分析兩國現代化的社會脈絡，試著掌握中國滿清政府的現代化發展為何落後日本明治政府的重要因素，來討論中日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一、中日兩國關鍵成員對西風東漸與現代化的意會

現代化關鍵人物什麼時候接觸到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如何認知意會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如何出洋考察來學習西方文化與現代化，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推動現代化的歷程，常常是影響一個國家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因素。至於，影響兩個國家現代化的關鍵人物約略可分成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及民眾，他們對西風

東漸與現代化的意會(參見表4-5)，甚至參展學習的涉入程度，對兩個國家推動現代化的成效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表4-5 中日兩國現代化關鍵成員對西風東漸與現代化的意會比較

	中 國	日 本
皇親貴胄	滿清皇帝有著「天朝上國」的自負，鄙視西方科技文明。	明治天皇的開明專制，擇優攝取西方文明。
政府官員/ 知識分子	中國維新派的骨幹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大多飽讀詩書，有才學熱情，卻缺少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	在明治維新前後就形成一個勤於學習西方的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群體，且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霜歷練，具有鬥爭經驗和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都是富於謀略、精明強幹的政治家。
國 民	滿清時期的中國不存在變革的「上下呼應」的現代化承載力量。中國滿清時期人民的識字率不高，19世紀中國的識字率難以超過20%，進而影響到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幕末與明治時期的日本存在「自下而上」的現代化承載力量，主要來自於德川幕府與明治政府獎勵辦學所培養的高素質國民。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在日本3,000多萬人口當中，男子有45%左右的識字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一，就皇親貴胄而言：在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皇帝與其家族享有無上的權力，以及經科舉制度由皇帝考試任用的官員也享有極大的權力。當然在引進西方科技與制度，他們的認知意會、好惡態度及政策決定至為重要。于桂芬於《西風東漸》書中指出：「從文化攝取主體的角度來分析觀察，我們發現決定西學傳播內容及其發展方向的，既不是認同西學的開明士大夫群體，也不是民間新興的社會經濟力量，而是封建中央集權制度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皇帝的需要，往往決定受眾的需要，而統治者的好惡，往往決定西學傳播的過程和方向。順治皇帝相信西學，湯若望便得寵，西學傳播便順利。順治死後，討厭西學的攝政大臣鰲拜當政，湯若望便被關進大牢，西學傳播便受到阻礙。康熙親政，扳倒鰲拜，西學又受重視。」(于桂芬，2003：36) 雖然康熙皇帝喜歡西方人的科技，而且還下過功

夫學習，不過可惜的是康熙只把西學當成個人的愛好，壟斷把持與外國人的交往，沒有為清朝大規模引進西學。更有甚者，推行禁教政策，使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過程發生嚴重的中斷。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皇帝基於考量天朝尊嚴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以及中國儒家正統思想受到天主教教義嚴重挑戰，拒絕羅馬教廷使節的請求，重申天主教禁教令，後為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皇帝所繼承。在禁教政策之下，大清朝廷中擔任修曆及懷有各種技術的西洋人已不多見。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一書，對康熙與雍正的天主教禁教令有這樣的記述：

康熙自從結束鰲拜的攝政之後，開始任用耶穌會士：康熙令耶穌會士監管「欽天監」垂詢地圓的繪製與工程建築等事務，並允許他們在北京城內與各省傳教。特別是在1692年後的十年間，康熙下旨容許基督教……。不過康熙堅持耶穌會必須同意，中國人祭祖祀孔是世俗典禮，而非宗教儀式。此故，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仍可繼續祭祖祀孔。……然而不同修會的天主教神甫與傳教士，不管是在東亞或羅馬，皆深深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康熙是以無上的權威介入宗教教義，耶穌會士的態度會破壞基督信仰的統整。羅馬教皇……禁止天主教士遵從康熙的諭旨，否則將會遭受逐出教會的懲罰，康熙於是下令驅逐所有不願「具結」脫離羅馬教會、領取准許在華傳教證明之「印票」的神甫。……由於雙方均採取強硬的立場，結果中斷了教會在中國的影響勢力，阻礙了西方科技向中國的傳輸。(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2001：74-75)

在處理天主教傳教士問題上，雍正比起康熙晚年更為嚴峻。這不僅因為「禮儀之爭」……在最後一次的禁令中，雍正對天主教的禁革提昇至道德的層次：「遠夷慕化而來」，他在1726年批示道，「惟宜示以恩德，萬不可與之爭利。」……教會的影響力迅速沒落，傳教士在朝廷所擔負的角色僅止於天文曆法與繪畫方面。(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2001：90-91)

相對的，日本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於享保五年(1720年)下令禁書中除與基督教有關的部分外，允許其他洋書輸入，這便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洋書解禁令」。從此荷蘭文書籍與漢譯洋書，源源不斷地進入日本，德川吉宗本人更是醉心西方文化。德川吉宗之所以如此，有其個人的好奇心和進取心的個性使然之外，是基於當時社會歷史發展正面臨危機的考量，德川吉宗試圖透過對西方書籍禁令的鬆綁，鼓勵西學研究，提倡儉約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善幕府的財政狀況，挽救日本社會的頹勢。在與荷蘭人的接觸過程中，吉宗認識到西學的實用性，他想藉由荷蘭人引進西方天文曆法、醫學、武器等門類的學問，來達到殖產興業的

目的。1720年康熙皇帝和德川吉宗將軍分別發布了兩個詔令，對兩國攝取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參見于桂芬，2003：50，76-78)

18世紀的乾隆皇帝，曾在1792年對大英帝國由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節團在圓明園佈置「科技宮」展示西方工藝之際，他的態度高高在上以天朝自居，心想其恩威遠播，萬國來朝，大清朝種種貴重之物比比皆是，無所不有。而且天朝從不貴奇巧，更不需要英國製辦的產品。如此看來，西方工藝只不過是不屑的「奇技淫巧」而已。英國又於24年後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派阿美士德來華，這次嘉慶皇帝非要英國使臣三跪九叩首不可，結果阿美士德稱病拒絕行禮，即被遣送出京，令其回國。嘉慶也給了英王「敕諭」，徹底拒絕和英國建立關係。

「……爾使臣不敬恭將事，代達悃忱，乃爾使臣之咎。……爾國距中華遙遠，遣使遠涉，良非易事，且來使於中國禮儀不能諳習，重勞唇舌，非所樂聞。…俟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轉引自鍾叔和，1989：92)

另於1820年繼大位為道光皇帝，在位的1839年發生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事實上道光皇帝最初主戰，敢下這樣的決心，與他對當時無知世界大勢有關。道光皇帝居然不知道歐美各大國的位置，對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一無所知，導致他盲目樂觀，認為對英戰爭可以穩操勝券。顯然道光帝不知道，作為全球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國，其軍事實力是當時世界最為強大的國家。由於道光帝對敵我力量判斷的失誤，導致其決策上的反復。1840年7月定海的陷落，道光皇帝聽從大臣勸告同意和談。然而他所謂的和談，仍是天朝上國對外夷懷柔的安撫政策。(馬敏、彭南生主編，2009：20-21) 這樣的世界觀，與其祖父乾隆皇帝如出一轍，即使兵臨城下，仍高高在上以天朝自居，很難將西方科技工藝的「奇技淫巧」放在眼裡。此外，有關清朝(之前的明朝亦然)對海外貿易的態度，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點出：中國的統治者對海外貿易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認為貿易活動會帶來社會的紊亂失序，擔心貿易活動會將軍情洩漏給外國強權，還會造成貴重的白銀大量外流，滋生海寇和其他犯罪。因此，即使鄭氏家族敗亡之後，清廷雖放棄強制遷移沿海居民的政策，不過仍透過廈門等沿海城市實施特許與限制船隻

噸位的措施，以控制臣民與海外的往來。(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2001：59)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列強又挾威誘導清政府必須各派使臣，往來聘問，使兩國消息常通，相互幫助。對此滿清政府仍認為這是洋人妄自尊大與冀我俯就的巧黯之術，而予以嚴峻拒絕。但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滿清政府內部初步具備世界知識的洋務派，開始意識到遣使出洋的重要性。如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就曾上奏：「查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以籌計。」同時一些地方洋務派官員也有類似看法，如李鴻章主張遣使有二利，一為「凡遇爭辯疑難之事，公使領事有不可情理喻者，使臣向政府詰責曉譬，排難解紛」，二為「使臣學習外國之所長，以為自強根基」。(參見田毅鵬，1993：14)在洋務派極力倡議下，清政府從1866年開始遣使西洋學習外國之所長，以為自強根基的考察學習活動。同治皇帝在1866年12月批閱由恭親王奕訢上奏斌椿西行考察北歐所撰行記，僅寫下「知道了」三字，並沒有對一行相關奏陳表達任何具體看法。(辛德勇，2013：95)

在慶應四年/明治元年(1868年)1月15日，日本以國書形式向各國傳達，從此由日本國明治天皇(1868-1912)與外國進行交涉，即位就頒布了《五條誓文》，一為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為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以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為要；四為破舊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為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下令將江戶改為東京並立為首都，之後又在天皇集權的政府實行了「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的相關政策。這樣一來，原本分散於幕藩的權力就全部集中到天皇手中，也為後來改革的順利進行帶來保障。(參見佐佐木克著，孫曉寧譯，2016：259-271)

至於小明治天皇7歲的光緒皇帝(1875-1908)曾經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該書以「富國強民」為核心思想，主張社會改革把中國從落後變為先進，從封建主

義變為資本主義，從貧窮變為富強，積極探討富國救國之途。光緒帝大為賞識，詔命總理衙門特印2,000部，分發京都大臣閱讀。另陳熾寫成《庸書》百篇，提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興學育才、倡議設議院等頗具時代性的主張。此書在維新運動期間與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併被呈送給光緒帝御覽，對光緒皇帝與維新運動有過重大的影響。(劉健, 2010: 72, 74) 在夏偉(Orville Schell)與魯樂漢(John Delury)合著的《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曾提及光緒皇帝從兒時起便受帝師翁同龢授以西學，跟當時思想界的年輕菁英一樣，懷抱求新求變的壯志，1898年設立現代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光緒進行改革的關鍵來自馮桂芬，他下令刊行馮著書《校邠廬抗議》，要求一千名首席官員閱讀並提出建言。光緒皇帝還照著張之洞《勸學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保住儒家價值與經典等「中體」，同時提倡研究學習西方的「技術」。(Orville Schell & John Delury 著，潘勛譯，2014: 84-85) 其實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的慘敗，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光緒皇帝領導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層面的改革，希望中國走向君主立憲的道路。據費行簡《慈禧太后傳信錄》記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對光緒皇帝說過：「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光緒皇帝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恨不得把千年任務在短時間之內完成。正所謂操之過急，更重要是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在保守派的反撲下功敗垂成。於是在日本伊藤博文私下晉見光緒皇帝三天後，被迫下昭慈禧太后重新垂簾攝政，結束了短暫的102天維新運動，也就是歷史上的「戊戌變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Orville Schell & John Delury 著，潘勛譯，2014: 85-86)

邁入20世紀，八國聯軍之後的1904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首次決定投入大筆參展經費以官方名義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更派出溥倫貝子率團赴美主持中國館揭幕，並帶著慈禧的私函與親

筆簽名玉照轉赴華府會見老羅斯福總統。溥倫貝子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時，表達了中國不甘落後於日本的決心，以及要向西方學習，振興國脈的信心。從居蜜博士編寫的《1904美國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所發掘的史料當中，20世紀初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慈禧，也不是一個顛預腐敗的清廷，而是一個懂得如何與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建立私人情誼的大清統治者，與一批充分理解文化外交重要性的洋務大臣。(居蜜主編，2010) 在進入20世紀滿清政府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后對西方文化與科技有新的意會，才有後來的立憲運動。不過，在李少軍教授對慈禧太后與明治天皇相較之下，明治天皇學習新知識，追隨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明治維新運動，終於使日本實現了現代化，而慈禧太后卻相形見絀，根本不具備現代意識，一心只知維護和鞏固個人權勢，對國計民生並無遠大抱負，不可能推動中國現代化順利實現。(李少軍，2001：295) 史成虎與張曉紅兩位大陸學者亦指出：慈禧太后等人在改革之初，就沒打算讓這場改革能真正開展起來，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部分，就像載澤在上奏慈禧的密詔中所說的：「立憲之利如此及時行之，何嫌何疑。……不知今日宣佈立憲，不過明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滿清政府於1906年9月宣佈預備仿行憲政的諭旨，其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時間上又不能立即實行憲政，因為「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改革官制、大興教育、清厘財政、整頓法律才是當務之急，「俟數年後規模初具，察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在慈禧太后看來，清末新政和洋務運動沒有本質的不同，兩者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皇權專制統治。以路徑依賴的觀點，清末新政只能在政治改革上實施拖延戰術，以繼續維持專制主義制度下收益遞增的趨勢。(史成虎、張曉紅，2012：5)

第二，就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而言：影響兩個國家現代化的關鍵人物中，有關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他們對西風東漸與現代化的意會，甚至學習與實際涉入程度，對兩個國家推動現代化的成效產生一相當程度的影響。筆者試從思想立場探討19世紀中日兩國的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面對西風東漸，以及國家承受外在強

大壓力，從封建體制走向近代國家體制的政治過程中，他們的意會、觀念及態度上的差異。這裡指稱的「知識份子」，一般說來是科舉時代的讀書人，以及現代受過一定教育程度，同時關心國家社會榮枯興衰的讀書人。由於「學而優則仕」的儒家觀念，中日兩國的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有高度的重疊性，筆者將他們放在一起來作比較分析。關於中日知識份子對西風東漸回應問題的研究，中國史學界尚缺乏系統性的研究，而日本史學界具體研究成果亦甚少。不過這並不意味事涉此問題的研究全然空白，如中國學者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徐海松的《清初士人與西學》、于桂芬的《西風東漸—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趙德宇的《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張朋園的《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以及日本學者河野健二的《日本的近代和知識份子》、依田熹家的《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序說》等著作，或多或少地觸及知識份子左右國家現代化的問題。張朋園教授指出：「知識份子是新觀念的宣導者，因此他們在現代化遲緩的國家特別受到尊敬和重視。討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討論知識份子的觀念。換而言之，知識份子與現代化是相提並論的。」（張朋園，2002：4）

總體而言，中日兩國面對西風東漸的差異，可見之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1月《時事新報》的社論有這樣的一段記述：1862年福澤(諭吉)先生滯留於英京倫敦時，與中國之遊學某氏相邂逅，……某氏曰：「謀東洋之革新，別無他，必先輸入西洋文明之教育。今於日本，讀洋書解其意，又可教之於他者，有幾何？」聞之，(福澤)先生答曰：「精密之數，難以枚舉。然依余之估算，日本國中，五百人歟。」(福澤)先生又反問道：「於中國何如？」彼屈指歎息，曰：「實羞煞人也，不逾十一人。」(福澤)先生聞其言，無言以對。彼時日本開國尚不滿十年，然洋學之端，早自明治八年即開。國中有識之士，在於斯學者甚眾。與此相對，觀彼中國之狀，開國以來殆百有餘年，其間既與外人二度接戰並敗和，故已實見西洋文明之事物，然……開國百年之際，卻言讀真實洋書，且通其意者，於全國幾億人口中，尚不逾十一人！……如斯之狀，到底無進步之望矣。(福澤)先生曰：「自聞某氏談話之時，即絕望矣。」(靳叢林、陳泓、張福貴譯，1990：263) 據陳景彥教授的研究，

1862年遊學之某氏是一位名叫唐學塤的中國人，在倫敦向福澤諭吉問到在日本能讀洋書並兼教他人者有多少，福翁答約500人，當福翁反問時，唐氏沉吟片刻後愧答曰只有11人。兩人所言數字未必精確，但以中國知識份子之眾，同日本相比，學習西方的知識份子與之不成比例當是事實。陳教授舉例言之，1834年出生的仙台藩士岡千仞，精通漢學與西學，其前後共有弟子3,000人，著述達30餘卷；再從魏源的《海國圖志》1854年傳到日本三年時間，翻刻本、訓點本及日譯本竟達21種之多。從以上情況看，日本至少在明治維新前後就形成了一個勤於學習西方的知識份子群體。(陳景彥，2006：160)

臺灣大學李永熾教授的研究，這些勤於學習西方的日本知識份子可分為志士型、幕臣論客型、幕臣報人型、教師型，影響當時及後代最大的應推志士型與幕臣論客型。志士型知識份子大多出身於幕末下級武士階級，曾參加幕末尊王攘夷、反幕、討幕運動，明治政府成立後，皆官居要津，如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志士型知識份子對歐美國家有激烈對抗意識，起先大多抱持攘夷觀，經過幕末對外戰爭之後，體認到盲目攘夷的不可能，於是積極吸收西方的技術與文化。在對外的態度上，他們都有不同程度自覺的劣等感，如何克服這種劣等感就成為這群明治官僚的主要課題之一。所謂文明開化(吸收西方技術、文化)、富國強兵，就是這種激烈對抗意識的表現。這類知識份子對外達成日本獨立自主的高度使命感，而這種使命感又源自於他們的「菁英」(elite)意識，他們認為日本的自由與獨立是社會中堅與國家菁英的使命。志士型知識份子政府的官僚，明治維新的締造者，日本近代化的推進者。幕臣論客型以明治六年成立的「明六社」最具代表性，他們的出身也是幕末的下級武士階層，大多曾任職於幕府機構或受教育於幕府開成所，或任教於幕府蕃書調所。本身具備儒教學養，也和西方文化有過廣泛的接觸，在知性與公職的領域佔有領導性的地位。「明六社」社員於明治七年創辦「明六雜誌」，是明治初期思想性最濃厚的一份雜誌，到明治8年停刊前，每期銷售平均在3,000份以上，在當時可說是銷路最廣的雜誌。「明六社」中如森有禮、福澤諭吉、西周、津田真道、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杉

亨二、箕作麟祥等，皆為日本國一時之選，也是當時日本最活躍的知識份子，在各種專門學科各有所長，對西方文化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他們的言論在當時頗具影響力。他們思想的特徵在基本上同意絕對主義天皇制的開化(開明專制)政策，而將重點放在日本的獨立，追求一種強調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獨立。站在輔佐政府的立場，以「喚起愚蒙之沉睡，樹立天下之模範」為己任，認為啟蒙民眾是他們的責任，而開化民眾更是日本獨立的根本條件。要開化民眾須破除封建「愚蒙」，歐化或移植歐美思想則是破除愚蒙的最佳武器。(參見李永熾，1997：16-19)

相形之下，滿清末年的中國就少了勤於學習西方的知識份子群體。1898年戊戌變法是西洋思潮影響下的改革運動，推動人物為清一色的士紳階層(有功名與仕宦的讀書人及捐官的群體)。據估計，領導人物有傳可考者48人，其中進士28人，舉人8人，貢生3人，生員2人，無功名而有捐納官位者4人。這群體的西方知識得自一些翻譯作品，或因與西方人士接觸，或遊歷西人的殖民地和通商口岸，得到一些一鱗半爪的印象。可說是所知有限，甚至一知半解。真正到過西方的人士當中有5人曾遊歷歐美，1人到過日本，又因語言文字的隔閡，未必能有深入的觀察。能提出變法觀念的不過二、三人，如馬建忠、嚴復之輩，卻不在變法運動的中心位置。有些已進入統治階級，但缺乏積極進取的觀念，再加上保守勢力的強大，雖有所知，亦保留而不敢流露。如黃遵憲嘗謂太平世在民主，但不敢明言。(張朋園，2002：5-6)

王曉秋教授將中日兩國維新力量與守舊力量做了比較分析，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維新勢力壓倒了守舊勢力。維新勢力以下級武士為核心，打出天皇的旗幟，與反幕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工廠主人、農村富農在內的町人階層，在財力與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廣大農民、市民也積極參加或支持反幕武裝運動。因此形成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翻幕府老舊腐朽的政權。相反的，在中國戊戌維新時，守舊勢力要遠遠大於維新勢力。守舊勢力以掌握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后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軍政實權的皇親貴胄、地方大員，以及因改革措施觸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對維新的大小衙吏、綠營軍官、旗人、

八股士人等等，形成龐大的守舊陣營。他們手握政權、兵權、金權，富有政治經驗，全力反撲扼殺維新。而中國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知識份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傀儡皇帝光緒，聯合少數帝黨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員。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金權，他們自許為社會中堅與國家菁英的氣息，輕視並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連資產階級、商人也很少關心支持他們。維新思想家嚴復就曾指出「當時維新派與守舊黨相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除數量的懸殊之外，維新派領導人的能力、氣質及採取的方法、策略，與維新成敗也有很大關係。中日兩國維新運動的領導人，他們大多出身封建家庭的知識份子，年齡正當中青年、血氣方剛、憂國憂民，且多數曾接觸過西方思想文化，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等相似之處。然而，不同的是日本維新派的中堅份子是中下級武士，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浪鍛煉，具有鬥爭經驗和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於謀略、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中國維新派的骨幹卻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大多飽讀詩書，有才學熱情，卻往往缺少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啟超就承認他的老師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他們在維新措施和鬥爭策略上也有些急於求成，不顧實效。(參見王曉秋，1998：43-44)張朋園教授亦曾評論，康有為領導下的變法維新，既要變軍事，又要改政制，再要講外交，更要求內治。在康氏的變法計畫中，軍事、政治、財政、社會無所不包，且急於短期內實行，終究一事無成。政變之後，維新成了泡影。康氏求變操之過急是維新失敗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失敗是觀念不清，其求變計畫龐雜而無選擇，在傳統積重難返的情況下，難逃失敗的命運。(張朋園，2002：9)再就知識份子群體中的個別人物而言，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尤其是在近代中日發生巨變的過程中，人的潛能發揮對於歷史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李少軍教授認為：比較近代中日相同或相近類型的人物，不失為認識當時兩國狀況的一個有效途徑。加之在19世紀後半期，兩國面臨諸多相同的課題，比較各自的代表人物對這些課題的因應，從中發現異同，頗能啟發思考。(李少軍，2001：293)

林則徐與渡邊華山：清朝的林則徐(1785-1850)自1838年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上任之後，由於處理對外問題的需要，才開始接觸並研究西洋問題，而且主要集中在其欽差大臣任內。渡邊華山(1793-1841)是日本江戶幕府末期三河國田原藩的藩士，於1832年天保饑饉和英國東漸勢力加速的內外交迫形勢下，被任命為田原藩家老¹⁶兼海防負責人。當時在三河地區只有田原藩面臨太平洋，因之該藩為三河地區海防的唯一據點。對此渡邊華山深感責任重大，為解決內外危機，開始認真研究西洋問題。與日本正統洋學家比較起來，林則徐和渡邊華山的西洋研究起步較晚，時間也不長，而且二人皆不諳外語。雖然如此，他們卻分別成為那個時代中日兩國認識西風洋務問題的先導人物。

近代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滿清官員當屬林則徐，在中外交涉過程中意識到翻譯以蒐集敵方洋人情報的重要性。林則徐為瞭解外國情況，在自己的行轅裡設立「譯書館」，網羅亞孟、袁德輝、亞林、梁進德等善譯人才，專門翻譯蒐集廣州、澳門外國人出版的各種書報，如「澳門新聞紙」與廣州英商主辦的《廣州周報》，包括商業情報、傳教小冊子和介紹西方史地的書籍。林則徐認真閱讀西方書報，反復研究，從中「藉以探訪夷情」，尋求新知。(陳君聰，1999：48-49) 在林則徐主導的眾多譯著中影響最大的，要算是1839年將英人慕瑞《地理大全》譯成《四洲志》出版，後來成為魏源《海國圖志》的前身。還有《各國律例》、《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等，《各國律例》係摘譯本，後收於魏源的《海國圖志》，內容包括關於一個主權國家對外僑的司法管轄權問題，以及作為對外敵對措施的封鎖、禁運等手段。成就後來林則徐遵循國際法原則處理對外交涉，他的國家主權觀念已開始有點近代色彩。他還提出：「查英吉利在外國最強悍，諸夷中惟美利堅及佛蘭西尚足與抗衡，……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林則徐在處理外交事物中錯落有致，得力於他的西洋知識。林則徐得力於西洋知識的另一重要收穫是他在海防上的作為。他針對英國「以船堅炮利稱其強」的現實，於海防上傾注

¹⁶ 家老是日本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或各藩閣僚中的職位。家老一般有數人，採取合議制管理幕府和領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在幕府或藩中地位很高，僅次於幕府將軍和藩主。

了極大的心力，曾上奏折給道光皇帝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炮利於遠攻，並購得西洋大號舊夷船備兵勇演習仰攻。

相較之下，1832年渡邊華山被舉為家老和海防負責人後開始蘭學研究，在關心西洋的動機上與林則徐相同。渡邊華山明確指出：「搜索西洋諸番之事情，實今時之急務」，「不審敵情則無以立兵備之策謀」。然而有別於林則徐的西學知識，這只是渡邊華山洋學成果的一部分，真正價值在其援引歐洲的經驗用以解決日本問題的思想，以及基於科學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體的世界認識。渡邊華山認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在於「物理之精確」，而且「不惟於萬物以圖窮理，且於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並提出西洋富強的根源在「學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養才造士為先」。(趙德宇，1995：40-41) 李少軍教授對兩人做了最好的結語：他們的差異在於林的視野還沒有渡邊那樣寬闊而有系統，渡邊站在新舊社會的高度來看待西方、東亞及日本社會，而林則徐還無法從東西不同社會原理的高度來理解當時危機的深刻程度。兩者產生差異的原因在於當時各自的西學積累相去甚遠。(李少軍，2001：293)

魏源與佐久間象山：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陽人，於道光二年考中順天府鄉試舉人。道光五年在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中，替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留心「實學」。道光九年魏源在北京考進士不中，捐了一個內閣中書舍人，在這裡接觸到朝廷的許多重要文獻資料，使他熟悉清代的歷史掌故，為以後編撰《聖武記》打下基礎。這時的魏源也結識了林則徐、龔自珍、黃爵滋等人，一起飲酒賦詩，議論時政。道光二十三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使魏源從關心內政的改革轉而注意外患的入侵，寫成《聖武記》十四卷，以清初的武功來激勵國人，增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鴉片戰爭後，魏源認為禁煙已完全失敗，白銀外流也無法堵住，國家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當魏源把視線轉向世界，研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長技和社會歷史狀況時，驚訝看到中國已在許多方面不如他國，必須學習西方，引入新的因素，大刀闊斧實行變革，才能振興自強、抵禦外侮。大膽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找到向西方學習，「轉外國之長

技為中國之長技」，用以「富國強兵」的新出路。然而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有一種鄙視技術的傳統，往往把一些新奇的技術和產品說成是「無用」或「敗壞人心風俗」的「奇技淫巧」。當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後，立即遭到這種傳統思想的反對。魏源駁斥奇技淫巧論者，不應把「奇技」和「淫巧」混為一談。西方的機器和技術能夠「奪造化，通神明」，確實是「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的奇技，而決不是什麼無用和敗壞人心風俗的淫巧。學習和採用西方的機器、技術，不但不會「敗壞人心風俗」，恰恰相反它會有開風氣和啟迪智慧的作用。他滿懷信心地表示中國「師夷長技」的結果將會使「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基於「欲制夷患，必籌夷情」，魏源編撰《海國圖志》，內容包括世界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民族、宗教、曆法、文物等，協助國人瞭解西方與學習西方。(陳君聰，1999：55-70)

日本幕末時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1811-1864)，在獲知中英鴉片戰爭清朝大敗之前，仍一心潛修儒學，1839年還在江戶開設私塾傳授儒學。當鴉片戰爭大清慘敗的消息傳到日本後，他感受到空前強烈的國家危機，思想上發生轉變。為了認識這個與東洋完全不同的西洋以知己知彼，34歲的佐久間象山開始學習荷蘭語，通過閱讀有關西洋軍事與學問的書籍來瞭解西方。他認為在幕末這個特殊時期，儒學者應從傳統「夷狄觀」的偏見中走出來，將視野擴大至更廣闊的世界，並指出鎖國攘夷的不切實際，只有引進西洋的科學技術，才能增強國力，打開國門是必然的選擇。他不再將西洋稱為「外夷」，而稱之為「外蕃」，逐漸從傳統的「華夷秩序觀」走出，開始平等對待東西洋。在佐久間象山的《省愆錄》中，提到「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前者指儒家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與政治制度，後者則指西洋的科學技術與機械文明。象山認為東洋道德與西洋文明可以相互調和，並不存在絕對的對立，儒學者應充分發揮這兩者的功效，以達到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是一種東西洋調和論，既有別於鎖國論者，又不同於蘭學者的全盤西化。(伊原澤周，1999：60-61；宋媛媛、姚繼中，2014：42-43)

魏源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並沒有改變其傳統思想的「中體」的部分，雖說必須接受西方長技，但堅信「器變道不變」的思想，最終仍無法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精神和工業文明。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則將其朱子學(朱舜水)合理主義，加上西方經驗主義和重視試驗的精神而成，認識到研究自然科學的態度是指導所有學問的基礎。李少軍教授指出：魏源與佐久間象山面對西方的思想差異，出自於自己所處文化環境的不同，當時的日本已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學思想體系與儒學的合理性、日本固有的邏輯思維並存，而中國還是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與考證學相互對立。(李少軍，2001：293-294)

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是中日兩國近代化運動初期的領導人物，比較分析其近代化思想的異同，有助於討論中日近代化落差的原因。大久保利通出身於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薩摩藩下級武士家庭，在薩摩藩校造士館就讀時，結識同為下級武士家庭出身的西鄉隆盛，學成後與西鄉兩人皆以薩摩藩士的身分為藩主效命，後來兩人逐漸掌握實權，在推翻德川幕府與推動明治維新有巨大貢獻。明治四年(1871)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參加岩倉使節團出使歐美，見識到歐美各國的文明開化與強大國力，深感日本封閉落後，咸認為日本應該暫時停止對外爭戰的政策，全力發展內政。使節團回國後，大久保在明治六年(1873)兼任內務卿，積極規劃推動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國策，也籌劃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落實其殖產興業政策。中國清朝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晚清朝廷重臣，文華閣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歷經太平天國、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與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並稱為「晚清四大名臣」。他對興辦洋務鼓吹之力，建樹之多罕有能匹敵，贏得很高的聲望。

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都認為推動國家現代化初期，只有開明專制政體才能維持政局的穩定，方能集中全國力量投入現代化運動。由於兩國國情不同，大久保是在開明的基礎上追求專制政體，而李鴻章則是在既有的專制政體裡追求開明，結果大久保取得成功，李鴻章卻是失敗。當時日本明治政府初期的施政方針，可見

諸於明治天皇即位就頒布《五條誓文》：一為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為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為官武一途，以至庶民，以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為要；四為破舊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為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佐佐木克著，孫曉寧譯，2016：261-262) 在「破舊有之陋習，求知於世界」部分，1872年明治政府頒佈了《學制》，各地普設西式中小學以開化世風，使得整個國家都認識到現代化的迫切性。但就現代化的第一步，大多數官員認為應該先從「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的民主政治做起，大久保利排眾議認為「確立一個有權威的政府乃當務之急」。為了明確未來的改革方案與步驟，明治政府1871年底，毅然派出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人組成的岩倉使節團，前往西方實地考察，認為「用俾斯麥的強權，締造英國式的富強」是日本今後奮鬥的目標。1873年11月，大久保向政府提交《立憲政體建議書》，為了保證國家現代化的進程遂行，初期只能暫行專制政體。因為無論何種政體，在處理百端事務時，都必須有獨立不羈，斷然行事之權，否則眾說紛紜，必使政府陷於多頭馬車迷失前進方向。也就是說要想完成現代化的使命，必須建立強權政治，這可是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姚傳德，1995：199-200)

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後，遭到西方強權沉重的打擊，又在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借用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滿清朝廷出現一批主張借用西法以自強的洋務派，如中央的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及地方大員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但當時掌握大權的卻是不知天下大勢的慈禧太后，以及一幫反對現代化的頑固派手中，在中央有大學士倭仁、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朝廷各部門有眾多官員附和頑固派，地方上則有大批保守的地方官、士紳和八股書生。而且在洋務派中，真正認識西方想借用其法而自強者，只有李鴻章、丁日昌、郭嵩燾等數人。至於一般民間知識份子，仍然熱衷科舉而不問時事，絕大部分人都站到反對現代化的頑固派這一邊。當時中國要推行洋務運動以現代化，對於要走的第一步，同日本一樣也頗有爭議。1877年郭嵩燾從英國致書李鴻章，表示「泰西富強，具有本末，主議院，新風俗是治國之本」，「而所置一切機器，將

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但李鴻章認為：「西化為必須，但不能行之過急」，「華人之效西法，如寒極而春至，須遷延忍耐，不斷加溫」。民主政治屬於現代化步驟中的「大者，遠者」非當務之急。而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是要使整個社會確立現代化的決心，即「使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明洋務，庶練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漸增強」，否則「猶畫餅也」。(姚傳德，1995：200)

大久保與李鴻章都認同工業化是為現代化的核心工作，在觀念上和做法上卻有差異。大久保的殖產興業運動完全以民辦為中心，而李鴻章雖然歡迎民辦實業的發展，但未認識到它的關鍵作用。1873年11月明治政府設立內務省，由大久保利通擔任內務卿，隔年(1874)大久保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日本經濟現代化的總方案《殖產興業建議書》，開頭即言：「大凡國家之強弱，繫於人民之貧富，而人民之貧富，系於物產之多寡，物產之多寡，繫於人民是否勉力於工業，更有賴政府官員的獎勵誘導」。(國雄行，2005：52) 在這場殖產興業運動中，政府應「補民智所不及，助民力之不足，予之以貸款，予之以扶植」。只要政策得當，同西方列強並駕齊驅並非難事，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大久保全面推動「殖產興業」政策。相對於大久保對工業化的認識，在1860年代的李鴻章以為工業化只是「中國的富商大賈必有仿求洋機器以求利益者」。到1870年代，他才明確認識到工業化是國家富強的關鍵，要想強大國家，則莫如振商務。李鴻章支持民辦工商業的發展，更主張「須官為扶持」等等。(參見姚傳德，1995：202-203)

綜上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在認知西方列強與推動國家現代化的差異，大久保接觸西方文明的時間、深度，以及從事現代化試驗的時間、規模，均超過李鴻章。更重要的是大久保出身中下級武士，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浪鍛煉，富於謀略、精明強幹，具有鬥爭經驗和政治才幹的政治家。他們都把「開明專制」作為現代化的第一步，可惜的是李鴻章面臨頑固派的極力阻撓；兩人都認為近現代化活動的核心工作是工業化，但大久保以民辦為中心，而李鴻章雖歡迎民辦工業的發展，但未認識到它的關鍵作用，仍以官督民辦為主，縮小了民辦企業的成長空間。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學者在討論中日現代化重要人物時，也會把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做一比較，如劉學照教授的〈論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專文。雖然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都被推崇為中日兩國社會由傳統邁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關鍵性人物，但可見李鴻章自幼受到嚴格的儒學薰陶，又是順著傳統科舉晉身廟堂的封建官僚。雖說李鴻章屬廟堂之上的封建官僚，在眾多大臣中仍屬具備世界知識的洋務派，有關鴉片戰爭結束後，列強要求清政府必須各派使臣乙事，李鴻章就主張遣使有二利，一為「凡遇爭辯疑難之事，公使領事有不可情理喻者，使臣向政府詰責曉譬，排難解紛」，二為「使臣學習外國之所長，以為自強根基」。(田毅鵬，1993：14)而伊藤博文出身長州藩下級武士，1862年參與攘夷活動，曾經潛入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國公使館縱火。1863年受長州藩派遣伊藤同井上馨等5人，偷渡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學習，親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認識到僅僅憑著滿腔熱血盲目攘夷決非上策，只有開國向西方學習，發展近代資本主義，才能成就國家現代化大業。李鴻章對西學的瞭解始終非常淺薄，與伊藤親赴英國學習求知識於世界的態度，絕非李鴻章1896年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環遊世界走馬觀花所能比擬。

據劉學照教授的比較研究，李鴻章採取片面以軍事為中心的產業政策，忽視民用企業的意義，且始終奉行官辦官督的方針，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契機。細言之，中日兩國政府鑒於內外形勢，都實行一種強兵政策，兩國的近代工業差不多都是從舉辦官辦近代軍事工業開始的。李鴻章和清政府所採取的是以軍事為中心的產業政策。1860年代在自強的口號下創辦了一批主要是「官督商辦」形式的民用企業，仍是從軍事著眼。李鴻章在「唯兵之為務」的思想指導下推動製造業的發展，而疏於基本工業之建設。李鴻章和清政府出於對財政和餉源至上等諸多考慮，強化官督商辦，嚴重影響洋務企業走向商辦企業，從而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相較之下，明治政府的伊藤博文則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政策。儘管日本明治政府強調富國強兵，但是明治政府和伊藤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面的唯軍事的產業政策。雖然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非常重視軍事工業的創辦，但

同時也很注意各種基本工業部門和金融、外貿等各項近代經濟事業的建設，始終把「殖產興業」以發展近代經濟實力，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進而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的思想。(劉學照，1998：61-62)

李少軍教授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評論，李恪守「中體西用」原則，伊藤則是明治政府中倡導「歐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於見識，更缺乏膽識謀略，而伊藤卻是明治維新後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李與伊藤的上述差異，除了他們自身的階級屬性不同這個原因之外，也是由於他們各自代表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在現代化層次上有根本差異，李的客觀政治處境也比不上伊藤。(李少軍，2001：295-296) 推其因，蓋在李鴻章背負中華傳統文化的優越感，以及必須面對頑固派阻撓的大清王朝洋務大臣，不如沒有儒家文化束縛而能積極倡導「歐化政策」維新的伊藤博文，可以用心學習西方用力開展現代化事業。

第三，就一般民眾而言：田毅鵬教授在〈中日早期現代化的比較〉一文指出，與日本相較之下，中國早期現代化缺乏一種「自下而上」的現代化「承載者」和呼應力量。在非西方國家的後發現代化過程中，由於社會內部缺乏內生的工業文明主體，因而其現代化只能「自上而下」來進行，由是政治決策者與社會精英人物的認知意會、參考學習及應對行動，都會影響現代化的進程的推進或延遲。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在論述中日現代化成敗時，會把目光投向兩國的政治與思想精英，試圖通過慈禧太后與明治天皇、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等人物的比較，來解釋兩國現代化的成敗，也就是本論文前面從更廣泛的關鍵人物，如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份子來討論這些人物影響現代化的推進或延遲。但事實上，中日現代化不僅在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份子等政治統治者和社會精英主導現代化存在著差異，而且在現代化的承載者和呼應力量方面也存在著差異。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推進力量之外，還存在著「自下而上」的現代化承載力量，而在中國則不存在這種「上下呼應」的力量。在日本這種「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主要來自於德川幕府與明治政府獎勵辦學所培養的高素質國民，成為國家現代化

基層的「承載者」，以及一批由舊武士、農民、市民等階層轉化而來的實業家，成為將外來的工業文明在地化的強有力的「承載者」。例如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大力提倡學問，獎勵辦學，在日本3,000多萬人口當中，男子有45%左右的識字率，這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自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制令》，建立起近代教育制度，國民教育更為普及，創造了當時亞洲最高的就學率，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國民。反觀中國則不存在這種「上下呼應」的格局，19世紀下半葉的中華帝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傳統士大夫仍醉心科舉八股，鄙視西學，教育空疏。雖然洋務派也興辦了一些新式學堂，但在頑固派激烈的反對下，應者寥寥無幾。直到20世紀初才確立了近代意義上的新學制，這比日本晚了30多年。(參見田毅鵬，2001b)

日本經濟新聞亞洲總局編輯委員村山宏在〈中國和日本國力何時出現逆轉〉一文，就曾點出：「最大的原因是平民教育水平的差異，日本推動明治維新的是下層武士、商人和富裕起來的農民。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連普通平民都能夠理解外國的新技術和新思想。領導者不管怎樣下達指令推進維新運動，如果底層的人不理解支持，新技術和新思想就無法推廣。清朝末期中國也出現了幾次維新運動，但僅限於宮廷內部，並未成為廣泛的大眾運動。在中國通常只有地主階級的兒子為了科舉考試而上學，平民的孩子能夠上學的少之又少。因此中國老百姓在20世紀之前對歐洲文化的理解一直都很緩慢。」(村山宏，2015)李永熾教授依據美國學者Herbert Passin的研究指出：「自1750年到幕府被推翻為止，諸藩設立的藩校共223所、鄉校568所，為平民設立的寺小屋(私塾)有11,199所，私塾1,500所，再加上幕府設立的學校，總數約有17,000餘所。到了明治初期，男子能讀能寫的已達40%以上，具有相當程度接受文化的能力。幕末平民教育的興起，使大多數都市商人都接受私塾或寺小屋程度的教育，甚至有到高等私塾作進一步深造的，他們的教育內容，除了一般商業的實用知識外，還修習儒家倫理。在農民方面，上層農民階級也都到鄉學或寺小屋接受啟蒙。幕末教育的逐漸普及，增廣了知識層，孕育了明治初期啟蒙運動的可能性。」(李永熾，1997：14)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與人民的知識水準有密切關係，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指出：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準、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複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1997：58) 美國學者殷克累斯(Alex Inkeles)與史密斯(David H. Smith)合著的《邁向現代化》一書，給現代化下了一般定義，還訂出10項指標來明確現代化的狀態和發展水準，分別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3,000美元以上；第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下降至12~15%；第三級產業(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上升至45%；非農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比重超過45%；成人識字率超過80%；大學生占20~24歲年齡人口比重10~15%；城市化50%；每千人擁有的醫生數為2人以上；平均預期壽命70歲；人口自然增長率1%以下。(Alex Inkeles & David H. Smith著，何欣譯，1981) 其中隱含學術界流行的一個看法：識字率越高，現代化的速度越快。由於識字率與現代化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以英國為例，該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識字率很高，史學家認為工業革命會先發生於英國。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識字率亦相當高，更加強了二者因果關係的說法。而中國現代化的延誤，是不是因為識字率太低？美國匹茨堡大學勞詩靜(Evelyn Rawski)教授的《清代教育與大眾識字能力》一書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勞詩靜教授估計1880年代(清光緒初年)中國的識字率，男人為30~45%，女人為2~10%。如果以低標論之，男人30%，女人2~10%，則平均識字率為16.6~20.5%；以高標論之，男人45%，女人2~10%，則平均識字率為24~28%，不亞於英國和日本現代化前的識字率。如此看來，中國和英日兩國有相近的識字率。中國的大眾識字率既不亞於英日，何以不能像這兩個國家一樣迅速現代化？勞詩靜教授的說法，促成現代化的因素很多，高識字率只是其中之一。中國不能及時現代化，與教育沒有關係；應從其他的因素去觀察，如社會結構、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張朋園，2002：202-204) 不過，據張朋園教授的研究，勞詩靜教授認為19世紀中國的城市識字率甚高，達到80~90%，這或許是過分樂觀的看法。而且即使我們承認此一數字，甚而提高為100%，當城市人口當時只占全

國人口的6~7%。換算成全國識字率，仍只有6~7%。要是城市中的人只有一半識字，則全國識字率就減為3.5%。張教授認為以下限估計較屬合理，也就是說19世紀中國的識字率很難超過20%。清政府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推行九年預備立憲，其中的一個工作就是推廣識字。預備立憲清單內規定：

第二年頒佈簡易識字課本，創設廳州縣簡易識字學塾，頒佈國民必讀課本；第四年創設鄉鎮簡易識字學塾；第七年人民識字義者須得一百分之一；第八年須得五十分之一；第九年得二十分之一。(參見：〈候補四品京堂勞乃宣奏請於簡易學塾內附設簡字一科並變通地方自治選民資格折〉，載於《政治官報》，宣統元年12月6日)

清廷的這一紙清單，無異於視全國人民為文盲，經過九年預備也只以5%的識字率為目標。1907年孟昭常在〈廣設公民學堂議〉說過：「(人民)大半不識字，書不足以記名姓，數不足以計米鹽，目不識圖冊版串為何物，耳不辨權利義務為何等名詞，見官府示諭，茫然不知赤文錄字竟作何語。」證明識字率的確不高。若就學者認為40%的識字率有助於現代化的看法，C. A. Anderson認為人民的識字率到了40%，就可以使一個社會具備經濟發展的條件。Colin Lanksheer則認為識字率到了40%才會敲響現代人的晨鐘，人們才能有較高的適應力、推動力，並有較大的彈性，願意求變和選擇新的方向。(參見張朋園，2002：207-209，214) 如此看來，張教授主張19世紀中國的識字率難以超過20%的說法，可解釋中國滿清時期人民的識字率不高，而影響到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二、考察學習：中日兩國出使西洋與留學生的比較分析

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曾有過「東風西漸」的時代。13世紀中國與西方的接觸，雖然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仍有諸多爭議，他的中國遊記仍值得一提。西元1266年馬可波羅兄弟抵達中國北京城，見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據說當忽必烈得知他們是從西方來的商人，便寫了一封信託尼可拉帶回羅馬交給教皇，請教皇派人至中國，交流東西方的生活文化。根據他親身經歷寫成的《馬可波羅遊記》，造成13世紀歐洲數百年的東方熱。比馬可波羅晚了200餘年的航海家哥倫布，在15世紀就是攜帶馬可波羅遊記上船作為指引，探尋東方明珠。另比哥倫布早一些時間，中國

明成祖的1405年至1433年期間，鄭和率領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員的龐大遠洋艦隊，連續七次大規模跨越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半島及東非各地，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洋航海壯舉。比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holmeu Dias)發現好望角早70年，比義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西班牙天主教君主的贊助下，於1492年到1502年間四次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早80多年。英國皇家海軍指揮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撰寫的暢銷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提出鄭和船隊的分隊曾經實現環球航行，並早在西方大航海時代之前便已發現美洲、澳洲、紐西蘭的論點。(Gavin Menzies著，鮑家慶譯，2011) Lousis Eevathes著書《當中國稱霸海上》，也提到鄭和的七次下西洋，顯示15世紀的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距離、持續時間等規模，在當時世界均是前所未見，清楚證明中國有稱霸海洋成為比英國更早的海上強權潛力。(Lousis Eevathes著，邱仲麟譯，2000) 但可惜鄭和在最後一次出海之後，下西洋行動即突然停止，明朝在成祖駕崩後，後繼皇帝缺乏遠見與魄力，朝廷也認為七下西洋除滿足成祖宣揚國威之外，未能獲得適切的經濟回報。士大夫更是鄙視由宦官主導的海洋政策，且中國傳統以農立國，無意於海洋發展，尤其鄭和出使西洋所費不貲，影響國家財政，致朝廷官員視為「敝政」。加上此後中國沿海不斷受到倭寇侵襲，朝廷重申片板不許下海的禁海政策，導致「閉關自守」，喪失與西方國家交流並與日俱進的機會。(王桂巖，2008)

隨著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與工業革命的進程，西歐開始了大規模的航海探險與殖民擴張，徹底打破了農業社會文明區域孤立發展的狀態，翻轉了東西方文明交流風向，「西風東漸」正衝擊著東方以農業為主的文明古國。由於海上探險家與傳教士，16世紀世界地理知識傳入日本，刺激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激發了日本人主動認識走向世界的勇氣。早在天正10年(1582)足利幕府末代將軍足利義昭時代，日本九州地區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向羅馬教廷派遣伊東祐益、千千石清左衛門、小佐佐甚五等四名少年為中心的使節團，於天正18年(1590)回到日本。這個使節團由傳教士耶穌會會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發起，目的是希望從羅馬教皇和西班牙、葡萄牙國王得到在日本傳教的經濟和精神的援

助，以及讓日本人親自體驗基督教的世界，並通過出使少年來傳達基督教世界的榮光及偉大，俾利於傳教事業。這個使節團的出現，讓許多歐洲人知道日本的存在，也對歐洲文明進行了實地考察，獲取了大量對西方國家的知識，並從歐洲帶回古騰堡印刷機，第一次使用活字印刷術刊行了日本語書籍。少年使節團歸國時，也向攝政關白豐臣秀吉進獻世界地圖集，豐臣秀吉對此圖極為重視，命畫師將其中一幅放大繪在屏風上，每日觀賞，使日本的統治階層對世界有更為完整的瞭解認識，此次出使影響至鉅。(于桂芬，2003：28-30；田毅鵬，1996：48-49) 中國滿清末年和日本幕府末年，面對西方船堅砲利的「外壓」，自然興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革新運動，雙方都相繼派出使節團或考察團，進行外交談判與瞭解西方國家以茲因應。例如，滿清1866年的「斌椿使節團」、1868年的「蒲安臣使節團」，以及日本1860年的「遣美使節團」、1862年的「遣歐使節團」。(王賓，2001：223-224) 前揭兩國在引進與發展博覽會制度上，也曾派出使節團與考察團，如日本幕府早在慶應三年(1867)就派出「巴黎萬博使節團」，中國滿清政府則遲至1904年才派出「聖路易士萬博使節團」。而考察團的部分，日本明治新政府在明治四年(1871)派出「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考察西方文物制度，順道參訪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中國滿清政府則在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團」，赴日本歐美等國考察政治，順道參訪1906年米蘭世博會。

19世紀60年代，在西風東漸與帝國主義的背景之下，中日兩國被迫放棄閉關鎖國政策，先後組織了遣使西洋考察學習的活動。從面對現代化角度看，這是中日兩國加入近代國際秩序，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從歷史上看，中國出使西洋是在兩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下緩慢被動地進行，而日本則是在美國黑船叩關的壓力下，迅速主動所採取的開國措施。兩國從1860年代至1870年代，主要的出使西詳如表4-6：

表4-6 中日兩國從1860年代至1870年代主要出使西洋比較表

時間	出使者		出使國家
	中國	日本	
1860年		新見正興	美國

1861年		水野忠德	歐洲諸國
1862年		竹內保德	英國、荷國、俄國、法國
1864年		池田長發	歐洲諸國
1865年		柴田岡帥	英國、法國
1866年	斌椿(一行5人), 總稅務司赫德同行		歐洲諸國(法、英、俄、荷蘭、丹麥、瑞典、芬蘭、普魯士、比利時)
1868年	蒲安臣、志綱		美國、英國、法國、瑞士、丹麥等國。
1871年	崇厚		英國、法國
		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	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國、丹麥、瑞典、義大利、奧地利(順道參觀維也納世博會)、瑞士等歐美諸國。
1872年		寺島宗則	英國、法國
		森有禮	美國
1877年	郭嵩燾		英國
1878年		青木周藏	德國、法國
	陳蘭彬		美國、西班牙、秘魯
	崇厚		俄國
	曾紀澤		英國、法國
1905年	載澤、尚其亨、李盛鐸、戴鴻慈、端方		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順道參觀當時的米蘭世博會)、奧國、比利時、瑞士、荷蘭、丹麥、瑞典、挪威、俄國等國。

資料來源：整理自田毅鵬〈近代中日兩國出使西洋的比較研究〉，《歷史教學》，第4期，1993年 pp.14-15。

西方列強一直盼望與中國建立互派公使的近代外交制度，早在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在為乾隆祝壽之際，提出互派使節的請求，但清廷認為與天朝體制不合而嚴加拒絕。至熱河覲見時，英使拒絕行跪拜之禮。當時的乾隆皇帝比較寬宏，在這個問題上並不過分挑剔，總算同意他以見英王之禮朝見，但對國書中所提建交遣使、擴大通商的要求，乾隆皇帝則一概不准，給英王的「敕諭」如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驛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可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飾，天朝亦不肯強人以所難。設天朝欲差人常駐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至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轉引自鍾叔和，1989：91）

英國又於24年後的嘉慶21年(1816年)派阿美士德來華，這次嘉慶皇帝非要使臣三跪

九叩首不可，結果阿美士德稱病拒絕行禮，即被遣送出京，令其回國。嘉慶也給英王「敕諭」如下，徹底拒絕和英國建立關係：

……爾使臣不敬恭將事，代達悃忱，乃爾使臣之咎。……爾國距中華遙遠，遣使遠涉，良非易事，且來使於中國禮儀不能諳習，重勞唇舌，非所樂聞。…俟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轉引自鍾叔和，1989：92）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列強又挾威誘導清政府必須各派使臣，往來聘問，使兩國消息常通，相互幫助，實屬有益中國。對此清政府仍認為這是洋人妄自尊大與冀我俯就的巧黯之術，而予以峻拒。但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滿清政府內部初步具備世界知識的洋務派開始意識到遣使出洋的重要性。如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就曾上奏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同時如李鴻章一些地方洋務派官員也有類似看法。（參見田毅鵬，1993：14）在洋務派極力倡議下，清政府從1866年開始遣使西洋學習外國之所長，以為自強根基的考察學習活動。

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赴泰西「遊歷」，也就是第一批親自去接觸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是同治五年(1866)由斌椿父子率領的同文館學生一行五人，並由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擔任嚮導。斌椿一行赴歐遊歷，主其事的是咸豐11年(1863)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始發其議的則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關於派員遊歷這件事，1866年2月20日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等人有一道奏摺，摘錄如下：

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借資籌計，……遲遲未敢瀆請。茲因總稅務司赫德來臣衙門，談及伊現欲乞假回國，如由臣衙門派同文館學生一二名，隨伊前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語。（轉引自鍾叔和，1989：74）

前襄陵知縣斌椿，攜其子廣英，有同文館之英文館學生張德彝、鳳儀和法文館學生彥慧，一行總計五人，隨同回歐洲度假的赫德，親赴法、英、德、俄等歐洲九國考察，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專門為考察西洋情況而出國遠行。斌椿一行於同治五年正月21日離京，三月18日到達法國馬賽，總計他們在歐洲遊歷的時間不到四個月。應該說他們的收穫並不是很多。斌椿隨時記載，帶回中國的只有薄薄一

冊《乘槎筆記》，其中在歐洲的見聞不到兩萬字。但無論如何，這本書畢竟是近代中國知識一分子最早親歷歐洲的記述，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士大夫的傳統觀點。遊歷一番後，斌椿的思想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當西人向他「詢問大中華，何如外邦侈」時，他還是「答以我聖教，所重在書禮；綱常天地經，五倫首孝悌……今上聖且仁，不尚奇技巧」。(鍾叔和，1989：80-81，86)

繼斌椿一行於同治五年赴歐洲諸國遊歷之後，清同治七年七月初一日(1868年8月18日)滿清政府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節團，由前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志剛、禮部郎中孫家谷等「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組成，志剛留下《初使泰西記》一書，記述使節團1868-1870年間訪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經過。「洋務」辦起來以後，外國使臣「不請自來」，交涉事宜日益頻繁。1867年《天津條約》已屆修約之期，主管洋務的恭親王等人，估計英法等國可能會提出進一步的要求。鑒於過去的教訓，與其臨時關門，不如事先交涉。要交涉，就得遣使，要遣使，就得有人才。大清朝乏人堪膺此選，且中外交際不無為難之處，也就是派斌椿出國遊歷時所說的「禮節一層尤難置議」。在「諸費周章」的情況下，總理衙門總算找到了一個辦法，聘請原來擔任美國駐華公使，此時業已卸任的美國人蒲安臣來「權充」使臣，而志剛也被任命為使團成員之一。(鍾叔和，1989：89，96-97) 這與往後滿清政府處理接到歐美國家邀請參加世博會的處置如出一轍，爰「以夷制夷」的想法，組團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的大事，交由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籌備，從此確立由海關洋員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喪失了親身參與學習的機會。

相對的，一海之隔的日本德川幕府，於1858年初負責與美國駐日領事哈理斯談判締結《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日方全權代表井上清直、岩瀨忠震，建議派遣使節團到美國考察求知，在通商條約的條款中規定：「條約批准書的交換儀式於兩年後在美國的華盛頓舉行，屆時日本派遣使團前往。」於是1859年11月，幕府任命新見正興為正使、村垣範正為副使、小栗忠順為監察官，為壯大聲勢，特意允許各藩派人參加之外，另為護衛美國軍艦「波哈丹號」，特遣購自洋人的「咸臨丸」

同行，當時擔任木村喜毅艦長隨從的福澤諭吉亦在行伍之中，「萬延遣美使節團」人數多達81名。浩浩蕩蕩於1860年2月13日搭乘美國軍艦從浦賀港出發，橫渡太平洋，經夏威夷，3月底抵達舊金山，對華盛頓等城市進行訪問，完成換約的使命。7月使節團乘美艦繞過非洲好望角，經香港於11月9日返回橫濱，完成這次環球航行。在時間上領先滿清政府的斌椿一行赴歐洲遊歷，日本「萬延遣美使節團」81人與9個月的規模，遠勝滿清斌椿一行5人四個月的歐洲之行。更重要的是，日本德川幕府官員為向海外求知，特於談判締約時，把意圖載於《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條款中，刻意派遣使團前往美國。跟滿清於兩次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盼望與中國建立互派公使的近代外交制度，清政府認為這是洋人「妄自尊崇」、「冀我俯就」的狡黠之術而予拒絕。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政府才被迫接受公使駐京要求，但絕大多數官員仍然拒斥有出使西洋的必要性，一直拖到1866年，在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建議下，奕訢才決定派遣滿族大臣斌椿隨赫德休假返鄉遊歷歐洲各國，心不甘情不願的走出國家大門。(于桂芬，2003：132-134) 滿清在外交的認知與出使的意願上，與日本德川幕府的主動積極，有天壤之別。

文久元年(1861年)5月，德川幕府為兵庫、新瀉兩港與江戶、大阪兩都「開港開市」延期問題，向締約各國發出將軍的親筆信，要求延期7年開港開埠。談判過程中，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建議幕府派遣使團赴歐洲，與各國當面協商解決。據悉阿禮國的著眼點並不僅是為了解決當前的開港開埠問題，而是有意讓日本使節認識英國的實力，使幕府傾向於依附英國，並使日本統治階層見識一下資本主義經濟，借以引導他們對於開展貿易採取更積極的態度。正好幕府也想借機派遣使節團赴歐洲，直接體驗西歐諸國的文明，於是決定派團赴歐。1862年1月正使竹內保德、副使松平康直等36人組成所謂的「文久遣歐使節團」，搭乘英國軍艦「奧丁號」，也從橫濱出發，訪問法、英、荷、普、俄、葡等國，於1863年1月歸國。值得一提的是，使節團內有福地源一郎、福澤諭吉、松木弘安等洋學家參加，歸國後的福澤諭吉出版了現代化啟蒙書籍《西洋事情》，在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于桂芬，2003：135) 「文久遣歐使節團」在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的安排之下，順

道出席1862年倫敦世博會的開幕典禮，係日本第一次派人前往參觀世博會。(湯本豪一，1996：8-9；西川智之，2006：175-176；松村昌家，2004) 數年後，福澤諭吉在《西洋事情》書中，除向日本人介紹西洋的政治制度、西洋經濟和技術發展(機械工業、汽車、汽船等近代交通運輸工具)、西洋新文明開化的福利事業、西洋的電信郵政，進行文明開化的思想啟蒙之外，也介紹博覽會、博物館等觀念，出版發行之時就狂賣25萬冊，對日本官員與知識份子認識「文明開化」與「博覽會」有深遠的影響。(椎名仙卓，2000：47 & 2005：23；上海圖書館，2002：12)

近十年後的1871年12月23日，日本明治政府為修改不平等條約與考察歐美國家先進國家文物制度，再次派遣由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4人為特命全權副使，他們後來都成為左右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鍵人物，以及隨行人員48人與留學生50餘人等組成100多人的大型使節團「岩倉使節團」。從橫濱港乘美國商船出發前往美國和歐洲各國。回國後的1878年由久米邦武編寫《美歐回覽實記》多達100卷，除有參加奧國維也納世博會的紀錄二卷。岩倉使節團主要的影響，在國家發展方面認識到富強是治國的根本，發展資本主義乃是富強的有效途徑。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差距很大，有必要改革。在學習對象方面，歐美列強的後進國家如德國與俄國的經驗，才是日本學習的榜樣。(毛利敏彥，1969：176-180) 大久保利通在1873年5月回國就任參議，11月設內務省由他兼任內務卿，建立起大久保利通政權，自稱「東方的俾斯麥」。1874年提出《殖產興業建議書》，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認為：「大凡國家之強弱，在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在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在於人民是否勉力於工業」，而目前的日本，所以落後於西方國家，在於民智未開，以及政府對此事未加宣導與獎進。在宣導方面，大久保認為博物館與博覽會是「開人智、獎工藝」的捷徑，尤其肯定博覽會物產調查與產業獎進的功能，在他的極力宣導之下，1876年為參加美國費城世博會，成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親自擔任該局總裁，田中芳男、手島精一等能吏協助籌辦，成功的完成明治政府第二次海外參展。由於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

年美國費城世博會的經驗，有感於舉辦博覽會的效益，也開始思考在國內舉辦等同規模的博覽會。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工業，決定先舉辦全國性的內國博覽會，以防止強勢的外國貨品在國內泛濫，扼殺亟待發展的國內工業。並在西南戰爭的威脅之下，於1877年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有鑒於他的盛況與效益，大久保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建議每四年分區輪流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加速殖產興業政策的推動。(國雄行，2005：51-84) 另外一位岩倉使節團的成員伊藤博文，則是日後起草明治憲法，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的內閣首輔。

20世紀初的中國，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而搖搖欲墜。1901年1月鎮壓過戊戌維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佈要「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遊歷。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的加深，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後，再做決策。於是1905~1906年間，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等一二品大員，並選調了大批隨員同行，陳琪受端方的賞識舉薦在列，分兩路考察14個國家。考察雖以政治特別是憲政為中心，但實際調查範圍包括議會、政府機關、工廠、銀行、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動植物園...等，並順道參訪1906年的米蘭世博會。(王曉秋，2007：143-144)

比較中日兩國出使西洋考察學習的經驗來看，日本政府主動且反應快速之外，使節團的規模龐大。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迫使日本開國，日方刻意於1858年初與美國駐日領事哈理斯談判締結《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就在條款中規定：「條約批准書的交換儀式於兩年後在美國的華盛頓舉行，屆時日本派遣使團前往參加。」於是1859年11月幕府任命新見正興為正使，率領規模龐大多達81名成員的「萬延遣美使節團」。明治維新4年後，明治政府為修改不平等條約與考察歐美國家先進國家文物制度，派遣後來都成為左右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鍵人物的重臣，以及隨行人員48人與留學生50餘人等組成百餘人的「岩倉使節團」。日本對外的反應快

速，積極主動又有計畫。反觀滿清政府，清朝第一次出使西洋，發生在鴉片戰爭爆發26年後的1866年始有斌椿遊歷西洋，對外反應顛預而遲緩。再者，滿清政府固守華夷觀念，使得遣使活動備受束縛難以伸展。如1877年郭嵩燾出使英國「謝罪」，朝野上下輿論譁然，郭迫於壓力，屢次上書力辭，奏曰：「臣素鈍於言辭，周旋應對，絕非所長，又老病衰頹，志氣消落，奉命出使，只益慚惶」，出使西洋的被動性可見一斑。此外，兩國在出使西洋的目的，在認識西方與掌握情報上是相同的。斌椿遊歷西洋時，清廷交付的任務是將所到各處的「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兩國之不同在於，19世紀後半滿清政府遣使西洋的目的，始終局限於瞭解外情與賠禮道歉表示友誼等事項上，並未像日本關注尋求現代化良方。這是因為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只學習西洋的船堅炮利，不求全面學習西方尋求國家現代化所致。直到20世紀初，滿清政府在內外交迫之下，才派出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力圖變法銳意振興，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考察西方強盛根源。這比日本幕末萬延遣美使節團晚了40多年，比明治政府初期的岩倉使節團晚了30多年，也標示著兩國現代化不同的進程。(參見田毅鵬，1993：15-16)

不禁要問，19世紀後半時期，中日兩國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的出使西洋之所以會產生差異，據田毅鵬教授的看法(1993：17-18)，主要有以下兩個因素：第一，兩國對外國文化的傳統態度不同。經過數千年來周而復始的考驗，養成了中國人自我中心論的認知習慣，視周邊民族為夷狄，而自己則是至高無上的天朝上國，評價其他民族時，總是從中國本位出發，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不屑認真研究學習周邊民族文化。以華夷思想為基礎的天朝意識構成了一道道無形的屏障，直接束縛了中國人出使西洋走向世界的意圖與行動。日本文明的特殊發展歷程，養成了日本民族師法他國的認知習慣。因而日本在19世紀的遣使西洋，幾乎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爭論，進展順利且領先中國。第二，對外事務認識的落差。19世紀中葉以前，中日兩國與西方接觸已達300餘年之久。由於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採取閉關政策，信奉華夷思想，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對於西方的認識非常模糊幼稚，統治階

級不知道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視西方為夷狄，昏然不識世界大勢。與中國不同，日本統治階級始終對外事務具有較高的認識水準，早在拉丁文明時代日本統治階級便已具備相當的西方知識。德川幕府鎖國後，統治階級仍可通過荷蘭風說書和唐人風說書管窺世界。1720年代德川吉宗「享保改革」的放寬禁書令，使得蘭學得以興起，西洋近代科技文化似涓涓細流，源源不斷輸入日本，使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一批通曉世界大勢的「蘭癖諸侯」、「蘭癖大名」、「蘭癖老中」，為日本出使西洋，走向世界作好準備。

此外，類似使節團出洋考察學習的另外一種走出國門的途徑，要算是出洋留學。于桂芬在《西風東漸》一書曾指出：「留學是民族國家間文化交流、借取的一種重要手段。對留學的態度，往往體現了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自我意識和對異文化的態度。所以在研究中日兩國攝取西方文化問題時，留學問題是絕對不能迴避。」（于桂芬，2003：137）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陳瑋芬的研究¹⁷，也指出「留學生」是討論中日近代化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此外，日本學者亦有針對留學生配對比較研究，如追手門學院大學名譽教授伊原澤周的《論日本與中國的西洋文化攝取》一書也有專章比較究〈最早赴美留學的兩位東洋人：新島襄與容闈〉，以上較偏向留學生的「事件比較」，而忽略了對中日兩國攝取西方文化縱向發展過程的歷史研究審視，恐淪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狀態，難以窺見兩國攝取西方文化動態發展演進的差異。為此，本小節以「過程比較研究」，討論起自於1840年代至1911年代，中日兩國留學生與兩國早期現代化的關係。（陳瑋芬，2007 &

¹⁷ 陳瑋芬研究員執行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教育與愛國：容闈與新島襄思想的比較研究」專題研究計畫，並將研究成果以〈西學之子—容闈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為題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發表，探討容闈和新島襄這兩位中國與日本的第一位留美學人，如何透過西行的舉動，拓展母國的西學深度和規模，並經由二者的比較，探討中、日兩國如何由「師夷長技」到投身西學的歷程。後來在〈西學與西行—近代中日留洋探路者的認同及遷異的比較（1850-1920）〉的後續專題研究，討論福澤諭吉、中村正直、小野梓、永井繁子、津田梅子、及李恩富、伍廷芳、嚴復等在19~20世紀之交留美與留英的開拓者，比較其知識基底、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改宗、邊緣處境、自他認識等問題，與先前容闈和新島襄研究結合，透過留學生的比較呈現中日兩國的思想界由近代跨向現代之際的思想轉化。並將研究部分成果於《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發表〈西學啟蒙：由中村敬宇和嚴復的翻譯事業觀其會通東西的實踐〉專題論文。

2008；伊原澤周，1999)

容闈在近代中國西學東漸中有他的歷史地位，容氏自稱「以中國人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實自余始。」1841年容闈進入馬禮遜學堂，翌年隨學校由澳門遷至香港。在這裡他遇到了一位美國老師勃朗先生，後來也到美國深造，主要是由於勃朗先生及其朋友的幫助。容闈、黃勝、黃寬等三人於1847年1月從黃埔港上了「亨特利思號」帆船，開始他們的美國旅程。他們的赴美留學，早於斌椿、志剛諸人的出洋紀錄。1847年4月12日他們抵達美國，由勃朗先生協助進入新英格蘭最有名的預備學校「孟松學校」，校長海門先生對容闈等三個中國留學生特別禮遇，「蓋亦對於中國素抱熱誠，甚望余等學成歸國，能有所設施耳」。容闈於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返國，曾接觸太平天國的干王洪仁玕，想貢獻所長未果。1863年找到曾國藩，希望通過曾來實現自己要讓西學得以東漸的志向。他成功的建議滿清政府設立第一座完善的機器工廠——江南製造局，以及在中國安排四批官費留學生出洋，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學。這兩件事可謂是「洋務運動」的兩樁大事。容闈本人也因為經辦這些事，成了中國在美國所設立的「留學事務所監督」和中國政府駐美「副使」。即使得到像曾國藩這樣大人物的支持，容闈的「為中國造福」派遣留學生教育計畫，從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120名學生分四期逐年赴美。原定15年學成回國，可是由於受到堅持閉關自守與反對學習西方蠻夷的保守勢力抨擊，繼曾國藩主持「洋務」的李鴻章又首鼠兩端，1881年這些留學生全部被撤回。雖然如此，120名沒有完成學業而被撤回的留美學生當中，後來仍出一些知名的人物。如詹天佑第一次不假外力設計並修成京張鐵路，梁敦彥在清末當了外務部尚書，唐紹儀則在民國初年曾任國務總理，對中國的現代化仍有其貢獻。(參見鍾叔和，1989：145-161)

早在發生中英鴉片戰爭的1840年代，許多日本有識之士就強烈感受到民族的空前危機，紛紛把目光投向海外。不過當時的德川幕府仍在鎖國狀態，嚴格禁止日本人出國，因此要想實現海外留學的夢想，就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衝撞鎖國禁令，採取偷渡的方式出洋。幕末著名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對西方各國情況的認真研

究，認為日本要想擺脫民族危機，必須打破消極保守的海禁政策向西方學習，他主張：「幡然改變既往苟且之故轍，如俄羅斯之彼得大帝，應選人才派往國外，使之學彼所長諸術，並真正探索其形勢，有廣為招引外國名士，披肝瀝膽予以優待，作為我國所無技術之師，發展諸學科。」為此，佐久間象山決定採取偷渡手段親赴西方考察，最終偷渡計畫雖然失敗，但卻展現日本維新志士學習西方文明的決心和勇氣，揭開了幕末個人出洋留學的序幕。(于桂芬，2003：139-140) 日本幕府時期個人出洋留學最為人所樂道的，屬日本江戶安中藩的新島襄(1843-1890)，容閱自耶魯大學畢業返國的1854年，閉關自守的日本終於打開國門。然而渡航解禁令並不適用於留學生及商人，所以在容閱返國整整九年後，日本才出現第一位留美學人新島襄。他克服死刑的恐懼違抗幕府禁令，於1864年偷渡取道北海道的函館，踏上留學之途。1865年7月20日才跨越大西洋抵達波士頓港，經柏林號船長哈帝的協助進入麻州的菲利普高中就讀，很受校長泰勒的照顧。兩年後畢業，在安道佛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附屬教會受洗，升入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理學系，1870年獲頒理學士學位，進入安道佛神學院，這是美國最初的神學研究所。研究所一年級時，他透過日本駐美公使森有禮的斡旋，獲得日本政府發給的留學許可證書，身分上不再是個偷渡客。研究所二年級時，在華盛頓與「岩倉使節團」見面，結識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兼任翻譯陪同文部理事官田中不二磨前往視察英、法、德等國的教育制度。返國後受託撰寫《理事功程》初稿，這份報告是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濫觴。1874年取得神學碩士學位，並成為神職人員。新島襄回國後在京都創辦同志社英學校，這是第一所由日本人創立的基督教學校，辭世後由夫人接手創設同志社大學，主張大學的基礎在於人文教養，所以不以培育政府官員、專業學術研究者為主要目的，而重視全人教育，作育英才無數。(陳瑋芬，2007：230-233)

此外，比新島襄個人偷渡出國更早的有長州藩不顧鎖國禁令派遣留學生赴英國學習。在日本幕藩體制下，諸藩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長州、薩摩等強藩繼幕府向海外派遣留學生之後，也派出了自己的留學生攝取西方文化。在長州藩的默許下，

長州藩士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尾庸三、井上勝、遠藤謹助等5名藩士(長州五傑)，於1863年5月12日從橫濱偷渡赴英國留學。這些藩士還曾經是攘夷急先鋒，後來他們發現日本在軍事上已遠遠落後於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想要變得強大就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於是決意留學英國。在1885年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回憶自己早年偷渡英國時思想上發生變化的過程，「雖然當時我亦為攘夷論者，但當我初渡海外，目睹歐洲之大勢，察其文化之進步後，方覺攘夷論實無立足之處。列強文明開化之狀況與日本實不可同日而語，而鎖國之論調亦漸不可取矣。我以為鎖國即害國也。歸國之後我即向上進言攘夷之說不可行，應倡導與外國和平共處，接受歐洲之進步文明。」而在長州五傑偷渡留學的兩年之後，也有薩摩藩的五代友厚、寺島宗則、森有禮等19人，追隨他們的腳步前往英國留學，這些人都成為推動日本現代化的功臣。1861年日本幕府為加強海軍建設，決定向美國訂購兩艘軍艦，同時計劃派遣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海軍與造船技術。計畫公開後，很多藩士都踴躍報名。後因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幕府改向荷蘭訂購軍艦，留學生也隨之派往荷蘭。1861年春，幕府選拔的第一批留學生內田恆次郎等人一行的人乘坐荷蘭商船「卡利浦斯」號來到荷蘭，可說是日本歷史上官派留學的嚆矢。(于桂芬，2003：140-141)

與日本的留學生相較，容閔留學美國主要是美國教師勃朗的促成，少了幕末日本武士為了冒險海外汲取西學，那種捨命偷渡的使命感。容閔曾感慨地回憶道：「是時中國為純粹之舊世界，仕進顯達，賴八股為敲門磚。……父母獨命余入西塾，此則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後，所謂洋務漸趨重要，吾父母欲先著人鞭，冀兒子能出人頭地，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的確在重視通過科舉制度為官的情況下，社會上絕大多數精英分子都熱衷於科舉考試晉身官場，根本沒有人對西學感興趣。甚至到了1860年代，中國社會上與洋人打交道的通事不為社會看好，謂質魯識淺、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安望其留心學問。所以在1860年代的中國社會，根本不可能興起稍具規模的出洋留學熱潮。而近代中國官方派遣留學的舉動更晚，直到1872年才得以成行，比日本足足晚了10年。(于

桂芬，2003：143-144) 中研院研究員陳瑋芬亦指出：由容闈、新島襄到嚴復、中村敬宇，表徵著中國與日本兩國私人留美及公費留英的兩種不同向度。容闈留美之舉早於新島襄19年，然而由於清廷西化政策的舉棋不定，公費留學制度整整晚了德川幕府10年才開始推行。中國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是在容闈數度上奏後，1872年起分四批逐年成行的「留美幼童」120人；日本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於1862年成行，目的地是荷蘭。「留美幼童」學業未成而全數遭清廷飭令召回，德川幕府卻積極加速推動西學、西化的腳步，繼荷蘭留學團之後，派出一批批公費留學生，如1864年往法國、1865年到俄國、1866年分別前往德國與英國，學習海軍、陸軍、造船、礦術、醫學、法律、測量、砲術等實用應用科學與社會科學，甚至數學、物理、化學、文學、哲學等基礎科學。總之，滿清政府與德川幕府面對派遣留學生出歐美留學一事的時間差異，表徵著19世紀後期的東洋面對西洋大軍叩關時戒慎恐懼的態度、以及面對西化開放時，欲迎還拒的程度。隨著公費留學生團的派遣，也標示著中日兩國西學、西化的深度與規模。(陳瑋芬，2008：64-65)

在推動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份子有其不可少的角色，他們是傳統性和現代性之間的重要媒介。范麗萍教授指出中日兩國留學生作為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知識份子群體，有著三種不同的角色與作用。首先在兩國早期現代化中留學生是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生產技術和政治思想的傳播者。其次，留學生也是兩國早期現代化的積極參與者，歸國後往往成為某一方面的專業人才，並獨當一面。最後，留學生還是社會制度的變革者之一。就作為西學的傳播者和現代化的參與者這兩個作用而言，中日兩國留學生不分軒輊，然就第三個作用(社會制度的變革者)而言，兩國的留學生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日本的留學生可謂是成功的社會制度的變革者。作為一個在社會轉型期中興起的新階層，留學生們明顯感受到了時代發展的脈動。例如出洋留學使得伊藤博文、井上馨等留學生認識到只有實行開國，積極學習西方才能有所作為，因此而放棄了盲目攘夷的主張。留學生這一新階層的力量畢竟是薄弱的，單靠他們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幕府舊政權。所幸的是，日本留學生階層為他們自己找到了實現其政治抱負的政治依託力量，那就是幕末被

邊緣化的中下層武士。反觀中國，作為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特殊知識份子群體，中國的留學生在當時始終未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可依託的政治力量，因而使自己的社會制度變革者的身分染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除了政府強力的支持，還要蒙受頑固保守勢力的攻訐，讓有心的留學生很難發揮其作用。中日都屬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類型，這類型的國家進行現代化至關重要的是必須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承擔起領導現代化的重任，羅榮渠教授亦指出：一個國家經濟愈落後，工業化的啟動就愈需要強大的國家導向與政治推動力。相較之下，日本留學生們在明治政府強力的支持下，獲得了極大的施展政治抱負的空間，諸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等都在新政府擔任了要職，對日本的現代化做出極大的貢獻。哈佛大學教授賴世和教授對中日現代化速度的差異，也曾提到可以從19世紀後半期海外留學生歸國之後的社會地位不同來看。日本海外留學生由於當時德川幕府實施鎖國禁令，渡航海外甚難，但也有人取得海外留學的機會到了歐美，雖然數目極少，但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在日本的社會上擔任各種要職。如長州毛利藩出身的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可以說是最好的例子。他們在短期的海外生活中吸收了新知識，回國後在日本明治維新佔有重要的地位。再看看當時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在更容易的留學環境裏，他們回國後，卻多半默默無聞。(Edwin O. Reischauer著，王崧興譯，1963：17) 導致這一差異的另一個因素是兩國對西方文化認知理解的程度。與日本武士好習蘭學，積極攝取西方文化相對照，中國的士大夫如郭嵩燾所言「所求者，詬毀洋人之詞，非求知洋情者也。就師士大夫不下萬人……但以詬毀洋人為快，一切不復求知」，究其因在於兩國文化在歷史中不同的地位所形成的天下觀，與不同民族意識所致。(參見范麗萍，2001：76-78)

三、情報學習：中日兩國鎖國時期認識西方的管道比較分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滿清政府下令關閉漳州、寧波、雲臺山三處對外通商口岸，只留下廣州「一口通商」，後續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頒佈《防範外夷條規》、又稱《防夷五事》，嘉慶十四年(1809年)頒佈《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年(1831年)頒佈《防範夷人章程》等條規，主要對來中土的外國人進行各種限制，也標示中

國的閉關鎖國。日本更早於寬永十年(1633年)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到寬永十六年(1639年)期間共發佈五次「鎖國令」，主要是禁止日本人出入國門與葡萄牙人到日本，以及取締天主教徒等等。(李建鋼，2010：111)但從地理大發現的歷史來看，全球化使得各個國家不可能與世界完全隔絕。中日兩國在鎖國的狀態下，如何有計畫、有目的、有管道的搜集西方世界形勢變化的資訊，對於中日兩國現代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底下就風說書制度、使節團商館人員拜謁、漂流民見聞及翻譯西書等方面，來討論閉關鎖國時代中日認識西方的差異。

首先就風說書制度而言，本論文第三章在討論日本何時接觸世博會時，就曾提及1851年的日本正是德川幕府治理的鎖國時期，曾要求將當時荷蘭在爪哇的巴達維亞建立的東印度公司總部，摘要彙總全球時事送往江戶幕府的《別段風說書》(奇異風聞錄)，其中就有一段記載：「在英國的首都(倫敦)正舉辦能夠展示來自全球各地藝術品與工業產品的博覽會，為此特別建造一座全用玻璃與鋼鐵建材的水晶宮展館……。」(福田州平，2013：30-31)據于桂芬與田毅鵬教授的研究，鎖國時代的德川幕府禁止外國人前來日本貿易，僅開放長崎一港，允許荷蘭與中國商船進行有限制的貿易，使得長崎成為當時日本獲取西方歐美情報的重要來源。為此，特別要求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定期向幕府提供世界各國情況的報告書。荷蘭商人為壟斷與日本的貿易，也積極回應幕府這一要求。從正保元年(1644年)開始，荷蘭商船每次登陸時，都呈遞東印度公司的商館經理要給幕府講述海外見聞的書信，以及海外的最新情報，並由幕府官辦的「洋書調所」譯成日文，稱為「荷蘭風說書」。幕府當時將此視為了瞭解西方的重要情報機密檔案，僅限於幕府最高一級的老中、若年寄等極少數官員閱覽。同時幕府還規定來日貿易的中國商人也必須報告海外情報，稱為「唐人風說書」。此外，還有擔任翻譯的通事根據外國商人的口述或摘譯外國報紙上的新聞，編成「別段風說書」。幕府透過「荷蘭風說書」，對西方世界有所理解，尤其是歐洲的情況。如法國1789年大革命在它爆發後的第6年，也就是寬政六年(1794年)即藉由「荷蘭風說書」傳到日本，另1840年代日本幕府也從「風說書」掌握到英國發動侵華鴉片戰爭的情報。據日本學者森睦彥的研

究統計，早在1839年就有一件「荷蘭風說書」記載「廣東禁止英吉利等國之鴉片走私，官府奉旨嚴查藏匿鴉片基地」。鴉片戰爭爆發後，自1840年至1844年中國赴日商人提供的「唐人風說書」更多達19件有關鴉片戰爭的情報。據此，日本幕府高層開始意識到東亞國家面臨空前危機，更將中英鴉片戰爭作為日本殷鑒。(參見于桂芬，2003：59-61；田毅鵬，1994：50-51) 反觀鎖國時代的滿清政府，沒有類似於日本「風說書」搜集海外情報的那樣管道。與日本的情況相似，在鎖國時期滿清政府也留下廣州作為與外夷貿易的港口，而澳門被葡萄牙占據後也成為西方商人和傳教士雲集的地方。廣州與澳門兩地理應成為中國認識西方世界和西方情報重要來源的窗口，惟滿清政府固守華夷觀念，對外面的世界不屑一顧。主觀意識裡，中國乃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夷狄則為不知禮義的化外之民，而且夷狄以通商逐利為性命，反覆無常，不講信義，其所言所傳亦不足信。清政府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化外夷狄」身上的情報價值，相反卻頒布《防範夷人章程》、《防範外夷規條》，實行公行制度，限制西方情報的搜集。嚴禁外商越過行商，直接與清朝官員接觸，以維護華夷尊卑體制。在公行制度下，清朝的封疆大吏奉行「人臣無外交」的信條，不與外商直接聯繫。而對於與外商經常接觸的買辦、行商、通事等，都作了嚴格限制。由是將中國自絕於日新月異的世界之外，為滿清王朝埋下敗亡的種子。(于桂芬，2003：62；田毅鵬，1994：51)

其次就使節團商館拜謁而言，可視為「荷蘭風說書」的延伸，幕府利用「江戶參府制度」，在荷蘭商館長去江戶參拜將軍的機會，積極蒐集西方情報。所謂的「江戶參府制度」是指荷蘭商館長為表示對幕府特准貿易的感謝，所進行的定期朝拜制度。據史料記載，參拜制度起源於1611年第一代商館長先到駿府謁見德川家康，再到江戶拜見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此後相沿成制。據統計從1611年至1850年的240年間，荷蘭商館長共進行116次拜謁。從荷蘭方面來看，進行拜謁的目的在於從外交上和政治上與日本幕府保持聯繫，以維持對日貿易獨占的有利地位。但從日本方面來看，荷蘭人的「江戶參府」卻無疑帶來了解先進西方文化的機會，使得幕府官吏能在鎖國體制下，仍有機會瞭望世界，直接攝取西方文化。例如慶

安二年(1649年)幕府決定留下部分隨荷蘭商館長到江戶參禮的荷蘭人，觀其炮術及醫術。寬文十年(1670年)幕府允許荷蘭商館長及館員在拜謁將軍後，與幕府官員自由會談。日本鎖國時代的「海外通」新井白石就曾利用這樣的機會，向荷蘭商館長等4名荷蘭人，請益西方世界各強國的海外經營、政治、經濟、地理情況，寫成《和蘭紀事》和《阿蘭陀考》兩部著作，成為幕府西洋情報的重要來源之一。

此外，對於鎖國時代因海難事故或為傳教而進入日本的外國人，德川幕府以違反「鎖國令」的罪名將其逮捕，但仍注意從這些非法入境的外國人身上獲取一些海外情報。如1708年新井白石就通過審訊違反鎖國令，擅入日本國內進行傳教的西洋傳教士西多蒂(G. B. Sidotti)，得到了很多有關亞洲和歐洲的歷史地理知識，尤其對羅馬教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德國、法國的政治和文化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于桂芬，2003：70-71；田毅鵬，1994：51)相較之下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西洋耶穌會傳教士巴亞里央不顧清政府的禁教令，私入內地傳教，被湖廣地方官員捕獲，押送刑部，擬判永遠監禁，乾隆皇帝聞訊後諭令：「此等人犯不過意在傳教，尚無別項不法情節，且究系外夷，未諳國法，若永禁囹圄，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以示柔遠至意。」大清是以「懷柔」對待，以示天朝上國皇恩浩蕩，根本沒有據此了解外部世界的意識。而對於來華的外國使節團，滿清政府更是賤視之為「化外蠻夷」，不予重視。在鴉片戰爭前，葡、西、荷、英等西方國家為了與中國建立商務關係，屢次派遣使節來華要求訂立商約，滿清王朝在「天朝意識」之下，把他們視為朝貢的使臣，只在乎如何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根本無心藉此了解西方世界。(于桂芬，2003：73)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魏源(1794-1857)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滿懷激情地從揚州奔赴浙江前線。正好碰上寧波府俘虜了英國砲兵上尉安徒德，送到寧波軍營，魏源的朋友邀請他參加審訊。他根據安徒德的口供，又結合臺灣所俘英人顛林等的口供，於道光二十一年整理成《英吉利小記》，後收入《海國圖志》，其中記述了英國的地理、政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魏源在《海國圖志》

一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他研究世界政治形勢，認為當時英國是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考較英國強盛的原因，認為科學技術水平較高是其強盛的因素，而且這些科學技術水準顯然比中國高。從這裡魏源意會出「欲制夷患，必籌夷情」。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陳君聰，1999：58-70) 惟《海國圖志》一書在當時的滿清並未引起很大回響，倒是在1851年傳入日本就被翻譯成日文，日本人驚為天書，藉由此書瞭解西方的長處，為後來的明治維新作出貢獻。

其次就漂流民見聞而言，在中日「鎖國閉關」時代，兩國政府屢頒禁令限制沿海民眾出海遠洋。日本「鎖國令」的限制措施比滿清政府更為嚴格，而且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比較徹底。日本江戶時代初期，獲得幕府將軍特許從事海外貿易，並發給出海遠洋許可證的「朱印船」那樣的航海型船隻都被禁止下海，出洋者只得用近海駁船強行數百海里以上的長途海運，因而導致海難頻繁，出現許多「漂流民」的問題，反倒形成「鎖國時代」日本管窺外部世界，獲取西方情報的一個途徑。相較之下，清朝對出洋貿易的百姓限制較日本鬆散，因而「閉關時代」中國沿海地區赴南洋貿易者仍絡繹不絕。不過由於清政府對造船業的限制，海難事故也頻頻發生，致使一些出海貿易遭遇海難的百姓不能按清廷規定期限歸國，只好淪落異邦成為「漂流民」。由此可見，在「鎖國閉關」時代，中日兩國都存在著「漂流民」的議題。從文化接觸、傳播的角度看，這種「漂流民」實際上是中日兩國與西方文化的「跨文化」接觸，必定會對兩國認識世界和攝取西方文化產生影響。(于桂芬，2003：63-64；田毅鵬，1994：52)

據川合顏充《近代日本漂流編年史略》的研究統計，在1637年至1867年的230年間，共有254起日本人漂流事件，主要的漂流地點有墨西哥、加拿大、俄羅斯、菲律賓等。由於漂流越境行為觸犯了鎖國禁令，按幕府的規定應處死刑，但從史料來看，幕府並未實際執行這一嚴厲的懲罰措施，卻命令歸國的漂流民陳述種種海外見聞，寫下大量「漂流記」，幕府以機密文件處理，僅供高級官員內部傳閱，嚴禁外流。這說明在鎖國體制下，幕府已不滿足於僅從「風說書」獲取有關歐美

世界的情報，還試圖透過「漂流民」見聞來了解瞬息萬變的世界。與「風說書」的「傳聞」特性相比，「漂流記」屬實地見聞式的目擊，對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有更為重大的意義。1838年11月，一位名叫次郎吉的日本人在仙台附近海面遇難，後漂至勘察加，歸國途中他在聖伊其島聽到中國滿清有關廣東的鴉片事件，中英雙方已經交戰。聖伊其島上的英國士兵告訴他，有278艘英國軍艦正在進攻廣東，且中英戰事結束後，英國的下一個攻擊目標將會是日本。次郎吉聽到這一消息，立即火速返回日本，十萬火急地報告給幕府，使幕府從另一管道了解到西方殖民侵略者在東亞擴張的最新動態。再如鎖國時代最著名的漂流民萬次郎在1840年1月出海遇險，被一艘美國捕鯨船救起，美國船長送他到美國麻薩諸塞州接受教育。後萬次郎經過千辛萬苦返回日本，將其海外見聞寫就《漂客談奇》出版，向日本人描述了美國這個神奇的國家，使日本人大開眼界。(轉引自于桂芬，2003：64-67；田毅鵬，1994：52)

而滿清王朝的漂流民活動於西方殖民勢力猖獗的南洋地區，有的甚至有過漂流周遊世界的紀錄，由於目擊西方的情況，肯定有更不同的意會與理解。但在清廷閉關政策與華夷思想之下，他們所掌握的西方情報卻很難在國內傳播，更不能上傳到滿清政府的權力核心。因為一船出洋之華人，乃與法令抵觸，自不敢留下其冒險事業於書冊。正統儒家子弟認為撰文記載留滯西方之浪人冒險事業是浪費筆墨的行為，而滿清朝廷對於漂流民所掌握的西方情報根本不加重視。《海錄》的作者謝清高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在18歲時從商人出洋海南，因船難為洋船救起，從此隨洋船周遊英、美、葡等國。遊歷大半生，晚年雙目失明，不敢歸鄉，寓居澳門，衣食無著。為了記其所見傳之於後，在民間人士楊炳南的協助下寫成《海錄》，成為中國人最早的海外實地見聞錄。雖然該書關於西洋政治、經濟、風俗記載甚詳，具有相當的情報價值，但因出自澳門普通老百姓之手，對清朝統治階級基本上沒有發生任何影響。(于桂芬，2003：67-70；田毅鵬，1994：52-53) 相較之下，鎖國時代的日本幕府通過「漂流民」見聞瞭解到大量的西洋情報，進而對西方有進一步的認識，而清政府卻對流浪異邦的漂流民所掌握的大量西方情報置若

岡聞，使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長期處於「蠻夷之邦」的偏見，中日在意會西風東漸與認知帝國殖民可能帶來的危機方面，態度與管道上已看出兩國之間的差距。

最後就翻譯西書而言，在東西方文明接觸與文化交流，譯書一直都是增進彼此之間相互瞭解與學習的重要手段。在日本鎖國之初，除荷蘭的醫藥、醫學外科、航海等書籍之外，嚴格限制不准輸入其他歐洲洋文書籍，這時的日本似乎不存在譯書活動，大大限制日本藉由翻譯洋書這個管道獲取西方情報。據于桂芬與田毅鵬教授的研究，日本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享保年間(1716~1735年)推動改革時，開始放寬「禁書令」，准許輸入與基督教沒有關係的其他洋書，也因此造就以翻譯荷蘭書籍為核心的蘭學運動。蘭學在發展過程中遍及全國，不只局限於醫學，甚至於天文學、地理學、理化學、兵學、歷史學等領域。于桂芬在《西風東漸》一書指出：從1720年「洋書解禁」到1853年「黑船叩關」時期內，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下令禁書中除與基督教有關係的部分外，允許其他洋書輸入，由此揭開了日本大規模攝取西方文化的序幕。鎖國時代後期，日本通過蘭學家們的大力譯刊，對西方近代科學知識開始有了一個整體的把握，以1774年前野良澤《解體新書》的出版為主要里程碑，步入了日本翻譯西書的新時代。蘭學以醫學為切入點，在50年中普及擴大到天文學、地理學、理化學、博物學、歷史學、語言學，以及與國防密切相關的兵學等方面，使日本人接觸到歐洲科學革命及近代理性人文科學的新成果，表現出日本人學習攝取西方文明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以地理學研究來說，新井白石於1715年出版的世界地理書《西洋紀聞》最為突出，該書係根據審訊潛入日本的義大利傳教士西多蒂的記錄寫成，內容涉及西方各國的政治、地理、宗教、風俗等方面。新井白石在書中明確承認歐洲的「形而下」文化是有價值，並且是和基督教有所不同，即便在禁止後者的條件下，也是具有可以吸取的內容，由此導出幕末的「和魂洋才」之說。在鎖國時代蘭學家當中，經濟學的領域較具代表性的是本多利明《經世秘策》，將海外貿易作為富國方策，提出了進取性的「開國論」。他指出：「日本是個海國，航海運輸貿易是首要的國務，本來就是國君的天職。所以，派遣船舶駛往各國，搜羅國家必需的產物及金

銀銅，輸入日本，雄厚國力，是使海國物資充足之法。如果只想以本國的力量來治理，則國力逐漸衰弱，其弱全都落在農民身上，農民連年陷於貧困，這是自然之勢。」他還以英國為例，強調說明英國雖然本是個寒冷小國，物產貧乏，卻能稱霸世界，就是依靠對外貿易來增強國力。藉由蘭學使日本對西方文明有更加深刻的認識，為日本明治維新現代化做好了思想準備。(參見于桂芬，2003：77-78，83-87) 另據1852年出版的《西洋學家譯述目錄》統計，自1774年至1852年的百餘年間，日本德川幕府翻譯歐洲的醫學、天文、曆學等書籍近500種，從事翻譯洋書的學者有117人之譜。蘭學的興起不只是日本鎖國時代攝取西洋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蘭學在發展傳播的過程中與政治結合，向幕府權力高層滲透。如19世紀上半葉蘭學著名團體「尚齒會」，就吸引了幕府大臣江川英龍、羽倉用九、川路聖謨、松平伊勢守等人的加入，他們深受蘭學大師高野長英與渡邊華山的影響，從其譯著中習得大量西方知識。而且很多蘭學大師還被召到各藩，傳播西方知識。如仙台藩早在文政五年就設立了醫學館作為荷蘭醫學講習所，水戶藩天保三年召聘青地林宗，可見蘭學的勃興給幕藩體制下的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更多詳盡的西方情報，使日本統治階級明確認識到不應強力排斥西學，而應大力攝取推廣，為日後日本開國走向世界奠下了堅實的基礎。(參見田毅鵬，1994：53-54) 美國黑船來航後，江戶幕府有感於洋學研究的必要性，將過去天文臺蠻書和解御用掛(將洋書翻譯成日文的專責單位)加以擴編，於安政二年(1855年)設置「洋學所」，由於安政年間大地震損毀，安政三年二月十一日(1856年3月17日)重建改稱「蕃書調所」，由古賀謹一郎擔任所長，箕作阮甫與杉田成卿擔任教授，以蘭學為主與英學為輔的洋學教育機構，翻譯西方書籍，為幕府時期的日本培養出許多有世界觀的人才。(ウイキペディア百科事典：<https://ja.wikipedia.org/wiki/蕃書調所>)

反觀中國在明末清初之際，著名的來華傳教士有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義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 與利瑪竇(Matteo Ricci)、德國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比利時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他們為完成傳教士的使命，以西學為敲門磚，與中國士大夫合作，翻譯了大批西學著作。當時的整個翻譯工作由傳

教士主持，參與的中國人只擔任修飾翻譯的文辭。例如：利瑪竇於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年)來到中國除傳播天主教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並繪製《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來華，在澳門神學院講授數學，曾於北京、上海、揚州、杭州、陝西、山西等地傳教。另致力於介紹西學與世界地理知識，編譯歐洲地理學的代表作《職方外紀》並由明朝同進士出身的官員楊廷筠加以潤色，並繪有《萬國全圖》。清廷開始禁教之後，隨著傳教士的紛紛離去，西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處於停滯狀態。直到19世紀鴉片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林則徐在中外交涉過程中意識到翻譯以蒐集敵方洋人情報的重要性，林則徐為瞭解外國情況，在自己的行轅裡設立「譯書館」，網羅善譯人才，專門翻譯蒐集廣州、澳門外國人出版的各種書報，如「澳門新聞紙」與廣州英商主辦的《廣州周報》，包括商業情報、傳教小冊子和介紹西方史地的書籍。林則徐認真閱讀西方書報，反覆研究，從中「借以探訪夷情」，尋求新知。(陳君聰，1999：48-49) 在林則徐主導的眾多譯著中影響最大的，要算是1839年將英人慕瑞《地理大全》譯為《四洲志》，後來成為魏源《海國圖志》的前身。但從時間上看，與1774年日本蘭學的第一部譯著《解體新書》相比較，《四洲志》遲了60多年，從社會影響角度看，蘭學的譯著不僅在民間有一定影響力，而且為幕府提供了大批情報，有其影響力。而《四洲志》以及後來的《海國圖志》在當時卻影響甚微，後甚至絕版。(田毅鵬，1994：54；于桂芬，2003：67-70)

于桂芬的《西風東漸》比較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中日兩國著述譯刊的西學圖書，發現：(1)此時期的滿清中國西學譯著只是官僚士大夫的個人行為，沒有發展成有組織、有目的政府行為。而日本的西學譯著則既包括幕府控制下的洋學，又包括各藩有識之士的著述，具有極強的的目的性和組織性。例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夏燮的《中西紀事》等西學著述，均為士大夫個人「開眼看世界」憤筆疾書的產物，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存在一個有組織攝取西方文化的群體。而在日本，封建幕府鑒於中國鴉片戰爭的教訓，為挽救其統治危

機，決定加強對洋學的掌握，建構嚴密的洋學組織群體。將過去天文臺蠻書和解御用掛(將洋書翻譯成日文的專責單位)加以擴編，於安政二年(1855年)設置「洋學所」¹⁸，由於安政年間大地震損毀，安政三年二月十一日(1856年3月17日)重建改稱「蕃書調所」，翻譯西方書籍，研究海防，培養了解世界的新人才。1862年為求名實相符將「蕃書調所」又正名為「洋書調所」，1863年為擴充翻譯洋書至實用之學，參酌中國《易經》的「開物成務」之義，將「洋書調所」改名為「開成所」，集中了幕末一流的洋學家致力研究西學，出版了許多書籍。(2)從兩國西學譯著傳播和影響的角度看，西學著作在日本社會的流傳和影響的程度明顯大於中國。例如《海國圖志》在中國出版後，倍受冷落，竟至絕版，而傳到日本卻大受重視。據日本學者的研究，傳入日本的《海國圖志》售價連年看漲之外，立刻有不同的翻刻版本出現，高達23種之多。幕末維新志士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都讀過此書，其中塩谷岩陰在訓點《海國圖志》時作序，感慨地說：「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而著此書，卻不為其君所用，反倒用於別國他邦。吾不獨為魏默深(魏源字默深)悲，亦為清帝悲。」(3)從此時期兩國西學著作的類型看，日本遠遠勝過中國。鴉片戰爭後20餘年間，中國誕生的西學著作，僅限於少數留心時事的志士間接地翻譯西書，綜合中外資料而成。而日本除了漢譯、洋譯著作之外，還包括綜合性的西學著述和頗具影響的「實地見聞錄」。此外，由於荷蘭當局停止向幕府提供「荷蘭風說書」，改為直接呈送荷蘭東印度總督府機關報《Jaraschtconrant》，幕府命令官方的「洋書調所」譯為日文，自1862年起以《巴達維亞新聞》公開發行，是為日本最早公開發行的官方報紙，成為日本人認識世界的最主要管道。(參見于桂芬，2003:126-132)

德川幕府於1856年設置「蕃書調所」，10年後的1867年，李鴻章也在江南製造總局設置以傅蘭雅(John Fryer)為中心的翻譯局。當時所翻譯的西書，大抵限於「格

¹⁸ 于桂芬在《西風東漸》書中提及：「1855年7月，老中阿部正弘採納簡井等人的建議，設立蕃書調所」(p.130)，參考ウィキペディア百科事典(<https://ja.wikipedia.org/wiki/蕃書調所>)，當時依該是將過去天文臺蠻書和解御用掛加以擴編，於安政2年(1855年)設置「洋學所」，隔年的1856年才改名「蕃書調所」，另于桂芬提及「1862年5月蕃書調所又改名為洋學所，1863年8月，洋書調所又改名為開成所」(p.130)，其中蕃書調所又改名為「洋學所」應屬筆誤，應該是「洋書調所」。

物窮理」、「聲光電化」，比較偏重物質層面的西書翻譯，直到嚴復等啟蒙思想家出現的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翻譯工作才由物質層面的引入，擴大為精神層面的接收。嚴復的著作與譯作等身，如知名的《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都具備深厚的儒學素養，透過漢籍古典的素材，帶國人走上文明開化的道路。試圖克服「中體西用」的文化觀，而在宇宙、政體、制度及精神各層面，對東西文化提出更細緻的觀察與引介。(陳瑋芬，2008：66)

四、實作回應：中國的「中體西用」 vs 日本的「脫亞入歐」

前兩個小節已討論中日兩國如何意會西風東漸與學習西法的差異，接下來整理兩國在面對西方叩關要求通商所做的回應，以及救亡圖存所做的國家現代化行動方面的差異。(參見表4-7) 首先，比較設置處理對外關係專責單位的演進。在清朝前期的政府官僚結構當中，並沒有所謂「外交部」的設置，基於華夷觀念，與非漢民族的往來，委由不同的衙署辦理。這種作法意味著異族在文化的低劣與地理的邊陲性，同時也有防禦異族入侵之意。(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2001：129-131；李兆祥，2008：26-30)

在北方與西北方的蒙古、準噶爾以及俄羅斯人的關係是由皇太極於1638年設置的「理藩院」負責，理藩院的官吏悉數由滿人、蒙古人出任，任務是防止邊患形成，因為歷來外患都起於此地。為達到撫綏的目的，理藩院設計了一套複雜的制度來調節中亞商隊的貿易。清朝往往以皇室公主與蒙古親王聯姻，形成一種私人同盟的保護網絡，並輔以重兵駐守各戰略據點。

歐洲傳教士來華傳教則是由「內務府」負責管轄，他們在處理宣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大清宣揚國威的一部分，而非關國家的外交事務政策。而與朝鮮或是東南沿海的國家，如緬甸、泰國、越南、琉球等非漢民族的互動往來，是由「禮部」負責處理。這些國家分享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使用中國的曆法紀年，部分典籍仿自於中國，尊崇儒家思想，模仿中國的官僚組織架構。禮部在處理與這

些國家的關係時，特別彰顯典章儀禮與符號象徵，中國試圖不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來控制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在給中國的國書中用語恭敬，使節謁見皇帝則行三跪九叩大禮，藉以承認中國在文化與政治方面的優越地位。這些國家則可以得到中國一定額度的貿易賞賜，這些國家每年定期派遣所謂的「朝貢團」前往北京，在向皇帝呈送貢品之後，隨同朝貢團抵達北京的使節與商人就在可以中國做買賣，所有的朝貢團成員均須住在禮部管理的客棧，朝貢結束就必須帶著貨品離開中國。日本人一直不願承認中國典章制度的優越性，所以從明朝末年之後便已停止遣使，加上德川幕府亦限制外人在長崎居住和從事貿易活動，所以清朝與德川幕府之間幾乎沒有來往。

表4-7 中日兩國面對西風東漸所做的回應比較

	中 國	日 本
基本思想	滿清以「中體西用」主軸，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推行洋務運動。	明治日本則以「和魂洋才」與「脫亞入歐」為基調，全盤西化。
外事機構	1861年初滿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基於「夷夏之辨」，先從處理「夷務」開始，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並設置北洋通商大臣與南洋通商大臣，並由欽差大臣、總督與將軍在第一線處理夷務。1901年方設置專責外交事務的中樞機構「外務部」。	明治政府於1871年7月就在正院底下設置「外務省」，負責外交事務的專責機關。
產業發展	滿清自強運動在「唯兵之為務」的思想指導下推動製造業的發展，而疏於基本工業之建設。又出於對財政和餉源至上等諸多考慮，強化官督商辦，嚴重影響洋務企業走向商辦企業，從而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	明治政府則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政策。明治政府非常重視軍事工業的創辦，但同時也很注意各種基本工業部門和金融、外貿等各項近代經濟事業的建設，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進而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的思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至於對非朝貢國家之間的往來，則以粵海關和十三行來處理。清朝在康熙年間停止遷海、禁海政策後，荷蘭以曾助剿滅鄭氏，首先請求通市獲准。其它西洋諸國因荷蘭得請，爭相越洋來華互市通商，這些國家也就變成了清朝的「互市之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後推行的一口(廣州)通商，一直到鴉片戰爭結束，特設的「粵

海關」成為清朝與大西洋各國交涉的最重要的機構。與粵海關配合管理貿易的是「十三行」，又稱洋貨行、洋行、外洋行、洋貨十三行。名義上雖稱十三，其實並無定數。十三行的行商具有了三重身份，商人、稅收官員和以對外貿易內容為主的對外交涉事務的具體承擔者。十三行也就成為清朝一個獨特的對外交涉的具體執行機構。總的來說，清朝前期處理西北、傳教士、南方異族及互市之國幾種不同的模式，未見近代所謂的專責外交機關，倒是反映了中國人「華夏天下」、「華夷朝貢」的基本信念，認為中國乃「中央」王國，其他的國家皆屬遠離文化中心的化外之邦。中國對外國的訊息並不感興趣，亦不願意仔細研究。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外交機構來看，中國的涉外部門只有禮部、理藩院、內務府及粵海關。鴉片戰爭之後，為應付對外通商口岸的開設，新增了「五口通商大臣」一職，直至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成立。鴉片戰爭中，中英交涉都是由清廷諭命的欽差大臣來辦理。鴉片戰爭後，為了管理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1842年10月的道光皇帝諭旨：「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為兩江總督，會辦江、浙、閩三省通商之事，留守省城南京辦理除廣州之外的其他四個通商口岸事務」。1843年4月6日的道光皇帝再頒諭旨：「命兩江總督耆英為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查辦事件，辦理通商餉稅章程，一切務臻妥善」。耆英到達廣州，正式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身份接辦廣州將軍伊里布未竟差事，與英國等國談判。這時的耆英已經是五口通商事務集於一身的欽差大臣了，五口通商大臣制度初現雛形。1844年4月22日清廷收到廣州方面的奏摺，說美國公使顧盛來華後聲言「只與欽差大臣商酌」。於是清廷再頒諭旨：「耆英現已調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後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鈐用」，這道諭旨是為因應美國公使的交涉，卻正式確立了在中國主持中外交涉近17年之久的五口通商大臣制度。(李兆祥，2008：60-61；孫瑜鑫，2013：154)

日本德川幕府的嘉永六年(1853年)七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將軍，率領四艘軍艦開到江戶灣口，以武力威脅幕府開國。從1853年德川幕府接受美國國書開始，日本的門戶正式被西方打開，並於1854年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

又稱《神奈川條約》，開放下田、函館兩個港口，並享有最惠國待遇。從1854年到1856年，日本與美、英、俄、荷四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為通商貿易的目的，與日本開始了通商方面的交涉和談判。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在《神奈川條約》簽訂後的安政改革期間，再次任用開國派的堀田正睦為老中，他好蘭學，又積極宣導對外通商，支持開國，在阿部去世之後，堀田成為首席老中兼外國事務負責人(外国掛)。改革期間的安政五年(1858年)，由海防負責人(海防掛)井上清直、岩瀨忠震為全權代表與美國交涉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條約簽定之後，廢止海防掛，幕府設置專門外交機構「外國奉行」，由井上、岩瀨等5名特任官負責對外交涉事務，頂頭上司為兼外國事務負責人的老中。慶應三年(1867年)這些特任官上設一外國總奉行(外国惣奉行)，大政奉還之後的1868年廢止。1871年7月明治政府三院(正院、左院、右院)官制確立，在正院底下設置「外務省」負責外交事務的專責機關，也是日本實施內閣制以來，唯一沒有變動的中央機關。直至今日的日本政府，仍沿用「外務省」主責外交事務。

比安政改革期間的1858年幕府設置專門外交機構「外國奉行」晚一些，由於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要求，以及與列強的交涉日形重要，第二次鴉片戰爭敗北之後，咸豐十一年(1861年)一月十一日，在北京督辦和局的「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恭親王奕訢，與桂良、文祥聯名上奏《通籌夷務全域折》，正式提出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月二十日咸豐皇帝正式頒旨，恩准奕訢等所奏。二月時，恭親王奕訢上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成立，開用關防，並知照吏部等各衙門，及通商各省督撫臣、天津通商大臣、上海欽差大臣，同時照會英法等各國公使，一體遵照。」三月十一日，奕訢從禮部領到「欽命總理各國事務關防」，隨即通告吏部等各衙門、地方督撫，並照會各國駐華公使。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通籌夷務」的外事常設機構，與此同時各國要求派使駐京也得到滿足，這些外國使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外交上代表各自國家督促清政府履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基本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係滿清政府被迫成立的「通籌夷務」機構，旗下設同文館、總稅務司署，並間接透過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地方督撫、

將軍等地方大員遂行通籌夷務，背後總浮現「華夷之辨」的意識形態作祟，也就是清政府維持不與列強直接接觸的慣例，降低清政府與列強交涉的級別，甚至採「以夷制夷」的鴛鴦心態，夷物委由洋人代辦的便宜行事。如1861年1月16日，上諭委由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擔任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負責經理所有新開口岸的關稅事宜。（參見李兆祥，2008：111-127）清同治二年（1863年），李泰國被解雇離開海關返回英國，滿清政府委任英國人赫德繼任總稅務司，立下洋人幫辦關務的制度。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被迫簽定辛丑合約之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更名「外務部」，負責一切對外交涉的事務，除簽訂條約、劃定疆界、派遣使節外，更多的是有關通商、海防、路礦、關稅、郵電、華工、傳教、遊歷等事務。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列強依據新的條約，列強繼續向中國索取政治特權和經濟利益。20世紀初，近代中國外交到了非改革不可、也不能不改革的地步。1901年「外務部」成立，正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構建近代化外交制度的開始。也就是說，過往的鴉片戰爭，雖然滿清政府被迫設立了特命欽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等對外交涉的官署和官員，但是五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都是各自為政，而作為有可能成為外交中樞機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卻由於所有官員都是兼職、地方督撫具有辦理外交的權力等諸多原因，不可能也沒有成為構建一種新的外交體制核心。而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化設置的「外務部」，不但按列強的要求列六部之前，而且其結構、職能以及權力的行使，都展現出一個中央外交中樞機構的特點。（李兆祥，2008：174-281）

相較之下，1871年7月明治政府在正院底下設置「外務省」負責外交事務的專責機關，而滿清政府於1901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被迫簽定辛丑合約之後，方才於中央政府設置專責外交事務的中樞機構「外務部」，有30年的時間落差。推其因在中日兩國對外事是種「夷務」還是「洋務」的態度，滿清政府除了態度消極，在列強基於維護不平等條約的利益，強烈要求設置專責專業的外事機構之外，再

加上華夏天下、華夷之辨的文化包袱，更延誤滿清政府專責專業外事機構的設置。

中國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可以上溯到1860年代的自強運動，在羅榮渠教授的看法，1860年開始至1911年，為滿清王朝試圖挽救其衰亡命運而從事的現代化努力，到1912年至1949年則為爭取依照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建立現代化獨立而統一國家與經濟發展。1860年至1911年，就關鍵成員來看，現代化的領導精英最初來自清廷的官僚士大夫上層階級，後來逐漸轉向接受西方影響、具有科舉功名的中下層士紳，而現代化是在傳統制度和權力結構的範圍內進行，可分為三個截然不同但又有聯繫的運動所組成，即1860-1894年的自強運動、1895-1898年的維新運動及1905-1911年的立憲運動。其中最早的自強運動是種「防衛性現代化」¹⁹，持續了30年時間，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運動中佔有最重要位置，對研究現代化的成敗得失有代表性意義。自強運動學術界又稱之為「洋務運動」，從現代化角度來看，自強運動較為切題，主要著眼於局部地借助西方科技尋求抵禦西方的富強之術，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也就是李鴻章所說的「辦洋務制洋兵」。(羅榮渠，2013：220)

1861年初的洋務運動，先從處理夷務開始，如前揭有關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並設置北洋通商大臣與南洋通商大臣，是為推行自強運動的先聲。繼之在軍事改革的領域，洋務派在目睹洋人「船堅炮利」之後，便先從軍事方面開展了自強的變革。在與英、法、美、俄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之餘，開始了以購買洋槍洋炮、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為中心內容的洋務運動。也就是說派員採購西洋船炮並演習製造為開路，隨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子彈局、火藥局、軍械局、機器局、船政局等官辦的新式軍工企業。到1880年代中期進度加快，擴及到海軍的建立，興辦一般民用企業，開礦山，試辦電報郵政，翻譯西學著作，派遣留學生出國，設立新學堂，甚至連遭到激烈反對的鐵路修築也有所突破開始動工，這二、三十年正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緩慢的發展。洋務派在軍事改革有一定的成績，

¹⁹ 「防衛性現代化」一詞，意指一些非西方國家家的現代化之主要動機，並非發自社會之內部，而是發自社會之外部的。因為他們感覺到為了保衛自己，免於西方優勢的政治經濟的侵襲，非求得國家的安定與力量不可。(金耀基，1987：153)

曾任中法「常捷軍」幫統的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於1872年曾經寫道：「中國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整個官僚階級都決心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兵工廠和造船廠的產量讓人印象深刻；中國建造的軍艦不久就將可達到歐洲的最高水準，中國的軍事力量與1860年情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張楚楚，2012：55；羅榮渠，2013：220-221) 羅榮渠教授對自強運動曾評論道：

興辦新式軍事工業以圖自強，這本來就是常見後進國家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形式。清朝政府宣導興辦從外國引進技術的官營工業，這也是中國經濟史上劃時代的創舉。然而，就這次早期工業化的努力而論，則是這種努力中的最保守的嘗試。造成這次運動的保守性的原因很多，可以說從啟啟階段就暴露出種種重大弱點。首先近代君主制國家在西方衝擊下，為維護帝國的生存，採取自上而下的改革來救亡圖存，一般都從抓軍事改革入手。同時都有較重大的政治改革，如體制或法制上的改革。自強運動的最大的體制改革是設置總理各國商務事務衙門，這是祖制所無，卻是在英法聯軍兵臨城下的緊急形勢下被逼出來的。(羅榮渠，2013：221)

也就是說自強運動的所有改革，都是在原有的皇朝體制相結構之中採取的修補性措施，具有明顯的保守性。雖名為「同光中興」，實際只能說是應付危機而倉促進行的小改變，先從軍事方面開展的自強變革，其起點與規模遠低於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早期現代化改革運動。如金耀基教授所說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後，立刻就形成一全面的抗阻的陣線，而第一道被西方文化衝破的便是最外層的器物技術的一道防線。這便是張之洞所說的「西學為用」的「用」，其最明顯的就是曾在洋務運動提倡學習西方的「船堅砲利」；因為在當時文化意識上，中國知識份子認為西方高於中國者在此而不在彼。(金耀基，1987：162-163)

就先前兩國知識分子的比較，看出端倪。中國的魏源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並沒有改變其傳統思想的「中體」的部分，雖說必須接受西方長技，但堅信「器變道不變」的思想，最終仍無法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精神和工業文明。而日本的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則將其朱子學合理主義，加上西方經驗主義和重視試驗的精神，認識到研究自然科學的態度是指導所有學問的基礎。象山認為東洋道德與西洋文明可以相互調和，並不存在絕對的對立，儒學者應充分發揮這兩者的功效，以達到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是一種東西洋調和論，

既有別於鎖國論者，又不同於蘭學者的全盤西化。(伊原澤周，1999：60-61) 日本全盤西化的代表性人物福澤諭吉，就主張徹底背棄復古主義的舊傳統，走「脫亞入歐」的道路。自明治維新政府成立以後，日本就急速地轉向「文明開化」的新政策，改革各種陋俗弊政，採行西洋式的教育制度，獎勵洋學，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獎勵科學技術，廢除對基督教傳教的禁令，一時舉國上下都崇洋，建立一個純西方化的新國家。(羅榮渠，2013：178)

中日兩國在推動國家現代化初期，政治領域的改革，咸認為只有開明專制政體才能維持政局的穩定，方能集中全國力量投入現代化運動。明治維新伊始，大多數官員認為應該先從五誓言的「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行民主政治做起，大久保利通力排眾議認為「確立一個有權威的政府乃當務之急」。經派遣岩倉使節團前往西方實地考察後，認為「用俾斯麥的強權，締造英國式的富強」才是日本今後努力的目標。(參見姚傳德，1995：199-200) 由於兩國國情不同，大久保是在開明的基礎上追求專制政體，而李鴻章則是在既有的專制政體裡追求開明。至於經濟領域的產業發展方面，因應富國強兵政策的需要，兩國的近代工業差不多都是從官辦近代軍事工業開始的。清政府所採取的是以軍事為中心的產業政策，1860年代在自強的口號下創辦了一批「官督商辦」形式的軍事企業。推其因，滿清在「唯兵之為務」的思想指導下推動製造業的發展，而疏於基本工業之建設。又出於對財政和餉源至上等諸多考慮，強化官督商辦，嚴重影響洋務企業走向商辦企業，從而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相較之下，明治政府則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政策。儘管日本明治政府強調富國強兵，但是明治政府和伊藤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面的唯軍事的產業政策。雖然明治政府非常重視軍事工業的創辦，但同時也很注意各種基本工業部門和金融、外貿等各項近代經濟事業的建設，始終把「殖產興業」以發展近代經濟實力，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進而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的思想。(劉學照，1998：61-62)

滿清政府推動洋務運動，是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引進西方軍事科技，改良生產技術，以富國強兵。例如，在軍事上建立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號稱

世界排名第八的海軍，甲午戰爭卻不敵全盤西化有成的日本。看來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只在軍事與經濟上的圖強，似不足以完成國家現代化。

五、從兩國現代化被鑲嵌在社會係絡的差異來看

(一) 地理因素：中國的「東亞大國」vs日本的「極東小國」

至於中日兩國現代化主要成員與現代化本身被鑲嵌在社會脈絡方面，首先在地理因素而言，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也決定了開國的先後，西風東漸的走向先中國再日韓，中國首當其衝，也為日韓留下緩衝時間。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天朝上國的慘敗，震動了日本各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很多有識之士都迅速地意識到這場發生在鄰國的戰爭，與日本的未來命運息息相關，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在鴉片戰爭正在進行之際，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在寄給其心腹川路聖謨的信中就曾說過：「鴉片戰爭雖屬外國之事，亦即我國之鑒。關於浦賀防務之建議迄未作出決定，殊屬無狀」，除表示十分憂慮之外，更深深感到「唇亡齒寒，我國雖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時」。幕末大臣勝海舟也指出：「鄰國之事也是我國之鑒，歐洲的勢焰漸入東洋，有剝林以膚之誠。」水戶藩藩主德川齊昭本也認為：「最近謠傳清國戰爭，人心浮動。如果確有其事，則任何事，均可置諾不問，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於武備耳。鑒於清國戰爭情況，急應公布天下，推延日光參拜，以日光參拜經費為武備之用。」後來德川齊昭還在海防問題上書幕府，指出：「近來清朝鴉片煙之亂，乃前車之覆轍。」可見無論是幕府重臣與各藩藩主都從鴉片戰爭的硝煙戰火中，體會到英國等列強在亞洲的侵略活動，已直接威脅到日本的生存，必須隨時提高警惕，提防日本重蹈滿清政府慘敗的覆轍。(參見於桂芬，2003：103-104) 由於地理位置有中國在前，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與回應，尤其是天朝上國的戰敗乙節，足為日韓敲起警鐘，並爭取到更多回應的時間與前車之鑑。

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是一個擁有1,0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和4億人口的封建大國，相較之下的日本這個封建國家，則是一個只擁有大約4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萬人口的蕞爾小國。基於這些地理的因素，由於日本比中國的國土狹小，因而容

易受西洋的影響。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很容易就受到挑戰。賴世和教授就指出：中國有長江黃河等大河，可溯航進入內地，這成了它為何受外國勢力影響很大的理由。日本沒有可供大型輪船航行的河川，而且由於被本土山岳所覆蓋，它實際上是外國勢力很難滲入的環境。(賴世和著，王崧興譯，1963：18) 基於這些地理的因素，井上清教授也提出了一個重要論點：在經濟上與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上，雖然中日兩國並無階段上的差距，且就局部地區(如中國長江下游的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地區)而論，日本甚至遠不及中國。但從「全國平均密度」來看，則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顯然超過中國。首先在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進程和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因素對自然經濟的衝擊程度方面，日本領先中國。由於土地面積屬小國和島國的日本，由於有統一的貨幣與度量衡，由於有較為發達的交通，乃至於國內統一市場條件較中國為高，商品貨幣經濟更易擴散、滲透到廣大農村地區。其次就城市工商業中心的意義而言，日本也超過中國。日本新興工商業城鎮典型如：桐生、足利，從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的百年間，人口從千人增加至四五千人，而我國晚明時期的蘇、滬、杭等地區曾湧現數十個新的工商市鎮，大者人口逾萬，小者亦五六千，豪不遜色。但從全國來看，19世紀日本城市人口在全國比重相當可觀，而且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趨勢也甚為強大。幕末時期的史料記載，「無論在哪裡，農家生長的人民，都羨慕町人的榮華，一有機會就投身商業」，有助於各地經濟比較均衡的發展。井上清教授「密度」的看法，意味著儘管就局部地區而論中國佔有某種優勢，但從全國範圍來看，絕大部分地區處在封閉落後狀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本上未受到觸動。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封建的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制政權儘管到19世紀中葉已十分腐敗，這個腐敗的龐然大物卻可以從全國廣大地區的閉塞和落後狀態中吸收取之不盡的力量，來遏制局部先進地區資本主義新經濟因素的發展，似可以說明中日兩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發展與現代化的差異。(參見何芳川，1988：23-24) 這與奧唐納(Guillermo A. O'Donnell)在《現代化和官僚威權主義：南美政治研究》一書中，指稱以「均數」為基礎，來比較巴西這樣一個存在邊緣地區與現代地區落差的國家，以及阿根廷

這樣一個沒有邊緣地區與現代地區落差的國家，會導致對這兩個國家的所得均數的認知和推論偏差的說法，似有異曲同工之妙。(cf. O'Donnell, 1988:16-26) 也就是說中國幅員廣大與人口眾多，有明顯中心與邊陲的現象，發展領先的地區常會被全國落後的表現稀釋，容易產生分析和推論的偏差。

陳景彥教授在比較中日兩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從時間上中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產生較晚，兩者至少相差一個多世紀。出現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在中國土地廣袤，自然資源豐富，易使人產生安全感。馮桂芬在《制洋器議》中就說過：「我中華幅員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美)，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內，日用百須，無求於他國而自足者，獨有一中華。」這種安全感極大程度遏制危機意識的產生，而日本國土狹小，自然資源貧乏，使人們極易產生危機意識。佐久間象山在關於攘夷策略給藩主的建議書中則說：「本邦面積，以德意志里法量之，不滿一萬方里。即如所述，遠不及五大洲二百分之一。即便本邦盡為膏腴之地，外國過半為不毛之地，猶如一比一百，此乃鄒楚之懸隔也」。這種深刻的危機意識，是比較自覺地認識到日本小國的風險，它不僅成為其認識西方、學習西方的動力，也增長日本對西方的探索熱情。(陳景彥，2006：164) 梁啟超在20世紀初，就曾指出：「日本乃小國，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他界之文化傳人，則趨之若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亦與之俱化矣；中國則不然，中國既是大國，又有數千年相傳之固有之學，壁壘森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轉引自田毅鵬，2005：133) 此外，西方勢力東漸的形勢已經十分明朗，但士大夫對「中國中心論」的地理世界觀仍深信不疑，他們仍認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濱海而居者，俱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言邊也。」1793年英國馬夏爾尼使節團浮海東來，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驚奇地發現：「中國士大夫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中華，他們的書上很少提到亞洲以外的地區。甚至在他們畫的亂七八糟的地圖上，也找不到亞洲以外的地方」。「中國的天文學家和航海家們始終未能超脫人類原始的粗糙觀念，總認為地球是一塊平面，他們認為中國位置在這塊平面的中心，因此他們自稱為『中華』，而其他各國在他們眼光中都比較小，

而且還在地球的邊緣。」(于桂芬，2003：92) 隱含著一種中心國文明的驕傲與自信，相較之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自然比較難產生。

(二)經濟因素：中國的「地主制的重農抑商」vs 日本的「領主制的農商並重」

由於工業革命致使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際交通的發展，國際貿易成為19中葉工業化領先國家必須面對的議題。居於工業化領先群的英國、法國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為日益膨脹的生產力尋找新市場，加劇了彼此之間在商業上的競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即指出隨著資本主義而起的，會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為舞台而展開的商戰。(轉引自汪岳波，2000:1203) 為商戰求勝以持續產業發展，與宣揚帝國榮光，英、法等工業先進國家競相舉辦世博會，在全球資源的掌握與海外市場的爭奪方面，更是排山倒海的奔襲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等國家，開啟19世紀英、法、荷、美等歐美國家將殖民的注意力轉到舊世界，尤其是南非、印度、東南亞、東北亞等區域的國家。

中日兩國自19世紀伊始，具有都被歐美列強要求開國的歷史共同性，並在政治經濟的半獨立與半從屬狀態中，力圖「富國強兵」追求國家現代化。然而，這一走向近代化和對外自立的過程中，日本進展很快，但中國卻緩慢，有些學者從當時強加於兩國的政經和軍事「外壓」的不同，做為兩國差異的主要原因，日本學者芝原拓自認為這沒有多少根據，主要是兩國面對「外壓」的對策本身，決定其間的差異。(芝原拓自，1986)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對「外壓」的情況下，基本上國家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和體制根本沒有改變，直到20世紀初，在新政的改革中，漸採重商政策，獎勵農工發展。(劉偉，1997：42) 在近代中國的產業結構，農業產值的比重一直占壓倒優勢，1880年代農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高達66%，傳統工業產值比重僅為7%，近代工業產值比重則可忽略不計。1936年的國民總產值中農業產值比重仍占62%，近代工業產值僅占5%，這說明1949年以前的中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代化程度仍非常之低。(馬敏，1997：101)

何以近代中國的工業發展緩慢，而仍以傳統的農業為主？可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出版的《農業的內卷化：印尼生態變遷的過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當中「農業的內卷化」²⁰的概念來做解釋，滿清中國由於缺乏資本與人口的增長，使得土地數量有限，加之「重農抑商」的政策，致使勞動力不斷填充到有限的農田水稻生產之中，沒有生產率的提高，且以生活水準、日平均報酬率的下降作為代價，換得溫飽與封建社會穩定的一種增長模式，黃宗智教授給了一個新名詞「過密化」的發展。(孫建國、村上直樹、陳文舉，2013：22-23) 顯然中國前近代社會經濟發展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並沒有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這其中主要在於中國人口的增加、土地制度及重農抑商的關係。中國在近代工業的發展進程落後日本方面，其實中日兩國在起步階段有共同點，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直接刺激和影響下，首先建立近代軍事工業；近代生產技術、機器設備和原材料開始時都來自西方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途徑，以政府投資為主等。從結局來看，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任務，而滿清中國根本未能實現工業化。造成這種差異的因素：(1)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對封建政治、經濟制度進行了根本性變革，為工業化創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國洋務運動不僅沒有觸動反而維護了封建制度，從根本上制約了工業化的進程。(2)明治政府從以官辦工業為中心轉向大力扶持民間工業，而滿清洋務派卻始終對民間工業加以控制乃至壓制。(3)明治政府採用西方近代經濟制度和經營管理方法，而洋務派卻拒絕採用西方近代經濟制度，將衙門作風帶入企業經營管理。(4)日本只借助不依賴的方式引進西方技術，而洋務派始終沒有擺脫對洋人的依賴。(孫建國、村上直樹、陳文舉，2013：15-16)

²⁰ 「農業內卷化」的概念，Clifford Geertz用在實地研究印尼爪哇島和外島之間存在著二元發展型態，外島借助於技術的一些地區的生產越來越向資本密集型方向發展；而爪哇島的一些地方則不斷地向勞動密集型方向發展。爪哇島聚集了印尼2/3的人口，主要從事糧食生產和小型手工業，爪哇人由於缺乏資本，土地數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礙，無法將農業向外延擴展，致使勞動力不斷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沒有生產率的提高，且以生活水準、日平均報酬率的下降為代價的一種增長模式，黃宗智教授給了一個新名詞「過密化」的發展。(參見孫建國、村上直樹、陳文舉，2013：22)

此外，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指出：中國的歷史發展長期以來都是漸進性變革與突發性變革相結合，帶有自己的獨特性，形成一種中國式的「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 模式。這種中國式發展模式的經濟基礎，是一種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穩定結構，而政治基礎則是中央集權制的官僚帝國。經濟的增長、人口的繁衍、技術的進步、文化的繁榮與傳播，都在這一循環模式中緩慢地進行，使中國歷史與文明在總體上形成長期連續性的發展，文化積累層之豐厚舉世無雙，因此能在前現代時期長期保持世界的領先地位。到了19世紀中葉，當西方工業革命以雷霆之勢推動其世界征服運動，中國內部也開始出現王朝統治危機之時，內因和外因達到一個交會點，開始逐漸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轉向。西方殖民主義入侵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外族入侵，而是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擴張。由於這一全新的外因介入，中國被捲入世界發展的大潮之中，出現數千年來前所未有之大變局。西方資本主義東來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為了進入廣大的中國市場，中西衝突的焦點自然是中國傳統朝貢貿易制度與西方自由貿易制度的對抗。清政府一開始就對西方的貿易衝擊採取退縮與封閉政策，自行放棄在南洋開拓的許多貿易據點，壓縮西方與中國貿易的口岸，將澳門、漳州、寧波、雲臺山四口貿易改為廣州一口貿易。當時朝野普遍認為茶葉、大黃能扼制外人生存命脈，如林則徐等有識之士也持這一觀點，因此每當中外衝突發生，便威脅停止與西方商人的貿易，或將貿易從甲國轉讓給乙國，作為逼使外夷就範的手段，這就是所謂「以商制夷」的政策。中國應對西方強權要求開放門戶通商的失誤，固然是由於對世界大勢的盲然無知，但更深層的原因則在於中國式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發展體系的穩固性，以及在政治上以重農抑商作為穩定社會秩序、防止民間力量增長的傳統政策。這就是中國古典農業時代的政治經濟學。這一套政治經濟體制的牢固性並不僅僅在於制度本身，還在於它得到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悠久深厚的儒家文化系統的支援與增強，中國自給自足的發展體系就牢不可破，與金觀濤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有異曲同工之妙。(羅榮渠，2013：196-197，205-206；金觀濤、劉青峯，1987)

相對的，日本鑒於封建幕府遺留下來的經濟基礎甚為落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很不成熟，明治政府為了抗「外壓」，亟思在日本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以「富國強兵」。於1868年4月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公佈《五條誓文》的施政綱領，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統一國家，表明了近代化的方向。(王銘，1997：85)不久制定了一項移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殖產興業」政策，運用國家政府的力量，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和動用國庫資金，來加緊推行資本積累，並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大力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明治維新後所推行的「殖產興業」和20世紀初年的產業革命高潮，日本已一躍而變為亞洲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了全面的發展。1886年的日本全國僅有各類公司(會社)1,794個，1899年則達7,631個，1909年更高達11,549個。1886年的日本全國工廠數為874家，1900年已增至6,992家。從農業與工業比例關係演變看，在「殖產興業」初期，農業一直占有絕對大的比重，隨著工業的發展，其比重逐漸下降。大體到1910年，工業和農業拉平，以後雙方的位置便顛倒過來。在貿易結構上，到1900年前後，日本逐步擺脫了半殖民地的貿易結構，開始形成既依附歐美列強，又對亞洲實行掠奪擴張的新貿易結構。(馬敏，1996：134-135)

土地所有權制度的不同，影響封建制度的穩固與否，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快慢。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丁日初與杜詢誠對中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與日本領主土地所有制的差異，討論過這對兩個國家封建制度的穩固，以及是否容易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影響。中國自秦漢以後，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制，而日本則與西歐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相近，採行領主制。在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所以當官的往往廣置田產，大肆兼併。中國封建官僚的經濟利益是與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緊緊扣在一起，只要這種制度得以維繫，當官的經濟利益有著充分的保障，相對地有個較為穩固的保守封建社會。為維護與增強地主制經濟體制中統治階級與封建官僚的利益，政府通常採取「重農抑末」(重農抑商)的傳統政策，通過專賣把主要的工商業控在手中，再用移徙、拔富等作法讓商人無法累積財富。又因為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商人只有把賺來的金錢買地成為地主，確保其經濟上積累的

財富，這些對商業資本的累積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十分不利。相對的，在日本的領主制，領主的土地不能買賣和分割，並實行長子繼承制度。相對的日本土地兼併的情形較為和緩。日本的幾百個諸侯(大名)領有大小不等的土地，以農民的租稅作為各藩的財政收入，旗本和下級武士則領有一定數量的祿米。正因為武士的祿米收入相對固定，所以在幕末商品和貨幣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利益就會受到嚴重影響。日本的下級武士和一部分公卿在幕末封建社會發生動盪的時刻，他們的經濟地位日趨惡化，常常朝不保夕，甚至淪為無主浪人。封建社會的繼續維持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好處，很自然他們就有可能從封建陣營中分化出來，成為改革或革命的力量。總之，由於地主制與領主制的不同，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從中國的官僚地主中不容易分化出同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離的社會力量，而在日本卻比較早地產生了這種社會力量。中國的商人完全是受封建勢力控制的，而日本的富商在社會生活中卻有很大的影響力，且隨著社會條件的改變，能夠迅速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變化。中日兩國的地主制與領主制的不同，對兩國現代化進程有其影響力。(參見丁日初、杜詢誠，1983：38-40) 李少軍教授亦贊同這樣的說法，認為中國商人常因買地成為地主，對商業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業不是處於封建勢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旦社會條件發生改變，就能迅速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更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別，使日本幕藩領主恣意榨取剝削小農的情形，略遜於中國的封建地主及統治階級，日本「農民剩餘」的形成要比中國容易，更有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李少軍，2001：269)

中日兩國儘管土地所有權制度不同，但都是以自然經濟為主，農民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聯繫在一起，不過這兩國自然經濟的這種結合在範圍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一直是鼓勵農民男耕女織，加上農民的貧困，中國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得特別緊密，這種不計成本的農民家庭手工業，曾對大工業產品提出非常頑強的抵抗，這對於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構成重大的阻力。而在日本幕府與某些大名對於農民家庭手工業的政策是不一樣的，幕府力阻新的

農作物和農民家庭手工業(紡紗、織布等)的推廣，它認為稻米才是最重要的產品，而一切家庭手工業都會使農民脫離他們的主要生產活動(種田)，造成人員流動影響到封建社會結構的穩定。但某些大名為了追求更多的收入，鼓勵農民種植新作物。因為這些新作物是農業家庭手工業的基礎，並可以擴大向農民收租。日本私營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中最發達的行業就是棉織業。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除了大阪地區外，尾西地區、京都的西陣、桐生市和足利市都是日本私營資本主義工廠織布業的中心。總之，由於地主制與領主制的不同，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從中國的官僚地主中不容易分化出同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離的社會力量，而在日本卻比較早地產生了這種社會力量，中日兩國由於地主制與領主制的不同，影響到兩國的現代化進程。(丁日初、杜詢誠，1983：41-42)

(三)政治因素：中國的「中央集權制」vs 日本的「幕藩封建制」

同地主制與領主制這兩種不同的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態相對應的是中央集權制與幕藩封建制這兩種不同的政體。在滿清中國的中央集權政體中，歷代皇帝都是絕對權力的化身，運用其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統治臣民。君權至上且一切事務由皇帝獨斷專行是封建專制政體的基本特徵，皇帝的決定，各級官吏必須服從，任何政治集團或政治派別都難以脫離君權獨立發展，改革勢力更是如此。洋務派的地方大員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也是在一片忠心想保住清朝封建專制政權，他們的主張才有可能得到皇帝的批准，在自己管轄地區推行洋務新政，由國外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一批洋務企業。

反觀日本幕府時期的政體同滿清中國迥異，日本的大名(諸侯)，特別是外樣大名²¹，有半獨立於德川幕府治理自己領地的權力。大名在自己領地對所轄臣民有行政權和司法權，大名指揮領取祿米的武士，治理在領地內種地和繳納實物地租的

²¹ 「外樣大名」是指在德川家康於1600年「關原之戰」擊敗石田三成的後才歸順於德川家的大名，包括長州的毛利氏、薩摩的島津氏、加賀藩的前田氏、仙台藩的伊達氏等實力堅強的雄藩大名在內，稱之為「外樣大名」，用以區別于在關原之戰前就同家康站在一起，並為德川氏世襲家臣的「譜代大名」。

農民。德川幕府的將軍大人本身也只是一個最大的大名而已。幕府固然有統轄諸大名之權，然而這種權力的至高性遠遜於清朝皇帝。正因為諸藩有相對的獨立性，所以如長州、薩摩等藩能夠違背幕府的旨意，使藩政改革朝不同的方向發展。長州藩在代表下級武士利益的村田清風主持下，獎勵人們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和軍事技術，甚至出洋留學，在經濟上扶持商人和地主，破格拔擢人材等等。薩摩藩除採取措施改善該藩的財政外，在軍事技術方面，特別是海軍方面採取了西方的新技術，並相應地獎勵了西學。肥前藩除採取措施殖產興業外，積極向西方學習軍事，特別是海軍方面的現代技術，所製造的洋槍，在當時的日本最為先進。美國培理艦隊叩關以後，在安政年間(1854-1860年)，幕府不得不進行「安政改革」水戶、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藩也競相採用洋式軍備和學習西方自然科學。要不是諸藩原來就有相對獨立性，這種同中央政府相抵觸或培植自身實力的藩政改革是不可能存在，即使發生也不可能獲得成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1863年長州藩的高杉晉作在藩主的同意和支援下，組織了一支後來威振日本的維新中堅份子，如井上馨、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大批維新志士，為打倒幕府作了準備。總之，幕府的力量並不太大，大名有相對獨立性，使得幾個強藩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低層次藩政改革，造就一批改革派，由他們把低層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層次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參見丁日初、杜詢誠，1983：42-44)

賴世和教授亦認為：德川時代安定的地方分權封建社會，比起中國完全統一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對經濟成長的促進更有貢獻。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化落後的癥結在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假如對政府有利的新事業興起，就課予重稅，變成國家的獨佔事業，便扼殺民間的企業。日本雖也有類似的事例，其程度遠不及中國的全面。再者，武士階級輕蔑商業行為的態度，也都比中國中央集權制度對私人企業經濟的妨害來得輕微。因此，儘管兩國都在封建制度下，但十八、十九世紀後，日本的經濟組織已超過中國。換句話說，日本並沒有像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強力政權，而是封建地域性政治集團諸侯割據，對外反應富有多樣性。(參見賴世和著，王崧興譯，1963：20) 李少軍教授的研究亦指出中央集權與幕藩分權所造就有無政

治權力制衡關係，以及是否促發競爭方面做了兩國現代化時間差異的探討。在日本幕藩體制內部，存在著多種制衡的機制，且促發競爭，各藩因競爭而重視教育，任用人才，興辦實業，採用新式武器，到幕末進而爭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質，當外部危機到來時，就能很快出現轉機。但近代中國的專制集權幾乎沒有存在反向的制衡力量，結果只能造就內部保守與改革對立的兩極，貽誤現代化的契機。北京師範大學馬家駿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湯重南兩位教授合著的《日中近代化比較》，從滿清中國與幕府日本的政治制度穩定性差異來看現代化的快慢。日本實行世襲門閥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級武士不能進入高層，促使幕末下級武士走向與舊政治制度決裂，為倒幕維新創造有利條件；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則將全國各地、各族的地主和土地權力、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位一體的代表人物、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人才都吸收到中央政府來，鞏固了專制統治，統治者成功利用科舉制度箝制眾多讀書人的思想，讓維新求變門檻升高。(參見李少軍，2001：264)

(四) 社會因素：中國的「戰亂頻仍」vs 日本的「戰亂可數」

在鴉片戰爭後至滿清覆亡這70餘年間，中國發生的天然災害、社會動亂、內亂及對外戰爭，嚴重挑戰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國家主權與統一遭到破壞，社會秩序混亂，大量資源耗費，這些都是世界其他國家處在同一歷史轉型時期所罕見。尤其近代中國戰爭與內亂不斷，國家現代化一直缺少平穩發展的環境，只有在戰亂與戰後復原的艱苦環境中緩慢發展。道光年間的1840年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滿清戰敗，與英國簽下南京條約，割地賠款與開通商口岸。咸豐年間的1856年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滿清又被英法聯軍打敗，簽下北京條約，賠款與開通商口岸。接續發生中法戰爭(1883~1885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年)、八國聯軍(1900~1901年)，一再上演簽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及開通商口岸等戲碼。不只是民族自尊心的嚴重傷害，對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都造成重大衝擊，更讓人在意的是，近代中國償付的戰爭賠款總值究竟有多少？

據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人員相瑞花的整理，說法有七、八種之多。其中數值最

高者為銀19.53億兩，最低者也有10餘億兩之譜，而被史學界廣泛採用者將近13億兩。在滿清近代對外戰爭史上，中國償付的賠款舉其要者有：(1)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中英《南京條約》中規定的鴉片煙價6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軍費1,200萬銀元。(2)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關平銀1,600萬兩，含中英《北京條約》中規定的英軍軍費銀600萬兩、商虧銀200萬兩，及中法《北京條約》中規定的法軍軍費銀700萬兩、商虧及撫恤費銀100萬兩。(3)1895年甲午戰爭賠款庫平銀23,150萬兩，含中日《馬關條約》中規定的軍費2億兩、威海衛駐軍費150萬兩，《遼南條約》中規定的贖遼費用3,000萬兩。(4)1901年庚子賠款，含《辛丑各國和約》中規定的償付諸國賠款關平銀4.5億兩。巨額戰爭賠款、外債以及戰爭期間的軍費是三宗最大的支出，猶如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枷鎖，給中國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和嚴重的災難，大大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社會進步，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進程。

據記載，道光時期(1820-1850年)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4,000萬兩。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約占該額的37%。在償付賠款的過程中，清政府一方面大量動用關稅收入，一方面加重地丁漕賦、鹽課、兵餉和商捐等的徵收科派，致使本該應用於自身發展的大筆款項被索賠國掠走。但壞在這一時期清政府尚能做到收支平衡，賠款對財政經濟的影響還不顯著，遲緩了痛定思痛的改革。甲午戰爭賠款在中國財政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近代中國的財政經濟自此一蹶不振。當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清政府為籌集戰時軍費，先後兩次向英國滙豐銀行借債，共計庫平銀28,65萬兩，這兩筆債款直到1914年才還清。甲午戰後，財政已十分拮据的清政府在短期內根本無力籌集和支付超過當時年財政收入3倍的戰爭賠款，萬般無奈只好借債償還。1901年《辛丑各國和約》簽署之時，清政府因甲午戰爭舉借的外債遠未還清。這一年償付的債款本息即達庫平銀2,059萬兩。加上八國聯軍之役中支付的軍費，清政府已是不堪重負。而庚子賠款又比甲午戰爭賠款增加了近1倍，相當於清政府4年以上的財政收入。庚子賠款是列強對中國最大的一次勒索，滿清政府的財政經濟陷入全面崩潰。(相瑞花，1999) 近代中國對外賠款這一特殊的歷史現象，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華野蠻掠奪的結果。它對近代中國領土、行政、海關、

財政、教育等主權，都產生過極其重大的影響，它既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後，也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進程。(參見潘家德、劉開清，1999)

在鴉片戰爭後的70年間，發生過苗民、回民、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等五次社會大動亂，其中太平天國內戰歷時14年，長期的戰爭對江南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造成巨大破壞，使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人口在一個世紀後還未能復原到原有的水平。(羅榮渠，1994：8) 大陸學者彭澤益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一書指出：太平天國之亂的20年內戰中，軍費龐大造成清政府財政空前危機，自1852年到1862年的戶部銀庫收支情況來看，有六年都是虧空短少，1853年更虧了403萬兩白銀。為了擺脫財政困境，不惜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強取豪奪人民財富，以至整個經濟更加惡化，社會更加不安，國民革命勢所難免。(彭澤益，1983：138-145) 在戰亂頻仍所造成的社會動盪與財政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很難騰出手來與籌措經費推動國家現代化。

日本在明治時期，相對於中國享受了多年的國家統一與安定和平，只在1868年大政奉還時發生「戊辰戰爭」(1868-1869)，以及明治維新推行「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及「廢除封建階級身分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影響到封建士族(武士)的利益，引起士族叛亂，1877年爆發「西南戰爭」，在叛軍首領西鄉隆盛中彈自殺後，結束了日本歷史上最後一次內戰。至於明治時期的對外戰爭有三次，依序為1894~1895年的「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1900~1901年的參與「八國聯軍」，以及1904~1905年的「日露戰爭」(日俄戰爭)，幸運的是三次都獲勝，為日本贏得巨大利益。而諷刺的是三次戰爭的戰場都在中國，造成滿清國家威信與人民財產生命極大的損傷。兩相比較，中國滿清末年與日本明治時期的60年當中，中國有將近20年身陷戰亂，而日本只有2年多的內戰與2年多的出兵海外，相對安定與賺得戰爭財，相較之下會有更多的資源與更好的環境推動國家現代化。

(五) 文化因素：中國的「自負排他」vs 日本的「擇優攝取」

殷海光在〈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專文指出：中國的現代化的問題在基本上就是

一個從古老文化過渡到現代文化的問題。中國文化意識是崇古、拒變、輕外而又自足。中國文化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刷除這些觀念，而採取好新、迎變、明外、並且自覺到不足而有向外人學習的必要。(殷海光，1990：35) 東亞史的美國權威學者賴世和有關日本與中國近代化差異的研究，也強調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指出「要說明19世紀日本與中國兩國之間近代化速度的差異，過去的解釋並不全，不太令人滿意。因此，非得闡明其社會構造、思想、價值觀等因素不可。當考察思想、價值觀等這類無形的文化因素時，兩國之間差異點也就可一一辨明。」(賴世和著，王崧興譯，1963：18)

19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在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下，日本成功發展成為獨立工業國家，中國則喪權辱國，走上次殖民地的悲慘境地，這兩種不同的際遇，正說明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夠成功應付外來的挑戰，取決於外來挑戰的性質和強度，更取決於被挑戰的主體本身內在結構的牢固性，以及應付外來挑戰的手段與能力。相對於日本，中國具有很高的內部結構穩定性和牢固性，自秦一統天下以後，就一直保持大陸帝國的統一發展格局，其中的改朝換代只是帝國的被打破和再修復。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華夏文明，與大一統的農業帝國格局相結合，加強了中國傳統歷史格局的牢固性，而且華夏文明長久以來都是向外輻射，外來的挑戰和威脅最終都在文化上同化於中國，中國兩千年的傳統社會文化結構，形成特有的穩定性和牢固性。也就是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中的主張：中國在戰國時期後期，秦始皇一統天下形成絕對君主制之後，進入超穩定結構持續到清朝末年為止。究其因在農民經濟、官僚政體和儒家思想三個子系統緊密結合，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超穩定結構。(金觀濤、劉青峯，1987) 也由於中國兩千年傳統文化結構特有的穩定性和牢固性，形成文化的自負與排他，很難把外來的文化看在眼裡而擇優攝取。

文史學家郭沫若就曾提出這樣的看法：中國古代文化歷史太久，太光輝燦爛，往往視歐美為夷狄，對於新文化、科學知識不易接受，這在變革時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而日本傳統文化的負擔沒有中國重，易於學習外來文化，所以走得較快。

(李少軍，2001：283) 日本學者井上清也表達過類似的見解：「中國在幾千年的長時期內，就東方和東方人所知道的範圍來說，實際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國人當然會以中華自豪，對於近代西洋文化，不容易虛心學習。與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曾吸取朝鮮、中國及印度文化，來培養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國文化與認識其價值方面，不受中國人那樣的歷史的限制。」(丁日初、杜詢誠，1983：45)

就田毅鵬、王曉秋等教授的研究，在文化世界觀方面，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民族文化水準參差不齊，早在秦朝統一六國之前，在中原黃河流域即形成早期華夏文化，居於中土文明的中心地位，而周邊諸民族則處於相對落後，使中國古代先民就形成華夷思想，有「華尊夷卑」之說，咸認為在周邊民族是落後野蠻的民族，稱之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華夷體制內，中國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夷狄定期向中國朝貢，中國則有教化恩典蠻夷的義務，形成朝貢體制。由於華夷觀念的影響，加之以華夏文明長時間領先周邊諸民族與國家，久而久之使中國士大夫認為中國文化乃天下之最，養成了一種強烈的文化自負。日本自古以來有向外國學習的歷史傳統，古代著重學習中國文化，近代以來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並能與自己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因此，明治維新推行文明開化政策，阻力較小，成效顯著。另外，日本歷來提倡武士精神，崇實而不尚虛浮的義理空談，這種精神有利於變法改革。而中國是文明古國，知識份子往往背負中華文化優越感的包袱，攝取外國文化常常遭到很大阻力。不少人還崇古好古託古，相信祖宗之法不可變，有違祖制的事萬萬不可。加上長期以來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科舉八股制度限制知識份子的創新改革，喜歡脫離實際的空談，這些都對維新改革很不利。(參見王曉秋，1998：45；田毅鵬，1996：46)

羅榮渠教授認為：自居於萬國之上的「天下國家」觀與「夷夏之防」的儒家理論，中國自給自足發展體系的核心價值觀，一直成為支配從中國統治者到普通人的思維模式。在這方面，早期東來的耶穌會打開進入中國大門傳教的方法，先自我「中國化」，然後再使中國人基督教化，其中的佼佼者利瑪竇，雖為迎合「中國

中心」意識，獻給明朝皇帝的地圖，把中國的位置安排在中心，在其中國札記也大大批評中國人的「天下國家」觀念：

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參見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2010：181，94-95)

如果從1842年魏源的《海國圖志》算起的話，中國人重新認識西方和外部世界也早於日本，並對日本學習西方發生過啟蒙影響。但中國知識份子背著沉重的傳統儒學包袱，去認識西洋技術。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優越感，使得當時的中國人對西方科技產生種種歪曲的認識。1866年被派遣出使歐洲的第一個清廷官員斌椿，在法國首次見到自行車，視為中國古代「木牛流馬之遺意」。御史魏睦庭把歐洲的武器技術說成是元代西傳火藥後引起的「奇巧百出」。洋務派領導人奕訢認為西方的天文算學「實本於中術之天元」，由此形成一套「西學源出於中學」的說法。附和此說的人還包括著名的維新派人士馮桂芬、曾紀澤、郭嵩燾、鄭觀應、薛福成、黃遵憲等人。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把外來文化加以中國化，納入中國固有的思維模式之中，以保持中國文化特有的穩定性和牢固性，嚴重地阻礙中國人去認識未知的新事物和新世界，也成為推動現代化起步的沉重精神束縛。(羅榮渠，2013：217)

王曉秋教授亦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才不得不規定將「夷人」稱「洋人」，「夷務」稱「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意識的轉變。中外關係不再是天朝對夷狄，而是中國對列強的關係。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艱難的開端，一方面是中國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阻撓。保守勢力攻擊外國先進技術為奇技淫巧，製造輪船為形同虛耗，開礦修路則破壞風水，興辦學校是敗壞人心，留學外國是以夷變夏。另一方面中國洋務意識的指導思想

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價值體系，只能在儒教封建綱常與君主專制的「中體」不可變的前提下，學習引進西方軍事、工業、科技、文教等「西用」，而為減少學習西方的阻力，還宣傳「西學中源論」，竟說西學實際上都源自中國古代聖人諸子的經典，學習西學不過是「禮失求諸於野」的自我安慰，這也是為滿足華夷思想僅剩丁點自大心理的欺人言論。(王曉秋，2012：56)

相較之下，日本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是全方位學習西方，從「和魂洋才」到「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明治政府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把日本建設成一個能夠和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可以看到日本自古以來就有學習外來文化的傳統，最早是學中國，那時學得很全面，唐朝時派遣唐使，把中國的制度、法律、文學、藝術都學過去。最初學習中國的時候，叫做「和魂漢才」，「漢」就是中國，「和」就是日本大和民族，也就是說靈魂還是日本的，但其他各方面都學習中國。(王曉秋，2012：37) 那「和魂洋才」、「和魂漢才」是不是跟中國「中體西用」是一樣的嗎？一說「中體西用」強調儒家的綱常名教，強調政治體制的不可替代、不可動搖；而「和魂洋才」並沒有強調傳統不可變易，而是強調東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容並蓄的意味。在兩種價值體系的差異，中國是被迫引進西方文化，日本則是主動積極引進吸收西方文化。洋務運動只局限於引進西方器物層面，明治維新則能兼取西方文化各個層面之長。也有研究認為「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兩者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華夷思想」。「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而「中體西用」在中國卻遭到失敗，主要應從國家政權、社會經濟條件方面去找原因。(李少軍，2001：288-289)

表4-8 從中日參與世博會事業比較兩國現代化差異

	中 國	日 本
地理因素	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與國家大小決定了開國的先後，西風東漸先走向中國，首當其衝。中國土地廣袤，自然資源豐富，易使人產生安全感，相較之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產生自然比較困難。	日韓地理位置與國家大小在中國之後，也為日韓留下緩衝時間。1840年鴉片戰爭，天朝上國的慘敗，震動了日本各界，有識之士迅速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經濟因素	<p>中國滿清的地主制，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從中國的官僚地主中不容易分化出同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離的社會力量，延緩了現代化進程。</p> <p>在於中國的小農經濟與自給自足體系的穩固性，以及在政治上以重農抑商作為穩定社會秩序、防止民間力量增長的傳統政策、儒家文化系統的支持與增強，形成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p>	<p>日本幕府的領主制，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先產生從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離的社會力量，加速日本現代化進程。</p> <p>某些大名為了追求更多的收入，鼓勵農民種植新作物。因為這些新作物帶動農業家庭手工業，手工業中最發達的行業就是棉織業。</p>
政治因素	<p>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君權至上且一切事務由皇帝獨斷專行，皇帝的決定，各級官吏必須服從，任何政治集團或政治派別都難以脫離君權獨立發展。</p>	<p>日本的「幕藩封建制」，大名在自己領地對所轄臣民有行政權和司法權，大名指揮領取祿米的武士，治理在領地內種地和繳納實物地租的農民。正因為諸藩有相對的獨立性，改革才比較可能。</p> <p>賴世和教授認為德川時代安定的地方分權的封建社會，比起中國完全統一全國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對促進經濟成長更有貢獻。</p>
社會因素	<p>中國的「戰亂頻仍」，在鴉片戰爭後至滿清覆亡這 70 餘年間，中國發生的天然災害、社會動亂、內亂及對外戰爭，造成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的嚴重挑戰。近代中國償付的戰爭賠款總值，被史學界廣泛採用者將近 13 億兩。</p>	<p>日本的「戰亂可數」，明治時期的「戊辰戰爭」(1868-1869)，1877 年的「西南戰爭」，至於戰爭有三次，依序日清戰爭、八國聯軍，以及日俄戰爭，幸運的是三次都獲勝，為日本贏得巨大利益，為推動國家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p>
文化因素	<p>中國文化意識是崇古、拒變、輕外而又自足，滿清堅守「中體西用」強調儒家的綱常名教，強調政治體制的不可替代、不可動搖。</p> <p>中國是文明古國，知識份子往往背負中華文化優越感的包袱，攝取外國文化常常遭到很大阻力。不少人還崇古好古託古，相信祖宗之法不可變，有違祖制的事萬萬不可。</p> <p>加上長期以來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科舉八股制度限制知識份子的創新改革，喜歡脫離實際的空談，這些都對維新改革很不利。</p>	<p>日本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是全方位學習西方，從「和魂洋才」到「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明治政府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把日本建設成一個能夠和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和魂洋才」並沒有強調傳統不可變易，而是強調東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容並蓄的意味。</p> <p>日本歷來提倡武士精神，崇實而不尚虛浮的義理空談，這種精神對變法改革也是有利的。</p>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五章 結論

中國與日本早在1866年就接到法國邀請參加1867年在巴黎舉行的世博會，日本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搪塞，並未組團，到了1873年方由海關洋員組團參加奧國的「維也納世博會」。另日本明治政府於1877~1907年間共舉辦六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而中國卻遠落後30多年，於1910年方首度舉辦等同規格的「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彼此間博覽會事業發展的延誤落差？由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且深度尚淺，有關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興衰研究，僅見金普森、林芳、謝輝三位合力完成的兩篇專文，主要論點在政府信用不佳、財政困難、政局動盪等原因；以及劉健在《博覽勸業：世博會與近代中國博覽會》專書中有一小節，從政局動盪、實力羸弱、人員素質等三個面向阻礙博覽會事業發展的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及文化因素，來討論造成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發展遲緩並走向衰落。(金普森、謝輝：2004；林芳、謝輝：2005；劉健，2010：165-172)

另1860年代的中日兩國同受歐美帝國主義的衝擊，分別以「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進行早期現代化。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滿清簽署馬關條約，結束中日甲午戰爭，也終結了中國洋務運動，代之而起的戊戌變法與立憲運動的再次現代化改革，由於成效不彰，終至滿清皇朝的覆亡，標示著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挫敗與富國強兵的現代化成效落後於日本。兩國現代化的成敗曾激起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注與討論，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國際背景下，兩國現代化的命運何以如此不同？田毅鵬教授總結百年來學術界主要圍繞著中日現代化的起點，社會精英、社會結構與現代化之間關係等議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李少軍教授則指出學者專家多從兩國近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諸多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參見田毅鵬，2001；李少軍，2001) 蔡文輝教授指出有關於中國現代化落後的研究，大多限於中國社會系統中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事實上，不乏關於宗教、家庭結構、政治組織和法制系統的小型理論，可惜無法使我們對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成敗有一整體的解釋。(蔡文輝，1980：440) 我們需要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全面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

一、研究心得

本論文以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分析，做為綜論現代化落差的案例樣本，並以歷程分析法，除了要分析影響博覽會事業的主辦者、參展者及參觀者這三個關鍵活動成員，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還要掌握關鍵活動成員和博覽會引進過程是被鑲嵌在社會脈絡，一些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因素不容忽視。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進而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一) 世博會的定義與隱含的幾個意義

所以選擇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做為案例，在於歐美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所舉辦的世博會，其中隱含著幾個舉辦世博會的意義：(1)是宣揚帝國主義殖民正當性的手段，(2)是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3)是國家現代化的一面鏡子。誠如趙致真在《造物記：世博會的科學傳奇》一書所言，我們可以從世博會的歷史看見人類的科技簡史與近代文明史。我們也可以從學者專家對世博會的研究，隱約的看出透過世博會，可以窺探一個國家發展的歷程。另陶德民、朱蔭貴、馬學新、木村昌人合編的《世博會與東亞的參與》，可以看見中國的發展及東亞的變遷，以及兩國現代化經驗。(陶德民等編，2012)有許多文化批判的學者把世博會看做是現代文化的編織、展演及表述的重要平臺，而它又在特定的時空中凝結了現代文化制度的各種表現方式，值得以博覽會為媒介去探詢和比較兩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文化思考與文化建構的軌跡。吉見俊哉教授在《博覽會的政治學》一書，既非討論博覽會的歷史，也非著墨博覽會的魅力，所關注的是博覽會就像一面「鏡子」。吉見教授努力捕捉這面鏡子所映照出來的種種圖像，就是想要在日常世界結構空間的層次上，揭露一種貫穿所謂「現代」這個時代的力量。(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2010：271-272)

筆者以為世博會除了是展示人類藝術、科技和產業發展成就的國際性展會活動，目的在喚起大眾關注，以達到振興產業、開發科技園區、進行都市更新與均

衡區域發展，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與「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之外，也會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誠如大陸學者喬兆紅博士在《一切始於世博會》專書的論述：「世博會以諸多『世界第一』而聞名。一切始於世博會，是人們對世博會雲集了各個時代最先進的文明成果和最新潮的產品及概念模式的由衷讚歎。每一屆博覽會，無論規模大小，都使人類文明邁上一個新臺階(階段)。在考察西方文明的進程中，博覽會是一個重要指標。」(喬兆紅，2008a：282)有鑒於此，筆者試著從可做中日現代化一個面向的世博會事業發展，針對兩國幾乎同時接觸世博會，卻在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出現30到40年時間差的案例，進行綜合觀點的案例分析，進而多方比較中日現代化發展差異，以架構起解釋兩國現代化成敗的綜合觀點。

至於博覽會的定義，筆者認為無論所舉辦的博覽會是BIE所定義的註冊型與核可型的世博會，或是AIPH國際博覽會系統申請舉辦的世博會，或是憑藉自身力量舉辦的國家級與地方性博覽會。不同等級的世博會都是由主辦國邀集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民間企業，公民社會、一般大眾出錢出力，完備會場展館與周邊基礎設施的建設，共同展示人類藝術、科技和產業發展成就的全球性展會活動。以達到振興產業、開發科技園區、進行都市更新、均衡區域發展、加速國家發展、宣揚國威提升國際地位等發展目標。世博會可說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更是「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本論文所指的「世界博覽會」係指BIE的世博會與AIPH的國際園藝博覽會等級的博覽會，以及包含可視為主辦這兩類世博會暖身的國家級博覽會。

(二)從歷程與鑲嵌脈絡討論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差異

受到蕭瑞麟教授《不用數字的研究》一書與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的〈演化科技意會〉論文的歷程分析法的啟發，本文在方法論上，把博覽會事業個案研究的觀察時間拉長，由過去的歷史去了解博覽會主辦者、參展者及參觀者這三個關鍵活動成員，他們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

的差異，以及所產生的不同結果與其鑲嵌在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社會脈絡中的相互關係，去釐清造成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因素，進而能夠用以解釋兩國現代化的差異。同樣的，于桂芬在《西風東漸》一書對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亦有類似的嘗試，從單純的「事件比較研究」轉變成「過程比較研究」，將兩國攝取西方文化的歷史進程分為6個時期加以比較研究。她認為在學術界以往的研究過程中，人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等具體的「事件比較」上，而忽略了對中日兩國攝取西方文化縱向發展過程的「長時段」宏觀研究審視，這就使得相關的研究停留在「見樹不見林」的狀態，難以窺見兩國攝取西方文化動態發展演進的規律，總結其得失教訓。（于桂芬，2003：3-10）

接下來，先就中國在滿清末年，以及日本在幕府末期與明治時期的歷史，整理比較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關鍵活動成員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的差異。

首先，就中日兩國何時接觸博覽會而言：中國(滿清政府)早在1851年曾有過私人身份(希生廣東老爺)親臨現場或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寄物參與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而且當年在華的英國官員阿禮國也曾徵集中國商品送往第一屆倫敦世博會展出。而此時的日本德川幕府，收到過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總部編譯的《別段風說書》，對第一屆倫敦世博會有過報導，少數幕府官員曾對世博會的「報導」有過接觸。雖然日本近畿大學教授坂本久子指出日本早在1851年第一屆倫敦世博會藉由荷蘭希格斯公司展出過日本屏風，1853年紐約世博會的荷蘭展品中也出現過日本物件，1855年巴黎世博會在荷蘭展品中更出現80件日本展品，而John Allwood在《大博覽會》書中也提到日本展品首次出現在1853年都柏林博覽會，日本展品大規模出現在世博會是發生在1862年第二屆倫敦世博會，係英國第一任駐日大使阿禮國的私人收藏品提供世博會展出，這與1851年第一屆世博會有中國商人寄物參展與外國人徵集中國商品送往參展有十年的差距。

至於政府官員與文人雅士親臨現場並寫下紀錄，則由日本領先於1862年德川幕府派遣了以竹內保德為正使，包含淵邊德藏、福澤諭吉、福地源一郎等人的竹內遣歐使節團，參觀過第二屆倫敦世博會。淵邊德藏留下《歐行日記》與福澤諭吉在數年後出版的《西洋事情》一書。而中國稍遲於1866年由滿清政府派遣的斌椿歐洲考察團，參觀了隔年將開展的第2屆巴黎世博會展場工程，以及英國的水晶宮。斌椿的《乘槎筆記》與隨行張德彝的《航海述奇》寫下巴黎世博會描述文字。1867年第2屆巴黎世博會，日本政府(德川幕府)應邀正式組團參展，又是一次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德川昭武、栗本鋤雲、田中芳男、佐野常民、澀澤榮一、清水卯三郎等人與歐洲世博會的接觸。而1873年日本明治政府再次應邀參加維也納世博會，佐野常民完成《奧國博覽會報告書》。期間派出的「岩倉使節團」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等政府官員，以及留學生等共107人參訪了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又是日本一次盛大而有計畫的接觸世博會。至於中國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參展接觸，卻是在30年後的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

總的說來，私人身分與較大規模展品出現世博會會場的接觸形式，中國的1851年領先日本的1862年。至於政府官員與文人之流親臨現場並寫下紀錄，則由日本的1862年領先派遣竹內遣歐使節團參觀過第二屆倫敦世博會，隨行淵邊德藏的《歐行日記》與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對世博會觀念有精準掌握，讓更多日本人透過書籍接觸世博會。而中國稍遲於1866年派遣的斌椿歐洲考察團，參觀了正在施工的第2屆巴黎世博會展場，斌椿的《乘槎筆記》與隨行張德彝的《航海述奇》留下有關巴黎世博會遊記式的介紹文字。而正式由國人自主組團參展的接觸，日本更領先於1867年正式參與第2屆巴黎世博會，中國則遲至1905年滿清政府才決定改由商部操辦，自主籌備參加比利時舉辦的黎業斯博覽會。

其次，中日兩國如何意會博覽會而言：中日兩國何時接觸博覽會或有不同的說法，甚至中國人先於日本人接觸世博會。然就意會掌握世博會意義來說，日本德川幕府領先中國滿清政府30至40年，清楚認識博覽會有「眼目教化，殖產興業」

的意義。就皇親貴胄，1867年日本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委任其弟德川昭武代理出席1867年巴黎世博會，並命其弟遊學法國學習西方文物制度。十年後的1877年起，明治天皇出席各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第四屆除外)，除表示對大久保利通運用博覽會推動「殖產興業」政策的支持，更以行動宣示對日本現代化國策的堅持。而中國滿清的慈禧太后遲至於1904年為改善其國際形象，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首次以官方名義組團參加美國聖路易士世博會。日本的最高領導人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與大正奉還後的明治天皇，以及中國滿清最高領導人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之間，意會出世博會的重要性並採取行動的時間落差約有30到40年之久。

就兩國的政府官員，較具代表性的有1873年日本「岩倉使節團」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口尚芳等政府官員參訪維也納世博會，將世博會視為現代化的重要機制，並定位為振興工業、富國強兵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回國後大久保利通建議舉辦內國勸業博以推動「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政策。而中國滿清遲了30多年，為推行新政於1905年12月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端方、戴鴻慈順道參觀1906年米蘭世博會，歸國後積極推行憲政之外，1908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會同江蘇巡撫陳啟泰聯銜奏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

就知識份子的中國士大夫與日本武士來說，1862年參與英國倫敦世博會的日本竹內使節團成員之一，精通蘭學的福澤諭吉回國後，在其1866年所著《西洋事情》點出「博覽會」的意義，並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全日本，甚至普及到其他漢字體系的國家。幾年後，1868年流亡海外的中國文人王韜於參觀巴黎世博會會後會場寫下〈游觀新院〉，將世博會名之為「博物大會」、「聚珍大會」，流露出中國士大夫鄙視夷人奇技淫巧的氣息，十年後的1878年駐英法公使郭嵩燾的幕僚，留學巴黎兼做譯員的馬建忠，在致李鴻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雖然在用字仍以「炫奇會」，不過已跳出過去讀書人視博覽會為奇技淫巧的刻板認知，認為世博會意不在炫奇，而在誇富宣揚國威。遲至1890年代，才有1893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大力闡釋世博興商強國論，同時提出舉

辦博覽會的主張。1897年劉楨麟發表〈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一文，直言興商務必自賽會始。中日的知識份子對世博會的認識與主張，亦有1860年代與1890年代間，大致有30年的時間差距。

再就商人或士商來看，1851年上海買辦商人徐榮村，獨寄榮記湖絲於倫敦世博會，在商人接觸世博會似領先日本，不過徐氏稱世博會為「百年大會」、「京城大會」，將世博會看成在商場競爭所需與商品評比行銷工具而已。1867年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隨德川幕府萬博使節團，在巴黎世博會場開設一家有藝人現場表演而大受歡迎的日本風茶室。回國後的1872年提出〈舉辦博覽會建議書〉，主張日本應該舉辦博覽會，以開闢貿易興國之路。同團成員澀澤榮一之後放棄武士任官從商，所寫下的《航西日記》肯定博覽會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對博覽會會場上各國的各種展品的陳列、比較，就能瞭解到各個國家的差異、進步、文明開化之狀況。在中國與澀澤榮一在家學背景、人生歷練，以及仕途方面都有驚人相似性的張謇，他在1896—1897年間向朝廷上呈〈農工商標本急策〉，提出舉辦博覽會是振興實業的重要途徑。若以中日兩國代表性士商澀澤榮一與張謇對世博會的清楚認識與舉辦博覽會的主張來看，中日商人與士商也有約30年的時間差。總結說來，為文引介博覽會觀念方面，就時間的早晚、出版數量的多寡及認識的深淺，日本略勝一籌。中國最初理解所接觸的博覽會為「炫奇賽珍」的無用之舉，目的只在敦睦邦交。日本視博覽會為「智力功夫交易」的活動，而其用處在「殖產興國」。

再其次，日本實質領先中國30餘年參展學習世博會：雖然中日於1866年同時接到法國政府的邀請參加隔年於巴黎舉辦的世博會，中國滿清政府總理衙門以「曉諭商民參加」來搪塞，並未組團參加。僅發函授權總稅務司署統管參展世博會工作，由福州海關稅務司法國人美理登利用回國假期參與1867年法國巴黎世博會，協助滿清商民參賽事務，形成了以後近40年，陸續有30多位稅務司藉回國休假兼辦世博會事務。也在這個時候，接受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建議，決定派遣「斌椿歐洲考察團」，隨同回歐洲度假的赫德，親赴法、英、德、俄等歐洲九國考

察，不只是中國人第一次出國遠行考察西洋情況，還順道參觀施工中的1867年巴黎世博會場館。反觀1866年的日本，在駐日大使羅休斯與幕府要員栗本鋤雲的居中協調，幕府為向各國宣示其政權統治日本的正統性，以及薩摩和佐賀兩藩為了要利用參加法國世博會做採購軍艦商談的目的，最終決定參展，由德川幕府率同薩摩和佐賀兩藩參展，是為日本首度正式組團參加世博會。或許此次組團參加的展示效果不大，倒是可以看到1867年的日本已經有組織計畫，能夠徵詢洋顧問意見，進行展品徵集與展館規劃，而隨團出洋籌備本次世博會參展的田中芳男、佐野常民、山高信離、清水卯三郎等社會菁英，紮實習得世博會這個西方創造的文化裝置，確實為日本儲備了一批舉辦博覽會與殖產興業的人才。

奧地利政府在1870年向世人宣佈在三年後的1873年舉辦維也納世博會，於1872年派特使親赴日本面見明治天皇陳遞約瑟夫一世親筆邀請函，年底日本政府即決定參加，任命參議大隈重信、外務大輔寺島宗則、大藏大臣井上馨處理博覽會事務。1872年1月特別成立「博覽會事務局」，由大隈重信擔任總裁、駐奧國公使佐野常民擔任副總裁，負責徵集展品與籌備海外展示事宜。1871年11月日本明治政府為外交事務與考察歐洲國家文物制度以師夷之長，首度派遣重臣所組成的「岩倉使節團」，由右大臣岩倉具視銜命率參議木戶孝允、外務少輔山口尚芳、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一行60餘人，至美國及歐洲諸國交涉修改與美英法等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做西方文物制度考察。1873年9月13日回到日本，途中取道維也納參觀世博會，而日後才有大久保利通的規劃與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以及1877年首度在東京上野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

1870年清政府也受到邀請，起初也是不願參加，由於奧國特使一再請求，始勉強同意並曉諭商民參加。在奧國駐華公使強力建議清政府組團參展，方不失大國顏面。由於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再加上滿清政府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自然委由當時受到總理衙門信任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全權處理，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展極為成功，從此確立由海關承辦世博會參展事務，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把持32年操辦滿清參加世博會的展出業務，於是有人戲稱中國之賽會乃「赫德

之賽會」。也就是說在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這個時間點，日本已能精準掌握參加博覽會是要讓日本走入國際社會、學習西方文明與技術等目的，並藉此廣徵展品的機會向國人作了參加世博會的政策宣示。在籌備組織上，大量起用佐野常民、町田久成、田中芳男、山高信離、近藤真琴、關澤明清這些有西學背景與世博會經驗的本國菁英。在「參展團」的佐野常民、近藤真琴，以及「岩倉使節團」的大久保利通等菁英，從世博會的意會到認知「自主精神」的重要性，開始規劃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推動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國策。相較之下，中國滿清政府則缺乏熟悉博覽會事務和懂得外交的人才，再者漠視世博會的效益，認為是奇技淫巧之類的無益之舉，方委由績效卓著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主辦參展事務，也由於此次組團參加世博會極為成功，從此確立32年間由海關承辦的「洋人代辦」參展模式，與日本明治政府「國人自辦」的參展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對兩國在博覽會事業的進展也產生極大的影響，兩國菁英學習世博會與蓄積籌備能量上，已開始出現差距。

相較於日本1873年有組織的參展，與派出大臣出洋考察並順道參觀世博會，4年後有第一屆全國性博覽會「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參展學習模式，中國滿清政府晚了33年，在1906年首次依照《出洋賽會通行簡章》規定，由商部顧問張謇和民間聯合參加米蘭世博會，結束持續30多年由海關總稅務司洋員把持參賽的歷史。是時滿清政府也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團，順道參訪米蘭世博會，在考察大臣端方的努力之下，才有4年後的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的舉辦。總結的說來，在參展與考察學習的階段，清政府在1873年一時權宜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負責籌辦，開始由海關洋員把持30多年中國參加BIE世博會的業務，1906年起由國人籌備只有2次，且日本早在1867年開始的12次經驗相比，不管參展次數與時間早晚都有段距離。滿清政府「洋人代辦」權宜決策，剝奪中國學習籌備出洋參展與累積博覽會經驗的機會，進而造成中國博覽會事業落後日本30多年。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團」與日本1871年派出「岩倉使節團」，順道參訪世博會的經驗，以及考察人員日後的官階與是否主導博覽會事業的不同，對日後

自己舉辦博覽會有一定的影響力，使得雙方有30多年的時間差。

最後，在實作舉辦的階段，滿清的博覽會事業發展落後日本30多年：明治政府參加1873年奧國維也納世博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之後，有感於奧美兩國舉辦世博會的效益，當時主導維也納世博會參展事宜的佐野常民，提出博覽會與博物館具有「寓教於觀」的作用之外，更有感於日本產業技術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提出舉辦世博會計畫，以吸取西歐先進產業技術，振興日本產業。惟當時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保護國內工業，決定先舉辦全國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以防止強勢的外國貨品在國內泛濫，扼殺亟待發展的國內工業。1877年至1907年的30年間共舉辦六次比較重要的內國勸業博覽會，會期都在百日以上，參觀人次從45萬成長到680萬之譜，雖為內國勸業博覽會，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與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已有世博會的規模。為保護國貨以振興國家產業發展，第一屆至第四屆內國勸業博覽會性質屬「經濟的博覽會」。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與1899年治外法權的撤除，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1903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就比較偏向宣揚帝國主義正當性的「帝國博覽會」。

對照滿清政府的舉辦博覽會經驗，1906年第一次把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博覽會引進國門，在成都舉辦的第一屆商業勸工會，於4月13日閉幕之後的10月7日天津勸工展覽會於大經路河北公園內開展。除1906年成都商業勸工會與天津勸工展覽會之外，1909年在武昌舉行的武漢勸業獎進會，雖說是清末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博覽會，這三個博覽會雖同有經濟博覽會的性質，即使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已有設置類似日本的參考館，且有外國應邀參展，但規模都不及日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展示天數由102天增加至153天，以及參觀人數由45萬成長到531萬人次的規模。

就單與日本1877年舉辦全國性質的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相比較，中國遠遠落後30多年，在1910年才首度舉辦全國性質的「南洋勸業會」。推其因：在中日兩國政府的作為，有著中國「顛預遲緩」與日本「開明進取」的強烈對比。滿清政府

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博覽會不甚在意，早期海外參展委由海關洋員代辦，後迫於形勢決定由自己舉辦博覽會以振興工商實業，卻為時已晚。保守勢力「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與帝國主義強烈干預，組織上「商部」及後來改組的「農工商部」主管官員素質不齊，且權力與影響力有限，使得滿清「振興工商」政策失敗，讓博覽會發展失去了立基。再加上第一次南洋勸業會不算成功，所導致後來政府信用的不佳與財政困難等諸多原因，限制了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發展。相形之下，明治政府很早就掌握博覽會是「開人智、獎工藝」的捷徑，除極力宣導官商合作海外參展之外，有政策、有能吏、有組織的規劃與建立「內國勸業博覽會」制度。

至於博覽會活動成員與博覽會本身被鑲嵌在社會脈絡方面，博覽會是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世界市場體系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晚清的中國仍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沒有起碼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基礎，很容易理解其博覽會事業發展的困難性。而在「殖產興業」政策之下的日本明治政府，以「強政府」之姿，於1877年成功舉辦博覽會，以推動殖產興業政策。20世紀初滿清政府強烈的救亡圖存與振興工商的需要，模仿明治政府的做法，於1910年舉辦了等同規模的南洋勸業會。時間落差了30多年，其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與工業化不成熟的環境下，若要提早舉辦博覽會以振興工商，政府的介入與指導至為重要。至於戰爭對舉辦博覽會的影響，1851年倫敦世博會之後的中國滿清末年與日本明治時期的60年當中，中國有將近20年身陷戰亂，而日本只有2年多的內戰與2年多的出兵海外，相對安定與富裕，相較之下會有更好的條件，更早舉辦更多的博覽會。總而言之，世博會是「人類文明交流之舞台」與「國家發展之政策工具」，當然可以把它視為「主辦國有計畫的，在一定的期間，假相當面積的展場，徵集相當數量的參展者提供展品，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將主題資訊傳達給參觀者」的一種大型展會活動，其成敗與發展，除了要看主辦者、參展者及參觀者的認知、能力、經驗與經濟條件之外，尤值得注意這三個關鍵活動成員與博覽會是被鑲嵌在社會脈絡的這個事實，一些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因素不容忽視。一個後進國家若要成功舉辦世

博會，主辦國最好是一個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不能是戰場、要有海外參展與考察汲取經驗、要有明確的博覽會政策與制度、要有博覽會認知與經驗的國家菁英(政府能吏與社會賢達)。

(三)從中日博覽會比較架構討論兩國現代化差異

有關中日兩國現代化差異，試以前揭中日博覽會事業落差的綜合分析架構，把中日初期現代化理解成「防衛底現代化」，兩國如何在西方的船堅砲利的威脅下，去面對西方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挑戰，更是西方文化對兩國文化的挑戰。其成敗與發展，除了要看當時掌有國族命脈與文化機運的關鍵成員，如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商人及民眾，他們什麼時候接觸到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如何認知意會西方文化與現代化、如何出洋考察來學習西方文化與現代化，以及何時與如何實作推動現代化的歷程來比較分析其落差成敗因素之外，還要看活動成員與現代化被鑲嵌的社會脈絡裡的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面向，來比較分析影響兩國現代化的發展因素，來討論中日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首先，中日兩國關鍵成員對西風東漸與現代化的意會：兩國在皇親貴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政治統治者與社會精英主導現代化方面存在著差異。第一，滿清中國的皇帝有著「天朝上國」的自負，向來鄙視西方科技文明，而日本的明治天皇則開明專制，擇優攝取西方文明；第二，日本至少在明治維新前後就形成了一個勤於學習西方的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群體，且維新派的中堅份子是中下級武士，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霜歷練，具有鬥爭經驗和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於謀略、精明能幹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中國維新派的骨幹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大多飽讀詩書，有才學熱情，卻缺少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至於兩國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對西風東漸的對策，滿清中國以「中體西用」為主軸，日本則以「和魂洋才」與「脫亞入歐」為基調，全盤西化。第三，現代化的承載者和呼應力量方面也存在著差異，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推進力量之外，還存在著「自下而

上」的現代化承載力量，而在中國則不存在這種「上下呼應」的力量。在日本這種「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主要來自於德川幕府與明治政府獎勵辦學所培養的高素質國民，成為國家現代化基層的「承載者」，例如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大力提倡學問，獎勵辦學，在日本3,000多萬人口當中，男子有45%左右的識字率，這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中國滿清時期人民的識字率不高，張朋園教授的看法，19世紀中國的識字率難以超過20%，進而影響到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其次，中日兩國出使西洋與派遣留學生出國考察學習：比較中日兩國出使西洋考察學習的經驗來看，日本政府不只在時間領先中國之外，主動且反應快速，使節團的規模也較龐大。滿清遣使西洋的目的，始終局限於瞭解外情與賠禮道歉表示友好等事項上，並未像日本關注尋求現代化良方。這是因為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只學習西洋的船堅砲利，不求全面學習西方尋求國家現代化所致。此外，類似使節團出洋考察學習的另外一種走出國門的途徑，要算是出洋留學。中日兩國留學生在歸國後扮演社會制度變革者的作用上面，兩國的留學生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日本的留學生可謂是成功的社會制度的變革者，如出洋留學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明治維新的中堅份子。反觀中國的留學生在當時始終未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可依託的政治力量，除了政府強力的支持，還要蒙受頑固保守勢力的攻訐，讓有心的留學生很難發揮其作用。

再其次，中日兩國鎖國時期認識西方的管道比較：日本有風說書制度、使節團商館人員拜謁、漂流民見聞及翻譯西書等管道，有計畫、有目的、有管道的搜集西方世界形勢變化的資訊，優於滿清中國只重翻譯西書這個管道。**最後，中日兩國如何面對西方叩關要求通商所做的回應：**1861年初滿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基於「夷夏之辨」的思維，先從處理「夷務」開始，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並設置北洋通商大臣與南洋通商大臣，並由欽差大臣、總督與及將軍在第一線處理夷務，並非由對等的外交機關來處理。反觀明治政府於1871年7月就在正院底下設置「外務省」，成為負責外交事務的專責機關。滿清政府於1901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被迫簽定辛丑合約之後，方才於中央政府設置專責外交事務的中樞機構「外

務部」，與明治政府有30年的時間落差，推其因在中日兩國對外事是種「夷務」還是「洋務」的態度，滿清政府除了態度消極，在列強基於維護不平等條約的利益，強烈要求設置專責專業的外事機構之外，再加上華夏天下、華夷之辨的文化包袱，更延誤滿清政府設置專責專業的外交機關。至於自強運動，滿清在「唯兵之為務」的思想指導下推動製造業的發展，而疏於基本工業之建設。又出於對財政和餉源至上等諸多考慮，強化官督商辦，嚴重影響洋務企業走向商辦企業，從而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相較之下，明治政府則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政策。儘管日本明治政府強調富國強兵，但是明治政府和伊藤博文卻沒有推行片面的唯軍事的產業政策。雖然明治政府非常重視軍事工業的創辦，但同時也很注意各種基本工業部門和金融、外貿等各項近代經濟事業的建設，始終把「殖產興業」以發展近代經濟實力，作為富國強兵的基礎，進而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的思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不敵全盤西化有成的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看來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只在軍事與部分經濟領域上的圖強，似不足以完成國家的現代化。

至於中日兩國現代化主要成員與現代化本身所鑲嵌的社會脈絡方面，第一、**在地理因素：**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開國的先後，西風東漸先走向中國再日韓，地理位置與國家大小讓中國首當其衝，也為日韓留下緩衝時間。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天朝上國的慘敗，震動了日本各界引起很大的反響，有識之士迅速意識到這場發生在鄰國的戰爭，與日本的未來命運息息相關，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從時間上中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產生較晚，與日本至少相差一個多世紀。出現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在中國土地廣袤，自然資源豐富，易使人產生安全感。隱含著一種中心國文明的驕傲與自信，相較之下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產生自然比較困難。

第二、在經濟因素：由於中國滿清的地主制與日本幕府的領主制，在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從中國的官僚地主中不容易分化出同封建制度的利益相背離的社會力量，而在日本卻比較早地產生了這種社會力量，中日兩國由於地主制與

領主制的不同，影響到兩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應對西方強權要求開放門戶通商的失誤，固然是由於對世界大勢的盲然無知，但更深層的原因則在於中國的小農經濟與自給自足體系的穩固性，以及在政治上以重農抑商作為穩定社會秩序、防止民間力量增長的傳統政策。這一套政治經濟體制的牢固性並不僅僅在於制度本身，還在於它得到千年儒家文化系統的支援與增強，中國自給自足的發展體系就牢不可破，與金觀濤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政治因素：同地主制與領主制這兩種不同的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態相對應的，是中央集權制與幕藩封建制這兩種不同的政體。德川時代安定的地方分權的封建社會，比起中國完全統一全國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對維新改革與經濟成長的促進更有貢獻，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化落後的癥結在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

第四、社會因素：近代中國戰爭與內亂不斷，國家現代化一直缺少平穩發展的環境，只有在戰亂與戰後復原的艱苦環境中緩慢發展。近代中國償付的戰爭賠款總值，被史學界廣泛採用者將近13億兩，對近代中國領土、主權、行政、海關、財政、教育等，都產生過極其重大的影響，它既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後，也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進程。比較中國滿清末年與日本明治時期的60年當中，中國有將近20年身陷戰亂，而日本只有2年多的內戰與2年多的出兵海外，相對安定與賺得戰爭財，相較之下會有更多的資源與更好的環境推動國家現代化。

第五、文化因素：殷海光指出中國的現代化的問題，基本上就是一個從古老文化過渡到現代文化的問題。中國文化意識是崇古、拒變、輕外而又自足。相較之下，日本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是全方位學習西方，從「和魂洋才」到「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明治政府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把日本建設成一個能夠和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相對的，滿清堅守「中體西用」強調儒家的綱常名教，強調政治體制的不可替代、不可動搖；而「和魂洋才」並沒有強調傳統不可變易，而是強調東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容並蓄的意味。在兩種價值體系的差異，中國是被迫引進西方文化，日本則是主動積極引進吸收西方文化。滿清洋務

運動只局限於引進西方器物層面，明治維新則能兼取西方文化各個層面之長。也有研究認為「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在本質上沒有差別，兩者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華夷思想」。「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而「中體西用」在中國卻遭到失敗，主要應從國家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條件方面去找原因。

二、繼續研究的方向

(一)可嘗試不同方法觀點討論中日兩國百六十年博覽會事業發展(1851~2011年)

就本論文的討論，可以看出造成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一甲子(1851~1911)興衰的相關因素，最引人深思的還是滿清政府把世博會意會成西方的「奇技淫巧」，為「炫奇鬥異」的無益之舉，甚至於海外參展交由海關洋員代辦背後的促成因素，或許在經濟上以農業為主的文明古國並無發展工商的需要，或是國際政治上中國夙以「天朝上國」自居，士大夫只有朝貢的「天下觀」、沒有國與國的「世界觀」，自然鄙視蠻夷所舉辦的博覽會為無益之舉，而不願放下身段與聞，參展也只是迫於形勢在1873年以後交由海關洋員代辦的安撫蠻夷之舉，舉辦博覽會以振工商的政策也就拖延至20世紀初才跨步向前，博覽會事業發展的遲緩，想當然耳。經討論，兩國現代化落差的因素亦雷同，這些背後隱含著幾千年文明與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力。不禁讓人想起哈佛大學Lawrence E. Harrison的《未開發是一種心態》，以及與Samuel P. Huntington合編的《為什麼文化很重要》這兩本書所傳達的訊息，「國與國之間，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主要來自於他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左右了他們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Harrison, 1985; 李振昌、林淑慈譯, 2003) 可以從本論文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的比較，與綜論兩國現代化差異的過程與鑲嵌因素，結論出儒家文化價值觀對中國博覽會事業與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影響力，中國堅持不放棄而延誤了進程，而日本即時的改變全盤西化，終至成功脫亞入歐，成為東亞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尹基老教授在〈日本與韓國對西洋叩關回應的比較研究〉一文，亦點出地理位置同屬東亞漢字文化圈，近代同樣採取鎖國閉關政策，而在面對西洋叩關，日本全盤西化柔軟對應，而成功

完成現代化；韓國則以明國(明朝時期的中國)正統後繼者堅拒以對，終致淪為殖民地的結果，其間的差異主要來自於日韓兩國面對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尹基老，2005)

若將兩國博覽會事業發展的時間延展至2010年，日本於1970年舉辦過亞洲國家第一次經BIE認可的綜合型世博會—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遲至2010年才舉辦經BIE認可的綜合型世博會—上海世博會，也有著40年的時間落差，我們不禁要問：仍會是本論文所指，主要是文化因素影響造成中日兩國百六十年博覽會事業的落差，也就是背後隱含著幾千年文明的自負與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嗎？真要將比較中日兩國博覽會事業案例的時間拉長至2010年，比較研究兩國截至目前的世博會事業發展，肯定會是一個值得投入心力研究分析的絕佳案例。或許就不是中國幾千年文明的自負與文化價值觀念等文化因素所能解釋，再加上1949年後中國出現兩岸分治的議題，肯定會讓比較研究更為複雜有趣，需要不同的史觀與更多的觀點來加以持平處理。

1.現代化理論當中「內生的」與「外生的」兩個觀點

未來探討日本在1970年舉辦大阪萬國博覽會與中國在2010年舉辦上海世博會時間落差的因素研究，可借用現代化理論當中「內生的」(endogenous)與「外生的」(exogenous)兩個概念。有關「內生的」與「外生的」觀點，主要受到現代化理論當中政治學者討論經濟發展和政體(Regime)之間關係的啟發。經濟發展與民主或獨裁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社會科學家長久以來關心的議題。例如兩個獨裁國家，富裕的一國是否比貧窮的一國更可能轉型成民主呢？根據Adam Przeworski 和 Fernando Limongi的〈現代化：理論與現實〉一文，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只能維持既存的民主，而無法促成民主化的轉變。他們重新測試「經濟發展有利於民主」這樣的命題，檢驗為什麼富國之中民主國家的比例要比窮國中的民主國家比例要來得高？如果是因為經濟發展增加了窮國轉型成民主的可能性，稱之為「內生民主化理論」(endogenous theory)。如果是因為經濟發展使得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權

得以保持，而不易重返獨裁統治，則稱之為「外生民主化理論」(exogenous theory)。而Przeworski和Limongi的資料與分析，證明「外生民主化理論」成立，而「內生民主化理論」不成立。(cf.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 知名的政治社會學家李普賽在《政治人》書中討論經濟發展與民主的關係，也認為國家愈富裕愈有機會維繫民主政治。(Potter, 1997:10-11)

而Carles Boix和Susan C. Stokes在〈內生民主化〉一文，提出經濟發展增加了一個國家發生民主化的可能性，經濟成長的確導致了非民主國家朝向民主化方向發展的看法。他們指出在19世紀中葉到第二次世界戰前這百餘年的時間裏，經濟成長對於民主化轉變的影響十分明顯，甚至更勝於它在維持民主穩定方面的作用。同時，他們認為在未來一些取得一定程度經濟發展的獨裁政權統治國家，發生民主化的機率會隨著它們的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而增加。(cf. Boix and Stokes, 2003)「內生民主化理論」強調經濟發展係促成民主的內在因素，經濟的發展自然會使政體走向民主，經濟的富裕隱含著政治民主的必然走向。而「外生民主化理論」則強調經濟發展不足以促成民主，倒是維繫民主國家持續不墜的重要外在因素。值得追問舉辦世博會是否也和經濟發展有「內生的」關係，比較富裕的國家是否就比較可能舉辦世博會呢？

就現代化的研究而言，史學界普遍認為世界的現代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又不盡相同，類型也有區別。許多學者把英法等國率先從農業社會發展成工業社會，並通過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變革而逐步實現的現代化過程，稱為「早發內生型現代化」；把受到西方列強侵略，開始以西方資本主義為榜樣，而進行現代化探索的國家所從事的現代化稱為「後發外生型現代化」，並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或近代化屬於後一種類型。(參見：孫占元，2000：126) 在西方歐美國家，博覽會是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世界市場體系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其中國家政權的作用居於次要的地位。而在近代中國，博覽會的舉辦雖然不可能沒有起碼的現代工商業基礎，但強烈的救亡意識、振興工商的超經濟目的，使政府的宣導和參與作用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政府的

直接介入，中國的商品賽會將難以舉辦，這正是外源型現代化(後發外生型現代化)模式特徵的一種反映。(參見：喬兆紅，2008b) 以此看來，討論現代化的歷史學者把「內生」看做是社會內部現代性自然演變積累的結果，而「外生」是後進國家對外部現代性挑戰的一種自覺回應。準此而論，未來有關比較研究中日兩國近百年(1911~2011)博覽會事業發展的40年時間落差，可從世博會「內生的」觀點，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愈高，或是「大國崛起」之際，就愈有可能舉辦世博會。以及從世博會「外生的」觀點，則指的是後進國家基於加速經濟與國家發展等外部因素考量，政府直接介入與主導世博會的申辦。也就是說從內生與外生的觀點，討論兩國的博覽會事業發展，進一步討論兩國的現代化發展。

2. 有關舉辦博覽會的「內生的」觀點

首先，中日兩國舉辦BIE認可的綜合型世博會是否為資本主義經濟起飛的結果？若以英美等發展領先國家舉辦世博會時年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中國於2002年申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時年均GDP僅1,135美元(參見表5-1)，卻能在2010年舉辦上海世博會，若以丁錫鏞博士8,000美元就能舉辦世博會較高的標準來看，中國在2010年舉辦BIE認可的綜合型世博會更是牽強。然而是什麼因素促成這一個發展中國家、且世博會體質看似不足的中國(2002年中國的年均GDP只有1,135美元，會在2002年BIE第132次全體大會上擊敗韓國(當時韓國的年均GDP有11,485美元)、日本(年均GDP更高達30,733美元)、俄羅斯等五個申辦國家，獲得2010年世博

表5-1 主要國家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單位：美元)

	1986年	1991年	1992年	1996年	1999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日 本	16,542	28,040	30,492	37,279	34,297	32,153	30,733	33,125	35,843	35,592
新加坡	6,570	13,773	15,427	25,122	20,910	20,723	21,209	22,155	25,352	26,833
香 港	7,290	15,156	17,626	24,311	24,716	24,765	24,121	23,294	24,096	25,620
中華民國	3,897	8,769	10,274	13,073	13,609	13,093	13,163	13,327	14,271	15,291
韓 國	2,612	6,817	7,193	12,244	9,549	10,178	11,485	12,707	14,161	16,306
中國大陸	277	353	415	671	865	1,042	1,135	1,274	1,490	1,714

資料來源：世界年鑑(<http://www7.www.gov.tw/todaytw/2007/intestine/ch06/2-6-11-0.html>)

會的舉辦權，為中國博覽會事業開啟新的里程碑，而中國在2010年舉辦上海世博會的動因與成功的因素讓人好奇。日本在1905年日俄戰爭獲得勝利擠身於世界強國之林之後，著手規劃舉辦世界級的博覽會，其間的1928年日本參與《國際展覽公約》的制定，成為BIE締約成員國之一，後幾經波折，直到1930年方具體提出於皇紀2600年(1940)舉辦東京萬國博覽會的構想，預計配合1940年東京奧運，於東京的月島新生地(今天的東京都晴海區)，舉辦以慶祝日本帝國成立2600年為主題的世博會，後因中日戰爭的關係，計畫被迫終止。(古川隆久，1998：22-150)

我們不能單純就2002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135美元，未能達到2,000美元舉辦世博會門檻，就論斷中國不可能舉辦世博會，其實2010年要舉辦世博會的上海市，它的年均GDP早在1995年就已超過2,000美元，2008年更達到10,000美元以上，上海市很早就有舉辦世博會的條件。就此世博會不只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還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實力，年均國民所得在2,000美元以上的支撐，顯然言之成理，而中國舉辦上海世博會的「內生」觀點似乎站得住腳。然而，我們可以發現1851年後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之中，年均國民所得在2,000美元以上的新加坡就沒有舉辦過世博會。我們可以說，國家的進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以及2,000美元或8,000美元以上的年均國民所，只是一個國家舉辦世博會的一個條件。還得加上一些內外生因素，方能成事。

其次，中國於2010年舉辦BIE認可的綜合型世博會是否與「大國崛起」有相關性？自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依據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史》的數據，1985年中國的GDP為1,599,201百萬國際元²²，已超過同年英國、法國與德國的GDP，上海開始思考舉辦世博會。在中國積極申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時，1998年的GDP為3,873,352百萬國際元，僅次於美國的7,394,598百萬國際元的經濟大國。(參

²² 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又稱 Geary-Khamis dollar(簡稱 G-K 元)，在《世界經濟千年史》書中兩者通用，是多邊購買力平價比較中將不同國家貨幣轉換成統一貨幣或國際元的方法。最初由愛爾蘭經濟統計學家 R. G. Geary 創立，隨後由 S. H. Khamis 發展。在特定時間與美元有相同購買力的假設通貨單位，常以 1990 年或 2000 年作基準，與其他年份作比較。1 國際元在個別國家能買到的東西，與 1 美元在美國能買到的東西相同。(Angus Maddison 著，伍曉鷹等譯，2004：16)

見表5-2) 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全球充斥中國製造的產品。回顧1860年代英國因工業革命全國GDP已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而有1851年人類史上在倫敦舉辦的首屆世博會。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則向全世界宣告美國已經成為了世界大國。此時美國的產品已充斥全球，美國製造業總產值到1894年就已經是英國的兩倍。(喬兆洪，2009b：119) 日本於1970年舉辦大阪世博會時的GDP，已超過當時英國、法國與德國等歐洲大國，成為僅次於美蘇兩強的經濟大國。2010年中國舉辦「上海世博會」，也展示著「大國崛起」，似乎支撐「大國崛起」之際，就愈有可能舉辦世博會的相關性。

表 5-2 世界主要國家 GDP (單位：百萬 1990 年國際元)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8年
英國	599,016	665,984	728,224	802,000	944,610	1,022,172	1,108,568
法國	592,389	699,106	813,763	877,305	1,026,491	1,079,157	1,150,080
德國	843,103	947,383	1,105,099	1,176,131	1,264,438	1,398,310	1,460,069
美國	3,081,900	3,516,825	4,230,558	4,940,383	5,803,200	6,544,370	7,394,598
蘇聯	1,351,818	1,561,399	1,709,174	1,863,687	1,987,995	1,169,446	1,132,434
日本	1,013,602	1,265,661	1,568,457	1,851,315	2,321,153	2,493,399	2,539,986
中國	640,949	800,876	1,046,781	1,599,201	2,109,400	3,196,343	3,873,352

資料來源：整理自 Angus Maddison 著《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3. 有關舉辦博覽會的「外生的」觀點

首先，中國在2010年的上海舉辦世博會是否是一種「世博經濟」的思維？中國大陸有鑒於20世紀下半葉是世界各都市圈形成與發展的時代，舉辦上海世博會無疑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的發展政策。日本於1970年舉辦大阪世博會後，所形成的關西經濟區域，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10年的輝煌，因此上海世博會也應是長三角經濟區加速融合並全面崛起的最佳載體，是建構長江三角洲成為世界級都市圈的重要推手，更是長三角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郭定平，2007：334-335) 若就以上的討論和日本如何利用舉辦奧運會與世博會成功提升經濟力量的經驗來看，中國舉辦世博會無疑是上海吸引全世界注意力及提升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方法。在北京決定代表大陸爭取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後，上海

若要利用會展經濟在世界舞台乘風破浪，就只剩下爭取2010年的世博會承辦權的機會，因為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像世博會這樣的國際頂級會展，可以讓中國/上海在世人面前揚眉吐氣。事實上，上海爭取2010年世博會承辦權的目標非常明確，早在1990年代末期，由上海官方提出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年)」中，便可以看到上海市政府為了2010年的世博會特別預留了一塊用地。上海市政府相當清楚可以藉由舉辦世博會這樣的國際性超大型活動(Mega Events)，一方面加速上海轉型為兼具製造業及服務業的複合型經濟中心，另一方面也能強化城市集聚和向上海周邊輻射發展的雙重功能。同時，一個成功的世博會必會為上海帶進豐富的資本、文化、商業活動等多樣性的進步動力。(劉芳榮，2005：46-47) 準此而論，中國在2010年的上海舉辦世博會，是種「世博經濟」的思維，主要在吸引全世界注意力與加速經濟發展，也比較符合後進國家基於加速經濟發展與國家發展等外部因素考量，政府直接介入與主導世博會申辦的「外生」的觀點。

再者，中國舉辦世博會是否為「軟實力」全球戰略的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快速增長，軍事力的加強與國際政治影響力日益擴大，帶給西方先進工業國家一種潛在的不安感覺，擔心一個有數千年歷史且曾領先世界的非西方大國刻正現代化，即將追平甚至超越世界領先國家。許多西方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中國是個不滿現狀的新興強國，意圖運用手段恢復中華文明榮光，重建國際秩序。Samuel P. Huntington對此提出「全球政治即是文明政治，如今超強國家之間的對立已被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所取代。」未來人類世界恐將陷入中國、日本、印度、回教、西方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及撒哈拉大陸的非洲文明的衝突。(cf. Huntington, 1996)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引起西方國家的關切，而「中國威脅論」進而喧囂塵上。為了淡化各國所擔心的「中國威脅」論，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希望全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國」，看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而「明天的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和充滿希望的大國」。另外，溫家寶也強調中華文化的「和而不同」，而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

(蕭全政, 2004:2-3) 中國大陸《2007年中國外交白皮書》特別強調軟實力(Soft Power)日益成為綜合國力中的重要因素, 各國更加重視軟實力建設, 運用各種資源和手段, 努力提升國際形象, 擴大國際影響。軟實力為1990年代初, 哈佛教授奈伊(Joseph Nye)首創的概念, 是一種透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的能力, 是一國綜合實力中除傳統基於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硬實力之外的另一種軟性與隱性的實力。(Joseph Nye著, 吳家恆、方祖芳譯, 2006) 中國在2010年的上海舉辦世博會, 會不會是在處理中國崛起所衍生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亟需舉辦國際超大型活動以塑造和改善國際形象, 亦符合強調軟實力運用各種資源和手段, 努力提升國際形象, 擴大國際影響的考量, 而政府直接介入與主導世博會申辦的「外生」觀點。

(二)可嘗試針對「儒家文化區」五個國家博覽會事業與現代化經驗比較研究

此外, 二次世界大戰後, 先是日本在戰敗後短短20年的光景, 從百廢待舉到令人稱奇的高度經濟成長, 讓許多歐美學者不得不盛讚「日本第一」。隨後的台灣、香港、新加坡及韓國, 在1960~1970年代也呈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 專攻東亞政經社會研究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曾以專書「躍升中的四小龍」來稱讚這四個國家或經濟體的傑出表現(Vogel, 1991)。美國柏克萊大學教授詹生(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Johnson, 1982)、小霍夫漢(R. Hofheinz, Jr.)與凱德(K. E. Calder)合著的「東亞優勢」(Hofheinz, Jr. & Calder, 1982)、安室單教授(Alice H. Amsden)「亞洲的下一個巨人: 南韓」(Amsden, 1989)都曾廣泛討論東亞經濟的崛起。是什麼喚起這幾個東亞國家沉睡已久的經濟力? 金耀基教授曾在「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 韋伯學說的重探」一文, 做了精闢的分析與整理。「結構論者」(Institutionalist)從結構的觀點來解釋, 特別強調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安排; 以及「文化論者」(Culturalist), 從文化的觀點來解釋, 著眼於觀念與價值的性格。(李亦園等編著, 1985: 45~52) 「結構論者」或可以柏克萊大學教授詹生所分析的四大成功因素窺知一二: (1)強而有力且無私的政府, 為人民謀長遠利益。(2)精英所組成的經濟引導機構, 指方向立制度。(3)重視教育與均富, 有充沛高素質的人力資源。(4)尊重市場機制, 鼓勵公平競爭等。(殷允芄編, 1985) 「文化論者」如美國知名的

未來學者康恩博士(H. Kahn)，就以儒家倫理來解釋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由於觸及韋伯論題(Weberian thesis)，引發東西方學者廣泛的注意與論戰。然就金耀基教授的看法，在解釋高度複雜的東亞經濟發展經驗，不應在「結構論」與「文化論」之間強做選擇，二者實際上是互補。就本論文的初步研究成果，Harrison與Huntington強調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主要來自於他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奇蹟有關結構論與文化論之間的爭論，未來可以針對「儒家文化區」的主要國家如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南韓、越南等五個國家，進行博覽會事業與現代化經驗作更廣泛的比較研究，來檢視儒家文化價值的影響力。

其中，台灣也曾在日據時期的1935年舉辦過盛大的「始政40周年紀念博覽會」，政府也在1948年慶祝台灣光復3年，首度舉辦「台灣省博覽會」。1949年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應邀代表中國參加過幾次世博會，以及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仍接受美國邀請參加1974年的史波肯世博會。直至1979年中國大陸與美國正式建交之後，中國大陸接受各國邀請代表中國參加世博會，中華民國即淡出世博會舞台，於2005年才以「美麗島餐廳」的形式參加「愛知萬博」重返世博會。政府也曾在經濟部的主責之下，1992年開始規劃「2000年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計劃於台北南港經貿園區用地舉辦BIE等級的世博會，最終卻以較小規模的「台北國際資訊展」結案。在2000年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之後，經建會曾規劃於2008年假桃園、嘉義、台南三個高鐵站區，舉辦世界級的「台灣博覽會」，都沒能付諸實現。其間彰化縣府在2004年成功舉辦「台灣花卉博覽會」之後，直至2006年4月，台北市府及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成功爭取「2010年國際花卉博覽會」的舉辦權，於2010年舉辦亞洲首次在市中心舉辦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為台灣博覽會事業開啟新的里程碑。

而韓國繼成功舉辦1988年漢城奧運之後，曾提出舉辦「國際貿易與產業發展博覽會」的構想，並於1989年5月開始討論擴大舉辦成國際展覽局(BIE)認定的世博會，1990年獲准，並以三年半的時間完成籌備「1993年韓國大田世博會」的不可

能任務。之後的1999年在江原道東草市舉辦國際觀光博覽會，2012年的麗水世博會是韓國繼1993年舉辦大田世博會後，韓國再次舉辦由BIE認證的專業型博覽會。中國、日本、台灣、南韓與越南這五個國家當中，越南在歷史上雖有法國人舉辦的殖民博覽會：1902年河內博覽會²³，卻未曾有過舉辦全國性博覽會與世博會的紀錄，針對中、日、台、韓、越這五個「儒家文化區」的國家，進行博覽會事業與現代化經驗作更廣泛的歷史過程比較研究，來檢視其鑲嵌的儒家文化價值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的相關性，會是一個值得後續研究努力的方向。

(三)可嘗試以本論文解釋架構比較中國、印度及埃及三大文明古國現代化差異

最後，就中日兩國現代化差異的初步比較研究，文化價值觀形塑出對吸取外來文化的態度，雖不能說是絕對的因果關係，不過可以肯定有重大的相關性。蔡源林教授在導讀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書時，東方主義有三個時期：(1)拿破崙征埃及之役(1798~1801年)至1869年蘇彝士運河開通時期，以英法兩國為主導的西方列強開始滲透伊斯蘭世界的時期；(2)186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蘇彝士運河的開通標示著西方殖民主義狂潮的席捲伊斯蘭與其他東方世界的開始，不只是近、中東區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或附庸，甚至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地區，如黑人非洲、印度和東南亞也被西方殖民化，而中國此時也淪為次殖民地，這時期的殖民大贏家是英國，上述的伊斯蘭地區均由英國殖民政權所控制，法國雖欲與英國競爭，但終究不敵，只佔領一些據點及控制中南半島；(3)1945至1970年代，這時英法殖民主義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全球霸業，填補此一後殖民時代權力真空。(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1999：導讀頁6-7)

讓人好奇的是，埃及、印度及中國這三大文明古國在面對西方工業文明與殖民主義的挑戰，有的淪為殖民地，有的則為半殖民地，三國的現代化都是一條艱辛屈辱的漫漫長路，會是埃及、印度及中國三大文明古國的千年文化驕傲或包

²³ 1902年河內博覽會(L'exposition de Hanoï)由時任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美(Paul Doumer)，在首府河內舉辦的一次國際殖民地博覽會，目的在向世人展示法屬印度支那在經濟、工業、科技、文化以及政治上取得的成就。(詳見李丹，2010)

祇所致嗎？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在研究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時曾指出：19世紀西方強權的殖民擴張，正是導致亞洲各國歷史發展格局轉變的決定因素，但是各個國家轉變的方式、速度、成效是大不相同的。東亞的印度、日本、中國在西方衝擊下經歷三種不同的命運，正好代表三條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印度喪失自己的獨立而淪為殖民地，中國走上喪權辱國的次殖民地的發展道路，唯有日本成功地克服危機發展成為獨立工業國家。這些國家的成敗取決於外來挑戰的性質、特徵與強度，更要取決於被挑戰的主體本身內在結構的牢固性、發展水準相應付外來挑戰的手段與能力等等。印度是亞洲的一個文明古國，它在來自海上的西方殖民勢力襲擊下之所以比較容易地逐步解體，在於這個國家內在結構的脆弱性。印度在政治上實際上是由許多分散的小邦國構成，社會的基礎是封閉的村社制度，又被種姓制度所割裂，漫長的海岸線上海防薄弱，這些內在結構上的不堅固性，使這個龐然大物的帝國不難被各個擊破而解體。(羅榮渠，2013：201) 那同為文明古國的埃及帝國與中華帝國其所在地理位置與內在結構又是如何影響自身的命運？後續似可以就這三個國家在面對西方文化東漸的意會、學習及行動過程，及其過程所鑲嵌的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因素，來比較研究埃及、印度及中國三大文明古國現代化的差異，檢視歷史過程分析結合脈絡研究方法的解釋效力。

附錄

一、台灣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海峽兩岸對於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的研究，起步較晚。台灣在滿清政府參與世博會研究方面，有古偉瀛教授藉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各國賽會檔案文獻記載進行量化統計分析，檢視中國近代參與國際賽會經過，發現中國近代朝野對博覽會的認識，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的轉變過程。(古偉瀛，1986) 趙祐志教授也利用這些檔案，對清末中國參與世博會的歷程進行研究分析，也談到滿清政府對世博會由疑懼到接受、由炫奇到商戰、由邦誼到商利、由慣例到章程的認知過程，並整理參加世博會的籌辦機構、參賽團體與個人、經費的籌措，總結認為這些參展的經驗，對於催生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具有重要意義。(趙祐志，1997) 鍾少華先生在1991年於《歷史月刊》發表〈中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一文，對中國第一次舉辦的內國勸業型博覽會做了介紹與評論。(鍾少華，199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正華的〈呈現「中國」：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專文，討論在清末財政困難、歲收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由政府統籌參展事宜，派遣官方特使團，甚至請出大清國皇太后肖像之舉，積極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舉辦之萬國博覽會，所為何來？(王正華，2003)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許峰源博士研究晚清博覽會與近代中國的發展，主題包括：1905年黎業斯博覽會考察中國海關權力的轉移、對晚清中國參與1906年米蘭博覽會，以及探討日本大阪內國勸業會與清末中國博覽會的興起、清季那桐赴日考察與新政的開展、晚清博覽會的主導權移轉與參展制度的建立。(許峰源，2009、2008a、2008b、2007、2005)

有關殖民與博覽會的主題，呂紹理教授在2003年發表〈展示殖民地：日本博覽會中臺灣的實像與鏡像〉，2005年中原大學陳其澎教授繼展示在博覽會與博物館的角色一文之後，探討19世紀萬國博覽會之殖民意涵。(陳其澎，2005) 胡家瑜也在2005年發表〈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專

文(胡家瑜, 2005), 李政亮副教授於2006年以1903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案例, 討論帝國、殖民與展示議題。(李政亮, 2006) 2010年政治大學楊瑞松教授也以1903年日本大阪勸業博覽會人類館事件, 探討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楊瑞松, 2010) 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戴蕾於2014年發表〈1910年日英博覽會中的階序與時序展示〉, 分析日本在「日英博覽會」中除了展示日本本國的文化以及現代化的成果外, 也展示其殖民地, 設置「福爾摩莎」、「南滿鐵路公司」、「關東政府」、「韓國總督府」等展示區, 並以「真人展示」的手法, 在博覽會中建造「福爾摩莎村」、「愛奴人的家」兩個土著村。透過殖民的成果, 展現強盛的國力之外, 更企圖藉著呈現殖民地落後的意像, 突顯日本本國在演化階序上的進步。(戴蕾, 2014)

有關日據時代台灣參與及舉辦博覽會的研究, 代表性的論文有林品章教授、蘇文清教授針對「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展出背景、規模、宣傳、展覽會場與設施進行專題研究。(林品章、蘇文清, 2000、1999) 政治大學呂紹理教授分別就1903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與日本博覽會中臺灣的實像與鏡像, 進行展示臺灣與展示殖民地的研究。(呂紹理, 2002) 更在2008年發表〈臺灣史上第一場「小人國」博覽會〉專文, 運用Bruno Latour討論實驗室與實體社會關係所提出的「轉譯」(translation)概念, 觀察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會場中有關科學及工業的展示手法。暨南大學的劉融也從日本博覽會中的臺灣, 將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參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 在《暨南史學》雜誌發表〈「異地」臺灣：日本內地博覽會中的臺灣形象〉專文。(劉融, 2003a) 此外, 2006年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黃琪惠發表〈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年博覽會中的「臺灣歷史畫」〉, 以台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收藏的「台灣歷史畫」作為核心, 這些畫作係台南市政府配合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行盛大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活動, 在台南史料館的基礎上所設立的台灣歷史館, 他們委託畫家小早川篤四郎製作約20幅台灣歷史畫於會場展出, 透過這些畫作的歷史背景與相關作品的比較, 解讀每幅歷史畫的圖像內容與風格特色, 重建其製作過程的來龍去脈, 探討

其使用脈絡的政治文化意涵。(黃琪惠，2006)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蔡錦堂於2007年發表〈「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論文，針對紀元二千六百年(1940年)日本昭和政府為了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規劃舉辦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日本萬國博覽會等大型活動，以精神動員全國民眾(當然含括殖民地台灣)的這段歷史，探討這一年在日本與臺灣發生的事情及其意義。(蔡錦堂，2007)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梁雅惠於2010年發表〈日治時期博覽會中「臺灣喫茶店」之研究〉一文，藉由前人有關日據時期的台灣博覽會研究基礎，縮小焦點討論相關展覽會中「臺灣喫茶店」的內容與特色、總督府對喫茶店的政策、茶商公會的角色。(梁雅惠，2010)

有關國民政府與光復後台灣參與及舉辦博覽會的研究，有鍾少華1992年發表〈一九二九年的杭州西湖博覽會〉專文，介紹國民政府於1929年所舉辦的第一次大規模博覽會「杭州西湖博覽會」。(鍾少華，1992)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周芳美教授分別就1915年中華民國和日本參展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1926年費城世博會與1933~34年芝加哥世博會中華民國和日本藝品之展示，討論20世紀初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品在美國所舉行的世博會中的展示和美國藝評家的評論，點出日本延續明治、大正時期的參展經驗，在展覽中總可以新舊揉合並陳，讓參觀者除了可以看到日本工藝美術與西方同步的一面外，也可以欣賞到日本的傳統之美。中國則囿於國內的政經不穩，除了1915年能盛大參展外，其餘時間皆是倉促成行，與日本相形見絀。(周芳美，2011、2010、2009) 國史館的廖文碩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1945~1948)〉，針對抗戰勝利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黨政系統所策劃的小型時事政令宣導與工商藝術展覽，經歷省政府成立初期自中國大陸引入的國貨與中原文物展覽等，迄1948年規模盛大的臺灣省博覽會進行研究。(廖文碩，2011) 進入21世紀的台灣興起世博會熱潮，針對2004年在彰化舉辦的臺灣花卉博覽會與2010年臺北市國際花卉博覽會，從都市發展、行銷設計、會後會場再利用、大型展會公共衛生、客戶滿意度、展會效益等議題，進行分析與研究。(田瑞良、游志青，2004；李清

景、陳國華，2010；劉翠華、李銘輝、彭予柱、劉家烘，2011；邱靖鈺，2012；陳郁婷、張靜文、洪念慈，2012；謝琦強、莊翰華、曾宇良、王欄蓁，2012；林孟臻、李欣岱、游文瑜、汪世潔、林茂榮，2013；陳惠美、劉喜臨，2013；張煜權、藍怡慧、林佩怡、林佩君、林立凡，2013；葉嘉楠、邊魯興，2013)

台灣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專書較不多見，莊永明將珍藏的日據時期台灣圖文資料，於1996年出版《台灣鳥瞰圖：1930台灣地誌繪集》，其中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行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資料常為研究人員引用。(莊永明，1996) 曾經任教於銘傳大學、中央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林品章教授，於2003年從設計學的角度出版《臺灣近代視覺傳達設計的變遷》專書，探討1985至1990年間台灣舉辦的共進會、展覽會、博覽會以及設計相關活動。(林品章，2003) 隔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程佳惠，以《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的碩士論文為基礎，改寫出版《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SHOW》一書，對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的研究做出貢獻。(程佳惠，2004) 前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呂紹理教授於2005年出版《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一書，透過博覽會展示空間特性、展示分類架構、策展者的展示意圖及參觀者對展示活動的理解等面向，討論日本殖民政府何以不遺餘力舉辦各種展會活動、活動中日本建構何種台灣的形象、台灣人與日本人又是如何理解會場中蘊含的秩序知識與文化觀。《展示台灣》一書可謂是我國在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與創新性的著作，從博覽會看見台灣的發展。本書介紹日本政府如何引進歐美世博會，並在臺灣這塊殖民地複製舉辦博覽會的情形，再以「空間」與「權力」之間的運作，詮釋日本殖民時期是如何在台灣島內外的博覽會中展示、建構臺灣形象，最後分析討論博覽會所引發的廣告業、旅遊業、百貨公司的興起，以及背後觀看文化的興起與浸透。(呂紹理，2005) 陳芳明教授更在2011年《展示台灣》修訂版說道：「呂紹理的研究成果，代表現階段臺灣史的領域已開始有了突破性的視野與詮釋。」

此外，從規劃籌備世博會的需要，經濟部科技顧問室曾委由台灣嵐德科技顧問公司，對我國於西元2000年之前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之可行性與財務可行性進行評估，並將研究評估結果彙集成三冊專書出版，為國人世博會入門與籌備的重要參考資料。(經濟部科技顧問室，1992a、1992b、1991) 另丁錫鏞博士經十多年的長期觀察與研究，編撰出版《1851至2005年世博會全紀錄》上、中、下三巨冊，近1,600頁，其中第一與第二篇整理BIE類別的世博會，並提出其中隱含的經驗與教訓。第三與第四篇則對舉辦世博會所需考量的因素(如主題、展期、會場面積、籌辦組織、參觀人次、展館規劃...)做了各國經驗的比較分析，豐富的資料與洞見，對世博會的總體理解與舉辦世博會的實務頗有參考價值。(丁錫鏞，2006a、2006b、2006c)

有關博覽會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從國家圖書館的「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博覽會」、「勸業共進會」的論文名稱來檢索，未見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共102筆，與「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相關的論文45筆最多，另與世博會與日據時代台灣舉辦博覽會相關的研究有19筆，其中以台灣日據時期1935年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與該時期的博覽會活動設計、宣傳計畫、視覺表現、殖民教化、島外參加博覽會等議題，以及中國參加世博會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相關議題的研究為主，亦有對台灣舉辦國際性博覽會的土地開發、經濟效益之研究。(參見：韓克復，1995；蘇文清，1997；鄭建華，1998；程佳惠，2000；劉融，2002；張世朋，2004；馮瓊瑩，2005；石川豪，2005；彭慧媛，2005；胡雪芳，2006；林士鈞，2006；林碧郁，2007；曾子芳，2009；謝長志，2010；顏永昌，2010；黃馨瑩，2011；蘇立，2011；周喬蓁，2012；張郁琪，2013) 另與台灣地方性博覽會相關的論文，有「2004台灣花卉博覽會(彰化花博)」的6筆、「宜蘭綠色博覽會」的10筆、「2013雲林農業博覽會」3筆、「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3筆、「網路博覽會」2筆及其他14筆。

二、中國大陸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兩岸有關世博會研究的起步相差無幾，大陸由於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相對的資源投入與研究成果較台灣豐碩。就國內圖書館的藏書與網路資源的查找，並參考2004年謝輝博士整理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的研究專文、喬兆紅博士2009年出版的《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專書當中的「學術史」小節，以及馬敏教授在2010年對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做了回顧與思考的專文，對中國大陸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文獻有了較周全的掌握。(參見：謝輝，2004；喬兆紅，2009；馬敏，2010)

大陸方面的博覽會研究，基本上是隨著對商會史研究的重視而逐步興起。1980年代初，隨著天津商會檔案和蘇州商會檔案的陸續整理出版，史學界開始注意到商會對近代博覽會的參與，以及與中國與近代博覽會事業的關聯性。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與教授的馬敏博士率先於1985年發表〈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述評〉，隨後於1988年發表〈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開啟中國大陸的博覽會史研究。(馬敏，1985、1988) 隨後有朱英的〈端方與南洋勸業會〉、汪嶽波的〈晚清政府參加國際博覽會述略〉、梁碧瑩的〈民初我國實業界赴美的一次經濟活動：中國與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王翔的〈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里程碑：1910年南洋勸業會述論〉、王翔與黃錫明的〈民國博覽會縱覽〉、王傳瑞的〈清末南洋勸業會的產生及影響〉等論文的發表。(朱英，1988；汪嶽波，1988；梁碧瑩，1988；王翔，1989；王翔、黃錫明，1993；王傳瑞，1999)

此後沉寂一段時間，直到1999年中國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之後，再加上籌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需要，相關的研究又活絡起來。有關博覽會研究的論文，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博覽會」的篇名檢索自1999年起的論文，共17,000多筆，縮小範圍以「世博會」的篇名檢索，共有1,020筆。舉其與中國近代參加世博會與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及世博會研究相關的主要論文，整理如次：

有關滿清政府參加世博會的研究，1999年後有汪嶽波的〈晚清政府參加國際博覽會述略〉、董增剛的〈晚清赴美賽會述略〉、宋茂萃〈近代中國海關與維也納世博會〉，以及尹淑梅與屈春海的〈清政府參加比利時萬國博覽會後的政策調整〉。(參見：汪嶽波，1988；董增剛，2000；宋茂萃，2004；尹淑梅、屈春海，2007) 而有關滿清政府主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研究，繼馬敏、王翔、王傳瑞等學者專家對1910年南洋勸業會的研究之後，魏愛文對清末商品賽會加以評述，朱英則對清末的武漢勸業獎進會做了評介。(魏愛文，2002；朱英，2000) 至於社會菁英與關鍵人物對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影響的研究方面，馬敏教授與謝輝曾對「張謇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題目先後發表專文，蔡克驕對近代中國博覽業的先驅陳琪，以及張元隆對參與1876年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的李圭發表專文。李愛麗則對把持滿清政府出洋賽會主辦權29年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影響也做了分析。(馬敏，2001；謝輝，2002；蔡克驕，2001；張元隆，2006；李愛麗，2004) 有關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綜論研究，馬敏教授討論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關係，林芳與謝輝合力研究分析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衰落的原因，喬兆紅博士分別就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發展、政府作為，以及與天津的關係發表論文。(馬敏，2004；林芳、謝輝，2005；喬兆紅，2005、2007、2008b)

專書方面，由於中國籌辦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需要，有關世博會的專書與譯書，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大陸的中文圖書。試整理與本論文主題相關的簡體字中文圖書如次：

籌備上海世博會工作當中，世博會文獻的整理、研究、宣傳是極其重要的事。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於2003年1月成立「上海世博會資訊中心」，編譯出版「世博資訊叢書」宣導世博會，2003年至2008年間，分別翻譯Alfred Heller的《文明的進程：世博會的發展與思考》Claude Servant & Ippei Takeda的《國際級博覽會影響研究》、Marcel Galopin的《20世紀世界博覽會與國際展覽局》、Monclus Javier F. Fraga的《世界博覽會和城市規劃》，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對世博會的引介做出貢獻。(參見：吳惠族等譯，2003；魏家雨等譯，2003；錢培鑫

譯，2005；于漫譯，2008) 此外，2012年王宇田翻譯Steven Conn的《博物館與美國的智識生活，1876-1926》一書點出博物館不但反映了西方人的征服的結果，同時也是人類知識領域的最前線。博物館按照當時的知識體系來呈現產品，同時根據最新的知識體系對展品進行調整，帶動人類對於這個世界有進一步的理解發展。該書的第七章〈1926年：關於博覽會、博物館與歷史〉，說明博覽會與博物館在反映西方人征服的結果與展示人類最前瞻知識的功能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博物館可說是長時間展出的博覽會，博覽會則是短時間展出的博物館。(王宇田譯，2012) 另有關世博會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可讀周秀琴的《世博會與博物館：演繹與思考》專書，作者搜集歐洲、美洲、大洋洲和亞洲幾十屆世博會的資料，闡述世博會成為博物館蓬勃發展的動力。(周秀琴，2010)

有關世博會歷史的回顧，除2003年吳惠族等人翻譯的《文明的進程：世博會的發展與與思考》一書之外，2007年上海市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出版《走近世博會：迎接百年難逢的大機遇》，介紹1851年至2005年中影響較大的25屆世博會與世博會基本知識，以及中國參加各屆世博會和申辦世博會的情況。2008年有焦貴平與曾原編著的《收藏世博會》、上海世博雜誌編輯部出版的《走進世博會》，回顧了歷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世博會，整理從1851年英國倫敦萬國工業產品博覽會到1962年美國西雅圖世博會期間最具影響力的世博會。同年喬兆紅博士出版《一切始於世博會》，藉由世博會歷史的回顧與梳理，分析世博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2009年周秀琴與李近明編著的《文明的輝煌：走進世界博覽會歷史》，則從1851年倫敦萬國工業產品博覽會開始的歷屆世博會當中，挑選了52屆具有代表性的世博會作了介紹，包括博覽會的起源、時代背景、經濟效益、文化教育、大眾娛樂、文明進程等內容。2010年陳瑤等人翻譯M. J.Morgan的《人類景象：世博會從倫敦到上海》，就19世紀以來歷屆大型世博會介紹世博會的發展史。(陳瑤等譯，2010) 同年趙致真的《造物記：世博會的科學傳奇》，從世博會的歷史看見人類的科技簡史與近代文明史。(趙致真，2010) 另2012年陶德民、朱蔭貴、馬學新、木村昌人合編《世博會與東亞的參與》，是本集結中日兩國學者有關世博會研究的論文集，從

世界的1851年的倫敦世博會、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到1933年芝加哥世博會、1970年大阪世博會，從中國的1910年南洋勸業會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歷史，看見中國的發展及東亞的變遷，以及兩國現代化經驗，很有參考價值。(陶德民等編，2012)

有關中國參與世博會歷史進程的研究，原始資料有《中國早期博覽會資料彙編第一冊》與《清宮萬國博覽會檔案》共七冊，前三冊係宣統二年1910年南洋勸業會資料，後四冊為民國18年（1929）杭州西湖博覽會資料。(參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7) 相關的研究成果有上海圖書館的《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俞力主編的《歷史的回眸：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故事(1851-2008)》、喬兆紅的《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羅靖的《中國的世博會歷程》、馬敏的《博覽會與近代中國》，以及胡斌的《世博與國家形象》，介紹了從晚清到現今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整個歷程，中國是如何通過世博會這一視窗向世界展現自身形象。(上海圖書館，2002；俞力主編，2009；喬兆紅，2009；羅靖，2009a；馬敏，2010；胡斌，2010a) 還有丁長清主編的《中國與世博會三部曲》，從世博會的解說，到中國參與世博會與自己舉辦世博會。(丁長清主編，2010a、2010b、2010c) 大陸中山大學梁碧瑩教授的《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歷史考察》一書的第六章，敘述中國參與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覽會與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世博會的歷史，展示了中國工商界參與世界經濟交往的活動情況，點出此舉是中國實業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對中國實業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梁碧瑩，2004)

有關中國舉辦世博會的專書，以上海世博會相關的研究為主，包括總體介紹(上海世博雜誌編輯部，2008b；上海世博雜誌編輯部，2009)、籌備經過(周漢民，2011；郝鴻勝，2010)、規劃設計(鄭時齡、陳易，2006；吳志強，2009)、經營管理(尤建新、丁潔民、陳迅等，2006；謝工曲、楊豪中、吳采薇，2008)、經濟效益(陳信康，2006)、都市發展(郭定平，2009；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2010；崔寧，2008；吳建中，2010)、世博外交(楊潔勉，2011)、文明對話(徐波，2010)、對上海的影響(諸大建、姜富明，2004；吳信訓，2010；呂建昌，2013)等主題。另戴光全曾以1999

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為例，研究超大型活動對城市發展及城市旅遊的影響。(戴光全，2005) 滿清政府主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專書，則有鮑永安主編的《南洋勸業會報告》。(鮑永安主編，2010)

有關研究中國參加世博會的社會菁英與關鍵人物的專書，陳占彪編輯的《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針對清末民初中國參與的11次世博覽會相關的親歷遊記24篇，有張德彝、王韜、李圭、郭嵩燾、張蔭桓、屠坤華、馮自由、郭鳳鳴、張繼業等關鍵人物參觀博覽會的經驗。(陳占彪，2010) 此外，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張海林教授的《端方與清末新政》，是第一部研究清末漸進主義改革派代表人物端方的學術著作，其中第九章〈端方在兩江的經濟舉措與市政建設〉，對理解倡議籌辦中國第一個內國勸業博覽會「南洋勸業會」的端方有所助益。(張海林，2007) 另謝輝、林芳對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第一人陳琪先生的介紹(謝輝、林芳，2008；林芳，2009)，陳養才等人翻譯Stanley F. Wright的《赫德與中國海關》一書，對1867年到1905年長達39年的時間，中國海關在總稅務司赫德的把持下，承辦多次中國參與國際博覽會展覽事務的歷史。(陳養才，1993) 至於對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籌備卓有貢獻的中國駐法國大使(1998-2003年)與國際展覽局(BIE)主席的吳建民先生，以及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原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副局長周漢民先生，亦有多本專書的記述。韓敏的《吳建民訪談錄》，吳建民、施燕華合著的《我與世博有緣》與周漢民的《十年世博路》，記錄參與籌辦上海世博工作的經驗教訓和思路想法，以及歷任上海市計畫委員會研究所室主任、市發展計畫委員會長遠規劃處副處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區縣經濟處處長的郁鴻勝博士的《立意上海世博會的歷史回眸》，記錄了上海醞釀申請世博會以及世博會成為國家重點方案的過程，由於作者親歷這一過程並保存了原始資料，本書披露了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參見：韓敏，2007；吳建民、施燕華，2009；周漢民，2011；郁鴻勝，2010)

大陸有關世博會研究的博士論文，以「博覽會」相關的名稱來檢索「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有八筆博士論文，顯然比台灣的學界多。其中兩筆以2010年上海世博會為案例，以有效管理模型研究探討公眾參與超大型活動，以及研究

城市重大事件對土地利用的影響效應。(王春雷，2008；倪堯，2013) 三筆從史學的領域，2005年浙江大學謝輝博士，從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切入，整體考察近代中國參加與主辦世博會的發展。2009年湖南師範大學羅靖博士選擇了中國近代博覽會史上幾次有代表性的世博會，研究分析近代中國國際化和現代化的進程。2011年華中師範大學艾險峰博士，就1909年武漢勸業獎進會與民國時期湖北舉辦3次規模較大國貨展覽會這段歷史，討論博覽會與城市社會的互動發展。(謝輝，2005；羅靖，2009b；艾險峰，2011) 另有三筆分別在藝術、法學及設計的領域，201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胡斌博士，從晚清到民國以後的中國參加世博會歷程，藉由展品選擇、展館建設、陳列方式、組織及影響力等因素的整理分析，以闡述中國如何透過這扇窗向世界展現自身形象。2011年華東政法大學邱一川博士以《世界博覽會主辦國法律制度與國際規則的協同關係研究》為題，研究在世博會國際規則的法律框架下，主辦國如何遵循國際規則，並在國際規則框架下創造性地發揮國內法制的作用。2012年武漢理工大學胡以萍博士，從世博會展示重心的轉變，研究其引發展示手法的多維度和表達的多樣化。(胡斌，2010b；邱一川，2011；胡以萍，2012)

另從大陸的「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博覽會的相關研究，自1999年起約略有300多筆資料，在數量上更是台灣的三倍多。碩士論文當中有60餘筆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有關，若與中國近代參加世博會與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以及世博會專題研究的主要論文，整理如次：首先，就近代中國博覽事業(參加世博會和自辦博覽會)的綜論，2012年有南京藝術學院王玉慧的《晚清政府博覽會管理研究》，介紹中國參與國際博覽會的歷史，從晚清政府對國際博覽會的認識入手，進而重點闡述和分析滿清政府對中國參與國際博覽會事物，以及國內自辦博覽會的具體政策和措施。(王玉慧，2012) 2011年有蘇州大學薛坤的《近代中國博覽事業的起步和發展(1851-1937)》，分晚清和民國兩階段，對中國近代博覽事業進行整理，並揭示博覽事業與國家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薛坤，2011) 2010年河北師範大學的《清末經濟新政與國內商品賽會研究》，從清末經濟新政推動國內商品

賽會發展這個角度，研究清末北京、天津、四川、武漢這幾個區域的商品賽會，把政府的經濟政策與這幾處商品賽會聯繫起來。(丁麗，2010) 華中師範大學的喬兆紅以武漢勸業獎進會為中心，討論商品賽會與湖北早期的現代化，結論指出以商品賽會為媒介，西方文明的輸入是啟動湖北早期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喬兆紅，2000) 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宋茂萃的《晚清海關與世博會》，以1870年代的三次世博會、1980年代的倫敦世博會及20世紀初海關承辦的最後兩次世博會為例，研究由晚清海關代表中國參加世博會，一直到外務部、商部接管承辦的歷史過程。(宋茂萃，2005) 較早在2002年福建師範大學的沈惠芬以《晚清海關與國際博覽會》論文取得碩士學位，她運用豐富的海關檔案資料，對1867年到1905年長達39年的時間，中國海關在總稅務司赫德的把持下，承辦了至少29次中國參與國際博覽會展覽事務承辦權的這一段歷史進行研究，認為晚清中國參加國際博覽會是中國走向世界進程中重要的一步，海關承辦國際博覽會事務在許多具體事務方面是值得肯定。但晚清海關很大程度上無視中國工商界的利益，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阻礙中國向國際博覽會進軍，滿清政府才不得不收回承辦權。(沈惠芬，2002) 有關滿清政府商部與博覽會的專題，有山東師範大學泮君玲的《清末商部：農工商部研究》。(泮君玲，2004)

其次，就民國時期參加世博會和自辦博覽會的碩士論文，綜論有湖南師範大學王水卿的《民國時期中國與世博會關係研究》，介紹世博會的發展歷程，簡要回顧晚清時期中國與世博會的關係切入，進而分析民國時期中國與世博會的關係。(王水卿，2007) 1994年杭州大學的謝輝對1929年西湖博覽會進行個案研究，他指出西湖博覽會是民國史上最具規模的全國性博覽會。不僅促進了我國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具有廣泛的社會教育意義，使人們在開闊眼界的同時，萌發出強烈的憂患意識、競爭意識和對外開放意識。對促進浙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謝輝，1994) 華中師範大學黎秀芳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上海商會與國貨運動研究》，以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的上海商會與國貨運動為研究對象，探討當時上海商會在國貨運動中的角色、作用和影響。(黎秀芳，2011) 更早一些的2003年華中師

範大學洪正強也對1928年的中華國貨展覽會進行專題研究，探討經濟民族主義與中華國貨展覽會的互動關係。在1920年代的中國，面臨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國家與社會都以經濟民族主義與之相對，社會發起了全國聲勢浩大的抵制運動和國貨運動，國貨展覽會也不斷舉辦。1928年中華國貨展覽會之後，國貨展覽會開始制度化，推動了國貨的銷售與改良，提升了經濟民族主義。(洪正強，2003)至於參加世博會的部分，2012年分別有華中師範大學吳偉的《中國參加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之研究》、遼寧大學張敏的《1915年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世界博覽會的歷史考察》、西北民族大學晏翔的《中國參加1933-1934年美國芝加哥世博會的若干問題研究》。(吳偉，2012；張敏，2012；晏翔，2012) 關於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中的關鍵人物，華中師範大學張卉比較中國張謇和日本澀澤榮一的參與中日近代博覽會的活動。(張卉，2012)

三、日本有關中日參與世博會的研究

日本對世博會的研究，時間要比中國早，論文與專書的數量上也比較多。運用日本國立資訊研究所(NII)「學術資訊導覽資料庫」裏的大學圖書館藏書(CiNii Books)搜尋工具，以「博覽會」檢索約有2000多筆書籍，其中近1500筆的書名有出現博覽會的字眼，除開博覽會的公式紀錄、調查及參展成果報告，與本論文題目較為相關者約50筆。以「萬國博覽會」檢索發現有375筆書籍，其中204筆的書名出現萬國博覽會，不計萬國博覽會的公式紀錄、調查及參展成果等報告書的話，與本論文題目較為相關者約20多筆。整理如次：

綜論方面，由籌辦單位、科技作用、國家發展與及文化藝術等角度，討論博覽會的概念、歷史及意義為主。如1933年永山定富就編撰《內外博覽會總說》專書，以籌辦博覽會的需要出發，對博覽會的概念、籌備、參展及海內外博覽會做了開創性的整理，是日本最早的博覽會百科全書。(永山定富，1933) 東京都立大學教

授山本光雄於1970年延續永山定富的架構，完成《日本博覽會史》一書，對日本所舉辦的內外博覽會歷史做再一次的檢視，對如何舉辦博覽會及研究日本博覽會發展，很有參考價值。(山本光雄，1970) 而日本博覽會專家平野繁臣的《國際博覽會歷史事典》，則藉由本身策展人的親身經驗，敘述世博會的發展史，以及日本參與及舉辦世博會，並討論舉辦國際博覽會對日本社會的影響。這三本書所整理的資料，對本論文很有參考價值。(平野繁臣，1999) 這類的專書還有諸岡博熊的《博覽會學肇始》，重點放在如何舉辦博覽會，期望對博覽會的策展人與主辦單位有所助益。(諸岡博熊，1987) 寺下勅的《日本的博覽會》，整理個人的博覽會收藏、相關知識與專文。(寺下勅，2005) 橋爪紳也的《萬國驚奇的博覽會》，也從親身經驗來介紹個人對博覽會的認識。(橋爪紳也，2005) 海野弘的《20世紀萬國博覽會》小冊子，特別針對宣告世博會史進入「美國時代」的1915年舊金山博覽會開始，大約每隔10年找個有代表性的20世紀博覽會作介紹，討論其特色、時代背景、社會情況、展館建築與設計等等。(海野弘，2013) 另椎名仙卓的《日本博物館成立史：從博覽會到博物館》與《圖解博物館史》兩本書，從博物館、藝術展示與博覽會的緊密關係切入，對日本博物館與博覽會的發展史關係有簡要的整理。(椎名仙卓，2000、2005) 名古屋學院大學綜合研究所的《國際博覽會省思：超大型活動的政策學》專書，藉著2005年日本舉辦愛知萬博的機會，從新的觀點討論博覽會為地方帶來經濟與社會的效益，在博覽會效益評估的方法上作出極大的貢獻。(名古屋學院大學綜合研究所，2005)

此外，有從技術發展史的角度切入，如京都大學教授吉田光邦的《技術文明史上的萬國博覽會》一書，對萬國博覽會在促進科技發展中的作用進行系統研究。1981年至1983年間，吉田光邦在日本文部省的支持下，進行為期三年的博覽會研究，將成果出版《萬國博覽會研究》與《圖說萬國博覽會史(1851-1942)》兩本專書，論述世博會史與彙編有關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專題研究，對本論文有參考價值。(吉田光邦編，1996；吉田光邦，1999) 吉田光邦大致延續了福澤諭吉將博覽會視為「智力交易」的看法，指出博覽會係明治時期用來收集經貿商業，乃至

於政治文化的資訊網絡，博覽會這套展示體系對於明治時期推動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及文明開化等主要政策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另由國家發展的角度出發，如東京大學教授吉見俊哉的《博覽會政治學》名著，是從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及大眾娛樂的角度來談世博會的發展。誠如呂紹理教授在中譯本推薦序所言，吉見教授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固然希望透過博覽會試圖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不過這本書中仍有許多饒富興味的歷史場景重建與追索，使讀者不僅能具有理論意涵的透視，也能穿梭於時光隧道，一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博覽會場景，增加讀者的臨場感，更能讓人理解戰前的日本，如何在亦步亦趨學習歐美萬國博覽會的過程中，投射出渴望成為帝國的心願、醉心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夢想、追求奇觀現代都市生活空間與生活方式的這段歷史。(吉見俊哉，1992；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等譯，2010：X) 吉見教授的另外一本著作《萬國博覽會幻想：戰後政治的魔咒》，針對1970年大阪萬博、1975年沖繩世界海洋博覽會、1985年筑波世博會、2005年愛知萬博等日本舉辦的幾次世博會，反省運用萬國博覽會滿足民眾追求富裕與政府加速國家發展的迷思。(吉見俊哉，2005) 而另一代表性人物東京首都大學教授國雄行的《博覽會與明治日本》與《博覽會時代：明治政府的博覽會政策》著書，探討博覽會的導入與舉辦，如何反映主辦機關單位的發展意圖，以及針對明治時期大久保利通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下，所舉辦的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發展歷史與意義，做了完整的歷史分析。(國雄行，2010、2005) 而日本南山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松田京子的《帝國視線：博覽會與異文化表象》一書，則從帝國殖民的角度，討論1903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在本質上已從原來的經濟博覽會轉變成帝國博覽會。(松田京子，2003) 五年後關西學院大學教授山路勝彥的《近代日本的殖民地博覽會》專書，延續帝國殖民的主題，整理日本帝國主義在宣揚國威與頌揚統治台灣、朝鮮及滿州國的殖民成果所舉辦的一系列殖民地博覽會，也討論近代日本殖民起源的「他者像」(日本心中自身以外亞洲野蠻人的意像)。(山路勝彥，2008) 此外，有關討論日本海外參展對國家發展的意涵，有學習院大學的伊藤真實子的《明治日本與萬國

博覽會》，從明治政府海外參展的策略、展品、日本館與配合舉辦的宴會，討論萬國博覽會展示出來的日本意象。(伊藤真實子，2008a) 另2014年山路勝彥教授的《大阪的繁華時光：剖析兩次萬國博覽會》專書，運用豐富的史料，針對日本所舉辦過最具代表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與世博會，也就是同在大阪舉行的明治36年(1903年)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與昭和45年(1970年)的萬國博覽會籌備過程加以檢視比較，並還原兩次博覽會的實際展演狀況。(山路勝彥，2014) 這些專書的論述對本人迭有啟發，整理的資料對本論文也很有參考價值。另堀田綾子的《1910年日英博覽會》一書，指出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及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崛起引起歐洲列強的不安。更在1910年8月日本吞併朝鮮，引起歐美列強更大的疑慮，日本的國際形象更加惡化。日本選擇在1910年的倫敦舉辦日英博覽會，求淡化國際媒體對於日本吞併朝鮮的關注，以及增加歐洲對於日本的認識，俾改善日本的國際形象，鞏固英日同盟關係。(Hotta-Lister，1999) 同樣的，筑波大學藝術學系博士山本佐惠的《戰時舉辦的萬國博覽會與日本的國家形象》一書，討論日本政府在�中日戰爭的時候，如何透過參加1939年美國紐約世博會與舊金山金門大橋國際博覽會，改善日本的負面國際形象，該書詳細檢視參展的美術品、電影、照片與建築等展品與表現方式所呈現出來的日本國家形象。(山本佐惠，2012)

在文化藝術分析方面，博物館、藝術展示向來和博覽會有緊密的關係，日本博物館專家椎名仙卓的《日本博物館成立史：從博覽會到博物館》與《圖解博物館史》兩本書，對日本博物館的發展史與博覽會的關係有簡要的整理。(椎名仙卓，2000 & 2005) 東京藝術大學教授佐藤道信的《明治國家與近代美術：美的政治學》一書，從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與美術行政來研究分析博覽會與博物館，專章討論殖產興業與美術振興的相輔相成關係，指出明治政府參加世博會掀起「日本流風」風潮，尤其是對日本美術審美的崇拜。(佐藤道信，1999) 日本當代美術評論家多摩美術大學教授榎木野衣的《戰爭與世博》，研究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對日本現代美術的影響。日本在1960年代的美術、建築、文學等領域前衛藝術家都參加了大阪萬國博覽會，可說是日本現代藝術家的大集合。「人類的進步與和諧」

是當年世博會的展示主題，但1970年代的日本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世博會的主題願景並沒有實現，因此有「未來夢想廢墟」的批判。(榎木野衣，2005：39-66) 另從經濟史角度，探索博覽會所具有的技術評比與推廣宣導功能，對於促進技術知識普及產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其代表人物為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清川雪彥，曾於1988年於《一橋大學經濟研究》發表〈博覽會與共進會在殖產興業政策所具有的意義〉，再於1995年出版《日本經濟發展與技術的普及》專書，強調技術普及是日本產業革命的重要一環，也是發展近代經濟的一項重要策略，其中有專章討論博覽會與共進會對日本技術普及與市場形成所具有的意義。(清川雪彥，1995：第七章)

有關研究影響日本世博會事業的社會菁英與關鍵人物的專書，追手門學院大學名譽教授伊原澤周的《論日本與中國面對西洋文化的因應之道》，從張之洞的〈勸學篇〉與福澤諭吉的〈學問〉、「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王韜的《扶桑遊記》與竹添光鴻的《棧雲峽雨日記》、最早赴美留學的容闈與新島襄、中日兩國近代設立洋學校講師等的相對比較，論斷中國由於中華思想與儒教至上的價值觀影響，使得汲取西洋文化的困難度是比日本來得高，從中也可以看到中日兩國近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西洋文化，以及對博覽會的不同詮釋。(伊原澤周，1999) 日本德川幕府為了交換《日美通商條約》，1860年組織日本使節團乘坐美國船艦赴美，並派遣「咸臨丸」軍艦護衛，當時福澤諭吉擔任「咸臨丸」軍官木村攝津守的助手隨行。1862年日本派遣以竹內下野守為正使的使節團出使歐洲諸國，福澤諭吉也以翻譯官的身分隨行。福澤經歷兩次海外使節團的洗禮，有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1876年開始編寫出版一套十冊的《西洋事情》，詳盡介紹西方的社會與文化，其中也包括博覽會，認為博覽會不只是智力功夫交易的場所，也是國民不分智愚，都可以相互切磋成就國家近代文明的一種展會。(福澤諭吉，2002) 另東京大學教授芳賀徹的《將軍大人的使節：幕末日本人的西歐體驗》一書，記述1862年日本德川幕府派遣的竹內使節團，遠赴歐洲考察各國社會文化風土民情，順道參觀1962年倫敦世博會的情形，有專章介紹隨行的福澤諭吉，福澤日後成為日本近代化啟

蒙大師，對博覽會做了最有影響力的引介。(芳賀徹，1968) 此外，歷史研究家須見裕的《德川昭武：萬博先生傳記》一書，講述日本德川幕府第14代將軍德川慶喜的弟弟德川昭武，於1867年奉將軍命率領代表團出使巴黎第二屆萬國博覽會，隨行有澀澤榮一、佐賀藩的佐野常民、江戶商人清水卯三郎，遊歷瑞士、荷蘭、比利時、義大利和英國的故事，該書也記載昭武在1903年參觀於大阪舉行的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情形。(須見裕，1984) 澀澤榮一、佐野常民、清水卯三郎等人，日後影響日本博覽會事業至鉅。1872年(明治4年)，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及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員組成50人的使節團，遠赴歐洲修改不平等條約與考察歐美主要國家文物制度，回國後隨團的久米邦武據此編寫《特命全權大臣：米歐回覽實記》於1875年開始發表，記載歐美諸國所見所聞，尤其在1873年順道參觀維也納世博會，記錄了這樣的心得：「歐洲各國有大小國之分。作為國家自主的基本經濟力量來說，大國不足懼，小國不能侮。在最進步的英法兩國工商業有很好的發展。不過，比利時與瑞士小國在博覽會的參展物品，卻也充滿獨創而讓大國感到驚訝。…這種競爭正是「和平的競爭」，對文明世界來說是最重要的競爭。」這些心得日後影響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年輕官員，形成運用博覽會與博物館等設施殖產興業的思想，日後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在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的協助下，以英國與德國為榜樣，大力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久米邦武，1989) 另吉田光邦著書《日本近代化時期雇用的外國人(2)：產業篇》，在討論殖產興業的部分有「博覽會」乙節，從出使巴黎第二屆萬國博覽會代表團的德川昭武、澀澤榮一、清水卯三郎談起，帶出待在長崎的德國人華格納與佐賀藩有田陶瓷產業結緣，往後如何因奧地利駐日公使館的引薦擔任日本參加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事務的顧問，日後協助佐野常民推展日本博覽會事業與落實殖產興業政策。(吉田光邦，1968：74-96) 東京首都大學研究所教授國雄行於2013年出版《佐野常民：佐賀偉人傳》，記述佐野常民在日本博覽會事業的活耀與成就，以及他對日本近代化的貢獻。(國雄行，2013)

另以日本國立資訊研究所(NII)「學術資訊導覽資料庫」裏的期刊論文(CiNii

Articles)搜尋工具，以「博覽會」檢索約有2500多筆文章，以「萬國博覽會」檢索則有500多筆文章，與本論文題目較為相關者約150多筆。摘要比較相關重要者如下：

首先針對博覽會研究文獻檢視與研究趨勢，先後有學習院大學的伊藤真實子的〈博覽會研究動向：現況與意義〉的專文，從博覽會研究的範圍，係學者專家針對19世紀與20世紀各國所舉辦的世博會所做的研究開始，先談歐美主要博覽會研究學者專家的主題與論點，再對日本從1933年永山定富的《國內外博覽會總論》開始，討論日本博覽會研究學者專家有關殖產興業、帝國殖民、國家展示、美術建築及萬博幻滅等主題的演變，對掌握歐美與日本等國家博覽會研究的學者專家、參考書目及主題很有助益。(伊藤真實子，2008b) 金澤大學歷史文化系教授東田雅博的〈世博會研究的最近動向：全球化與大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論文，則偏重20世紀與21世紀的歐美學者研究大博覽會(1851年英國萬國工業博覽會)觀點的轉變，從工業文明、帝國殖民、國家展示到全球化的觀點來討論大博覽會的發展意義。(東田雅博，2012)

其次，有關研究討論博覽會的概念、意義及趨勢的文章，日本博覽會專家平野繁臣從世博會展現人類文明來談博覽會入門概念(平野繁臣，1997)，吉田光邦、吉見俊哉、國雄行、百崎誠等日本博覽會學者專家，分別就日本的博覽會發展史，討論博覽會概念的變化。(吉田光邦，1989；吉見俊哉，1990a、1990b；國雄行，2004) 湯川嘉津美從世博會案例，研究分析明治時期導入西方幼兒教育進程。(湯川嘉津美，1984) 吉田光邦也曾為文討論日本萬國博覽會的教育意義。(吉田光邦，1986) 馮赫陽從世博會看出從西方的「中國流風」(Chinoiserie)到「日本流風」的轉變。(馮赫陽，2010) 高井宏子則從世博會的研究，點出從工業社會的博物學轉變到消費社會的符號學的發展趨勢。(高井宏子，2004) 另日習院大學的伊藤真實子研究整理日本江戶後期到明治初期的百科全書、博物學、博覽會等知識潮流。(伊藤真實子，2012)

再次，有關世博會與日本參展的研究，依世博會舉辦的國家與先後順序來看，神戶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重富公生關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主要以1851年第一屆倫敦萬國博覽會為案例，從博覽會來討論英國的產業、地方產業、製造業及勞工等議題，並從博覽會的展品看英國商品與歐洲產業分工。(重富公生，2001、2003a、2003b、2005、2007、2009、2012) 中部大學教授大島俊一也以第一屆倫敦萬國博覽會為案例，從匯集科學技術發展成果的水晶宮討論當時美國的生產方式。(大島俊一，1996) 而金澤大學歷史文化系的東田雅博教授也關心英國維多利亞時代(1850年-1900年)英國文明的使命與亞洲的印度、中國、日本的意象，以及運用世博會與文化帝國主義來討論當時英國的世界觀。(東田雅博，1992a、1992b) 而愛知淑德大學教授楠元町子最近的一篇論文，是以1862年第二屆倫敦萬國博覽會為案例，研析在倫敦萬國博覽會展現出來的日本形象。(楠元町子，2015) 一橋大學寺本敬子則對1867年第二屆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日本形象撰寫論文。(寺本敬子，2013)

針對1873年在奧地利舉辦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則有名古屋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教授西川智之的兩篇論文，前篇為〈維也納博覽會的「日本流風」〉，後篇為〈維也納博覽會的「日本流風」：與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比較找出日本的形象〉。(西川智之，2006a、2006b) 奈良縣立大學的戶田清子教授也以1873年維也納博覽會為焦點，討論近代日本博覽會事業對振興產業的意義與扮演的角色。(戶田清子，2010) 富士大學研究所教授藤原隆男也就維也納博覽會的特殊性與日本同意參展對其產業發展的意義發表專文。(藤原隆男，2006a、2006b、2007、2008、2009、2011)

至於1876年在北美洲舉行的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有近畿大學九州短期大學教授坂本久子，從日本參加費城萬國博覽會的展品來討論它與之前的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與之後的1878年第三屆巴黎萬國博覽會之間的關係，以及介紹與費城萬國博覽會重要關係人，如大久保利通、西鄉從道、町田久成、田中芳男、德川昭武等人士。(坂本久子，2001、2008、2010a、2010b)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的畑

智子也以1876年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為焦點，研究分析當時的日本徵集的展品、日本的展示空間、日本展館的建築。(畑智子，1997、1998a、1998b) 中央大學研究所的博士生關根仁也撰寫了一篇有關日本參加1876年費城萬國博覽會的過程與狀況的論文。(關根仁，2001) 回到歐洲的法國，於1878年舉辦的第三屆巴黎萬國博覽會，早稻田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樋口いづみ以這屆的巴黎萬國博覽會為案例，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分別討論日本徵集展品主其事者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意圖、日本教育部門的參展，以及日本參展的使命與實際情形。(樋口いづみ，2003、2004、2008a、2008b) 而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系教授吉田典子，則針對1900年第五屆巴黎世博會，在《國際文化學》半年刊發表論文，討論本屆巴黎世博會的政治、文化與象徵意涵。(吉田典子，2000)

再回到美國所舉辦的世博會，國學院大學的平井茜針對1893年美國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的日本館發表論文，而大阪大學的關口英里也以這個芝加哥世博會的女性館，來呈現19世紀的美國女性。關西學院大學名譽教授大井浩二在《人文論究》發表美國的女作家與芝加哥萬國博覽會論文。(平井茜，2014；關口英里，1998；大井浩二，1992) 而1904年美國聖路易世博會，則有愛知淑德大學教授楠元町子針對這個世博會發表多篇論文，從聖路易世博會來討論明治政府的國際戰略、國際關係、皇室外交、日俄戰爭時期的外交、展示與世界觀的形成、日本品牌的萌芽、日本展品與評價、女性參與、不同文化的交流等議題。(參見：楠元町子，2002、2003a、2003b、2007a、2007b、2007c、2009、2010、2011、2012) 學習院大學的伊藤真實子也從聖路易世博會，討論日俄戰爭時期的日本外交。(伊藤真實子，2003)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的畑智子也以聖路易世博會的日本館建築，以及這個世博會的文化交流與民族主義，來看19世紀的日本。(畑智子，1998、2000) 愛知淑德大學的渡邊かよ子討論聖路易世博會的「教育」，奈良女子大學的久本明日香則研析聖路易世博會「娛樂街」的設置。(渡邊かよ子，2003；久本明日香，2007)

然後，有關日本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研究，概論有國雄行對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基礎研究，討論殖產興業、不平等條約及內國的意義等議題。(國雄行，1993)

天野史郎則為文介紹法國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天野史郎，1992) 個案則有丸山宏的〈明治初期的京都博覽會〉(丸山宏，1996)，國雄行的〈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與大阪〉(國雄行，2003)，關根仁的〈明治16年水產博覽會的舉辦〉(關根仁，2004) 松田京子亦曾對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與大阪的議題撰寫論文，以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為主軸，討論展示「他者」(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表象的技法，以及帝國博覽會與作為「東洋商都」的大阪。更以1914年東京大正博覽會與1922年和平記念東京博覽會，研究分析大正時期的「南洋」表象。(松田京子，1998、2002、2015) 延續松田京子以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討論展示「他者」表象的技法與帝國博覽會的議題，伊藤真實子曾為文介紹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的台灣館與人類館，並討論帝國殖民與人種展示等議題。(伊藤真實子，2005) 有關殖民地與人種展示方面，關西學院大學教授山路勝彥有多篇論文，研究在日英博覽會設置「人間動物園」、拓殖博覽會與帝國版圖裡的諸人種、台灣與滿洲所舉辦的殖民地博覽會等主題。(山路勝彥，2004、2005、2006、2009) 以及有關研究日本博覽會事業關鍵人物的文章，博覽會研究專家寺下勅曾就幕末與明治時期的博覽會先驅，如栗本鋤雲、清水卯三郎、佐野常民、福澤諭吉、田中芳男、澀澤榮一、手島精一等人，做簡要的生平事蹟介紹。(寺下勅，2005：52-58) 松村昌家則有三篇討論1862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出現的幕末使節團專文(松村昌家，1997、2003、2004)，隨後大前義幸也發表〈考察第二屆倫敦萬國博覽會的江戶末期日本使節團一行〉專文。(大前義幸，2008) 愛知峰子、澤護、關根仁、嚴安生分別對日本博覽會事業關鍵人物的樋口一葉、清水卯三郎、大倉孫兵衛、佐野常民、久米邦武做專文的介紹。(參見：愛知峰子，2008；澤護，1981；關根仁，2010；嚴安生，2006)

最後，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的博覽會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國外博覽會研究的影響，尤其是日本學者專家，他們對中國近代博覽會的研究較早，1970年代倉橋正直的〈清末實業的振興〉與著名學者野澤豐先生也注意到近代中國的博覽會事業，先後發表了〈1903年大阪博覽會與張謇來日〉、〈辛亥革命與產業問題：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與日、美實業團的訪華〉及〈民國初年袁世凱政權的經

濟政策與張謇》三篇開創性的論文。(倉橋正直，1973；馬敏，2010：158) 稍後發表的代表性論文還有吉田光邦的〈1910年南洋勸業會始末〉、小島淑男的〈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和東南亞華僑〉、鈴木智夫的〈李圭訪美與在美國的華人〉、〈萬國博覽會與中國(1851年~1876年)〉、〈清朝赴美教育使節團與在日/在美的華人(1)~(4)〉、〈祁兆熙的『出洋見聞瑣述』(一)~(二)〉等諸篇。(吉田光邦，1986；小島淑男，1994；鈴木智夫，1995、1996、1997~2000、2001~2002) 其中鈴木智夫的〈萬國博覽會與中國(1851年~1876年)〉專文，整理滿清政府對博覽會觀念的演變，與中國海關在清政府海外參展所扮演的角色，對本論文很有參考價值。(鈴木智夫，1996) 2004年奈良女子大學久本明日香發表〈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與清末中國〉，討論中美兩國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形象。隔年2005年愛知淑德大學楠元町子的〈萬國博覽會與中國〉，也是以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案例，來分析中國的自我認知。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之際，愛知學院大學柴田哲雄的〈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世界博覽會〉一文，研究分析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神戶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重富公生也對上海世博會做了巡禮，討論它在世博會歷史上的位置。(重富公生，2010) 2013年一橋大學的小倉康寬在《言語社会》專刊發表〈1855年萬國博覽會的中國美術展〉專文，從中國美術展其實是工業展覽的屬性，討論中國美術在法國吸收東洋美術觀念的角色。(久本明日香，2004；楠元町子，2005；柴田哲雄，2010；小倉康寬，2013)

再以日本國立資訊研究所(NII)「學術資訊導覽資料庫」裏的博士論文(CiNii Dissertations)搜尋工具，以「博覽會」檢索有54筆博士論文，以「萬國博覽會」檢索則有17筆博士論文，整理與本論文題目較為相關者如次：較早期的有神戶大學三島雅博於1993年完成的《明治時期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日本館研究》博士論文，整理分析明治政府參加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1876年費城萬國博覽會、1878年巴黎萬國博覽會、1889年巴黎萬國博覽會、1893年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等世博會的日本館建築，以及參展組織、展品與九鬼隆一、山高信離、岡昌覺三等世博會關鍵人物。(三島雅博，1993) 同年法政大學的宮永孝完

成《德川幕府末期遠赴荷蘭的日本留學生研究》博士論文，其中第三章談到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巴黎萬博使節團及使節團長德川昭武。(宮永孝，1993) 2001年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畑智子的《1876-1904年間美國三屆萬國博覽會的日本建築》博士論文，研究分析1876年費城萬國博覽會、1893年芝加哥萬國博覽會、1904年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等三屆世博會的日本館建築，對這三屆世博會有概要的敘述。(畑智子，2001) 2006年學習院大學伊藤真實子的《明治政府與萬國博覽會》博士論文，從明治政府海外參展的策略、展品、日本館，討論近代日本在萬國博覽會的自我認識。(伊藤真實子，2006) 另2010年奈良女子大學久本明日香則以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案例，分析討論中美兩國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形象。(久本明日香，2010) 兩年後的2012年一橋大學寺本敬子完成《1867年/1878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日本：早期日法兩國交流中形成的日本形象》博士論文，則藉由日本政府首次正式參加的1867年第二屆巴黎萬國博覽會與後來的1878年第三屆巴黎萬國博覽會，研究分析日本與法國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日本形象。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之後，日本在法國的知名度大大提升，甚至掀起「日本流風」的一種和風熱潮，特別是對日本美術審美的崇拜。(寺本敬子，2012) 另早稻田大學福井庸子的《日本博物館成立過程的研究：展示空間的教育特質》博士論文，研究分析從1750年代物產會勃興，到1860年代接觸西方博覽會與博物館，再到1870年代明治維新的廣設博物館與博覽會，最終1900年代博物館正式肩負社會教育機關使命的過程，並討論明治時期博物館與博覽會等展示空間的教育特質。(福井庸子，2010)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丁日初、杜詢誠(1983) <十九世紀中日資本主義現代化成敗原因淺析>，《歷史研究》，第1期，pp.37-53。
- 丁長清主編(2010a)《中國與世博會三部曲①解說世博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2010b)《中國與世博會三部曲②參與世博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2010c)《中國與世博會三部曲③舉辦世博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丁錫鏞(2006a)《1851至2005年世界博覽會全紀錄(上冊)》，臺北市：嵐德智庫。
- (2006b)《1851至2005年世界博覽會全紀錄(中冊)》，臺北市：嵐德智庫。
- (2006c)《1851至2005年世界博覽會全紀錄(下冊)》，臺北市：嵐德智庫。
- 丁麗(2010)《清末經濟新政與國內商品賽會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上海市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2007)《走近世博會：迎接百年難逢的大機遇》，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2010)《城市發展中的中國智慧》，上海市：文匯出版社。
- 上海世博雜誌編輯部(2008a)《走進世博會：世博歷史150年》，上海市：東方出版中心。
- (2008b)《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概覽》，上海市：東方出版中心。
- (2009)《世界文明的盛會：走進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上海圖書館(2002)《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于桂芬(2003)《西風東漸：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 中央月刊(1970) <大阪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館>，《中央月刊》，第2卷，第6期，pp.37-40。
- 中華民國參加1974年世界博覽會執行小組(1975)《中華民國參加1974年史波肯世界博覽會工作報告》，中華民國參加1974年世界博覽會工作指導委員會。

-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05)《我國參加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執行總報告》，臺北市：經濟部委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編印。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2000)，《二十四史：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2007)《清宮萬國博覽會檔案》，北京市：廣陵書社。
- 尹淑梅、屈春海(2006)〈清政府參加比利時萬國博覽會後的政策調整〉，《歷史檔案》，第3期，pp.91-96。
- 尤建新、丁潔民、陳迅等著(2006)《合作與協調：上海世博會管理問題研究》，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王水卿(2007)《民國時期中國與世博會關係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王正華(2003)〈呈現「中國」：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p.421-475。
- 王玉慧(2012)《晚清政府博覽會管理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
- 王春雷(2008)《基于有效管理模型的重大事件公眾參與研究》，同濟大學城市管理與建設工程管理博士論文。
- 王曉秋(2012)《東亞歷史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07)〈三次集體出洋之比較：晚清官員走向世界的軌跡〉，《學術月刊》，第6期，pp.140-145。
- (1998)〈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之比較〉，《文史知識》，第6期，pp.40-46。
- 王桂巖(2008)〈鄭和下西洋的史實及其在航海史上的偉大貢獻〉，載於「大華技術學院選修課程：跟著鄭和下西洋」的論文一覽，
<http://zhenghe.tust.edu.tw/consult.htm>。
- 王傳瑞(1999)〈清末南洋勸業會的產生及影響〉，《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1期，pp.46-54。
- 王銘(1997)〈殖產興業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遼寧大學學報》，第6期，pp.85-88。
- 王翔(1989)〈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里程碑：1910年南洋勸業會述論〉，《江海學刊》，第3期。
- 王翔、黃錫明(1993)〈民國博覽會縱覽〉，《民國春秋》，第2期。
- 王韜(2008)《漫遊隨錄》，載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6

- 冊，長沙市：岳麓書社，pp.37-156。
- (1982)《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
- 古偉瀛(1986)〈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第3期，pp.249-266。
- 史成虎、張曉紅(2012)〈清末新政失敗原因新解：以路徑依賴為視角〉，《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5期，pp.1-7。
- 田瑞良、游志青(2004)〈打造花田城市：從2004臺灣花卉博覽會談起〉，《社區發展季刊》，第107期，pp.161-170。
- 田毅鵬(2011)《知識·思想·權力：中日現代“世界秩序觀”形成之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5)〈中日現代化起點的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pp.126-133。
- (2001a)〈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一百年〉，《世界歷史》，第3期，pp.102-110。
- (2001b)〈中日早期現代化的比較〉，《人民網》，2001年2月20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24/20010220/399994.html>
- (1996)〈中日近代世界觀的形成與兩國早期近代化的成敗〉，《日本研究》，第1期，pp.45-50。
- (1994)〈略論鎖國閉關時代中日認識西方的情報系統〉，《日本研究》，第2期，pp.50-54。
- (1993)〈近代中日兩國出使西洋的比較研究〉，《歷史教學》，第4期，pp.14-18。
- 石川豪(2005)《殖民教化與「未開化」意象的再現：以四個博覽會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中國早期博覽會資料彙編第一冊》，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 光復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1990)《大美百科全書》，臺北市：光復書局。
- 外交部(1968)〈參加蒙特婁國際展覽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1968/02/08〉，《外交部檔案典藏》，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pp.1-7。
- 行政院經建會(2003)《「2008臺灣博覽會條例」特別法草案期末報告書》，臺

- 北市：行政院經建會委託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編印。
- 朱 英(2000) <清末武漢勸業獎進會述略>，《歷史研究》，第 4 期，pp.186-189。
- (1996) 《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1988) <端方與南洋勸業會>，《史學月刊》，第 1 期，pp.68-70。
- 艾險峰(2011) 《博覽會與武漢城市社會互動發展研究(1909-2010)》，華中師範大學土地資源管理博士論文。
- 李少軍(2001) <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綜述>，載於《近代史研究》，第 4 期，pp.261-299。
- 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等編著(1985)《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李永熾(1997) 《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臺北市：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初版三刷。
- 李兆祥(2008) 《近代中國的外交轉型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佳峯、莊文儀(2015) 《赴義大利參觀 2015 米蘭世博及拜會食品安全研究管理相關單位機構》，經濟部工業局出國報告。
- 李政亮(2006) <帝國、殖民與展示：以 1903 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pp.31-46。
- 李清景、陳國華(2010)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之探討>，2010 設計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pp.219-228。
- 李瑞麟(1996) 《突破研究與寫作的困境》，台北市：茂榮圖書有限公司。
- 李愛麗(2004) <赫德與博覽會>，載於中國海關學會編《赫德與舊中國海關論文選》，北京市：中國海關出版社，pp.214-225。
- 李建鋼(2010) <中日閉關鎖國政策異同論析>，《理論導刊》，第 3 期，pp.111-112，107。
- 李 丹(2010) <1902 年河內博覽會述略>載於馬敏主編《博覽會與近代中國》，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pp.147-165。
- 李 圭(2008) 《環遊地球新錄》，載於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6 冊，長沙市：嶽麓書社，pp.187-354。
- (1997) 《環遊地球新錄》(電子書)，載於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研製開發，《中國基本古籍庫》，伺服器：140.112.114.78，北

- 京：黃山書社。
- 李 軍(2015) <中國早期博物館知識的傳播：以 19 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中文報刊為例>，載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編《博物館學季刊》，第 29 卷，第 2 期，pp.5-21。
- 李 嘉(1970) <大阪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館的建館功臣>，《中央月刊》，第 2 卷，第 6 期，pp.41-44。
- 希吾譯(1974) <一九七四年世界博覽會>，《拾穗》，第 291 期，pp.60-61。
- 汪岳波(2000) <晚清政府參加國際博覽會述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友誼，pp.1196-1205。
- 汪 榮(2006) <論晚清新政中的經濟政策及其法制措施>，《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pp.74-80。
- 汪榮祖(2000)《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湖南長沙市：嶽麓書社，第 1 版。
- (1993)《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
- 沈 原(2006) <中西文化的交融與碰撞：記晚清政府派員參加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歷史檔案》，第 4 期，pp.72-76。
- 沈惠芬(2002)《晚清海關與國際博覽會》，中國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沈祖煒(1983) <清末商部、農工商部活動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2 期，pp.100-110。
- 村山宏(2015) <中國和日本國力何時出現逆轉>，載於《日經中文網》，2015/11/09，<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special/16786-20151109.html?start=1>
- 邢建榕(2010) <參加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的溥倫貝子>，《世紀》，第 6 期，pp.36-37。
- 吳海勇(2010) <中國人參與世博會的百年記憶與史鑒>，《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1 期，pp.13-18。
- 吳志強主編(2009)《上海世博會可持續規劃設計》，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吳信訓主編(2011)《“後世博”與上海發展》，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 (2010)《上海世博與上海發展》，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 吳 偉(2012) 《中國參加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之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吳 靖(2012) 《文化現代性的視覺表達：觀看、凝視與對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吳建中(2010) 《世博啟示錄》，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 (2008) 《世博會主題演繹》，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吳建民、施燕華合著(2009) 《我與世博有緣》，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
- 呂紹理(2008) <臺灣史上第一場「小人國」博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pp.125-156。
- (2005)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出版。
- (2003) <展示殖民地：日本博覽會中臺灣的實像與鏡像>，《2003年度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歷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台北：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 (2002) <展示臺灣：一九〇三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台灣史研究》，第9卷，第2期，pp.103-144。
- 呂瑋宗(2002) <世博會總規劃師稱奧運世博是中國經濟「雙響炮」>，《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8-10/30/content_16688982.htm。
- 呂建昌(2013) 《上海世博會與未來上海發展》，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 宋茂萃(2005) 《晚清海關與世博會》，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
- (2004) <近代中國海關與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桂海論叢》，pp.133-134
- 宋楚瑜(1983) 《如何寫學術論文》，台北市：三民書局。
- 宋媛媛、姚繼中(2014) <幕府末期儒學思想助推西洋文明攝入小考：以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橋本左內為中心>，《外國語文(雙月刊)》，第30卷，第6期，pp.41-45。
- 何芳川(1988) <近代東方的沉淪和日本的崛起：世紀日、中成敗的比較>，《世界歷史》，第3期，pp.23-32。
-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2010) 《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
- 周秀琴(2010) 《世博會與博物館：演繹與思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版。

- 周秀琴，李近明編著(2009) 《文明的輝煌：走進世界博覽會歷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 周芳美(2011)〈1926年費城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和日本藝品之展示〉，發表於**2011 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議**，台北：陽明大學，pp.3-4。
- (2010)〈1933~34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和日本藝品之展示〉，《**藝術學研究**》，第6期，pp.161-230。
- (2009)〈1915年中華民國和日本參展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美術宮之初論〉，載於林文淇、吳方正主編《**觀展看影：華文地區視覺文化研究**》，pp.95-124。
- 周喬蓁(2012) 《**世界博覽會國家形象館之服務設計探索：以2014年米蘭世界博覽會台灣館服務創作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漢民(2011) 《**十年世博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居蜜主編(2010) 《**1904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金普森、謝輝(2004)〈政府政策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興衰〉，《**歷史教學問題**》，第4期，pp.4-10。
- 金觀濤、劉青峯(1987)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台北市：天山出版社。
- 金耀基(1990) 《**中國現代化的歷程：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1987) 《**從傳統到現代**》，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1984) 《**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林芳(2009) 《**中國近代博覽會之第一人：陳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林士鈞(2006) 《**1931年萬國殖民博覽會：一種對殖民地的有限想像，以印度支那館為例**》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林文通(2003) 《**日據時代始政30週年紀念博覽會之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設計所碩士論文。
- 林芳、謝輝(2005)〈論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衰落的原因〉，《**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7卷，第3期，pp.63-66。

- 林品章(2003) **《臺灣近代視覺傳達設計的變遷：臺灣本土設計史研究》**，台北：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林品章、蘇文(2000)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研究：展覽會場與設施>，《**設計學報**》，第5卷，第1期，pp.19-32。
- (1999) <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研究：展出背景、規模與宣傳>，《**設計學報**》，第4卷，第2期，pp.73-87。
- 林海曦(2015) <淺析陳琪的博覽會文化觀>，《**社會科學戰線**》，第8期，pp.256-259。
- 林孟臻、李欣岱、游文瑜、汪世潔、林茂榮(2013) <國際臺北花卉博覽會展場空氣中微生物菌種與濃度分布>，《**臺灣公共衛生雜誌**》，第32卷，第5期。
- 林碧郁(2007) **《台灣舉辦博覽會參觀旅客對經濟效益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林劍秋(2005) <台灣博覽會與地區發展>，發表於台南縣政府主辦「總體發展願景研討會」，民國94年2月25日。
- (1997a) <韓國世界大田博覽會籌備組織運作出國訪談報告>，台北：資訊工業策進會。
- (1997b) <他國舉辦世界博覽會之推動經驗出國訪談報告>，台北：資訊工業策進會。
- (1997c) <訪談日本博覽會與Events產業相關單位出國報告>，台北：資訊工業策進會。
- (1993a) <西班牙萬國博覽會會後設施運用效益考察報告>，台北：資訊工業策進會。
- (1993b) <韓國大田科技博覽會心得報告>，台北：資訊工業策進會。
- 季鳳文(2002) <奕訢洋務思想淺論>，《**安徽史學**》，第4期，pp.25-27。
- 邱一川(2012) **《世界博覽會主辦國的法制創造：遵循國際規則的機制與實踐》**，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 **《世界博覽會主辦國法律制度與國際規則的協同關係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博士論文。
- (2006) **《世界博覽會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 邱靖鈺(2012) <咎責迴避的策略應用：以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為例>，《**東吳**

- 政治學報》，第 30 卷，第 3 期。
- 東方申報(2010)《世博看榜：150 年世博會精彩鉤沉》，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金普森、謝輝(2004)〈政府政策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的興衰〉，《歷史教學問題》，第 4 期，pp.4-10。
- 金鐘范(2003)〈韓國大田世博會舉辦效益評價與啟示〉，《外國經濟與管理》，第 25 卷第 5 期，pp.44-48。
- 青山治世(2010)〈晚清郭嵩燾與上海博覽會計劃〉，《百年潮》，第 11 期，pp.72-76。
- 武堉幹(1929)〈近代博覽會事業與中國〉，載於《東方雜誌》，第 26 卷，第 10 期，轉引自商務印書館民國期刊總輯全文數據庫(<http://cpem.cp.com.cn/Detail/9wxOAY4MXoI=>)
- 芝原拓自(1986)〈論中日兩國的近代化：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對比分析〉，《日本研究》，第 3 期，pp.50-70。
- 胡家瑜(2005)〈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62 期，台灣大學人類學系，pp.3-39。
- 胡雪芳(2006)《世界博覽會及會場後續利用評估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胡以萍(2012)《論世博會展示設計的多維表達》，武漢理工大學博士論文。
- 胡志剛(2002)〈世博會將給我們帶來什麼？中國期盼 2010 世博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2-02/07/content_272022.htm。
- 胡 斌(2010a)《世博與國家形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10b)《何以代表中國：中國在世博會上的展示與國家形象的呈現》，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
- 俞 力主編(2009)《歷史的回眸：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故事(1851-2008)》，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 俞 力(2008)《水的故事：西班牙 2008 年薩拉戈薩世界博覽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 郁鴻勝(2010)《立意上海世博會的歷史回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洪振強、艾險峰(2009)〈論晚清社會對博覽會的觀念認知〉，《學術研究》，第 2 期，pp.101-108。

- 洪正強(2003) 《1928年中華國貨展覽會研究》，中國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相瑞花(1999) 〈試析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pp.76-82。
- 姚傳德(1995) 〈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較〉，《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pp.199-206。
- 徐波(2010) 《上海世博會人類跨文化對話》，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 唐子來、趙渺希(2004) 〈世界博覽會的經典案例研究之三：1992年塞維利亞世博會〉，《城市規劃彙刊》，第3期，pp.39-42。
- 馬克斌主編(2007) 《會展典型案例精析》，重慶市：重慶大學出版社。
- 馬敏(2010a) 《博覽會與近代中國》，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0b) 〈世博會與近代東亞的參與〉，《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3期，pp.77-87。
- (2010c) 〈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的商品賽會〉，《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pp.78-81。
- (2004) 〈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與科技、文化傳播〉，《歷史研究》，第2期，pp.98-117。
- (2001) 〈張謇與近代博覽事業〉，《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5期，pp.14-21。
- (1997) 〈有關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幾點思考〉，《天津社會科學》，第9期，pp.95-104。
- (1996) 〈中國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張謇與澀澤榮一之比較觀〉，《近代史研究》，第9期，pp.120-139。
- (1988) 〈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近代史研究》，第1期，pp.115-132。
- (1985) 〈清末第一次南洋勸業會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pp.73-78。
- 馬敏、彭南生主編(2009) 《中國近現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
- 馬敏、艾險峰 〈張謇與20世紀初年的博覽會：一個跨文化互動的歷史觀察〉，
http://www.princeton.edu/~colcutt/doc/MaMin_Chinese.pdf，pp.1-3。

- 殷允芃編(1985)《太平洋世紀的主人》，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 殷海光(1990)〈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載於金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歷程：知識份子與中國現代化》，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郭定平(2009)《世博會與國際大都市的發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郭廷以(1980)〈中國近代化的延誤〉，載於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一輯，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pp.63-84。
- 郭嵩燾(2008)《倫敦與巴黎日記》，鐘叔河、楊堅整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郭 慧(2006a)〈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上)〉，《歷史檔案》，2006年第1期，pp.37-44。
- (2006b)〈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中)〉，《歷史檔案》，2006年第2期，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pp.17-21。
- (2006c)〈清末米蘭博覽會給中國商民的啟示〉，《歷史檔案》，2006年第2期，pp.126-127。
- (2006d)〈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參加意大利米蘭賽會史料(下)〉，《歷史檔案》，2006年第4期，pp.11-18。
- 倪 堯(2013)《城市重大事件對土地利用的影響效應及機理研究》，浙江大學土地資源管理博士論文。
- 美國國務院(2006)〈美國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1900 - 2001)〉，《美國國務院電子期刊》，2006年4月號。
- 晏 翔(2012)《中國參加 1933-1934 年美國芝加哥世博會的若干問題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 孫占元(2000)〈中國近代化問題研究述評〉，《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pp.154-162。
- 孫建國、村上直樹、陳文舉(2013)《中日工業化進程比較》，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 孫瑜鑫(2013)〈從“朝貢體系”到“條約體系”看近代中國外交的轉型〉，《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總第156期，pp.152-155。
- 孫耀中(2007)《近代成都勸業會研究》，四川大學碩士論文。
- (2005)〈從花會到勸業會：成都廟會文化的歷史沿革〉，《文史雜誌》，

- 117 期，2005 年第 3 期，pp.16-19。
- 莫建清(1998) <談如何旁徵博引、小題大作從事語言學研究論文之寫作>，《國立政治大學學報》，77 期。
- 曹俊漢(1978) 《研究報告寫作手冊》，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 陳占彪編(2010) 《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正茂(2009) 《各擅風騷：民國人和事》，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 陳其澎(2011) <論展示在博覽會與博物館的角色>，《建築學報》，第 10 卷，pp. 47-71。
- (2005) <十九世紀萬國博覽會的殖民意涵>，《設計學研究》，第 8 卷，第 2 期，pp.81-97。
- 陳君聰(1999) 《現代化先鋒：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陳信康主編(2006) 《上海世博經濟研究專論》，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 陳郁婷、張靜文、洪念慈(2012) <國際臺北花卉博覽會展場空氣中微生物菌種與濃度分布>，《臺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31 卷，第 3 期。
- 陳惠美、劉喜臨(2013) <大型活動之城市意象塑造與城市行銷：遊客對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知覺效益之研究>，《造園景觀學報》，第 19 卷，第 2 期。
- 陳瑋芬(2008) <西學啟蒙：由中村敬宇和嚴復的翻譯事業觀其會通東西的實踐>，《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1 期，pp.61-111。
- (2007) <西學之子：容闈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pp.223-265。
- 陳景彥(2006) <西風東漸與中日知識份子的回應>，《歷史研究》，第 3 期，pp.150-166。
- 陳燮君主編(2012) 《世博詞庫》，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張元隆(2006) <文牘李圭與費城博覽會>，《秘書》，pp.24-25。
- 張世朋(2005) 《日治時期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 張世賢、馬莉(2004) <奧運經濟與世博經濟之比較研究>，《社會科學》，5 期，pp.19-24。

- 張朋園(2002) 《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市：百花洲文藝。
- 張郁琪(2013) 《女性的展示與被展示：以 1876、1893、1915 年美國世界博覽會婦女館為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海林(2007) 《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
- 張煜權、藍怡慧、林佩怡、林佩君、林立凡(2013) 〈以遊客滿意度探討舉辦大型節慶活動之關鍵要素：以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為例〉，《醒吾學報》，第 47 期。
- 張學勤(2010) 〈中國提出舉辦世博時間早於鄭觀應盛世危言〉，2010 年 6 月 11 日《浙江日報》，載於華夏經緯網(<http://hk.huaxia.com/zhwh/sslh/>)
- 張 卉(2012) 《溷澤榮一和張謇博覽活動的比較研究》，華中師大碩士論文。
- 張偉、黃薇(2010) 〈世博舞臺上的中國鏡像〉，《檔案春秋》，pp.13-15。
- 張暢、劉悅(2012) 《李鴻章的洋顧問：德瑾琳與漢納根》，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張 敏(2012) 《1915 年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世界博覽會的歷史考察》，遼寧大學碩士論文。
- 梁雅惠(2010) 〈日治時期博覽會中「臺灣喫茶店」之研究〉，《史匯》，第 14 期，pp.111-134。
- 梁碧瑩(2004) 《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歷史考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88) 〈民初我國實業界赴美的一次經濟活動--中國與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近代史研究》，第 1 期，pp.81-99。
- 崔 寧(2008) 《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間再構：以上海世博會為例》，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 惟 儀(1970) 〈一九七四年世界博覽會〉，《中央月刊》，第 2 卷，第 6 期，pp.41-44。
- 莊永明(1996) 《台灣鳥瞰圖：一九三〇台灣地誌繪集》，臺北市：遠流。
- 黃琪惠(2006) 〈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 年博覽會中的「臺灣歷史畫」〉，《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0 期，pp.109-149+151-173+178。
- 黃鶴群(2010) 〈張謇是中國近代世博事業的先驅者〉，《中國市場》，第 26 期，頁 148-149。

- 黃馨瑩(2011)《日治初期水產政策的推動：水產博覽會對臺灣水產業的影響(1895-1910)》，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許峰源(2009)〈晚清中國參與 1906 年米蘭博覽會之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 23 期，頁 161-188。
- (2008a)〈晚清博覽會的變遷(1905-1911): 主導權的移轉與參展制度的建立〉，載於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頁 357-372。
- (2008b)〈日本大阪內國勸業會與清末中國博覽會的興起〉，載於《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上冊，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頁 136-151。
- (2007)〈清季那桐赴日考察與新政的開展〉，《成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頁 139-158。
- (2005)〈從 1905 年黎業斯博覽會考察中國海關權力的轉移〉，《近代中國》，第 163 期，頁 132-157。
- 許海娜(2013)《1901-1928 年間天津展覽會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陶德民、朱蔭貴、馬學新、木村昌人合編(2012)《世博會與東亞的參與》，上海人民出版社。
- 屠坤華(2012)《萬國博覽會遊記》，臺北市：知識產權出版社。
- 鹿野政直(1987) 卞崇從道譯《福澤諭吉》，北京市：三聯書店。
- 傅雲龍(2005)《傅雲龍日記》，杭州：浙江古籍。
- 華力進(1980)《政治學》，台北市：經世書局。
- 馮瓊瑩(2005)《展示「統治時間」：日據時代「始政週年紀念博覽會」的治理技術》，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子芳(2009)《應用服務科學於會展產業之系統化服務創新：以世界博覽會為例》，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碩士論文。
- 曾碧淵(2007)〈未來國家發展計畫與就業市場趨勢〉，http://www.mdu.edu.tw/~dba/chinese/14/retailing/14_03/961121.ppt 96/11/21。
- 焦貴平、曾原編著(2008)《收藏世博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 喬兆紅(2011a)〈世界博覽會與世界歷史整體發展〉，《社會科學》，第 4 期，pp.158-167。
- (2011b)〈智力之交易：近代日本與世界博覽會：以 1873 年維也納世博會為中心〉，《廣東社會科學》，第 3 期，pp.151-159。

- (2010a) <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局限性>，《上海經濟研究》，第3期，pp.110-120。
- (2010a) <上海商會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史林》，第2期，pp.15-23。
- (2010b) <史上世博：觀念碰撞與文明演進的舞台>，《北京日報》，2010年04月26日。
- (2009a) 《百年演繹：中國博覽會事業的嬗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b) <中國與世界博覽會：西學東漸與中學西漸>，《學術月刊》，41卷，11月號，pp.147-154。
- (2009c) <上海世博會與中國的發展：從中國瞭解及參與世博會的歷史談起>，《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pp.26-31。
- (2009d) <強國世博與世博強國>，《上海經濟研究》，第10期，pp.111-120。
- (2008a) 《一切始於世博會：博覽效應與社會發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2008b) <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政府行為>，《社會科學》，第2期，pp.154-162。
- (2008c) <世博讓主辦國經濟出現奇蹟>，《檢察風雲》，第23期，pp.8-10。
- (2008d) <開一時之風氣策異日之富強：論1910年南洋勸業會>，《歷史教學》，2008年第18期，pp.11-17。
- (2007a) <天津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歷史教學問題》，第1期，pp.53-58。
- (2007b) <世界博覽會：從帝國角逐到和平友愛之競爭>，《世界經濟與政治》，第5期，pp.30-36。
- (2005) <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發生與發展>，《上海經濟研究》，第8期，pp.89-96。
- (2003) <論1909年的武漢勸業獎進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3期，2003年第4期，pp.55-58。
- (2000) 《商品賽會與湖北早期現代化：以武漢勸業獎進會為中心》，中

國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彭澤益(1983)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北京市：人民出版社。
- 彭慧媛(2005) 《日治前期「殖民臺灣」的再現與擴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1916)為中心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程佳惠(2004) 《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 SHOW》，臺北市：遠流。
- (2001) 《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載 澤(2008)，《考察政治日記》，載於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4冊，長沙市：嶽麓書社，pp.561-686。
- 楊彥華、冷啟迪、陳恒才(2010) 〈追夢：香山人與百年世博〉，《新民晚報》，2010年1月21日。
- 楊瑞松(2010) 〈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21卷，第2期，pp.107-163。
- 楊智友(2010) 〈赫德之賽會：晚清中國海關與世界博覽會〉，《傳記文學》，96卷，第5期，pp.22-29。
- 楊潔勉(2011) 《中國世博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
- 董增剛(2000) 〈晚清赴美賽會述略〉，《北京社會科學》，第2期，pp.97-103。
- 葉嘉楠、邊魯興(2013) 〈政策與行銷成效評估之研究：以2010臺北市國際花卉博覽會為例〉，《中華行政學報》，第12期。
- 靳叢林、陳泓、張福貴譯(1990) 《外來文化攝取史論：近代西方文化攝取思想史的考察》，長春市：吉林教育出版社。
- 經濟部(2004a) 《2008台灣博覽會可行性研究》，臺北市：經濟部。
- (2004b) 《2008台灣博覽會綜合規劃》，臺北市：經濟部。
- (1998) 《行政院指示本部籌備博覽會案：資訊科技博覽會計畫書草案》，臺北市：經濟部。
- 經濟部科技顧問室(1992a) 《我國於西元2000年之前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之財務可行性評估》，臺北市：經濟部委託台灣嵐德科技顧問公司編印。
- (1992b) 《我國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之可行性評估》，臺北市：經濟部委託台灣嵐德科技顧問公司編印。

- (1991) 《西元 2000 年我國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之可行性評估》，臺北市：經濟部委託台灣嵐德科技顧問公司編印。
- 經濟部技術處(1996) 《我國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可行性分析報告》，臺北市：經濟部。
- 資策會(2001) 《國際資訊展成果彙編總覽》，臺北市：經濟部委託資訊工業策進會編印。
- (1995) 《我國舉辦世界資訊科技博覽會規劃設計報告書》，臺北市：經濟部委託資訊工業策進會編印。
- 廖文碩(2011) <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1945~1948)>，《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4 期，pp.181-222。
- 端方、陳啟泰(1909) <兩江總督端方蘇巡撫陳會奏創辦南洋第一次勸業會摺>，《東方雜誌》，第 6 卷，第 4 期，轉引自商務印書館民國期刊總輯全文數據庫(<http://cpem.cp.com.cn/Detail/FkdyNzaJlcY=>)。
- 閔根仁(2010) <澀澤榮一見到的 1867 年巴黎世界博覽會與歐洲近代經濟社會>，載於馬敏主編《博覽會與近代中國》，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pp.71-87。
- 潘家德、劉開清(1999) <簡論近代中國對外賠款及其影響>，《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pp. 19 -22。
- 趙致真(2010) 《造物記：世博會的科學傳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趙祐志(1997) <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 (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pp. 287 -344。
- 趙德宇(1995) <從林則徐和渡邊華山看近代轉折點上的中日西洋學>，《日本研究》，第 6 期，pp.39-45。
- 鄧昌國(1974) <特稿：史波肯世界博覽會開幕與中華民國館>，《中央月刊》，第 6 卷，第 8 期，pp.153-156。
- 鄭時齡、陳易(2009) 《世博與建築》，臺北市：佳赫文化行銷公司。
- (2006) 《世博會規劃設計研究》，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鄭建華(1999) 《臺灣日治時期博覽會活動設計及其視覺傳達表現之研究》，臺北：臺灣科技大學工業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起東(1988) <清末「振興工商」研究>，《近代史研究》，第 3 期，pp.30-48。

- 鄭觀應(1998) <賽會>，載於氏著《盛世危言》，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pp.397-401。
- 蔡文輝(1980) <中國現代化綜合理論之建立>，郭承天譯，載於金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PP. 419-440。
- 蔡克驕(2001) <近代中國博覽業的先驅陳琪及其著述>，《近代史研究》，第1期，pp.307-313。
- 蔡錦堂(2007)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第1期，pp.51-88。
- 諸大建、姜富明主編(2004)《世博會對上海的影響和對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劉芳榮(2005)《一博天下：上海世博會商機無限》，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劉學照(1994) <論李鴻章和伊藤博文：19世紀中日近代化軌跡的投影>，《近代史研究》，第3期，pp.16-33。
- 劉楨麟(1987) <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收錄於宜今室主人編《皇朝經濟文新編：商務，稅則，郵政》，臺北縣永和市：文海。
- 劉鑫炎(2009) <萬季飛、周漢民、成岳沖、楊瀾談上海世博會籌備>，《新華網》，http://news.sohu.com/20090308/n262673884_1.shtml。
- 劉偉(1997)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發展趨勢及其特徵>，《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期，pp.39-45。
- 劉融(2003a) <「異地」臺灣：日本內地博覽會中的臺灣形象>，《暨南史學》，第6期，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pp.27-71。
- (2003b)《日治時期臺灣參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健(2010)《博覽勸業：世博會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劉翠華、李銘輝、彭予柱、劉家烘(2011)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遊客滿意度研究：以新生公園區夢想館為例>，《臺灣觀光學報》，第8期。
- 黎庶昌(2008)《西洋雜誌》，載於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6冊，長沙市：嶽麓書社，pp.387-598。
- 黎秀芳(2011)《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上海商會與國貨運動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鮑永安主編(2010) 《南洋勸業會報告》，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錢國紅(2009) 《走近"西洋"和"東洋"：中日世界意識形成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蕭瑞麟(2007) 《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台北：培生。
- 蕭瑞麟、侯勝宗、歐素華(2011) 〈演化科技意會：衛星派遣科技的人性軌跡〉
《資訊管理學報》，第 18 卷，第 4 期，pp.90-118。
- 蕭榮興(2015) 《義大利食品安全政府機關暨米蘭世博會參訪出國報告》，台北：資訊工業策進會。
- 戴光全(2005) 《重大事件對城市發展及城市旅遊的影響研究：以'99 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為例》，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 戴季陶(1989) 《日本論》，台北市：故鄉出版社。
- 戴鴻慈(2008)，《考察政治日記》，載於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 4 冊，長沙市：嶽麓書社，pp.291-530。
- 戴 蕾(2014) 〈1910 年日英博覽會中的階序與時序展示〉，《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第 49 期，pp.111-125。
- 謝工曲、楊豪中、吳采薇編著(2008) 《世博會：國際經驗與運作》，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謝休容(2013) 〈「建構自然」抑或「殖產興業」？幕末博物圖譜初探：以服部雪齋為中心〉，《議藝份子》，第 21 期，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pp.33-51。
- 謝長志(2010)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之展示主題與詮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 輝(2005) 《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 (2004) 〈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3 期，pp.97-103。
- (2002) 〈張謇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安徽史學》，第 4 期，pp.43-47。
- (1994) 《西湖博覽會研究》，中國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謝輝/林芳(2008) 《陳琪與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謝琦強、莊翰華、曾宇良、王欄蓁(2012) 〈展覽空間再利用規劃：以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為例〉，《嶺東學報》，第 32 期。

- 謝飛帆(1999) <世界博覽會的效益評估>，《社會科學》，第 12 期，pp.29-32。
- 鍾少華(1992) <一九二九年的杭州西湖博覽會>，《歷史月刊》，第 48 期，pp.106-110。
- (1991) <中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歷史月刊》，第 41 期，pp.98-103。
- 鍾叔和(1989)《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文化的前驅者》，台北市：百川書局。
- 韓克復(1996)《我國舉辦國際性博覽會土地開發目標體系與開發策略之研究》，臺北：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韓東育(2009)《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韓 敏主編(2007)《吳建民訪談錄》，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 薛 坤(2011)《近代中國博覽事業的起步和發展(1851-1937)》，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 魏愛文(2002) <清末商品賽會述評>，《貴州文史叢刊》，第 3 期，pp.24-28。
- 顏永昌(2010)《臺灣遊客參觀重大國際展覽認知與態度之研究：以上海世界博覽會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 靖(2011) <近代中國參加世博會之歷史嬗變>，《學術論壇》，2011 年第 1 期，PP.153-157。
- (2009a)《中國的世博會歷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09b)《近代中國與世博會》，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羅榮渠(2013)《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
- (1994) <跨世紀的沉思：對近代中國社會巨變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第 1 期，pp.4-10。
- 羅福惠(1995) <日中兩國的傳統文化與早期現代化的成敗>，《史學月刊》，第 2 期，pp.36-42。
- 蕭瓊瑞(2005)《楊英風全集》，臺北市：藝術家出版。
- 蘇文清(1998)《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宣傳計畫與設計之研究》，臺北：台灣科技大學工業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 立(2011)《不單作秀亦勸學：晚清中國英文報刊裡的萬國博覽會》，臺灣

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等譯(2010) 吉見俊哉著，《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的近代》，台北：群學出版社。

龔 克(2010)〈成都商業勸工會—中國最早的商品博覽會〉，《四川檔案》，第5期，p.21。

公論報，1948年10月23日、10月25日、10月26日

申報，1872年6月13日、9月13日、11月26日，1881年2月17日、3月9日、3月11日，1893年5月1日，1896年3月2日

民族晚報，1974年3月24日

徵信新聞，1967年6月23日

2010年台北國際花博網站 (<http://www.expo2010.tw/welcome/welcome.html>)

2010年上海世博網站

(<http://www.expo2010china.com/expo/chinese/sbdt/index.html>)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建築概述

(http://www.president.gov.tw/1_art/build/work.html)

Arrighi, Giovanni; Takeshi Hamashita; Mark Selden 主編，馬援譯(2006)《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Conn, Steven 著，王宇田譯(2012)《博物館與美國的智識生活，1876-1926》，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Bayly, C. A. 著，于展、何美蘭譯(2013)《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年》，北京：商務印書館。

Benjamin, Walter 著，張旭東、魏文生譯(2002)《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臺北市：臉譜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Dobord, Guy Ernest 著，王昭鳳譯(2002)《景觀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Elman, Benjamin A. 著，車行健譯(2006)〈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州的興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2期，pp.13-20。

Foucault, Michel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2007)《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新華書店經銷。

- Fraga, Monclus Javier F.著，于漫譯(2008) 《世界博覽會和城市規劃》，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 Galopin, Marcel 著，錢培鑫譯(2005) 《20世紀世界博覽會與國際展覽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 Gerth, Karl 著，黃振萍譯(2005) 《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Harrison, Lawrence E.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編著；李振昌、林淑慈譯 (2003) 《為什麼文化很重要》，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Heller, Alfred 著，吳惠族等譯(2003) 《文明的進程：世博會的發展與思考》，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文獻。
- Huntington, Samuel P.著，黃裕美譯(1997)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市：聯經出版社。
- Inkeles, Alex and David H. Smith 著，何欣譯(1981) 《邁向現代化》，台北市：黎明文化公司。
- Levathes, Louise 著，邱仲麟譯(2000) 《當中國稱霸海上》，台北：遠流出版社。
- Lipset, Seymour Martin 著，張明貴譯(1982) 《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初版，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 Maddison, Angus 著，伍曉鷹等譯(2004) 《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Maddison, Angus 著，伍曉鷹、馬德斌譯(2008) 《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西元960-2030年》，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 Menzies, Gavin 著，鮑家慶譯(2011) 《1421：中國發現世界》，台北：遠流出版社。
- Mills, C. Wright 著，張君玫、劉鈺佑譯(1996) 《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出版社。
- Moore, Barrington 著，拓夫譯(1991) 《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誕生時的貴族與農民》，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Morgan, M. J.著，陳瑤等譯(2010) 《人類景象：世博會從倫敦到上海》，北京市：新華出版社。
- Nye, Joseph S.著，吳家恆、方祖芳譯(2006) 《柔性權力》，台北市：遠流。
- Peyrefitte, Alain 著，王國卿等譯 (2007)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

- 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Potter, David 等編著，王謙等譯(2000)《民主化的歷程》，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有限公司。
- Reischauer, Edwin O. 賴世和著，王崧興譯(1963)〈日本與中國的近代化〉，載於《文星雜誌》，第 68 期，1963 年 6 月，pp.17-21
- Rodgers, Daniel T. 編著，吳萬偉譯(2011)《大西洋的跨越：進步時代的社會政治》，譯林出版社。
- Said, Edward W. 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1999)《東方主義》，立緒出版社。
- Schell, Orville & John Delury 合著，潘勛譯(2014)《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社。
- Servant, Claude & Ippei Takeda 合著，魏家雨等譯(2003)《國際級博覽會影響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 Spence, Jonathan D. 著，溫洽溢譯(2001)《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上海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Weber, Max 著，于曉等譯(2001)《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
- Weightman, Gavin 著，賈士蘅譯(2013)《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現代世界的創建 1776-1914 年(二版)》，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 Wright, Mary C. 著，房德鄰等譯(2002)《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Wright, Stanley F., 陳養才等譯(1993)《赫德與中國海關》，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
-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2010)《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市：中華書局。
- 佐佐木克著，孫曉寧譯(2016)《從幕末到明治：1853-1890》，北京：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
- 劉世龍著，陸梅、劉紅譯(2010)〈南洋勸業會與清末新政時期政府的振興產業政策〉，載於馬敏主編《博覽會與近代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pp.359-387。

二、日文部分

- 大阪大学 21 世紀懐徳堂編(2012) 《なつかしき未来"大阪万博" : 人類は進歩したのか調和したのか》, 大阪市: 創元社。
- 大前義幸(2008) <江戸末期における、日本使節団一行の西洋視察の考察: 第二回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を中心に> 《関西英学史研究》4 号 pp.1-14。
- 大島俊一(1996) <第一回万国博覧会とアメリカ的生産方式: 科学的技術発展の成果の集約としての水晶宮> 《産業経済研究所紀要》, Vol.6 pp.1-36。
- 大井浩二(1992) <アメリカ女性作家とシカゴ万国博覧会>, 《人文論究》, Vol.41, No.4, pp.1-14。
- 大貫涼子(2012) <地方博覧会の変容(序論): 明治前期を中心として>, 《國學院大學博物館學紀要》, Vol.37, pp.1-16。
- 小島淑男(1994) <1910 年の南洋勸業會和東南亞華僑>, 原載於作者編著的《近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 汲古書院 1993 年版, 譯文見丁日初主編《近代中國》第 4 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Pp.282-296。
- 小倉康寛(2013) <一八五五年、万国博覧会の中国展: ヴィンケルマンからボードレールへ>, 載於《言語社会》, 7 号, pp. 226-242。
- 三田誠広(2009) 《堺屋太一の青春と 70 年万博》, 東京都: 出版文化社。
- 三島雅博(1993) 《明治期の万国博覧会日本館に関する研究》, 日本神戸大學博士論文。
- 工藤泰子(2008) <明治初期京都の博覧会と観光>, 《京都光華女子大学研究紀要》, No. 46, pp.77-100。
- 下中弘編集(1988) 《世界大百科事典》, 東京: 平凡社
- 久本明日香(2010) 《19-20 世紀轉換期のアメリカにおける中国のイメージとセントルイス万博博覧会》,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博士論文。
- (2007)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娯楽街「パイク」について>, 《人間文化研究科年報》, Vol.22, pp. 41-56。
- (2004)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と清末中国>, 《寧楽史苑》, Vol.49, pp.38-54。
- 久米邦武(1989) 《米歐回覽實記》, 東京: 岩波。
- 山本光雄(1970) 《日本博覧會史》, 東京都: 理想社, 昭和 45 年。
- 山本佐恵(2012) 《戦時下の万博と「日本」の表象》, 東京都: 森話社。(山

本やまもと佐恵さえ)→政大總圖三樓中文圖書區/069.9 014

山田美香(2010) <清朝末期：万国博覧会と南洋勸業会>，載於柴田哲雄編著
《中国と博覧会：中国 2010 年上海万国博覧会に至る道》，成文堂出版
社，pp.3-18。

山路勝彦(2014)《大阪、賑わいの日々 二つの万国博覧会の解剖学》，東京：
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2009) <日英博覧会と「人間動物園」>，載於《関西学院大学社会
学部紀要》，108 號，pp.1-27。

——(2008)《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博覧会》，東京都：風響社。

——(2006) <満洲を見せる博覧会>，《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
101 號，pp.43-67。

——(2005) <台湾博覧会：植民地は今花盛り>，《比較日本文化研究》，
9 號，pp.45-84。

——(2004) <拓殖博覧会と帝国版図内の諸人種>，載於《関西学院大学
社会学部紀要》，97 號，pp.25-40。

山陰中央新聞社(1997)《山陰・夢みなと博覧会公式ガイドブック：ジャパン
エキスポ鳥取'97》，山陰・夢みなと博覧会協会。

土田映子(2013) <テクノロジーのユートピアと多民族の祭典：シカゴ「進
歩の一世紀」万国博覧会、1933-34 年>，載於《国際広報メディア・
観光学ジャーナル》，17 號，pp.13-25。

尹 基老(2005) <西洋に対しての日本と朝鮮の対応の比較：シーボルトと
ハーメルを手がかりに>，載於《県立長崎シーボルト大学国際情報学
部紀要》，第 6 号，pp. 293-303。

王 賓(2001) <中華の国から夷狄の国へ>，載於井上勝生編《幕末維新論集
(2)開國》，東京：吉川弘文館。

王 娟(2014) <万国博覧会跡地における博物館の展開>，載於《國學院大學
博物館學紀要》，39 號，pp.57-69。

中鉢令兒、劉潔君(2012) <万国博覧会から MICE の変遷：観光活動を視点と
して>，載於《都市学研究：北海道都市地域学会研究論文集》，49 號，
pp.11-18。

日本史籍協會森古秀亮編(1969)《大久保利通文書(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

- 會，昭和 44 年。
- 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1935)《**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日本萬國大博覽會**》，東京市：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昭和 10 年。
- 毛利敏彦(1969)《**大久保利通**》，東京：中央公論社。
- 丸山宏(1996)〈明治初期の京都博覽會〉收錄於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覽会の研究**》，東京都：思文閣，再版，pp.221-248。
- 戸田清子(2011)〈明治期における教育博物館の意義と工業教育の展開：手島精一の工業教育論をめぐる考察〉，《**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第 21 卷，第 4 号，pp. 37-67。
- (2010)〈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博覽会の産業振興的意義と役割：ウィーン万国博覽會を中心に〉，《**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第 20 卷，第 3 号，pp.157-183。
- (2008)〈万国博覽會と産業振興：明治期における「工芸」と工業化をめぐる考察〉，《**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第 18 卷，第 3/4 号，pp.27-37。
- 天野史郎(1992)〈ナポレオンのコルベル：シャブタルとフランス内国勸業博覽會〉，載於横山俊夫編《**視覚の一九世紀：人間、技術、文明**》，京都市：思文閣。
- 木下達文(2011)〈万国博覽會のあり方について〉，載於《**展示学**》，49 號，pp.90-96。
- 五島聖子(2008)〈日本庭園のアメリカへの伝来：ルイジアナ万国博覽會における日本庭園〉，載於《**日本庭園学会誌**》，18 號，pp.25-33。
- 永山定富(1933)《**内外博覽會總説：竝に我國に於ける萬國博覽會の問題**》，東京市：水明書院，昭和 8 年。
- 古川隆久(1998)《**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東京：中央公論社。
- 平野繁臣(1999)《**国際博覽會歴史事典**》，東京都：内山工房。
- (1997)〈人類の文明の表現としての万国博覽會 (特集 文化と国家)〉，載於《**国際交流**》，Vol.19，No.2，pp.54-61。
- 平井岳哉(2014)〈日本万国博覽會への三菱グループの参加に関する一考察〉，載於《**独協経済**》，94 號，pp.65-75。

- 平井 茜(2014) <1893年シカゴ万国博覧会に於ける日本館について>，載於
《國學院大學博物館學紀要》，39號，pp.91-102。
- 平田諭治(2004) <1884-5年ニューオーリンズ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の紹介>，
《筑波教育学研究》，2號，pp.1-16。
- 吉田光邦編(1996)《万国博覧会の研究》，東京都：思文閣。
- 吉田光邦(1999)《図説万国博覧会史：1851-1942》，京都市：思文閣
- (1996) <1910年南洋勸業會始末>，載於作者主編的《万国博覧会の研究》，
東京都：思文閣。pp.333-354。
- (1989) <博覧会：万博から花博までの20年>，《建築と社会》，Vol.70,
No.12，pp.20-22。
- (1970)《技術文明史上の萬國博覧會》，東京：日本放送協會。
- (1968)《お雇い外国人》V.2産業篇，東京都：鹿島研究所出版会。
- 吉見俊哉(2005)《万博幻想：戦後政治の呪縛》，東京都：筑摩書房。
- (1992a)《博覧会の政治学：まなざしの近代》，東京：中央公論社。
- (1992b) <ジャポニズム・帝国主義・万国博覧会>，《文芸》，
Vol.31,No.4，pp.434-441。
- (1990) <博覧会の歴史的変容：明治末～大正期日本における博覧会文化>，
《都市問題研究》，Vol.42,No.3，pp.43-59。
- (1989) <博覧会都市の現代的変貌：研究のための準備ノート>，《早稲田文学》，
No.160，pp.42-47。
- (1988) <博覧会の政治：明治国家形成と内国勸業博覧会>，《都市問題》，
Vol.79,No.11，pp.39-54。
- 吉田典子(2000) <1900年パリ万国博覧会：政治・文化・表象>，《国際文化学》，
Vol.3，pp.13-33。
- 竹内竜巳(2014) <博士 吉田光邦の博覧会意識とその評価>，《國學院大學博物館學紀要》，
Vol.39，pp.195-209。
- 西川智之(2006a) <ウィーンのジャポニズム(後編)パリとの比較を中心に(日本像を探る)>，
《言語文化研究叢書》，第6巻，pp.63-82。
- (2006b) <ウィーンのジャポニズム(前編)：1873年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言語文化論集》，
第27巻，第2号，pp.175-187。

- 西山 清(2010) <変貌する社会構造と万国博覧会>，《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 21 号，pp.55-70。
- 西田みどり(2004) <慶應 3 年パリ万国博覧会での佐賀藩：佐野常民を中心として>，《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論集》，第 28 号，pp.127-138。
- 西村吉正(1971) <万国博覧会跡地等の利用について>，《時の法令》，第 757 号，pp.32-37。
- 西野嘉章、根本亮子(1997) <田中文庫博覧会関連資料目録>，載於《学問のアルケオロジー》，東京大学。
- 寺下勅(2005)《日本の博覧会》，橋爪紳也監修，東京都：平凡社。
- 寺本敬子(2013) <1867 年パリ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日仏歴史学会会報》，Vol.28, pp.3-19。
- (2012)《1867 年・1878 年パリ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初期日仏交流史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形成》，日本一橋大學博士論文。
- 伊原澤周(1999)《日本と中國における西洋文化攝取論》，東京都：汲古書院。
- 伊藤真実子(2014) <1931 年パリ国際植民地博覧会>，載於福井憲彦監修，伊藤真実子、村松弘一編《世界の蒐集：アジアをめぐる博物館、博覧会、海外旅行》，東京都：山川出版社，pp. 229-254。
- (2012) <世紀日本の知の潮流：江戸後期~明治初期の百科事典、博物学、博覧会>，《19 世紀学研究》，第 6 号，pp. 59-78。
- (2008a)《明治日本と万国博覧会》，東京：吉川弘文館。
- (2008b) <博覧会研究の動向について：博覧会研究の現在とその意義>，《史學雜誌》，Vol.117，No.11，pp. 104-111。
- (2006)《明治政府と万国博覧会：近代日本の自己認識》，日本學習院大學博士論文。
- (2005) <第五回内国勸業博覧会と万博開催への模索：台湾館と人類館>，《日本歴史》，No.686，pp.69-84。
- (2003) <一九〇四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と日露戦時外交>，《史學雜誌》，Vol.112，No.9，pp.1542-1562。
- 百崎誠(2005) <わが国博覧会の歴史と変遷>，《研究広報誌》，Vol.13, pp.4-8。
- 名古屋学院大学総合研究所(2005)《国際博覧会を考える：メガ・イベントの

政策学》, 京都: 晃洋書房。

江原規由(2015) <都市化をテーマとした上海万博: 万博をめぐる中国の過去と未来>, 載於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 京都: 思文閣出版, pp.681-710。

芳井敬郎(1996) <第5回内国勸業博のディスプレイ>, 載於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覧会の研究》, 東京都: 思文閣, 再版, pp.287-306。

坂本久子(2007) <日本の出品にみる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と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の関連>, 《研究発表大会概要集》, 第54回, 日本デザイン学会。

佐野真由子編(2015)《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 京都: 思文閣出版。

佐野真由子(2015) <万博の人、ラザフォード・オールコック—1851、1862、1878、1886>, 載於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 京都: 思文閣出版, pp.21-52。

佐藤正晴(2004) <メディア史としての万国博覧会: 1970年日本万国博覧会を事例として>, 《明治学院論叢》, No.713, pp.81-102。

佐藤哲夫(2007) <駐在員の眼: 万国博覧会に向け着々と準備をすすめる上海市>, 《中国経済》, No.499, pp.8-14。

佐藤洋子(1998) <日欧文化の相互影響について: 万国博覧会と文芸雑誌から>, 《早稲田大学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紀要》, Vol.11, pp.77-108。

——(2010) <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と日本人関係者>, 《日本デザイン学会研究発表大会概要集》, Vol.57, pp.F09-F09。

——(2010) <日本の出品にみる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1876年)とパリ万国博覧会(1878年)の関連>, 《近畿大学九州短期大学研究紀要》, No.39, pp.1-12。

——(2008) <日本の出品に見る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と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の関連>, 《近畿大学九州短期大学研究紀要》, No.38, pp.1-15。

——(2001) <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とアーネスト・F・フェノロサ>, 《近畿大学九州短期大学研究紀要》, No.31, pp.1-25。

阿部純一郎(2014)《<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國史 統治技術としての観光・博覧會・フィールドワーク》, 東京市: 新曜社。

- 松田京子(2015) <大正期の日本における「南洋」表象：一九一四年東京大正博覧会、一九二二年平和記念東京博覧会を中心に>，《南山大学日本文化学科論集》，No.15，p.47-66。
- (2003) 《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 (2002) <帝国の博覧会と「東洋の商都」大阪：世紀転換期の帝国意識と「貧民街」移転問題をめぐって>，《歴史研究》，Vol.48，pp.1-30。
- (1998) <世紀転換期における「他者」表象の技法：一九〇三年第五回内国勸業博覧会を中心に(平成八年度博士論文(課程)要旨)>，《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Vol.38，pp.A20-A22。
- 松本孝徳、福永洋介、持田明子(2008) <パリ万国博覧会を契機とした日本文化受容：川上音二郎・貞奴を中心に>，《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Vol.37，pp. 145-155。
- 松園俊志(2000) <ハノーバー万博から愛知万博への課題：万国博覧会の光と影>，《東洋大学短期大学紀要》，No.32，pp.59-67。
- 松村昌家(2014) 《大英帝国博覧会の歴史 ロンドン・マンチェスター二都物語》，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 (2004) <エドからロンドンまで：ジョン・マクドナルドの遣欧使節団同行記>，《大手前大学人文科学部論集》，Vol.5，pp. 127-142。
- (2003) <一八六二年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場の幕末使節団 (一)> 《大手前大学人文科学部論集》，Vol.4，pp. 103-120。
- (1997) <ロンドン万博会場の幕府使節団>，《図書》，Vol.574，pp.22-27。
- 東田雅博(2012) <万国博覧会研究の最近の動向：グローバル化と大博覧会>，《金沢大学歴史言語文化学系論集 史学・考古学篇》，No.3，pp.151-164。
- (1992a) <「文明化の使命」とアジア：ヴィクトリア時代におけるインド、中国、日本のイメージ(1850年-1900年)>，《思想》，No.811，pp.121-140。
- (1992b) <ヴィクトリア朝英国における世界観：万博と「文化帝国主義」>，《史学研究》，No.170，pp.40-56。ベテラン

- 並松信久(2016)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博物館政策の展開>，《京都産業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1号，pp.8-47。
- 芳賀 徹(2015) <岩倉使節団の見たウィーンとウィーン万博>，載於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京都：思文閣出版，pp.53-72。
- (1968)《大君の使節：幕末日本人の西欧体験》，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 武藤秀太郎(2015) <南洋勸業会をめぐる日中関係：上海万博との対比から>，載於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京都：思文閣出版，pp.621-646。
- 味岡京子(2002) <1893年シカゴ万国博覧会「女性館」：「芸術」と「女性の領域」>，《文化学研究》，No.11，pp.54-57。
- 重富公生(2012) <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と労働者>，《国民経済雑誌》，Vol.206 No.5，pp.33-47。
- (2011)《産業のパクス・ブリタニカ：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の世界》，東京都：勁草書房。
- (2010) <2010年上海万国博覧会めぐって：万国博史上における位置づけを中心に>，《国民経済雑誌》，Vol.202, No.6，pp.15-26。
- (2009) <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開催と地方産業界：開催合意形成過程での反応と対応を中心に>，《神戸大学経済学研究年報》，Vol.56，pp.21-39。
- (2007) <19世紀半ばイギリス産業の自己認識：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余剰金の使途をめぐって>，《国民経済雑誌》，Vol.195, No.3，pp.49-63。
- (2005) <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の表彰問題をめぐって>，《国民経済雑誌》，Vol.191, No.4，pp.69-83。
- (2003a) <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と製造業利害：「バーミンガム問題」を中心に>，《神戸大学経済学研究年報》，Vol.50，pp.1-14。
- (2003b) <十九世紀なかばイギリスの商品世界：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展示品を中心に>，《ヴィクトリア朝文化研究》，No.5，pp.5-23。
- (2001) <万国博出品からみた十九世紀半ばヨーロッパ分業圏：1851年ロンドン万国博試論>，《国民経済雑誌》，Vol.183, No.6，pp.35-50。
- 前田典子(2009) <福澤諭吉と近代美術/関連年譜(1834-1915)>，《Booklet》，

Vol.17, pp.176-190。

畑智子(2001) 《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建築 1876-1904：アメリカ合衆国における三博覧会の分析を通じて》，日本京都工芸繊維大学博士論文。

——(2000)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の建築物>，《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No.532, pp.231-238。

——(1998) <1876年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の概要と「日本」の出品状況について>，《賀茂文化研究》，No.6, pp.31-42。

——(1998) <1876年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の建築にみる「日本」>，《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No.503, pp.195-201。

——(1998) <19世紀世界の中の日本：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にみる文化交流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国際交流・国際協力・「国際貢献」）>，《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No.44, pp.1-12。

——(1997) <19世紀の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の展示空間-1876年フィラデルフィア博を中心に>，《デザイン学研究/研究発表大会概要集》，No.44, p.38。

柴田哲雄(2010) 《中国と博覧会：中国 2010 年上海万国博覧会に至る道》，東京都：成文堂。

——(2010) <中国の改革開放期における博覧会：中国'99 昆明世界園芸博覧会と中国 2010 年上海万国博覧会>，《愛知学院大学教養部紀要》，Vol.57, No.3, pp.35-48。

倉橋正直(1978) <清末の實業振興>，野澤豊編，田中正俊同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昭和 53-55，pp.63-92。

海野弘(2013) 《万国博覧会の二十世紀》，東京都：平凡社。

宮永孝(1993) 《幕末オランダ留学生の研究》，日本法政大学博士論文。

原田鎮郎(2008) <21世紀アジアの循環型都市へ：愛・地球博から上海万国博覧会へ>，《新建築》，Vol.83, No.5, pp.142-147。

高井宏子(2004) <万国博覧会とデパート：産業社会の博物学から消費社会の記号へ>，《環境創造》，Vol.17, pp.75-95。

徐 蘇斌(2015) <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国の万国博覧会参加をめぐる権力の変容>，載於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

- 史》，京都：思文閣出版，pp.591-620。
- 曹建南(2015) <中国における博覧会ブームの誕生>，載於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京都：思文閣出版，pp.711-728。
- 國雄行(2013)《佐野常民 佐賀偉人伝》，佐賀県立佐賀城本丸歴史館。
- (2010)《博覧会と明治の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
- (2005)《博覧会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覧会政策》，東京：岩田書院。
- (2004) <博覧会時代の開幕>，載於松尾正人編《日本の時代史 21：明治維新と文明開化》，東京：吉川弘文館。
- (2003) <第五回内国勸業博覧会と大阪>，《文化国際研究》，9号。
- (1993) <内国勸業博覧会の基礎的研究—殖産興業・不平等条約・『内国』の意味>，《日本史研究》，375号。
- 野澤豊(1983) <辛亥革命與産業問題：1910年の南洋勸業會與日、美兩國實業團の訪華> 原載於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報》，第154號，譯文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中華書局，pp.2473-2496。
- 野村啓介(2011) <1855年のパリ万国博覧会準備にみるジロンド県万博委員会とワイン出品問題：フランス第二帝制下における万博政策と地域権力> 載於《国際文化研究科論集》，No.19，pp.91-102。
- 御古一茂(2009) <近代日本社会と博覧会：1877～1903内国勸業博覧会を中心に> 載於《人間社会学研究集録》，No.9，pp.109-130。
- 須見裕(1984)《徳川昭武：萬博殿様一代記》，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 湯本豪一(1996)《図説明治事物起源事典》，東京都：柏書房。
- 湯川嘉津美(1984) <明治初期における西洋幼児教育の受容過程：万国博覧会を中心にして>，《日本の教育史学：教育史学会紀要》，Vol.27，pp.46-64。
- 椎名仙卓(2005)《日本博物館成立史：博覧会から博物館へ》，東京都：雄山閣。
- (2000)《図解博物館史》，東京都：雄山閣。
- 馮赫陽(2010) <初期万国博覧会に見られる「中国趣味」から「日本趣味」への趨勢について> 載於《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No.3，pp.511-528。

- 渡辺かよ子(2003) <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教育」>，《愛知淑徳大学論集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篇》，No.3，pp.149-161。
- 菊浦重雄(1983) <幕府・維新期の万国博覧会と「技術移転」：経済史との関連で>，《桜美林エコノミクス》，No.13，pp.1-29。
- 福井庸子(2010)《わが国における博物館成立過程の研究：展示空間の教育的特質》，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
- (2007) <大正期における博物館教育活動に関する研究：東京教育博物館の特別展覧会を中心に>，《早稲田教育評論》，Vol.21, No.1，pp. 51-63。
- (2006) <戦前における社会教育機関としての博物館の機能と学芸員の専門性：棚橋源太郎の博物館教育観を中心に>，《アジア文化研究》，Vol.13, No.13，pp. 15-26。
- (2006) <明治初期博覧会における展示空間の成長>，《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第54号，pp. 51-61。
- (2005) <明治初期博覧会における展示空間の生成：『博物帖』を手がかりに>，《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第54号，pp. 51-61。
- 福井憲彦(2014)監修，伊藤真実子、村松弘一編《世界の蒐集：アジアをめぐる博物館、博覧会、海外旅行》，東京都：山川出版社。
- 福田州平(2013) <博覧会における「文明」と「野蛮」の階梯：人類館事件をめぐる清国人留学生の言説>，《OUFCブックレット》，第1号，pp. 26-46。
- 福間良明、難波功士、谷本奈穂 編著(2009)《博覧の世紀：消費／ナショナルティ／メディア》，東京都：梓出版社。
- 福澤諭吉(2002)《西洋事情》，マリオン・ソシエ、西川俊作合編，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
- 鈴木智夫(2005)《近代中国と西洋国際社会》，東京都：汲古書院。
- (2002) <祁兆熙の『出洋見聞瑣述』について(二)>，《人間文化：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Vol.17，pp. 314-292。
- (2001) <祁兆熙の『出洋見聞瑣述』について(一)>，《人間文化：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Vol.16，pp. 304-293。
- (2000) <清朝の遣米教育使節団と在日・在米華人(4)>，《人間文化：

- 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5, pp. 218-207。
- (1999) <清朝の遣米教育使節団と在日・在米華人(三)> 《人間文化：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4, pp. 215-230。
- (1998) <清朝の遣米教育使節団と在日・在米華人(二)> 《人間文化：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3, pp. 318-303。
- (1997) <清朝の遣米教育使節団と在日・在米華人(一)> 《人間文化：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2, pp. 238-225。
- (1996) <万国博覧会と中国-1851~1876>, 《人間文化：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1, 愛知学院大学, pp. 174-162。
- (1995) <李圭の訪米と在米華人>, 《愛知学院大学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25, pp.119-129。
- 楠元町子(2016) <1876年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国の展示>,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41号, pp.83-100。
- (2015) <1862年第2回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40号, pp.55-72。
- (2013) <日英博覧会と明治政府の外交戦略>,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38号, pp.41-56。
- (2012) <万国博覧会に見る明治政府の国際戦略：1902年ハノイ博覧会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37号, pp.105-120。
- (2011) <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に見る日本ブランドの萌芽>,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36号, pp.55-68。
- (2010) <万国博覧会と皇室外交：伏見宮貞愛親王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35号, pp.31-43。
- (2009) <万国博覧会と女性委員会(Board of Lady Managers)：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に>,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第34号, pp.31-42。
- (2007a) <国際関係史から見た万国博覧会：一九〇四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を中心に>, 《法政論叢》, Vol.43, No.2, pp. 22-38。

- (2007b) <万国博覧会の展示と世界観の形成：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に>，《日本生涯教育学会論集》，Vol.28，日本生涯教育学会，pp.1-10。
- (2007c)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の展示品と評価>，《愛知淑徳大学現代社会研究科研究報告》，第2号，pp.135-147。
- (2005) <万国博覧会と中国：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に>，《現代社会学部論集》，No.10，pp.139-151。
- (2003a) <一九〇四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と日露戦時外交>，《史学雑誌》，Vol.112, No.9，pp.1542-1562。
- (2003b)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覧会と日露戦争：異文化交流の視点から>，《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No.6，pp.135-150。
- (2002) <万国博覧会と異文化交流：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の事例を中心に>，《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No.5，pp.155-167。
- (2001) <岡倉天心にみる万国博覧会と異文化交流>，《愛知淑徳大学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言語文化》，Vol.9，pp.71-80。
- 榎木野衣(2005) 《戦争と万博》，東京都：美術出版社。
- 電通(1990) 《世界デザイン博覧会公式記録》，名古屋：世界デザイン博覧会協会。
- 愛・地球博公式ガイドブック制作共同事業体(2005) 《2005年日本国際博覧会：愛・地球博公式ガイドブック》，名古屋：財団法人2005年日本国際博覧会協会。
- 愛知峰子(2008) <樋口一葉と万国博覧会：『うもれ木』と「陽明門」(岡本勝教授追悼号)>，《人文学部研究論集》，No.19，pp.224-216。
- 諸岡博熊(1987) 《博覧会学事始》，兵庫県：エスエル出版会。
- 稲賀繁美編(2007) 《伝統工芸再考：京のうちそと過去発掘・現状分析・将来展望》，京都市：思文閣。
- 横山俊夫編(1992) 《視覚の一九世紀：人間、技術、文明》，京都市：思文閣。
- 範 虹(2007) <大博覧会と小博覧会：ヴィクトリア朝ロンドンにおける中国の展示品>，《大手前大学論集》，第8号，pp.203-217。
- 樋口いずみ(2008a) <日本の万国博覧会参加における「実演」とその役割に関する考察：1878年パリ万国博覧会を事例として>，《早稲田大学大

- 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別冊 (16-1), pp.197-206。
- (2008b) <1878年パリ万国博覧会と日本の教育部門への参加>,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別冊 (16-2), pp.173-183。
- (2004) <1878年パリ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 日本の出品当事者の意図と欧米側の反応>,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Vol.10, pp.161-178。
- (2003) <文化交流の視点からみた1878年パリ万国博覧会: 日本の出品当事者の意図と交流の実態>, 《文化研究》, No.12, pp.93-95。
- 澤 護(1981) <清水卯三郎: 1867年パリ万国博をめぐって>, 《千葉敬愛経済大学研究論集》, Vol.19, 千葉: 敬愛大学・千葉敬愛短期大学, pp.493-511。
- 橋爪紳也(2005) 《万国びっくり博覧会: 万博をひやく百倍楽しむ本》, 東京都: 大和書房。
- 館野直子(2009) <伊藤真実子著『明治日本と万国博覧会』> 《学習院史学》, Vol.47, pp.73-78。
- 藤原隆男(2011) <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の特殊性>, 《富士大学紀要》, Vol.43, No.2, pp.1-12。
- (2009) <1873年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賛同の産業発達史上の意義(下-3)>, 《富士大学紀要》, Vol.42, No.1, pp.9-41。
- (2008) <1873年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賛同の産業発達史上の意義(下-2)>, 《富士大学紀要》, Vol.41, No.1, pp.13-56。
- (2007) <1873年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賛同の産業発達史上の意義(下-1)>, 《富士大学紀要》, Vol.40, No.1, pp.7-24。
- (2006b) <1873年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賛同の産業発達史上の意義(中)>, 《富士大学紀要》, Vol.39, No.1, pp.39-61。
- (2006a) <1873年ウィーン万国博覧会賛同の産業発達史上の意義(上)>, 《富士大学紀要》, Vol.38, No.1-2, pp.3-12。
- 関口英里(2006) <ホワイト・シティの女性たち: 万国博覧会という文化装置>, 《同志社女子大学学術研究年報》, 第57号, pp.11-18。
- (1998) <シカゴ万国博覧会・女性館における19世紀アメリカの女性像>, 《大阪大学言語文化学》, Vol.7, pp.75-91。

- 関根 仁(2010) <大倉孫兵衛と博覧会：万国博覧会・内国勸業博覧会への出品>，《大倉山論集》，第 56 号，pp.25-41。
- (2007) <國雄行著『博覧会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覧会政策-』>，《中央史学》，Vol.30，pp.226-233。
- (2004) <明治 16 年水産博覧会の開催>，《日本歴史》，第 671 号，pp.62-79。
- (2003) <明治初期における海外博覧会と漁業振興：1880 年ベルリン漁業博覧会参加を中心に>，《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Vol.33，pp.71-83。
- (2001) <1876 年フィラデルフィア万国博覧会と日本：参加過程・状況を中心に>，《中央史学》，Vol.24，pp.84-106。
- 巖 安生(2006) <中・日近代化における先見の効用：『特命全權大使米欧回覧実記』と『郭嵩＝倫敦与巴黎日記』>，《大手前大学人文科学部論集》，第 7 号，大手前大学人文科学部，pp.1-22。
- 劉 世龍(1998) <南洋勸業会と清末新政期政府の産業振興政策>，《広島東洋史学報》，第 3 号，pp.20-39。

三、英文部分

- Allwood, John(1997) *The Great Exhibitions*, London : Studio Vista.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erbach, Jeffrey(1999)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 a Nation on Display*, New Haven, C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uerbach, Jeffrey and Peter H. Hoffenberg (2008) *Britain, the Empire, and the World at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ub. Company.
- Benedict, Burton (1893) *The Anthropology of World's Fairs : San Francisco's 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1915*, Berkeley : Scholar Press.
- Benjamin, Walter(1969)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erspecta*, Vol. 12, pp. 163-172.

- Bennett, 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 Bletter, Rosemarie Haag et al. (1989) *Remembering the Future :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from 1939-1964*, New York : Rizzoli
- Boix, Carles and Stokes, Susan C.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pp. 515-549.
- Briggs, Asa(2000) "Exhibiting the Nation." *History Today* , Vol.50, No.1,pp.16-25.
- Burg, David F. (1976) *Chicago's White City of 1893*, Lexington :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Burris, John P. (2001) *Exhibiting Religion : Colonialism and Spectacle at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51-1893*, Charlottesville, Va. :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Christ, Carol Ann(2000)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8, No.3, pp.675-709.
- _____ (1996) "Japan's Seven Acres: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at the 1904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Gateway Heritage*, Vol.17, No.2, 2-15.
- Clevenger, Martha R. (1996) "Through Western Eyes: Americans Encounter Asians
at the Fair." *Gateway Heritage*, Vol.17, No.2, pp.42-51.
- Conant, Ellen P. (1991) "Refractions of the Rising Sun: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1862-1910" in Eomoko Sato & Toshio
Watanabe(ed) *Japan and Britain: an Aesthetic Dialogue 1850-1930*,
London: Lund Humphries, pp.78-92.
- Cortinovis, Irene E. (1977) "China at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 No. 1, (October), pp. 59-66.
- Cotter, Bill (2009) *The 1939-1940 New York World's Fair*, Charleston, S.C. :
Arcadia Pub.
- Cotter, Bill and Bill Young (2008) *The 1964-1965 New York World's Fair :
Creation and Legacy*, Charleston, S.C. : Arcadia Pub.
- Christ, C. A.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t the 1904

- St. Louis World's Fair. "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8 no. 3, 2000, pp. 675-709.
- Cull, Nicholas J. (2012) "Sinking and Swimming at the Yeosu expo: Public Diplomacy and Nation Branding in South Korea, 2012",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No.8, pp.249-255.
- Daykin, Jeffer (2014) "The Transfer of the Exposition Form from Europe to Japan and China : The Case of Jury Awards", *The 50th Congress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of Japan*. [http://www.worldbhc.org/files/ full%20program/A5_B5_.pdf](http://www.worldbhc.org/files/full%20program/A5_B5_.pdf)
- Eckersall, Peter(2013) *Performativity and Event in 1960s Japan : City, Body, Memory*,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 Edwards, Anthony David (2008)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Britain, 1850-1910 :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Decline and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Issue*, Amherst, NY : Cambria Press.
- Edwards, Sue Bradford (1996) "Imperial East Meets Democratic West: The St. Louis Press and the Fair's Chinese Delegation", *Gateway Heritage*, Vol. 17, No. 2, Fall, pp. 32-41
- Endersby, Linda Eikmeier(1999) *Expositions, Museums, and Technological Display: Building Cultural Institutions for the 'Inventor Citize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Ph.D. Di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Fernsebner, Susan R.(2010) "Expo 2010: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9, No. 3 (August), pp. 669-676.
- _____ (2006) "Objects, Spectacle, and a Nation on Display at the Nanyang Exposition of 1910", *Late Imperial China*, 27, No. 2 (December), pp.99-124.
- _____ (2002) *Material Modernities :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 1876-1955*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Findling, John E. (1990)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

- 1851-1988*,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 Fisher, David C.(2003) **Exhibiting Russia at the World's Fairs, 1851-1900**.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 Fitzpatrick, Anne Lincoln (1990) *The Great Russian Fair : Nizhnii Novgorod, 1840-90*,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 Ganz, Cheryl R. (2008) *The 1933 Chicago World's Fair : a Century of Progress*,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eppert, Alexander C. T.(2010) *Fleeting Cities: Imperial Expositions in Fin-de-Siècle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eppert, Alexander C.T., Jean Coffey and Tammy Lau (2006)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and World's Fairs, 1851-2005:A Bibliography*, <http://www.csufresno.edu/library/subjectresources/specialcollections/worldfairs/ExpoBibliography3ed.pdf>
- Gilbert, James Burkhart (2009) *Whose Fair? : Experience, Mem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St. Louis Exposition*, Chicago, Ill. ; Lond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1) *Perfect Cities : Chicago's Utopias of 1893*, Chicago, Il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dley, Michael R. (1978) "China's World's Fair of 1910: Lessons from a Forgotten Event",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3, pp. 503-522.
- Greenhalgh, Paul (2011) *Fair World: A Histo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 from London to Shanghai 1851-2010*, Winterbourne, Berkshire, U.K. : Papadakis
- (1988)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a, Sae-Bong (2007) "Taiwan and Its Self-Images: The Case of Osaka Exhibition in 1903",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14, No. 2 (June), pp. 1-39.
- HAN, Kou (2007) "The Great Exhibition and the Little One : Chinese Display in Victorian London", *Otemae Journal*, No. 8 (June), pp.203-217.
- Harris, Neil(1975) "All the World a Melting Pot? Japan at American Fairs,

- 1876—1904." in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edited by Akira Iriy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4-54.
- Harrison, Lawrence E.(1985)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 Lanham, MD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Harvey, Penelope(1996) *Hybrids of Modernity: Anthropolog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Universal Exhibition*. London: Routledge.
-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Martin Heidegger (ed.), William Lovitt (tran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p.115–154.
- Heller, Alfred (1999) *World's Fair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 an Insider's View*, Corte Madera, CA : World's Fair, Inc.
- Hobhouse, Hermione (2002) *The Crystal Palace and the Great Exhibition : Art, Science, and Productive Industry : a History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for the Exhibition of 1851*, London ; New York : Continuum.
- Hoffenberg, Peter H.(2001) *An Empire on Display : English, Indian, and Australian Exhibitions from the Crystal Palace to the Great War*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fheinz, Jr., Roy and Kent E. Calder (1982)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 Basic Books.
- Hotta-Lister, Ayako (1999)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of 1910 : Gateway to the Island Empire of the East*, Richmond, Surrey : Japan Library.
- Huang, Yaocheng (2007) *Shanghai Expo*, Singapore : Thomson Learning.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76) "Is Democracy Dying? : Verdict of Leading World Scholar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rch 8.
- Hur, Hyungju(2012) *Staging Modern Statehood: World Exhibitions and the Rhetoric of Publishing in Late Qing China, 1851-191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Harrison, Lawrence E. & Huntington, Samuel P. (eds.) *Culture Matters :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 Basic Books, pp.80-97
- Jackson, Anna (2008) *EXPO :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51-2010*, London : V&A Publishing,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 New York, N.Y. : Distributed in North America by Harry N. Abrams.
- Japan Association for the 1970 World Exposition(1972) *Japan World Exposition, Osaka, 1970: Official Report*, Suita City, Osaka Prefecture : Commemorative Association for the Japan World Exposition (1970)
- Kertzer, Davi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ornicki, P. F. (1994) "Public Display and Changing Values : Early Meiji Exhibitions and Their Precursors",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49, No. 2, pp. 167-196
- Kumar, Krishan (1978) *Prophecy and Progress : the Sociology of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London : Penguin.
- Langlois, Lisa Kaye(2004) *Exhibiting Japan: Gend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of 189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0)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 Volume 1, Number 4, pp.80-83.
- Markwyn, Abigail (2008) "Economic Partner and Exotic Other: China and Japan at San Francisco's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Winter, Vol. 39, Issue 4, p439-465.
- (2006) *Constructing "an Epitome of Civilization" : Local Politics and Visions of Progressive Era America at San Francisco's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May, Trevor (2010) *Great Exhibitions: From the Crystal Palace to the Dome*, Osprey Publishing.
- Meyer, Jonathan (2006) *Great Exhibitions : London, New York, Paris, Philadelphia, 1851-1900* , Woodbridge, Suffolk, [England] :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 Mitchell, Timothy(1992) "Orientalism and the Exhibitionary Order", in Nicholas B. Dirks (ed) ,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289-318
- Monclús, Javier (2009)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Urbanism: the Zaragoza Expo 2008 Project*, Farnham,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 Morton, Patricia A. (2000) *Hybrid Modernities: 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at the 1931 Colonial Exposition, Paris*, The MIT Press.
- Nordin, Astrid H. M.(2012) "Taking Baudrillard to the Fair: Exhibiting China in the World at the Shanghai Expo",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37 Issue 2, pp. 106-120
- O'Donnell, Guillermo A.(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itman, Jennifer (2002) "China's Presence at the Centenni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 10:1, pp.35-73
- Potter, David (1997) "Explaining democratization", in David Potter et al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Polity, pp.1-40
- Pluvinage, Gonzague (2008) *Expo 58 :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Brussels [Belgium] : Brussels City Archives : State Archives in Belgium : Éditions Racine.
-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o Limongi(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pp. 155-183.
- Roche, Maurice(2000)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Roche, Maurice (2003) "Mega-Events, Time and Modernity." *Time & Society* 12:1:

99-126.

- Rosenberg, Chaim M(2008) *America at the Fair : Chicago's 1893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arleston, S.C. : Arcadia Pub.
- Ru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pp. 337-363.
- Rydell, Robert W. (1993) *World of Fairs : the Century-of-Progress Expositions*, Chicago, Il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4) *All the World's a Fair :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Il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ydell, Robert W., John E. Findling, Kimberly D. Pelle (2000) *Fair America : World's 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Rydell, Robert W. & Nancy E. Gwinn (1994) *Fair Representations :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 VU University Press.
- Rydell, Robert W. & Laura B. Schiavo(2011) *Designing Tomorrow: America's World's Fairs of the 1930s*, 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 Samuel, Lawrence R. (2009) *The End of the Innocence : the 1964-1965 New York World's Fair*, Syracuse, N.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 Daniel(2013) *The Empire of Progress: West Africans, Indians, and Britons at the 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 1924-25*,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 Tenorio-Trillo, Mauricio (1996) *Mexico at the World's Fairs : Crafting a Modern N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ke, Francesca(2013) "Degrees of othern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at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 in Jeffrey A. Auerbach & Peter H. Hoffenberg(eds) *Britain, the Empire, and the World at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 pp. 191-205.
- Vennman, Barbara(1996) "Dragons, Dummies, and Royals: China at American World's Fairs, 1876-1904", *Gateway Heritage*, Vol. 17, No. 2, Fall, pp. 16-31

- Vogel, Ezra F.(1991)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den, Keith (1997) *Becoming Modern in Toronto : 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a Late Victorian Culture*, Toronto, Ont. ; Buffalo, N.Y.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Williams, Rosalind H. (1982)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right, Mary C. (1962)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Sandra (2012) "Exhibiting a New Japan: the Tokyo Olympics of 1964 and Expo '70 in Osaka", *Historical Research*, Volume 85, Issue 227, pp.159–178
- Yengoyan, Aram A. (1994) "Culture, Ideology and World's Fairs: Colonizer and Colonize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Robert W. Rydell & Nancy E. Gwinn eds. *Fair Representations: World's Fair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pp.62-83.
- Young, Paul (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Exhibition: the Victorian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